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

(下)

[美] 罗伯特·E.戈定 主编

[美] 卡尔斯·波瓦克斯 [美] 苏珊·C.斯托克斯 编

唐士其等 译

 人民出版社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

(下)

[美] 罗伯特·E.戈定 主编

[美] 卡尔斯·波瓦克斯 [美] 苏珊·C.斯托克斯 编

唐士其等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阮宏波  
责任编辑:忽晓萌  
封面设计:汪莹  
责任校对:张红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美)戈定(Goodin, R.E.)主编;(美)波瓦克斯(Boix, C.),  
(美)斯托克斯(Stokes, S.C.)编;唐士其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01-015764-1

I. ①牛… II. ①戈…②波…③斯…④唐… III. ①比较政治学-手册  
IV. ①D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4749号

书名原文: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01-2011-4645

## 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

NIUJIN BIJIAO ZHENGZHIXUE SHOUCHE

[美]罗伯特·E.戈定 主编 [美]卡尔斯·波瓦克斯

[美]苏珊·C.斯托克斯 编 唐士其等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61

字数:1201千字

ISBN 978-7-01-015764-1 定价:128.00元(上、下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第六部分

**大众政治动员**



## 第二十一章 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产生

卡尔斯·波瓦克斯(Carles Boix)

在瑞士的少数州,所有投票者每年召开公民大会;新英格兰也有一些市镇,居民在公开的市镇会议上辩论和投票。除此之外,所有现代民主国家都实行代议制民主,因为直接民主在今天的世界上根本不可行。每一个国家的地域都太大,人口也太多,让相当数量的公民在一起以任何有意义的、可持续的方式直接讨论随时遇到的政治问题,已经完全不可能。公众所关心大多数议题,涉及面既广,内容也相当复杂。任何一个人,哪怕在政治上耗尽他的全部精力,也不可能将这些问题完全掌握。在经济生活中,人们以高度专业化的方式生产和工作,当代政治也一样,所有领域贯彻了劳动分工的理念。选民们不再直接做决定。他们通过定期选举,挑选出一部分政治家制定政策,并统治他们自己。换言之,在一定期限内,即下一次选举之前,他们把制定决策和监督这些决策的全部权力委派给他们的代表。至于未来的选举,大概就是唯一的、而且可能并不完善的机制,以约束政策决定者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

现代政治的范围,以及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和议会机制,都推动着政治家去建立,或者参与选举和立法“团队”或政党,这种稳定的组织使政治家能够在各选区、议会、行政机构或政府委员会中协调其政治行为。在议会舞台上,党派之间的协调减少了制定和通过法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此外,党派协调也有可能增强立法机关要求行政机构作出回应的能力。在选举的时候,政党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政治家征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他们得以宣传及动员选民。政党通过简化候选人的选拔程序,并强迫选民通过策略协调为本党候选人投票,可以增加自己获胜的可能性。最后,政党通过在某些议员间形成一种稳固的合作形式,可以使他们能够提供更为稳定的纲领并在选民面前以清晰的方

式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从而战胜他们的对手。<sup>①</sup>

毫不奇怪,政党在代议民主制之下是一个普遍现象。近代早期议会形成的时间,在美国是18世纪80年代,在法国是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年,在英国则伴随着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对立。紧接着出现的,就是派别之间的协调,或者政治代表之间稳固的合作。随着选举的扩展,以及选举成为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择机制,这些派别也逐渐发展成更具凝聚力的机器。它们约束其成员支持或者反对政府、向选民们提出统一的施政纲领,并且动员选民投票。作为选举和立法机制的现代政党,于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现在杰克逊时期的美国。在比利时和瑞士,统一的自由派(或激进派)政党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晚期。在英国,自由派最终于19世纪50年代聚合为一个议会政党。到19世纪80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并具有广泛的目标。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基督教徒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欧洲大陆组建了高度集中的群众性政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所有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几乎所有的选举竞争和议会斗争都要围绕组织严密的政党展开了。

## 一、问题:什么政党,哪种政党制度?

通过政党这种候选人和议会议员吸引选票和进行管理的团队来协调政治家的行动,这在现代民主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的、绝无例外的现象,但政治家的组织方式,以及选民应对政党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一方面,政党的内部结构各不相同。它们的等级化程度,议会党团与党的机关的力量对比,党员的数量、来源、忠诚度有所差别。从党的凝聚力来看,也是从松散的、暂时的利益联盟,到其成员从不放弃官僚位置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不一而足(Duverger 1954; Panebianco 1988)。

另一方面,党派的外在维度或属性,亦即它们在选举市场上的表现各有不同。首先,它们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纲领目标不同。换言之,他们对选民作出的承诺各不相同,而受制于世界形势,他们作出的决定也有所不同。<sup>②</sup> 其次,它们获得的支持率、议会中的席位,以及获得选民支持的稳定程度都有所不同。

任何政党的纲领立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选举实力,取决于它的成员对自己追求

<sup>①</sup>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学和结构主义文献中对政党的功能进行了广泛讨论(LaPalombara and Weiner 1966; Sartori 1976)。本章采用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性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方法(Cox and McCubbins 1993; Aldrich 1995)。

<sup>②</sup> 新近的一些重要的研究对(严格的)纲领性政党和代理型政党进行了区分(Kitschelt et al. 1999; Stokes 2005)。我没有作这种区分。我认为“代理型”政党也有其纲领,那就是为它们的支持者提供特定的物品。

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的选择。但是,任何政党获得的选举支持,同时又在两个方面取决于其他政治竞争者作出的意识形态承诺,以及它们采取的政治策略。首先,政党策划的竞选纲领部分是对其他政党在诸多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选择的回应,这些问题包括公共品的提供、教育的管控、外交政策的执行等。其次,选民最终是根据各政党在选举市场上提供的不同立场进行投票。也就是说,政党的规模和政治立场,都是政治家及其组织为成功竞选而进行的策略互动的结果。就此而言,讨论一个国家的政党体系或“政党制度”是有意义的。这里的政党制度,指的就是全国范围内政党的数目、规模,以及意识形态倾向。

下面我将介绍两种相互竞争的关于政党制度的解释,即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以及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并对它们各自的优缺点进行讨论。在余下的两个部分,我将提出一种认识政党形成过程的新的方法,它在更广泛的分析框架内,整合了上述这两种研究。<sup>①</sup>

## 二、当前的理论研究

### 2.1 社会学的解释

1967年,李普塞特和罗甘发表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他们在解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西欧出现的不同的政党制度时,强调了利益和社会群体的异质性(Lipset and Rokkan 1967)。更具体地说,他们认为,欧洲国家政党的数量和相对力量的不同,是由两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决定的。一是民族革命,即现代的、世俗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二是工业革命。各国的精英分子在推动单一的行政管理机构、集中化的官僚制度,以及统一的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社会群体的抵抗。一个是边远地区反对中央集权的群体,另一个是天主教会,后者担心失去他们的财产、教育制度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再说工业革命。随着制造业及随之而来的城市的兴起,两个新的冲突维度出现了。一个是乡村与城市的冲突(很多情况下围绕贸易政策展开);另一个是资本所有者和工人的冲突。

劳资争端最终出现于所有国家,并且随着普选权的实现而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与之相对,其他三种冲突(领土的、宗教的和城乡之间的)的性质和强度在欧洲各国(以及由民主机制统治的前殖民地,尽管罗甘和李普塞特并未谈及这些地区)各不相同。各国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政党就是这些冲突的结果。比如,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以及天

<sup>①</sup> 这一部分主要依据 Boix(2006b)。



主教徒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宗教冲突非常严重,但这类冲突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基本不存在。贸易政策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很多大国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在比利时和荷兰则不然。

影响政党制度的,除社会利益的性质和规模之外,还包括不同国家政治精英(和反精英)结盟的顺序。在那些宗教改革获得成功、新教成为国教的地方,冲突围绕贸易问题以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展开。在英国,地主所有者、国教会和保守党一起与自由党对峙,后者代表的是城市利益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是中心城市与乡村(有些情况下还包括天主教会)对峙。天主教国家出现了支持教会的政党与反对教会的政党的分裂,而且这两类政党都以不同形式牵涉城乡之间的矛盾。那些位于新教和天主教交界地区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和瑞士)则连接了两个世界,每个政党的支持者都会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区域。

## 2.2 社会学解释的局限

李普塞特和罗甘的著作引发了一系列对于每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与部门的实质性研究。<sup>①</sup>但是,这些研究随即招致了尖锐的批评。这里,我将首先讨论并驳斥这种对政党形成的社会学解释的激进批评,随后介绍一种修正的、基于利益的政党政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政党的制度环境及其进入选举的顺序,对其最终的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对社会学解释最极端的批评,甚至置疑选民具有某些既成的偏好,而且它们可以通过政党得到直接表达的假设。批评者们认为,身份和政治偏好并非某种等着某个政党来加以表达和动员的客观存在;事实上,是政治家和政党塑造着认同。他们的主张体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些学者声称,政治偏好根本就不存在。选民无非是无知的一群人,最多拥有一些个人的冲动与欲望,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则把这些冲动和欲望围绕某个意识形态原则表达出来,以服务于他的个人利益。另一些学者承认,也许存在某种选民(就某些政策和议题)的偏好;但他们马上又断言,这些偏好过于芜杂,因而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为何某些群体或者观念在选举舞台上得到动员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提供不了任何实际的帮助。另外,由于任何政治认同都可能出现,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关注所谓的既存“选民空间”。按照这两种说法,政治家并非受到意识形态推动的行为者,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代表某些利益,并且实现它们的政策偏好。相反,他们不过是追求选票最大化的经营者,考虑的是哪些议题可以增加他们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以及应该使哪些群

<sup>①</sup> 新近的文献综述请参见 Caramani(2004)。

体政治化并对其加以动员,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对社会学关于认同形成和动员理论的激进批评,主要来自对族群冲突和民族认同的研究,近年来在解释前共产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民主化国家出现的新的社会分裂时,获得了比较大的影响力。<sup>①</sup>

有意思的是,这种“建构主义”的批评具有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相同的核心论点和弱点,即对商业周期的前理性预期。为了证明扩大需求和减少失业未必加剧通货膨胀,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假定,工人只是些无知的甚至非理性的个体,当有智慧的、策略性的政府在操纵经济积累时,他们不会相机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自然,由于货币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批评,这一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了。类似地,在政治建构主义者看来,选民也不过是一帮能够被政治家轻易操纵的愚夫愚妇。但是他们在建构理论时不能保证逻辑上的自治,因为他们在否认选民具有工具理性这一核心假设的同时,又为政治精英留下了后门,假定他们的行为完全是策略性的。

一种修正的、以利益为基础的政党政治理论。如果我们认为选民和候选人都是理性的行为体,也就是说,他们能够界定自己的利益(无论当时,还是经过一段时间通过学习、通过试错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并且据此行动(选民们根据某些提高福利的标准选择代表;政治家推举合适的候选人以赢得选举),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回到某些关于选举的社会学理论。政治家并非在真空中行动。他们的选举承诺和政策决定必须对选民的关注予以回应,必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并对之加以切实改变,这是他们能够再次赢得选举的前提。对于那些基于某种观念或者纲领成功动员选民的政治家来说,选民们必须对他们提供的选举纲领产生(物质上或者观念上的)亲近。简而言之,为认识政党制度,我们需要了解选民偏好的类型及其分布,也就是政策空间的特点。

不过,即便利益很重要,社会学的解释仍然需加以适当修正,因为这种解释并未澄清决定政治家选择以何种方式在政党内部相互协调的(时间、组织或制度)条件。换言之,社会学研究过于匆忙地在利益和政治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相反,应该把利益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变量,并不必然以政党的方式体现出来。选举空间理论证明了这一点。该理论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并因罗甘和李普塞特著作的发表而成为政党政治领域的主流学说之一。它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政党视为社会和经济利益的直

<sup>①</sup> 关于这一观点的先驱者们,参见 Sartori(1968),他针对社会学的解释,坚持认为在说明政党起源的时候,政治具有独立的作用。

接体现者,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sup>①</sup> 首先,选民关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且他们的立场并不必然指向同一个方向。比如,既然大部分农民都支持农业补贴,那么农民政党就有可能出现并赢得选举的胜利。但在投票时并非所有农民都必然如此行事。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把选票投给一个非农民的政党,因为后者的政策承诺满足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像全民医疗保健,或者颁布禁酒令,等等。因此,在一个多维空间中,政党可以通过吸引不同类型的选民,建立一个有望胜选的联盟。其次,政党可能会把各种不同的政策捆绑在一起(通过更多的公共教育支出来弥补因贸易开放导致的损失),如此一来,体现选民利益的政策未必就是他们经济立场的直接反映。受雇于进口竞争压力之下的企业的工人,一般会为贸易保护主义政党投票。但是,如果一位主张自由贸易的候选人承诺建立某种补偿机制(比如职业培训)以应对未来的全球性冲击,且这一承诺为他们所信任,那么他们最后可能把选举投给他。最后,选民关于支持哪位候选人的大多数决定,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某些政策的结果对他们的福利会产生何种影响。因此,虽然低税收和自由放任政策原则上会减少低收入者从国家获得的转移支付,并且削弱劳动力市场上的一切保护性制度,但如果他们相信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乃是促进增长和增加收入的最佳选择的话,那么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最终把选票投给保守主义政党。

李普塞特和罗甘理论的非社会学特征。用以补充甚至替代政党形成的社会学理论的,是从组织与制度着手的研究。不过,在深入讨论这方面的内容之前,有必要指出,李普塞特和罗甘的有些工作,是他们的直接追随者(特别是大部分总结者)所没有做到的:那就是他们承认,纯粹以“社会为中心”解释政党的形成是不够的。<sup>②</sup> 他们强调政党形成过程中的时间和制度因素。一方面,他们要求人们注意19世纪有关参与和代表制的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政党乃是精英们选择联盟群体的最终结果。

诚然,它们的非社会学观点太抽象、太一般化。他们的确提出了一系列“断层”,并从中导出一些行为体和(行政、经济、地域、宗教等领域的)团体,用以对西欧的情况提供普遍化的解释。他们甚至描绘了这些群体之间能够形成的联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联盟的限制)的类别。但是,除了对几个特定国家政治代表形式的历史叙述之外,他们并未具体阐明在不同的国家,这些群体(单独或者与其他群体一起)是如何被组织到某种制度网络或政党结构之中的。由于他们的著作出版于社会选择和空间模型被纳入

<sup>①</sup> 这些研究表明,即便是在一个不存在任何制度,或者任何制度都不会迫使选民相互协调并且进行策略行动的世界里,政党也不会成为利益的直接体现者。我将会在下文第二节第三部分讨论制度的影响。

<sup>②</sup> 基切尔特在本卷中就试图纠正那种通常的、狭隘的对李普塞特和罗甘理论的社会学解释。

政治学研究之前,所以他们很少关注精英的根本目标与其策略之间的关系问题;另外,他们也未能阐明选举规则和组织能力影响选举目标的具体形式。

### 2.3 组织与制度解释

如果竞选舞台上始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议题(或者说如果它就是一个多维的政治空间),而且选民的利益和用以满足这些利益的政策工具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联系,那么社会学解释就必须让位于另一些模型,后者强调的正是制度结构以何种方式决定了政党代表性的性质。

在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先后出现过两种大的思路。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政治精英和政治组织的作用,因为是由它们选择对哪一部分选民,以及用何种方式进行动员。普列泽沃斯基和斯普雷格(Przeworski and Sprague 1986)研究了社会主义政党的竞选决定,以及它们在竞选中进行取舍的方式。后者指的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是仅诉诸传统的力量基础(但要冒在议会中永远得不到绝对多数的风险),还是调整竞选纲领,以吸引中产阶级的选民。卡利瓦斯(Kalyvas 1996)认为,基督教民主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是教会精英的决定,以及基督教世俗运动的组织能力。

另一方面,严格的制度主义学者证明,选举和宪法原则通过两个渠道决定了候选人和政党的数量。首先,选举规则,特别是简单多数制鼓励了精英和选民的策略行为,迫使他们围绕那些不大可能浪费选票和资源的候选人协调行动。更具体地说,单一选区制会把选票集中到两位候选人身上。随着选区的扩大,有望获胜的候选人也会增加。一般情况下,一个拥有  $M$  个席位的选区,有望获胜的候选人(即有可能获得选票的候选人)的数量,不会超过  $M+1$  个(Duverger 1954; Cox 1997)。

其次,国家制度也会制约政党的协调方式,从而对政党制度产生影响。原因很简单:选举法可以决定选区层面的协调,但决定不了选区间的政党协调过程。科克斯(Cox 1987)曾对19世纪英国议会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他发现,形成两党制的原因,是(简单多数制加上)政府逐渐发展为一个完全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因而有能力通过选举的威胁要求支持者的忠诚)。舒加和卡雷(Shugart and Carey 1992)证明,总统制同样影响了候选人的人数。在总统制之下,总统通过简单多数制选举产生,因而候选人的人数会接近于两个,如果立法机关也是根据简单多数制选举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如果立法机关根据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话(拉丁美洲的情况大致如此),则总统候选人的人数就会稍稍超出杜维吉尔的预期。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议会中的政党增加了,因而两个以上的政党在总统选举中推出候选人的机会也增加了。在实行一轮投票的总统制之下,对候选人的约束较为温和,因而总统候选人的人数在四个左右波动。总统选举制的

类型也会影响立法机关中的政党制度。如果总统按照简单多数的原则进行选举,且总统与议会选举同时进行,那么议会中的政党数就会比较少(因议会选举制度的不同在2.1至3.1之间)。否则,总统选举的方式对议会中的政党制度就没有影响。切巴和科尔曼(Chhibber and Kollman 2004)在他们最近的研究中,则强调了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对政党数目的不同影响。

#### 2.4 制度主义的局限

制度主义的解释面临两个主要局限。首先,仅仅根据规则的类型,不能推断出在选举舞台上竞争的政党的空间分布、意识形态归宿,以及它们所得到的选举支持的性质,特别是当选举是在一个多维空间中进行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简单多数制可能会导致两党制,但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是否会最终定格为社会主义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对教权主义、自由贸易者对保护主义者,或者其他的组合,则与选举法无关。

其次,仅仅使用制度主义模型并不能解释变化。严格的制度主义者把制度规则视为某种自我维持的均衡。根据这种解释,简单多数制之所以导致两党制,是因为两党都无意削弱选举法的限制作用;比例代表制把选举舞台分裂为诸多政党与行为体,是因为它们可以凭借这种碎片化否决任何提高代表选举要求的企图。更一般地说,在严格的制度主义者看来,政治行为体对于他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制度结构而言完全是内生性的。由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就是某种特定刺激结构的产物,因此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兴趣去改变维持这一结构的对局规则。<sup>①</sup>

把制度视为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显然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宪政背景以及具体的选举法律都是政治行为体选择的结果,而且这些行为体也并非完全内生于制度规则。对选举法的外来冲击(比如工业工人阶层的形成),以及新行为体为制定选举对局之外的行动策略而作出的选择(比如成立工会参加以后的选举),都有可能改变既存的制度均衡。

<sup>①</sup> 大多数对制度形成的解释,或者把制度视为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或者时间一致性问题完美方案(Knight 1992),或者简单地把它们视为自我维持的均衡(Putnam 1993)。比例代表制的采用,或者被归因于小国贸易的要求(Rogowski 1987),或者被归因于它在多样化社会中解决冲突的能力(Katzenstein 1985; Lijphart 1977)。政党的目的,则被理解为解决协调失败的问题(Aldrich 1995; Cox 1987)。另外,效率理论也难以解释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出现的变化,特别是难以解释一些次优的制度为何会得到采用、政治停滞为何普遍存在,以及政体为何会崩溃等。事实上,从分析制度主义的核心论点来看,这种主要是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的支配地位就非常让人不解。这个论点是:正因为制度塑造了政治均衡,所以它们只能是政治策略的产物(Riker 1986)。

### 三、关于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分析步骤

既然上文回顾的模型都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因此,要更为系统地说明政党制度的产生,就必须以对两个理论步骤的整合为基础。第一步是严格的分析,并且对促使选民投票和政治家决定竞选公职的动机结构加以描述。澄清代议民主的制度机制,即选举、政府构成和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够使我们以一种哪怕最粗略的、最抽象的方式推断,选民和政治家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会以何种方式使他们达致其目标的可能性最大化。为做到这一点,可以借鉴当代选举研究、空间理论和策略性协调(由选举规则推动)的大量文献,对代议制政府的运行加以描述。

第二步是历史的。我们从形塑选民与政党行为的动机结构出发,还需进一步描述并说明使政治家在政党内部协调、选择特定的竞选纲领和策略,以及使选民们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历史事件的顺序。这样一种方法能够揭示为何某些政党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为何其他政党并未出现,或者即便它们出现了,也未能赢得选举;以及最后,为何它们选择了特定的选举制度,而这些制度又反过来影响了有望获胜的政党的类型和数目。

这两步互为补充。没有分析基础,对政党制度和选举的历史描述只会是一些杂乱无章、变化多端的事实的堆积。除小部分(但非常值得称道)的例外,关于这一问题的大多数文献仍然表现出这种特点。相反,如果不注重实际的历史顺序,我们就无法说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而这一机制在我们试图加以解释的政党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同时,我们也无法辨明哪些变量发生在哪些变量之前,以及产生这种顺序的原因。正如上文所言,对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时序)关注的缺乏,大大限制了多数关于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形式研究的深度。制度结构与政党数目同时发生变化,这一发现充其量只意味着一种相关性,它对于我们了解制度与政党如何演变,以及行为体如何影响了代议制民主的机制几乎毫无作用。

我们现在从细节上分析民主选举的运行方式。如图 21.1 所示,在所有选举中,首先有一部分公民决定提出他们的候选人(连同一套特定的竞选政纲或政策承诺)。随后选民投票,只有少数候选人会当选,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能够汇集足够数量的选票(这一额度由当时当地的选举法决定),获得公职。选举结束后,当选的代表聚集起来组建政府,制定政策,直到进行下一轮选举。当选政府制定的政策中,很可能就包含了未来进行选举时挑选候选人的程序(如选举法),它们将会对公民(和政治家)的福利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下一次选举如何进行,以及选民如何作出决定。



图 21.1 代议制民主的时间顺序

这这一时间结构中,选举导致某些政策产出,它们又会对选民的福利产生影响。选民决定为某位候选人投票则取决于两件事。首先,选民一般会选择与其他政治家相比,其竞选承诺更接近他们理想的政策或者目标的候选人(如果是竞选连任,则是已经作出一些成就的候选人)。但是其次,选民支持某位政治家的前提,是他有望赢得选举(或者有可能影响政策选择)。更准确地说,只有当选民们(从个人角度)相信某位候选人能够从其他选民那里赢得足够的支持,他们才会为他投票。因此,选民可能会放弃他们虽然喜欢,但获胜希望渺茫的候选人,并且把选票集中到他们并不太喜欢,但更有可能获胜的政治家身上(以击败他们更不喜欢的政治家)。

决定选民行为的机制已如上述,我们再看一看政治家们如何行动。也就是说,他们会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决定竞选公职。首先,候选人会挑选出对相当部分的选民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并以此出发赢得他们竞争的席位)。其次,政治家只有在有望赢得选举,即选民们认真地把他们视为值得投票的候选人的时候,才会参加竞选(政党也才会开始动员)。

从选民(选择使他们的福利最大化的代表)和政治家(被视为有用且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进而当选)的动机结构来看,我们要构建一种关于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需要三个主要部分或者基本要素:选民的偏好、他们的信息和信念(其他选民会如何行动,政治家当选的机会有多大),以及聚集选票和在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的选举制度。

首先,因为选举迫使政治家代表选民行动,所以关于政党制度的形成理论首先必须说明选民的偏好分布,这也就是政党相互竞争的选举空间。政党不能偏离选民的需求太远,否则就会在选举舞台上受到惩罚。但是,出于上文我讨论过的原因,仅仅了解选民的情况一般不足以推断任何国家政党制度的性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民才能获得关于政党政策的完全信息;而且他们的立场往往存在多个维度,这使他们可能会受到不同的政治诉求的吸引。不过总的来说,选民的类型和数量分布,仍然是决定政党在选举市场上如何选择立场的主要因素。

其次,由于选民对不同候选人胜选机会的预期,可能与决定其投票的个人利益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对决定这些看法,并且进而决定政治家的战略协调与选民的工具性投票的机制加以关注。可以指出以下两个方面。

选民们的预期(以及由此决定的策略行为),使那些在开始时就进入选举进程的政治家相较于后来者有着更多的优势。也就是说,在一个空荡荡的选举舞台上,由于选民们无从(根据过往选举)了解谁是最好的候选人,又应该团结在谁周围击败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所以策略性考虑几乎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相反,一旦某些政党成为主要的竞争者,选民马上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主要政党则会根据过往的选举,坚持那些被认为有效的政策策略,同时反对新的虽然可能更受欢迎但未经检验的候选人,并以此维持它们与选民之间的联盟。

这种竞选优势来自某种被认可的标签、某个组织,以及某种赢得选举的声望,它会产生额外的而且很重要的影响。它使政党有能力和时间调整政策承诺,使特定的候选人能够适应选民及其偏好的变化,以保持他们在竞争舞台上强大的竞争力。简言之,尽早进入选举进程、同时利用选民的策略性考虑,这两者的结合使政党要尽可能长期地使用其传统标签,甚至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尽管经历了几次战争,经济不再是传统的制造业,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主党和共和党始终把美国选民一分为二。同样,在英国大约有80年的时间是由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正是因为这些政党利用了选民的策略性联合,并且根据情况变化逐渐调整政策,所以它们一直系统地阻止了第三种政治力量进入选举舞台并发展壮大。

对政党制度稳定性的讨论使我们转向第二个方面,即导致既存政党制度崩溃的条件。初看起来,新的政党会在选举市场骤然变化的时候出现,这或者是因为大量新选民参加了投票(由于选举权规则的变化),或者是因为大部分选民的利益发生了变化(比如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或者战争导致了剧烈的政治重组)。但从总体上看,只有当部分选民放弃既存政党为了维持其领导地位而向他们许诺的“预期”的好处时,新的政党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要使这种情况发生,新的政党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组织力量,以动员它们的选民从旧的平衡(这种使它们为旧政党投票更有意义)转向新的平衡(以支持新的政党)。关于历史的部分会详细说明,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就是因为工会决定不再支持(左翼)自由主义政治家,而转向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

最后,由于选民投票给谁(以及政治家组建政党)的决定,受到那些把选票转变为议席的制度规则的强烈影响,所以为了了解政党制度的形成,我们还有必要考察有关选举的法律的性质和选择。在国际体系中,行为体(国家)不能选择对局规则。事实上,在无政府状态下,除去一些非正式情形,很少会出现合作。在市场上,企业只能部分地(如果有的话)决定竞争规则。相反,在代议民主制之下,是政治家制定了那些决定他们如何被选举出来的规则;而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他们会尽量使自己当选的机会最



大化。这一简单的事实,迫使我们去探究人们选择这些对局规则的深层原因。换言之,如果我们对政治家维持(在一定时间内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或者改变法律现状(极少出现且带来重大影响的情况)的动机不予以关注的话,一种关于政党形成的理论就是不完全的。

## 四、历史解释

在这一部分,我将运用上面讨论过的分析要素,解释西欧形成政党制度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渐进的政治自由化开始,到20世纪前半期实现普选制为止。

### 4.1 初始条件

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化进程的起点都有一种非常类似的政治代议制度,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前政党代议制。首先,他们的选民规模很小,这出于两个可能的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选举资格的限制非常苛刻,即仅限于拥有财产的男性。当然存在着选举权比较开放的例外,但最终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够投票。其次,代表选举一般是在单一代表的小选区内进行,而且实行简单多数制。最后,选举竞争高度分散。候选人很少(如果有的话)在全国范围内与其他政治家合作,他们仅仅针对地方性的问题、主要依靠各自选区内的个人关系和代理人竞选公职。在很多情况下,竞争这个概念本身就为人所不齿。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50—60年代的比利时和丹麦,三分之一的选区内候选人没有竞争者;90年代的瑞士也有四分之一的选区属于这种情况。总而言之,当代的政治家作为地方和区域利益的代表,就如同全国议会中的外交使节。比如,在17世纪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大多数法案都具有地方特性,都是对地方商业、许可状或者工程的授权或者管理(Cox 1987)。

### 4.2 国家职能的扩展和选民的增长

随着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建设和选举权的逐步扩展,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应对主权国家之间不断强化的军事竞争,以及(国内外)产业经济的兴起,各国的中央政府不断扩大(或者试图扩大)其规模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它所作出的决定(以及用以执行这些决定的行政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明显的分配效果。全国性的政治影响了广大民众(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的生活和事业。不过直到这个时候,这种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具有偶发性和间歇性,即主要因某些关键的、特定的历史性冲击而起,比如战争或者宗教迫害。但是,到19世纪中叶,中央政府的政策已经

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它在全国范围内的管辖权不断扩展,因而造成了真正意义上全国范围内的赢家和输家。这反过来又促使议会中不同地域和不同代表之间为地方利益进行合作,以支持政府及其政策,或者以持续有效的方式对其加以反对。

除国家角色的增强,选举权的逐步扩展也推动了政党作为一种统一的国会和选举机制的兴起。更大的选区迫使政治家建立相应的机制以争取选票。为了与主要依靠个人选票的传统精英进行有效竞争,为动员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选民而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新的政党,不得不依靠更为广泛的组织,以收集会费,支持他们的候选人。

科克斯(Cox 1987)表明,英国议会政党的立法一致性在19世纪全面增长,并且在20世纪早期达到了很高水平。尽管这一时期其他国家议会的资料比较缺乏,但到19世纪的最后30年,大部分的国家都出现了若干组织严密的政党。在英国,格兰斯通于19世纪60年代把自由党改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机器;在欧洲大陆,大众化的宗教政党则在19世纪70和80年代获得了令人瞩目的选举成果。这一切,都迫使议会中传统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自我调整,并且最终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

#### 4.3 选民偏好:选举权与竞争空间

为了应对政治生活的国家化,政治家根据两个主要的因素联合成为永久性的国会(以及后来的选举性)政党。一是选举的竞争空间,即选民的经济与宗教偏好;二是选举动员的次序和模式。我在这一小节讨论第一个因素,并在下一小节讨论动员的时机问题。

两种主要的政治冲突影响了选举竞争空间结构。一方面,选民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而相互区分;另一方面,选民也会因国家在教育 and 创建统一的国民文化方面所应扮演的角色而彼此冲突。

经济。交通成本的持续下降(由于新的技术的发展),加上普遍的国际竞争(因法国革命战争而加剧),促使国家强化对其领土范围内经济生活的控制。这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地方自治和合作、废除国内贸易壁垒、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一旦国民经济空间得以形成,国家开始着手制定关税水平并提供公共服务,经济政策的制定就会成为社会中不同经济利益系统竞争的目标。<sup>①</sup>

经济利益对最初的政党选举联盟的影响,要经过19世纪上半叶通行于大多数国家的非常有限的选举权才能实现。由于只有财产所有者能够投票,因此不同收入等级

<sup>①</sup> 形成经济上的统一是当时政治的一个部分,并且影响了最终形成的政党制度的性质(比如瑞士)。不过,我假定经济统一的过程在我这里考察的政党联合进程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基本上外在于这一进程)。由于所有的国家都统一了它们的经济(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最终归于失败且消失了,可以如此理解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所以这一假定应该是合理的。

之间(针对再分配政策)的冲突,亦即上、中、下(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即便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极少出现。政治竞争主要围绕城市生产者和乡村土地所有者之间不同的贸易利益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既有的地方或区域性利益代表相重合。由于农村和城市利益分别集中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所以政党之间的联合自然从相邻选区代表的聚合开始(下文将说明,选民人数的增加改变了选举空间结构,使其更主要以阶级为基础)。

*民族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形成*。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观念、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战争,以及工业化需求的推动,国家开始着力塑造同一的公共文化,在很多时候,是塑造统一的民族,其主要手段,则是扩展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控制和统一教育体系。这加剧了一场关于应该由国家还是非国家的教会(或是天主教会或是非国教的新教信仰)提供教育的政治冲突,而在少数情况下,也加剧了国家和某些少数民族的冲突。

城乡维度的冲突(很多时候与贸易问题相关)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而教育、宗教和地域性冲突只在某些国家爆发,这取决于各个国家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只有一个国教会的国家没有出现宗教维度的冲突。由于国家控制了所有的行政管理和教育机构,所以不存在有组织的反抗。事实上也没有理由出现反抗,因为国家不可能因宗教原因而对公民区别对待(像那些除官方教会之外尚存在其他教会的国家那样)。

只有在那些除官方的、国家主导的教会之外还存在其他教会的国家,宗教才会成为政党竞争的核心问题。这种情况出现在像英国和荷兰那样的新教国家,也出现在天主教国家。在英国,宗教人士分为国教徒和非国教徒;在荷兰,存在好几个国教会(此外还有大量的天主教少数派);在天主教国家,教会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教育结构。(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偏离了 Lipset and Rokkan 1967 年中提出的标准理论。他们对新教与天主教国家进行了区分。前者基本上不存在宗教意义上的选民分野;后者的特点则是宗教与非宗教的鲜明对立。他们解释的问题是,宗教冲突并不限于天主教国家,在一些新教国家同样存在<sup>①</sup>)

有限的选举权,几乎无法改变在宗教问题影响下结成选举联盟的方式。宗教差别存在于不同的收入阶层和经济部门中,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宗教信仰和宗教联系与阶级和

<sup>①</sup> 李普塞特和罗甘实际上指出了挪威这个方面的问题,但他们用挪威原教旨主义的地域性和边缘性来解释这个例外。另外,他们的解释也无法说明英国和荷兰的情况。在英国,非国教派是19世纪中期自由党的支柱之一;而在荷兰,基督教历史联盟(CHU)和反革命党(ARP)就是两个新教政党。20世纪初,宗教冲突淡出了英国政治舞台,但由宗教冲突而导致的地域冲突时至今日依然相当激烈。在荷兰,宗教冲突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渐渐停息。

职业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和教育的差别仍将在选举和国会活动中发挥重要影响。<sup>①</sup>

#### 4.4 动员的顺序:从冲突的维度到政党制度

两种最初的议会政党。在联合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当大部分联合发生在议会和国会层面的时候(候选人仍然独自在选区内竞选),支持(或反对)全国性政府和通过全国性政策的需要,促使政治家聚合为两大议会(通常是比较松散的)政党,一般来说,就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党。<sup>②</sup>

在一维的选举空间中,这些政党一直保持稳定,虽然它们在议会内部的团结变得更为紧密,组织能力也日益强大。在少数情况下,一维空间是单一维度政治冲突的结果。19世纪80年代的瑞典就属于这种情况,在那里基本上不存在宗教与教育问题,民众在文化上又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当现代议会取代了传统的四院制之后,19世纪70年代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引发了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主义者之间一场尖锐的冲突,双方都按地理位置集聚起来。虽然前者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分裂,但两股力量最终固化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政党。一维的竞争也发生在拥有多个选举维度但彼此高度相关的国家,比如比利时。至少在1893年大致普及男性选举权之前,这个国家的乡村和城市选区基本上分别为天主教和反宗教政党所控制。

宗教问题与第三候选人的加入。那些经济和宗教问题在竞选舞台上都非常突出的国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支配地位显然相对较弱,特别是当宗教问题被某个能够在任何时间动员起来反对任何候选人的组织网络加以利用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这种动员,以及由此导致的两党制的崩溃,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荷兰和瑞士,当时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和新教政党进行了成功的竞选。但是其他所有国家的两党制,如英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普选权最终实现(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之时。<sup>③</sup>

① 不过,选举权的影响也并非总是微不足道。在几种情况下,选举权的结构会改变不同教派选票的比重。比如,由于大多数威尔士非国教徒在1868年选举改革之前没有选举权,自由党直到19世纪最后30年才控制了威尔士。类似地,比利时直到1893年都实行有限选举权,这让天主教政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劣势。对于自由党来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天主教政党力量的增强,他们甚至更希望维持这一制度。

② 联盟的紧密程度取决于国家的制度结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立法机关虽然建立在强有力的委员会基础上,但政党非常松散),以及竞选舞台上是否存在组织严密的竞争对手(这会促使竞争者们强化内部组织)。

③ 下文将会讨论,维度的数目并不能决定政党的数目。自李普塞特和罗甘的著作(Lipset and Rokkan 1967)发表之后,大量的文献持相反的观点。比如,塔杰帕拉和舒加(Taagapera and Shugart 1989)认为,政党数目等于维数减一。李普哈特持类似的立场,不过以维度是否彼此重合为条件。李普塞特和罗甘(Lipset and Rokkan 1967)提出了一种关于分化与利益的宽泛理论,但对于他们所考察的每一个国家来说,他们讨论的这些分化或群体被代表的方式都是非形式化的、特殊的。

自由派与保守派政党在选举中的稳定性(或者不稳定)的根源通常在于制度与组织。正如上文分析部分所讨论的,在19世纪被所有国家采用的简单多数制之下,选民完全没有理由抛弃像自由党那种一个现存的党,而支持一个他们更为喜欢的替代者,比如某个激进的候选人,除非他们确信,这么做的结果不会分裂左翼的多数,并使保守派的政治家获胜。在这一联盟对局中,自由党(和任何其他在各自选区占支配地位的政党)享有的选举优势不仅使它能够维持政权,而且能够相当成功地遏制内部分裂和抵御外部威胁。第三党只有以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为依托,或者以某种类似的“前政党”的组织为依托,并且使其全体成员相信(在实行简单多数制的情况下),组织中其他所有人都会同时为新党投票时,才有可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信任的替代者参与竞选,并且说服足够多数的选民同时抛弃旧政党。

在一些国家,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家很早就围绕宗教问题彼此冲突(也在不同的议会派别内相互联合),也就是说,教育和与教会相关的问题很早就进入主要的政党和选举联盟,而两党中的一党会寻求宗教组织网络的支持。这样,后者就不可能为第三党所利用(或者事实上没有利用的动机)。<sup>①</sup>比利时就属于这种情况,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教育问题和宗教政策一直左右了这个国家所有的选举;在法国,从大革命开始(Tackett 1986)直到20世纪70年代,选民都围绕宗教问题分为两大阵营(Converse and Pierce 1986);德国的南部各州(德国统一前)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国家,保守派的候选人(他们的后继者在比利时以天主教政党的形式出现)都依赖于密集的天主教组织和行动网络。相反的情况出现在英国。在那里,第一阶段的政党竞争(1832年第一次选举改革之后)源自19世纪40年代的贸易政策(以及后来的地域)分歧。但是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在过去30年仅仅被偶然提及的宗教问题却又走上了选举政治的前台,原因是格莱斯通决定把非国教徒选民吸引和整合到自由党中来,以此击败托利党。这样,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并没有导致新政党的产生,而只是被纳入了既存的(且越来越组织严密的)两个议会政党之中。(当然,一旦政治家开始把选民中一个人数众多且诉求各异的部分作为争取对象,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党内强大的选举和政治压力。以英国自由党为例,它从城市雇员和出口导向型企业中的技术工人、非国教徒和非教派人士那里获取支持。类似地,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的天主教政党也把农村选民、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数目庞大的工人阶级选民[特别是引入普选权之后]作为它们的力量基础。为此,政党领袖不得不通过滚木头<sup>②</sup>的立法形式协调派系矛盾,并且通过创造某

<sup>①</sup> 另外,一般来说不存在反映城乡对立的组织网络,并把选民们动员到这个维度上来。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德国与2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现的农民党。

<sup>②</sup> “Logrolling legislation”,指互投赞成票以达成妥协的方法。——译者

些补偿机制取悦不满的选民。这些政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令人怀疑,所以它们时常面临实然的崩溃和议会重组,比如英国 1885 年发生的格莱斯通自由派和自由工联主义者的分裂,或是 1893 年至 1899 年,瑞典出现的温和的和激进的自由贸易者之间暂时的分裂。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政党还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选举连续性)

与之相反,在普鲁士(1870 年以前)和统一后的德国(1870 年以后),以及荷兰和瑞士,最初使自由派和保守派相互对立的因素都不复存在了。在这些国家,自由派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转向一种激烈的反宗教立场,而代表了创建这些国家(德国和瑞士是通过战争)的新教精英的保守派已经不再得到天主教选民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既存的宗教组织可以而且的确得以很容易地动员起来,以打破两党制的现状(Kalyvas 1996)。

**社会主义政党的进入。**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发达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出现了新一轮变革。这一变化是两个因素相结合的结果:数量众多且不断变化的选民,以及工会对自由派当权者的反对力量提供支持的决定。

20 世纪初,普选权已经得到普及,选举空间也随之发生变化。19 世纪主导选举政治的城乡选区之间的对立被纳入一个更广泛的、由收入差异决定的空间。选举空间的这一变化为社会主义者,即反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党打开了机遇之门。如表 21.1 所示,只有在引入普选权或准普选权之后,比利时、英国和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党才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这些条件本身并不充分。如果没有适当的组织工具,社会主义政党的候选人很难挫败自由派或进步派的当政者。正如在其他政治问题上一样,既存的简单多数选举法的确阻挠了第三方候选人的进入。在 19 世纪的法国、瑞士和美国,男性普选权并未导致议会中出现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在挪威,拥有选举权的男性比例从 1879 年的 21% 增长到 1900 年的 90%,而在这一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加在一起始终能获得 95% 的选票。直到 20 世纪初,当历史上一直与自由派结盟的工会决定与之决裂之后,社会主义政党才真正成为传统政党制度的威胁。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整个欧洲的兴起,都与工会不再支持自由派候选人有关。具体来说,德国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比利时在 19 世纪 80 年代、挪威在 1899 年、英国在 1900 年、瑞典在 20 世纪初都出现了这种变化。相反,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社会主义政党就只能惨淡经营。在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之前,19 世纪 90 年代曾经有几位社会主义候选人在伦敦参加竞选,但都以惨败告终。美国社会主义党由于得不到工会的支持,在 20 世纪初的黄金时期也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 3% 到 6% 的选票,因而在国会中几乎没有代表,并且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淡出政治舞台。类似地,尽管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瑞士就实现了男性普选权,但在工

会 1908 年脱离与激进自由主义候选人结成的联盟之前,瑞士社会主义党只能在工人中得到很少数量的选票。

表 21.1 社会主义政党和胜选记录

		男性选举权 没有或部分具有	普选权
工会转而支持社会主义政党	否	1900 年以前的英国	美国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比利时	[加拿大]
		1900 年以前的挪威	1900 年前的法国
		1900 年以前的瑞典	19 世纪 90 年代前的新南威尔士
			1900 年前的瑞士
	是	1900—1918 年的英国	澳大利亚
		19 世纪 70 年代—1893 年的比利时	1918 年后的英国
		1918 年前的意大利	1893 年后的比利时
		1899—1900 年的挪威	1905 年后的部分法国
		1900—1911 年的瑞典	1871 年后的德国
			1918 年后的意大利
			1900 年后的挪威
			1911 年后的瑞典
			20 世纪的瑞士

#### 4.5 选举制度及其导致的政党制度

有关选举制度的学术文献表明,选举法的类型和政党制度的性质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Duverger 1954;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Cox 1997)。相对多数制与简单多数制经常导致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则倾向于产生多党制。

简单多数制——特别是相对多数制——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强化了两党制。如上所述,在一个选区里选出得票最多的人,会促使选民与最具竞争力的两个候选人结成策略性联盟,这种选举制也不会鼓励任何议员脱离他们自己的政党(即便面临重大的意见分歧)。另外,这种制度也使任何新的政治力量都很难吸引足够的选民,以成为既存政党的可替代选择。因此,得票(以及席位)最多的两个政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选举制度。除非一个强大的组织网络打破了既存的两党垄断,或者遭遇了历史性的政治危机,否则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联盟重组,现状也就不会改变,简单多数制和两党制就会无限

期存在下去。

比例代表制也具有类似的自我维持倾向。由于这种制度降低了候选人当选的门槛,因而常常会导致政党制度高度碎片化。当然,一旦几个政党已经存在,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试图建立相对多数制,因为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它们在选举中的失败。因此,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并且借助外在于传统政党制度的行为者,相对多数制才会转变为比例代表制。<sup>①</sup>

简单考察自代议制民主产生以来选举法的演变就可以发现,选举制度几乎不会随时间改变。在整个19世纪,西方一直实行相对多数制和两轮简单多数制。从19世纪晚期瑞士几个州的选举和1899年瑞士的选举开始,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头20年采用了比例代表制。简单多数制只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日本和西班牙保留下来。1920年以后,对既存选举制度的改革又变得很少见了。<sup>②</sup>

20世纪早期第一批民主国家选举制度的剧烈变化是社会主义快速兴起的结果。如果没有可靠的社会主义机制的快速出现,选举制度就不会改变。分享全国选票的两个主要的政党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能够维持它们的选举优势的规则。它们充其量只会改变他们的选举政纲,以应对选民不断变化的利益和潜在的第三党的挑战。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轻而易举地挫败20世纪初出现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使之无果而终),加拿大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垄断了大部分选票。

与之相反,在那些工人和社会主义政党能够获得足够数量的选票的国家,简单多数制很快放大了它们的威胁。它使社会主义政党有可能使自己成为得票最多的两个政党之一,而传统政党中的一个则黯然退场。当然,社会主义的出现只是选举改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要有一个传统政党在非社会主义阵营中保留了主导地位(并因此吸引了所有非社会主义的选民),比例代表制就不会被引入。英国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党一分为二,保守党作为阻挠社会主义最安全的选择,最终吸纳了反工党的自由党人。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自由党的边缘化已经非常明显,而无论工党还是托利党都不再抱有弃除相对多数制的念头。另外,在非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为统一的政治组织的国家,比例代表制也未能出现,澳大利亚就是这样,该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在20世纪中叶结成了反社会主义党。

在社会主义政党比较强大且没有一个非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凝聚非社会主义的选民

<sup>①</sup> 1958年和20世纪90年代法国和意大利的选举改革就属于这种情况。

<sup>②</sup> 从相对多数制到比例代表制,或者相反的变化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过,而且极为罕见(是意大利和日本政党制度崩溃的结果)。法国和希腊是仅有的两个选举制度在20世纪经历了大规模变化的国家。



以击败社会主义的国家,比例代表制取代了旧的选举制度。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是因为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得票过于接近,以至选民无从判断其中哪一个更具选举优势;或者是因为它们在比如贸易或宗教问题上的政治分歧过于严重,以至不可能出现工具性投票。

## 参考文献

- ALDRICH, J. H. 1995.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ix, C. 2006a. Between protectionism and compens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In *Globalization and Egalitarian Redistribution*, ed. P. Bardhan, S. Bowles, and M. Wallerste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2006 b. The birth of party democracy: the formation of party system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Unpublished MS.
- CARAMANI, D. 2004.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Electorates and Party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BBER, P., and KOLLMAN, K. 2004.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arty Systems: Federalism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Canada, Great Britai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NVERSE, P. E., and PIERCE, R. 1986.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Fr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x, G. W. 1987. *The Efficient Secret: The Cabi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MCCUBBINS, M. D. 1993. *Legislative Leviathan: Party Government in the Hou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Wiley.
- KALYVAS, S. 1996. *The Rise o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ITSCHOLT, H., MANSFELDOVA, Z., MARKOWSKI, R., and TORA, G. eds. 1999.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IGHT, J. 1992.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ALOMBARA, J., and WEINER, M. eds. 1966.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IPHART, A.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 M., and ROKKAN, 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PANEBIANCO, A. 1988.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and SPRAGUE, J. 1986.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UTNAM, R.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 H. 1986.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GOWSKI, R. 1987. Trade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203-24.

SARTORI, G. 1968.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ngineering. In *Public Policy*, ed. J. D. Montgomery and A. O. Hirsch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UGART, M. S., and CAREY, J.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KES, S. 2005. Perverse accountability: a formal model of machine politics with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 315-25.

TAAGAPER, R., and SHUGART, M. S.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ACKETT, T. 1986.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Ecclesiastical Oath of 179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第二十二章 政党制度

赫伯特·基切尔特(Herbert Kitschelt)

尽管政党制度的概念在政治学文献中无所不在,但它却从未得到系统界定——如果我们主要参照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Greenstein and Polsby 1975),以及戈定和克林格曼(Goodin and Klingemann 1966)编著的手册的话(参见 Epstein 1975;Pappi 1996)。同样,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出版的《政治科学:学科状况》的各个版本(*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1983,1993,2002),也仅仅是在个人政治行为以及偏好形成这些微观政治的层面讨论政党问题,对政党制度则几乎只字不提。在最近的一版中,也仅有菲奥瑞纳关于美国政党的文章(Fiorina 2002)对政党制度略有提及。

这可能是因为政党制度这一主题太过复杂和多样,以至那些主要的政治学手册没有办法对其进行简单统一的处理。这个研究领域的实际情况是,人们或者用一整本手册介绍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研究(参见 Katz and Crotty 2006);或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政党制度类型的划分“既多且乱”(Sartori 1976,119页),甚至萨托利自己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至少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把自己的注意力决定性地转向了比较政治经济学、政治体制变革和族群文化认同的政治,并因此忽视了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研究。<sup>①</sup> 尽管如此,在政治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政党制度仍然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在关于政治经济、公共政策和民主体制延续性等问题的研究中,各种重要利益的联合,以及代表这些利益的政党制度的竞争性都是十分重要的变量。

在本章中,我首先将采用沃尔兹把国际社会区别于国家的方法(Waltz 1954,1979),从概念上澄清政党制度与政党的区别(第一部分)。然后,我将明确政党制度的

---

<sup>①</sup> 绝非偶然的是,这正是拉定(Laitin 2002)在其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评论中列出的三个主要的研究路途。

系统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竞争进行静态比较分析(第二部分)。最后,我要对政党制度竞争机制的历史演变进行探索(第三部分)。在这里,比较历史分析将超越对政党制度和竞争的形式研究发挥独特的作用。政党制度作为独立变量,会影响民主政治的输出和结果,但对此我将不予讨论,因为本手册的其他章节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 一、政党制度的概念

沃尔兹(Waltz 1954)曾区分了国际政治的三个分析层次或是分析图式。第一个层次与人的行为、决策者和社会成员个人的动机与行为有关;第二个层次集中关注国家组织内部的群体决定过程,因为是它们形成了关于外交政策的、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第三个层次把国家战略作为一种系统特征的产物加以考察,而系统则被视为一系列互相作用的单元(Waltz 1979,40页)。在系统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都受到其他所有成员行为的影响。系统理论因此必须“表明系统层次或者结构,与互动的单元层次之间的区别”(ibid.)。用博弈论的话来说,系统特征与行为体的资源、偏好结构、可能的行动一同决定了对局的框架,并对其他对局者的行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外部影响。如果偏好是固定的、外生的,那么系统均衡就完全取决于系统性特性,包括参与人数、行为规则,以及行为者的资源分配等。正如在经济生活中,与拥有更多卖家和买家的竞争性市场相比,霸权或垄断格局形态更易于促使行为者围绕不同的均衡点(相对价格、体系中的战争与和平的状态)相互协调。

政党制度理论同样要明确行为者的人数、他们之间的资源与能力分布,以及被允许的行动规则,以对系统行为进行某些不受个体因素内在差异影响的预测。系统均衡涉及持续参与者的人数、他们所获得的回报,以及他们之间或联合或冲突的关系。这些因素进而影响到政府行政机构的建立与维持、稀缺资源的提供及向选民的分配,以及更一般地说民主制度的续存或者崩溃。当然,即便这些系统层面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它们还需要根据对各政党内部行为的认识加以进一步的限定和具体化,因为这些行为决定了单纯的系统分析的界限。

索劳夫(Sorauf 1964)对“选民中的政党”(个人行为及取向)、“作为组织的政党”(组织起来的政治体),以及“政党制度”的区分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种图式”在比较政党制度理论中至少发挥着一种潜在的作用。政党制度理论一直受到一种特殊的简约主义的影响。一方面是个体行为者(公民、政治家)独特性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党内决策结构,那么政党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是否会影响政治过程的输入和输出呢?

让我们首先勾勒第一个和第二个图式假设,因为这是任何有关第三个图式(系统

性)的特征与过程的有益假设的基础。正如国际体系假定第一和第二层图式存在着历史性的不同(参见 Ruggie 1989; Spruyt 1994),政党的“系统性”或者“系统进程”也只有在某些低层次的条件得到满足的特定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

关于个体行为者(公民和政治家)的第一层图示的假设。政党之间的系统性策略互动假定,至少部分选民会通过政党或者候选人为自己提供的好处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如果所有选民都拒绝投票,或者随意投票,或者基于一成不变的团体忠诚而非委托者或者潜在的代理人偏好的相对组合投票,那么系统过程就不会出现。卢比亚和麦克卡宾(Lupia and McCubbins 1998),以及艾里克森、麦克库恩和史汀森(Erickson, MacKuen, and Stimson 2002)都认为,至少有一部分选民必须是“理性的守财奴”,他们的策略选择(投票与否,是否支持特定的选举人和政党)取决于其他选民或者当选候选人的行为,后者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为他们提供服务。

同样,候选代理人(“政治家”)在选举组织中也必须采取策略性行动,也就是说,在选择他们自己的行动方式时,考虑到至少部分委托人(选民)与竞争中的候选人的偏好和策略选择。正如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目标是生存一样,政治家则把当选(连任)公职(最好是行政职位,次之是立法职位)作为他们目标的底线,尽管除此之外他们的追求可能各不相同(个人利益、荣誉、政策,或其选民的特殊利益)。至于这些类高层次的目标具体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对其加以追求,则取决于由对局规则决定的竞争局势、竞争者的立场,以及选民的需求。正是这些限制,使政治家在某些时候不可能成为毫无原则的、仅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掠夺者。<sup>①</sup>在某些情况下,对行政职务的追求可能预设了政治家会可信地服务于能够产生公共政策的集体利益。

选举民主中的系统过程假定存在某种选举市场,其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选择互为条件。供需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弹性。如果这些条件实际上不能得到满足,则系统性政党理论就无效。比如,在极度贫困的国家,委托人可能缺乏物质和认知条件在选举市场上进行预测;或者在族群高度分化的国家,他们可能会忠诚于某一特定的政治代理人(“党派认同”),从而阻止了任何系统过程。

关于政党制度(集体代理人)之下选民团体的第二层图式的假设。在实行普选权的大众民主国家,委托人与代理人只有通过中介机制的协调作用,才有可能在选举市场上有效行动。这些中介机制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促进选举市场上的信息流动,简化委托人与代理人据以直接或者间接互动的服务选项。作为政党制度的构成要素,政党可以部分或者完全提供此类服务(Aldrich 1995)。在此,政党可以从类别的意义

<sup>①</sup> 关于政党和政治家偏好选择的系统条件,可参见 Strom(1990a)。

上,被理解为一系列正在提取资源的政治家,而不必是法律和制度意义上把各政党区别开来的标签。需加以协调的,可能是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也可能是不同政党构成的联盟(Morgenstern 2004)。为简化起见,下文中把政党视为有效的集体行为者,而不必是某种法律标签。

政党可以通过降低作出选举选择之前选民收集和候选人传递信息的成本,以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它们也可以通过把具有不同个人偏好的政治家联合起来追求某些单一的集体目标(“政党纲领”)<sup>①</sup>,以减少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因多数决定的不稳定性和拖延而导致的“社会选择”问题。当然,可能也存在其他传达和聚合利益的集体动员机制,如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等,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没有类别意义上的政党作为集体行为者协调系统的民主国家,只是极为罕见的例外,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光谱的另一端,大部分的政党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有能力一再协调选民和政治家的行动,这就是制度化的政党体系(Huntington 1968,第7章;Mainwaring and Scully 1995),这类似于萨托利(Sartori 1968,288—297页;1986,55—56页)所说的“结构化的”政党制度和梅尔(Mair 1997,213—214页)所谓的通过“封闭”而形成的“系统性”,即通过一段时间后形成的对互动的实体单元(政党)的认同。

## 二、不同的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理论目的在于预测竞争者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最佳的均衡。这一理论的关键要素,是竞争者的数量以及它们为争取选民而使用的“选举货币”,即政治家为获取支持而承诺的政策议题或者议题的集合。政党制度理论一般假定在选民和政治家之间存在某种间接交易。公民在选举周期开始的时候投票,是为了换取当选的政治家在选举周期内兑现他们竞选时作出的承诺。民主回应制之所以间接运行,是因为(一)在选举和政策提供之间存在时间差;(二)政策的收益和成本涉及所有选民,无论他们是否支持胜选者;(三)选民在选举周期结束时以回溯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当政者(以及反对派)记录的评判,并在对政治家为下一个选举周期作出的承诺进行前瞻性判断时考虑这种评价。

不过,这种基于政策的“责任政党”模式,只是一系列更广泛的民主回应制中,关于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一种特例。在转而讨论政党竞争一般模式的关键因素,即竞争

<sup>①</sup> 关于政党形成的理论,特别参见 Aldrich(1995),Cox and McCubbins(1993,第4、5章),以及 Snyder and Ting(2003)。至于它们是否如阿德里奇(Aldrich 1995)所言,真的解决了集体行动和社会选择的问题,则要视条件而定(见下文)。

者的数量和竞争维度的数量之前,我们应根据不同的委托人—代理人交易形式,区分民主回应制的不同类型(2.1 小节)。然而,批评者就此认为,责任政党模式关注的只是一种十分狭隘的竞争“通货”即政策立场,而不是广义的有价值之物(2.2 小节)。在立场议题竞争的特殊位置得到澄清之后,我们就可以转向参与者数量和政策议题维度的问题,这是政党体制的结构性特征(2.3 和 2.4 小节)。最后,对于所有的政党体制,我们可以对其竞争强度或者“竞争性”作出大小不同的区分(2.5 小节)。

## 2.1 民主回应制的不同模式

选民为何支持某些政党、政治家又如何通过算计获得选民的支持?政党体制理论关注的是理性权量的机制,而非心理上的情感归属,比如党派的认同、选民对候选人客观特性的认同(如性别或族裔),或者候选人令人兴奋的特性(“魅力”)。基于此类标准的支持会成为候选人累积的政策记录或者政策承诺的反映,菲奥瑞纳(Fiorina 1977, 1997)则非常贴切地把政党认同称为政党过往记录的“账簿”。当然,政党竞争理论包含对这些因素的分析。

在回应的理性模式中,应区分选民(委托人)和政治家(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之间直接的和间接的交易。在间接的政策交易中,民众根据责任政党模型投票。之所以把这种交易视为间接的,是因为从委托人投票到代理人采取权威性行动之间,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而且代理人的行动把收益成本分摊给各种抽象的选民群体的成员,而不论这些群体中的成员个人是否真的为决策者投了赞成票。也就是说,政治家对于他们的支持者在社会中的分布,可能只有一种大概的意识,他们无法精确了解,也无法监控或者制裁选民。与这种间接的“政策”交易相反,在直接的、目标明确的、“裙带式的”交易中,选民个人或者他们构成的小团体为他们的选票获得直接收益,或者由于为失败者提供了支持而受到直接损失。这种交易涉及的“通货”包括礼物或金钱、公共部门的职位、公共住房、社会政策转移的特权、更有利的管理规定,以及使企业雇用曾支持过获胜政党或者候选人的工人的采购合同等。<sup>①</sup>裙带政治总是包含了某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机制,使政治家能够监控甚至制裁小群体的选举行为。

有很多理论试图说明裙带式交易关系在政党竞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参见 Scott 1969; Schmidt 1997; Shefter 1994; Kitschelt 2000; Piattoni 2001; Keefer 2005; 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6)。物质生活的渐趋丰裕和贫困的逐步消除,可能会减弱裙带因素在选

<sup>①</sup> 裙带关系总是涉及选票与物质利益之间的交换,而不仅仅是富有的选民为政党提供金钱以换取经济上的好处。当然,这种物质上的支持可以使政治家很容易地建立裙带关系。

民中的相对价值,并且提高他们对于在以政治方式提供公共品等方面此类活动的机会成本的敏感性。发展网络,即因国有的、国家补助的,或者国家调节的企业乃至整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机会而形成的裙带关系。<sup>①</sup>在国家提供的“软性预算”羽翼之下运行的经济行为体更容易接受各种出于人情的任命,因而也更容易接受裙带关系;而一个社会如果被受到动员,又在选举方面垂直区别开来的族群—文化团体所分裂,则裙带关系会更加显著(参见 Horowitz 1985; Chandra 2004; Wilkinson 2004)。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与政党体制的竞争性相互作用(见后文)。更为激烈的竞争,会鼓励政治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经营关系网和/或者纲领性的政策竞争。

至于选举和行政制度是否影响了政党体制中裙带式与纲领式竞争的平衡,则尚无定论。要求候选人公开与其进行直接交易的、数目受到严格限制的选举人的选举规则,可能会减少裙带式的交易(参见 Katz 1980; Ames 2001)。但也很容易观察到,在实行封闭名单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很多政党都受裙带关系的影响,如1999年为止的委内瑞拉和澳大利亚;而在实行开放名单选举制的国家,也存在很多纲领性的政党(参见 Samuels 2004)。

## 2.2 价值与立场竞争

对传统政党竞争理论的批评,引入了另一种可能与民主回应制有关、且较为有用的对价值与立场,或者说政党选择的区分(Stokes 1963)。由于偏好稀少而重要的物品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更需要的只是一种物品(如诚实的政治家、对经济的有效管理等)。因此,各政党也不就是否提供某种物品选择立场,而是在如何更可信、更好、更充分地提供这种物品方面相互竞争。每个政党都声称拥有“更具吸引力”的候选人和技术顾问,证明自己更有能力提供公共品(如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保护环境、防止恐怖主义),并且/或者为所有提出要求的人分配更丰裕的相关利益。

相反,立场竞争假定,对于政党提供的物品与服务的业绩,选民的偏好分布相当宽泛。政党因此可能会在同一个维度上针对不同的选民作出不同的承诺(见2.3小节)。立场选择通常与政策议题相关。不过对立场理论的批评认为,就选民而言,大多数时候价值问题会压倒立场问题。比如,回溯性的经济投票关注的是人们所感受到的某党政治家的“能力”,这又关系到他们是否有好的经济表现,像降低了通货膨胀和推动了经济增长等。另外,价值竞争领域内也存在非政策模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裙带政治

<sup>①</sup> 此句原文为“Development, clientelism hinges upon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state-owned, state-subsidized, or state-regulated firms and entire sectors.”疑有错漏。——译者



中,政党竞争选票的方式是把自己装扮成那些最丰裕的、最可靠的、最便利的利益的提供者;而带有候选人人格魅力的竞争则会转向那些被广为称道的品质,如领导力、同情心,或者青春活力等。

尽管如此,在民主回应制的类型与政党竞争中价值或者立场选择的优先性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候选人的素质而言,虽然没有选举人会喜欢无能的政治家,但与当机立断和雷厉风行相比,一些人会更注重政治领导素质中同情心和深思熟虑的一面。类似地,在竞争公职的候选人族群—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选区,对选民的代表问题(通过候选人的性别或者民族)就可能成为一种“立场”策略。另外,裙带式交易也可能会以立场竞争的方式展开。在选民高度分化的选举环境下,某些政党可能会采取裙带主义的做法,并且暗示由此而来的腐败会得到宽宥,而其他政党则会采取相反的立场。

然而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直接反对斯托克斯的观点(Stokes 1963),并且断定立场而非价值至少潜在地构成了大多数政策议题诉求的基础。虽然政治生活中很多终极目标可能具有价值的形式,但政治本身就是对达至这些目标的手段进行选择,因此,由于认知与评价的分歧,人们完全可以坚守立场竞争的视角。社会生活中因果关系复杂多变,因此对于达致某一目标的政策手段的实效,人们的评价就会各不相同;对于政策手段导致的分配效应,人们也会争论不休。政治家可能会使用一些价值符号(如打击犯罪,减少通货膨胀,创造工作机会)推销某种分配方案。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语言权术的一部分(Riker 1986),可以用来掩盖他们自己的价值诉求导致的分配效应,同时彰显对手的价值议题框架。意识到价值竞争对政党的限制非常重要,因为各类政党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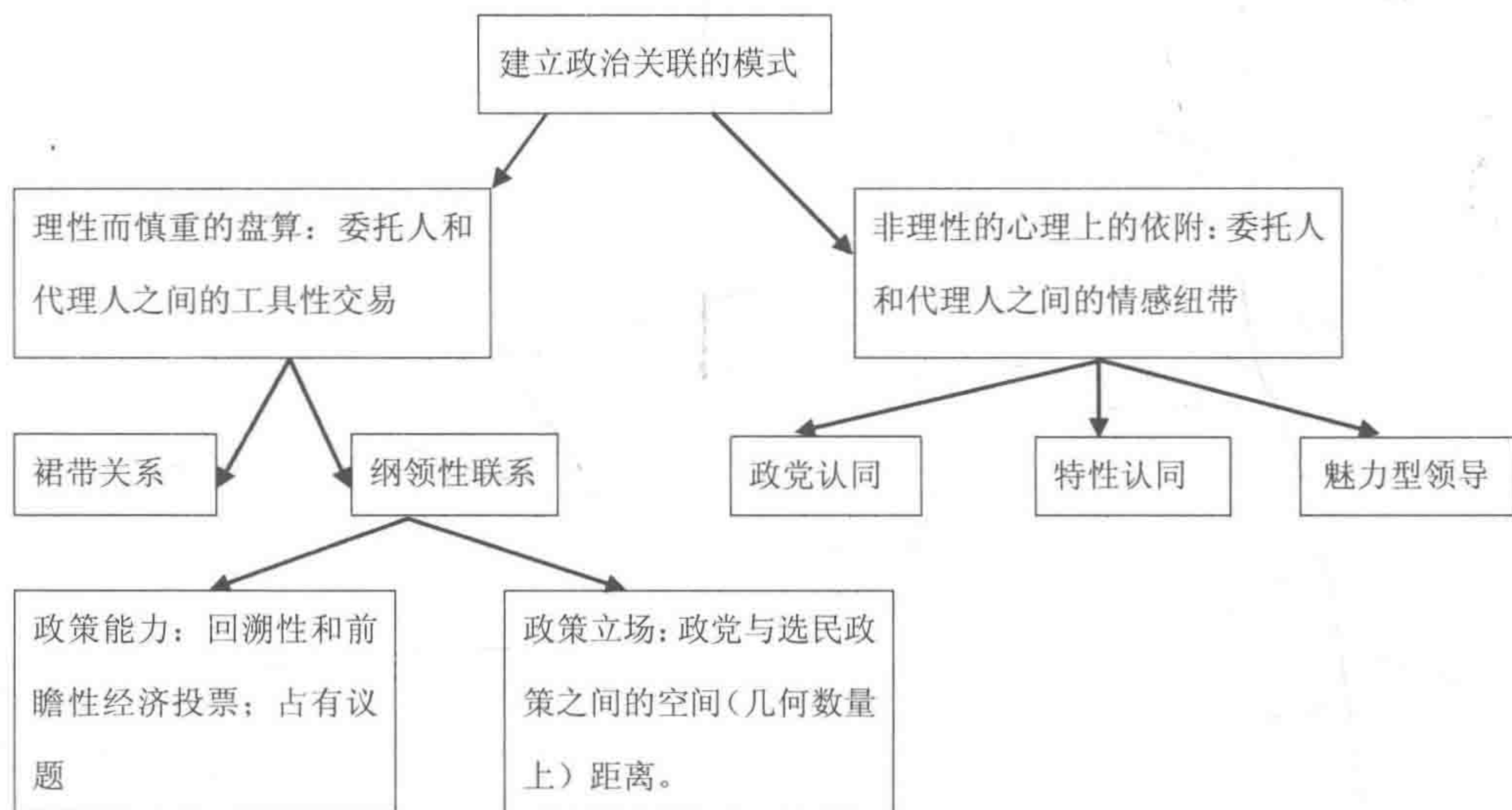


图 22.1 民主制中政治关联的不同模式

的宣示,作为政党最完备、最系统的纲领诉求的体现,至少最初是建立在政党竞争中价值问题的优先性的基础之上(参见 Budge, Robertson, and Hearl 1987; Budge 2001)。

图 22.1 总结了回应机制与价值或立场竞争优先性之间的关系。从经验上看,存在以下可验证的规律。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候选人的诉求表现为价值竞争而鲜有立场竞争。裙带式的回应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政党之间的价值竞争(谁能够提供最多的利益且最可靠?反过来说,在拒绝裙带关系的诱惑方面谁最“清廉”?)。在经济高度分化、收入差距悬殊的选区,由于裙带关系会得到一些政党的支持和另一些政党的反对,所以某些时候它会体现为立场竞争。

### 2.3 数量特性:碎片化、有效数量和变动

长期以来,政党体制被区分为两党制与多党制(参见 Duverger 1954; Downs 1957),但这种区分最终让位于更具体的数量标准(Mair 1997, 200—206 页),最有名的可能是萨托利(Sartori 1976)基于是否存在“反体制”的掠夺性政党,对温和的和极化的多党制的区分。不过,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由于出现了政党体制规模更为精确的、以变量为基础的测量方法,政党体制的类型学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新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对政党体制碎片化程度的测量(Rae 1967),或者由拉卡索和塔杰帕拉(Laakso and Taagepera 1979)提出的其数学化表达,即“有效政党数”,这个数值的计算可以根据选民对政党的支持(ENVP),也可以根据国会中政党的规模(ENPP)。这一方法,以及后来以数学方式对这种测量的扩展(Molinar 1991),其核心思想是把政治体中政党数量和规模的分布结合在一个单一的碎片化系数中,它反映的是政治体中政党与规模加权的情况。碎片化测量仅仅根据政党标签计算其数量,但只有把政党视为单一的集体行为者时,这种方法才有意义(参见 Morgenstern 2004)。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一种广泛使用的、从时间维度测量政党体制的结构性参数,即政党体制的变动。变动指数总结同一政党在两次相继的选举中支持率的变化(最大取值为 100,一般会除以 2。参见 Pedersen 1983)。几乎不言自明的是,碎片化与变动之间紧密相关。但是,如果几个政党在立法和选举活动中紧密合作,形成某种集团,而变动指数又仅以政党为基础,不能反映集团内部的情况,因此有可能严重高估政党体制的变动程度(参见 Bartolini and Mair 1990)。对变动本身进行有差别的概念化,并以此说明时间进程中政党体制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则有可能得出重要的成果。

### 2.4 基于政策的纲领性政党制度:社会与政治的分化、断层及竞争维度

除行为者的数量之外,纲领性政党体制的空间—立场理论也会考虑政党竞争的维

度的数量,经验性比较研究通常称之为“断层”。由于这一领域使用的术语常常发生变化,所以首先必须澄清概念之间的差异。每一个社会,都会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集团利益,以及剥夺感而产生不同的分野。如果这类在特征、归属,及观念方面的分化具有持久性,特别是彼此互相强化(Bartolini and Mair 1990),我们就称之为断层(Rae and Taylor 1970)。断层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分化”,后者仅仅与某个单一的决定(以欧洲的情况为例,应该在道路的左侧还是右侧通行?)相关,其导致的集团分化更容易发生改变。断层一般具有拘禁和封闭的特点。由于个人不仅要面临进入或者退出某个社会政治集团时成本高昂的门槛,而且还有作为成员必须接受的回报或者剥夺,因此他们也就倾向于在这个集团中组织起来,以获取或者维护特定的经济、政治或者文化资源,还有权利与特权。

此类分化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转化为以改变现状为目标的行动,更不用说以政党政治这种极为特殊且具有挑战性的方式进行了。当不同党派体现了社会分化不同侧面的时候,政党分化才会出现。从统计学意义上说,这种以政党形式体现出来的分化可以通过因子和判别分析,也可以通过回归分析的技术手段加以识别;如果把政党选择作为自变量,则多变量对数模型更为有效。如果几种相互强化的社会分化由同一些政党加以体现的话,那么由政党体制反映的社会分化的数目可能比政党分化的数目更大。因此,如果所有工人阶级的选民都不信宗教,而所有非工人阶级的选民都信仰宗教,那么即使政党把两方面的问题都反映到政党体制中,也不会出现宗教和阶级方面的政党政治分化。相反,如果社会分化导致的群体成员身份相互交错,并且通过政党体现出来,那么就可能产生多重的政党分化。

从谋求公职的策略型政治家的观点来看,决定赢得竞选的策略动机的并非社会甚至党派分化,而仅仅是政党体制中最小限度的竞争分化或者“竞争维度”。正是因为这些分化的存在,选民才有可能依据各政党对其相互竞争的诉求与承诺的调整,在党派选择方面表现出某种弹性。与之相对,很多政治分化所涉及的不过是政治认同,而非政治竞争(参见 Sani and Sartori 1983)。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党派倾向,但是,如果竞争中的政党可以在给定的政治维度上改变它们的诉求,那么就不会存在选民们可以改变他们的政党选择的开放性的选举市场。在同一个竞争维度上,相当一部分理性的选民会对政党诉求的变化作出回应。这种弹性难以测量,这可能需要一种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大致反映一个维度上竞争状态变化的,是相关问题对选民和政党来说的重要性。

表 22.1 总结了前文介绍的术语及其运用。通过一个例子也许能够说明,这些区分对于推断未来的历史发展(2.4 节)会有所帮助。在比利时,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都存

在着两种相互交叉而又同样具有竞争力的政党分化。一种是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分化,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为一个极端,与中间跨阶级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另一个极端的商业自由主义者相对立;另一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分化,它使世俗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阵营与天主教基督教民主阵营分隔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宗教的分化逐渐失去竞争力,并演变成单纯的政党认同上的区别。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一种平行的运动,语言和地域问题上的族群—文化区分开始登上政党竞争的舞台,且在弗兰德斯比瓦隆尼亚更为明显。这一区分虽然长期存在,却以前从未在政治上引起关注。到20世纪90年代,一种经过重组的社会经济分配方面的分化、族群—语言方面的分化,以及政治治理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与威权主义者之间的分化,都走上了比利时政党竞争的前台,特别是在弗兰德斯。与此同时,原来基于社会经济差别的工人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区分,以及宗教性的区分,都不仅失去了形成政党参与竞争的能力,甚至也失去了维持政党认同的能力。

政党数目是否反映了政党体制中的断层数(Taagepera and Grofman 1985; Lijphart 1999, 81—83页)? 虽然社会分化的增加有可能导致政党分化的增加,并进而导致竞争维度的增加,但这还不是一个十分确定的结论。由于现有研究尚未在政治分化和竞争维度的概念化方面予以充分关注,所以政治体制中政党数目与立场分化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还存在疑问,而在经验上也未经验证。

表 22.1 民主政党竞争中议题观点的组织

分化在政党体制的组织中是否具有核心地位?	议题分化是否具有持久性?	
	较低:“分化”	较高:“断层”
较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分化	社会和“意识形态”分化	社会和“意识形态”断层
中间:政治层面上的政党分化	政党分化(短暂)	政党断层
较高:竞争维度	完全的分化(短暂)	真正意义上的断层

在很多情况下,但上述比利时的例子除外,政党会把选举竞争的实际维度减少到一两个。对于政党竞争维度减少的原因,研究文献提供了一些解释,但未必完全。在所有情况下,一个基本假设是,政党不可能随便挑选议题而不对重要议题表明立场,除非它们规模极小且无关紧要。这一假定的原因是,政党的政治家是从不同地区选举出来的,他们将在立法机构中针对一系列不确定且不受限制的议题代表选民的立场,而对于立法日程,他们仅有十分有限的控制能力,比如,对国家预算案的投票就会涉及不计其

数的议题。

首先,进入性的制度壁垒有利于两党制,而现有政党中的政治家也会有强烈的动机阻止因交叉议题产生的党内分化,以免在现有分化的基础上针对新的重要议题产生不同的立场(Stimson 2005)。其次,政治家和公众针对不同政治选择进行信息处理的一般性认知局限,使那些能够在较低的意识形态维度表达其立场的政党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参见 Downs 1957; Hinich and Munger 1994; Lupia and McCubbins 1998)。最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政策(比如福利国家的发展)对社会偏好分布的影响,可能会围绕非常低维度的空间形成一系列政治偏好(Kitschelt 1994)。所有这些假定都不认为存在某种逻辑上具有必然性的约束,使特定的议题立场相互聚合。

## 2.5 政党体制的竞争性

如果(一)选举结果极为不确定,并且(二)有不确定的事情发生,比如政党选举支持的微小变化导致了立法机构中代表数的巨大变化,并且/或者导致了政党在行政任命、相互支持,以及政策形成方面更大的讨价还价的权力,则政党体制会在变得更具“竞争性”的交涉中转化为巨大的差异。竞争性越强,政治家就会为动员支持付出更大的努力,而选民也会对政治(竞选捐款、结果和信息处理)予以更多的关注。

在两党制之下,竞争性通常以两位候选人竞选中支持度的接近程度,或者预期的胜选差距衡量。不过,这种方法的普遍性不足,也未能考虑选举竞争中双方的“努力程度”。如果各方作出的承诺本质上没有区别,那么选民和候选人还会尽其全力吗?

如果以下五个条件得到满足,则政党体制的竞争就会很强(见图 22.2)。<sup>①</sup> (一)对策略性政治家来说,稍稍增加的支持率会转化为关于立法机关中的多数(联盟)和行政官员任命的谈判力量的巨大增长。实行单一选区多数制的“多数决”民主制倾向于产生由单一政党多数构成的政府,至少在议会主义之下,并且缺乏制度外否决点时会如此。这就为立法和行政机构内部联盟的形成给予了更多的制度性便利(参见 Lijphart 1999; Powell 2000; Tsebelis 2002)。(二)出现两个以上的有效竞争对手时,如果政治家能够围绕为政治权力展开竞争的可识别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协同行动,就能够保住他们的竞争力。<sup>②</sup> 从选民的角度看,偏好的分布应该让所有的行为者都认为结果(三)非常接近(两个政党联盟之间的胜选差额很小),而且(四)是开放的,即存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选举市场,选民能够在候选人之间自由选择,并且能够对他们的诉求的细微变

<sup>①</sup> 选举的竞争性,也被称为“行政的责任性”,相关讨论见 Franklin(2004,112—114页)。

<sup>②</sup> 关于可识别性及其操作的讨论,见 Strom(1990b,47页、73—75页)。

化作出回应。

除以上四个条件之外,只有当(五)竞争的努力程度也很高,比如相互竞争的政治家联盟的成本—收益的不对称性比较高时,才可以说竞争性很强。政治家提高或者降低其努力程度,部分地取决于(一)到(四)这些条件,不过下文将证明,这些关系还不是很清楚。面对这一问题,人们可能认为中间选民理论比较具有说服力。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有两个可识别的集团在竞争多数的支持,从而使获胜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操纵制度杠杆,而且在实力比较接近的竞争者之间存在一个竞争市场的话,那么两个阵营的政治家都会承诺在获胜的情况下提供类似的成本—收益分配,从而在事实上降低努力程度。这样一种承诺,最受中间选民的欢迎。我们将会看到,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与这一对抗力量的行动逻辑(多数形成层面的激烈竞争和多数行动层面的微弱竞争)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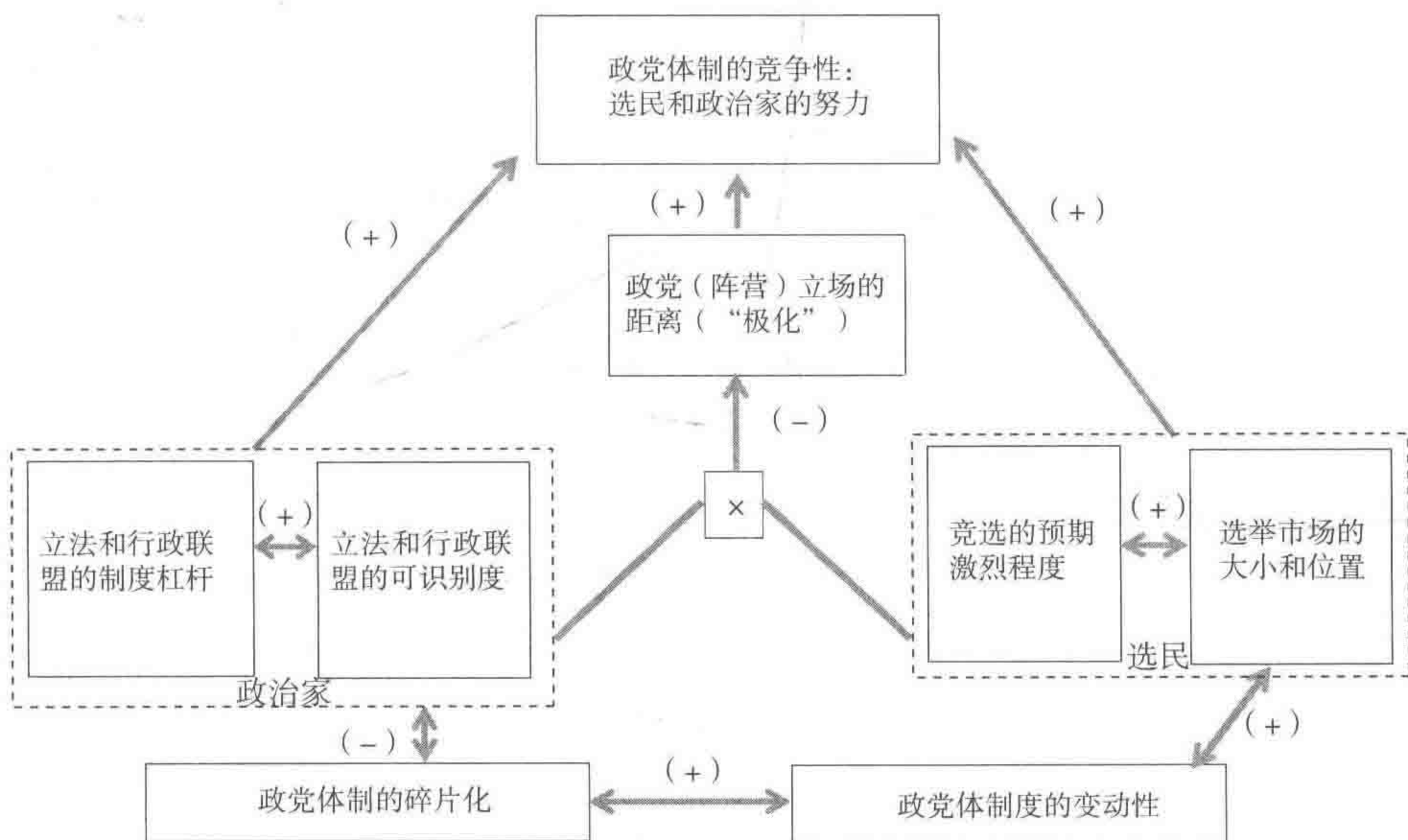


图 22.2 影响政党体制竞争性的变量

仅仅从政治家和选民是否愿意在选举中付出努力这一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影响选举竞争性的条件相当复杂。所以,像政党体制的碎片化和变动性这类简单的指标,显然就不能作为竞争性的经验性的测量标准。然而,它们还是常常为此目的而被采用,尽管它们只能间接影响决定竞争性的某些条件。另外,这类指标之间的因果联系本身也是有争议的。虽然人们认为,由于政党制度的碎片化会增加选举获胜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强了选举的竞争性;但相反的情况也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碎片化会降低执政联盟的可识别度。政党体制的变动性也许能够反映选举市场的规模,但未必能够反映其(竞争

阵营之间的?)位置。最后,根据巴托里尼和梅尔(Bartolini and Mair 1990)的观点,要推断政治家和选民在政党竞争中的策略选择,应该在政党联盟而非单个政党的层面对变动性加以测量,而这一点很少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 三、静态比较:政党体制中的策略选择

大部分政党体制竞争理论都假定:(一)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包含间接的纲领性交易,(二)交易涉及立场议题和承诺。策略选择仅依据竞争者的数量和政党体制相关的竞争维度发生变化。关键的目标是要找到由竞争数量和维度所决定的均衡,使策略行为者只有在降低其回报的情况下才能改变选择。由于半个世纪的形式化研究发现,在此类条件下难以找到均衡点,所以最近的理论工作放宽了模型假设,包括针对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和立场议题的假设,以推断均衡点的位置;或者干脆放弃对均衡点的寻找,而代之以电脑仿真的代理人模型。

#### 3.1 简单空间理论:均衡的模糊性

此类研究最简单的案例和起点是唐斯(Downs 1957)的中间选举人理论,据此,两个政党都会选择接近中间选民立场的政策诉求。为了得到这个均衡,人们必须假定(一)政治家有谋求公职的动机,(二)他们拥有关于选举情势的完善信息(包括选民偏好),并且(三)不畏惧新的竞争者加入,(四)他们得到政治活动家的无私资助,其目标与候选人完美契合,(五)他们在选民分布的一维空间竞争理性选民的支持,(六)选民有明确的偏好序列,且充分了解情势,(七)他们不会弃权,(八)而且会在选举的当时(九)把自己的选票投给那个立场与他们的个人理想最接近的政党。同样,在一维竞争的相当严格的条件下,一些形式化理论能够证明,拥有四个或更多候选人的体制,也可以使对抗在竞争空间中展开,并且达到一种均衡分布。

如果放宽上述必要假定中的一个或几个,以得出中间选民理论,就会发现它的脆弱性(参见 Grofman 2004 的评论)。这与经验观察相吻合的,即哪怕是在单一维度的两党竞争中,竞争者的立场也会分化而非趋同。同样,在多党和/或多维度竞争中,均衡条件也十分脆弱且难以确认。谢普索(Shepsle 1991)发现,如果竞争维度多于一个,或者竞争者多于两个,且其他合理假设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则不能保证可以找到均衡点。在一次调查中,一位政党竞争空间理论方面著述颇丰的学者承认:“要建构关于政党竞争结构的一般性的简单理论不大可能。”(Ordeshook 1997, 266 页)因此,理论要具有经验意义,就只能或者增加新的假定,或者干脆放弃对均衡的追求。在

上面两种情况下,关键问题是说明政党分化和稳定性的条件,尽管选区规模(M)和选举规则可能促成具有更多人口的更大的政党体制(参见 Cox 1997, M+1 政党体制规模的外部边界)。

### 3.2 复杂空间理论:特殊条件下的均衡

因为相关学术文献纷繁复杂,我将仅限于罗列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放宽空间—立场竞争理论的建议。我回避了基于价值议题的竞争理论(Budge and Farlie 1983),因为我相信只要选择被合理框定,议题就能反映立场。不过,“价值”是通过候选人的吸引力和政党认同(包括政党提供选择性的利益或者“好”的公共政策的能力)这些非议题的考虑发挥作用的,在此我们就涉及最近提出的两种关于两党或者多党体制下政党立场的稳定性和分散性的说明。

第一,亚当斯、梅里尔和戈夫曼(Adams, Merrill, and Grofman 2005)提出了一种空间模型,据此,(一)选民非政策性的党派偏好(包括政党认同),(二)人们对候选人作出承诺时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的不信任,以及(三)选民弃权的可能,会在单维或者多维选举空间中,使纲领上分散化的政党之间达成稳定的均衡。在这个模型中,非政策性的党派偏好是关键,而不信任与选择弃权,只是放大了这些偏好在使政党投票分散化方面的效果。其中的逻辑很清楚。如果选民因非政策性的原因认同一个政党,那么即使这个党当下的议题立场与其竞争者相比更远离选民的预期,他们也会对其提供支持。这一观点虽然看上去可信,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为“非政策性”因素包括一系列变量,它们不仅需要得到澄清,而且通常也会间接地具有某种潜在的政策基础,如果人们的职业或者党派认同的影响有可能转变为对某个政党政策追求的长期评价时,情况就会如此。

第二,肖菲尔德(Schofield 2003, 2004)提炼了一个竞争的价值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政党在某个附加的价值维度上吸引选民,以及彰显其候选人能力和领导力的声誉方面,无论处于有利还是不利的地位,只要它们在其政纲诉求方面具有某些灵活性,那么策略性的政党就会在纲领议题空间中出现分化。虽然这一模型在形式上比较优雅,但在经验层面,它会导致一种对政党体制分散化的机会主义式的因果论证。亚当等人(Adam et al. 2005)的调查表明,在政党分散的情况下,尽管关键的自变量复杂多变,研究者总还是能够确定某些价值因素。

第三,从梅(May 1973)和罗伯特森(Robertson 1976)开始,经阿德里希(Aldrich 1983)和施莱辛格(Schlesinger 1984),到麦克盖恩(McGann 2002)、米勒和肖菲尔德(Miller and Schofield 2003),理论家们引入了委托人偏好多样性的概念,正是他们选



出了政党候选人和任职者。如果候选人不仅依赖选民,而且也依赖党的“活动家”,即那些本身并非候选人,但为动员选民而付出精力和金钱的人,那么后者的思想和偏好就会影响前者的策略性诉求。为了维护党的选举信誉,领导人可能需要在决策过程中为活动家提供某些表达的机会,以此证明围绕一系列目标达成的一致并非少数领导人策略性的空头支票,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承诺(Caillaud and Tirole 2002)。不过党的活动家一般都是些观念至上的人,他们加入政党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纲领偏好,而不是赢得选举(参见 Panebianco 1988)。为了获得活动家不可或缺的投入,候选人可能会被迫调整议题立场,并使其偏离他们最佳的选民议题诉求。当然,活动家是否会采取此类激进的立场,则取决于政党体制的形态,以及围绕一系列议题进行的社会偏好动员(参见 Kitschelt 1989a)。在多党制之下,参与政党竞争的不满的活动家更多是发挥一种工具性的作用,以赢得选票和公职,而不大会系统表达各不相同的观点。

第四,一系列模型都认为,候选人不仅追求公职,同时也追求政策,因此从空间意义上说会偏离他们为赢得选票所需的最佳纲领诉求。对这一立场,罗姆(Roemer 2001)进行了最全面、最复杂的论述。他认为,即便是在两党制之下,如果那些以政策为目标的候选人面临两维政策空间内选民偏好的不确定性,以及围绕某个联合选举策略在三个不同的党内派系之间建立胜选联盟的任务时,就可能产生一些均衡点,并把不同的竞争者彼此区分开。

第五,选民可能是策略性的,因此并不根据他们自己的政策理念与某个政党的政策理念之间的相似度、而是根据未来可能的党派联盟的政策取向投票(Kedar 2005)。在这种情况下,较极端的政党可能会赢得更多份额的选票,并导致更极化的政策选择。选民之所以会支持其政策取向比他们自己的政策理念更为激进的政党,是为了以此换取较为温和的合作者的妥协,并且最终使联合政府的政策重心接近选民真实的理想位置。词典式投票模型(Kitschelt and Rehm 2005)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该模型认为,如果政党受制于它们以往的行动记录,不能在更显著的政策维度上彼此明确区分,以致党派差异对选民们来说没有太大意义的话,选民们就可以按“词典”式的排序方法<sup>①</sup>排列他们在政党之间的选择,依次把他们关注的焦点放在第二个、第三个或是第  $n$  个竞争维度上,直至党派差异对选民来说变得足够清晰和突出为止。

第六,选民可能并不简单地依据空间理性行动,即估量他们自己期望的政策框架与

<sup>①</sup> 指本文词典中排列词条的方法,如 aaa, aab, aba, abb, bbb 等。——译者

政党竞争者的政策承诺之间的空间距离,再考虑其重要性。他们也可能会根据政党是否针对某个政治议题明确表达了“正确的”立场,而以“直接”的方式对它们提供支持。这样会推动各政党明确区分它们的议题立场(参见 Rabinowitz and McDonald 1989)。针对这一观点,已经产生了众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最终的结论大概是选民的考虑中同时包含了空间性的和直接的因素,不过从经验上看,对于投票行为的基本的空间框架而言,直接的因素只是施加了某种可以忽略不计的修正。

### 3.3 以行为体为基础的政党竞争模型

新近出现的一种以行为体为基础的计量模型,既是对政党竞争的形式化理论的反弹,同时也反映了对单独的历史叙事的不满,而它本身的目标,则是对政治体制的比较静力学和动力学获得某些理论上的深入认识(参见 Kollman, Miller, and Page 1992, 1998)。这里的一个关键性假设是,选民和政治家都只有相当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他们只根据某些简单的规则,而不是对所有人的偏好和策略选择的调查采取行动。由于选民在空间中投票,同时只处理极少的信息,所以政党要不损害其声誉的话,只能在议题空间内缓慢移动。根据拉伏尔的观点(Laver 2005),政党仅根据一些简单的拇指规则行动,比如“猎人”规则(重复使用增加了选举支持的诉求,而如果选举失败,则对其加以修正),或者“掠食者”规则(永远向选举中最强大的政党靠拢)等。在选民随机分布的二维空间中,此类行为会使政党活动家逐渐向中间地带聚拢,但不会有政党直接移动到绝对的中心,它们也不会不断变化立场,以阻止稳定的均衡。

基于行为体的计量模型的优势和劣势都在于,虽然可以对其进行无限的修正和复杂化,但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操作在认识论上的含义。如果某个特定模型的模拟结果与经验相符,我们是否就已经得到了对可观察行为的理论说明?如果很多次不同的模拟也产生了相同的经验结果又该如何解释?这意味着基于行为者的模型必须与经验研究相结合,以丰富计算机模拟采用的行为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可以通过简单计算选民因可观察到的、与他们接近的政党的表现而退出或参与选举的情况,对拉伏尔的模型加以发展。

### 3.4 新政党的进入

形式化的空间理论在解释政党进入的问题上成就十分有限(参见 Laver and Schilperoord 2005, 8—9 页的批评)。最近出现的一种非空间的、信息不完全的博弈论模型可能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一模型反映的是潜在的进入者与既有政党的互动关系,虽然它关于当权者与(私人)挑战者的知识分布的假设有问题,并且导致了相当复杂的经

验结果(Hug 2001)。

非形式化的经验研究潜在地受到某种关于竞争的受行为约束的准空间框架的影响,据此,政党的进入和退出被视为供求关系的结果(参见 Hauss and Rayside 1978; Harmel and Robertson 1984; Kitschelt 1988, 1995a)。受社会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新的政治要求凸显出来,而既有政党则不能对其加以满足。这种不妥协可能出自以下原因:(一)既有政党的声誉只能缓慢变化,并且需要付出极大的选举代价,加之(二)选举交易导致了政纲性诉求的变化。虽然新的议题诉求也许只能逐渐赢得新的选民,但既有政党却会迅速被旧的选民所离弃,从而使其陷入选举危机。选举制度、大众媒体,或者政党财政对新的挑战者形成的进入壁垒,会让现有政党多多少少忽略新的政治要求而不至付出太大代价。计量模型可以同时捕捉现有政党策略性的消极无为,以及新政党面临的进入壁垒(参见 Laver and Schilperoord 2005)。

虽然很多关于政党进入的非形式化的和计量的研究潜在地受到政党竞争空间模型的影响,且放宽了对选民和政治家的理性要求,但批评者还是通过引入凸显模型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麦基德(Meguid 2005)认为,对某个政党来说,如果某个议题凸显出来会导致其内部分裂,或者失去部分选民的话,那么它可能会选择忽略这个议题;而另一个政党为了伤害自己的竞争者,则会选择一种相反的策略,即把这个议题凸显出来,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立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新政党就会兴起。麦基德试图使政党竞争维度内在化。实际上,里克尔(Riker 1982, 213—232页)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预示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在一个现有的竞争维度上遭到永久性失败的政党,可能会试图在政党体制内创造一个新的竞争维度,以从内部分裂垄断性的政党,并为新的政党或者旧的失败者在选举中取而代之提供机会。里克尔的证据,是共和党因奴隶制问题而兴起的历史事实。不过这一事例也表明了意志主义理论的局限,它认为,策略性的政治家能够“制造”出显著的议题维度。文加斯特(Weingast 1998)通过政党竞争,对奴隶制问题进行了一种不同的说明。他认为,只有当政治经济条件允许政治家诉诸外生性进程,即有足够数量的选民提出新的政治要求,且这些要求不能被纳入既存政党体制框架之内的时候,他们才会创建新的政党或者联盟。

#### 四、政党体制的历史变迁

政党体制历史变迁的开山之作是李普塞特和罗甘(Lipset and Rokkan 1967)关于西欧政治断层的产生和存续的文章;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则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政党竞争的空间理论或者政党进入与退出模型中明确涉及的诸多因素。因此,在政党竞争的

形式化或者非形式化的一般性分析与政党体制演化的比较历史研究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动,社会中产生了新的利益和价值分化,而随着制度约束和政治家为争取选票、谋求公职,以及控制公共政策而加以利用的策略机会的不同,不同的议题集也会被纳入政党竞争的舞台。在理想状态下,关于政党体制的一般性分析与历史比较研究会相互补充与相互启发。前者一般是在选民和政治家的政治偏好已经给定、而政党的数目或者外在、或者内在于政党体制的前提下,对其策略性运动的静态比较分析;后者则主要探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它们形塑了偏好以及制度和策略环境,而后者又进一步影响了被政治家们视为可行的政治策略。因此可以说,后者为前者非历史的框架中真实了血与肉。

#### 4.1 西欧政党形成的经典分析

李普塞特和罗甘(Lipset and Rokkan 1967)在始于17世纪的民族与产业双重革命的背景下,分析了欧洲政党体制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不过,他们的分析绝非社会学决定论(Sartori 1968)。首先,影响了社会分化动员的历史条件包含一系列政治行为。政党和政党体制出现的背景,是一系列政治过程中相互冲突的精英们进行的政治选择与互动,这些过程包括建立地域国家、把宗教组织收归国家权威之下、迫使土地精英不得不交出政治控制权力,以及把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纳入制度化的政治框架之内。其次,他们强调选举权的普及和选举制度的建设这一复杂多变的政治过程,既是政党体制形成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因此,农业和宗教分化并非社会学条件的自然结果,而是来自于政治精英间复杂的策略互动。

在李普塞特和罗甘之后,在政党体制的比较历史分析中最精致的例子大概是卢贝特(Luebbert 1991),卡利瓦斯(Kalyvas 1996)和巴托里尼(Bartolini 2000)的研究,它们都捕捉到了欧洲政党体制形成和重组过程中供求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卢贝特强调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在动员农民选民过程中的策略性冲突,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党体制的不同发展路径。卡利瓦斯(Kalyvas 1996)揭示了19世纪晚期以来卷入宗教性政党形成过程中的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世俗政治家的策略性考量。巴托里尼(Bartolini 2000)则对导致欧洲政治中阶级分化的供需条件进行了一种全景式的描绘。阶级冲突是最后的、也是仅存的一种冲突,策略性的政治家将不得不把它纳入已经在其他分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存的政党体制之内。

相对于两种分析上略显单薄、历史上更缺乏洞见的观点而言,这些著作提供了一种更为精致、而且在经验上也更为可信的关于政党形成的图景。普列泽沃斯基和施普拉格(Przeworski and Sprague 1986)对政党和阶级政治提供了一种过分意志主义的解释,他

们强调的是策略性政治家及其能力在决定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中的影响；尽管经验分析不得不承认，既存的跨国文化差异、法团主义的利益协调，以及蓝领选民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在光谱的另一端，罗戈夫斯基(Rogowski 1989)对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同盟和党派分裂现象提出了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说明。他认为，由于国内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世界市场上的资本具有相对稀缺性，因此，在世界经济扩张或者收缩的情况下，针对贸易开放或者保护主义产生了不同的集团利益。这一观点虽然相当新颖，但过分估计了经济开放对政治分化和竞争维度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它缺少对经济利益集体动员及其转化为政党竞争的条件分析。

#### 4.2 后工业民主国家政党政治的转变

李普塞特和罗甘(Lipset and Rokkan 1967)关于20世纪20年代欧洲政党体制“正在冻结”的著名论断，在相关研究中发挥了过大的影响。这原本只是他们在对欧洲政治断层形成的历史进行长期的比较分析基础之上，作出的一个尝试性的观察结论，但随后却被视为关于成熟的、制度化的政党体制的基础性的理论和经验论断。不过，在一段时间内对欧洲政治体制相对稳定性的经验观察，也并没有使李普塞特和罗甘否认这样一种可能，即这一体制正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分化重组的系统过程(参见Mair 1997,第4页)。在对富裕的后工业民主国家政党体制转变的比较研究中，至少有三个不同的论题值得关注。

首先，很多学者在李普塞特和罗甘的影响下，探讨欧洲现存的政治断层结构的持续性和衰落的问题。研究发现，累积性政党体制的变动只有轻微的增长(Maguire 1983; Shamir 1984; Bartolini and Mair 1990)。但是，个人层面的投票分析表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投票发生了实质性下降，虽然不同国家情况有所不同(Franklin, Mackie, and Valen 1992)。这使一些学者认为政党不再是联系选民的纽带(Dalton, Flanagan, and Beck 1984; Dalton 2004)。后工业化特别是让受教育的公民不再相信政党，并准备投身于能够绕开选举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利益动员。这一趋势与投票率的下降、彼此无关的单一议题投票的增加，以及政党认同的日趋衰落相伴随，其结果就是冲突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政党层面的分化相互脱节。

第二个论题与上述观点正相反。一些学者强调，后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了新的党派分化和竞争维度的兴起。随着手工工人阶级的瓦解、教育和职业技术的分化，以及福利国家发展导致的一个广泛的非盈利性社会服务部门的兴起，社会经济利益发生了重组，政党也因而获得了重组政治分化和竞争维度的新的机会(参见Brooks, Nieuwbeerta, and Manza 2006; Evans 1999; Knutsen 2006; Manza and Brooks 1999)。当然，党派分化和

竞争维度并不直接反映基础性的社会变动,而是政党的策略立场及其建立选举联盟的能力的结果(参见 Kitschelt 1994; Kitschelt and Rehm 2005)。因此,政党体制的这些变化并不必然预示着经济分配型政治的衰亡,或者如后物质主义文献(参见 Inglehart 1990, 1997)所表明的那样,意味着经济利益联盟与政治文化治理需求的新的融合。

还有一大批研究文献探讨了后工业民主国家新的政党形成与获得成功的原因,其中一个核心观点是,面对各国现存政党不同的策略联合,经营型政治家采用了把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方法。虽然此类研究最早关注的是持自由至上论的左翼(Kitschelt 1988, 1989b; Redding and Viterna 1999),但近来很多欧洲国家以及盎格鲁-萨克逊殖民民主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一种得到普遍同意的观点认为,社会经济转型为这类政党提供了选民(首先是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手工劳动者和传统业主,如农民、手工业者和店商,一般是技术水平较低的人们),并使他们与不为右翼政治诉求所动的团体(首先是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特别是社会服务部门的女性)相对抗,但政治机会结构如何影响了极右翼诉求的性质、又如何使其获得了选举的成功,对此则充满了争议(参见 Kitschelt 1995a; Lubbers, Gilsberts, and Scheepers 2002; Norris 2005)。争论的核心,是极右翼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自由市场经济纳入他们的政治诉求框架之内(Cole 2005; Ivarsflaten 2005; Kitschelt 1995a; Schain, Zolbergi, and Hossau 2002)、选举法在推动或者阻止新的极右翼政党兴起方面因果效应是什么样的(Carter 2005; Golder 2003; Jackman and Volpert 1996; Norris 2005; Veugelers and Magnan 2005),以及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政策和治理实践的趋同和类似对新的右翼政党的成功发挥了什么影响(Carter 2005; Ignazi 2003; Kitschelt 1995a; Meguid 2005; Norris 2005; van der Brug, Fennema, and Tillie 2005; Veugelers and Magnan 2005)。

在政治力量重组方面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围绕欧洲统一产生的分化进入了各国的政党体制之内(Gabel 1998; Hix 1999; Marks and Wilson 2000; Marks, Wilson, and Ray 2002; Marks and Steenbergen 2004)。在很多国家中,欧洲统一不大会在上述特定意义上成为一个竞争维度(Mair 2000)。但是,人们毕竟会感受到,或者推测欧洲统一对各国政治经济所带来的影响,而与之相关的不同的环境的条件,则可能使欧盟问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嵌入国内政治之中(参见 Bringar, Jolly, and Kitschelt 2004; Ray 2004; Scheve 2000)。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论题涉及在当今的后工业政治体中,公民与政治家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通过委托人—代理人的框架加以把握。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资本密集型的选举策略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二是公共政党不断增加的财政支持,这催生了一些不受选民需求影响的、无须回应的“政党卡特尔”(Blyth

and Katz 2005; Katz and Mair 1995, 重印于 Mair 1997);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竞争的力量以及选民退出的可能, 以驳斥这种观点 (Kitschelt 2000b)。换言之, 与以前数十年相比, 选民们对政党表达了更多的不满, 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趋势。那么, 这是否说明无须回应的精英已经造成了政治代表性的危机? 或者这些不满仅仅是糟糕的经济表现和经济结构转型导致的负面后果, 而它们恰恰为政党重组开启了新的机会?

#### 4.3 发展中世界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体制

虽然对经合组织国家的比较研究担心的是民主回应制的衰落, 研究发展中国家民主制的学者关注的却是一个相反的问题, 即在那些国家到底能否建立回应关系和制度化的政党体制。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和后共产主义政治的研究者来说, 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复杂多变, 似乎使选民和政治代理人之间形成一种持久的关系变得十分困难 (Mainwaring and Scully 1995; Mair 1997 第 8 章; Roberts and Wibbels 1999; Rose and Munro 2003)。在那些政党体制已经具备某种生存能力的国家, 支配着政治生活、且得到新的选民和政治挑战者接受的, 并非建立在间接交易基础之上的纲领性政治, 而是一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裙带关系, 无论在南亚和东南亚 (Kohli 1990; Chandra 2004; Chhibber 1998; Krishna 2002; Sachsenröder 1998; Wilkinson 2006), 还是拉丁美洲 (Fox 1994; Gibson 1997; Levitsky 2003), 或者后共产主义的东欧 (Hale 2006; Kitschelt 1999) 都是如此。裙带关系的存续和消亡, 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经济贫困和财产分配的不平等, 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政党竞争中产生的策略动机是否导向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回应关系 (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6)。另外, 常常受到裙带式交易关系影响的国有企业, 或者受国家管理的企业的不良表现, 也会影响民主国家回应制的演化方向。

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 在发展中世界的各个地区, 政党制度的稳固, 以及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实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和拉丁美洲, 一系列政党体制已经形成了结构化的纲领性政治断层, 以及比较稳定的竞争性政党分化; 而如果我们采用巴托里尼和梅尔的标准 (Bartolini and Mair 1990), 即主要关注一个分裂系统中政党阵营大致相似的诉求, 而非单个政党的变化的话, 情况就更是如此。关于后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断层与竞争性政党分化的程度与性质的文献正不断增加 (Bielasiak 2002; de Waele 2004; Evans and Whitefield 1993, 2000; Kitschelt 1992, 1995b; Lewis 2000; Pridham and Lewis 1996; Tavits 2005; Whitefield 2002), 一个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是原来居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政党融入民主化的政党政治的情况 (Bozoki and Ishiyama 2002; Grzymala-Busse 2002)。至于如何总结这些国家的政治分化和竞争维度的特征, 以及如何解释多多少少出现的纲领性结构, 则存在着争论。导致新的利益分化的, 到底是

每一个国家过去的政治经验(遗产),还是民主制度(比如选举制度,以及行政与立法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者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

对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非常类似的问题。一些作者试图确定至少某些政党体制中政治断层的起源、特征及其持久性(Dix 1989; Collier and Collier 1991; Coppedge 1998)。另一些学者则重点关注拉丁美洲政党体制稳定与变化的一般形态,以探讨民主政党体制制度化的原因(Dix 1992; Mainwaring and Scully 1995; Geddes 2003)。拉美与东欧的情况一样,有些国家的政党体制显得更稳定,且围绕纲领性回应机制建构起来。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竞争出现之前,即已经历过其他民主竞争的阶段。这种广泛政治动员的阶段使人们获得了政治经验,有些时候甚至“锁定”了某些政治经济成果,比如福利国家的萌芽,它们提供了某种支点,特别是在经济改革与市场自由化的时代,使选举能够围绕纲领性选择展开。

不过,在比较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时候,会发现一种奇特的不对称性。拉美政党体制的稳定性和纲领性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经历了一次最严重的侵蚀;而从2000年开始,这种侵蚀恰恰就出现在曾经拥有更稳定的政党体制的国家。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委内瑞拉,然后是阿根廷,甚至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墨西哥和智利也未能幸免。同时,那些政党体制一直不甚完备的拉美国家反而没有出现什么变化的迹象。东欧的情况相反,那些历史上纲领性回应制制度化发展较好的国家,目前的制度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即便是很多对这一制度并不太友善的地区,也表露出某些向纲领性回应制发展的倾向。

在东欧、南亚和东南亚,过去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显然有助于一种健全的代表结构的逐步确立。相反,在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加之政治精英没有能力确定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和反复出现的货币稳定危机),不仅导致了该地区持续的经济困境,也导致了民主政党体制的脆弱性。

## 五、结 论

本章对政党体制研究的文献回顾是高度选择性,它受到作者本人在该领域的研究兴趣的推动,也希望借此强调值得在未来付出努力的某些关键点。我认为,对于主导民主政党体制下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的不同机制的比较研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另外我还认为,在政党竞争“维度性”的研究中,应更注重社会、政治与竞争性政党分化的区别。第三,与第二点相关,我认为政党体制的竞争性需要进一步概念化,也需要比以



往更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过去学者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政党体制某些相对比较容易测量的宏观属性上面,比如政党体制的碎片化、极化、变动等等,但这些都不能反映政党体制的竞争性。

另外,本章对政党体制的研究回避了对概念本身作为自变量的讨论。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关于政党体制的各种概念和理论,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把它们作为研究不同政治经济过程中政党竞争结果的有效工具。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多数的形成、政策形成和贯彻过程的结果过程,以及政党体制的动力机制对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稳定和持续的结果等等,都属此类。由于这些问题本书其他部分都有所提及,所以在关于政党体制的这一章中我对它们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同时,对政党体制,特别是民主回应机制和党派竞争性更为精细的概念化,可以为通过政党体制推断政治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运行轨迹的研究,提供更出色的因果解释。

## 参考文献

- ADAMS, J., MERRILL, S., III, and GROFMAN, A. 2005. *A Unified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DRICH, J. 1983. A Downsian spatial model with party activ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974-90.
- 1995.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3.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1983, ed. S. M. Lipset. Washington, DC: APSA.
- 1993.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1993, ed. A. W. Finifter. Washington, DC: APSA.
- 2002.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2002, ed. I. Katznelson and H. Milner. New York: W. W. Norton.
- AMES, B. 2001. *The Deadlock of Democracy in Brazi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ARTOLINI, S. 2000.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eft, 1860-1980: The Class Cle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MAIR, P. 1990. *Identi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Availability. The Stability of European Electorates 1885-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ELASIAK, J. 2002.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lectoral and party systems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 189-210.
- BLYTH, M., and KATZ, R. 2005. From catch-all politics to cartelisa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8: 33-60.

- BOZOKI, A., and ISHIYAMA, J. eds. 2002.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rmonk, NY: M.E. Sharpe.
- BRINEGAR, A., JOLLY, S., and KITSCHOLT, H. 2004.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divisions over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62–89 in *Dimensions of Contest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d. G. Marks and M. Steenberg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OKS, C., NIEUWBEERTA, P., and MANZA, J. 2006. Cleavage-based voting behavior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evidence from six postwar democrac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 88–128.
- BUDGE, I., and FARLIE, D. 1983. *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Election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ROBERTSON, D. and HEARL, D., eds. 1987. *Ideology, Strategy and Party Change: Spatial Analyses of Post-War Election Programmes in Nineteen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LINGEMANN, H.-D., VOLKENS, A., BARA, J., and TANENBAUM, A. (with group of further co-authors). 2001. *Mapping Policy Preferences: Estimates for Parties, Electors, and Governments 1945–199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ILLAUD, D., and TIROLE, J. 2002. Parties as political intermedia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1453–89.
- CARTER, E. 2005.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Success or Fail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ANDRA, K. 2004. *Why Ethnic Parties Succeed: Patronage and Ethnic Headcounts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HIBBER, P. K. 1998. *Democracy without Association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COLE, A. 2005. Old right or new right?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ing of parties of the far r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4: 203–30.
- COLLIER, D., and COLLIER, 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PPEDGE, M. 1998. The evolution of Latin American party systems. Pp. 171–96 in *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 ed. S. Mainwaring and A. Valenzuel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Cox, G.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MCCUBBINS, M. 1993. *Legislative Leviathan: Party Government in the Hou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LTON, R. J. 2004.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ANAGAN, S., and BECK, P. A. 1984.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Realignment or Dealig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 WAELE, J.-M. ed. 2004. *Les Clivages politiques en 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Brussels: Édition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 DIX, R. 1989. Cleavage structures and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2: 23–37.
- 1992.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4: 488–511.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Methuen.
- ENELOW, J. M., and HINICH, M. eds. 1990. *Advances in the Spatial Theory of Voting*.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L. D. 1975. Political parties. Pp. 229–78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iv: *Non-Governmental Politics*, ed. F. I. Greenstein and N. W. Polsb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ERICKSON, R. S., MACKUEN, M. B., and STIMSON, J. A. 2002. *The Macro-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G. ed. 1999.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 Class Voting in Comparative Con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WHITEFIELD, S. 1993. Identifying the bases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ea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521–48.
- 2000. Explaining the formation of electoral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Pp. 36–68 in *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First Wave*, ed. H. D. Klingemann, E. Mochmann, and K. Newton. Berlin: Edition Sigma.
- FIORINA, M. 1977. An outline for a model of party choi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601–25.
- 1997. Voting behavior. Pp. 391–414 in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ed. D. C. Muel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Parties,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 old theories face new realities. Pp. 511–41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 H. V. Milner and I. Katznelson. New York: Norton.
- Fox, J. 1994.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clientelism to citizenship. *World Politics*, 46: 151–84.
- FRANKLIN, M. 2004. *Voter Turnout and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since 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KIE, T., and VALEN, H. eds. 1992. *Electoral Change: Responses to Evolving Social and Attitudinal Structur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BEL, M. 1998. Political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five theories. *Journal of Politics*, 60(2): 333–54.
- GEDDES, B. 2003. *Paradigms and Sandcastl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IBSON, E. 1997. The populist road to market reform: policy and electoral coalitions in Mexico and Argentina. *World Politics*, 49: 339–70.
- GOLDER, M. 2003.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success of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4): 432–66.
- GOODIN, R. E., and KLINGEMANN, H.-D. eds. 1996.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EENSTEIN, F. I., and POLSBY, N. W. eds. 1975.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iv: *Non-Governmental*

-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GROFMAN, B. 2004. Downs and two-party converg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s*, 7: 25–46.
- GRZYMALA-BUSSE, A. M. 2002.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Redeeming the past: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after 1989. Pp. 157–81 in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d. G. Ekiert and S. E. Ha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E, H. 2006. Correlates of clientelism: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ized ethnicity,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Forthcoming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MEL, R., and ROBERTSON, J. D. 1984. Formation and success of new parties: a cross-analysi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 501–23.
- HAUSS, C., and RAYSIDE, D. 1978.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since 1945. Pp. 31–57 in *Political Parties: Development and Decay*, ed. L. Maisel and J. Cooper.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HINICH, M., and MUNGER, M. 1994. *Ideology and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hoice*.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Hix, S. 1999. Dimensions and alignments i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cognitive constraints and partisan respons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5: 69–125.
- HOROWITZ, D.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G, S. 2001. *Altering Party Systems: Strategic Behavior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UNTINGTON, S.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IGNAZI, P. 2003.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VARSFLATEN, E. 2005. The vulnerable populist right parties: no economic realignment fuelling their electoral succes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4: 465–92.
- JACKMAN, R., and VOLPERT, K. 1996. Conditions favouring part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 501–22.
- KALYVAS, S. 1996. *The Rise o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TZ, R. S. 1980. *A Theory of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nd CROTTY, W. eds. 2006.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and MAIR, P. 1995.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 (1): 5–28. Reprinted in P.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EDAR, O. 2005. When moderate voters prefer extreme parties: policy balancing in parliamentary elec-

- 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185–200.
- KEEFER, P. 2005. Democratization and clientelism: why are young democracies badly governed?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3594.
- KITSCHOLT, H. 1988. The rise of left-libertarian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xplaining innovation in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s. *World Politics*, 40: 194–234.
- 1989a.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parties: the law of curvilinear disparity revisited. *Political Studies*, 37: 400–21.
- 1989b. *The Logics of Party Form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2. The formation of party system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olitics and Society*, 20: 7–50.
-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J. McGann). 1995.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5. The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 Politics*, 1: 447–72.
- 2000a. Linka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in democratic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845–79.
- 2000b. Citizens, politicians, and party cartellizati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tate failure in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7: 149–79.
- HAWKINS, K., ROSAS, G., and ZECHMEISTER, L. FORTHCOMING. *Latin American Party Systems*.
- and REHM, P. 2005. Work, family, and politics: foundations of electoral partisan alignments in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200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and WILKINSON, S. eds. 2006.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ZECHMEISTER, E. 2003. Patterns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200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 MANSFELDOVA, Z., MARKOWSKI, R., and TOKA, G. 1999.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UTSEN, O. 2006. *Social Class and Party Choice in Eight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Longitudinal Stud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KOHLI, A. 1990. *Democracy and Discontent: India's Growing Crisis of Govern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LLMAN, K., MILLER, J., and PAGE, S. 1992. Adaptive parties in spati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929–37.
- 1998.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landscap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139–58.

- KRISHNA, A. 2002. *Active Social Capital: Tracing the Roots of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AKSO, M., and TAAGEPERA, R.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2: 3-27.
- LAITIN, D. 2003.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tate of the subdiscipline. Pp. 630-59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 H. V. Milner and I. Katznelson. New York: W. W. Norton.
- LAVER, M. 2005. Policy and the dynamics of par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263-82.
- and HUNT, B. W. 1992. *Policy and Party Competition*. London: Routledge.
- and SCHILPEROORD, M. 2005. The birth and death of political parties. Draft prepared for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Edinburgh, 30 July-5 August.
- LEVITSKY, S. 2003. *Transforming Labor-Based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P. G. 2000.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LIJPHART, A.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 M., and ROKKAN, S.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Pp. 1-64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ed. S. M. Lipset and S. Rokkan. New York: Free Press.
- LUBBERS, M., GIJSBERTS, M., and SCHEEPERS, P. 2002. Extreme right-wing voting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 345-78.
- LUEBBERT, G. 1991.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Social Classe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PIA, A., and MCCUBBINS, M. 1998. *The Democratic Dilemma: Can Citizens Learn What They Need to Kn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GANN, A. J. 2002. The advantages of ideological cohesion; a model of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on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multi-party democrac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4: 37-70.
- MAGUIRE, M. 1983. Is there still persistence? Elector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1948-1979. Pp. 67-94 in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H. Daalder and P. Mair.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MAINWARING, S., and SCULLY, T. 1995. Introduction;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Pp. 1-35 in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ed. S. Mainwaring and T. Scull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IR, P. 1997.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000. The limited impact of Europe on national party system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3: 27-51.
- MANZA, J., and BROOKS, C. 1999. *Social Cleavages and Political Change: Voter Alignments and U.S. Party Coali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KS, G., and STEENBERGEN, M. eds. 2004.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WILSON, C. 2000.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a cleavage theory of party respons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433–59.
- and RAY, L. 2002.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585–94.
- MAY, J. D. 1973. Opinion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e special law of curvilinear disparity. *Political Studies*, 21: 135–51.
- MAYHEW, D. R. 2000. Electoral realignment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49–74. MEGUID, B. 2005.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347–60.
- MERRILL, S., III, and GROFMAN, B. 1999. *A Unified Theory of Voting: Directional and Proximity Spatial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G., and SCHOFIELD, N. 2003. Activists and partisan realig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2): 245–60.
- MOLINAR, J. 1991. Counting the number of parties: an alternative index.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1383–91.
- MORGENSTERN, S. 2004. *Patterns of Legisl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2005. *Radical Right: 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DESHOOK, P. 1997.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elections and committees: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Pp. 247–70 in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ed. D. C. Muel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NEBIANCO, A. 1988.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PPI, F. U. 1996. Political behavior: reasoning voters in multi-party systems. Pp. 255–74 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 R. E. Goodin and H.-D. Klingeman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DERSEN, M. 1983. Chang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 i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1948–1977: explorations in explanation. Pp. 29–66 in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H. Daalder and P. Mair.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PIATTONI, S. ed. 2001.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WELL, G. B.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RIDHAM, G., and LEWIS, P. eds. 1996. *Stabilizing Fragile Democracies: Comparing New Party System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PRZEWORSKI, A., and SPRAGUE, J. 1986. *Paper Sto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BINOWITZ, G., and MCDONALD, S. E. 1989.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 Science Review*, 83:93–121.
- RAE, D.W. 1967.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nd TAYLOR, M. 1970. *The Analysis of Cleava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AY, L. 2004. Don't rock the boat: expectations, fears, and opposition to EU level policymaking. Pp. 51–61 in *Dimensions of Contest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d. G. Marks and M. Steenberg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DDING, K., and VITERNA, J. 1999. Political demand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explaining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left-libertarian parties. *Social Forces*, 78:491–510.
- RIKER, W. 1982. *Liberalism versus Populism*. San Francisco: Freeman.
- 1986.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K., and WIBBELS, E. 1999. Party systems and electoral volatility in Latin America: a tes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575–90.
- ROBERTSON, D. 1976. *A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New York: Wiley.
- ROEMER, J. 2001. *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GOWSKI, R.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 R., and MUNRO, R. 2003. *Elections and Parties in New European Democraci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RUGGIE, J.G. 1989.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space, time, and method. Pp. 21–35 in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ed. E.-O. Czempiel and Rosenau.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 1993.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139–74.
- SACHSENRODER, W. 1998. Party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view. Pp. 1–35 in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vol. i, ed. W. Sachsenröder and U.E. Frings. Ashgate: Aldershot.
- SAMUELS, D. 2004. From socialism to social democracy: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999–1024.
- SANI, G., and SARTORI, G. 1983. Polarization, fragment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p. 307–340 in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H. Daalder and P. Mair.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SARTORI, G. 1968. The sociology of parties: a critical review. Pp. 1–25 in *Party Systems,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Masses*, ed. O. Stammer. Berlin: 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en.
-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influence of electoral systems: faulty laws or faulty method? Pp. 43–68 in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ed. B. Grofman and A. Lijphar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SCHAIN, M., ZOLBERG, A., and HOSSAU, P. eds. 2002. *Shadows over Europe: The Development and*



- Impact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 SCHEVE, K. 2000. Comparative context and public preferences ove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SCHLESINGER, J. 1984. On the theory of party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46: 369–400.
- SCHMIDT, S. W., GUASTI, L., LAND, C. H., and SCOTT, J. C. eds. 1977.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OFIELD, N. 2003. Valence competition in the spatial stochastic mode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5: 371–83.
- 2004. Equilibrium in the spatial “valence” model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6: 447–81.
- SCOTT, J. C. 1969. Corruption, machin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142–58.
- SHAMIR, M. 1984. Are western party systems “frozen”? A comparative dynamic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35–79.
- SHEFTER, M. 1994.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EPSLE, K. 1991. *Models of Multiparty Electoral Competition*. Chur: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SNYDER, J. M., Jr., and TING, M. M. 2002. An informational rationale for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90–110.
- SORAUF, F. J. 1964.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 SPRUYT, H. 1994.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MSON, J. 2005. *Tides of Consent: How Public Opinion Shapes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D. 1963. Spatial models of par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368–77.
- STROM, K. 1990a.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565–98.
- 1990b.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Contr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AGEPERA, R., and GROFMAN, B. 1985. Rethinking Duverger’s law: predicting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in plurality and PR systems: parties minus issues equals on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3: 341–53.
- TAVITS, M.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stable party support: electoral dynam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2): 283–98.
- 2006. Party systems in the making, the emergence and success of new parties in new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hcoming).
- TSEBELIS, G. 2002. *Veto Play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BRUG, W., FENNEMA, M., and TILLIE, J. 2005. Why some anti-immigrant parties fail and others succeed: a two-step model of aggregate electoral suppor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

537-73.

- VEUGELERS, J., and MAGNAN, A. 2005. Conditions of far-right strength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an application of Kitschelt'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4: 837-60.
- WALTZ, K. 1954.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EINGAST, B. 1998.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ivil war: institutions, commitmen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Pp. 148-93 in *Analytical Narratives*, ed. R. H. Bates, A. Greif, M. Levi, J.-L. Rosenthal, and B. R. Weing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FIELD, S. 2002.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81-200.
- WILKINSON, S. I. 2004. *Votes and Violence: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Ethnic Riots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party-voter linkages in India. Pp. 110-40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ed. H. Kitschelt and S. I.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第二十三章 选民与政党

安妮·雷恩(Anne Wren)

肯尼斯·M.麦克尔韦恩(Kenneth M.Mcelwain)

### 一、政党—选民关系重组或解体

在对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选举和立法行为的比较研究中,政党占有突出的地位。与选举制度、议会委员会或其他普遍存在的政治机构不同,各国宪法无论在结构还是在功能上都很少对政党作出规定。<sup>①</sup>但是,政党又存在于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和部分专制国家中。实际上,许多关于政党政治的研究,其出发点都是谢茨施奈德的名言:“政党创造了现代民主制,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制不可思议。”(E.E.Schattschneider 1942)

对政党的意义有多种解释。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党在选举过程中的功用,特别是它们如何帮助选民在投票时组织他们的偏好。由于现代政府无论在二战之前还是二战之后都面临着不断增加且日益复杂的政策议题,人们认为公众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搜集和处理决定为某位候选人投票所必需的全部信息(Campbell et al.1960),政党(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组织基础雄厚的政党)则可以通过对其候选人的政策纲领进行信息上的处理,简化这一过程(Downs 1957)。一名与工会保持紧密联系的美国工人,虽然对某位民主党候选人自身知之甚少,但能够推断出他在国会中会如何投票。还是用谢茨施奈德的话来说:“政党通过极度简化选民的各种选项,把他们组织起来了。”(Schattschneider 1960)

政党除提供信息之外,还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和立法功能。许多政党,特别是左翼政

---

<sup>①</sup> 也有一些著名的特例,如德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明确规定了政党的法律权利、功能以及结构。

党拥有庞大的成员基础,他们借此征募候选人、发布信息,并且聚合各种利益以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Aldrich 1995; Dalton and Wattenberg 2000)。它们也是议会决策和构成联盟过程中的基本行为体。政党把观点相近的议员协调成为统一的立法集团,并且通过它们能够使用的各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视政治家忠诚于党的长期目标的程度,对他们进行奖励或者惩罚(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Cox and McCubbins 1993; Bowler, Farrell, and Katz 1999)。

李普塞特和罗甘(Lipset and Rokkan 1967)在他们的经典研究中,描绘了选民与早期大众政党之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联系。那些在大众选举权扩展之时,甚至在此之前已经成功组建的政党,在与新选民建立关系时,具有某种第一推动者的优势。这一优势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至虽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欧洲出现了各种政治动荡,但那里可观察到的政党体制仍然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因此,上述两位学者得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选举断层的结构已经“冻结”,它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大众政党形成时期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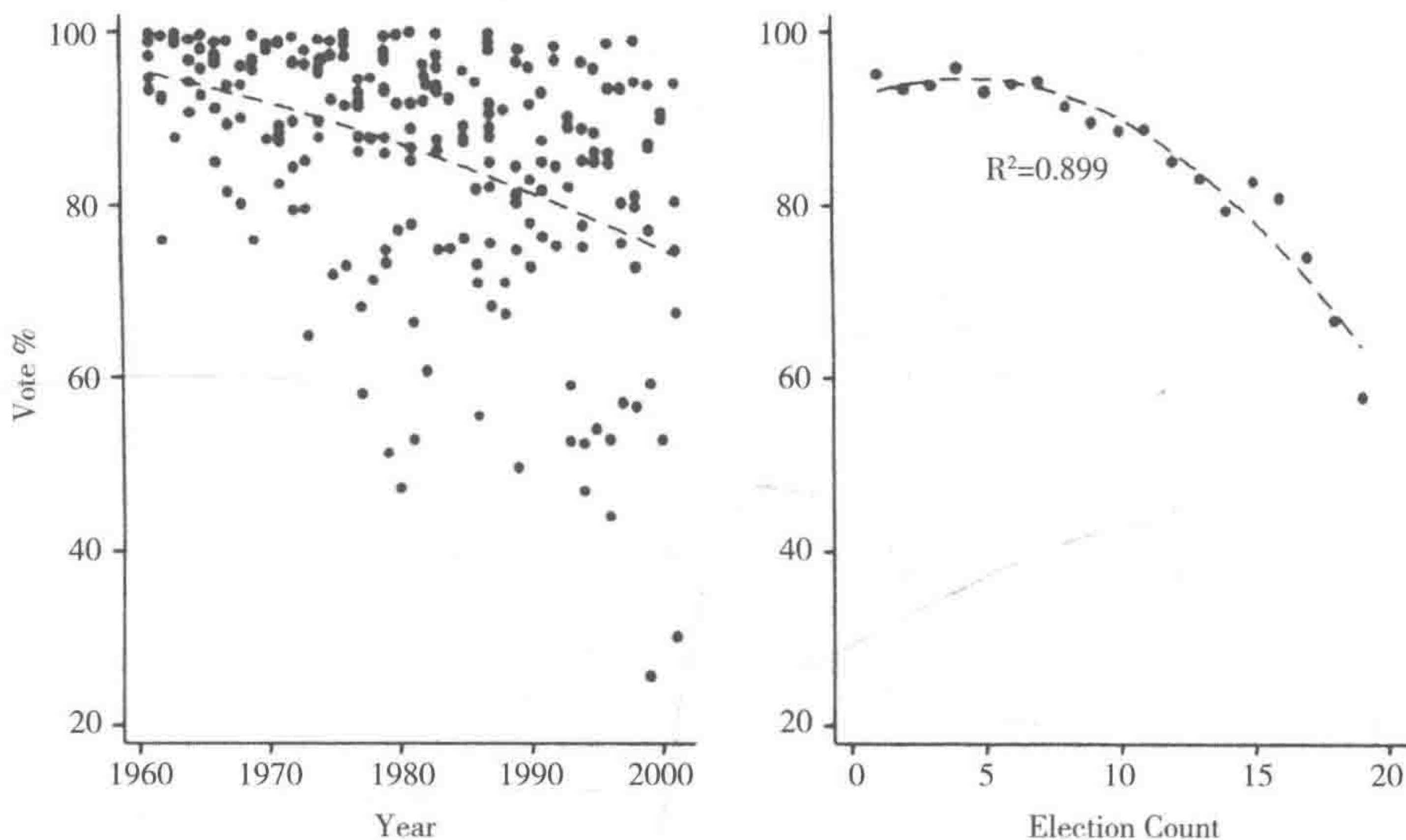
在这一时期,政党的组织策略对于加强政党与选民之间的感情联系尤为重要。把选民中重要的部分纳入主要政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或者像工会这样与政党紧密联系的组织,有利于培养长期的政治认同。<sup>①</sup> 这样,由于选民作出决定主要依赖他们所信任的政治组织提供的精简信息,因而其投票行为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选举本质上成为政党间为建立最大的群众组织而进行的竞赛,而既存政党的得票份额也基本保持稳定。

然而,就在李普塞特和罗甘对政党与选民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联系作出上述描绘之时,一些征兆已经出现了,它们预示选举图景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图23.1反映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1960年之前成立的政党(即那些在“冻结的断层”假说中最典型的时代已经存在的政党)总得票额的变动趋势。<sup>②</sup> 该图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反映的是年度数据,并标出了所有数据点;其二反映的是所有国家每两次选举之间的平均值,或者

<sup>①</sup> 参见 Przeworski and Sprague(1986)关于选举型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策略及其与工会运动之关系的论述;参见 Kalyvas(1996)关于基督教民主政党与天主教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论述。

<sup>②</sup> 本图以及其他各图表中的选举数据来自以下国家:澳大利亚(1946—2004);奥地利(1945—2002);比利时(1946—2003);丹麦(1945—2001);芬兰(1945—2003);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8—1997);(西)德国(1949—2002);希腊(1974—2004);冰岛(1946—2003);爱尔兰(1948—2002);意大利(1948—2001);日本(1946—2003);卢森堡(1954—2004);马耳他(1947—2003);荷兰(1946—2003);挪威(1945—2001);葡萄牙(1976—2002);西班牙(1977—2004);瑞典(1948—2002);以及英国(1945—2005)。数据出处:Gorvin(1989)和 Caramani(2000)。

称之为“选举计票点”。<sup>①</sup> 同时运用年份和选举计票点进行测量,使我们可以区分那些同时影响所有国家的因素导致的政治结果(通过以年份衡量),以及选举竞争的频率和自然周期所导致的发生变化(通过选举计票点)。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方法,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在时间与既存政党的表现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二次相关性。<sup>②</sup>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些政党的总得票额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下降,这意味新出现的政党在选举中强有力的存在。



Annualized data shows all datapoints. Election count data shows average for each period.  
Regression line is fit using a quadratic specification:  $y=a+bx+bx^2+e$

图 23.1 1960 年之前成立的政党的总得票率

[年份数据显示了全部数据点。选举计票点反映每个周期的平均值。]

[回归线根据以下二次方程拟合而成:  $y=a+bx+bx^2+e$ ]

不仅如此,很多研究还发现,选民与政党关系的不稳定性有持续增长的迹象。对于个体选民的面板调查表明,在不同政党之间摇摆,或者把选票投给多个政党<sup>③</sup>的现象正不断增加(Cl Clarke and Stewart 1998; Dalton, McAllister, and Wattenberg 2000)。另外,政党

<sup>①</sup> 例如,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发生的第一次选举中,所有标本国家的平均得票额,反映为选举计票点的观察值就是“1”。选举计票点的数据来源仅限于那些选举计票数小于 20 的国家,因为只有澳大利亚、丹麦和日本在二战之后举行了多于 20 次的选举,如果把它们纳入统计,则一些仅存在于这些国家的特殊因素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本章中的所有图表都把选票计票点限定在 20 以下。

<sup>②</sup> 这里的拟合值即关于总得票率的二次预期,是总得票率对选举计票点和选举计票点的平方进行线性回归的结果。计算二次预期使用的是 Stata 9 软件中的“twoway qfit”功能。

<sup>③</sup> Ticket splitting,指在不同选举比如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不同政党的情况。——译者

的正式成员数量最近几十年也一直在减少(Scarrows 2000),选民的投票率则一路下滑,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如此(Wattenberg 2000)。这些变化对于选举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更多新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Hug 2001; Tavits 2006),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各政党得到的选票和议席的波动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Mair 1997; Clarke and Stewart 1998; Dalton, McAllister, and Wattenberg 2000)。图23.2运用佩德森指数(Pedersen 1979),即两次选举之间政党得票率的净变化,反映了二战后选举变动的趋势。<sup>①</sup>该图同样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标准:一种逐年反映选举的变化,另一种则根据选举计票点反映平均的变动。图中的点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不稳定性以相对稳定的速率增长。<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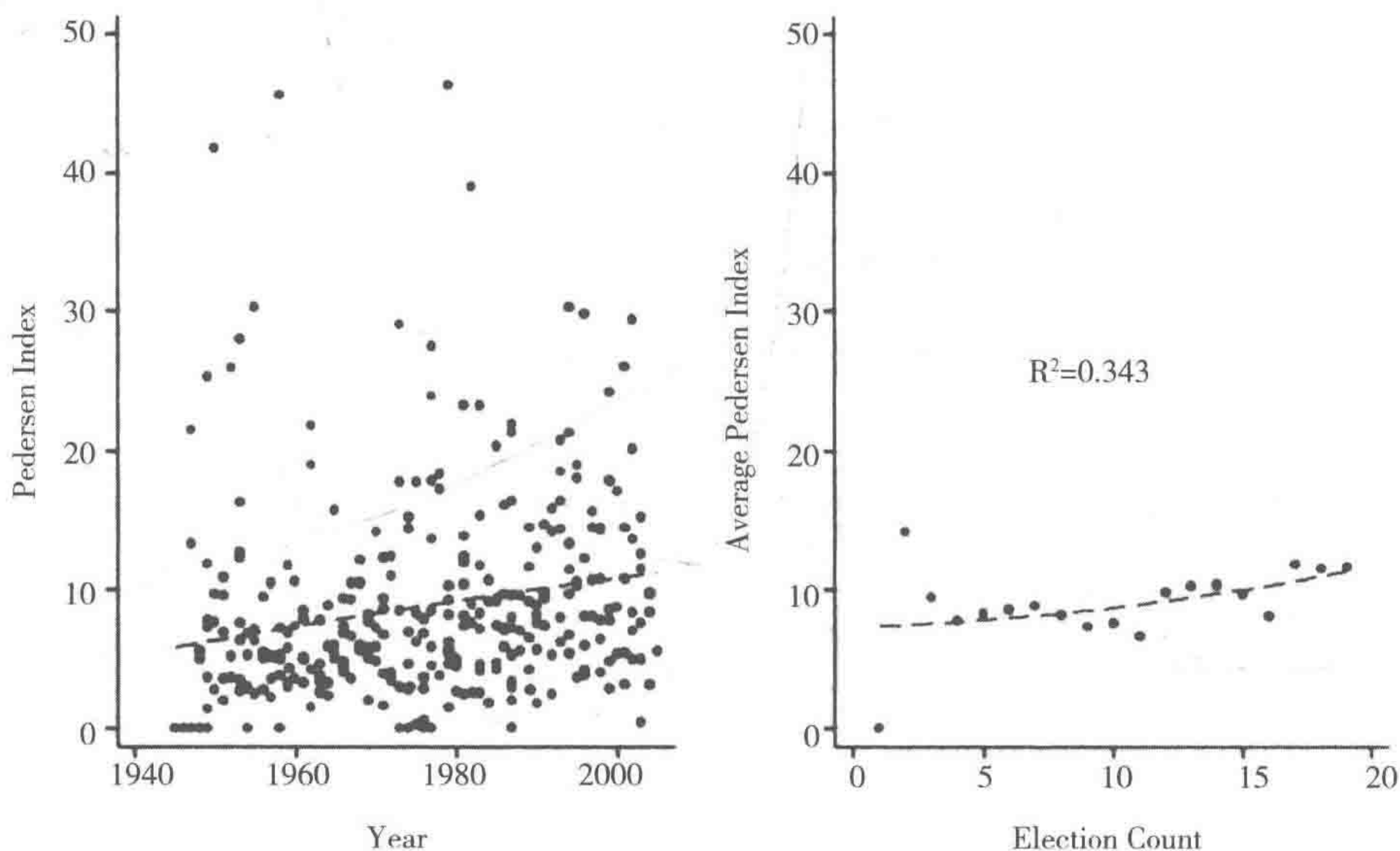


图 23.2 选举不稳定性的变化

数据反映的这些不同以往的趋势表明,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政党和选民关系的本质

<sup>①</sup> 佩德林指数用以下公式表示得票率的净变化: $0.5 * \sum (|V_{i,t} - V_{i,t-1}|)$ 。其中, $V_i$  = 政党*i*的得票率, $t$  = 当下的选举。对于如何计算新政党的净得票率,不同文献之间存在分歧。例如,假设政党A和政党B合并为政党C,那么不稳定性应当通过 $V_{C,t} - V_{(A+B),t-1}$ 来计算,还是仅以 $VC$ 来计算?另外,对于那些通常被归为“其他”类别的边缘政党,是应当将它们一并忽略,还是视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在本章中,我们把政党C的总得票率作为选票变动的值,并且根据Lijphart(1994)的方法,将边缘政党一并忽略。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难以完整记录在每一次选举中哪些政党合并了,或者分裂了,特别是哪个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又聚合成了哪些独立的政党。

<sup>②</sup> 尽管最佳拟合线是用二次回归计算出来的,但其斜率随时间推移保持恒定,这说明不稳定性呈线性增长。

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转变。基尔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 1966)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理论指导,他预言政党—选民关系将发生三种相互联系的变化:政党将减少对严格的意识形态的忠诚、政党在选举中不再仅仅依赖特定的社会阶层或派系、政党领袖会强化针对党员个人的组织权威。近年来,比较政治学研究已经验证了所有这三个维度的变化。在此,我们把这些表征概括性地分为两类,对于未来,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含义。

政党—选民关系的一个方面,是选民政策偏好的分布和内容在逐渐转变,而这种转变又对既存政党维持其支持率带来了强大挑战。在李普塞特和罗甘的框架内,所有国家最先出现的选举断层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它意味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以及工人和资本所有者的阶级冲突。<sup>①</sup> 在选举领域,这一冲突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有关国家干预经济的正当性及其范围问题上。左翼政党主张高水平的福利再分配,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右翼政党则强调自由市场的结果具有福利最大化的特征。

然而一些学者发现,随着近年来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民主国家越来越转向服务业,同时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经济网络,传统的“左—右”概念已经难以解释分配冲突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Rodrik 1997; Iversen and Wren 1998)。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在较高的经济发展和安全水平上,分配冲突的重要性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诸如环境和个人自主等生活质量问题的“后物质主义”关切(Inglehart 1977, 1997)。这种偏好变化迫使政党改变他们的表达内容,特别是在政府追求的政策方面。在那些政党不能调整其政策纲领,以适应选民新的偏好的地方,选举变动就会持续下去,而且至少持续到新的政党取而代之为止。

不过从长远来看,也许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一般说是政党在组织和机构方面的变化,具体说就是选民和政党之间的联结纽带的渐次消损。就其理想形态而言,大众政党之所以曾经高效,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政党—选民联系对交易双方都有利。选民通过政党了解有关时下政策的争论,并且在投票时简化他们在候选人之间的选择。政党则可能通过倾听基层网络的声音,把握公众情绪的风向,而且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投票集团,会使政党在选举中获益。选举环境两个主要是外生型的变化挑战了大众政党的这种结构:一是选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二是营销和传播技术,特别是民意调查和电视的创新。得到这些新的装备,选民现在能够廉价地从政党之外的渠道收集政治信息,而政党也不再需要维持庞大的基层组织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有效的竞选

<sup>①</sup> 反映有关宗教和地域问题,以及城乡分化的第二次断层则因各国历史发展不同而不同。

(Dalton and Wattenberg 2000)。换言之,人们认为,对政治家和选民而言,大众政党组织策略的意义都已经大不如前,因而也就被双方所抛弃。

尽管这两种趋势并不相互排斥,但它们主次地位的不同,还是会给政党—选民关系的未来带来相当不同的结果。虽然现有政党的问题是无法完全适应选民政策偏好的变化,但政治能力的变化仍然反映出,联系选民与所有政党的各种纽带的强度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前者为最终的意识形态“联盟重组”和长期的选举稳定性保留了机会;但后者却预示着选民—政党之间的忠诚关系会越来越不稳固,以及选举中永久的“去联盟化”。表 23.1 更为细致地反映了两种假说的因果逻辑,及其各自可观察到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将重新评价持联盟重组与去联盟化观点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的政党—选民关系提出我们自己的判断。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变化是传统政党表现不佳的原因。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讨论这种观点。那些竞选战场上的老兵据说已经无法适应选民偏好的变化,只能被动地接受新来者的攻击。第三部分将概述近年来政党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及其对传统政党的选举表现,以及一般意义上对选举结果稳定性的影响。第四部分介绍统计分析的结果,这一分析旨在探索选举竞争和组织变化对传统大众政党表现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并指出未来研究的一些方向。

表 23.1 联盟重组与去联盟化

理论	刺激因素	短期影响	回应	长期影响
联盟重组	选民偏好的改变	选民与现存政党之间意识形态鸿沟的扩大	现存政党采用新的政策纲领;新政党会缓慢地取代它们的位置	投票波动趋于稳定
去联盟化	选民/政党能力的改变	选民与所有政党之间的情感和组织联系弱化	政党组织发生变化:政党积极分子、“全国性”或“集中化”政策的作用降低	投票波动继续;投票率下降

可以在此事先表明的是,我们认为经验研究倾向于支持去联盟化的主张。证据表明,近年来选举不稳定性的增加,不仅仅是政党体制为应对选举偏好变化进行短期调整的结果(尽管无疑这种调整正在进行中),它们更多来自于政党自身组织结构的深层变化。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选举不稳定的变动趋势,似乎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影响政府构成的稳定性。因此,日益增加的选举不稳定性更为广泛的政治影响,似乎并不像人们有时所宣称的那么大。



## 二、选民政策偏好的变化

在关于议会行为的标准理论中,选民偏好被认为是外生性的、且固定不变的,而政党则是回应性的“受动者”,它们通过策略性地选择政治纲领,使自己的政治诉求最大化。早期的选举空间模型以“议题汇聚”概念为核心。据此,选民选择那些政策倡议与他们自己的偏好最接近的政党,而政党则会制定出能够吸引最大数量选民的纲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选民偏好呈简单的左—右分布、且采用胜者全胜的选举规则时——政党会向中间选民的立场汇聚,并采取温和的中间路线(Downs 1957)。不过,最近出现的“定向”投票的模型则假定,一般来说选民的政策偏好都比较模糊,因此他们的选择取决于政党竞选承诺的方向和强度,这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而非汇聚(Rabinowitz and Macdonald 1989; Iversen 1994)。当然,这两种模型中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是相同的,即由政党对政策进行宣传,以吸引最大多数的选民(Stokes 1999)。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选举竞争中的基本意识形态断层,是按照经济维度上的左—右之分形成的。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会结成紧密同盟,并在其政策纲领中强调工人的利益,特别是降低失业率并保障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保守政党则保持着与资本所有者的牢固联系,并倾向于创造对企业发展和资本投资更有利的条件。尽管这两大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隔并非牢不可破,但大量研究都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执政党的政策输出存在着独特的党派倾向,且与这些政党的铁杆选民的偏好相关(Hibbs 1977; Alesina and Rosenthal 1995)。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选民的政策偏好分布逐渐转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经济维度上左右之间断层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这一转变的发生,部分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有证据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白领职员和服务部门职员即“新中产阶级”逐渐取代农民和体力工人,成为选民中关键的社会经济群体,传统上党派划分的社会基础逐渐消失(Mair, Muller, and Plasser 2004)。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很多国家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投票渐趋衰落(Clark and Lipset 2001)。

伴随着上述人口变化的,是关于经济组织问题,以及可供考虑的替代选择的争论。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人们不再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取而代之的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最佳管理的讨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使各国政府更难于执行独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Simmons 1998; Boix 2000)。在很多国家,为了缓解通胀压力,货币政策的职责已经被委托给政治上独立的中央银行(Grilli, Masciandoro, and Tabellini 1991)。相比之下,对于欧盟成员国的政府来

说,由于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货币的采用,其独立行动受到的约束更多。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可以认为,虽然这些约束尚不足以消除经济政策制定中独特的党派特征,但在最近几十年间党派的影响力的确是下降了(Wren 2006)。

经验证据也表明,在经济问题上,各政党的意识形态正表现出某种趋同的迹象。巴吉、罗伯特森和赫尔(Budge, Robertson, and Hearl 1987)根据“宣言比较研究项目”(Comparative Manifesto Project)提供的数据认为,在经济的左右维度上,各党的竞选纲领正在向中心汇聚。柯尔和格雷(Caul and Gray 2000)发现,在15个发达民主国家中,有10个国家主要政党左右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而且这种中间化的趋势在实行简单多数选举制的国家最为明显,因为这种制度对政策趋同的压力最强。更细致的分析发现,这一趋势并非单向的。伏尔干和克林格曼(Volkens and Klingemann 2002)证明,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在1940—1960年间有所缩小,在1970—1980年间又有所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再度缩小。不过总体而言,无论是极化的程度(左—右光谱的重要性),还是意识形态的跨度(极左与极右政党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40年代都比20世纪90年代更明显。艾泽罗(Ezrow 2005)认为,这种逐渐的中间化可能是一种使选票最大化的策略,因为在1984年和1998年之间,中间政党的得票往往会稍多一些。

由于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都趋于中庸,所以提供给选民的政策选择余地也变得狭小了。温和的政党纲领进而导致了更多的中间政府。图23.3显示了从每次选举前的最后一届内阁到选举后第一届内阁,意识形态构成的历时性变化趋势。虽然在两次选举之间也会发生政府更迭,但是考察选举前后意识形态的变化,可以使我们了解议会席位最初的分配如何影响了权力的分配。我们用“1”、“2”或“3”来标记内阁中的多数分别由右翼、中间或左翼政党构成的情况。<sup>①</sup>图23.3根据选举前政府为左、中、右翼三种情况(选前意识形态)把数据点分为三部分,并且追踪下届政府意识形态变化的方向(选后意识形态)。数据显示,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间政府明显越来越多。换言之,保守主义的和社会主义政府都在向中间靠拢,而中间派政府则持续稳固。

(传统理解的)经济上的左右之分重要性的降低,为一些次级断层在选举中重要性

<sup>①</sup> 内阁意识形态状况更形式化的表达方式是:1=保守政党控制了至少51%或者绝对多数的内阁职位;2=中间政党控制至少51%的内阁职位,或者存在一个左右政党结成同盟,其中每一方至少控制了33%的内阁职位;3=左翼政党控制了至少51%或者绝对多数的内阁职位。所谓绝对多数,指的是拥有比其他两类政党加在一起还要多的内阁职位,比如在不计独立人士的情况下,左翼的百分比>中间派的百分比+右翼的百分比。关于政府构成和政党意识形态的数据,来自Woldendorp, Keman, and Budge 2000,以及Comparative Political Data Set(Armingeon et al.2005)。

的上升提供了空间。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77, 1987, 1997) 预言了这一变化, 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指出,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物质繁荣和经济的提升, 发达工业社会出现了一种“价值观变迁”。由于经济发展和福利国家的扩展满足了年轻一代的物质需求, 他们开始把诸如环境和个人自由等关乎“生活方式”的问题置于传统的物质关切之上。重要的是, 英格尔哈特得到公共舆论数据的支撑, 它证明即便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年龄渐长, 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仍然不会改变, 这意味着选举图景产生了永久性的变化 (Inglehart 1987,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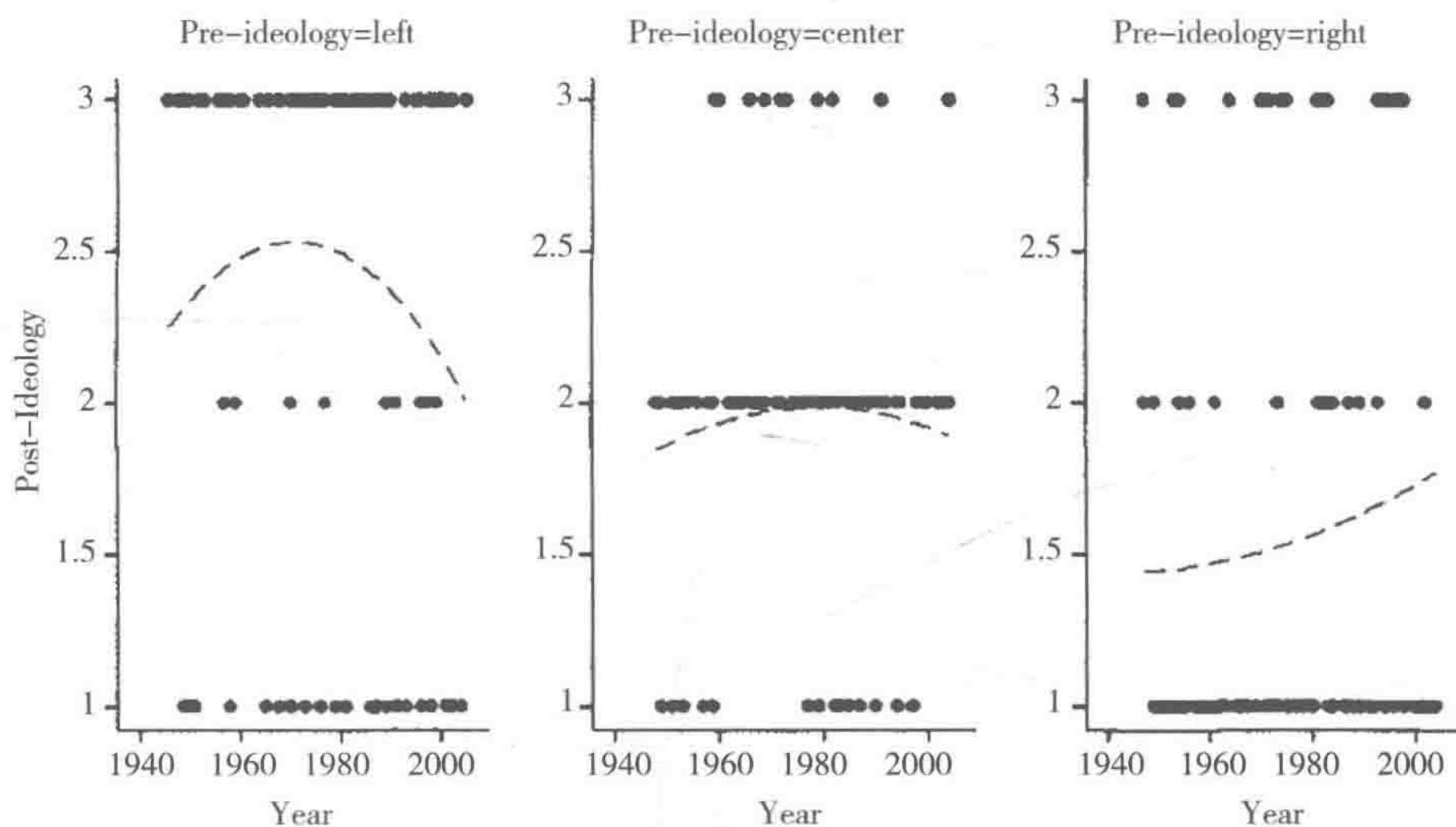


图 23.3 选举前后内阁意识形态变化的趋势

(选前/选后的意识形态 = 选举前/后的内阁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1 = 右翼; 2 = 中间派; 3 = 左翼)

当然有理由认为英格尔哈特的理论 (即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物质问题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有些言过其实。例如, 艾弗生和雷恩 (Iversen and Wren 1998) 认为, 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 会使社会面临一系列新的不可回避的分配选择, 而且它们无法简单地用传统上左右之间的经济断层来理解。类似地, 一些学者指出, 在西方民主国家, 针对全球化, 特别是经济开放、就业和福利国家保护之间的取舍, 政治冲突的重要性提高了 (Rodrik 1997)。基切尔特 (Kitschelt 1994, 1995) 认为, 围绕环境或移民等“非经济”议题的选举断层, 实际上与后工业社会新出现的一系列经济断层密切相关。经济上传统的左右之分已经吸纳了这一新的维度, 因而它现在的跨度已经扩大到从“左派自由至上论者” (他们集中在相对而言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得到保护并支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工人中间) 直到“右翼威权主义者” (主要是那些感到自身福利和经济安全受到了最

近经济变化,特别是经济开放的威胁的人群)的更广泛的光谱。<sup>①</sup>

传统政党在应对这些社会经济变化时反应迟缓,这就给新政党留下了可以抓住的开放的政策空间。虽然新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最近几十年来,有新政党参与的选举的比例确实有所上升。在20世纪50年代举行的51次选举中,至少有一个新党参与竞争的占了27.5%。<sup>②</sup>虽然这一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保持稳定,但到80年代又开始显著上升,有至少一个新党参与的选举达到了30.0%;到90年代,这一比例再次提高,有47.3%的选举中出现了新的竞争。

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政党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别,它们都围绕或者是新的,或者是既存政党所忽视的议题。第一类是基切尔特(Kitschelt 1994)所说的左派自由至上主义政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生态主义者或者绿党,它们的产生,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如对环境恶化和核能的关切)的出现相关联。<sup>③</sup>

第二类是新极端右翼,它们主要出现于欧洲,并与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不断增加的关注有关。新极端右派的竞选策略,是去占据因传统政党纲领日益中间化而留下的政策空间(Kitschelt 1995)。虽然这些政党(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勒庞在法国建立的国民阵线、海德尔在奥地利建立的自由党,以及荷兰的皮姆·富图恩)都以其排斥移民的仇外立场为世人所知,但它们的总体竞选策略更为微妙,因为它们采取的是支持市场自由主义的坚定的保守主义原则,以争取独立的小店主和保守商业人士的支持。

第三类是地方主义政党,它们要求中央政府为其所在地区赋予更大的政治独立性,但不一定在左右之争中持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德·文特(De Winter 1998)发现,此类政党在那些分裂的政治体中较为常见,而它们能否取得成功,最好的指示器是语言分裂的程度(比如比利时和西班牙),以及某种程度上地域的贫富分化,富有的地区通常要求更多的自治权。

图23.4反映了新政党进入的历时趋势,既包括在左右之间具有可识别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政党,也包括基本上持中间立场的政党。这里的左右之分不止基于传统的阶级冲突,也考虑到自由至上主义对抗威权主义的维度,其中环境保护主义在左翼,移民问

① 贝诺瓦特和拉维尔(Benoit and Laver, forthcoming)在他们最近涵盖47个国家的专业调查中也发现,在很多国家,人们既从生态的也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左右”之分的维度。

② 在文献中,关于如何界定真正意义上的新生政党存在分歧,特别是是否应将由两个政党合并而成的政党视为一个新的主体(Hug 2001; Tavits 2006)。在这里,我们不区分政党的类型,因而包括了所有分裂之后的,合并而成的,以及真正的新生政党。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只计算那些至少获得了1%的选票或者一个议会席位的政党。

③ 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它们在左—右维度和自由至上主义—威权主义的维度上都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是竞争对手。

题则属于右翼。在左右分野上拥有清晰立场的地方主义政党也包含在此分类中,但那些主要倡导地方自主的则被排除在外,因为地方政治竞争的细节在每个国家都各不相同。

图 23.4 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观察。首先,左派自由主义政党的稳步增加,导致了新政党总体数量的增加。战后期间,在所有参加选举竞争的新政党中,左派政党占了 52%。这印证了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87)的观点,即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后物质主义的选民会集中在左翼,从长期来看,这就又推动了更多的左派政党加入竞选。第二,从时间上来看,持中间立场的新政党数量波动最小。根据 1950 年至 2000 年间的数,在每 10 年间,平均有 4.4 个新的中间政党加入选举,最多时是 7 个(20 世纪 60 年代),最少时是 2 个(20 世纪 50 年代)。另一方面,新增加的右翼政党的数量最不稳定。在 1950 年至 2000 年之间,每 10 年中平均有 6.2 个新的保守政党加入选举,但其中 20 世纪 60 年代是 0 个,而 70 年代则是 7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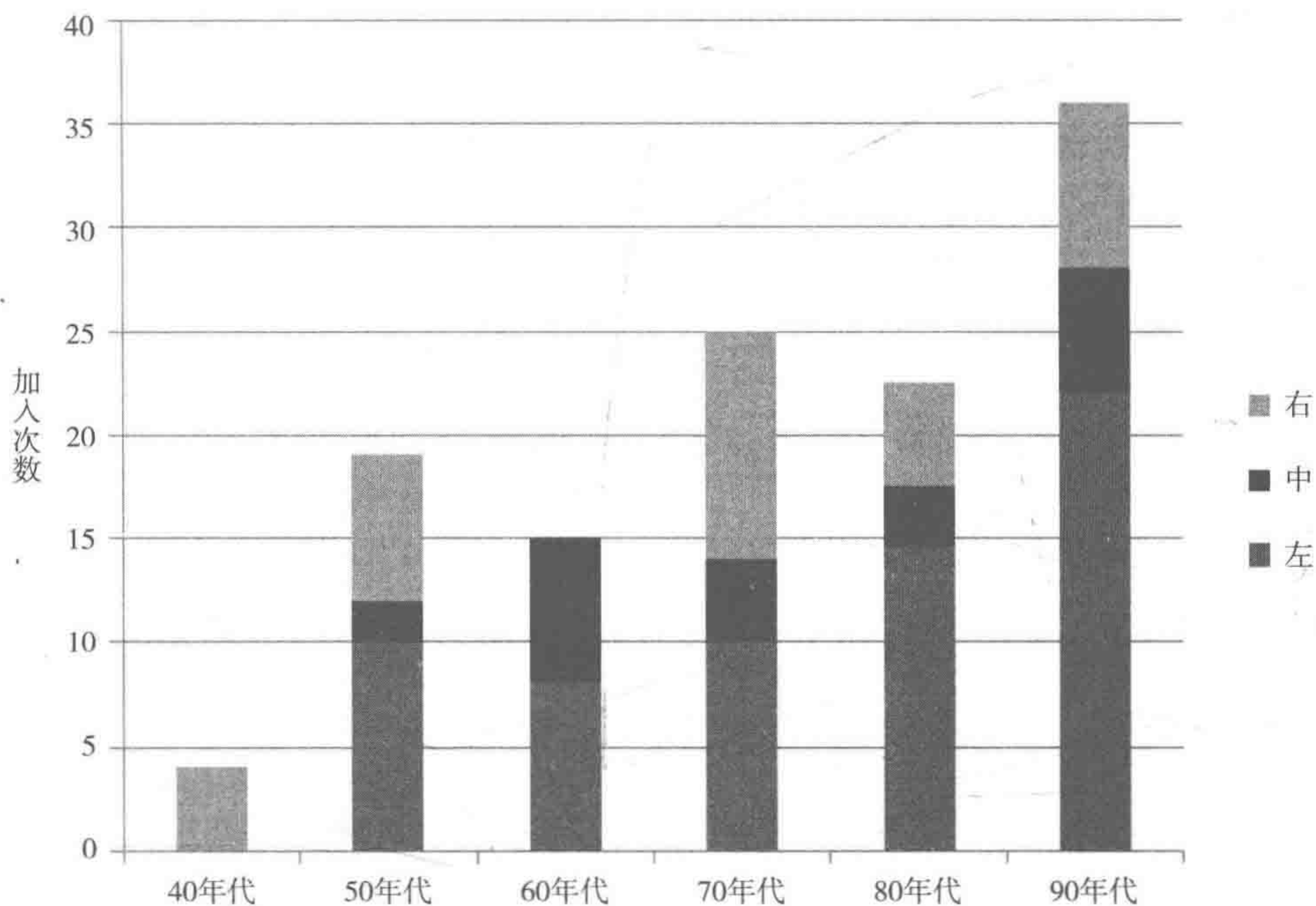


图 23.4 以意识形态分类的新政党加入选举的次数

新政党数量的增长及其意识形态分布,为以下假说提供了某种支持,即传统政党之所以表现不佳,是因为它们未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与英格尔哈特的假设相符,那些以传统的“左右”之分为争取中间选票而战的老牌政党,最容易持续受到强调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新的左翼政党的攻击。至于 20 世纪 90 年代新的右翼政党数量的增加(因经

济全球化特别是移民问题而导致的对分配问题关注的提升)是否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延续下去,还有待观察。

然而,投票偏好的变化,不能完全解释最近几十年来选举波动的模式。根据大众政党模型,选民通过社会化获得持久的政治认同,这意味着,只有当现存政党的基本选民发生了剧烈的人口变动,得票份额的变化才会发生。由于这种大规模变化十分缓慢,因此它所带来的选举方面的变化也应该相对和缓而稳定,至少选民和政党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会受到动摇。同时,如果新政党能够成功地吸引那些被边缘化的选民,那么从长远来看,它们的进入应该降低选举中的不稳定性。但是,正如我们从图 23.2 的散点分布中所看到的,在过去 40 年间,选举的不稳定性事实上一直以一个相当稳定的速率在上升。这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不仅是选民和政党的偏好出现了距离,更重要的是双方在组织上更为持久的分离。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政党和选民关系的性质所发生的更为根本的变化,及其对传统政党的表现带来的影响。

### 三、政党—选民关系的组织性变化

上一部分讨论的人口方面的解释,无法说明为何既存政党无法轻易地将新成员拉入它们的怀抱。这种策略灵活性的障碍,大致可以通过大众政党模式组织上的僵化加以理解。如果选民牢牢地嵌入某些特定政党的机制结构,那么选举日的唯一问题就只是哪个政党能够更好地劝诱其支持者前来投票。这样,选举结果就取决于某地区增长的人口是联合一致还是彼此分化。虽然在政党无法精确了解公众情绪的变化,而选民也很少获得政治信息的时代,大众型政党组织可能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但这种制度结构还是严重地限制了政党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选民的政治选择。<sup>①</sup>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党的组织结构,以及政党自身都开始变化。在过去 30 年间,政党基层组织成员的数量不断下降(Katz and Mair 1992)。斯卡罗(Scarow 2000)通过对 14 个发达工业民主国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从 1960 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党员数量都有所下降(从绝对量和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来看都是如此),而且这一下降的趋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尤为明显。尽管政党出于政治营销的目的会夸大其成员的数量,但斯卡罗引用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承认其党员身份的人数已经急剧减少。

这些发现补充了那种认为政党与选民之间的情感纽带正在削弱的观点。达尔顿、

<sup>①</sup> 关于不同国家的政党应对选举不稳定性上升的原因和结果,参见 Mair, Muller, and Plasser (2004)。

麦克阿里斯特和瓦腾贝格(Dalton, McAllister, and Wattenberg 2002)运用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数据表明,尽管过去一段时间“非常”和“相当投入”的政党支持者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但大批政党的“一般”同情者正转变为无党派人士。克拉克和斯图尔特(Clarke and Stewart 1998)在他们对民主制国家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被他们称为“一定程度的去联盟化”现象,即虽然具有较强党派联系的选民比例正在下降,但他们会转变为普通党员或者无党派人士,而不会成为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在一次更广泛的比较研究中,达尔顿、麦克阿里斯特和瓦腾贝格(Dalton, McAllister, and Wattenberg 2000)发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的不同选举中,承认会为不同政党投票的选民人数增加了。总的来说,证据表明,选民们正在彻底放弃党派忠诚,而不是永久性地转向其他政党。

这一转变在年轻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是在大众政党组织之外成长起来的。达尔顿(Dalton 2000)指出,一个最关键的事实是,表明具有强烈党派归属的人的比例,在年轻人中下降的速度比更年长的人群要快得多。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87)认为,党派归属感信念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强,但这一现象仅存在于那些年轻时即已形成党派归属的选民中间。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没有任何党派归属的年轻人的增加,就意味着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联系在今后将更为薄弱。

这一转型的背景是选举市场发生的两种外生性变化,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采用,它们使政党和选民得以脱离大众政党模式。这两个因素一方面减少了选民需要政党以获取有关政治事件的信息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党依赖基层成员的程度。偏好变化意味着选民与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转变,组织变化则是政党与选民的能力,以及它们双方为使其政治目标最大化而彼此依赖的程度发生变化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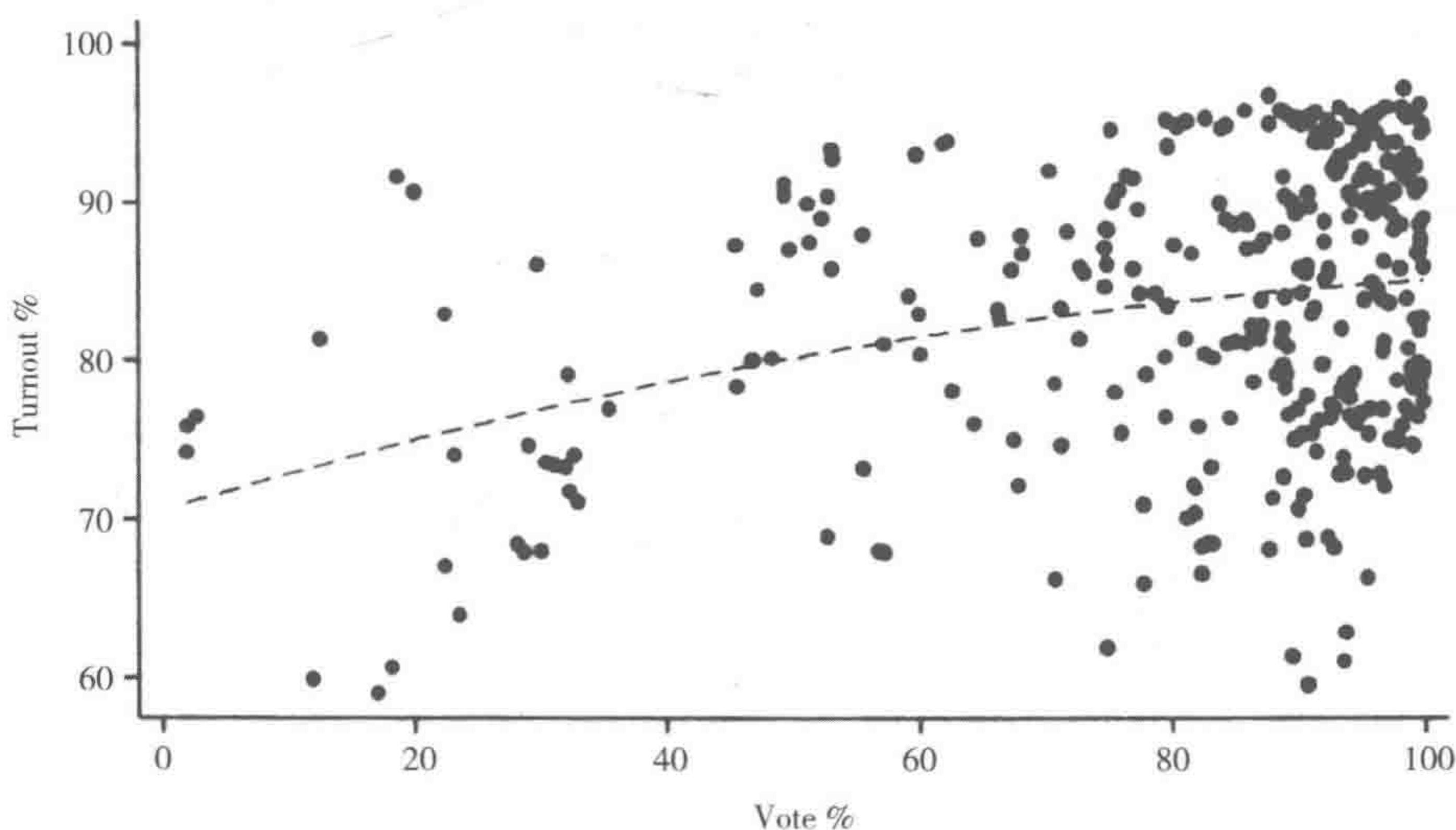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政党的两大核心社会功能,是用政策教育选民(Duverger 1954),以及在多名候选人之间简化选择(Downs 1957)。这种功能在工人缺乏搜集和处理政治信息手段的时代颇为有用,但教育机会的增加,以及媒体渠道的扩展,为选民提供了新的、政党之外的信息来源。在基本上实现了文化普及的发达工业民主国家,几乎每个人能够通过报纸,特别是电视、广播和网络追踪事件的进程。信息转播中不断增强的多元性,使选民们不必盲目追随政党的指引,同时也增加了选民了解政党也许更愿意对他们隐瞒的信息的可能性,如不良的执政表现或贿赂丑闻等。

不仅是选民不再需要政党,政党现在也可以不必受党派活动家偏好的束缚而进行有效的全国性竞选。虽然基层党员在选战中曾经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Aldrich 1995),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视拥有量的提高,以及最近网络的使用,使政党精英可以彻底绕开这些中间人,并且通过媒体直接面对更多的观众(Farrell 2002)。事实上,达

尔顿、麦克阿里斯特和瓦腾贝格 (Dalton, McAllister, and Wattenberg 2002) 发现, 几乎在所有国家, 参加实际竞选活动的人都越来越少。这种组织上新的机动性, 使政党能够更好地适应选民意识形态关切的变化。

新技术还带来了政党进一步的集中化, 特别是在协调竞选方面。这种集中化的一个标志, 就是政党领袖越来越被等同于政党的标签。达尔顿、麦克阿里斯特和瓦腾贝格 (Dalton, McAllister, and Wattenberg 2000) 对比了媒体提及候选人和政党的次数, 他们发现, 更多出现的是党的领袖而非政党本身。事实上, 大多数国家在选举之前都会重点报道政党领袖之间的电视辩论 (Farrell 2002)。

另一个发生变化的是竞争中制定和传播政策纲领的方式。大众政党组织曾经是政党精英收集有关选民政策偏好的信息的重要手段, 但民意调查日益广泛的运用及其可靠性的提高, 使政党有可能获得关于更大多数选民的数据。传播工具的成熟也使政党得以针对时下的重要问题“兜售”或“营销”它们的纲领, 而不仅仅是重复那些早就为人们所熟知的问题 (Farrell and Webb 2000)。竞选经理的专业化和政党总部职员数量的增长, 就是这一演进的表征。大众政党曾经是一个成员众多的组织与其精英人物之间重要的联络网络, 但最近的趋势则表明, 政党正在转变为政治候选人, 特别是党的领袖个人的专业竞选机构。



\*\* Total vote share of parties that had competed in the first election of the post-war period

图 23.5 投票率与现存政党得票率之间的关系

y 轴: 投票率; x 轴: 得票率

\*\* 各国参加过二战后首次选举的政党的总得票率

大众政党模式衰落的一个重要的附带影响, 是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投票率的普遍下



降。在大众政党模式下,政党领袖能够依靠基层积极分子来争取支持,并劝说选民在选举日去投票。然而,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投票率出现了急剧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投票率是84.6%,最低是71.3%;但自2000年以来,平均投票率降至77.3%,最低则达到了59.5%。这一变化部分源自现有政党动员能力的下降。图23.5反映了投票率与那些参加过各国战后第一次选举的政党总得票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投票率与现存政党得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293,而且如图中的二次回归线所示,两者之间强烈正相关。这意味着,当现存政党主导选举过程时,投票率就会提高;换言之,投票率与这些政党在选举中的重要性直接相关。

#### 四、选举竞争、组织变化以及传统政党的表现

如上所述,关于传统政党得票率的下降,比较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两类假说。第一类着眼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认为传统政党未能适应这些变化以及凸显出来的新问题,这可能削弱了它们的有效竞争力。第二类则强调政党的政治与组织角色方面更为根本的变化。随着作为选民与政党之间信息传递者的新技术手段作用越来越大,以及选民的教育水平和独立获取政治知识的水平不断提高,对大众政党组织的需求下降了。由此观之,传统政党每况愈下的竞选表现,以及投票行为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表明现存政党模式的重要性整体下降了。

由于投票波动、投票率、党员情况,以及新党加入等都随时发生变化,因而要明确每个因素单独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试图通过回归分析来研究这些因素的影响,因变量是1960年成立的政党的得票,即1960年之前已经存在的政党的总得票率。因为1960年已经成立的政党存在于“冻结断层”假说的高峰期,因此它们代表了那些在传统上拥有最强大的民众组织基础的政党。此处使用的统计模型,是一种运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和面板专用AR1(一阶自动回归)自相关的混合回归法。<sup>①</sup>数据集中的每个案例都是某一国家在1960年之后的一次选举,总共是20个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220个案例。该模型分别用“国家”及“选举计票点”作为面板变量和时间变量。

我们引入了两个滞后变量,它们都与1960年之前成立的政党在选举和组织方面变动直接相关。为了描述选举的不稳定性,我们引入了滞后佩德森指数,即用佩德森指数衡量的选票波动。如果选举波动来自既存政党之间的选票交易,那么虽然选票波动值比较高,但1960年之前成立的政党总的得票率并不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相关系

<sup>①</sup> 一阶自动回归 specification 表明其含有一个滞后的因变量。

数为负值意味选举波动的历时性增长的实际原因,是1960年后出现的政党夺去了1960年之前成立的政党的选票。滞后投票率是一个连续变量,它反映在上次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所有选举人的比例。由于1960年前成立的政党传统上通过动员其基层成员获得选票,所以较低的投票率就可能表明它们的组织能力有所下降。但是,如果投票率与任何政党的任何部分的组织能力都没有关系的话,那么投票率的下降对1960年前成立的政党的影响就不会比对1960年后成立的政党更大。我们之所以对佩德森指数和投票率都采用了滞后的而非同时的测量,就是因为考虑到了原因和结果方面的内生性问题。<sup>①</sup>

另一重要的自变量是新政党数,这是一个表示加入给定选举的新政党数量的离散变量。如果传统政党选举表现的退化的确部分反映了它们未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或者说如果新政党的确争取到了那些注重为传统政党所忽视的新的政策议题的选民,那么新政党的进入就应该对既存政党的得票率产生负面影响。反过来,如果新政党总体上对选举竞争的基本形态并无多少影响,或者它们只是简单地彼此进行投票交易,那么它们的进入就不会对既存政党的表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sup>②</sup>

还有一系列其他变量可以反映选举的不稳定性。我们引入了联盟这个二分变量,如果选举之前是联合政府执政,则该变量等于“1”。这一变量符合罗斯和麦基(Rose and Mackie 1983)的经验观察,即联合政府中的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的表现,总体上逊于一党执政的情况。虽然一般来说所有执政党都会失去一些选票,但参与联盟的政党受到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它们的支持者通常会认为,为支持联合政府而进行的政策交易是对该政党竞选纲领的背弃。议会表现也是一个离散变量,它反映两次选举之间内阁构成发生变动的次数。我们认为,如果执政党未能保证内阁稳定,就会遭到选民的惩罚。

我们还引入了两个测量政治制度的变量。选举制度变化是一个二分变量,当选举前选举制度发生变化时它等于“1”。所谓的变化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选举规则(如从简单多数制变为比例代表制或相反,或者比例代表制的规则发生变化);(二)选区规模的中值(大于10%的变化);(三)代表性的法定门槛。选举制度的变化会改变选举竞争的框架。因为对那些为在既有制度下实现效率最大化而培育其组织基础的政党来

<sup>①</sup> 例如,1960年前成立的政党的得票波动本身,就是反映政党选举表现的一个直接的、经验性的指标,因此,在对因变量进行解释的时候,同时的测量值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变量。投票率与滞后投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04,而佩德森指数和滞后佩德森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则是0.218。

<sup>②</sup> 虽然政党策略性进入的模型认为,一般来说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新政党才会加入竞争,但经验研究发现大多数新政党在竞选中表现不佳。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党获胜相关因素的较有说服力的模型。

说,制度变化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所以1960年前成立的政党得票率应该受到负面影响。

有效性门槛是一个用以衡量有效代表门槛的连续变量。后者是一个反映各种选举规则的复合指数,可以衡量在某种选举结构下赢得一个议席的难度(Lijphart 1994)。<sup>①</sup>在简单多数制(其门槛更高)之下赢得选票的困难之一,就是选民的策略行动更明显,即不会为那些注定落败的政党投票,尽管他们更喜欢那个注定落败的党,而非那些表现出众、地位稳固的竞争者(Duverger 1954; Cox 1997)。从理论上说,较高的有效性门槛对老政党有利,因为它维持现有政党体制的惯性效果更强。

最后,模型中还包含了年代这一虚拟变量,以区别那些在同一时间影响所有国家的因素,以及在某些国家政治成熟过程中(用选举记数点的时间因素表示)某些特定阶段发生作用的因素。重要的是,年代还能让我们得以在一个单一的时间趋势中厘清其他自变量的影响。

表 23.2 既存政党的选举表现评估(1960—2002)  
(模型:混合最小二阶回归,运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

变 量	1960 年前成立 政党的得票率		统计描述		
	$\beta$	(SE)	最小/最大	中值	S.D.
新政党数	-3.576 <sup>c</sup>	0.563	0/5	0.483	0.856
滞后佩德森指数	-0.273 <sup>c</sup>	0.091	0/46.35	8.852	6.793
滞后投票率	0.149 <sup>a</sup>	0.089	59/97.2	83.583	8.880
联盟	-2.585 <sup>b</sup>	1.316	0/1	0.562	0.497
议会表现	0.535	0.435	0/6	0.727	1.080
选举制度变化	-1.888 <sup>a</sup>	1.056	0/1	0.103	0.305
选举门槛	0.102 <sup>11</sup>	0.061	67/35	11.074	11.319
20 世纪 60 年代	11.925 <sup>c</sup>	2.748	视情况而定	45	
20 世纪 70 年代	8.966 <sup>c</sup>	2.514		60	
20 世纪 80 年代	7.239 <sup>c</sup>	2.589		60	
20 世纪 90 年代	3.289	2.342		55	

<sup>①</sup> 有效性门槛值是以下两个数值的平均数:(1)排除门槛值,即政党在无法获得任何议席的情况下的最高得票率;(2)纳入门槛值,即政党能够获得一个议席的最低得票率。排除门槛( $Texcl$ )= $V/M+1$ ,这里  $V$ =得票份额, $M$ =该选区的议席数量。纳入门槛( $Tincl$ )是以下二者中的更高值:(1)法定门槛值,或(2) $Tincl=100/2M$ ,这里  $M$ =平均选区规模(Lijphart 1994)。

续表

变 量	1960 年前成立 政党的得票率		统计描述		
	$\beta$	(SE)	最小/最大	中值	S.D.
常量	70.988 <sup>c</sup>	7.711			
统计量	147.81				
N	220				
R <sup>2</sup>	0.965				

注:群体变量:国家(20);时间变量:选举计数点(1—24)

面板指定一阶自动回归;通过成对选择计算标准差

<sup>a</sup>p<0.1.

<sup>b</sup>p<0.05.

<sup>c</sup>p<.01.

表 23.2 反映了这一普通最小二乘法混合回归的结果。模型总体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其似合度为 0.97。关于新老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以及老政党自身的组织能力,该分析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观察。

首先我们看到,新政党的加入降低了那些在 1960 年之前已经存在的政党的得票率,这表明新来者的确在新议题上成功地展开了竞争。新政党计数的系数为负,表明每个新政党加入选举,1960 年前成立的政党的得票率就降低 3.58%。

其次,选举波动性的增加对旧政党的损害大于新政党。滞后佩德森指数的系数为负值,这表明选举波动性对作为一个群体的老政党得票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滞后佩德森指数的标准差每增加 1,1960 年前成立的政党的得票率就降低 1.85%。这些估算表明,选举结果之所以不稳定,并非既存政党之间进行了什么交易,而是老政党流失的选民转而支持新政党造成的。

第三,滞后投票率变量的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如果前一时段投票率下降 10%,会使既存政党的得票率就下降 1.5%。这一发现再次表明传统政党组织结构变化的重要影响。换言之,由于老政党在选举日动员选民的能力降低,它们的选票流失要快于新政党。

再看其他变量。我们可以发现,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联盟为负,而议会表现为正,尽管在常规意义上说只有联盟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两个制度变量,即有效性门槛和选举制度变化的系数的正负,与先前预期的方向一致,尽管它们的实质影响较低。最低门槛(荷兰的全国性比例代表制,0.67)和最高门槛(英国式的单选区多数制,35)

之间,只是让1960年前成立的政党的得票率提高了3.5%。对这一微小相关性最可能的解释,是一阶自动回归变量(1960年前成立政党的滞后得票)已经结合了前一阶段选举门槛对选民行为的影响。由于选举门槛很少随时间变化,滞后变量低估了这一测量值的实际影响。类似地,选举规则的变化理论上应该给选举结果带来重大改变,但实际上仅使1960年前成立的政党的得票率降低了1.89%。这可能反映了如下的事实,即当权者一般会在有利的时机、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改变选举规则,而当权者多是1960年前成立的政党(McElwain 2005)。所有年代虚拟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和正向的,且越追溯到先前,影响系数就越大。由于1960年的新政党比1990年要少,所以可想而知的是,年代越久远,老政党的表现就越差。

总的来说,这一简单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发现。新政党的加入,对1960年之前成立的政党的得票率发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传统政党作为一个群体的确面临挑战,其对手就是围绕新的选举议题组织起来的新生力量,对此我们在第三部分中已经有所叙述。因此,传统政党每况愈下的选举表现,可以被部分地归因于它们未能在新的政策维度上进行成功的竞争。同时,投票率和既存政党竞选表现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组织结构上的变化(特别是大众政党基层组织的萎缩)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相当有趣的是,选举波动性的增加,对各政党的影响并不相同,受冲击最大的是传统政党。

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结果?一方面,我们大概可以预见,选举波动性将会增强,这是选举结盟重组带来的附带效果。也就是说,如果当前政党体制的调整是为了回应社会经济的变化,那么短期内选举波动会增强;但随着系统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即老政党完成了纲领调整,而新政党也各就各位之后,投票又会回归稳定。但是,如果选举波动性的增强实际上反映了政党组织及选民—政党关系某些更具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就没有理由期望选举波动会随着时间而降低。事实上,这两种立场都得到了统计分析的支持:新政党正进入选举舞台,而且正在拿走既存政党的选票;但与此同时,政治动员(这是“大众政党模式”的根本特征)也正在全面衰退,并正在摧毁老牌政党的胜选底线。

判断这两种力量孰强孰弱,是未来研究面临的一项富于挑战性的任务,且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一些经验指标的分析,识别出“趋势当中的趋势”。具体来说,虽然选举的波动性可能会持续增强,但我们应该考察增强的速度是高还是低;也就是说,选举波动性是加速,还是稳步增强?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时间点( $t$ )的佩德森指数值和时间点( $t-1$ )的滞后佩德森指数值来做一个简单的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值和滞后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218,这表示我们无法通过前一个时段的选票波动预测后一个时段的选票波动情况。时间点( $t$ )的佩德森指数减去时间点( $t-1$ )的佩德森指数的标准差(8.55)要比中值(0.504)大得多,这表明选举波动性相当不稳定。

图 23.6 反映了选举波动的变化速度,从中可以看出同时测量值和滞后测量值之间的差别,不过排除了选举规则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的选举。<sup>①</sup> 数据显示,选举波动增长的速度在各时段保持恒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选举波动性会很快回落。重要的是,除新政党增加的数量之外,没有其他指标表示选举正趋于稳定。根据这里所能得到的有限的数,我们观察到的似乎是持续的去联盟化,而非循环式的再结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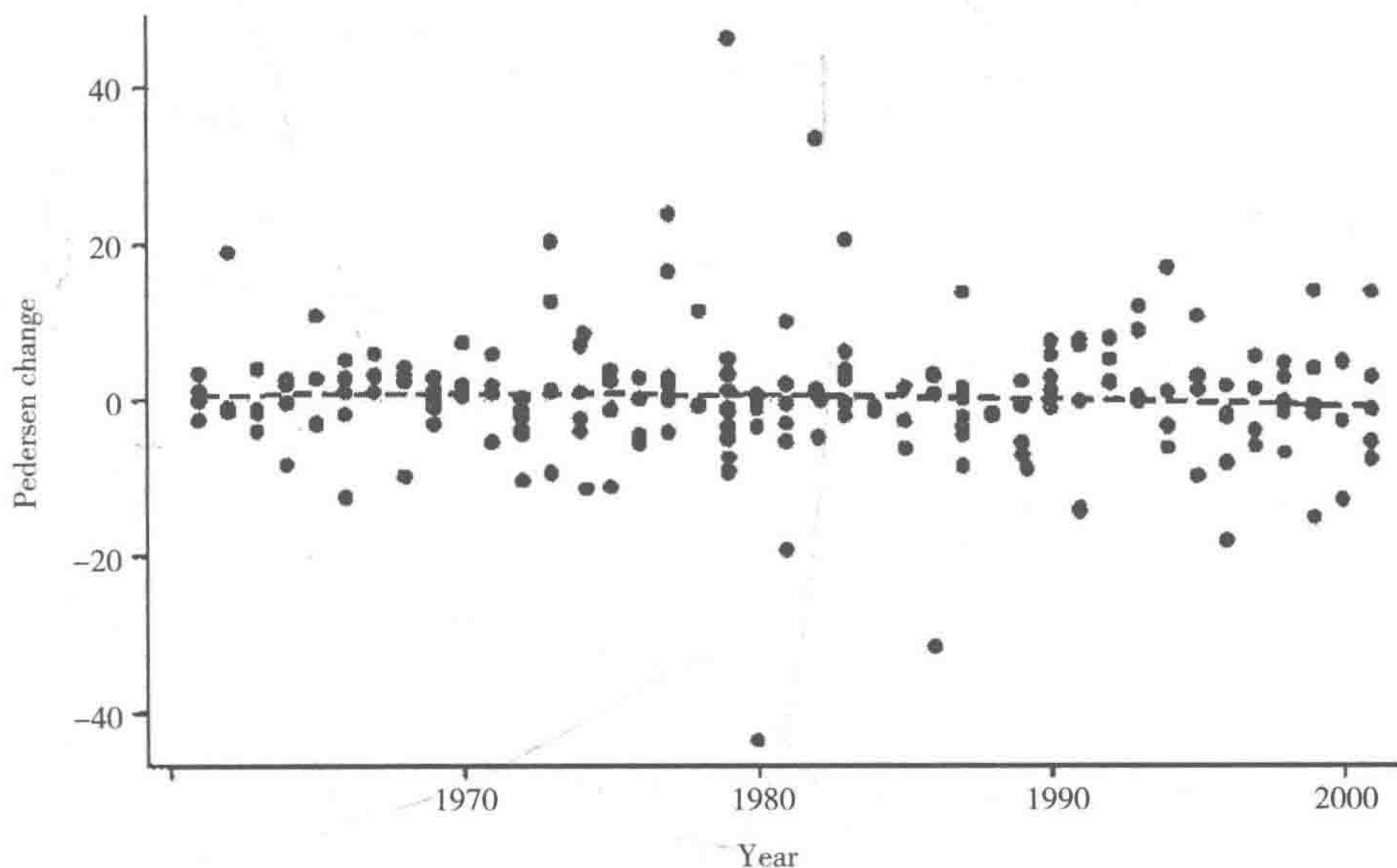


图 23.6 佩德森指数的波动( $\text{Pedersen}(t) - \text{Pedersen}(t-1)$ )

## 五、结 论

政党在议会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它所谓的衰落(本章和其他作品通过选举波动性指数对其加以研究)已经成为大量关于选举和立法行为的研究关注的焦点。在政党和选民关系问题上,学者们发现了两种平行的解释。第一,选民对政党的党派认同在减弱,选民的政策偏好与政党竞选宣言之间的差距在增加。第二,受教育机会的提高以及传媒技术的创新增强了政党与选民双方的政治能力,使得它们不愿也不必再把自己与某种大众政党结构捆绑在一起。两个方面的变化相互联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各政党为了迎合中间选民,其纲领也越来越中间化:宣传工具的容易获得,使政党能够直

<sup>①</sup> 把选举规则发生变化之后的选举包含进来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结果,但这种操作方式被更好地反映选举波动不受制度变化影响的自然趋势。

接呼吁全国选民进行投票(能力变化),但这也加大了政党与选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偏好变迁)。

这两种解释对于政党—选民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果偏好变化是导致选举波动的主要原因,那么一旦现存政党重组联盟、并且适应了选民政策偏好的变化,或者新的政党取而代之,投票波动最终会逐渐减弱。但是,如果选举波动是由选民和政党政治能力的变化所致,那么两个群体之间的组织联系就会持续弱化,而当前投票中的波动也可被理解为政党永久性去联盟化的先兆。

本章分析了这两种不同假设的因果效力。研究文献认为,随着旧政党转向政治中间地带,新政党通常会利用它们留下的意识形态空档,这是支持“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政党大量涌现的原因。我们的统计分析证明,老政党的选票正不断地被新政党夺走,但同样重要的是,各现存政党也难以保证他们的支持者在投票日参与投票。这一点,再加上选举波动的变化趋势(投票波动的变化速度)保持恒定这一事实,多数证据似乎表明,未来出现的将是长期的去联盟化而非暂时的联盟重组。

虽然跨国回归是研究新政党对选举竞争的影响的一种方式,但要真正理解新政党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对它们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理解。从理论上说,新政党的组织方式必然最大限度地适应其创立之初选民的偏好和能力;而另一方面,老政党的组织结构则可能反映出以往时期动机结构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从反面来说,如果成功的新政党建立了一种大众组织而非囊括一切的结构,那么我们就能够推断老政党的全面动员模式仍然有用,同时当前出现的选举波动趋势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去联盟化。

解决这一争论的一种方式提出某种政党的“生命周期模型”。虽然关于政党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探索,但关于它们如何才能获得成功、它们的组织结构如何随时间改变,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它们的生命周期,目前仍然知之甚少。这一研究需要有关新政党的成员、内部规章、意识形态构成,以及选举策略的完整数据,也需要当前居于主导地位、也许能够更新自己的旧政党的相应数据。大部分关于选举和政党政治的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我们也是如此),但如果不了解那些在创立之初十分弱小的政党如何发展壮大,那么理解新政党的演进就颇为困难。

政党大小的区分不仅仅取决于得票多少,因为不同规模的政党要在竞选中获胜,相应的组织基础应有所不同。例如,基奇海默(Kirchheimer 1966)认为,只有大型的、具有全国性竞争力的政党需要采用无所不包的结构,因为对持有相对极端或者新颖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小党来说,更为有利的选择,是与热切关注相应议题的选民小群体保持密切联系。只有当党内意识形态多样化过度发展,或者成员数量膨胀到难以控制的规模时,维持大众组织结构才会出现问题。但新政党,特别是后物质主义群体的规模相对来说

还比较小。因此,很难推断这些政党在获得成功后会如何调整它们的组织基础;如果英格尔哈特是对的,即后物质主义价值的选民基础会扩大的话,情况就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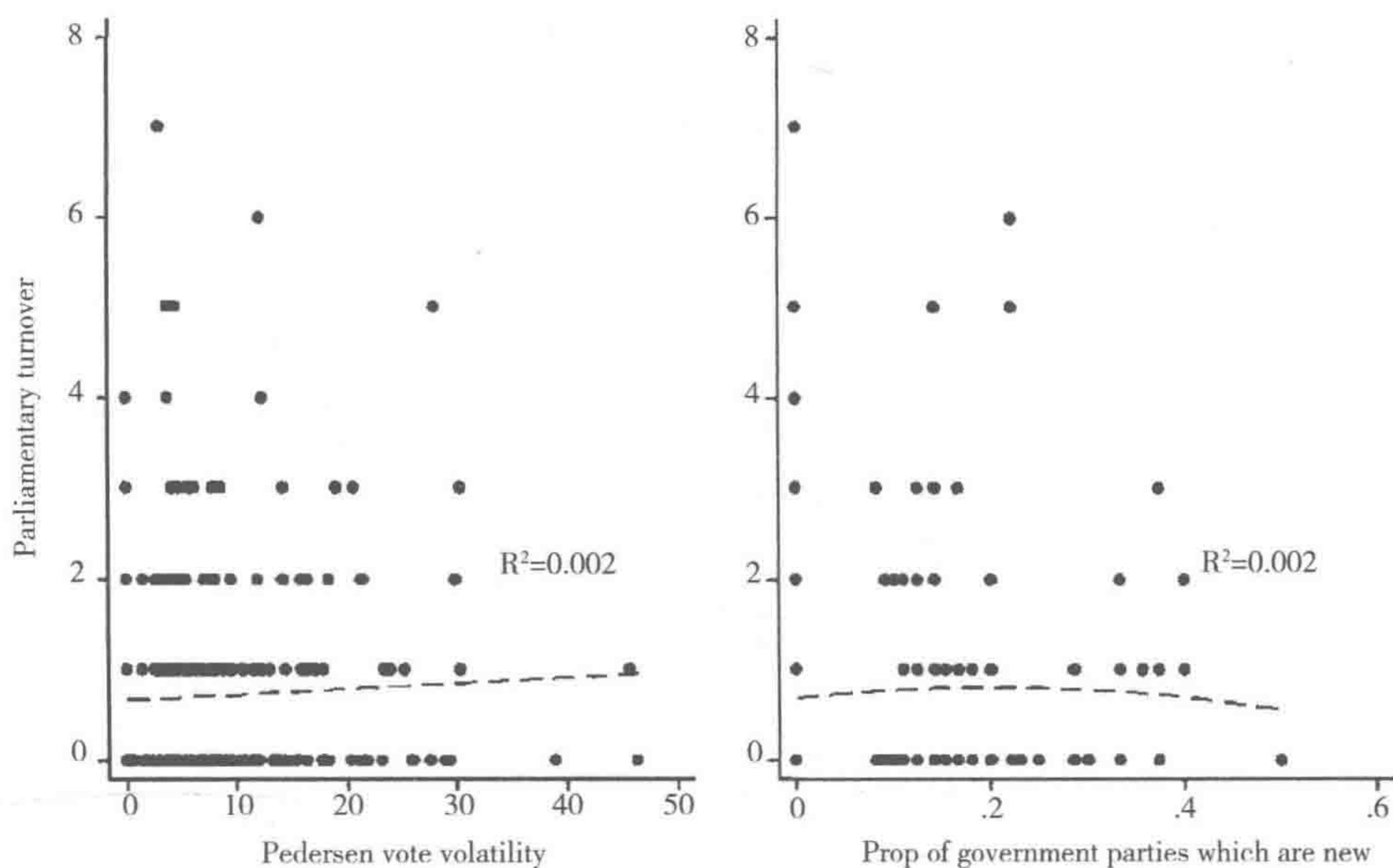
最后,虽然选举波动性本身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但并不清楚它是否会导致政党政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大众政党的动员能力的降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重要性的提升,以及/或者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识形态论争内容的变化,都可能会改变议会讨论的议题及其制定的政策。另一方面,选民的不稳定并不必然导致政府结构和形成的不稳定。新政党的进入可能会削弱老政党在选举中的重要性,但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政党加入政府,或者使政府构成发生越来越快的变化呢?

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梅尔对政党变化和政党体制变化的区分。在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立场的现存政党之间选票分布发生变化(如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选票交易),政党变化就发生了。但是,这并未改变政治竞争的总体模式,因为左—右分野依然存在。相反,政党体制的变化则会导致政治断层结构或者政府构成方式的转变。比如,假设居主导地位的中政党把选票同时丢给了左翼和右翼政党,那么政治竞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就会进一步极端化。或者,如果一个与众多小党竞争的大党发生分裂,并由此形成一个由两大潜在阵营相互争夺权力的新体制,政府形成的规则就被改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爱尔兰。当时进步民主党从共和党中分裂出来,不仅削弱了后者可能单独执政的多数党的地位,而且形成了一种由共和党—进步民主党与统一党—工党两大联盟对峙的局面。总体上看,政党变化比政党体制变化更为频繁,这使得梅尔认为,选举波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竞争的基础(Mair 1997; Mair and Mudde 1998)。

图23.7反映的是两次选举之间内阁变更频率的趋势,可以体现政党变化和政党体制变化的不同。<sup>①</sup> 在议会制政体中,内阁极不稳定。因为反对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或者内阁也可能会策略性地自行解散,以重新分配内阁职位,并让更多的议员有机会参与竞争(Mershon 2002)。选举波动性研究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由于新的政党缺乏知识,又没有与其他政党长期相处的关系,所以想要让政府避免危机非常困难,这就意味着新生政党占多数的内阁寿命可能不会太长。不过,图23.7中的左侧部分显示,政府不稳定与通过投票波动衡量的选举不稳定无关。图的右侧反映执政党中新政党(即从未参加过政府的党)的比例与内阁稳定性的关系,它同样表明,政府的稳定性与新政党的加入无关。

<sup>①</sup> 当行政部门更迭或一个新政党加入/离开既存内阁时,就记为一次内阁变更。这里采用的是Woldendorp, Keman, and Budge(2000)的计算方法。





Note: Parliamentary turnover counts number of changes in cabinet composition.

图 23.7 政府稳定性的构成因素

[x 轴: 佩德森投票不稳定性指数; 执政党中新党的比例]

[y 轴: 议会表现]

[注: 议会表现由内阁构成变化的次数计算]

虽然政府效率还有其他的衡量标准(比如政策输出和宏观经济表现),但上图说明,对于选举波动性的规范评价所引发的悲观失望可能是被夸大了。老政党毕竟仍然占据着大多数内阁职位,因此它们得票率的相对下降,可能不过是这些政党意欲摆脱与立法权无关的多余的选举能力的愿望。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政党是变得瘦而精了,还是小而弱了。虽然政府构成的相对稳定性支持前一种结论,但相信未来的研究会更好地说明政党—选民关系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 参考文献

- ALDRICH, J.H. 1995.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LESINA, A., and ROSENTHAL, H. 1995. *Partisan Politics, Divided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MINGEON, K., LEIMGRUBER, P., BEYELER, M., and MENEGALE, S. 2005. Comparative political data set 1960–2003.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Berne.

- BENOIT, K., and LAVER, M. Forthcoming. *Party Policy in Modern Democracies*. London: Routledge.
- Boix, C. 2000. Partisan government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1964–93. *World Politics*, 53: 38–73.
- BOWLER, S., FARRELL, D. M., and KATZ, R. S. 1999. Party cohesion, party discipline, and parliaments. Ch. 1 in *Party Discipline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ed. S. Bowler, D. M. Farrell, and R. S. Katz.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DGE, I., ROBERTSON, D., and HEARL, D. eds. 1987. *Ideology, Strategy, and Party Change: Spatial Analyses of Post-War Election Programmes in 19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ERON, D. 1984. Social democracy, corporatism, labor quiesc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 Pp. 143–78 in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ed. J. H. Goldthor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AMPBELL, A., CONVERSE, P. E., MILLER, W. E., and STOKES, D. E.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AMANI, D. 2003. The end of silent elections: the birth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1832–1915. *Party Politics*, 94: 411–43.
- 2000. *The Societies of Europe: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15*. London: Macmillan Reference Ltd.
- CAUL, M. L., and GRAY, M. M. 2000. From platform declarations to policy outcomes: changing party profiles and partisan influence over policy. Pp. 208–37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 J. Dalton and M. 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T. N., and LIPSET, S. M. 2001.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A Debate on Post-Industrial Stratifi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H. D., and STEWART, M. C. 1998. The decline of parties in the minds of citize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 357–78.
- Cox, G. 1987. *The Efficient Secret: The Cabi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Victoria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MCCUBBINS, M. D. 1993. *Legislative Leviathan: Party Government in the Hou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LTON, R. J. 2000. The declin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s. Pp. 19–36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 J. Dalton and M. 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ALLISTER, I., and WATTENBERG, M. P. 2000.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san dealignment. Pp. 37–63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 J. Dalton and M. 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publics. Pp. 19–42 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 Political*

-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 ed. K. R. Luther and F. Muller-Romm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WATTENBERG, M. P. 2000. Unthinkabl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Pp. 3–18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 J. Dalton and M. 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WINTER, L. 1998. Conclus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lectoral, office and policy success of ethnoregionalist parties. Pp. 204–47 in *Regiona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d. L. De Winter and H. Tursan. New York: Routledge.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Wiley.
- EZROW, L. 2005. Are moderate parties rewarded in multiparty systems? A pooled analysis of Western European elections, 1984–1998.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4: 881–98.
- FARRELL, D. M. 2002. Campaign modernization and the west European party. Pp. 63–84 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 Political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 ed. K. R. Luther and F. Muller-Romm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WEBB, P. 2000. Political parties as campaign organizations. Pp. 102–28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 J. Dalton and M. 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RVIN, I. ed. 1989. *Elections since 1945: A Worldwide Reference Compendium*. Chicago: St James Press.
- GRILLI, V., MASCIANDORO, D., and TABELLINI, G. 1991. Political and monetary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financial policies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13: 341–92.
- HIBBS, D. 1977.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1467–87.
- HUG, S. 2001. *Altering Party Systems: Strategic Behavior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7. Value chang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4: 1289–303.
-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VERSEN, T. 1994. The logics of electoral politics: spatial, directional, and mobilizational effec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2: 155–89.
- and WREN, A. 1998.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50: 242–56.
- KALYVAS, S. N. 1996. *The Rise o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TZ, R., and MAIR, P. eds. 1992. *Party Organizations: A Data Handbook o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1960–199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995.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 Party Politics*, 11:5-28.
- KIRCHHEIMER, O. 196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Pp. 177-200 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J. LaPalombara and M. Wei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TSCHOLT, H.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ORPI, W., and SHALEV, M. 1979. Strikes, industrial-relation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2:164-87.
- LANGE, P., and GARRETT, G. 1985. The politics of growth: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1974-1980. *Journal of Politics*, 473:792-827.
- LAVER, M., and SCHOFIELD, N. 1990. *Multiparty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in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WIS-BECK, M.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 STEGMAIER, M. 2000.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183-219.
- LIJPHART, A.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 M., and ROKKAN, S. ed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 MCELWAIN, K. M. 2005. Manipulating electoral rules: intra-party conflict, partisan interests, and constitutional thicknes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MACKUEN, M. B., ERICKSON, R. S., and STIMSON, J. A. 1992. Peasants or bankers?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nd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3:597-611. MAIR, P. 1990. Introduction. Pp. 1-22 in *The West European Party System*, ed. P. Mai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Party System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MUDDE, C. 1998. The party family and its stud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11-29.
- MULLER, W. C., and PLASSER, F. eds. 2004.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Change: Party Responses to Electoral Market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ERSHON, C. 2002. *The Costs of Coali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DERSEN, M. N. 1979.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hang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71:1-26.
- POWELL, G. B., and WHITTEN, G. D. 1993.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voting: taking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2:391-414.
- PRZEWORSKI, A., and SPRAGUE, J. 1986.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BINOWITZ, G., and MACDONALD, S.E. 1989.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93–121.
- RODRIK, D.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ROSE, R., and MACKIE, T.T. 1983. Incumbency in government: asset or liability? Pp. 115–37 in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H. Daalder and P. Mair. Berkeley,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SCARROW, S.E. 2000. Parties without members? Party organization in a changing electoral environment. Pp. 79–101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J. Dalton and M.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ATTSCHEIDER, E.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 SIMMONS, B. 1998.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Pp. 36–69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ed. H. Kitschelt, P. Lange, G. Marks, and J. Step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S.C. 1999.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243–67.
- STROM, K. 1990.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VITS, M. 2006. Party system change: testing a model of new party entry. *Party Politics*, 121: 99–119.
- VOLKENS, A., and KLINGEMANN, H.-D. 2002. Parties, ideologies, and issues: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fiftee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1945–1998. Pp. 143–68 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 Political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 ed. K. R. Luther and F. Muller-Romm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TTENBERG, M.P. 2000. The decline of party mobilization. Pp. 64–76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J. Dalton and M.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DENDORP, J., KEMAN, H., and BUDGE, I. 2000. *Party Government in 48 Democracies 1945–1998: Composition-Duration-Personnel*.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WREN, A. 200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In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第二十四章 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与选民

弗朗西斯·阿戈皮昂(Frances Hagopian)

政党是现代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代表组织。政党决定动员哪些选民,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动员。它们可能建立广泛而松散的联盟,也可能寻求那些具有明确的语言、地域或职业认同的群体的支持。它们可能会向选民提供物质利益和工作,或者为它们自己的社区,以及拥有个人魅力或者其他特定素质(比如诚实、能力,或者高度的工作伦理,或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族群、社会阶级,或者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观念)的候选人提供单独的、排他性的好处。简而言之,它们可以通过裙带关系、主仆关系、政治分肥、个人能力,或者个人表现、认同、纲领及意识形态等手段吸引选民。本章的目的,就是说明政党会选择何种策略、如何理解这些选择,以及它们在短期或者长期所获得的成功。

政党和选民关系中的几个论题,对先进的和新兴的民主国家是共同的。在这两类国家,政党都要提出吸引选民的战略,在重要议题上框定政策倡议,并把自己展现为拥有与选民一样的认同和价值观的、称职、务实的执政者。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这两类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它们使我们有机会在政党及其选民的关系问题上,处理比在先进民主国家所遇到的更广泛的问题。在新兴民主国家,党派观念通常十分微弱,政党来去匆匆,甚至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体系也几乎根本不存在。因此,我们不仅要探究某个特定政党得票率变化的原因,还要追问党派分野是如何出现的、政党选择什么样的基础动员选民,以及为什么政党有时候能把松散且不稳定的政党—选民关系转变为稳定的纽带,或者难以阻止曾经强固的政党—选民关系变得松散。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理论上的挑战,需要解决为何以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政治为基础提出的范式并不必然在新

兴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問題。新兴民主国家的起点不一样。这一方面表现在新兴民主国家作为投票基础的社会阶级和职业官僚出现时间点不同,并且经历过原有政党被压制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表现在它们试图在一种相当不同的社会扎根,这些地方贫困与不平等极为严重,社会生活贫乏,国际经济严重制约了国内政策空间,而全球信息交流又触及最遥远的乡村地区。

目前,我们缺少一种一般性的理论,以说明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极度不稳定的选举条件下,政党如何动员选民。人们认为,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稳定的党派归属来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宗教的或区域的)范畴,这一过程或是自然发生(Lipset and Rokkan 1967),或是受到政党的引导(Sartori 1969),并得到纲领性诉求的强化;新兴民主国家则不同,这些国家的选举人都很贫穷,全体选民中并不存在突出的差别,因此可以想象,政党会向选民发放现金、提供施惠性的工作岗位,或对它们自己的社区提供特殊的利益,政党候选人也会发出强烈的个人性呼吁。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政党缺乏凝聚力,不可能提出清晰的治理纲领,亦不能扎根于广大选民之中,结果就导致一种制度化程度较低的、不稳定的政党体制。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普遍存在把候选人个人声望置于首位的制度形态,而这会大大增加政党—选民关系的不稳定性。

本章认为,上述对新兴民主国家政党—选民关系的描述存在其缺陷。为提出更好的理论,我们需要在更广阔背景下,了解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如何被纳入政党及其代表的策略谋划,改变了关键的制度和社会行为体的权力平衡,并造成可能重塑党际竞争并且改变选民动员基础的新的议题分化。诉诸得到清晰界定的选民的强有力的纲领,可能会使基于施受惠关系的政党转变为纲领型政党;而在面临艰难的政策选择时进行共谋的决定,则可能会使纲领型政党与选民建立某种个人性的、裙带性的关系,而它们各自的选民群体也变得难以区分。

在接下来的各部分,我首先介绍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与选民关系脆弱和不稳定的特点。随后,我会深入分析以下观点,即这样一种联系的本质包含了建立稳定的党派归属的线索。为此,我会重申上面提及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党派分野,以及政党对它们将予以动员的选民的选择。在第三部分,我将回顾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政党动员(选民)机制的解释。第四部分将提出一种替代框架,以理解政党选择的动员策略。我会从政党—选民关系中尚未得到深入研究的一个策略层面入手,即党际竞争、选民需求和代表策略相互联系的方式。最后一部分对我们关于新兴民主国家政党和选民关系的理论与知识现状加以评估,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简要的规划。

政党动员选民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它们以裙带关系作为动员基础,那么

政府就不可能通过适应国家紧急情况的法案(Ames 2001),精英会通过阻碍经济发展获得利益,公共品则可能供给不足(Brusco, Nazareno, Stokes 2004, 84页)。<sup>①</sup> 纲领性差别和政策替代选择的缺失,也会导致公民参与和政治兴趣的瓦解(Hogopian 2005),而当选民与政党的联系中断时,政党就会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Crisp 2000),公民和政治精英眼中民主制的合法性会下降(Kitschelt et al. 1999, 第1页),民主制就可能变得不稳定(Lipset 2001, 第5页)。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具有强烈认同和极端意识形态的政党会加剧政治冲突,阻碍必要的政策妥协,但其结果同样威胁到民主制本身。

### 一、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民动员:挑战的强度

当今拉美、中东欧、亚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新兴民主政权,是在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催生的(Huntington 1991)。1978年时,拉丁美洲只有3个民主国家,而今天只剩下古巴和海地两个威权政权。在中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统治瓦解后诞生的27个国家中,只有7个到2004年仍被“自由之家”归为“不自由”的类别。在亚洲,韩国、台湾地区、泰国、菲律宾、蒙古已经与印度一样,成为完全的民主政权,在土耳其、斯里兰卡、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尼泊尔,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也得到了扩展。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90年之前只有博茨瓦纳、塞内加尔、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毛里求斯举行定期选举;到1998年,只有4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未曾举行过某种形式的竞争性选举(Gibson 2002, 202页)(图表24.1)。不言而喻,这些国家的情况相当不同,它们当中有前军人政权、共产主义体制,以及任期不等的个人独裁政权。在最后的威权统治之前,有些国家已经经历过民主政权,拥有政党体制和选民动员机制,它们很快就能得到复兴;但另一些国家则没有或仅有极少的民主经验,没有政党传统,公共社会也十分软弱。2002年,拉丁美洲的人均国民收入是3280美元,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亚洲分别只有450美元和460美元(World Bank 2004)。

在当前的新兴民主国家中,政党和选民关系密切而稳定的为数极少。从俄罗斯到巴西,只有少数选民具有政党认同。1994年具有政党认同者百分比的中间值,在7个

<sup>①</sup>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裙带主义政党能够从低度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均中获利。一方面,收入的增长会提高政党收买选票的成本;另一方面,选民更愿意支持裙带主义而非纲领型的政党,因为无论他们是否投票支持一个纲领型的政党,他们都能得到它所提供的公共品,而要想得到一个裙带主义政党的好处,他们就必须为它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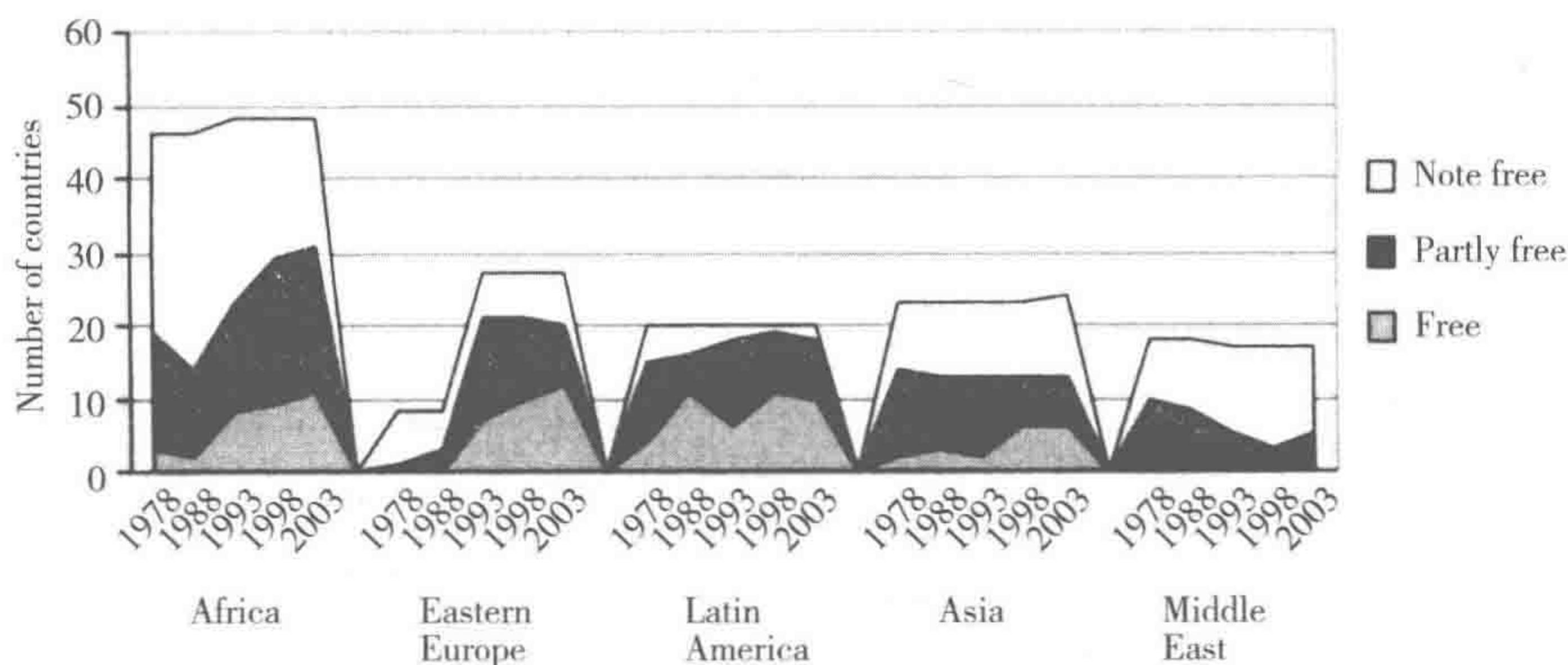


图 24.1 “自由之家”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排名, 1978—2003

中东欧国家为 27%，在 3 个前苏联国家为 15%；许多人对所有政党都持反对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投票意愿（Rose 1995, 552、554 页）。根据最近的统计，在东欧有 37%、在所有新兴民主国家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支持某一政党；而在亚洲，这一比例要小于四分之一（表 24.1）。尽管在公众调查中由选民自己报告政党认同，可能并不是衡量政党归属的最好方式，而政党归属可能也不像看上去那么薄弱<sup>①</sup>，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民与政党的联系远不如工业化民主国家那么密切。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选举波动率的平均值，即两次选举之间某政党得票的净变化值是 30.6，这是当前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 2.5 倍，1948—1996 年之间美国的 7 倍，1885—1995 年之间 13 个欧洲民主国家的 3.5 倍（Bartolini and Mair 1990, 68 页，引自 Roberts and Wibbels 1999, 576 页）。下议院选举的平均波动率，在东欧达到 44.0，在拉美为 30，在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为 22.8，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少举行过两次多党选举的 30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 28.4。只有 5 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冈比亚、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和南非——拥有制度化的政党体制，进行有规律的政党竞争，并有稳定政党参与选举；也只有在这 5 个国家，选民与有组织的利益团体认为，是政党和选举决定了由谁来统治（Mainwaring and Scully 1995；Kuenzi and Lambright 2001, 461、442 页）。

<sup>①</sup> 布雷德尔和塔克（Brader and Tucker 2001, 71—2 页）怀疑，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归属是否能够和应该仅仅用政党认同来加以衡量。他们以俄罗斯为例，提出了一种辨识新产生的党派归属的替代方法。这一方法测量以下三个方面的指标：（一）随时间变化选民在政党选择方面体现出来的忠诚度和稳定性。（二）选民的政党偏好与其他方面的政治评价的一致性。（三）归属某一政党的选民的利益和观念与该政党的诉求和纲领的对应程度。

表 24.1 新兴民主国家和工业化民主国家中的党派归属与选举波动性

区域中间值	选举波动性中间值(下院 <sup>a</sup> )	政党认同 <sup>b</sup>
南欧 <sup>c</sup>	12.8	44.1
东欧 <sup>d</sup>	44.0	37.3
拉丁美洲 <sup>e</sup>	30.0	27.7
亚洲 <sup>f</sup>	22.8	23.1
撒哈拉以南非洲 <sup>g</sup>	28.4	—
新兴民主国家中间值	30.6	34.7
工业化民主国家中间值 <sup>h</sup>	12.5	47.5

<sup>a</sup>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选举波动性中间值,由至少两次选举间政党得票的净变化值计算得出(Kuenzi and Lambright 2001),至于其他地区,那些1978年和2003年都被“自由之家”评定为“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至少举行过三次连续的下院选举(Mainwaring and Torcal 2006)。

<sup>b</sup>政党认同率的取值根据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你通常是否认为自己与某个特定政党的联系比较密切?”如果受调查者的回答为“是”,随后的问题便是:“是哪个政党?”与只问一个问题相比,两个问题的形式会导致统计出来的党派认同率更低,但能精确测量党派归属的国家间差异。调查年份在下面的括号中标出。

<sup>c</sup>西班牙(2000),葡萄牙(2002);希腊(只有选举波动性中间值)。

<sup>d</sup>白俄罗斯(2001),捷克共和国(1996),匈牙利(1998),立陶宛(1997),波兰(1997),罗马尼亚(1996),俄罗斯(2000),斯洛文尼亚(1996),乌克兰(1998);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只有选举波动性中间值)。

<sup>e</sup>巴西(2002),智利(1999),墨西哥(2000),秘鲁(2001);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只有选举波动性中间值)。

<sup>f</sup>韩国(2000);台湾地区(1996);泰国(2001)(只有政党认同率);印度(只有选举波动中间值)。

<sup>g</sup>选举制度比较研究(CSE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数据库中未收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数据。立法机构选举波动性中间值的计算则包括了这30个国家的数据。

<sup>h</sup>澳大利亚(1996),丹麦(1998),德国(1998),日本(1996),荷兰(1998),挪威(1997),瑞典(1998),瑞士(1999),英国(1997),美国(1996);加拿大(1997),以色列(1999),新西兰(1996)(只有政党认同率);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只有选举波动中间值)。

数据来源:选举波动性:Mainwaring and Torcal 2006, 27—28页;Kuenzi and Lambright 2001, 449页。政党认同:Samuels 2006, 5页(原始出处:选举制度比较研究,参见 [www.unich.edu/cses](http://www.unich.edu/cses))。

新兴民主国家的选举波动性部分源自政党数量的增加,但如果选民的政党归属比较强的话,那么新生政党要在选举中得到哪怕是暂时的胜利也不可能。一般认为,在新兴民主国家,比纲领型政党占有更大优势的施惠型政党,与选民通常只有松散的联系。人们常常说,裙带政治和施惠型政治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马来西亚(Scott 1972),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Lemarchand 1972),以及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和多数拉美国家(Mainwaring and Scully 1995)政党政治的基础,但是,对于裙带政治和施惠型政治在过去和现在的重要性,至今鲜有系统研究,部分的原因,是对政党—选民关系的这种特殊形式进行指责很容易,但要证明它存在却比较困难。对于收买选票的频率,也许可以通过全国性的选举调查加以窥知,如果存在这种调查并且提出合适问题的话;但众所周知,施受

惠关系和分肥交易的范围却很难进行测量,特别是在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层面。<sup>①</sup> 我们同样也不了解个人关系是否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普遍存在。一方面,韩国自 1954 年以后的历次选举调查都表明,对选民而言最重要的是政治领袖的人格和道德品性,而不是他们的党派归属和政策倾向(Shin 1999, 187—188 页)。然而在俄罗斯,虽然通行的说法也是要通过个人关系笼络选民,但在 1995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与“转变中的政党归属”(倾向社会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党,还是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对候选人个人品质的评价并不具有重要意义;而在 1996 年的总统选举中,公民们对特定议题的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候选人个人品质的评价只是影响投票的最次要的因素(Colton 2000, 218、222 页)。

政党和选民关系的薄弱,并不仅仅因为民主是种新事物。在 19 个新兴民主国家中,在经历 4 个选举周期之后,并未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趋势,表明选举波动有所降低(Mainwaring and Torcal 2006, 12 页)。这一发现推翻了根据康弗斯(Converse 1969, 167 页)的经典社会化模型得出的传统假定,即经过大约两代到两代半的时候,认为党派归属趋于稳定。此外,虽然一般认为如果人们是通过媒体而非政党机构获取信息的话,那么党派忠诚就更难以培育,但至少有一位研究者证明,媒体并没有发挥抑制党派归属的作用。他发现,韩国的情况是,人们的信息越全面,就越有可能形成对某个政党的归属关系(Shin 1999, 184—185 页)。另外,也没有多少证据支持“新法团主义”的观点,即如果结社生活相当活跃,则那些可以选择其他代表渠道的公民,就没有必要依靠政党向国家争取他们的利益(Schmitter 1992)。不仅有大量实例表明政党与它们的社会网络之间可以形成某种共生关系,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邻里会社(Levitsky 2003)以及波兰农民党的地方志愿者消防队(Grzymala-Busse 2002, 125 页)等,而且韩国的情况还表明,那些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对政党的归属感和依赖感都要比其他入稍微高一些(Shin 1999, 184 页)。

研究者们还假定,由于新兴民主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政党认同,对政府表现的回溯性评价就会在公众的投票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糟糕的经济表现必然导致明显的选举波动(Mainwaring and Torcal 2006)。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的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并没有能够为这一假设提供确凿证据。1995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对政府表现的回溯性评价,是影响选举行为的因素中最弱的一个(Colton 2000, 218 页)。在总统选举中,这种评价的影响要大一些,但仍不能与公民针对议题的观点相提并论。在拉

---

<sup>①</sup> 只有十来个国家进行这种调查,包括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研究由议员个人提出的预算修正案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能的,阿姆斯(Ames 2001)就针对巴西进行了这样的研究。

丁美洲,糟糕的政府表现并未影响当政者的支持率,因此在1982年至1990年,这段以高度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停滞和汇率严重下跌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时期,导致了高水平的选举波动(Remmer 1991)。20世纪80年代是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也是一个被科培治(Coppedge 2001, 186页)称之为“政治达尔文主义”的过程。在此期间,一些无法适应经济危机环境的政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另一些适时调整的政党——包括依靠个人能力的党、(能够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中右翼执政党,以及在野的中左翼政党——都生存了下来。如果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民主要根据对政府表现的回溯性评价进行投票,那么应该可以预期,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复苏,选举波动应该有明显的降低。但事实上,选举波动性在20世纪90年代要高于80年代更多(分别为23.2和19.6)(Roberts and Wibbels 1999, 577页)。一项最近的区域比较研究(Seligson and Tucker 2004)证实,原来的威权领袖得票的多少,似乎与选民的威权倾向和对民主的怀疑相关,而与民主政府的糟糕表现无关。

如果说媒体的报道、结社生活的活跃程度、年度经济指标都不足以影响选票的得失,那么在当今的新生民主国家,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或者阻止了稳定的党派归属的产生?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探讨以下两个问题,即政党如何确定目标选民,又是何种因素决定了政党与选民的关系。不过应该首先作出一点说明。在我的讲述中,假定政党—选民关系的本质可以进行明确的分类。但在现实中,区别一个纲领型的党和一个非纲领型的党(二者可能都有它们的竞选纲领)通常是困难的;另外,对一个裙带型的政党来说,要确定其代表为选民服务必须达到的程度、他们必须对什么样的提案负责也同样有困难。即便我们能够在这种分类标准上达成共识,政党和个人也会混合使用不同的策略。例如在智利1973年的政变之前,国家立法机构中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代表,同时又是地方裙带关系重要的代理人(Valenzuela 1977);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党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在数十年间,一直以纲领性诉求吸引某些地区的选民,又以裙带关系笼络其他地区的选民。议员个人常常在工作日追随政党领袖投票,而在周末为选民服务。简言之,虽然我们将“纲领型”“个人能力型”和“裙带关系型”作为三个彼此独立的标签,但政党和政治家会以不同的形式混合这三种因素,因此不仅为他们选择合适的标签,而且解释为什么他们采用了一种而非另一种策略都十分困难。这也就意味着,在单个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层面上,都有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算计权衡方式。

## 二、通过选民动员策略解释政党归属

政党试图争取哪一部分选民? 它们是想建立某种异质、松散的选民联盟,还是规

模虽小,但凝聚力更强、可以在诸如经济或宗教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纲领性联系的选民群体?在谁被动员、如何动员,以及动员策略的稳定性和成效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传统上,政党断层的出现,或者被理解为产生某个社会中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Lipset and Rokkan 1967),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政党行为的结果(Sartori 1969)。李普塞特和罗甘认为,四个政党断层从两大主要的社会经济转型中产生——因民族国家革命产生的中心—边缘分化和宗教分化,以及工业革命导致城乡分化和工人—资本家的分化。由于这些分化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因而在其出现后的数十年间塑造了欧洲的党派图景。萨托利则认为(Sartori 1969, 84、87、89—90页),这种“政治社会学”具有一定的缺陷。他注意到,有些分化根本没有转化为党派对立,因此,并非政党产生于阶级对立,而是阶级通过政党得到了自身认同。这种强调政党精英作用的解释框架,可以说明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班牙公众不断强化的政党归属(Barnes, McDonough, and López Pina 1985, 715页),以及皮诺切特独裁结束后智利政党断层的产生(Torcal and Mainwaring 2003)。在选民尚未被发展完善的社会组织吸纳之前,政党或许能够相当成功地塑造党派归属。

如果并非每种基于认同的差异,甚至其中最具社会意义的差异都能转变为政治断层上的分野,那么政党如何选择某种族群、宗教、部族或语言分野,并赋予其政治上的重要性?波斯纳(Posner 2005)认为,政党选择社会断层以动员选民的原则是能够结成最小获胜联盟,它由权力分赃必须惠及的最小数目的人组成,因此,某个断层能够界定的群体的规模,以及这个群体能否成为选举竞争的有效工具,就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赞比亚,切瓦人(Chewas)和通布卡人(Tumbukas)都是弱小的少数族群,并不具有作为社会支持的基础而加以动员的价值,于是这两个族群结成了联盟;国界另一边的马拉维也有这两个族群,虽然它们在客观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别与在利比亚别无二致,但人数众多,完全可以成为建立政治联盟的有效基础,结果它们变成了对手(Posner 2004)。此外,随着赞比亚在多党统治与一党统治之间来回变化,竞争的主要舞台也在国家层面(这个层面主要通过范围更大的语言群体进行划分)和选区层面(在此,部族认同成为主要的族群分野)之间来回转变。与此相似,基伯(Chhibber 1999, 14页)也认为,印度之所以会出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党,并不是因为印度社会内部印度教信仰的强化,或者这种宗教表达意愿的增强,而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它虽小但却不能被忽视,虽大但又不足以使一个政党如果得到了它的支持,就不必担心其他群体的反对。

通过政治手段形成的断层,能否如李普塞(Lipset 2001, 7页)所指出的阶级和宗教分裂一样根深蒂固呢?大多数研究者从直觉上推断,纲领性的或者意识形态的联系要更为稳定(参见Mainwaring and Torcal 2006, 2页)。选民的忠诚不会直接取决于政府的

经济表现(因为这取决于某些政党和政府控制之外的因素)、候选人的人格,或者也许永远无法兑现的特殊主义的利益承诺,而是基于对一套与他们更深层次的认同相一致的观念或者政策的拥护,因此只会非常缓慢地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虽然选民可能把选票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价者,或者因被某位候选人的个人品质所吸引而把大量的选票转投给他,但如果许诺的好处未能兑现,或者事实证明这些领导人其实乃是腐化堕落之人,或者他们最终离开政坛,那么政党在投票时仍然面临潜在的危险。众所周知,没有政党归属的选民,会抛弃那些执政时未能提供物质福利,也未能阻止犯罪和政治暴力、为人们提供人身安全的政党,而如果它们在竞选时曾作出过这些承诺,则情况更是如此(Stokes 2001)。即便政治强人的执政十分成功,他们也会影响政党自身作为一个机构的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联系都是松散的,政党的社会根基都是浮浅的,而党派归属也都是脆弱而易变的。

依靠个人能力的或者裙带主义的政党—公众关系,是否从根本上说只能为政党归属提供一种并不稳固的基础?① 尽管认为个人能力不足以为党派归属提供稳固基础这一假定的逻辑无懈可击,但我们也知道,胡安·庇隆和艾薇塔·庇隆所留下来的遗产,使阿根廷工人在他们去世后数十年间依然追随一个背弃了其核心纲领原则的政党。我们同样也不应低估那些民族独立和解放政党所长期拥有的象征性感情纽带,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同样的,裙带关系对于当政者来说也并不必然就是一种不稳定的统治形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依靠收买选票和政治分肥,成功地维持了60多年的统治。拉丁美洲最稳定的两个政党体制,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的政党体制,都建立在跨阶级的全民型政党基础之上。它们最初反映的(19世纪)城乡对立早已淡去,而它们当前的基础显然就是国家的施惠(Collier and Collier 1991)。当然,尽管在上述实例中,这类联系形式能够有效地把选民和政党团结在一起,但依赖这种补偿机制的政党也曾在选举中遭受惨败。当国家提供的福利贬值时,施惠型政党就会陷入危机;而由于选举逻辑会提高选民的谈判地位(Scott 1972, 109页),所以国家福利的贬值不可避免,这将导致大规模的公共赤字、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参见 Mainwaring 1999, 187—190页; Piattoni 2001, 25—26页)。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选民不仅会重新考虑裙带关系的得失,而且他们对此类策略可能导致的公共部门腐败的忍耐也会消减。

鉴于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持续的、纲领性的策略必然导致稳定的得

① 一项正在进行的创新研究(Unos in progress)试图精确考察,在委内瑞拉、秘鲁和阿根廷,政党—选民关系的类型是否决定了选民对政党的信任方式,以及政党体制的稳定性。

票率。政党可以通过发动其成员进行选区选民服务,以争取选民对其纲领的支持。此外,一个曾经依靠纲领赢得信任、并拥有稳定的选民归属的政党,也可能会转而采用裙带主义的动员模式。政党不仅可以混合使用策略,而且还会变更策略。

### 三、纲领、个人能力或施惠:制度与结构的作用

如果深深植根于公民社会的纲领型政党拥有选举的优势,也拥有难以割裂的稳固的党派归属,那么为什么政党不总是选择成为纲领型政党?是否有些不提出纲领性诉求的政党最终也能扎根社会,或者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谢夫特(Shifter 1977)假定,当政党能够动用国家资源的时候,就会采用施惠型关系,而在选举权开放的情况下,则不会形成反对施惠关系的同盟。基奇海默(Kirchheimer 1966, 184—191页)认为,选举竞争以及为迅速当选而猎取选票,都会诱使主要政党卸下它们的“意识形态包袱”而转变为“全民”的政党,以寻求不同阶层的的支持,同时抹平各群体主张之间的细微差别。普列泽沃斯基和施普拉格(Przeworski and Sprague 1986, 55—56页)则认为,社会主义政党为了获得竞选中的必要多数,过于迫切地吸引中产阶级的票源,从而损害了他们动员那些忠诚的工人阶级选民的能力,失去了他们的认同,而自己最终也得不偿失。

在政党归属薄弱、党派断层尚不明晰的时候,政党有些什么样的选择呢?主流观点认为,政党与选民构建的关系,只是正式的民主制,特别是选举规则以及约束政治家对公职的竞争及其未来政治生涯的相关制度的附带产物(Carey and Shugart 1995)。在立法机构的成员能够经过胜者全胜的规则再度当选的单一选区制之下,由于他们的职位来自选民,因此会为后者提供相应的服务和项目,以换取他们的支持。相反,比如在封闭名单的比例代表制之下,选票是投给政党的,因此一方面政党领袖可以强调候选人对党的纲领的服从,另一方面由于后者的成功有赖于前者,所以他们也会把希望寄托在党的声望上面。如果政治家要谋求一种更为广阔的政治生涯,那么他们会支持那些握有官职任命权的全国或地方性政党的领袖以及政府领导的政治方案;而如果他们希望在未来谋求地方层面的选举职位的话,他们则会在地方政治家和选民中寻求支持(Strom 1997; Jones et al. 2002; Morgenstern and Nacif 2002; Samuels 2003)。这些论断在像阿根廷那样的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经验支持。在这些国家,选举规则促使政治家服务于党的选民,因而在竞争性的议会选举投票中党的纪律性就比较强(Jones 2002)。但在像巴西那样的国家,候选人的挑选程序或者选举制度更鼓励立法机构的成员致力于塑造个人声望,以便与本党同僚进行竞争(Ames 2002),并且顺从大多数议员的倾向提出并且实施某些议案,而不是根据政党纲领或者国家利益发起立法动议(Crisp et al. 2002, 842—

844 页)。在这些国家,上述论断就不大能够获得支持。

我们可以基于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几个考虑挑战这一强有力的论题。第一,选举可以决定选民或政党领袖是否对议员拥有约束权,但它们未要求议员如何行动。政党领袖可以不顾选民偏好,用严格的纪律约束立法机构的代表,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希望通过代表们对选民提供的服务,为整个政党博得更多的竞选资本(Carey 1996; Swindle 2002)。政党领袖甚至还可能希望把政策妥协或者赢得未来的选举,而不是在当前使选票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Cox 1997, 170 页)。至于选民,他们想要的可能是一项拨款、一些就业机会、帮助减少政府机构中的繁文缛节,或者本选区内的建设项目,但他们也可能拒绝为此出卖选票,而更希望他们的代表投票支持稳定物价、重振经济、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以及减少犯罪等。<sup>①</sup> 第二,制度理论强调选举和立法制度对立法行为的影响,这意味着有一套统一的刺激因素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代表模式,对各政党或议员个人的策略可能出现的差异,该理论则不置一词。但是,同一政治环境下政党和个人层面实际存在的大量差异,表明这一假设并不成立。第三,该理论最强有力的预测,是在政党领袖与选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治家个人必须如何选择。但是,它并没有足够清楚地预见到非零和博弈的存在,也没有说明为何议员会为政党付出他们的声誉,并且赋予政党领袖以解决党内协调问题和维护党的集体声誉的权威。第四,该理论无法解释,在选举法和相关制度因素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党的选举竞争、选民动员和政治代表策略的改变。一些学者用另外的变量,如影响政党领袖把自己的政党引向新方向的能力的机制,来解释中欧和拉美民主选举中政党纲领的调整(Grzymala-Busse 2002; Burgess and Levitsky 2003),这种解释更为成功。

用制度主义方法分析新兴民主国家选民动员问题的比较政治学者,对这些制度的起源和变革也研究不足。在发达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中,选举规则随着新旧政党力量平衡的改变而变化(Boix 1999),这意味着制度约束并不一定是刚性的,规则可以被强有力者所设计。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权力平衡。政党的选民忽而增加,忽而减少。比如在工业革命中,制造业的劳动者迅速增加,而乡村阶级则急剧萎缩;而去工业化则制造了一批难以组织的非正式部门的从业者。另外,对政党体制的外部冲击,比如外国干涉或者民主转型,都可能加速政党选举力量的对比。特别是,权威统治的遗产会同时影响资源禀赋和集体行为者的利益(Kitschelt et al. 1999, 3, 11—12 页; Grzymala-Busse 2002, 281 页),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对局规则。

第二种对政党—选民关系本质的解释,从一个社会特别是其某个发展阶段的结构

<sup>①</sup> 巴西的选举调查显示,有微弱多数的选民拒绝为了食品或工作而出卖选票。



环境条件来说明政党的动员策略(Huntington 1968)。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 贫困的、缺乏信息的选民廉价出售选票以换取眼前的物质利益, 而不会去争取遥远而不确定的纲领性的成果, 并且当时“政党和政党体制都是裙带式的、施受惠导向的、地方主义的”(Kitschelt 2000, 856—857 页)。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 人们移入城市并受到教育, 形成了现代观念, 此时政党就可以在议题导向的以及纲领性的基础上动员选民。至于在那些拥有庞大公共部门的更加富裕的社会, 选民在投票时期望得到的回报, 可能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福利, 而是政府提供的工作, 或者耗资巨大的分肥项目。

事实上, 在贫困的社会, 贫困的选民比中产阶级更频繁地出卖选票, 虽然这种行为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普遍<sup>①</sup>, 而且随性别、年龄、社会参与网络、党派归属和具体环境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在贝宁, 与南部发达地区相比, 北部贫困地区的选民更容易接受裙带式的交易, 同时与女性相比, 男性对公共品的兴趣更少, 更容易出卖选票(Wantchekon 2003)。在墨西哥, 2000 年的一项定组研究表明, 近 15% 的受访者承认在总统选举中收到过来自某个政党的礼品, 而在相对贫困的瓦哈卡(Oaxaca)和尤卡坦(Yucatán)两州, 在老年(50 岁及以上)、受过中等教育、低收入的城市男性选民中, 这一比例更高(Cornelius 2004, 53—54 页)。2001 年 12 月, 阿根廷有大约 7% 的选民和 12% 的贫困选民报告, 他们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得到过不同政党提供的好处(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4, 70 页)。那些在失业时更愿意向政党组织者求助、曾经在选举中获得馈赠品并出卖选票的, 都是与庇隆主义政党有联系、居住在小城镇的年轻人, 他们在政党的工作人员操控下投票。他们之所以更愿意为了某种裙带利益而出卖选票, 并非出于感激或义务, 亦非对未来悲观失望, 而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时期, 他们连最微小的物质回报都不愿放过(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4, 75、81—82 页)。<sup>②</sup>

为什么一些政党在运用裙带资源收买选民方面比其他政党更成功呢? 部分原因是, 与立足于中产阶级的政党相比, 拥有深厚的工人阶级基础的政党能够更好地利用施受惠关系, 因为施惠手段的效用随着收入(或技能)的提高而线性递减, 因此同样的投入, 从高收入阶层得到的回报比从低收入阶层得到的要少(Calvo and Murillo 2004, 743 页)。拥有更多的机会运用国家资源进行施惠的执政党, 也更容易建立裙带关系, 因为

<sup>①</sup> 一般认为, 巴西的投票受到裙带关系的强烈影响。但是, 2002 年的全国选举研究显示, 只有略微超过 5% 的受访者报告他们因选票交易得到过某些好处, 如现金或工作; 即便是在地方选举中, 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部落报告它们在国会下院议员、上院议员、州长和总统竞选中得到过好处。

<sup>②</sup>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由于墨西哥的选举改革保证匿名投票, 所以反对党在 2000 年的选举中号召选民“好处照拿, 按良心投票”, 结果革命制度党的传统选民真的抛弃了这个党(Cornelius 2004, 49 页)。

它们关于提供特殊利益的承诺比反对派更可信。贝宁的选举验证了这一推测 (Wantchekon 2003)。相反,那些无望掌握国家资源的“外部动员型政党”之所以要依靠纲领进行竞争,是因为它们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Shefter 1977)。因此,在巴西和乌拉圭充斥着施受惠关系的政党体制中,巴西劳工党和乌拉圭广泛阵线反而凭借党的纲领实现了竞争中的突破。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前共产主义政党,在其实施施惠的资源被切断之后,也不得不洗心革面,并通过提出新的纲领诉求,使选民相信它们对新政策选择的承诺,以“为共产主义的过去赎罪”(Grzymala-Busse 2002, 124—125页)。

从结构出发对裙带关系的解释,可以部分说明裙带行为的微观基础,但无法澄清裙带关系和施受惠政治在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其他发达工业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 (Kitschelt 2000)。谢夫特 (Shefter 1977) 把不同国家政党选民动员策略的差异,归因于选举权的普及相对于职业公务员制度形成的时间点,以及工业化的水平。如果公务员制度形成于民主化之前,则政治家就不可能利用公共部门的资源形成政治裙带关系的基础,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纲领型政党 (德国模式);而在那些工业化之前已经存在广泛的选举权,公务员又不能与政治分隔的地方,虽然工业化之后实现了普选权,但还是会形成施惠型的政党 (美国的情况)。这一理论未能解释的是:为什么有的国家也曾受到过施受惠关系的感染,但最终还是根除或者有效控制了这种政治实践 (Piattoni 2001, 19—20、24页),为什么裙带关系在民主制实行几十年后会变得不再稳定 (Kitschelt 2000, 858页),以及为什么政党会改变策略。

制度和结构解释充其量能够说明政党—选民联系的现有类型,但不能说明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些全方位的、以施受惠关系为基础的党会转变为纲领型政党,而一些纲领型政党也会在实际上转向施惠关系;为什么组织良好的政党会崩溃,新生政党能成功地进入先前仅由一两个政党主导的政治角逐;还有,为什么与名誉扫地的政权相联系的政党能够成功地洗心革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更广泛的策略性利益,并且把选民偏好的微观逻辑与政党为使得票最大化进行的策略算计联系起来。

#### 四、从结构和制度到策略:政党竞争、结构变化和政治代表之间的联系

在与其他政党的竞争中,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必须选择是否要以纲领作为基础,如果是,又必须把什么样的议题政治化,以在选举中有所收获。它们可以扩展或者改变自己选举纲领,以吸引新的选民。当然,它们还必须决定竞争的激烈程度,即在纲领上与

对手保持多大的距离。政党为了把它们自己与立场接近的对手更清晰地区分开来,或者吸引选票市场中某个特殊的部分,可能会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针对某些关键的政策议题和纲领问题的主张极端化或明晰化。或者,政党也可能在使选民们彼此分裂的、有争议的问题上缩小它们的立场差距,以争取更多的选票。像在匈牙利(Kitschelt et al. 1999, 180 页)和智利,民主政权继承了大体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市场改革,并在实际上把与改革相关的问题作为价值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也可以刻意选择不在这类看似已经不可改变的问题上展开竞争。雅可布森(Jacobson 2000)等研究发达民主国家的学者认为,政党为了回应选民的需要,会在政策上相互靠拢,或者像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美国政党那样走向极端化。但在新兴民主国家,就目前研究所及而言,纲领性的政党竞争一般不被视为各政党选民之间意识形态或者纲领距离的内在反映,因为人们假定选民喜欢的是施惠型纲领。不过,新议题领域的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进程,以及纲领间空间差距的变动,也可能会影响政党动员和代表选民的策略。

大多数学者同意,像人权或环境等新议题的重要性的提升,会导致旧政党无法跟上其选民的步伐,这将让新政党赢得这些选民,或者既存政党围绕这些议题重组联盟。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所谓新议题则表示为政体变化、市场改革或者全球化的冲突。在政体变革过程中,断层可能会被重新划定,旧的消失了,而新的又形成了。在智利,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把基于阶级分野的前威权政党体制,转变为威权秩序的支持者和要求民主的反对派之间相互对立的政党体制。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后,共产主义旧政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又出现了新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断层,由于产生了要求削减社会保障和国家服务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和希望保留这些制度的群体;以及要求宗教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的群体和坚持往日共产主义政权的世俗主义,也要求未来建成一个自由至上的社会的群体;至于在一些存在社会文化分裂的国家中,还沿着族群界线形成了政治分化(Kitschelt et al. 1999, 64 页;Grzymala-Busse 2002)。

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还面临着或者创建市场、并对其加以改进,或者使之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任务。经济自由化和向市场的经济转型,以至至少三种方式重塑了实现政治代表的环境。第一,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左翼政党、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以及中间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必须更新它们的政党纲领,甚至放弃长期奉行的意识形态原则。如果“与时俱进”的举措具有失去其铁杆选民的风险,那么这些政党就可能不再以纲领吸引选民,转而主张通过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提供个人服务和社区资源(Auyero 2001; Levitsky 2003)。

第二,这些变化削弱了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裙带关系。国有企业和社会服务的私有化,以及关键市场和经济活动的自由化,都十分有效地限制了把工作、利益和国家管

控用于政治目的的范围。此外,财政约束也保障了预算的行政主导,从而减少了政党以“滚木头”的方式进行政治分肥,或者提出个别预算修正案的机会。即便是承认在相当贫困或者失业率极高的地区,出于政治目的提供国家稀有资源、公开收买选票,或者直接为选民服务依旧是有效的选举策略,但与国家干预经济的全盛期相比,在国家干预后撤的时期,各政党已经不大可能在提供施惠性服务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并达成一致了。

第三,市场改革也改变了选民分布的格局。去工业化和经济自由化使得社会原子化,削弱了组织纽带和集体认同的社会基础,使社会分野变得高度不稳定,这就使各政党难以通过抓住部分选民,或者提出彼此迥异的意识形态和纲领来分割选举市场(Roberts and Wibbels 1999, 587页)。无组织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民众,更容易被全民型的、基于个人能力的,甚至“新民粹主义”的政党所吸引,后者没有组织,也没有建立组织的能力,因而更倾向于通过一种微弱的政党归属动员上述群体参与选举和政治活动(O'Donnell 1994; Roberts 1995; Weyland 1996)。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归属的稳定性会取决于政党与中间团体联系的强度。那些能够有效联系社会组织的政党,与这种联系已经遭到破坏的政党相比,在面临经济下滑和族群问题挑战的情况下,其力量基础会更为持久。

虽然结构变化会推动政党调整其选民动员策略,但这种调整不会自动发生,其具体形式也难以预测。我们必须小心,以免从制度主义的非结构主义<sup>①</sup>滑向一种新形式的结构决定论。对施惠性支出的新的限制,可能会促使政党用解决问题式的选民服务替代施惠关系,或者彻底发育吸引个人票源的策略而转向纲领型的代表方式。如果它们两方面都没做到,就有可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政党“天然”的选民基础的剥蚀,或者它们传递的信息不能令人信服,并不能充分说明纲领变化的方向和程度。它们并不能决定政党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是突出其与对手在经济或文化议题上的不同,还是仅仅强调自己在处理价值议题上的能力。关于政党在何种基础上动员选民,它们同样不能提供什么信息。在这里,联系党际竞争的策略维度是关键。在党派差异明显、政党的集体声誉和竞选诉求因而可以建立在纲领基础上的地方,政党候选人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维护这一纲领。但如果政党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候选人需要寻找其他基础动员选民,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提供施惠或者分肥,或是选区选民服务,以培育自己的个人得票。换言之,精英的党派分野,其明晰程度与政党代表培育个人选票的程度成反比。

这样一种框架有助于解释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政治—选民关系性质的变化。围绕国家政策的政党选举竞争,可以说明印度为何从一种以两个中间的、全民型的政党为基础的政党体制,转变为围绕社会断层组织起来的体制。切巴(Chhibber 1999, 135—136、

<sup>①</sup> 原文为“astructuralism of institutionalism”,含义不明。——译者

169、218 页)指出,当北方邦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采纳孟德尔委员会(Mandal Commission)报告的建议,规定政府雇员中的族群比例,同时扩大下等种姓的受教育机会时,印度人民党(BJP)就把反对规定族群比例、要求减少政府经济干预的上等种姓作为动员对象。类似的过程在阿尔及利亚也很明显。当油价骤降、民族解放阵线政府无法维持原有的支出水平时,中产阶级就抛弃了这个政党,转而支持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后者为迎合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在纲领中增加了批评计划经济的内容。在西班牙,来自共产党的日益严峻的竞选挑战,促使工人社会党(PSOE)改变其在经济分配政策上的立场,这反过来又促使右翼调整其纲领中的核心诉求,从它们提倡的那些不大受欢迎的社会和道德议题,转向供给经济学,并承诺降低税率(Chhibber 1999, 149—150、203—205、213—214 页)。政党在经济议题立场上的内部一致性和彼此之间差异的扩大,同样有助于解释巴西和捷克共和国政党纲领性认同的强化;而智利的国会议员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对选民的个人服务,则是因为各政党之间差异的缩小。

政党之间政策差异的广度,以及它们的主张与选民需要的趋同,还有助于解释这些政党与选民的联系的稳定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过大,可能会造成或强化政党断层,因为意识形态的极化,会把各政党锚定在相对稳定并且彼此不同的选区群体中;而意识形态的去极端化,则会使选民在一些并无实质差别政策和政党竞选纲领之间自由选择,结果会削弱集体认同,促使候选人基于个人能力吸引选民(Roberts and Wibbels 1999, 583、586 页)。此外,如果政党根据选民明确的政策需要制定其竞选纲领,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则它们就更能好地保持选民的党派忠诚。巴西和乌拉圭政党体制的不断强化,表明这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而委内瑞拉的政党则因为未能做到这一点,结果导致了政党体制的崩溃。

## 五、结 论

本章提出的问题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以哪些选民作为动员目标,如何,以及为何动员他们。四大洲有几十个新兴民主政权,其政党和选民之间的关系通常是脆弱而易变的。在一些国家,政党成功地从国家施惠的践行者,转变为以针对未来的意识形态和纲领性构想参与政治竞争的行为者;在一些以前实行一党制的国家,政治竞争的规模已经明显扩大,而在另一些国家,即使是不变的认同和稳固的忠诚也未能使政党体制免于剧烈变动。换言之,政党—选民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如果我们的理论解释不承认这一基本前提,对这一动态关系的根本前提有所了解,所作出的解释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不幸的是,大多数理论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大多数关于新兴民主国家政党—选民关系持续不稳定的解释都存在严重缺陷(参见 Mainwaring 1999)。这些国家长期高水平的选举波动,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完善尚待时日,也不是因为媒体的影响,或者对经济和政治表现的负面评价。政党是采取集中化的竞选和代表策略,还是放手让候选人各行其是?是通过制订纲领动员选民,还是提供施惠和分肥?是面向数量众多但没有明确立场的选民,还是立足于选民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断层?这一切都不可能由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来自选举规则和职业抱负的政党之间不同的回应方式预先决定。威权体制的遗产以及民主转型过程会影响这些选择,但旧体制的影响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作用、程度如何,在理论上依然未予澄清。

本章认为,政党动员和代表选民的策略,受到结构和政体变化,以及制度刺激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必须被置于策略性的政党间竞争环境下加以考察。政党可能会在国家、地区乃至个人层面混合使用各种策略。在提出这一观点的过程中,本章置疑了关于政党与选民关系的研究中两种较强的假设:首先,只要有可能,政党就会选择建立裙带关系的策略;其次,只有当选民在经济和人口学意义上具备相应条件时,政党才会通过制定纲领的方式对其加以动员。当然,政党也可能放弃裙带关系,因为选民可能更愿意接受公共品,特别是在存在国际和国内压力,要求更多政府回应的“透明性”,并且人们认为“因循政治”导致了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另外,断层也并非自然形成的,在不存在断层的地方,各政党能够、也的确围绕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分野构建彼此纲领上的差异。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对于政党—选民关系中需求的一面,以及出于政治目的建构的、并不反映符合重要的社会分化的断层能否长期存在等问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对党内回应及其政策影响的制度分析,通常把选民视为同质的单元,能够被分开,也能被重组,一如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就像一袋土豆的比喻(1972, 515页);而结构主义则假定,选民因经济和亚文化因素被区分为不同群体,它们之间的界限政党根本无法改变。另外,我们还缺乏优质的调查数据。我们过分依赖那些主要关注一般性的价值及对民主的看法的跨国数据,而相对忽略了国别选举调查,而恰恰是后者才能集中反映选民在重大议题上的立场,以及他们出卖选票的基本逻辑。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 Kitschelt et al. 1999),在对新兴民主国家的研究中,很少有像康弗斯和皮尔士(Converse and Pierce 1986)对法国所做的研究那样,与政党及其选民的重要性相称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另外,我们要准确评估新兴民主国家政党—选民关系稳定性,还需要提出更好的方法,以衡量政党对选民需求的回应程度。<sup>①</sup> 如果在将来,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性

<sup>①</sup> 辛(Shin 1999, 191页)提出了衡量政党表现的三个指标——参与政治的机会、为公共利益服务,以及提供不同的政策。也可参见(Powell 2000)。

的影响,国家在管理经济、提供公共部门职位以及分配社会服务方面都受到约束,同时公众对公共品的特殊主义分配方式越来越难以容忍,因而各政党必须依靠纲领进行竞争的话,这种衡量方法就尤其重要了。

在新兴民主国家最终稳定下来之前,这些问题都是开放的。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对政党归属、选票买卖行为,以及政党竞争的空间维度的研究重新联系起来。希望未来能够出现更多像我在本章中提到过的那种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想象力,而且能够得到经验支撑的真正的比较研究。

## 参考文献

- AMES, B. 2001. *The Deadlock of Democracy in Brazi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2002. Party discipline in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In Morgenstern and Nacif 2002: 185–221.
- AUYERO, J. 2001. *Poor People's Politics: Peronist Survival Networks and the Legacy of Evit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S.H., MCDONOUGH, P., and LÓPEZ PINA, A.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sanship in new democracies: the case of Sp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695–721.
- BARTOLINI, S., and MAIR, P. 1990. *Identi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Availability: The Stabilisation of European Electorates, 1885–19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IX, C. 1999. Sett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change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 609–24.
- BRADER, R., and TUCKER, J.A. 2001. The emergence of mass partisanship in Russia, 1993–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69–83.
- BRUSCO, V., NAZARENO, M., and STOKES, S.C. 2004. Vote buying in Argentin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9: 66–88.
- BURGESS, K., and LEVITSKY, S. 2003. Explaining populist party adaptation in Latin America: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party change in Argentina, Mexico, Peru, and Venezuel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 881–911.
- CALVO, E., and MURILLO, M.V. 2004. Who delivers? Partisan clients in the Argentine electoral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742–57.
- CAREY, J.M. 1996. *Term Limits and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SHUGART, M.S. 1995.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 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14: 417–39.
- CHHIBBER, P.K. 1999. *Democracy without Association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 System and Social Cleavages in Ind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OLLIER, R.B., and COLLIER, D.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

- 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TON, T.J. 2000.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NVERSE, P. 1969.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 139–71.
- and PIERCE, R. 1986.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Franc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 COPPEDGE, M. 2001. Political Darwinism in Latin America's lost decade. Pp. 173–205 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ed. L. Diamond and R. Gunth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RNELIUS, W. 2004. Mobilized voting in the 2000 elections: the changing efficacy of vote buying and coercion in Mexican electoral politics. Pp. 47–65 in *Mexico's Pivotal Democratic Election: Candidates, Voters, and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2000*, ed. J. Domínguez and C. Laws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x, G.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ISP, B. 2000.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Power and Incentives of Venezuelan Politicians and Interest Group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COBAR-LEMMON, M., JONES, B., JONES, M. and TAYLOR-ROBINSON, M. 2004. Vote-seeking incentives and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in six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1: 136–56.
- FREEDOM HOUSE. 2004. *Freedom in the World*. Available at [www.freedomhouse.org](http://www.freedomhouse.org).
- GIBSON, C. 2002. Of waves and ripples: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frica in the 1990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201–21.
- GIBSON, E. 1997. The populist road to market reform policy and electoral coalitions in Mexico and Argentina. *World Politics*, 49: 339–70.
- GRZYMALA-BUSSE, A.M. 2002.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GOPIAN, F. 2005. The rising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Brazil and Chile. Pp. 123–62 in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mprovement or Subversion?*, ed. L. Diamond and L. Morlin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JACOBSON, G. 2000. Party polarization in national politics. Pp. 9–30 in *Polarized Politics: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in a Partisan Era*, ed. J. R. Bond and R. Fleischer.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JONES, M. 2002. Explaining the high level of party discipline in the Argentine Congress. In *Morgenstern and Nacif 2002*: 147–84.



- SAIEGH, S., SPILLER, P. T., and TOMMASI, M. 2002. Amateur legislators—professional politicians: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y-centered electoral rules in a federal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656–69.
- KIRCHHEIMER, O. 196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Pp. 177–200 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J. LaPalombara and M. Wei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TSCHOLT, H. 2000. Linka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in democratic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845–79.
- KITSCHOLT, H. MANSFELDOVA, Z., MARKOWSKI, R., and TÓKA, G. 1999.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ENZI, M., and LAMBRIGHT, G. 2001.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30 African countries. *Party Politics*, 7: 437–68.
- LEMARCHAND, R. 1972.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ethnicity in tropical Africa: competing solidarities in nation-build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68–90.
- LEVITSKY, S. 2003. *Transforming Labor-Based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Argentine Peron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 M. 2001. Cleavages, parties and democracy. Pp. 3–9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Revisited*, ed. L. Karvonen and S. Kuhnle. London: Routledge.
- and ROKKAN, S.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Pp. 1–64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ed. S. M. Lipset and S. Rokkan. New York: Free Press.
- MAINWARING, S. P. 1999.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SCULLY, T. R. 1995.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TORCAL, M. 2006.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y system theory after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Pp. 204–27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Parties*, ed. R. S. Katz and W. Crotty. London: Sage.
- MARX, K. 197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orig. 1852). Pp. 436–525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 MORGENSTERN, S., and NACIF, B. 2002.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DONNELL, G. 1994.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55–69.
- PIATTONI, S. 2001. Clientelism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30 in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SNER, D.N. 2004. The political sali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why Chewas and Tumbukas are allies in Zambia and adversaries in Malaw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529-45.
- 2005. *Institu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WELL, G.B.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 and SPRAGUE, J. 1986.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MMER, K. 1991.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conomic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80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777-800.
- ROBERTS, K. 1995. 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Peruvian case. *World Politics*, 48: 82-116.
- and WIBBELS, E. 1999. Party systems and electoral volatility in Latin America: a tes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575-90.
- ROSE, R. 1995. Mobilizing demobilized voter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Party Politics*, 1: 549-63.
- SAMUELS, D. 2003. *Ambition, Federalism, and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Braz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Sources of mass partisanship in Brazil.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48: 1-27.
- SARTORI, G. 1969. From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s to political sociology. Pp. 65-95 in *Polit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S.M. Lips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TTER, P. 1992.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group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5: 422-49.
- SCOTT, J.C. 1972.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91-113.
- SELIGSON, A., and TUCKER, J. 2004. Feeding the hand that bit you: voting for ex-authoritarian rulers in Bolivia and Russia.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 SHEFTER, M. 1977. Party and patronage: Germany, England, and Italy. *Politics and Society*, 7: 403-51.
- SHIN, D.C. 1999. *Mas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Democratizing Kor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S.C. 2001. *Mandates and Democracies: Neoliberalism by Surprise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OM, K. 1997. Rules, reasons, and routines: legislative role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3: 155-74.
- SWINDLE, S.M. 2002.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personal vot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collective electoral incentives. *Party Politics*, 8: 279-300.
- TORCAL, M., and MAINWARING, S. 2003. The political recrafting of social bases of party competition: Chile, 1973-95.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54-84.
- UNO, S. In progress. Public support and democracy: identifying causal mechanisms for erosion of democra-

cy in Latin Americ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VALENZUELA, A. 1977. *Political Brokers in Chile: Local Government in a Centralized Po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ANTCHEKON, L. 2003. Clientelism and vot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Benin. *World Politics*, 55: 399–422.

WEYLAND, K. 1996. Neo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unexpected affinit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1: 3–31.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http://www.worldbank.org).

## 第二十五章 政治中的裙带关系\*

苏珊·C.斯托克斯(Susan C.Stokes)

按照大多数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观点,政治中的裙带关系迟滞经济发展,毒害民主制,并使独裁者的统治得以苟延残喘。裙带关系不鼓励政府提供公共品,并且使一些人因国家持续的贫困和选民对权力的依附而获得,因而迟滞了经济发展;它破坏了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使一些选民能够通过选票改变政策偏好,而另一些选民只能用选票掠取些许补偿,因而毒害了民主;它使独裁者得以窒息选举竞争,使反对派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有所表现,因而延长了独裁者的统治。鉴于这些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裙带关系的内部机制及其成因和后果。

### 一、定 义

#### 1.1 裙带关系

与大多数概念相比,人们对裙带关系的含义尤其莫衷一是。就裙带关系作为一种选举动员手段而言,我将其定义为通过提供物质利益换取选举支持,提供好处的标准只有一条:你是否已经(或将要)支持我?<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中,“提供物质利益”有时会采取威胁而非利诱的形式。略举数例:新加坡政府以停止住宅改善计划威胁那些要把选票投给反对派议员的地区

---

\* 感谢波瓦克斯(Carles Boix),布鲁斯科(Valeria Brusco),卢普(Noam Lupu)和纳扎雷诺(Marcelo Nazareno)对本文的意见和评论。

① 一种不同的现象,也许可以称之为政治献金或腐败(根据一国法律),是私人行为体向政治家和政党提供资金,以换取立法上的特权和其他好处。在这种关系中,资金的流向与裙带关系中相反:它不是从政治家流向个体行为者,而是从个体行为者流向政治家。

(Tam 2005);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基督教民主党代表,也威胁要以违反健康管理条件为名传唤那些支持反对派的食物杂货商(Chubb 1982);在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当地的产业大亨则威胁要解雇那些投票反对他们中意的候选人的公民(Urquiza 2006)。

正是选举支持这一分配标准,把裙带关系与其他物质导向的政治策略区分开来。比如,美国的“猪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分肥政治)”就与此不同,它指一种由一个或几个地域独享利益,而让所有地区付出代价的现象(Aldrich 1995, 30页)。<sup>①</sup>分肥暗含的标准是:你是否和我同处一个地区?纲领型再分配政治也与裙带关系不同,它指的是执政党(大多数情况下)出于选举的考虑,通过发布公共政策,从一些群体中汲取资源分配给另一些群体。决定谁能从再分配方案中获利的标准是:你是否属于特定的受益阶级(失业群体、退休群体或属于特定纳税等级的群体,等等)?<sup>②</sup>纲领型利益因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它把非受益阶级的资源重新分配给受益阶级,而在受益阶级中,任何符合条件的个体都不能被排除在外。裙带关系正好与此相反,它是一种欠债还情的交易,好处只会分配给那些向施惠者提供了支持的人。

我的定义与基切尔特和威尔金森的定义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公民—政治家之间的联系“通常以直接的物质利诱为基础,它们针对个人或公众小群体。因为政治家们清楚,这些人对此类小恩小惠非常敏感,愿意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出卖自己的选票”。他们称之为“施受惠基础上的选民—政党关系”(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7, 10页)。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或至少不同的)定义。其中之一把“施受惠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定义为“两个具有不同地位、权力,或者资源的个人之间的……垂直的双向同盟,其中双方都认为与高于或低于自己的人结盟对自身有利。”(Landé 1977, xx页)。这一定义中,“双边”部分强调裙带关系面对面的特点,而“同盟”部分则强调这种关系可以重复发生。

另一些学者把裙带关系比较狭义地定义为用公共部门的职位交换政治支持(参见Robinson and Verdier 2003, 第2页)——这被大多数学者称为施惠(*patronage*)关系。还有的研究者从施受惠双方所交易的内容来定义这个概念。斯科特认为,这是一种“实用性的朋友关系,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施惠方)运用其影响和资源来向地位较低的个体(受惠方)提供保护或利益,或同时提供这二者,受惠方则通过向施惠方提供支持和帮助,包括提供个人性的服务,以为回报。”(James Scott 1972, 92页,重点为引

<sup>①</sup> 萨菲尔说,该短语“可能来自内战前的美国,那里会定期从大桶中取咸猪肉分配给奴隶”(Safire 1993)。

<sup>②</sup> 这些区分是概念而非经验上的,采用裙带策略的政治家,可以同时提供公共性和纲领性的利益再分配(参见Magaloni, Diaz-Cayeros, and Estévez 2006)。

者所加)。惠塔克(Whitaker)在其对穆斯林酋长国政治的讨论中也指出,在裙带关系中,“恩惠、经济安全和保护能够用来交换个人忠诚和服从”(引自 Lemarchand 1977, 102 页)。

斯科特的定义提出了如下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受惠者才不再简单地通过市场购买,而从某个他认识的、地位比他高的人那里获取保护和利益?能够购买人们需要的保护和利益的市场可能不存在,也可能相当发达。或者,此类保护和利益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但它们潜在的消费者(受惠者)却没有充足的资源(收入),以保障他们能够从一个非人格性的卖家那里买到这些商品。但是,低收入的、财产有限的受惠者拥有大量其他资源:时间、选票、他们可以施加影响的潜在的支持者网络,等等。总的来说,受惠者一方物质上的贫乏,是裙带关系的各种定义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因素。

斯科特的定义还要求我们关注受惠者在安全和保护方面的利益。在很多地方,安全和保护是作为公共品由国家提供的。因此,如果把斯科特定义中的两个要点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裙带关系会盛行于那些普遍贫困且国家机构相对软弱无力的社会。

## 1.2 买票和施惠

在探讨并提出了我自己对裙带关系的定义之后,我们再讨论两个相关的概念,即买票和施惠。在我的用法中,买票和施惠是裙带关系的下位概念。在裙带关系,双边关系中地位较低的一方要提供广义的选举支持,包括自己的选票、并为施惠者争取其他人的选票,买票则仅指用好处(利益和保护)交换选票。选择卖家的标准是:你是否已经(或将要)为我投票?这就再次与分肥和纲领性再分配形成了对比。

施惠则是指公职人员为回报得到的选举支持而向支持者提供公共资源(最典型的是公共部门的职位),这里的分配标准也是裙带式的:你是否已经——或将要——为我投票?因此,施惠与广义的裙带关系有所区别。在裙带关系中,权力更大的政治行为体可能担任也可能没有担任公职,因此,也许能够也许不能保证受惠者一定得到公共资源(这与比如政党资源不同)。在施惠关系,施惠者担任公职,并分配国家资源。这一定义与其他学者的定义相同,如曼瓦林就把施惠定义为“为获取政治利益而在非任人唯贤的基础上使用或分配国家资源”(Mainwaring 1999, 177 页)。这里对裙带关系与施惠的区别,也与麦迪纳和斯托克斯对于经济垄断与政治垄断的区分相一致。前者指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施惠者都对某些物品实行垄断;后者则指施惠者只有担任公职才能实施垄断(Medina and Stokes 2007)。经济垄断的例子是乡村共同体中的谷物储运机。机器的主人可以仅为已经或者即将为其投票的人提供便利,而不论选举结果如何。政治垄

断的例子是公共雇员的职位,施惠者只有在赢得选举之后,才能用它来奖励或惩罚选民。

某种关系是更为宽泛的裙带关系还是施惠——是基于经济还是政治垄断——对于结果很重要。在政治性垄断之下,希望把施惠者赶下台的选民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因为他的下台是一件公共品,然而在多数人并不反对他的情况下,投反对票的人就要承担受到报复的风险。每个希望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选民都会投票支持一位不得民心的施惠者,同时希望其他所有人(或者至少多数人)投他的反对票。但是,由于所有选民的动机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得民心的施惠者会一直保有权力。

这就意味着,在施惠或者政治垄断普遍存在的国家,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并不等于它(或者它的纲领)受到人们的欢迎。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一个执政党的例子。虽然它的民众基础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但它一直拥有权力,并持续赢得选举(参见 Magaloni 2006)。

## 二、裙带关系研究的两次浪潮

战后关于裙带关系的学术成果大体上来自两次研究浪潮,它们分别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涌现,以及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所激发。由施密特、斯科特、朗德和戈斯蒂编撰、并于1977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读本《朋友、追随者与派系》(Schmidt, Scott, Landé, and Gausti, eds.,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所收录和再版的论文,都是在1950年至1974年,特别是1964年之后的10年间首次发表的。重要的专著(如恰布关于意大利南部裙带关系和施惠问题的研究)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裙带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开始发生转变。

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关于政治裙带关系的研究再度繁荣。除期刊论文和专著大量涌现之外,2007年之后,还出现了三部针对相关问题的新的文集。<sup>①</sup>两次浪潮中涌现的著作在很多方面有所区别,包括所研究的政权体制(第一次浪潮并未关注政体问题,第二次则主要集中于民主制之下的裙带关系)、应用的基本概念范畴、采用的分析模式,以及产生的学科影响等。第一次浪潮主要是从人类学、其次是从社会学中得到启示,而第二次则受到了经济学的推动。

### 裙带关系的悖论

施惠者与受惠者的关系是个悖论。它涉及不平等的行为体——奴隶与主人、附佣

<sup>①</sup> 它们是 Piattoni(2001)、Schaffer(2007)、Kitschelt and Wilkinson(2007)。

与封主、佃农与地主、工人与雇主、选民与政党领袖。他们之间形成这种关系,一方面是自愿的,但从权力较小一方的角度来看,又意味着剥夺。用基切尔特的话来说,裙带关系“既涉及互惠与自愿,又导致剥削与支配”(Kitschelt 2000, 849 页)。由此引申,可以想象裙带关系中必然处处暗藏着背叛和欺骗。那么为何这种关系会持续存在,即便是切断这种关系对受惠者一方更为有利?因此,我们需要找到那些把施惠者与受惠者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因素。

很多早期(甚至还有部分最近的)研究认为,这种社会因素就是规范。规范是一种重要的、得到广泛认可的观念,其表现形式是“某事该做”(Elster 1989)。古德纳指出,“互惠的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性,它包含两重要求:“(一)人们应当帮助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以及(二)人们不应伤害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Gouldner 1960, 171 页)。在裙带关系中,处于上位的一方通过给予处于下位的一方礼节性的馈赠强化互惠这一规范,而这种馈赠,如同自然的、实用性的馈赠一样,(也许)能够导致一种礼尚往来的义务感。斯科特对个人化的、持续的关系中规范性的心理特征进行过深入探讨。施受惠关系之所以与一般人际关系不同,是因为

这种关系所具有的面对面的个人化的性质。形成并巩固施受惠关系的持续的互惠模式,常常会在双方之间产生信任和情感。当受惠者需要一小笔贷款,或者需要有人为其向当局求情时,他知道他可以依靠施惠者;反过来,施惠者也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他的人”会帮助他完成计划。而且,双方相互之间的预期还受到共同体的价值和礼俗的支持。(Scott 1972, 94 页;着重表示为原文所有)

在很多强调规范的裙带关系研究者看来,互惠规范能够把义务从一个领域推广到其他领域。“曾经限于某种特定交易的互惠关系,由此导向了双方累积性的或替代性的交易”(Lemarchand 1977, 106 页)。勒马昌德援引的实例包括:在塞内加尔,施受惠关系从封建和宗教义务领域外溢到部族政治中;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裙带关系从土地所有权扩展至牛群所有权;在尼日利亚的依巴丹(Ibadan),商业中的裙带关系蔓延到地方政治之中。通过引用沃菲尔(Wurfel)记录的事例,斯科特指出,菲律宾的政治家“的确喜欢个体性而非集体性的联系,因为他希望建立某种个人性的裙带义务”(Scott 1972)。总之,之所以强调裙带关系中社会规范的作用,不仅因为它可以防止双边关系中从属一方的反抗,而且可以把这种从属关系普遍化。

另一种迥然不同的理解裙带交易的思路认为,它之所以能够把受惠者与施惠者联系在一起,并不是通过形成某种互惠的规范,而是以中断好处输送相威胁。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这一视角更切合世纪之交(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裙带关系研究者的发现。当然,这种视角在第一次浪潮的研究中并非全然不存在。巴特在其经典著作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领袖》中强调：“礼尚往来，两不相欠，因此馈赠并不形成权威……单方面的馈赠……如同贿赂与薪酬一样，并不能有效地使接受方产生服从施予方命令的义务。”他认为：“馈赠和善意之所以成为控制他人的有力手段，不是因为它们所造成的回报义务，而是因为接受方希望它们能够持续。持续的馈赠创造了需求，也助长了依赖，因此，终止馈赠的威胁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约束机制”（Frederick Barth 1959, 77页）。

巴特基于利益的解释，与40年后布鲁斯科及其合作者们的观点如出一辙。后者认为，（阿根廷的）选民之所以服从一种潜在的裙带契约，“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服从，他们会在未来失去那些细微的好处”（Brusco et al. 2004, 76页）（唯一的差别在于，斯瓦特巴坦人中的“履足者”的收入，比他们的赠予对象“饥饿者”要多数百倍，因此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馈赠绝非“细微”）。

如果说第一次浪潮中就有某些研究认为，联系受惠者和施惠者的基本因素是后者对前者中止回报的恐惧的话，那么第二次浪潮中也有一些研究继续强调受惠者对施惠者的规范性义务观念。一位菲律宾观察者如此解释竞选馈赠的力量：“一旦某人给予我们一些东西，比如某种恩惠，我们就应该尽一切力量来报他的恩典，有时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引自 Schaffer and Schedler 2006, 32页）

与此类似，对于地方政党活动家是否以提供免费药品作为交换条件，动员其参与政党集会这一问题，一位阿根廷庇隆主义党的受惠者回答说：

不……我知道我必须跟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一起去。因为她给了我药品，或者牛奶，或者一袋茶或糖，我知道我必须和她一起去参加集会，以履行我对她的义务，表示我的感激。（Auyero 2001, 160页）

活动家们利用这些友好和感激的情感来获取选票。一位庇隆主义活动家在儿童节庆典上整整忙碌了一天以发放礼物，然后表示：“你如何耕耘……就如何收获选票。我不必盯着他们……选票总会来的。”（Auyero 2001, 82页）

但阿耶罗的研究表明，在受惠者的观念中，友好感情背后的工具主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位因得到药品、牛奶和糖，出于感激而参与集会的受惠者补充说：“如果我参加（庇隆主义活动家的）集会，那么当我需要什么东西时，她就不会再给我了。（她会说，）‘去找和你一起参加集会的那个人要吧’。”（转引自 Auyero 2001, 160页）

总体而言，研究者们或者强调规范，或者强调个人利益，但很少把他们的结论付诸经验验证。有一个例外就是布鲁斯科、纳扎雷诺和斯托克斯的研究（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4）。我们询问阿根廷的访谈对象，在竞选中收到带有目的性的好处的民众，是否感到有义务为提供好处的政党投票。认为有义务的受访者仅比不认为有这种

义务的受访者稍多一点点(51%对43%)。但事实上,那些认为有义务的人可能永远得不到好处。与我们调查样本的一般状况相比,他们一般都是富人、非庇隆主义者,而且来自大城市。他们似乎是在解释他人而非自己的经历。我们还询问受访者,他们是否认为收到馈赠的人应该有义务用选票加以回报。结果发现,在阿根廷即便存在要求“礼尚往来”的政治互惠规范,它也远远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我们的样本中,有十分之九的民众表示,在竞选中收受好处的选民不必感到有义务要用选票加以回报(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4, 81页)。我们不能确认是否这些结果仅仅反映了一国一时的特殊性,但是它们的确表明,政治互惠的规范并非普遍存在,而且很可能在反向的政治动员面前不堪一击。

### 三、裙带关系与诚信

受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第二次浪潮的着眼点从规范转向了对报复的恐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对政党如何运用个人化的,或者有目的性的激励以动员选举支持进行了形式化的解释。其基本理念是,政党可以不必借助影响各阶级选民之间资源转移的公共政策,而是依靠对个体选民提供物质激励,以增大胜选的可能。迪克齐特和朗德里甘(Dixit and Londregan 1996)称之为与“纲领型”再分配相对的“策略型”再分配。<sup>①</sup>这类形式化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如果政党非常了解它们的选民,且能够有效地向那些最有可能用选票对其加以回报的选民提供好处,那么这么做就有利可图。采用这一策略的政党会锁定所谓的铁杆选民:政党清楚了解他们的需求(Dixit and Londregan 1996)或选举倾向(Cox and McCubbins 1986),因此政党为他们耗费资源的风险极小(Lindbeck 和 Weibull 1987)。

马加罗尼、迪亚兹—卡耶罗和伊斯特维兹(Magaloni, Diaz-Cayeros, and Estévez 2006)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风险规避是一种可变的特质,甚至对于不同时期的同一政党来说也是如此。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可以解释政党对不同策略的运用(在某些时段和某些选区使用纲领型策略,在其他时段和选区则采用裙带策略)。

这种把裙带关系理解为选举策略的理论面临一个困难,即它没有充分考虑诚信的

<sup>①</sup> 他们的区分并非严格来自我在上文中所做的区别。他们所谓的纲领型再分配,指基于分配正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并通过所得税(以及财产税,不过相对较少)实行的再分配。策略型再分配(他们也称之为“分肥”)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再分配,他们给出的例子是对某些产业的补贴,或是把军事基地设置在某些选区。由此他们回避了真正个人化的利益,尽管他们的理论中似乎也涉及针对个体选民的分配和监控。

问题。<sup>①</sup> 收受一包食物、并(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同意用选票予以回报的投票人,可以在选举日轻易反悔,特别是在得到秘密投票制度保护的情况下。的确,引入秘密投票制度,就是为了保护选民免受选票交易带来的这种隐性强制。但是,诚信的问题是双向的:一个在选举前为换取选票向受惠者作出承诺的政党,也会在此之后忘记自己的诺言。

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考虑一场施惠博弈。按照迪克齐特和朗德里甘的说法,某个得到青睐的群体的成员,只有在施惠党获胜的情况下,方能享受策略性再分配的利益。投票人首先要决定是守信并为该政党投票,还是背信并投票反对它。当然,作为政党,只有胜负两种可能。如果政党获胜,它可以选择是奖励选民还是拒绝奖励;如果败选,则奖励无法兑现,博弈也就此结束。图 25.1 是这一博弈的延展形式。图中的排列顺序表明,选民要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前选择是守信还是背信(政党方面显然只有在得知自己胜选后才会采取行动)。

如果选民为政党投票,则其所得为  $v$ ; 而每当政党兑现奖励,它的损失为  $-r_p$ 。假定  $v > r_p$ 。对于政党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得到选票而不必为其付出;但它宁愿选择通过付出得到选票,而不是拒不付出而失去选票。在这一博弈中,选民在意识形态上温和地反对施惠党,因此他们最期待的结果,是获得奖励并投票反对这个党;但如果非投票则不能得到奖励,则他们也会为该党投票。这样,选民对结果的偏好顺序如下:  $(r_v + d) > (r_v + c) > d > c$ 。

如果政党胜选,其主导策略将是拒绝向选民提兑现奖励。无论选民是守信还是背信,拒付奖励对政党都更有利。从选民的角度来看,由于知道即便政党胜选也不会兑现奖励,因此对他们来说更好的选择是背信,并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中意的政党投票。这样,政党永远不会兑现奖励,而选民的选择,则完全由分配前支持或者反对某个政党的偏好所决定。

即使选民在意识形态方面倾向于为施惠党投票,但真正推动他们投票的,也是这种偏好而非施惠党的承诺。就政党来说,背信也能够得到更多好处。因此,选民会无视施惠党的承诺,仅仅根据意识形态投票。结果同样是政党不会提供任何好处,而它的承诺也不足以改变投票者的选择。

但是我们知道,受惠和买票的确在发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模型的问题。让我们暂且超越研究者们提出的这一单局博弈模型,回到裙带关系的众多研究者的洞见,即这是一种面对面的、而且长期持续的关系。裙带关系的“馈赠”和施惠不仅直接推动民

<sup>①</sup> 例外请见 Robinson and Verdier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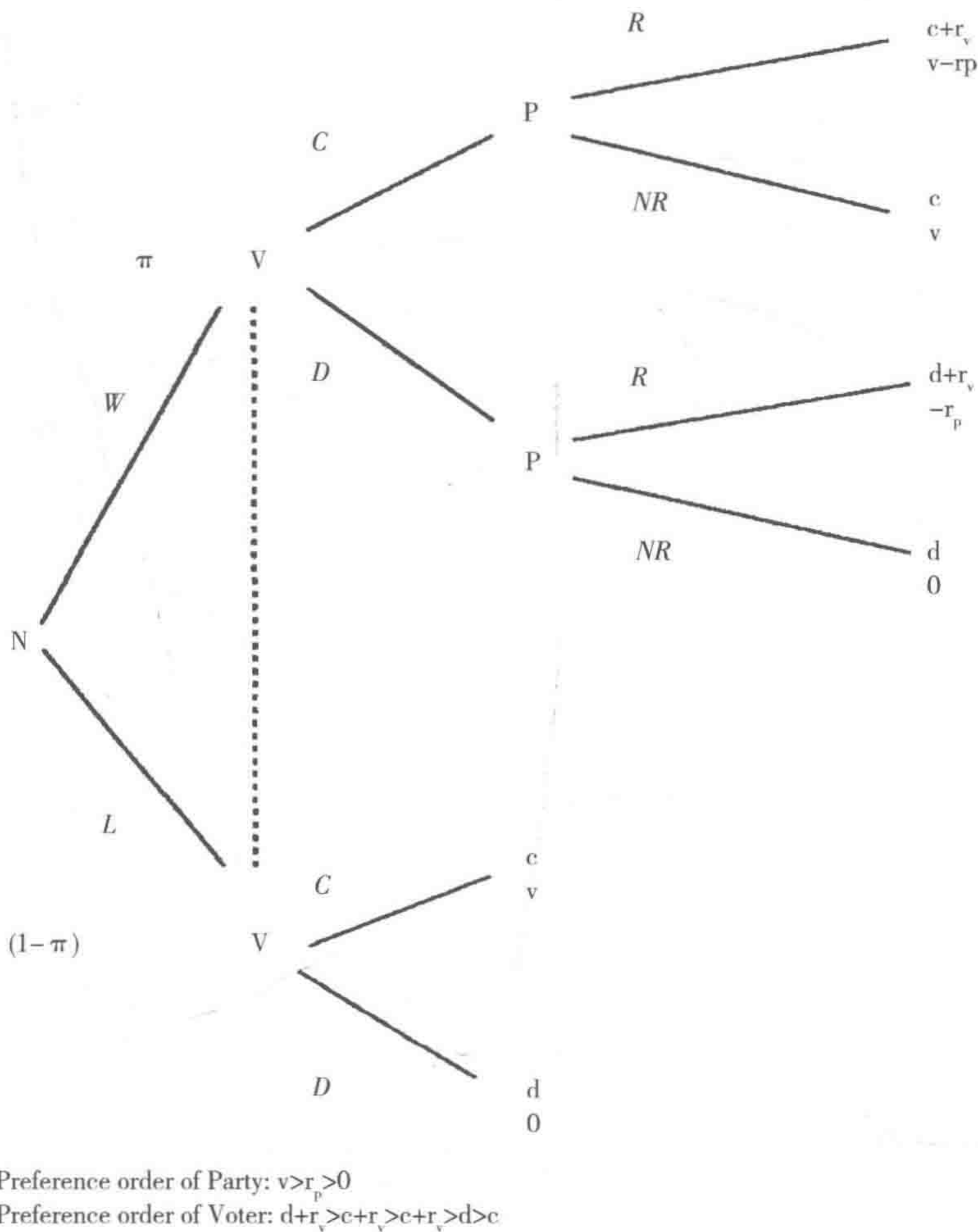


图 25.1 选民与可能的施惠者(是否予以奖励取决于是否当权)之间的单局博弈

政党偏好顺序:  $v > r_p > 0$

选民偏好顺序:  $d + r_v > c + r_v > d > c$

众为施惠党投票,而且强化了施惠者和受惠者共同置身其中的社会网络。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裙带关系,即这种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双边关系的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网络为其成员提供了有关其他成员的信息,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邻居和同事是投票还是弃权、是支持这个党还是那个党、是出身于共产主义者还是基督教民主党人家庭(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是庇隆主义者还是激进分子,等等)。对于陌生人,这些信息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裙带主义政党借助置身于这些社会网络中的活动分子,他们正如王和克鲁兹曼所说的台湾(地区)竞选经纪人,是“行走的当地知识百科全书”(Wang and Kruzman 2007, 94 页)。这种地方知识使政党活动分子能够有充分的理由,推断接

受了该政党给予的好处或职位的选民,究竟是自始至终地支持该政党,还是转向了其他党。网络使裙带主义政党绕开了秘密投票的阻碍。

政党可以运用这种信息奖励与之合作的选民,并惩罚背信之人,也就是说,它可以使选民对自己的投票行为负责。不过,与民主理论颂扬的那种回应制不同,这是一种“反向回应”,即政党要求选民对其行为作出回应(Stokes 2005)。

由于施惠者和受惠者内嵌于社会网络之中,我们可以用重复博弈模拟裙带关系。选民的偏好为:

$$u_i = -1/2(v_i - x_i)^2 + r_{vi}$$

其中,  $v_i = \{x_1, x_2\}$ , 表示为施惠党或其反对党所投的票,  $x_i$  代表选民  $i$  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立场,  $r_{vi} = \{0, r\}$ , 它表示与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投票相比,通过选票交易得到的报酬的值。因此  $-1/2(v_i - x_i)^2$  就是为两政党之一投票的外在表现价值。

表 25.1 表现了这一博弈的规范形式,而表 25.2 则是简化后的收益状况。考虑一位选民的情况,从意识形态或纲领的角度,他温和地反对施惠党。如果没有任何激励措施,他会为其反对党投票;但如果该党为其提供某种回报( $r$ ),那么与这位选民为施惠党的反对党投票、且得不到任何报酬的情形相比,他的收益就会有所提高。因此,他的偏好顺序为:

$$1/2(x_i - x_2)^2 + r > -1/2(x_i - x_1)^2 + r > -1/2(x_i - x_2)^2 > \pm(x_i - x_1)^2$$

表 25.1 裙带主义政党与选民博弈的规范形式

选 民	政 党	
	回 报	没有回报
守 信	$1/2(x_i - x_1)^2 + r, v - r$	$1/2(x_i - x_1)^2, v$
背 信	$1/2(x_i - x_2)^2 + r, -r$	$1/2(x_i - x_2)^2, 0$

另一方,裙带主义政党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在无须支付回报的情况下得到该选民的投票,但如果必要的话,也愿意为得到选票而提供回报。因此政党的偏好顺序是:

$$v > v - r > 0 > -r$$

表 25.2 表明,裙带主义政党与对其持温和反对态度的选民之间处于囚徒困境。双方都希望在买票交易中“合作”,政党支付回报而选民支持政党。但如果选民为该党投了票,则后者可以通过拒付回报获得更大收益;而如果该党拒付回报,则选民投票反对它可以得到更多收益。

在单局博弈中,买票最终无法实现选票。但在重复博弈中,双方能够合作进行选票

交易。他们可以通过实施“触发策略”来做到这一点。据此,对在两个策略(为裙带主义者投票,或者兑现回报)中背信的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在未来的每一次选举中予以惩罚。选民的最小最大值,即裙带主义政党所能迫使他接受的最低收益,是  $-1/2(x_1-x_2)^2$ ;即便他被迫放弃了回报,他仍然能够为反对党投票。政党的最小最大值是 0;对于背信的选民,它至少总是能够拒付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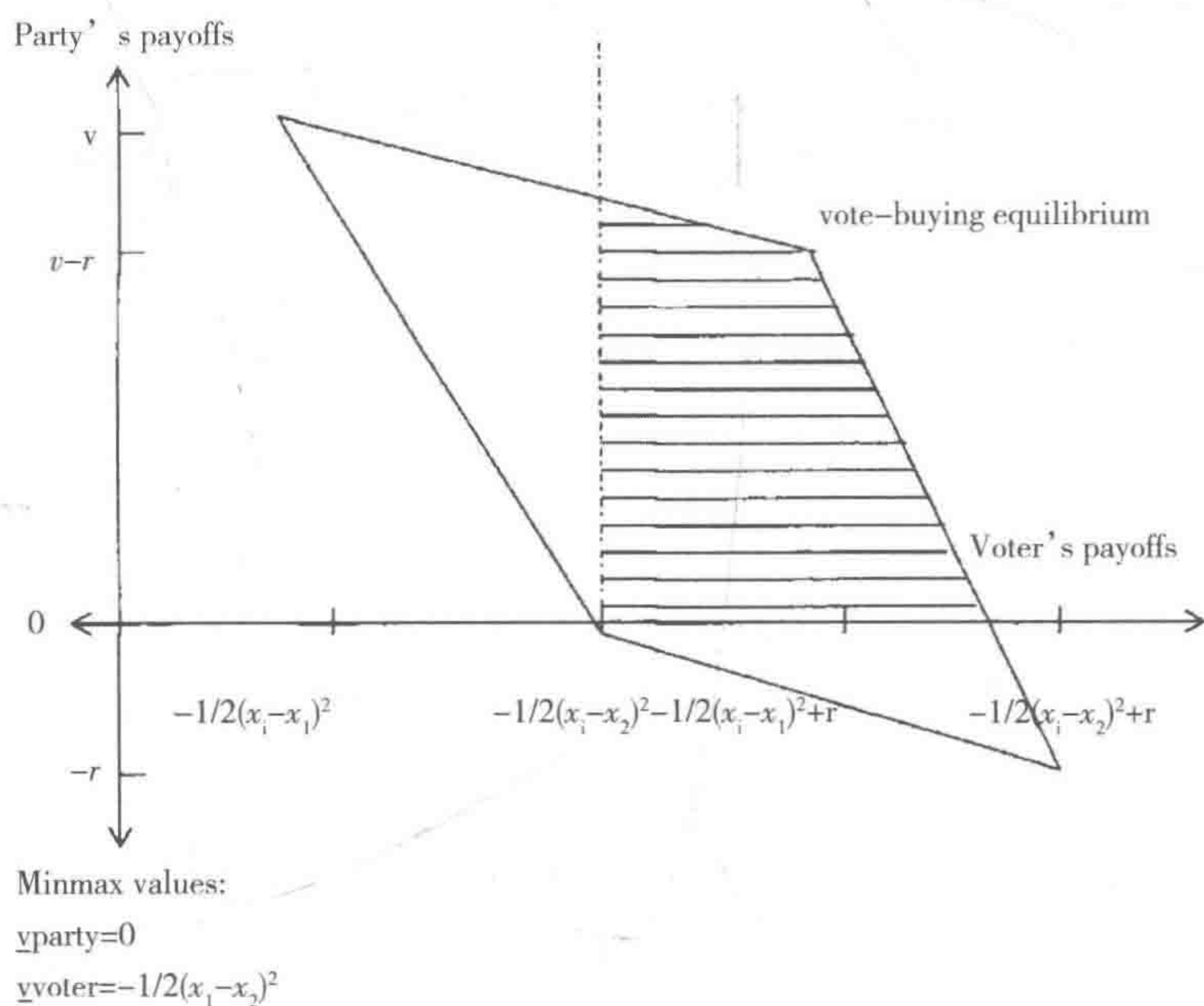


图 25.2 裙带主义政党与持温和反对态度的选民重复博弈中可能且对各方合理的收益组合

如图 25.2 所示,这些最小最大值使我们能够界定双方可以实现的、对各方合理的收益,其中包含了当买票实际发生时的一对最小最大值,即  $-1/2(x_1-x_1)^2+r, v-r$ 。根据“大众定理”,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中,如果参与者保持耐心,那么所有可行的、对各方合理的收益会达成一种均衡,因为“只要参与者有耐心,那么在一次违规行为中获得的任何收益,都不足以弥补未来每一次遭受的、哪怕是微小的效用损失”(Fudenberg and Tirole 2002, 153 页)。不过需要注意,图 25.2 中的买票均衡点只是诸多可能之一,因为整个阴影区域都反映可能的、对各方合理的收益。

从上述博弈引出了几个假设:

- 裙带主义政党直接监视选民个人的能力越强,买票就越容易发生;
- 投票越不透明、秘密性越强,买票就越不容易发生;
- 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越接近,买票越容易发生;

- 回报或个人性的激励对选民越有价值,买票越容易发生(Stokes 2005)。

表 25.2 裙带主义政党与持温和反对态度的选民博弈的规范形式,收益已被简化

选 民	政 党	
	回 报	不回报
守 信	3,3	1,4
违 信	4,1	2,2

#### 四、受惠者:铁杆支持者还是摇摆不定的选民?

把裙带关系理解为受惠者与政党之间内置于社会网络的重复博弈,还可以让我们了解裙带主义政党试图吸引的选民本身的特性。裙带主义政党无需用拉拢利诱的手段吸引忠实的选民,因为无论是否得到回报,他们都会支持该政党,因此即便政党不再提供回报,他们也未必撤回支持。拉拢利诱手段对于死硬的反对派选民也没有意义。与上文讨论过的温和的反对者不同,这类死硬的反对派在意识形态上对该政党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回报的价值,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会为回报而对其表示支持。<sup>①</sup> 不持立场的,或者温和对该政党的选民(即那些对它的反感能够被得到的回报压倒的人)是买票的理想目标。这一模型因此预示了一种针对边缘的或者摇摆的选民的策略:政党只会向那些不持立场的,或者仅在意识形态或纲领层面对其持温和反对态度的人,而不会对它的坚定支持者示恩。

一些研究已经验证过这一关于铁杆选民和摇摆选民的假设,但它们面临着某种方法论上的困难。在那些使用生态数据的研究中,调查者通常把执政党向过去为其大量投票的选区分配资源的做法视为铁杆选民策略的证据。但是,那些支持该政党并因此获得了公共资源的选民,在过去之所以支持该政党,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就得到过资源。因此,应该谨慎对待“铁杆”或者“忠实”这类概念。所谓“忠实”的选民,是那些一定会接受馈赠的、而非在意识形态方面支持裙带主义政党的选民。在理想状态下,生态研究应该控制过往选举中带有目的性好处的影响。依靠调查数据的研究面临它们特有的内生性问题:是某人(自述的)对政党的友好态度使他接受了那些好处,还是那些好

<sup>①</sup> 因此裙带主义政党温和的反对者的偏好顺序是: $-1/2(x_i - x_2)^2 + b > -1/2(x_i - x_1)^2 + b > -1/2(x_i - x_2)^2 > -1/2(x_i - x_1)^2$ ;而死硬的反对者的偏好顺序则是: $-1/2(x_i - x_2)^2 + b > -1/2(x_i - x_2)^2 > -1/2(x_i - x_1)^2 + b > -1/2(x_i - x_1)^2$ 。

处使他对该政党变得友好？或者，那些自称不持立场的选民，是否实际上是被所得到的好处软化的反对者？

经验研究注意到这些问题，因而描绘了一幅混合的图景。安索拉贝希尔和斯耐德（Ansolabehere and Snyder 2002）发现，美国那些传统上为州长所属政党提供高度支持的郡县，总是能从州政府得到更多的转移支付。他们同时发现，在州政府的执政党发生变化之后，转移支付的分配重心也转向那些为新的执政党提供了大量选举的县。

还有一些研究使用生态数据，在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检验了关于铁杆选民与摇摆选民的假设。马加罗尼（Magaloni 2006）在对墨西哥的研究中发现，革命制度党在反对党控制地区的社会项目上投入很少，在选民最有可能通过弃权而背信的地区则大量投入，这表明该党采用的也是一种边缘选民策略。雅拉胡安（Péter Yarahuan 2006）的发现正好相反，即执政党在分配社会项目时更偏向支持自己的选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并歧视反对派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体现的是铁杆选民策略，至少在1994年的选举中情况就是如此（参见 Hiskey 1999）。萨蒂（Schady 2000）在对秘鲁的一项反贫困项目支出的政治运作进行研究时发现，藤森政府重点照顾的是“边缘”选区。在藤森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和其后的一次全民公决中，他的支持和反对者的力量几乎是旗鼓相当。

在阿根廷，同样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两种假设。韦兹—夏皮罗（Weitz-Shapiro 2006）发现，在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执政末期和德拉努阿（De la Rúa）政府执政初期（1999—2001），失业救济金的分配偏向于摇摆选区，即两个政党力量对比非常接近的地区。纳扎雷诺、布鲁斯科和斯托克斯（Nazareno, Brusco, and Stokes 2006）也使用生态数据证明，获胜的政党在过往选举（有时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与反对党的选票差距越小，其在人事雇用方面支出的预算比例就越高。不过，斯托克斯（Stokes 2005）在对选举馈赠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上述证据并不具有决定性。虽然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党没有向坚定的反对者提供选举馈赠（根据她的模型，向这类选民提供馈赠是一种浪费），但它却向不持立场的选民、边缘选民和支持该党的选民提供了好处。她的推断是，裙带主义政党通常会把裙带式的馈赠和意识形态的诉求结合起来。在选区拉票的党的跑腿会带着一包食物或一项职位雇用的承诺造访某位选民，但他也会解释该党纲领的种种好处。在双方面对面的物质动员过程中，政党也会进行说教，原本不持立场的投票人，也会变得像是该政党忠实的选民。

总之，大部分经验数据说明，裙带主义政党争取的目标是边缘的，或者摇摆不定的选民，但也有例外。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对这一差异加以说明。如果延续迪克齐特和朗德里甘、科克斯和麦克库宾，以及马加罗尼等人的研究思路，则导致这一差异的关键因素可能是风险。如果政治家面对的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群体，又希望使得得不偿失的风



险最小化,或者如果政治家不愿冒险,那么他们就会使用铁杆选民策略。最近的一些研究,把重点放在(用 Cox 2006 的术语)“动员”(号召选民投票,而不是弃权)而非“说服”(改变选民关于应该投谁的票的想法)上面,这可能会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

## 五、原因与后果

### 5.1 为什么贫困会助长裙带关系?

我们看到,在裙带关系的定义中,受惠者的贫困是一个基本要素。的确,对政治裙带主义的定性研究,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这种关系是贫困国家的显著特征。这一研究的对象包括 18 世纪的荷兰(Randeraad and Wolfram 2001),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英国(O'Gorman 2001),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希腊(Mavrogordatos 1983),19 世纪晚期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城市(Wilson and Banfield 1963; Reynolds 1988),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冰岛(Kristinsson 2001),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意大利南部地区(Graziano 1977; Chubb 1981, 1982),南亚(Weiner 1967; Chandra 2004; Wilkinson 2006; Krishna 2007),东南亚(Landé 1965; Scott 1972),非洲(Lemarchand 1977; Wantchekon 2003; van de Walle 2007),保加利亚(Kitschelt et al. 1999);以及从墨西哥(Fox 1994; Magaloni 2006; Magaloni, Diaz-Cayeros, and Estévez 2007)到阿根廷(Levitsky 2003; Calvo and Murillo 2004; 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4)的整个拉丁美洲每个国家。由于很难提出对裙带关系进行跨国比较的定量测量指标,所以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跨国比较研究还比较缺乏。但只要对相关的定性研究稍事了解即可发现,虽然裙带关系并非(过去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的独有特征,但它在这些国家远比发达民主国家要普遍得多。<sup>①</sup>

更不清楚的是情况为何如此。学者们在无意之间,对裙带关系与贫困的联系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根据第一种也是最为常见的解释,馈赠的价值对穷人比对富人要高得多,因此,若要提供好处,目标自然是穷人(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参见如 Dixit and Londregan 1996; Calvo and Murillo 2004)。第二种解释认为,穷人不愿冒险,因此对他们来说,今天的些许好处,比关于明天的再分配性公共政策的许诺更有价值(参见如 Desposato 2007; Wantchekon 2003; Kitschelt 2000; Scott 1976)。正如基切尔特所言:“贫穷而未受教育的选民不考虑未来,他们只顾眼前,注重当下的利益。因此,裙带主义交易看得见的好处,总是胜过间接的、纲领性的联系,它们只能为选民承诺未来的、不确定

<sup>①</sup> 尽管跨国定量研究尚付诸阙如,但我们仍可以从田野研究(参见 Wantchekon 2003)和调查研究(参见 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4)所得出的系统数据中收获良多。后一研究明示,阿根廷政党在总体上更可能从贫困而非富裕的选民那里收买选票。

的利益。”(Kitschelt 2000, 857 页)

一项研究得出的数据质疑了关于风险规避的解释。布鲁斯科、纳扎雷诺和斯托克斯(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6)发现,阿根廷的穷人的确比富人更不愿意冒险。但是,风险规避对于某人是否愿意出售选票并没有直接影响。通过比较两位同样贫困的选民发现,更不愿意冒险的一位,并不比另一位更倾向于出售自己的选票。

第三种解释与前两种略有不同,认为不是贫困本身,而是收入不平等助长了裙带关系(参见如 Hicken 2007; Stokes 2007; Robinson and Verdier 2003)。如果用于买票的资源与一国的平均收入同步增长,那么经济发展就不会提高买票的成本。但是,如果裙带主义的成本要由不断增加的(上层)中产阶级支付,而且其对象也在(下层)中产阶级中不断增加,那么随着接受方的获利越来越多,这种转移对于供给方带来的痛苦也越来越多,因而供给方的抗拒也会越来越强。而且,要监控其他选民的行为,对中产阶级来说机会成本更高;当选民的收入分配向中间集中并在低收入端减少时,政党要在社会网络中维持其存在,并且监控个人的投票行为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还有一种观点干脆认为,并非贫困导致裙带关系,而是裙带关系制造了贫困。裙带主义政党为了维持政权,就必须迟滞收入的增长。恰布指责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认为是它为便于采用裙带主义和施惠政策而刻意保持选民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从而导致了该国南部地区的不发达。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在政府官员热衷于提供私人物品的国家(参见 Robinson and Verdier 2003),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依赖相对生产率不断下降的公共品垄断部门的国家(Medina and Stokes 2007; 并参见 Lyne 2006),其推动发展的公共品供给必然不足,而这也是导致裙带关系的原因。当然,裙带关系与贫困之间,也可能存在一种互为因果关系。

## 5.2 制 度

**选举规则。**一些分析者发现,从直观上看,鼓励为个人投票的选举制度同时也会鼓励裙带关系(参见 Hicken 2007; Kitschelt 2000)。基切尔特分析道:

个人化的选举竞争,允许候选人和选民去组织、监督和实施选举支持与来自权力的好处之间的直接交易。在复数选区制中,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为候选人个人、而不是政党的候选人名单投票,这就为个人化的交易提供了可能。如果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个人得到的选票不被汇集起来计算整个政党得到的席位,及其/或者政党领导不能控制候选人名单的决定权,则政治家建立裙带关系的动机就会进一步加强(Kitschelt 2000, 859 页)。

这一解释的缺陷,在于它忽略了候选人的个性化的诉求与个人化的、面对面的选民

动员之间的差别。尽管两者具有贬低议题和纲领的共同点,但它们在其他方面仍然颇为不同。注重候选人个人物质的竞选,会求助于大众传媒,并且依赖高度集中的政党结构。相反,裙带主义政党和竞选依赖的则是一大批捐客,他们事实上要监控选民。如果集中化的领导,或者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能够绕开这些分散的捐客,也就是说用激动人心的演讲和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取代分散的选票收买,那么他们当然乐于如此。因此,竞选的个人化与裙带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如果我们把个人化的选举规则与裙带关系的盛行联系起来,则有可能误入歧途。不过,这种争论本质上仍然是理论性的,大概只有当我们找到某种有关裙带主义的有效的跨国衡量标准,并据以评估选举规则对这一现象的影响,情况才会有所改观。

*对施惠和买票的法律限制。*今天,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对施惠和买票设置了法律限制。它们制定了规范官僚系统人员招募的法律和规章,并禁止选票交易。根据谢夫特(Shefter 1977, 1994)影响甚广的分析,在那些选举权得到普及之前,公务员已经实现专业化的国家,施惠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在选举权普及之前,没有经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国家,施惠现象则比较普遍,因为在后一类国家,政党有更多的自由通过提供公共职位动员大众的支持。

谢夫特的解释还留下了一些未经解答的问题。为什么公务员的专业化有些地方早有些地方晚?在某些情况下,虽然专业化的公务员系统已经存在,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还是对其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取消了它的独立性,并使之成为施惠的主要源头。例如,在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治下的巴基斯坦就曾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国家从英属印度时期继承了一套独立的、专业化的文官系统,但布托1973年的改革却使之成为自己的政党,即巴基斯坦人民党(PPP)的施惠工具(参见Baxter et al. 2002)。在类似的事例中,限制施惠和买票的法律规章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上。

*选票。*政府和政党用来使选民表达其投票决定的技术手段,也会对裙带关系产生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公开的、非匿名的投票制度为监控选民的选择提供了便利,从而也为裙带关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20世纪初,大多数独立且经历过民主制的国家,都已废除了口头表决制,并代之以秘密投票制,从而大大减少了选票交易的空间。然而,现在实行的一些投票形式和投票制度仍然使政党有可能推测个体选民的投票选择。例如,西班牙的投票制度是在半公开的情况下提出政党候选人名单(ticket ballot,只列出某个政党候选人姓名的名单),选民们可以选择是在有遮挡的投票间中,还是公开地将他们选择的政党名单装入信封(法国和部分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也使用这种对政党候选人名单选票的方式)。还有一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拿马和乌拉圭,采用的是政党投票制(party ballots),选票由各政党提供,而且(竞选行政

职位的)个人候选人的姓名与政党候选人的名单分别印在不同的选票上。

澳大利亚投票制与政党候选人名单投票和政党投票制都不同。在澳大利亚式选票上,以相同的格式列出了所有竞选某一职位的个别候选人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名单,选票由公共机构在严密管理的条件下准备,并在选举之前一天或者选举日当天发放给选民(Converse 1972)。根据雷诺德和斯丁贝格(Reynolds and Steenbergen 2005)的统计,当今有85%的国家使用澳大利亚式选票,15%的国家使用我所说的政党候选人名单投票和政党投票制。

政党投票制特别有利于买票,这并非是因为选票的格式,而是因为它们由政党提供,因而通常能够在选举之前分发给选民。选票发放成为选民动员过程的一部分,与选票一起分发的,还有食物、建筑材料或者其他个人化的好处,传递的信息也非常明确,即希望选民用投票回报这些恩惠。布鲁斯科、纳扎雷诺和斯托克斯(Brusco, Nazareno, and Stokes 2004)发现,直接从政党代表那里获得选票的阿根廷选民,明显地更愿意收受竞选馈赠,并报告说这些馈赠影响了他们的投票。

因为制订规则反对施惠和设计选票防止买票的都是政治家,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规则在约束裙带主义方面能否发挥独立的作用,或者这些规则只有在具备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发展使裙带关系不太有效、对政治家的吸引力也随之下落之后,才会具有生命力。另外在某些情形下,政党可能会把揭露选票收买和选举腐败作为竞争手段,从而形成了实行选票和其他制度改革的选举动机。人们可以在墨西哥、台湾地区和阿根廷发现这一动态过程。正如一名阿根廷政治家所说,在所有这三个地区,反对党的政治家都告诫选民们:“好处照收,选票照投”(引自Szwarcberg 2001)。

有关裙带型政党向纲领型政治转型的说明,为我们了解助长裙带主义的因素提供了线索。勒霍奇和莫里拉(Lehoucq and Molina 2002)认为,20世纪40年代哥斯达黎加买票现象减少的原因,是匿名投票制的引入和买票成本的提高,后者意味着,经济发展也许是裙带主义现象衰落的一个原因。

上文提到过,根据图25.2,裙带关系的均衡点,只是诸多可能的均衡之一。夏菲尔和谢德勒指出,虽然一般认为消费品市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明显的选票交易与当下民主的自由和平等规范相冲突”(Schaffer and Schedler 2006,第6页)。因此它易于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在秘鲁,一个得到左翼组织者和激进宗教人士追随的进步主义军人政权,号召人们牢记自己的公民身份,他们理应得到公共服务,是因为自己纳了税,因此无需作为受惠者乞求特别的恩宠(Stokes 1995)。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随着墨西哥的逐步民主化(在2000年达到高潮),裙带关系和买票现象渐趋衰落。一项由米托夫斯基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5%的选民在

2000年的选举前收到过竞选馈赠；“墨西哥2000”面板调查则估计该比例略低于15%（参见Cornelius 2004）。<sup>①</sup> 科尔内琉斯表示，无论从哪个数据来看，裙带主义与过去相比都有所减少。勒霍奇（Lehoucq 2006）和科尔内琉斯认为，经过了1994年全面改革的墨西哥联邦选举局（IFE），在减少裙带关系和买票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加罗尼同意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分析了墨西哥的执政党即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愿意赋予联邦选举局独立下限的原因。她认为，执政党这么做，是为了让反对党接受选举的合法性。与非法选举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相比，即便有可能失去政权，公平的选举仍然是一种更好的结果。

*裙带关系的制度后果*。探讨裙带关系制度原因的研究比较少，而对这一现象的制度后果研究就更少。在一篇颇具开创性的论文中，德波萨托（Desposato 2007）研究了裙带关系对立法机构中各政党的影响。他认为，在立法机构中，运用裙带策略的政党与通过提供公共品动员选举支持的政党表现有所不同。裙带主义政党所做的，就是不顾一切拿到公共资源，并通过个人渠道进行分配；而当它们作为反对派的时候，它们在立法方面就毫无章法。以公共品为导向的政党则会努力提供此类物品，并以此赢得支持；同时，无论执政与否，它们在立法方面都表现出更多的一贯性。德波萨托比较了巴西两个州的议会，一个州裙带关系盛行（皮奥伊），另一个地区则几乎不存在这种关系（巴西利亚）。<sup>②</sup> 他发现，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两个地区议会中政党的表现的确有所不同：巴西利亚议会中提出法案的频率比较高，而皮奥伊州议会中反对党的立法很少协调一致。

### 5.3 裙带关系和施惠的有效性

裙带关系的大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假定这是一种选举策略。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提供裙带好处的政党，与它不采取这种策略相比，会得到更多的选票。通常情况下，政党当然不会采取无效的策略。然而，还是有一些理论分析让我们相信，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实行裙带主义。在上述重复博弈中，买票均衡点只是诸多可能的均衡状态之一。

收受不得人心的当政者好处的选民，会找到某种方法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对他投反对票，墨西哥选民最后就是这么做的（Magaloni 2006）。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特别是在新兴民主国家，政党对它们所采取的策略的结果，常常也得不到充分的信息，那么对

<sup>①</sup> 但是在2006年的总统竞选中，“数百万贫穷的墨西哥人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不为各种候选人投票，就会被排斥在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计划之外，而主要是乡村地区的人，则因投票而收到40美元至60美元不等的报酬”（Alianza Civica，引自《华盛顿邮报》2006）。

<sup>②</sup> 在巴西的行政区划中，首都巴西利亚称为联邦区，与普通的州有所区别。——译者

于有些时候它们自掘坟墓的做法,我们也就不必惊奇了。<sup>①</sup>

已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裙带关系的选举后果,其中大部分是在美洲。在美国,列维特和斯奈德(Levitt and Snyder 1997)研究了分肥支出(根据上文的定义)对于随后的众议院选举的影响。他们发现,联邦开支每增加 100 美元,<sup>②</sup>现任者的得票率就能增长 2%。<sup>③</sup> 在秘鲁,罗伯兹和阿尔克(Roberts and Arce 1998)发现,藤森政府中执行反贫困项目的部门在 1994 年和 1995 年初的人均支出,与藤森在 1995 年(再次)选举中的得票率正相关。

不过裙带关系和施惠并非总能奏效。卡尔沃和穆里罗(Calvo and Murillo 2004)发现,阿根廷庇隆主义党治下的省份,每千人中的公共部门雇员数目越多,则该党在随后选举中的得票率就越高。但在由阿根廷另一个主要政党激进公民联盟控制的省份,公共部门雇员的数量对于该政党的得票率却没有明显影响。纳扎雷诺、布鲁斯科和斯托克斯(Nazareno, Brusco, and Stokes 2006)运用更为分散的(地方政府)数据,发现了类似(甚至更明显)的结果:属于激进公民联盟的市长的施惠行为,反而降低了该党的得票率。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庇隆主义者控制的)联邦政府有针对性地减少失业计划中的支出,也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因素(如贫困)的情况下,庇隆主义党的市长得到的人均支出,有望比激进主义联盟的市长多一倍,然而,把这些钱花到由激进主义联盟控制的地方,会在下一场选举中明显减少该联盟的得票率。但是,如果把同样的钱花到由庇隆主义党控制的地方,就能增加当地庇隆主义者在随后选举中的得票率。<sup>④</sup>

与列维特、施奈德一样,纳扎雷诺及其合作者们也认为,那些清楚自己在选举中会遇到麻烦的市长可能会花更多的钱。但是,即便这种加大了力度的施惠行为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得票率,但施惠本身也可能给人们带来负面的印象,从而降低了当权者的支持率。我们由此面临着一个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并不是支出导致了糟糕的选举表现,而是(预期的)不佳选举表现导致了更多的支出。为处理这一可能性,纳扎雷诺及其合作者使用了一项工具变量:前一次选举中的支出。不过,尽管纠正了内生性问题,结果

① 在当前语境下的党内策略之争,如到底是采取“对空”策略(广告,宣传)还是“对地”策略(买票,面对面的动员),表明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确定哪种策略能够奏效。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人均增加 100 美元之误。——译者

③ 众议员争取联邦支出是一个潜在的、被忽视的变量,这是个事实,而他们就考察了这一事实,这是他们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引入同一个州其他选区的联邦支出,作为工具变量。

④ 此句原文为“...Peronist mayors could expect to receive about twice as much funding per capita as Radicals, and spending in Radical-controlled municipalitie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adical vote share in the next election.”疑有误。——译者

还是不变:激进公民联盟的施惠行为减少它自身的得票率。

为什么裙带主义的支出会使花了钱的政党反受其害呢?对于一些选民,特别是更为富裕和自主的选民来说,这种支出恰恰是政府无效和无能的体现。阿根廷激进民主联盟,这个基本上由中产阶级选民支持的政党因施惠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的确发人深省。

## 六、结 论

政治裙带主义,即用物质资源换取政治支持,可以被理解为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持续交易的一部分。要维持这种交易,依靠的是对背信的威胁而不是互惠的规范,或者也可能是威胁加规范。结合把施受惠关系视为一种面对面的持续过程的传统观点,我们可以把此类交易模型化为一种重复博弈,并以此克服双方的诚信或者背信的问题。理论和经验研究明确了在何种条件下,铁杆和边缘的选民都会成为裙带主义政党争取的对象(或受益者)。裙带关系与贫困和不平等之间具有内在关联,两者可能互为因果。个人化的竞选、选票设计和法律限制等机制,也可能对政党究竟是采用裙带型策略还是纲领型策略产生影响。

当然,还有许多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有待进行。贫困(不平等)与裙带关系之间的亲缘性是确定的事实,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机制,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尚不明确。我们倾向于把裙带关系视为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双边关系,在选举语境中,就是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需要考虑至少三个行为体的策略互动:政党领袖、政党活动分子和选民。关于政党活动分子,我们拥有某些细致的经验信息,如王和克鲁兹曼(Wang and Kruzman 2006)对于台湾地区国民党活动分子出色的研究,但它们对于理论构建的意义还有待挖掘。另外,我们还希望更多地了解,各政党在对其采用的方法进行策略性考量时彼此之间的互动。最后,我们对裙带主义与制度(从选举制度这样的宏观机制到选票设计这样的微观机制)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比较粗浅。只有我们对裙带主义获得了充分的理论认识,并且通过系统的比较数据对其加以验证,我们才能找到驯服政治裙带主义的武器。

## 参考文献

- ALDRICH, J.H. 1995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SOLABEHRE, S., and SNYDER, J. M., Jr. 2002. Party control of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arty expenditures. Typescrip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UYERO, J. 2001. *Poor People's Politics: Peronist Survival Networks and the Legacy of Evit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ARTH, F. 1959. *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the Swat Pathans*. London: Athlone.
- BAXTER, C., MALIK, Y. K., KENNEDY, C. PL., and OBERST, R. C. 200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 A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BRUSCO, V., NAZARENO, M., and STOKES, S. 2004. Vote buying in Argentin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9(2): 66–88.
- 2006. Clientelism and risk. Typescript. Yale University.
- CALVO, E., and MURILLO, M. V. 2004. Who delivers? Partisan clients in the Argentine electoral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742–57.
- CHANDRA, K. 2004. *Why Ethnic Parties Succeed: Patronage and Ethnic Head Counts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Counting heads: a theory of voter and elite behavior in patronage democracies. Pp. 183–239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UBB, J. 1981. The social bases of an urban political machine: the case of Palermo.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6(1): 107–25.
- 1982. *Patronage, Power, and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NVERSE, P. E. 1972. Change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Pp. 263–337 in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ed. A. Campbell.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ORNELIUS, W. A. 2004. Mobilized voting in the 2000 elections: the changing efficacy of vote buying and coercion in Mexican electoral politics. Pp. 47–65 in *Mexico's Pivotal Democratic Election: Candidates, Voters, and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2000*, ed. J. I. Dominguez and C. Laws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x, G. 2006. Voters, core voters,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Type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Cox, G. W., and MCCUBBINS, M. D. 1986. Electoral politics as a redistributive game. *Journal of Politics*, 48(2): 370–89.
- DESPOSATO, S. W. 2006. How does vote buying shape the legislative arena? Pp. 144–79 in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 R. C. Schaffer.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DIXIT, A., and LONDREGAN, J.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of special interests in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58: 1132–55.
- ELSTER, J.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x, J. 1994.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clientelism to citizenship: lessons from Mexico. *World Politics*, 46: 151–84.
- FUDENBERG, D., and TIROLE, J. 2002. *Game Theory*, 8th ed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OULDNER, A. 1960.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2): 161–78.
- GRAZIANO, L. 1977.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 in southern Italy. Pp. 360–78 in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ed. S. W. Schmidt, J. C. Scott, C. Lande, and L. Guast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CKEN, A. 2007. How do rules and institutions encourage vote buying? Pp. 68–89 in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 F. C. Schaffer.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HISKEY, J. 1999. Does democracy matter?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KITSCHELT, H. 2000. Linka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in democratic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845–79.
- and WILKINSON, S. eds. 2007. Citizen-politician linkages: an introduction.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SFELDOVA, Z., MARKOWSKI, R., and TOKA, G. 1999.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ISHNAN, A. 2007. Politics in the middle: media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state in rural north India. Pp. 298–383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ISTINSSON, G. H. 2001. Clientelism in a cold climate: the case of Iceland. Pp. 172–92 in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S. Piatto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DE, C. H. 1965. *Leaders, Factions, and Parties: The Structure of Philippine Politics*. Yale Southeast Asia Monograph Series 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7. Introduction: the dyadic basis of clientelism. Pp. xiii–xxxvii in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ed. S. W. Schmidt, J. C. Scott, C. Lande, and L. Guast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HOUCQ, F. E. 2007. When does a market for votes emerg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Pp. 48–67 in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 F. C. Schaffer.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and MOLINA, I. 2002. *Stuffing the Ballot Box: Fraud, Electoral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osta 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MARCHAND, R. 1977.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ethnicity in tropical Africa: competing solidarities in nation-building. Pp. 100–23 in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ed. S. W. Schmidt, J. C. Scott, C. Lande, and L. Guast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VITSKY, S. 2003. *Transforming Labor-Based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Argentine Peronism in*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TT, S.D., and SNYDER, J.M. Jr. 1997. The impact of federal spending on House election outco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1): 30–53.
- LINDBECK, A., and WEIBULL, J. 1987. Balanced budget redistribution as the outcome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ublic Choice*, 52(3): 273–97.
- LYNE, M. 2007. Rethinking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voter's dilemma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Pp. 335–80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GALONI, B. 2006.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Z-CAYEROS, A. and ESTÉVEZ, F. 2007. Clientelism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a model of electoral invest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 Mexico. Pp. 381–429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INWARING, S.P. 1999.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VROGORDATOS, G.T. 1983. *Still-Born Republic: Social Coalitions and Party Strategies, 1922–193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DINA, L.R., and STOKES, S. 2007. Monopoly and monitoring: 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clientelism. Pp. 150–82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ZARENO, M., BRUSCO, V., and STOKES, S.C. 2006. Réditos y peligros electorales del gasto público en Argen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46(181): 63–86.
- O' GORMAN, F. 2001. Patronage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in England, 1700–1860. Pp. 54–76 in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S. Piatto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ÉREZYARAHUAN, G. 2006. Policy making and electoral politics: three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in Mexico, 1988–2003.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PIATTONI, S. ed. 2001.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NDERAAD, N., and WOLFFRAM, D.J. 2001. Constraints on clientelism: the Dutch path to modern politics, 1848–1917. Pp. 101–21 in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S. Piatto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YNOLDS, A., and STEENBERGEN, M. 2005. How the world vote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ballot design, innovation, and manipulation. *Electoral Studies*, 25(4).
- REYNOLDS, J. 1988. *Testing Democracy: Electoral Behavior and Progressive Reform in New Jersey, 1880–192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ROBERTS, K., and ARCE, M. 1998. Neoliberalism and lower-class voting behavior in Peru.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1(2): 217–46.
- ROBINSON, J., and VERDIER, T. 200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lientelism. Type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SAFIRE, W. 1993. *Safire's New Political Dictionary*. London: Random House.
- SCHADY, 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enditures by the Peruvian social fund (FONCODES), 1991–199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89–304.
- SCHAFFER, F. C. ed. 2007.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and SCHEDLER, A. 2007. What is vote buying? Pp. 24–47 in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 F. C. Schaffer.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SCHMIDT, S. W., SCOTT, J. C., LANDE, C., and GUASTI, L. eds. 1977.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OTT, J. C. 1969. Corruption, machin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1142–58.
- 1972.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91–113.
-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EFTER, M. 1977. Party and patronage: Germany, England, and Italy. *Politics and Society*, 7: 403–51.
- 1994.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S. C. 1995. *Cultures in Conflict: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in Peru*.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5. Perverse accountability: a formal model of machine politics with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 315–25.
- 2007. Is vote buying undemocratic? Pp. 117–43 in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 F. C. Schaffer.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SZWARCBERG, M. L. 2001. Feeding loyalties: an analysis of clientelism, the case of the Manzaneras. Typescript. Universidad Torcuato di Telia.
- TAM, W. 2005. Political insecurity and clientelist politics: the case of Singapore. Type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URQUIZA, E. Y. 2006. Las eternas internas: política y faccionalismo en un municipio radical, 1983–1999. Pp. 57–80 in *Democracia local: clientelismo, capital social, e innovación política en Argentina*, ed. S. Amaral and S. Stokes. Buenos Aires: Eduntref.
- VANDE WALLE, N. 2007. Meet the new boss, same as the old bos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Africa. Pp. 112–49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

- 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C.-S. and KURZMAN, C. 2007. Logistics: how to buy votes. Pp. 90–116 in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 F. C. Schaffer.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WANTCHEKON, L. 2003. Clientelism and vot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Benin. *World Politics*, 55: 399–422.
- WASHINGTONPOSTFOREIGNSERVICE. 2006. Dirty politics “ingrained” in Mexico. June 26, p. A16.
- WEINER, M. 1967. *Party Building in a New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ITZ-SHAPIRO, R. 2006. Partisanship and protest: the politics of workfare distribution in Argentina. Typescript. Columbia University.
- WILKINSON, S. I. 2007. 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party-voter linkages in India. Pp. 238–97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J. Q., and BANFIELD, E. 1963. *City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第二十六章 政治行动主义:新的挑战与机遇

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

政治行动主义的研究,对公民参与的方式、导致他们如此参与的过程,以及这些行动的结果加以比较。确立这一研究领域标准范式的,是一些受社会心理学传统影响的奠基性的著作,它们包括:Almond and Verba(1963),<sup>①</sup>Verba and Nie(1972),<sup>②</sup>Verba, Nie, and Kim(1978),以及 Barnes and Kaase(1979)。<sup>③</sup>

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参与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大多数倾向于反思之前数十年间提出的理论框架以及主要是基于调查的研究。例如,帕里、墨瑟尔和戴伊重述了他们在英国的主要发现及其采用的方法(Parry, Moyser, and Day 1992)。但到90年代,研究者已经在几个主要的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此过程中,一些基于标准的社会心理学模型的、关于个人资源和文化态度的重要性的假设,得到了重要的完善,甚至是全面的修改。在短短一章的篇幅里,不可能对快速增加的文献作出全面的回顾,而且其他学者也对美国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因此我们在此主要讨论比较政治学中几个方面的发展,并分析它们的影响。<sup>④</sup>这篇综述将强调过去十年间出现的四个关键的论题,包括:(一)正式规则的制度环境对选举结果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二)成熟民主国家党员数量的普遍减少及其后果;(三)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激发下,对自愿团体及社会信任的研究兴趣得到了实质性的复苏;以及最后(四)各种形式的目标导向型行动主义的扩展,包括示威和抗议、消费者政治、职业利益团体,以及更为分散的新型社会运

---

① 参见 Almond and Verba(1980)。

② 参见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1995);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2001)。

③ 参见 Marsh(1977); Jennings and van Deth(1989); Adrian and Apter(1995)。

④ 关于近来对大量关于美国的研究文献的回顾,参见 Schlozman(2002)。

动和跨国倡议网络蔓延。在简单介绍围绕这些议题的学术文献之后,本章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若干思考,并以此作结。

## 一、政治参与的标准社会心理学模型

受阿尔蒙德和维巴著作影响的研究,记载了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政治参与水平,并区分了政治行动的模式。虽然经验研究运用了多种方法,包括案例研究、焦点小组访谈、实验,以及形式模型等,但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政治参与研究中,主导的方法还是对样本调查的分析。这些研究得到了一系列现有已经众所周知的、关于大众行动主义的分布及其动因的发现。(一)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选票是唯一一种涉及大多数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二)此外,只有极少数人涉及那些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常规政治参与,包括竞选和政党工作、联系议会议员,以及社区组织工作等。(三)被视为行动主义的一个特殊类别的抗议政治,如示威、请愿和政治性罢工等,同样仅局限于少数精英。(四)在回答什么人会成为积极参与者这一问题时,维巴和奈伊基于他们提出的“底线模型”(“baseline model”)认为,结构性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教育质量、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分布,以及性别、年龄和族群等相关因素。(五)与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密切相关的文化态度,对于刺激参与也非常重要。如果人们感到能够充分了解信息、所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有关、而且行动能够产生效果,或者他们非常在意相关结果,以及他们认为能够使事情有所不同的话,他们参与的可能性就更大。(六)在较小的程度上,政治中行动主义也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维巴和奈伊指出,投票率会受到选民登记程序,以及选民所属的动员机构,如工会或政党的影响。但是,由于占据支配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每个国家全体成年人口代表样本的个人层面的调查分析,所以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并不是很充分(Books and Prysby 1988; Huckfield and Sprague 1995)。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至少80年代末,上述核心论断一直是教科书中的通行观点。其间,在调查基础上针对某些国家和特定参与类别的研究,重申或者确证了结构资源与文化态度的重要性。<sup>①</sup>

当然,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上述论断也远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例如,以唐斯(Downs 1957)和奥尔森(Olson 196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反对社会心理学关于习惯性参与形式的诸多核心假设,而强调对于“成本”和“收益”的有意识的计算。

<sup>①</sup> 参见 Milbrath and Goel(1977); Bennett(1986); Conway(2000); Teixeira(1992)。

关于公民参与对民主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看待调查研究反映的公众参与广泛缺乏这一基本事实,是接受它,还是把它作为对参与理想的背离加以谴责,在规范理论家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分歧。<sup>①</sup>以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952)为首的学派认为,只要自由公正的、定期举行的、有不同政党和政治家参与的选举能够保证代议民主制的合法性,则有限的公众介入就足以确保政府稳定并对选民负责。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公民的关键作用,在于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有权利、也有机会通过选举“把坏蛋赶下台”,而不在于介入公共政策制定的日常过程。希宾和泰斯—莫尔斯提出了该理论的最新版本(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3)。他们认为,美国民众并不希望更多卷入大部分政治的决策,相反,大多数人对于政治论争、妥协和冲突解决等纷纷扰扰的政治事务普遍反感。熊彼特式的视点强调,民主的基础不仅在于参与,也在于竞争和回应的价值。由于公民参与中存在持续的社会不平等,因此由他们进行直接决策具有严重的缺陷。根据这一观点,主要的政策挑战是如何形成有效的政治制度,以促进政党竞争和保证领导者对公众负责,这对于那些正处于转型和巩固过程中的民主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与之相反,那些追随卢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G.D.H.柯尔传统的研究者,如巴伯(Barber 1984)则提倡一种“参与型”或“强的”民主制。这种观点在美国较为流行,它把广泛的公众参与,包括对慎议讨论、社区群体和非集中化决策的广泛介入,视为民主的基本条件(Gutmann 和 Thomson 2004)。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行动主义具有多重价值,因为它可以通过强化公民意识、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提高社会宽容、促进普遍的互助互惠以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而使人向善;亦可通过产生更优良的决策和更合法的结果,促成更负责和更有效的政府。根据这一观点,主要的政策挑战在于为公共慎议和社区决策创造新的机会,其具体途径包括强化公共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使用全民投票和公民提议,以及通过其他的社区决策形式(包括互动式的政府协商过程、邻里委员会和地方市政会议等)等。

## 二、投票结果与规则的重要性

维巴和奈伊提出的标准的投票参与社会经济模型,承认选举体系和行政程序之外广泛的制度背景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具有核心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在最近几十年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比较研究文献,它们试图寻求解释不同国家投票结果的差异、并且提高

<sup>①</sup> 参见 Held(1996)总括性的讨论。

公共参与的水平。这些研究更多地强调有关选民登记和投票的制度规则与法律安排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同时影响了投票过程中行动主义的“成本”和“收益”。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机构(IDEA)自1945年以来一直追踪着世界各国议会和总统选举中选民参与的情况,该组织汇编的选举数据库大大加强了关于选举结果的比较研究(Lopez Pintor and Gratschew n.d.)。各国选举委员会和其他官方机构搜集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世界许多国家有关选举的行政和法律程序的相当准确的信息,包括选民注册、选举资格认定、义务投票制的实行、多日投票,以及为选举和政党募集的公共基金的程序等(Massicotte, Blais, and Yoshinaka 2004)。新的信息通讯技术,比如电子投票在瑞士、爱沙尼亚和英国的使用,对选举管理、选票形式和投票过程的影响,也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Kersting and Baldersheim 2004)。

最近关于投票结果的大量研究,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情况的比较,以期对制度的效果加以评估,比如研究在已经采用义务投票制的国家这一制度的影响,以及投票方式改革,如全面邮寄选票制(all-mail ballots)的效果。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确认,制度背景在累积层面对选民登记和投票结果都具有重要影响。例如,鲍威尔比较了29个民主国家的投票结果,并且分析了社会经济环境、宪法框架以及政党体系的作用。这一研究证实,义务投票的相关法规、自动注册程序,以及有力的政党—社会团体联盟都会提高投票率,而在一党独大、政府中不存在政党轮替的国家,政治参与水平会比较低(Powell 1980, 1982, 1986)。杰克曼和米勒(Jackman and Miller 1995)研究了21个工业化民主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选举参与状况,他们发现,政治制度和选举法规,包括选举比例、多党制和义务投票制等,能够很好地解释投票结果的跨国差异。<sup>①</sup>在此基础上,布莱斯和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一项更大规模的比较研究,他们分析了91个选举民主国家1972年至1995年议会选举中投票数和注册选民数的比例,发现投票结果受到多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义务投票制的实施、投票年龄、选举制度,选举结果的接近程度、政党数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的大小等等(Blais and Dobrzynska 1998; Blais 2000)。与此相似,富兰克林、欧克和奥本赫斯(Franklin, van der Eijk, and Oppenhuis 1996)比较了欧洲议会直选中的投票结果。他们发现,15个欧盟成员国在投票参与水平的不同,很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系统性的制度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是否采取了义务投票制、选举制度中的选举比例,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与各国选举在时间上的接近程度。罗斯(Rose 2004)基于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机构的数据库认为,战后欧洲各国选举中投票结果的差异可以由以下因素加以解释:实行自由选举的时间、是否采用比例

<sup>①</sup> 参见 Katz(1997)。



代表选举制与义务投票制、是否在休息日举行选举,以及平均选区规模等。<sup>①</sup> 富兰克林 (Mark Franklin 2004) 的最新研究也强调,制度背景在解释成熟民主国家投票结果的差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选举竞争的形式,以及获得选举权的年龄要素降低后所产生的影响。

在美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频繁的选举和复杂的选民登记程序降低了民众的投票率,而最近的研究,则以美国的各州作为实验室,以集中观察选举程序中的行政改革,包括引入驾驶证选民登记制度、采用不同的登记截止时间、选票设计的创新、选举日(当日)登记制度,以及提前投票等所带来的影响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Martinez and Hill 1999; Knack 1995; Crigler, Just, and McCaffery 2004)。在美国,目前争论中的更具实质性的改革,包括对选举人团制度,以及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的修正 (Hill 2002)。该领域一个相关的争论,涉及用什么标准反映美国投票率变化的趋势。过往的许多研究一直采用传统方法,即有效票数占适龄投票人口数的比例。例如,帕特森 (Patterson 2001) 在此基础上认为,尽管有过一些波动,但在过去三十年间,全国选举中的投票参与水平一直呈下降趋势。但麦克唐纳和波普金 (McDonald and Popkin 2001) 则认为,这段时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投票率的明显下降,原因在于不具备选举权的人口增加,包括非公民和因犯罪而不能合法行使投票权的人口增加,而非不参与投票的人口的比例的提高。<sup>②</sup> 这两个不同的结果表明,在未来的跨国比较中,重要的是应以有效票数与适龄选民人数 (Vote/VAP)、而非能够合法行使选举权的选民人数 (Vote/EE) 之比作为主要依据。在有些国家,或者因为移民的公民权受到限制,或者因为只采用有限选举权(比如排除了女性),或者限制了某些主要群体的选举权,结果导致大量成年人口被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对这些国家而言,上述标准的改变尤其重要 (Paxton et al. 2003)。至少,采用 Vote/EE 作为投票率标准的研究者,应该参照 Vote/VAP 标准,以验证他们的主要发现是否扎实可靠。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时间序列趋势的分析中,起点和终点的选择也十分重要。任何关于投票率的比较研究,如果武断地将时间序列的起点设定在一个特别高的数值点上(如 1960 年美国总统选举),或未能承认和解释趋势中的显著波动,而这些波动本可以很好地归因于环境因素,如人们对选战激烈程度的感知等(例如 1992 年和 2004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都有所提高),那么我们就应该报之以高度的怀疑。

近来对于制度背景研究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投票结果的累积统计结果。

① 参见 Norris (2004)。

② 参见 Miles (2004)。

这些研究表明,仅仅关注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态度分布的个人层面的调查分析是不充分的。不同国家、州和地区所采用的对局规则,能够决定究竟是全体选民都广泛地参与投票,还是投票参与者明显向富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阶层严重倾斜。与此类似,文化态度也确实会因环境不同而发生系统变化,比如,公民的外部效能感,可能与他们对政治体系满足公民政策关切方面的表现和责任的实际体验有关。当前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些研究关联起来,从而使个体层面的行为在其广阔的制度背景下得到理解,而这个挑战具有相当的难度。一般认为,由于正式规则能够产生某种机械效应,所以它们的影响相对直接,比如义务投票制会自动提高投票率。但是,即便是在实行类似选举规则的国家之间,也会出现相当重要的差异,无论它们采用比例代表制还是简单多数制,或者同样实行了义务投票制。这种差异可以部分归因于具体的制度细节,比如比例代表制之下选区规模的平均大小,或者对不履行投票义务者的惩罚。但是,挑战在于如何联结制度背景与个人行为,从而使我们能够认识杜维吉尔所说的正式规则导致的“心理”影响。<sup>①</sup>

关于制度对投票参与和公民介入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是政治科学面临的一项重大政策挑战。为在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国家促成自由公正的选举,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深度的介入,具体事例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威权政权倒台之后的转型、东帝汶的去殖民化、柬埔寨内战的终止,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进展(Carothers 1999)。在成熟民主国家,除基本的选举程式之外,也常有如何根本完善选举程序的争论。改革的对象包括决定着政党资格和候选人提名的法律条款与政党规则、选民登记与投票投放的行政程序、选举资金和政治宣传的管理,以及选举管理的过程等等。成熟民主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在决定席位分配的 d' Hondt 算法和 LR-Hare 算法<sup>②</sup>之间调整,降低有效票数门槛、使小党能够得到议会代表权,放宽选举权的条件,以及改变各级立法机构的规模等(参见 Lijphart 1994; International IDEA 2005)。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个基本的假定是选举改革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包括公民的不参与问题。因此,制度效果之所以值得研究,不仅因为它们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因为它们与解决现实问题的政策相关。

<sup>①</sup> 杜维吉尔最早把选举制度的影响区分为“机械性的”和“心理性的”(Duverger 1954)。

<sup>②</sup> 这是两种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分配席位的方法,前者对大党较为有利,后者则对小党较为有利。——译者

### 三、政党：成员不断减少的组织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政党越来越失去兴趣,其表现就是反对政党的情绪在上升,而党员的数量则在下降。这被许多观察者视为成熟民主国家正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党变化的传统叙事认为,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黄金时代”之后,大众型政党就陷入了持续的衰落期。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西欧国家,因为政党仍然是选民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媒介机构。由卡茨和梅尔领导的一支国际团队,重点研究了政党的内部组织(Katz and Mair 1992, 1995),而达尔顿和瓦腾贝格(Dalton and Wattenberg 2000)则汇集了关于后工业社会政党动向的最新系统证据。根据基(V.O. Key 1964)确立的惯例,关于政党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级:政府机构中的政党、政党组织,以及选民中的政党。证据强有力地表明,政党仍然是联系政府各部门的关键环节,也从未丧失在决策过程中联结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功能。<sup>①</sup> 但是很多研究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组织和选举层面的政党衰落已经十分明显(Lawson and Merkl 1988)。在所有的成熟民主国家,各国选举调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表示,选民中政党认同的强度已经有所减弱,这无疑减少了那些无论如何都会支持自己政党的一贯忠诚的选民的比例。<sup>②</sup> 不仅如此,梅尔和范·比赞的研究,以及斯卡洛的研究,都根据官方记录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成熟民主国家中很多政党的党员数量都在下降,尽管不同国家、甚至是相对比较类似的西欧民主国家之间,在党员层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sup>③</sup>

在这种趋势之下,成熟民主国家典型的大众型政党组织在中间层面表现出萎缩之势,并且潜在地限制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削弱了公共社会,并弱化了政党领袖对其追随者的责任。很多研究假定,党员数量的减少和政党忠诚的削弱,表明民主机体出现了问题,比如公众因对政党表现不满而普遍对其产生了拒斥。不过,这些动向的后果尚不清楚。正如斯卡洛所指出的,累积数据并不能说明问题。政党可能的确失去了处于边缘位置的消极党员的支持和他们的那部分党费,但它们可能仍然保有铁杆活动家的积极支持,而正是他们在管理地方支部、募集资金、分发传单、选举候选人和党的领袖、参加

① 参见 Dalton and Wattenberg(2001)的结论。另参见 Mair(1997)。

② 对于欧洲国家相关证据的最完整的综述,见 Schmitt and Holmberg(1995)和 Dalton and Wattenberg(2001)。

③ 特别参见 Mair and van Biezen(2001); Scarrow(2001)。

集会、讨论政策,并且为大众型政党招募基层的自愿者。<sup>①</sup> 另外,大众型政党也并非所有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必要特征,很多国家与法国一样,特点是政党组织由精英领导,并由立法和政府部门中的官员加以管理,而党员并不多。为了探究党员数量下降的原因,研究者首先对英国主要政党的党员进行了调查,且类似的调查也已经在其他国家展开(Seyd and Whiteley 2004)。针对英国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在时间方面的压力使政党行动主义的吸引力降低;而从需求方面来说,主要政党对志愿者募集资金和参与竞选的需要也减少了,这自然弱化了后者参与的动机(Whiteley and Seyd 2004)。公共资助和竞选宣传的中介渠道,已经替代了政党志愿者的许多重要功能。由于缺乏完整的跨国党员调查,所以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还有待观察。如果即便不存在一个由志愿者和活动家构成的中介层,政党也能够定期进行的选举中为选民提供一套政治选择和政治家团队,从而实现其作为专业化的竞选和鼓动组织的基本功能,那么党员人数的减少对代议民主的影响,就还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

#### 四、社会资本、自发团体与社会信任

政党组织的衰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更宽泛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后者影响到诸多传统的政治行动机制。在战后时期的西欧国家,这些传统机制与政党一样,历来为公民动员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其中包括各基督教民主政党所属的教会,对左翼工人阶级加以动员的工会和合作社,以及公共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和自发团体,像社区社交俱乐部、职业和商业组织、农业合作社和慈善团体等。<sup>②</sup> 对自愿组织的研究兴趣,由于社会资本研究的繁荣而被再度激发,后者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增长行业。

社会资本理论源自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70)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88, 1990)的思想,他们都强调社会纽带和共同规范对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的重要性。<sup>③</sup> 帕特南在政治科学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最具影响力的阐发,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Robert Putnam 1993)和《独自打保龄》(Robert Putnam 2000)中提出,社会资本、公民社团和自发组织,以及政治参与和有效治理密切相关。<sup>④</sup> 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

① 关于这一趋势在丹麦的证据,参见 Andersen and Hoff(2001)。

② 对相关文献中概念差别和理论框架的探讨,参见 Berry(1984)。关于工会、教会、政党成员数量变化趋势的比较,参见 Norris(2002)。

③ 对这一概念的历史探讨,参见 Baron, Field, and Schuller(2000)的导言。

④ 影响深远的著作包括 Putnam(1993, 1996, 2000); Putnam and Feldstein(2003)。

之间的联系,即他们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及关于互惠与信任的规范”(Putnam 2000, 19页)。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在这里同时被理解为一种结构现象(社会网络)和文化现象(社会规范)。由于通常总是在这个或者那个维度,但不会同时在两个维度上测量社会资本,所以这一双重性质常常带来某些问题。但帕特南认为,公共社会中的横向网络,以及与这些联系相关的规范和价值,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它们既创造私人利益,也创造公共品。此外,他还强调,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因而与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相比又更进了一步。帕特南的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双向模型:一方面说明公共社会如何直接促进了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则说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以及源自公共社会的文化规范)又如何反过来推动了政治参与和善治。他特别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的分析认为,丰富而密集的社团联系,以及大量的公民组织,会促进高效的治理。最后,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帕特南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在二战后的美国,公共社会,尤其是社会资本,已经受到严重侵蚀。帕特南探讨了可能导致这一变化的多重原因,如时间和金钱的压力等。但他强调,导致美国社会联系和公众参与衰落的根本原因,乃是技术和媒体的变化,特别是成为美国休闲活动主要形式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它们对战后一代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Putnam 2000, 246页; Norris 1996)。

帕特南的著作相当清晰地叙述了美国传统的公共组织与社会信任衰落的历史,不过关于如何解释这些趋势还存在争论。<sup>①</sup> 另外帕特南也承认,尚不清楚的是,类似的变化,即传统社团成员的减少和社会信任的衰落在其他后工业社会,如德国、瑞典和英国是否同样明显。<sup>②</sup> 对于西欧国家、后共产主义社会,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也考察了社会信任和社团行动主义的复杂形态,以及能够增强社会资本与公共社会的相关因素(Kornai, Rothstein, and Rose-Ackerman 2004; Svendsen and Svendsen 2004; Hooghe and Stolle 2003)。

由于若干原因,我们还难以解释当前跨国研究中的一些发现。对自发组织的比较研究的局限之一,是它们一般都只关注传统自发社团中的行动主义和成员数量,而未能充分考虑对分散的新型社会运动的参与。传统上成员众多的自愿结社,通常以定期的、制度化的、结构化的和可度量的活动为特征。要成为挪威工联、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妇女协会的持卡会员,人们需要登记在册并缴纳会费。与大众型

<sup>①</sup> 相关批评,参见 Edwards and Foley(1998); Ladd(1996); Skopol(1996); Schudson(1996); Rotolo(1999)。

<sup>②</sup> Pharr and Putnam(2000); Putnam(2002)。关于其他比较研究著作,参见 van Deth(1997); van Deth and Kreuter(1998); van Deth(1999, 2000)。

政党一样,这些传统机构也具有韦伯式官僚机构的特征,拥有正式的规章制度、付薪的全职工作人员、等级制的分支机构,以及清晰的成员归属界限(Cl Clarke and Rempel 1997)。铁杆会员作为自发结社的命脉,发挥着许多作用,如在当地的管理委员会中任职或向社会社团捐款、组织募捐活动、印发内部通讯、张罗宣传摊位、主持会议,以及参加像红十字会、家长—教师协会和扶轮社组织的联谊会。一些大型的伞状组织聚合并表达其成员,尤其是各主流政党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而另一些公共利益团体则把精力集中在更为具体的政策关切和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部门上面。社会资本研究的繁荣,再度激发了人们对这些组织的注意,并通过比如官方的成员名单,以及跨国调查(特别是连续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和2002年的欧洲社会调查)来追踪这些组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后出现的当代社会参与机制,其典型代表包括女性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战联盟、环境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政策倡议网络。它们的基本特点,是边界更为模糊、联盟网络更为松散、组织结构更为分散。新社会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变革,其具体手段既包括直接行动策略和社区建设,以及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也包括影响正式的决策过程和政府法律(Tarrow 1994; Tilly 1978;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Dalton and Kuechler 1990)。观察者认为,这些当代参与机制跨国行动的能力表明,围绕像全球化、人权、债务减免和世界贸易等议题进行动员的全球公共社会正在兴起(Rosenau 1990; Lipschutz 1996; Keck and Sikkink 1998; Smith, Chatfield, and Pagnucco 1997; Kriesi, Porta, and Riucht 1998)。这些机制的特点,是松散的联盟之间非集中化的、网络化的交流,相对扁平化的“横向”而非“纵向”的组织结构,以及非正式的成员归属形式,包括对不同议题和认同政治的共同关切等(Zald and McCharthy 1987; Oberschall 1993; Meyer and Tarrow 1998; Larana, Johnston, and Gudfield 1994;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人们可以仅仅通过“露面”,或在一个具有可以自由出入的边界的组织中表达共有的政治情感,来表明自己的归属,而不依靠缴纳会费“正式地”成为组织的一员。

如果像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样,新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年轻一代非正式的政治动员、抗议和表达的重要的替代形式,那么这一动向对于我们如何解读和衡量结社生活的变化趋势就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如果相关研究仅限于比较传统政治参与机构中的成员数量(典型指标是党员资格、工会的密度以及是否到教堂做礼拜),那么它们就只能提供一种片面的视角,并且低估通过当代机制实现的参与,其特点恰恰是模糊的边界和更为非正式的归属形式。

## 五、结果导向的行动主义的兴起

新型的行动主义组织形式的出现,与结果导向的政治行为的增加及其上升为主流形式有关。政治参与的传统文献,大多仅关注公民参与的形式,强调的是公民在各民族国家代议民主机构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影响选举、政府和政党的途径。维巴及其同事提出这一分析框架时,他们关注的是政治参与的多种“形式”,并认为它们在收益与成本方面存在系统差异(Verba, Nie, and Kim 1971; Verba and Nie 1972; Verba, Nie, and Kim 1978;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例如,投票可被视为通过定期选举实现的最为普遍的政治活动之一,但它只能对当选代表和政党施加分散的压力,虽然其结果会广泛影响到全体公民。为政党或候选人从事竞选工作,如分发传单、参加当地政党集会,以及投票动员,通常也能产生集体利益,但与简单的投票相比,需要更强的动机,以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反,个体性的接触,比如选民就某一特定问题与当选代表或政府官员取得联系,需要更高水平的信息和动机,但并不需要与其他公民合作,就能为相关个人带来特殊利益。社区组织活动则涉及地方性的动机和慈善团体。所有这些传统参与形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非常重视公民如何能够影响代议制民主,无论是通过直接的(选举)还是间接的(通过政党和当选官员)方式。维巴、奈伊和金也接受这一前提,因此他们把政治参与定义为“由公民私人进行的合法行动,旨在或多或少直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任及/或他们行为”(Verba, Nie, and Kim 1978, 46页)。公民导向的行动,比如参与投票和加入政党,对民主制仍然十分重要,但这在当今只能反映一种对行动主义的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排除了公众介入的一些重要的共同目标,而后者已经成为常规和主流。

早期的研究还明确区分了“常规”政治与“抗议”政治,时至今日,这一术语还常常在研究中使用。巴恩斯和凯斯在其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政治行动的经典研究中(Barnes and Kasse 1979),把“抗议”定义为公民自愿参与的异议表达行动,包括非官方的罢工、抵制、请愿、占领建筑物、公众示威,甚至政治暴力活动。<sup>①</sup>但这种理解行动主义的方式在当今似乎已经过时,因为它不再能够把握住当代政治参与形式的基本特征,而这些形式中的大部分今天已经成为主流。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高潮中,示威通常被视为仅由一小部分与工人联合的学生采取的激进行动,而针对争取公民权、反核,或者反战抗议的和平动员,则演变为公民不服从、街头剧、静坐,甚至暴力行

<sup>①</sup> 参见 Marsh(1977); Adrain and Apter(1995)。

为。但在今天,示威业已成为主流的、普遍的政治参与形式,1999—2001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在像瑞典、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约有40%的公众至少曾参加过一次示威活动(van Aelst and Walgrave 2001; Norris, 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4)。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示威参加者的比例已经翻了两倍多。消费者政治的普及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果,请愿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Norris 2003)。

参与形式变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今天已经可以更为清晰地把公民导向的行动和结果导向的行动区分开来,前者主要与选举和政党相关,后者则聚焦于特定的议题和政策关切,其形式包括消费者政治(由于政治或伦理上的原因而购买或抵制特定的产品)、请愿、示威和抗议。<sup>①</sup>当然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并非不可逾越。比如政党也会组织公众示威,而选民也会因特定的政策议题和社区关切,以及为争取个别选区的服务而游说当选代表。新社会运动通常采取混合型行动策略,把游说当选代表和联络新闻媒体等传统形式,与在线网络、街头抗议和抵制消费等多种政治表达的替代形式结合起来。与公民导向的行动相比,结果导向的参与形式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最普遍地用于在形形色色的目标之间追踪特定的议题和政策关切,其活动范围,既在选举舞台之上,亦可在选举舞台之外。

当然,从历史上看,目标导向的行动主义者采用的许多手段并非真的前无古人。事实上,向议会请愿是代议民主最早的形式之一,而且正如本手册先前各章所讨论的,在西方各民主国家,都可以发现周期性的抗争政治、激进抗议以及激烈的政治对抗的浪潮(Tilly et al. 1975)。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民权运动和西欧的核裁军运动采取的就是消极抵制的手段。在此基础上,直接行动在60年代的反越战示威、学生抗议运动,以及席卷巴黎、东京和伦敦街头的社会骚动中复兴。新社会运动,特别是关注女性平等、核能、反战和环境的运动不断扩展。70年代初,人们通过经济抵制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而工会也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经济行动,包括罢工、占领、封锁,偶尔还伴有纵火、破坏和暴力行动,来反对西方国家的政府(Epstein 1991)。到今天,示威这种集体行动,已经成为表达政治不满、提出反对意见,以及挑战权威的得到普遍认可的形式(van Aelst and Walgrave 2001; Norris, 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5)。

结果导向的参与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内容已经大大扩展,并介入了“消费者”政治和“生活方式”政治,而在这些领域,“社会”和“政治”之间的确切界限进一

<sup>①</sup> 帕特尔等也曾作出类似的区分,不过他们的分界线放置在“集体的”和“个人化的”行动主义形式之间。但是作为概念框架,这种区分似乎并不完善,因为抗议和示威总是集体行为,新社会运动也是如此,尽管与政党或者社区组织的正式成员相比,它们的参与者更具目的性和可变性。参见 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2004)。



步消弭。此类参与的实例包括在回收企业做义工、在受虐待妇女的庇护所做救助工作、为当地学校募集资金,以及在伐木地点抗议、抵制血汗工厂的产品、购买不进行动物试验的化妆品,等等。有人可能认为,这类行动虽然会产生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但不能归入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范畴。但是,正如女性主义研究长期以来所强调的,“公”“私”之间的界限本身就存在争议(参见 Pateman 1988; Phillips 1991)。结果导向的参与旨在变革法律或影响政策过程,但同时也致力于改变社会行为的系统模式,其具体方式包括建立玻璃瓶回收设施、受虐待妇女庇护所,以及提高人们有效利用能源的意识等。英格尔哈特认为,导致上述进展的,是一种文化变迁过程,伴随这一过程,推动行动者的核心议题,已经从物质主义的关注,即聚焦于工作、薪酬、养老金的生计考虑,转向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更广泛的关注,包括全球化、环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性别平等之类的议题。<sup>①</sup>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松散而无形的社区群体网络和基层自愿团体往往在地方社区采取直接行动,解决一些与生计相关的基本问题,如获取清洁的用水、分配农业补助、争取健康保障或入学等等(参见 Baker 1999)。围绕族群和性别的认同,政治议题同样常常会模糊“社会”与“政治”的边界。因此总体而言,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影响选举、政府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为目标的公民运动,其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看来似乎过于狭隘,因为它排除了大量一般认为属于广义的“政治”领域的事务。

结果导向的运动的另一关键特征,是它们既指向议会和政府,也针对公共的、非盈利性的和私人部门中的多种行为体。有大量的、而且不断增多的文献,比较了针对国际人权组织,女性非政府组织、跨国环境组织、反对血汗工厂和反对使用地雷的网络、和平运动,以及反全球化和反资本主义力量中的行动主义的个案研究(Sassen 1999; Keck and Sikkink 1998; Edwards and Gaventa 2001; Evans 2000)。抗议对象通常是大的跨国企业,既包括消费者对耐克运动鞋、麦当劳汉堡包以及加利福尼亚葡萄的抵制,也包括针对世界贸易组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的抗议(Keck and Sikkink 1998)。这些文献认为,参与目标的变化,是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自主权包括核心行政权力下降的结果,因为国家权力正同时向上(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政府间组织)和向下(区域和地方的议会)转移。<sup>②</sup> 而且,因私有化、市场化和取消管制而导致的“国家的收缩”,意味着决策的制定权正从直接对当选代表负责的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向活跃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复杂多样的非盈利机构和私人机构扩散和漂移(Feigenbaum, Henig, and Hamnett 1998)。由于这些发展变化,公

① 详细论述参见 Inglehart(1997); Inglehart and Norris(2003); Norris and Inglehart(2004)。

② 关于相关讨论,参见 Held(1999); Nye and Donahue(2001); Archibugi, Held, and Kohler(1998)。

众要通过全国性的选举、全国性政党和国家层面的立法机构挑战公共政策变得更为困难,因此以非传统方式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动员的需求就更为迫切。

## 六、结论:未来的研究议程

在过去十年间,有关政治行动主义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加并趋于多样化,但还有很多领域需要予以高度关注。我们将勾勒出未来研究日程中一些最具前景的方向,并以此为本章作结。

如前文所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的标准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在解释公民个人为何参与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动时,突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维巴及其同事的早期著作,强调个人参与政治时所具有的、既定的结构性资源,特别是他们的教育水准、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他们的族群和性别密切相关,而且都有助于他们的政治参与。比如教育能提高人们的分析能力,使其理解政治议题和决策过程;而家产收入则与政治捐助的能力直接相关。“底线”资源模型添加了文化态度因素,例如内部效能感(对自身影响公共事务能力的自信)、外部效能感(对体制回应的感知)、公民知识以及政治兴趣(如追踪新闻事件)等,它们通常都与积极参与的倾向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依然重要,而且它们事实上也被继续纳入对政治参与的标准叙述之中。

不过,在过去十年间,研究者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个体行为的环境,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在进一步扩展。这对于上述标准的心理学解释是一种补充。当前研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公民个人从幼年起经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内在心理能力和素质,而是在特定的社区、州、选区<sup>①</sup>或国家中发现的、能够激发或压制这些心理倾向的背景因素。维巴和奈伊也承认,个体成为行动主义者,需要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比如工会和教会在动员工人阶级社区方面的影响。最近,罗森斯通和哈森(Rosenstone and Hanson 1993)再次激发了人们对像政党和利益团体这类动员机构的作用的关注,而且对政党工作人员在通过地方竞选激活选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政治传播领域,米尔纳(Milner 2002)和诺里斯(Norris 2000)围绕大众传媒的角色展开争论,焦点是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究竟是鼓励了、还是压制了公民参与和公共意识。哈克菲尔特及其同事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人际交往所结成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在推动人们投身于公共事务方面的重要意义(Huckfeldt, Johnson, and Sprague 2004)。对于政治体制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决定投票参与机会的法律规范、选举制度和行政程序的作用,以及政党竞争模式和可

<sup>①</sup> 此处原文为“elections”,疑有误。——译者

能改变投票率的选举结果的接近程度等,最近的研究也予以了更多的关注(Franklin 2004)。

在过去十年,比较政治参与形式的研究整体上转移了研究重点,开始更多地关注像政党、社团和社区组织动员民众的社会过程,以及决定了参与形式的制度规则的广阔环境。制度因素之所以得到广泛研究,是因为它们对投票结果的影响。虽然法律背景下的比较和选举系统的广泛作用长期以来都被认为非常重要,但尚待完成的任务还很多,我们还需要研究制度如何影响了政治参与的其他维度。比如,政治献金法和公共基金补助可能会减少政党维持大批群众党员的动机,而控制税收和非盈利地位的法规则可能影响自愿组织的结构以及非盈利部门中社团成员的密度。

大量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特别是对美国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正如李普塞特(Lipset 1996)所说,在很多方面,美国并非典型的民主国家——无论就其极低水平的投票率、群众性政党的缺失,还是相对丰富的自发行动主义形式而言都是如此。一国内部的比较研究通常在不同群体(如非洲裔与拉丁裔美国人的投票率)、不同时间(如1960年后投票率的变化趋势),偶尔也会在不同区域或州(如选民登记要求的影响)之间进行。然而直到最近,系统的多国调查,特别是对西欧之外的国家,包括新兴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公民角色的研究,仍然相对滞后。最近几十年,比较研究已经开始运用新出现的大规模跨国选民调查,如全球晴雨表调查的结果。它们有助于对某些大众政治参与的共同形式,特别是投票率的比较。但是,要系统分析只涉及少部分人的、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的参与,还没有任何跨国调查能够提供所需数据,包括政党成员、竞选工作以及结社行动主义方面的信息。把所有大规模跨国调查——如欧洲晴雨表、国际社会调查计划(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选举制度比较研究——所提供的样本集中起来,可以得到足够大的样本,以解决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但其代价是会丧失部分分析环境效果跨国变动的可能。此外,要确定分析模式提示的因果关系的方向,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进行纵向多波固定面板调查,尽管进行这种跨国、跨时段的调查还存在大量的困难。

另一个局限是,比较研究一直集中关注“传统的”“常规的”或“公民”形式的行动主义,即那些在每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以影响当选官员和代议制民主决策过程为主要目标的公民行动。相比之下,只有极少数比较研究对替代性的政治介入、动员和表达渠道加以考察,但这类渠道在当代社会正迅速涌现,这体现为示威和抗议政治普遍增多,消费者政治日益普及,利益团体大量蔓延,社会运动、在线政治社区和跨国政策网络进一步多样化等。关于这些变化的确切形态及其重要性,以及它们应该被视为真正“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抑或仅是古老传统的反映,都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不过,学术

界还是达成了广泛共识,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可被纳入比较的组织机构的范围,以及行动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仅增加,而且多样化了,而学术研究却常常缺乏足够的创新,以捕捉正在变得日益普遍的各种行动的特性。

最后,从总体上看,当前的学术研究对参与原因的分析要比对其结果的分析更深入。具体而言,政治行动主义的性质和水平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都会提出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而我们目前对此还不能作出确定的回答。第一,如果新的参与形式对公民意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这些变化对公共领域的社会不平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二,这些变化(比如人们不再拿出自己的时间参与自愿组织的工作,而是通过财政捐助表达对利益团体的支持)对个人能力的发展、社区的强化以及大众参与的质量意味着什么?最后,在系统层面,它们对于治理过程、公共政策议程以及民主的稳定性意义何在?厘清从各种具体的参与行为到政府决定的输出之间的因果联系(比如,立法机关如何回应公众对于福利待遇的公共支出模式,或者对外政策调整的关注)相当困难,这仍然是政治科学面临的一个经典挑战。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在对规范民主理论的一些核心论断加以检验,特别是慎议对公民和决策的影响(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3,第7章)。但是,关于本章提及的诸多变化更广泛的影响,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结论。行动主义的新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补充或者替代了旧形式,对代议制民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仍然是未来的比较研究面临的根本挑战之一。

## 参考文献

- ADRIAN, C., and APTER, D. A. 1995. *Political Protest and Social Change: Analyzing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 A., and VERBA, S. eds. 1980.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 1989/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ANDERSEN, J. G., and HOFF, J. 2001.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 in Scandinavia*. Basingstoke: Palgrave.
- ARCHIBUGI, D., HELD, D., and KOHLER, M. 1998. *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Studies in Cosmopolitan Democrac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KER, J. 1999. *Street-Level Democracy: Political Settings at the Margins of Global Power*.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 BARBER, B. 1984. *Strong Democr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RNES, S., and KAASE, M.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BARON, S., FIELD, J., and SCHULLER, T. eds. 2000.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S. E. 1986. *Apathy in America 1960–1984: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itizen Political Indifference*. Dobbs Ferry, NY: Transnational.
- BERRY, J. 1984. *The Interest Group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 BLAIS, A. 2000. *To Vote or Not to Vote? The Merits and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and DOBRZYNSKA, A. 1998. Turnout in electoral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3(2): 239–61.
- BOOKS, J., and P R Y S B Y, C. 1988. Studying contextual effects on political behavior: a research inventory and agenda.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6: 211–38.
- BOURDIEU, P. 197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 BURNS, N., SCHLOZMAN, K. L., and VERBAS. 2001.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ROTHERS, T. 1999.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CLARKE, T. N., and REMPEL, M. 1997. *Citizen Politic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 CONWAY, M. M. 2000.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rd ed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CRIGLER, A. N., IUST, M. R., and MCCAFFERY, E. I. 2004. *Rethinking the Vote: The Politics and Prospects of American Electoral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 1996. *Citizen Politics*, 2nd edn.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and KUECHLER, M. eds. 1990.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 J. and WATTENBERG, M. P. 2001.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Wiley.
- EDWARDS, B., and FOLEY, M. W. 1998.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capital beyond Putna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2(1): 124–39.
- EDWARDS, M., and GAVENTA, J. eds. 2001. *Global Citizen Actio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EPSTEIN, B. 1991. *Political Protest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VANS, P. 2000. Fighting marginalization with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1): 230-41.
- FEIGENBAUM, H. B., HENIG, J., and HAMNETT, C. 1998. *Shrin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Privat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NKLIN, M. N. 2004. *Voter Turnout and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since 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NKLIN, M. N., VANDEREIJK, C., and OPPENHUIS, E. 1996.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turnout. Pp. 306-31 in *Choosing Europe? The European Electorate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Face of Union*, ed. C. van der Eijk and M. Frankli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UTMANN, A., and THOMSON, D. 2004.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2nd edn. Stanford, Cali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 HIBBING, J. R., and THEISS-MORSE, E. 2003. *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LL, S. 2002. *Fixing Elections: The Failure of America's Winner Take Al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HOOGHE, M., and STOLLE, D. eds. 2003.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UCKFELDT, R., JOHNSON, P. E., and SPRAGUE, J. 2004. *Political Disagre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SPRAGUE, J. 1995. *Citizens, Politics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d NORRIS, P. 2003.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TERNATIONAL IDEA. 2005.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2nd ed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www.idea.int](http://www.idea.int).
- JACKMAN, R. W., and MILLER, R. A. 1995. Voter turnout in the industrial democracies during the 1980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 467-92.
- JENNINGS, M. K., and VANDETH, J. 1989. *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ction*. Berlin: deGruyter.
- KATZ, R. 1997.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MAIR, P. 1995.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1): 5-28. eds. 1992. *Party Organizations: A Data Handbook o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1960-1990*. London: Sage.
- KECK, M., and SIKKINK, 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RSTING, N., and BALDERSHEIM, H. eds. 2004. *Electronic Voting and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EY, V.O. 1964.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Crowell.
- KNACK, S. 1995. Does motor voter work? 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data. *Journal of Politics*, 57(3): 796–811.
- KORNAI, J., ROTHSTEIN, B., and ROSE-ACKERMAN, S. eds. 2004.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RIESI, H., PORTA, D.D., and RIUCHT, D. eds. 1998. *Social Movemen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LADD, C.E. 1996. The data just don't show erosion of America's social capital. *Public Perspective*, 1: 5–6.
- LARANA, E., JOHNSTON, H., and GUDFIELD, J.R. eds.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AWSON, K., and MERKL, P. eds. 1988. *When Parties Fail: Emerging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PSCHUTZ, R. 1996. *Global Civic Socie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lbany, NY: SUNY Press.
- LIPSET, S.M.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Norton.
- LOPEZ PINTOR, R., and GRATSCHEW, M. n.d. *Voter Turnout Since 1945: A Global Report*.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www.idea.int](http://www.idea.int).
- MCADAM, D., MCCARTHY, J.D., and ZALD, M.N.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DONALD, M.P., and POPKIN, S.L. 2001. The myth of the vanishing vot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4): 963–74.
- MAIR, P. 1997. *Party System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VAN BIEZEN, I. 2001. Party membership in twenty European democracies 1980–2000. *Party Politics*, 7(1): 7–22.
- MARSH, A. 1977. *Protest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MARTINEZ, M. D., and HILL, D. 1999. Did motor voter work?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7(3): 296–315.
- MASSICOTTE, L., BLAIS, A., and YOSHINAKA, A. 2004. *Establish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Election Laws in Democrac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EYER, D., and TARROW, S. eds. 1998.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ILBRATH, L.W., and GOEL, M.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2nd edn.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ES, T.J. 2004. Felon disenfranchisement and voter turnout.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3(1): 85-129.
- MILNER, H. 2002. *Civic Literacy: How Informed Citizens Make Democracy Work*. Hanover, NH: Tufts University.
- NORRIS, P. 1996. Did television erode social capital? A reply to Putnam.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9(3): 474-80.
- 2000. *A Virtuous Circ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Electoral Engineer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INGLEHART, R. 2004.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GRAVE, S. and VAN AELST, P. 2004. Who demonstrates? Anti-state rebels, conventional participants, or everyone? *Comparative Politics* (forthcoming).
- NYE, J.S., and DONAHUE, J. 2001.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OBERSCHALL, A. 1993. *Social Movements: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o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RY, G., MOYSER, G., and DAY, N. 199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ATTERSON, T. 2001. *The Vanishing Voter*. New York: Knopf.
- PATTIE, C., SEYD, P., and WHITELEY, P. 2004. *Citizenship in Britain: Values,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XTON, P., BOLLEN, K.A., LEE, D.M., and KIM, H.J. 2003. A half century of suffrage: new data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1): 93-122.
- PHARR, S., and PUTNAM, R. eds. 2000.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 A. 1991. *Engendering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OWELL, G.B. 1980. Voting turnout in thirty democracies: partisan, legal and socioeconomic influences. Pp.5-34 in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d. D. Rose. London: Sage.
- 1982.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articipation, Stability and Viol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American voter turnou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1): 17-43.
- PUTNAM, R.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4): 664–83.
- 1996.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 *American Prospect*, 24: 34–48.
-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ed. 2002.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api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FELDSTEIN, L. 2003. *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OSE, R. 2004. Voter turnout in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countries. In *Voter Turnou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ed. R. Lopez Pintor and M. Gratschew.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 ROSENAU, J. 1990.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STONE, S. J., and HANSEN, J. M.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ROTOLO, T. 1999.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8(2): 199–212.
- SASSEN, S. 1999.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ew Press.
- SCARROW, S. 2001. Parties without members?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ed. R. J. Dalton and M. Wattenber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LOZMAN, K. L. 2002.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what do we know? Why do we car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 I. Katznelson and H. V. Miller. New York: W. W. Norton.
- SCHMITT, H., and HOLMBERG, S. 1995. Political parties in decline? Pp. 95–133 in *Citizens and the State*, ed. H.-D. Klingemann and D. Fuch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1996. What if civic life didnt die? *American Prospect*, 25: 17–20.
- SCHUMPETER, J. A. 195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4th ed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SEYD, P., and WHITELEY, P. eds. 2004. Party members and activists. Special issue of *Party Politics*, 10(4).
- SKOCPOL, T. 1996. Unravelling from above. *American Prospect*, 25: 20–5.
- SMITH, J., CHATFIELD, C., and PAGNUCCO, R. eds. 1997.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SVENDSEN, G. L. H., and SVENDSEN, G. T. 2004.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Cooperative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TARROW, S. 1994. *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IXEIRA, R. A. 1992. *The Disappearing American Vot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et al.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ANAELST, P., and WALGRAVE, S. 2001. Who is that (wo) man in the street? From the normalization of protest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rotester.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9: 461–86.
- VANDETH, J. W. ed. 1997. *Private Groups and Public Life: Social Participati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 London: Routledge. ed.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 2000. Interesting but irrelevant: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aliency of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7: 115–47.
- and K REUTER, F. 1998. Membership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p. 135–55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ed. J. W. van Deth. London: Routledge.
- VERBA, S., and NIE, N. H.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 KIM, J. 1971. *The M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Beverley Hills, Calif.: Sage.
-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LOZMAN, K., and BRADY, H. E.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BB, P., FARRELL, D., and HOLLIDAY, I. eds. 2002. *Political Par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LEY, P., and SEYD, P. 2002. *High-Intensity Participation: The Dynamics of Party Activism in Britai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OLFINGER, R., and ROSENSTONE, S. 1980. *Why Vo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ZALD, M. N., and MCCARTHY, J. eds. 1987.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第七部分

**处理政治需求**



## 第二十七章 政治偏好的聚集与代表

小 G.宾汉姆·鲍威尔(G.Bingham Powell, JR.)

### 一、导论

所谓“偏好的聚集”是指对集团成员可能支持的数种政策进行考量和遴选的过程。通常认为,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公民个体会对公共政策的目标或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有着自己的偏好。民主的偏好聚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所有这些倾向都给予同样对待。

显而易见的是,民主机制和偏好的聚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主意味着“民治”。现代民主政体多建立在间接参与决策的基础之上,即通过选举代表实现治理。就代表机构的目的在于聚集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偏好而言,代议制民主的经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对偏好聚集的研究。

此外,偏好聚集还具有强烈规范性含义。那些从规范意义上支持民主制的人同时也会支持代议制的政策制定过程,它聚集了偏好,体现了“人民”的愿望。有些学者将民主本身限定为“统治行为与同样权重的受这些行为影响的公民利益之间必要的一致”(Saward 1998, 51 页)。这个定义意味着“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致即没有民主。”另一些意见则认为,对民主最好的辩护是它“提供了一种和平而有序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公民的大多数能够引导政府去做他们最想让它去做的事情,并且避免他们最不愿意让它去做的事情”(Dahl 1989, 95 页)。偏好聚集的问题显然与民主的核心密切相关,无论是作为一种定义还是作为一种辩护。

如果“人民”能对他们的需求达成共识,那么评估民主的偏好聚集就相当简单。代议制民主应该能够使政策的制定与人民的要求相一致。基于这种预期,经验研究就可以探索哪些专门机制更可能产生民主性的政策,诸如不同的代表遴选规则或是政策制

定程序。然而,“人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他们是一个社会群体,而这正是为何他们的个体倾向必须要被“聚集”的原因。如果存在多样的偏好,那么应该以哪一种为准?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自然,对于这一集中过程的经验研究将会相应地更加复杂。

## 二、社会选择分析的挑战

显然,公民偏好的特性本身就是个复杂的话题,这在本书其他章节中会有所提及。代议民主制的相关理论大多要求“开明的”公民,即了解有关所面临的政策问题的相关思考。另外,公民们持有的观点和判断有明显的强弱之分,有些理论家会引导我们把这种区别纳入分析。不过,在本章对民主偏好聚集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假定所有的公民都有成熟的观点,而且他们的观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会得到同等对待。那么问题就是,人们各种各样的偏好是被如何结合起来,并形成与他们的愿望相一致的政策。

社会选择的形式研究早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偏好聚集的基本问题。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人各不相同的偏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被聚合为内在一致的、持续的单一选择,社会选择的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大量探索。他们发现,虽然对某些形式的公民偏好能够进行有意义的民主聚集,但其他的却不然。从政治行为者相同的偏好结构中,民主聚集的不同方法和不同顺序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换言之,没有一种选择可以无条件地要求得到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大多数的支持。这一对于偏好结构意义的发现,即“阿罗不可能定理”<sup>①</sup>(Arrow 1951),意味着我们也许不能确定某一具体的政策选择是否与“人民的愿望”相一致。通过民主程序总会产生其他的结果;这种结果甚至有可能比原来的结果得到更大多数的支持。

以威廉·瑞克尔(William Riker)为代表的许多理论家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改变我们对于民主本身的可能性的理解:

民粹主义对于投票的解释(即作为一个共同体,人民的需要必须成为公共政策)不能成立,因为它与社会选择理论相矛盾。如果投票的结果是,或者可能是不准确的或是无意义的混杂,那么人民的愿望就无从知晓。(Riker 1982, xviii 页)

莱克主张对民主制进行纯粹程序上的判断,在这一制度下,公民的大多数可以共同罢免现政府,但由此不会得出任何政策含义(参见 Dahl 1956 以及 Runciman 1969)。他

<sup>①</sup> 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的理论,也称为“阿罗悖论”。其基本内容是,当选择者面临三个或三个以上独立的备选项时,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依据某种特定的标准,把选择者个人的偏好序列转变为一种整个群体共同的偏好序列。——译者

明确警告说：“现存的这种民主与其就是民治，倒不如称之为一种间歇性的、有时是随机的甚至是故意找茬的平民否决”（Riker 1982, 244 页）。

里克尔的分析以及那些更普遍的社会选择理论，对代议民主制的偏好聚集研究提出了严肃挑战。要理解比较政治学中关于偏好聚集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把它与里克尔的质疑之间联系起来。我们将会看到，无论学者们是否明确地认识到社会选择的问题，他们已经在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它所带来的困难，而且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一些研究者事实上是按里克尔的建议，仅仅关注民主代表制的条件，比如自由选举和公民权，从而完全避开了公民偏好与政府政策之间的联系问题。但一些其他的研究路径也值得关注。其中两种的出发点都是通过调查研究确认公民的偏好，并研究这些偏好与政策制定者的立场之间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它们处理公民偏好的多重维度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从投票而非偏好入手，认为公民的愿望在投票行为中已得到充分的，或者权威性的显露。

### 三、代议民主和偏好聚集的条件

研究民族国家中民主的偏好聚集的一种方法，是关注大规模的代议民主制得以运行的必要的、但并非充分的条件。社会选择的问题则因为忽略偏好聚集概念上的困难而被规避了。这样，理论分析就在于明确大规模的社会中民主的偏好聚集所必需的机制，而经验分析则关注这些机制的起源和延续，当然偶尔也会研究与之相关的政策。

最有影响的理论分析可能是达尔关于“多头政体”的研究，他列举了为满足民主的五项标准而必需的七种制度（如 1989, 222 页）。这些“标准”，即平等的投票权、充分的政治参与、开明的认识、议程的控制以及包容性，本身都是作为民主的偏好聚集在理论上的必要条件派生而来的。达尔认为，七种“制度”，即官员选举产生、自由公平选举、普遍的选举权、竞逐政府职位的权利、表达自由、信息自由，以及自主结社，从经验上看则是大规模的民主政体能够满足上述标准的必要条件（1989, 221—222 页）。达尔很清楚，这些制度不足以确保“政策一定与公民大多数的意愿相一致”。出于这一理由，他更倾向于描绘一种体现为“多头统治”而非民主制的政治系统。不过他又认为，“这些制度已经足以使政府不至于强制推行那些受到多数民众反对，并且会积极运用自己被赋予的权利与机会来加以颠覆的政策”（1989, 223 页）。看上去，这一方法能够适应于里克尔“自由的”民主版本，但对于它与“民粹主义”理想之间的落差则有点轻描淡写了。

大量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确认在不同政治体系中这些



机制是否存在;第二,研究它们得以被引入及延续的条件。这种研究一般从“过程”的角度定义民主,并依照这些机制与实践存在与否,将实际的政治体系区分为民主政体或非民主政治(或者从民主的程度进行区分)。有三种比较有影响的途径就是根据这一标准(或与之类似的其他标准)从描述的角度对民主进行认定,它们是“自由之家”提出政治权利到公民自由指标([www.freedomhouse.org](http://www.freedomhouse.org))、根据政古尔(Ted Robert Gurr)的著作提出的民主和威权“政体”指标([www.cidcm.umd.edu/inscr/polity](http://www.cidcm.umd.edu/inscr/polity)),以及普列泽沃斯等人提出的民主与独裁政体的分类(Przeworski 2000)。尽管在定义和经验研究程序上有一些区别,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把同样一些政体视为“民主”或“自由”政体。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它们通常着眼于世界上某些特定地区,还对上述必要的基本制度进行了补充,比如法治或者对个人社会关系的平等保障,以使民主的其他制度得以有效运转(O'Donnell 2004,更概括的讨论见 Collier and Levitsky 1997)。

特别是在1975年至1995年这二十年间,以上述制度和进程的确立为标志的“民主政体”的实际扩散,刺激了“民主化”研究急速扩展。这种研究探讨了在何种经济与政治条件下民主政体得以被引入、“巩固”或稳定和存续(如 Huntington 1991; Diamond et al. 1997; Przeworski et al. 2000; Boix and Stokes 2003),或甚至被颠覆(Schedler 2002)。一些相关进程和必需条件之间的联系,如民主选举和人权保障的完整性(如 Poe, Tate and Keith 1999),或民主的程度与内战(Fearon and Iaitin 2003)等也成为大量研究的主题。一部分学者研究了那些据信有助于公民民主选择的稳定制度的发展,如较稳定的政党制度(如 Mainwaring and Scully 1995)或公民对于民主含义的理解(如 Bratton and Mattes 2001)。还有大量研究关注民主制在预期的政策结果(如经济增长、收入公平、教育和生命期望值,或保护少数族群免于种族灭绝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如 Dreze and Sen 1989; Przeworski et al. 2000; Feng 2003; Harff 2003)。

但是,民主化研究的大部分都忽略了研究民主的偏好聚集本身。社会选择问题因此甚至从概念上被回避了。这些研究要么假定充分的民主偏好聚集可以来自机制条件的引入和/或巩固稳定;要么假定这些条件非常关键,因而基本上无须考虑后续的政策结果;要么假定我们已知公民们(应该)需要什么。即便是那些直接以偏好聚集作为对象、以澄清公民偏好与政府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主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稳固确立的民主政体上面。

#### 四、偏好聚集与多重议题的一致性

民主的偏好聚集着眼于公民偏好,并在选择权威的公共政策时对它们予以系统考

虑。在少数大规模的民主国家,在少数问题上,也许会通过全民公决的方法直接了解公民们的政策偏好。比如,一些欧洲国家会直接就它们与欧盟或欧洲货币体系之间关系的变化询问公众的意见。不过只有瑞士在日常政策的制定中频繁地采用全民公决的方法。在大多数民主政体中,国家层面上把公民与政策制定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通过多党竞争选择政治的制定者。比较政治学中有三个方面的经验研究较为深入地考察了竞争选举中选举在聚集公民偏好方面的作用。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都涉及确认公民偏好的手段,并表明了选举中的竞争以及对决策者的选择如何(直接或间接)聚集了这些偏好。不过至少直到最近,还没有一个方面的研究进行到最终的一步,即把政策制定者的选择与实际公共政策的产出关联起来,因为这需要考虑到当事者(承诺的履行者)以及其他影响公共政策产出的因素。我们将在结论中回到这一点。

比较政治学中对公民倾向与其政策制定者立场之间的关联最透彻的分析,建立在对美国的议题汇集的研究基础之上。1963年,沃伦·米勒和唐纳德·斯托克斯采用公众意见调查的方式得出了美国不同国会选区公民的议题立场,并且把这些立场与各选区众议员的偏好、认知和行为关联起来( Miller and Stokes 1963)。在这一开创性的论文中,他们提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模型,以保证经验研究中“对选民因素的控制”;明确而有远见地指出公民信息的缺乏导致的困难;考虑了不同维度的公众意见之间的联系;而且讨论了政党在这一联系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影响国会议员行动的因素;等等。

米勒和斯托克斯把选举视为代表必须受到公众意见影响的主要原因。不过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在美国,不同的政策领域内由选举实现的这种联系会有所不同。“在社会福利领域代表关系最近似于负责任的政党模式”,这个领域政党通常会推举政策立场上有系统区别的候选人( Miller and Stokes 1963, 371 页)。他们发现,在这个领域,选区内的多数与胜选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与失败的候选人之间则呈负相关( Miller and Stokes 1963, 359—360 页)。另一方面在公民权领域,代表关系似乎更多地是由议员及其挑战者的认知,以及他们对选区内大多数选民的立场的相互预期所决定。

米勒和斯托克斯研究的直接目标就是民主的偏好聚集及其结果,这一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第一,他们的研究展示了如何运用调查研究检验公民偏好与政策制定者立场之间经验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被视为民主偏好聚集的证据;第二,他们证明,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民主竞争因果机制可以导致这种一致性,从而可以通过代议民主制形成民主偏好聚集的理论解释这种一致性。第三,他们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处理了社会选择问题:(一)在每个政策领域,它将不同议题在同一个维度上面排出顺序;(二)它并不试图进行跨政策领域的聚集。这样,米勒—斯托克斯公式只需要在两个重要的实际政策领域里找到民主偏好聚集的证据,而且避免了从单一的视角理

解公民偏好和决策者立场之间的关系(另外,如魏斯伯格[Weissberg 1978]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关系建立在双重选区制的基础上,仅限于立法机构的一个部门,因此并不需要把它们聚合为全体公民与全体决策者或选定政策之间的总体一致。对于进行一致性测量所面临的困难,亚琛在1977年和1978年[Achen 1977, 1978]出版的著作中才提出了重要的技术方面的批评)。

研究者们对米勒—斯托克斯模型进行了特定的修正,使之适用于多党议会的条件,并且一般把政党而非地理选区作为衡量一致性的单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把这一修正后的模式运用于其他国家,到现在为止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比较研究的传统。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是对单个国家的分析:荷兰(Irwin and Thomassen 1975)、意大利(Barnes 1977)、德国(Farah 1980; Porter 1995)、法国(Converse and Pierce 1986)、澳大利亚(McAllister 1991)、英国(Norris 1995)、瑞典(Holmberg 1989, Esaiasson and Holmsberg 1986),新西兰(Volvles 1995, 1998)以及挪威(Matthews and Valen 1999)。(还包括马尼奥关于中国半竞争型选举的出色研究[Manion 1996])。这些研究和米勒—斯托克斯模型至少有两个相同点。一是关注公民意见形成、公民知识的低水平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将这些意见与更成熟、更具体系性的精英意见相比较的问题。它们深入研究了每个国家公民所处的环境,有些时候还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差异(通常也将它们的研究结果与对美国的分析进行对比)。二是对多重政治议题的认真考察。它们描述了选民及其党派代表之间在不同议题上可衡量的、但又有变化的联系。通常它们是通过当地选举竞争的特征来探究以上问题。

除了上述国别研究之外,从达尔顿(Dalton)1985年对一系列议题上欧洲议会候选人对其党派选民的代表性的研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达尔顿提供了一个技术方面的杰出范例。他提出了对经验问题上的代表性进行测量的多重方法、强调选民和代表之间的接近(中间路线)、相关性和回归系数,以及集体的一致性。他还清楚地阐明,在“责任政党模式”下,通过选民对政党提供的不同政策组合的选择,如何创造出一种能够对公众的影响力加以说明的、关于选民—代表集体性一致的理论模式。

米勒和斯托克斯传统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米勒自己编辑、并在其去世之后不久出版的文集《西方民主中的政策代表》(Miller et al. 1999),该书收录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目标宏大的研究论文。作者们的目标,是基于已出现的关于五个国家中公民—立法者代表关系的一批研究成果,对主要得自“责任政党政府”模式的假设进行跨国检验。但是,由于他们对代表关系的理解和衡量标准各不相同,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了一些相去甚远的结论,比如在政党体系的组织程度与一般议题上一致性的高低之间的关系方

面就是如此(参见 Pierce 1999, 31 页; Holmberg 1999, 94 页; Thomassen 1999, 45—51 页, Wessels 1999, 148—151 页)。

同年,施密特与托马森出版了《欧洲联盟的政治代表与合法性》(Schmitt and Thomassen 1999)一书,提出了一种“责任政党政府”的模式,在该模式中,通过各政党提出相互一致的政策选择形成议题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一点在“欧洲层面”的代表性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对 199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公民和候选人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从左向右的维度上,选民与代表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的相互一致性,这显然是由选民的选择与政党提出的政策(包括国家层面和欧洲层面)造成的,而且与“责任政党模式”的条件相符。另外,在大量的全欧性议题方面,选民与候选人之间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对一致性,无论议题是由政党还是由相关国家(更有力地)提出来的(Thomassen and Schmitt 1997, 175 页; Schmitt and Thomassen 1999, 200—205 页)。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比如边界和共同货币),选民与政党的绝对立场相去甚远,候选人与选民相比更倾向于支持一体化。

秉承米勒—斯托克斯传统的第三种最近出现的跨国研究可见另一个论文集中由霍姆贝格(Soren Holmberg)所撰写的章节,它比较了丹麦、冰岛、挪威以及瑞典等国政党选民及其议会议员的政治立场(Holmberg 2000, 155—180 页)。霍姆贝格提出了一种两极化的结果,表明政党选民中的大多数与其国会议员之间的一致/分歧程度。他关于公民和立法机关集体(而非选民—政党的两分)何时形成赞成/反对态度的多数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霍姆贝格认为,在“处于政治争论核心的显著的、政治化的议题上”,选民与政党代表之间的一致性会更高,并证明在四个与“左—右”维度相关的议题上这个论断基本成立(参见 Thomassen 1994, 1999)。较好的共识可能是绝对的,也可能是相对的。但即便是 72 个这样的议题中,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大多数公民和他们的政党代表也在 15 个上面未能取得一致(约 21%)。霍姆贝格的数据中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各政党国会议员中多数派立场的高度一致。几乎所有的左派和社会民主党议员都选择了极左的立场,而几乎所有的保守党和进步党都采取极右的立场。如果从左往右对各政党的情况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总体而言保守立场的支持度有相对增长,但公众的主张比他们的代表更加泾渭分明。这意味着,很多政党都有少部分选民支持立法机构中仅仅是其他党派的代表所持的立场(许多国别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基切尔特、曼斯菲尔多娃、马尔科夫斯基和托卡合著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制度:竞争、代表和党际合作》(Kitschelt, Mansfeldova, Markowski and Toka 1999)讨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等几个新兴民主国家中议题代表和

政党选民代表的两重性问题<sup>①</sup>(1999, 309—344 页)。他们在使用数据表明每个国家不同议题(以及左右分野)方面代议制的聚集特性时,还考虑到了政党规模的问题。除“委托代表”之外,他们还提出了另外两种重要的民主代表模式,即“极化的委托制”和“温和的委托制”。他们并不是把这些模式视为民主的规范标准,而是认为,它们对于民主制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如公民动员、有效的政策领导,以及政治冲突的集中或分散等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1999, 80—88, 340 页)。

这些基于米勒—斯托克斯传统的研究,针对不同议题、不同条件下的偏好聚集积累了大量的国别信息。此外,关于选举竞争在偏好聚集方面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学者们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一)对议题偏好和党派立场的研究反复证明,政党代表的偏好和立场比普通公民更具结构性(可以通过这个党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立场加以推测出来)。因此在某些问题上,代表们的意见会与其党派立场有较强的关联,而公众的意见则不会,这就可能造成在这些议题上双方意见严重脱钩,某个党的国会议员可能代表了另一个党的选民的意见。这种情形的长期选举动力机制尚不明朗(但可参见 Holmberg 1997 对瑞典的研究)。

此外,代表的意见越一致,与其选民相比就会显得越极端。有时候可能出现较高级别的相对“一致性”,即各党派的代表与其支持者一同分为不同阵营,但相比而言,代表们会比他们的支持者更一贯地带有或“左”或“右”的立场。这种模式在基切尔特等人 1999 年的著作中被称之为“极化托管”关系,并出现于许多经验研究中(如 Holmberg 2000)。如果相关议题的一致性较高、偏好的强度较大、在单个议题上人们的偏好与“中间立场”的距离较远,就可能产生这种情形。

(二)政党议题的一致性研究表明,在那些与政党竞争的一般维度紧密相关的议题上面,代表性(一致性)至少是相对,甚至可能绝对大一些。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程式化的事实(如 McAllister 1991; Kitschelt et al. 1999; Holmberg 2000)。这种简化可以减弱理论上的社会选择难题,下一部分将会具体讨论这一点。

(三)另外,尽管比较研究不太注意那些因选民总体上不可能接受,从而也就被所有政党加以回避的政策立场(正如米勒和斯托克斯在民权领域所提到的那样),但它们似乎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的关联性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党都不会给出彼此相对的选择,我们也就很难找到相关议题上党派间的一致性,但也许选民和代表的主张会

<sup>①</sup> 原文为“issue representative of party voter-representative dyads”,疑为“issue representative and party voter-representative dyads”之误。——译者

更接近。选民对政党的影响可能来自政党对选民反应的预期,而非投票者选择的结果。唐斯模型认为,这种情形为两党制所独有。但如果选民们对某个议题并没有特别的立场,那么它也可能在多党制下出现。从经验上看,霍姆贝格 2000 年对北欧各国情色作品问题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一般来说,分别考虑议题或者议题的维度可以避免理论上的社会选择问题。而且,在每一个议题的基础上考察公众和政策的一致性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特色。威尔(Weale)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他指出,如果在公众对可能的政策组合的偏好中存在一个“孔多塞优胜者”<sup>①</sup>,那么通过研究每个议题上的中间值(大多数)就可以发现这一偏好;而如果在多维的偏好结构中不存在“孔多塞优胜者”,则这逐一寻找多数的方法至少是一种可取的、能够得到某种结果的民主程序(Weale 1999, 146—147 页)。当然在直接投票中通过其他形式的组合也许能够得出更好的结果——不否定阿罗悖论的存在——但对于威尔来说这并不能使多数决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程序。他指出:

在对多种政策选择的比较中,只有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才能够满足充足理性的要求。在复杂的情景中,公民们需要加以选择的并非逻辑一贯的政治纲领。通过对议题的逐一考察,我们也许能了解每一个议题上多数人的愿望,但通常不可能知道所有议题上的多数的交集是否代表了公众的普遍要求。但是,在每一个议题上取中间值乃是我们了解公众意见最好的方法。(1999, 147 页)

威尔还提出,公众通常不可能意识到潜在的社会选择问题。原因是一方面,政策制定常被分派到高度专业的部门和组织机构;另一方面,党派竞争显著减少了可能的特定选项,可供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1999, 146 页)。

从民主设计的角度来说,最后一点多少能给人带来些许安慰。因为它意味着有些政策制定规则和有些选举及政党制度会更多地,或在更早的阶段减少可能的政策选择项。这种排除法可能有效地掩盖了民主的政策组合潜在的优点。

## 五、作为偏好聚集的单维议题一致性

里克尔在其对“民粹主义”的民主论或者民主的“托管”论提出的批评中承认,如果具备一系列条件,则有可能在“公民需求”与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和行为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如果通过讨论、辩论、公民教育和政治社会化使选民对政治问题形成一定的

<sup>①</sup> 在对多个备选项进行两两相比较的对比中胜过其他所有备选项者。——译者

共识(可通过单一峰值加以证明),那么就能够保证获得一种具有可传递性的政策结果。”(Riker 1982, 128 页)

上文提到,米勒—斯托克斯传统对多重议题的一致性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政党竞争会存在一个基本维度,许多特殊的议题立场则与之相关。正如里克所指出的,当这样一个单一维度出现的时候,就能够对公民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偏好的一致性所体现的民主特性进行分析。的确,有一个天然的民主偏好聚集的典范——中间选民与政策制定者的立场一致。之所以选取中间选民的立场,是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一立场能够在它与任何其他立场进行的二选一的投票中占上风。政策制定离中间选民越远,则失去的选民就会越多(当然,这一标准并没有考虑偏好的强度或者多重议题的维度)。

在对偏好聚集的经验研究中,观察的目标是“左—右”之间(在美国的研究中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对峙,这是一个单一议题的维度,它结合了许多特定的议题立场,对代议制国家的公民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的研究证明,在成熟民主国家的政治话语中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维度。在很多(并非全部)国家进行的公众舆论研究表明,公民们能够在“左—右”对峙或者其他类似的维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维度结合了诸多具体的议题,而且能够把新出现的明显的议题也吸纳进去(如 Inglehart 1984)。专家们进行的多项跨国调查表明,人们能够根据通常由政府或者经济形势决定的议题(虽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有所不同),把每个政党都放置在一个适当的位置(Castle and Mair 1984; Huber and Inglehart 1995; Benoit and Laver 2000)。所有这些研究均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公民与政党的相对立场。研究证明,政党支持者的自我定位与专家对政党的定位高度相关(Gabel and Huber 2000)。

研究者运用另外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对工业化国家政党涉及不同重要议题的竞选宣言(选举承诺)进行了大规模研究,并且提出了一种把不同政党置放在一个跨国的“左—右”维度上的方法,从而使它们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可比性(Budge et al. 2001)。金和福尔定据此提出了一种方法,可以根据这些政党的立场以及关于选民投票时进行选择的一些假定,对中间选民的立场进行推断(Kim and Fording 1998)。

如果在一种单维话语中定位选民及其代表确有意义,那么在单一单维空间中对政治竞争和政策制定的抽象研究就可以得出一些在理论上强有力的结论,并可用来解释偏好聚集的相关过程。科克斯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1997, 第 12 章),认为中间选民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一致性,在实行单一选区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会有所不同(参见 Huber and Powell 1994, Powell 2000)。在单一选区多数制之下,根据杜维吉尔法则(Duverger 1954),成熟的民主国家会出现两个政党相互竞争;而根据唐斯的交汇论(Downs 1957),这两个政党会向中间选民的立场靠拢。在比例代表制之下,根据选举竞

争理论,政党会与选民一样分布在政策空间,而且这种分布最终会在立法机构中反映出来;而根据交易理论,中间政党的主张会严重影响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如 Laver and Schofield 1990)。因此,两种制度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形成代议制中的一致性。至于哪一种制度更可能破坏向中间立场的汇集,则主要取决于政党竞争和讨价还价的失败是出现在选举阶段(这在单一选区制中至关重要),还是出现在立法交易阶段(这在比例代表制之下更具实质意义)(Cox 1997,第12章)。

上文曾经指出,一些国别和跨国研究发现,在“左—右”对峙的维度上,以及在不同的特定议题上,公民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最近两项对代议制的经验研究从政治话语的单一维度入手研究了偏好聚集的问题,两者都重点考察了选举规则及其对中间公民(或选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的一致性的影响。鲍威尔与多名合作者的研究,对不同国家内部调查给出的中间选民自我定位的立场和专家得出的立法机构、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立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Huber and Powell 1994; Powell 2000; Powell and Vanberg 2000; Powell 2006)。这些研究假定上述差异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中间立场基本上不具可比性。它们稳定地显示,单一选区制通常不能使两党趋中(杜维吉尔法则和唐斯交汇理论的“失败”是可能的原因。也可参见 Grofman 2004 对唐斯交汇论在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局限的分析)。交汇的失败通常使获胜者、议会中的多数,以及政府远离中间选民。

图 27.1 显示了从 1950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间,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及新西兰这五个实行单一选区制的议会制国家多数党(水平方向)和第二多数党(垂直方向)与中间选民之间的距离。可以看出,尽管约一半赢得选举的多数党与中间选民的距离在 10 以内(最大距离为 100),但是另一半的距离则比较远,有时甚至非常远。这与比例代表制之下多数党与中间选民之间的平均距离大致相同。不同国家、不同选举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比如加拿大的大党就与中间选民非常接近),但是每个国家至少有一个获胜的多数党与中间选民的距离超过了 20。大多数国家都出现过若干次两个党均远离中间选民的选举。

在形成更具代表性的立法机构和促成更加接近中间选民立场的政府方面,比例代表制特有的两阶段交易过程看来一直比较成功。不过,诸如选前联盟或者大党极端化这样的因素也可能使形成的政府远离中间选民(Powell 2006),并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造成相当不同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如果用金和费尔定的方法确定中间选民的立场,再通过竞选宣言确定议会和执政党的立场,并且对两者之间的距离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出一些具有可比性的短期结果(McDonald, Mendes and Budge 2004)。麦克唐纳和他的合作者们发现,议会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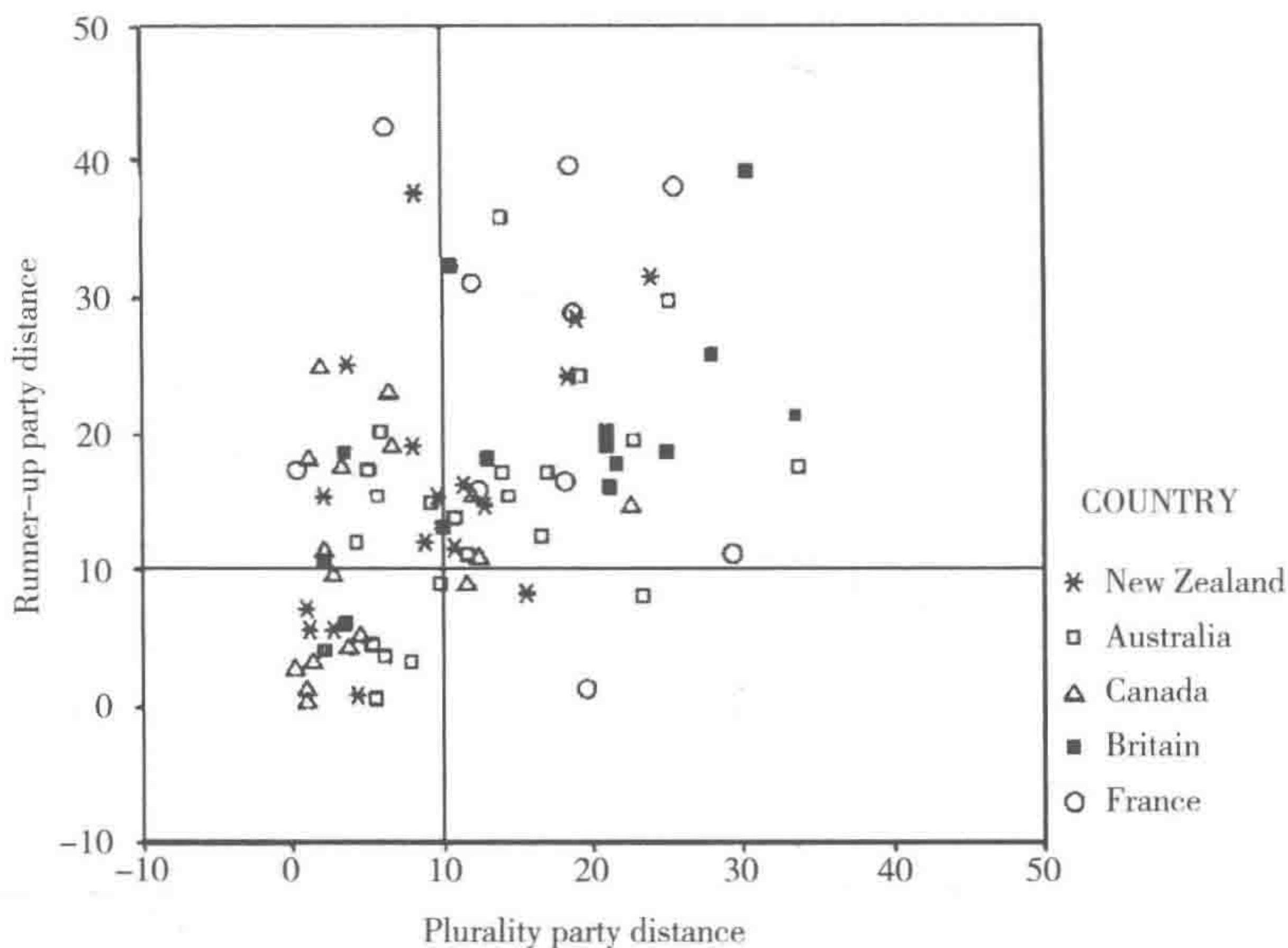


图 27.1 比例代表制之下政党与中间选民的距离

政府与中间选民之间短期内的平均距离,在单一选区制之下要大于比例代表制之下。由于与鲍威尔的研究相比,他们使用的是更长时段的系列和不同的技术手段(虽然两项研究针对的国家大致相同),所以这些可资比较的发现还是有益的(图 27.1 运用了这一技术手段)。他们也能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讨论一系列有趣的发现。

有大量的(虽然不是没有矛盾的)理论和前面提到的关于政党竞争和政府形成的经验研究可资基于单维话语的偏好聚集研究利用。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向度上只存在一种政治话语的假设解决了社会选择的问题。在中间选民与其期望的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方面,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趣而重要的结论,并且确认了在不同的选举规则下不能达成一致的条件。尽管这两项研究都着眼于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但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方法不能被扩展具有其他政策制定机制的民主机构,甚至其他类型的政党竞争研究中。另一方面,“左—右”对峙的政治话语显然不过是对政治议题联盟的简化,对于任何国家的全体选民来说这种对峙并没有意义,而且在一些国家它也完全不足以准确描述选民偏好与政党竞争的实际格局。对于新兴民主国家,或者其政党制度变得不稳定的国家来说,这种简化更成问题。

这种共同的话语得以形成(或者不能形成)的条件尚不清楚,因而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参见 Carey 2000, Kitschelt 2000)。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政策的审慎讨论能导向实质性的共识,或者至少能在讨论的范围上达成共识;认为公民的政策“偏好”固定不变具有误导性,应将其视为对可能结果的具有可塑性的判断(Weale 1999, 141—

143 页)。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理解整个过程中的条件与限制将会显得更加重要。

从方法论上来说,对于左—右对峙的政治话语的一致性的研究,依据的是公民调查、专家调查以及专家对政党竞选宣言的解读,其中每一种都存在导致错误和偏见的原因,另外在很多国家这类调查也并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认为单维的政治话语能够充分反映公众的偏好,这是一个强假设,因而也颇具争议。因而毫不奇怪,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传统就把投票(而非话语)作为选民偏好名义上的表达方式,并把投票与政策制定者的选择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偏好聚集而加以研究。

## 六、以选票反映偏好:偏好聚集与票决一致性

第三种对偏好聚集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将公民的投票视为他们的偏好唯一真实的反映,然后研究投票的结果如何转变为对政策制定者或者公共政策联盟的选择。这种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有悠久的传统。显而易见,投票行为是公民偏好的一种相对“过硬”的指标,它既不基于人为强加且经过特殊设计的问卷调查,也无须借助公众可能无缘参与的政治论争。在每张选票效力相等的情况下,投票可以被视为民主机制的完美典范。因此可以理解,分析家们为何投入大量精力去研究选举结果的聚焦。而且,单纯的投票行为迫使选民必须同时考虑自己关心的所有议题,并且将它们化约为单一的选择或者排序(在极为少见选举制中),因此研究投票的学者不必自己费心去解决如何把不同议题上的偏好结合在一起的问题。这样,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忽略集聚社会选择的问题。

对于选票—席位集中的研究是政治科学中一个高度发达的领域。尽管密尔(Mill 1861/1958)、夏特施奈德(Schattschneider 1942)和杜维吉尔(Duverger 1954)都意识到了不同选举规则下选票—席位集中的困难,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规范着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则是道格拉斯·赖伊的《选举法的政治影响》一书(Douglas Rae 1967/1971)。这本小书精彩而全面地区分了多种多样的选举法,总结了它们的一些重要特征,系统介绍了对选票—席位“非均衡”<sup>①</sup>状态的测量方法、议会多数的形成以及政党制的碎片化,并通过对 115 次选举中选举法的经验影响进行分析作出了其他一些贡献。赖伊证明,在这些选举中,选举规则在决定选票如何转化为席位方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选区规模”(每个选区的平均代表人数),它大大削弱了计票方法和其他相关特点的区

<sup>①</sup> 即某个政党最终得到的席位与它实际得到的选票不成比例的情况。——译者

别所造成的同样重要的影响(Rae 1967/1971, 138—140 页)。最有可能导致这种不对称现象的选举规则就是单一选区制,它在很多国家广为采用,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等,通常也被称为“胜者全胜”(FPTP)的原则。赖伊的经典研究还潜在地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尽管政党投票是一个有意义的同质性概念,但投票结果如果体现为议会议席却是一个重要问题。

赖伊在经验分析方面划时代的贡献得到了后来一系列研究的发展和完善,其中既包括经验层面,也包括方法论层面(参见 Groffman and Lijphart 1986;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Lijphart 1994; 以及 Powell 2004 年的评论,尤其是 275—280 页)。这些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于《选举研究》杂志发表的一些论文,但也出现在其他许多政治学的刊物上,它们极大地扩展了赖伊对选举规则与选举结果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正如加拉赫尔在其 1991 年的著作(Gallagher 1991)中所指出的,“均衡(proportionality)”这个概念的本身就包含了不同的规范性版本,这可以部分地通过比例代表制之下不同的计票规则体现出来。人们还可能为达到某些实际的目标而对特定的规则加以调整,包括政治稳定和规则制定者的党派目标等等,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别研究所证实。

虽然对选举法的分析主导了对选票—议席一致性问题研究,但另外两个主要变量也占有突出的位置。第一个变量是选票的地理分布。选举规则划定的选区规模越小,则它对于代表性的影响就越大,在单一选区制之下当然就达到最大。因此非常自然,由于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的学者一直就在这种选举制之下工作,所以对地理因素的作用就非常敏感;相反,那些在选区规模较大且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工作的学者,则常常会忽视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学家对变异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探讨,他们把一个国家选区的划分视为一张叠加在偏好分布地图之上的地图(如 Gudgin and Taylor 1979; Taylor and Johnston 1979; Taylor, Gudgin, and Johnston 1986)。有些分布会因为选区内的失败者而产生更多的“废票”,也会因为选民的摇摆而产生席位的摇摆。更多党派的加入会导致更多的废票,因为这或者意味着选区内的获胜者只得到了低于 50% 的选票,或者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压倒性的胜利都会越来越少。如果政党在地理上比较集中,则不会出现这种结果,当然这意味着不同政党将在不同地区进行力量不对称的竞争。出于党派利益进行选区划分,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在两个选区都出现胜败两方力量的平衡。

每个选区选民数与代表数之间比例的不平等也可能导致“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平等可能源于代议制规则本身(例如西班牙城市选区代表性不足的现象),通常我们称之为议席分配不公。不同选区投票率的不同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比如工党就可能取得相对更多的席位,那是由于城市地区的投票率较低,因此它获得的实际支持率并

不高。政治地理学家对两党制之下选举误差的分析强调了四个方面的因素：投票率、席位分配不均、第三党以及选区划分（有意无意地重新划分选区）。特别是可以参考约翰斯通、罗塞特和帕蒂 1999 年的著作（Johnston, Rossiter, and Pattie 1999）及其参考文献。虽然这一著作的作者们主要研究的是英国和新西兰，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因为斯奈德和萨缪埃尔 2001 年发表的评论（Snyder and Samuels 2000）已经补充了拉美国家席位分配不均的相关情况。

学者们长期以来还从不同角度发现，“过多”政党也会给代议制带来问题。夏特施奈德（Schattschneider 1942, 75 页以下）和杜维吉尔（Duverger 1954, 374 页）指出了在单一选区制之下政党数量超过两个时可能带来的问题。图 27.2 显示了“有效”政党数量从 2 到 5 之间的情况，在单一选区制之下，随着政党数量上升，选票—席位的不对称性也迅速加剧（实线），而在这个区间，比例代表制的选举结果却比较均衡（虚线）。

泰格帕拉和舒加尔特（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证明，政党数量过多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只限于胜者全胜的选举制。而且，随着更多政党加入竞争，不均衡会系统性地加剧。科克斯 1997 年的著作《让选票有意义》（Gary Cox 1997）提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对针对选举规则、政党数量以及选举失衡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科克斯还借助大量关于不同选举规则下策略投票的纯理论文献，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建立了一个关于杜维吉尔法则的“微观基础”的模型。吉巴尔德（Gibbard 1973）和萨特施威特（Satterthwaite 1975）从理论上证明，“策略性投票”（为一个更可能获胜、但并非立场与投票者最接近的候选人或政党投票）在任何选举制度下都是合理的，雷斯（Leys 1959）和萨托利（Sartori 1968）也曾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得出同样的结论。“杜维吉尔法则”的启示之一是希望在单一选区制之下只有两个政党，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则是对政党领袖和/或选民进行成功的协调，从而使政党数减少到能赢得选区内唯一席位的合理程度。这种协调包括政党领袖的策略、选举规则和对选民的预期。科克斯认为，从理论上说，政党的数量应该减少到不大于选区规模+1 的程度（1997, 31—32 页, 99 页以下）。

当协调失败、“过量”政党为跨越当选门槛而竞争时，代表性失真的水平就会上升（假设跨区抵消影响相等），正如图 27.2 中单一选区制的情况那样。虽然任何选举制度都需要某种调节，但在选区规模较小的制度下调节的任务更重，其失败的代价也会更高。胜者全胜的制度是一个极端案例，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政党可能在很多选区都拿到了相当数额的选票但是依然不能拿下其中任何一个选区——因而它剥夺了相当部分选民的被代表权。科克斯关于协调失败的理论条件（政党目标、信息、预期，以及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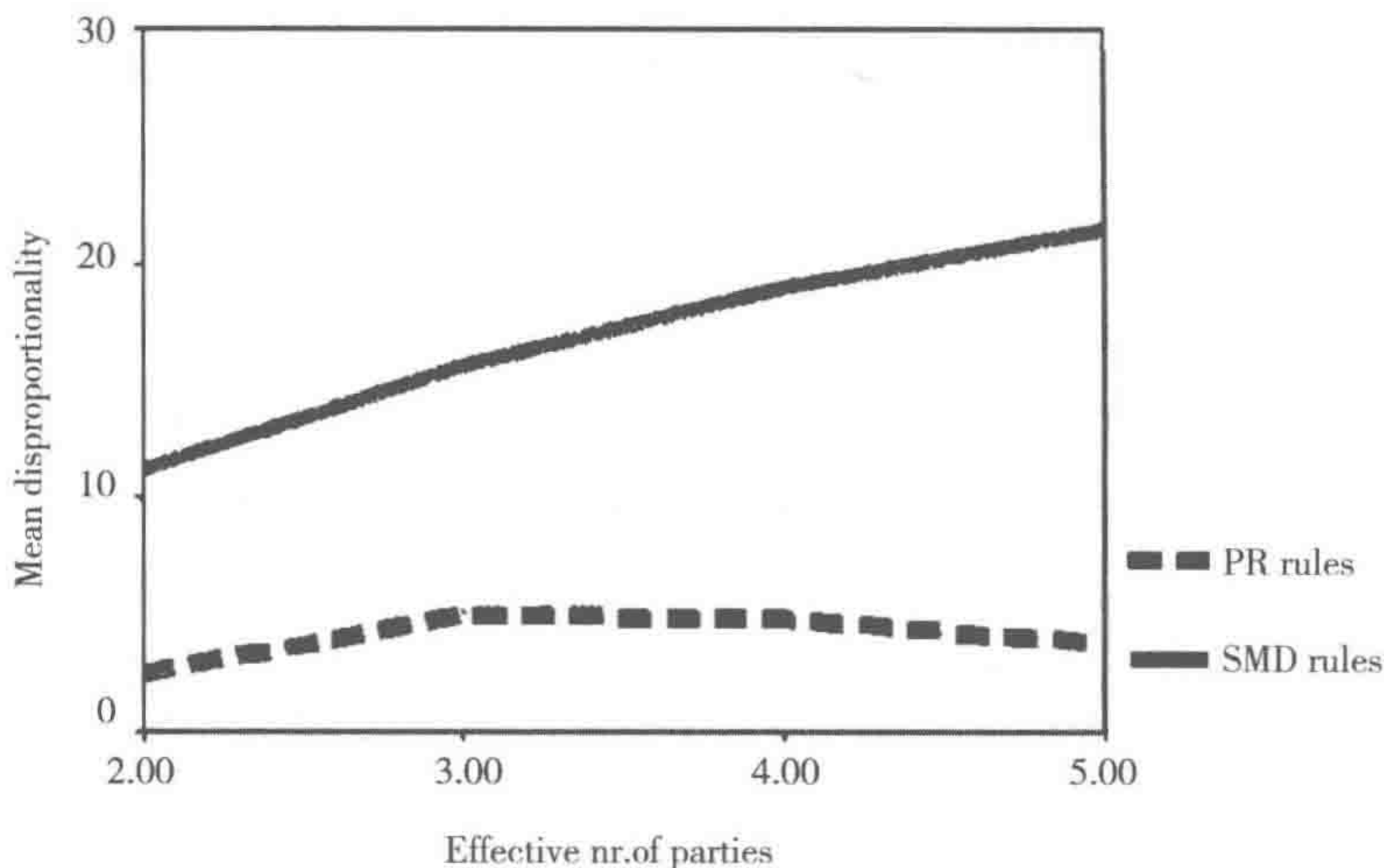


图 27.2 政党数量造成的选票—席位不对称性：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

此时就会得到满足,更不用说还有地理因素的影响。

我们对于选举规则、偏好的地域性分布,以及政党数量等因素之间复杂互动的认识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是科学研究进步方面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而且,可以说这些研究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偏好,其出发点是公民投票,即个体公民在政治领域作出的具体选择。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公民们通过投票表达它们的偏好时,均衡的偏好聚集可能会失败的条件。

因此,我们不能过高估计选票作为偏好显示工具独有的权威性。选民只能从划定的范围中进行选择。我们不能通过投票结果推断他们作出的这些选择与每个人的具体偏好之间的关系。有些选民会觉得候选人提出的主张很切合他们自己的相关议题偏好;但另一些选民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得不被迫“一揽子”接受与自己的要求相去甚远的政策。选民的偏好也可能会与政党或者候选人提出的政策相反。在多党制之下一个极端主义的政党因获得多数选票而胜出,这可能会导致大家忽略一个事实,即有三分之二的选民是极端主义的反对者,但他们的选票被分散了(关于依据获得多数票的胜出者来判定政治偏好的问题之理论分析,可参见 Weale 1999)。选民甚至不会为他们最支持的党投票,因为他们觉得它不会胜出,所以作出了“策略性”的选择,但这影响那些较热门的候选者最后的命运。这些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问题,则可能取决于选民偏好的分散程度、政党竞选纲领的变化,以及选举规则的不同。

另外,诸如选票—席位分析这样的选票聚集研究,通常假设选择政党或者候选人对每位选民来说都意味着相同的事情。那种认为用在一个选区失败的政党得到的票数抵消在另一个选区获胜的政党失去的票数可以得到均衡的结果的看法,其依据正在于此。

但在新的或是高度分散的政党制度中,这一判断未必成立。比如“同样的”政党标签可能在不同区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或者政党内部存在较大的派别,它们即使在同一个选区内也拥有不同的支持者。

考虑到以上各种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票决这种表面上颇具权威性的指标实际上带有很多人为的、建构的性质,在政党偏好,更不用说议题偏好(后者与前者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相联系)方面传达的信息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多。因此,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通过调查,确定偏好是否被选票所扭曲。的确,当存在多个选择项的时候,调查研究在提供有关偏好的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且,当我们把目光从选票转移到政策制定者身上时,另两个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规范性的聚集标准的问题。经典的选票—席位研究文献都沿袭赖伊的观点,把均衡作为标准。也就是说,一个政党在立法机关中的席位应该与该党获得的选票成比例,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不均衡”,对此可以有诸多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加以衡量。虽然经典的选票—席位研究文献以均衡性作为标准,但其他的标准也不是没有根据,比如席位变化对选票变化的敏感度(responsiveness),敏感度越高则效果越好。格尔曼和金(Gelman and King 1994)所谓的席位变化对选票变化的“敏感性”就强调了政党得票变化(围绕平均水平波动)与该党在立法机关的席位变化之间的放大效应。这一研究遵循了美英政治分析强调竞争价值和波动比率的传统(参见 Rae 1967, 26—27、100—101、145 页)。格尔曼和金明确指出,美国人强调敏感性在选票波动方面的放大作用,而注重均衡的观点则多多少少忽视了敏感性的问题,这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体现(1994, 544—545 页)。

在为数不多的明确从以上两种观点出发对选票—席位关系的研究中,卡茨(Katz 1997)把均衡性和“敏感性”视为两种相互竞争的民主特性。他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受到大致相同的因素的影响,却相互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Katz 1997, 138—142 页)。鲍威尔遵循了类似的思想路线(Powell 2000, 第 6 章),认为民主的“均衡观”和“多数观”体现了选票及其在立法(或政策制定)机构中的代表性的不同关系(也可参见 Powell 1978)。

基于选票的偏好聚集最后一个难点超越了各政党或者获胜的政党所得的选票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性这一问题,而涉及政策决定者的选择本身。在这一点上,均衡性聚集的支持者们会倾向于多党联盟,因为这种体制能够使政策制定者和立法机构中对各种政策选择的考虑最大化。那些支持通过多数实现聚集的人,则可能倾向把全部政策制定权都交到得票最多的获胜者(理想情况是得到多数票的赢家,但是经验上较少见)手里。因此,选票—政府之间的一致性,既可建立在由所有获得选票的政党组成的政府

中代表均衡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得票最多的获胜政党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加以主导的基础之上。鲍威尔在一项对于选举、政府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研究中发现,如果按照均衡型的和多数型(包括胜者全胜制和其他单一选区制)体系各自的标准,则它们“在聚集方面都表现良好,但如果用对方的标准来衡量则都表现糟糕”(2000,第6章)。这与卡茨的发现相同,而且也意味着在选举结果的均衡性和敏感性之间只能二者择一(不过,在多数制之下由于很少有政党能够赢得绝对多数的投票,所以较高的敏感性通常需要承认获得相对多数票的政党有资格得到那部分未被分享的统治权)。

要研究议会制国家选票—政府之间的一致性可以借助经验分析的成果,特别是那些着眼于议会多数党在组建政府中的角色的成果。在议会制和混合制中,组建合法政府的规则通常偏向于多数授权和信任投票,虽然从经验结果来看会有一些相当不同的变异。但是,大多数政府形成的理论和研究强调的都是政党在某种政策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参见 Laver and Shepsle 1990),而这通过投票分析和政党规模都不可能得知(见 Martin and Stevenson 2002)。在总统制下,虽然仍然有一个如何解释偏好的问题,但选举能够直接影响政府的构成。

虽然关于偏好聚集和政党得票的代表性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且也比较复杂,但它仍然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就政党得票体现了被列举出的偏好而言,政党得票的聚集过程直接描绘了偏好聚集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不同因素,如选举法、选票的地理分布以及政党数量等,如何使数百万张等效的选票聚集到几位政策制定者身上。它也使我们注意到偏好聚集的规范方式和经验方式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便是假定选票并不能直接体现偏好,政党承诺和选票的聚集也会部分地导致议题的汇集和左—右的汇集。

## 七、结 论

四种研究方法体现了四种对社会选择挑战的回应,或者说每一种都用不同的方法回避了这个问题。民主化研究探讨了引入或维持自由、民主的选举的条件,但没有分析它们给偏好和政策的一致性(均衡)带来的影响。议题汇集研究在对议题进行逐一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公民议题偏好与代表立场之间的一致性,但并没有考虑议题之间的协调问题。左—右议题一致性理论假定了一个单维的公民和政党偏好空间,即公民和政党的政治话语,但忽略了不能压缩进单个维度的议题、选民和政党制度。选举聚集研究假定选票充分表达了公民偏好,但忽略了可能限制或者扭曲偏好与选票之间的一致

性的相关因素。因此,与一种全面的、在经验上具有较高包容性的研究相比,以上四种民主的偏好聚集研究都各有缺陷。

此外,上述研究一个共同的缺陷是都没有关注回应的问题,即政策制定者是履行了,还是背弃了他们公开的政策承诺。它们都假定,当政策制定者被选民选出,并且/或者承诺将体现公众的偏好时,偏好聚集过程即告结束。对于那些言而无信、仅追求个人利益的政策制定者,或者缺乏能力兑现其诺言的政策制定者,则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民主理论假设,民主过程有助于保证治理行为甚至政策输出与公民的愿望相一致。就此而言,偏好的聚集必须等到政策制定者证明他们言而有信之后才算结束。确实存在某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有些原本应该保证公民偏好与政策制定者的立场相一致的机构,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促进,甚至妨碍了政策制定者信守诺言。

关于竞选承诺和政策效果之间的一致性(例如 Klingemann, Hofferbert, and Budge 1993; Royed 1996; Thomson 2001),以及选举诚信的理论和机制(Przeworski, Stokes, and Manin 1999)的著述虽少,但近年来有所增加。斯托克斯关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拉美各国总统的政策变化,及其对选举和政策的影响的研究(Stokes 2000)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腐败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许多新兴民主政体中公民的要求得到有效反映的主要障碍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这些线索最终都需要汇聚在对民主偏好聚集的研究之中。

当然应该认识到,以上介绍的每一种对偏好聚集的大型研究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都增进了我们对于竞争性选举之下民主的偏好聚集的认识。如果不能引入并维持自由的、真实的、民主的选举的条件,那么其他基于选举的对偏好聚集的研究就毫无意义。如果选举过程的结果不能导致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公民偏好与制定政策的代表的立场相一致,则民主的偏好聚集就归于失败。如果公民的偏好与政党的竞争都能够在一个单维的政治话语系统中加以表达,那么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和经验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民主聚集成败的条件。把政党选票聚集为议会和政府的代表性,这是保证民主聚集效果的一项重要机制。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发现彼此的优缺点。每一种研究都以自己的方式切实地推动了学术的进步,避免了因里克尔(Riker)否认民主的偏好聚集而造成的停滞,并为一个更宏大的图景作出了贡献。它们表明,在理解和描述民主的偏好聚集方面,里克尔基于社会选择提出挑战并不是无法回应的。



## 参考文献

- ACHENC. 1977. Measuring representation: peril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805–15.
- 1978. Measuring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477–510.
- ARROW, K. J.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S. H. 1977. *Representation in Italy: Institutionalized Tradition and Electoral Cho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OIT, K., and LAVER, M. 2005. *Party Policy in Modern Democracies*. London: Routledge.
- BOIX, C., and STOKES, S. C.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 517–49.
- BRATTON, M., and MATTES, R. 2001.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447–74.
- BUDGE, I., KLINGE MANN, H. D., VOLKENS, A., BARA, I., and TANENBAUM, E. 2001. *Mapping Policy Preferen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 M. 2000. Parchment, equilibria, institu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735–61.
- CASTLES, E., and MAIR, P. 1984. Left-right political scal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2: 73–88.
- COLLIER, D., and LEVITSKY, S. 1997.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World Politics*, 49: 430–51.
- CONVERSE, P. E. and PIERCE, R. 1986.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Fr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X, G. W.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 A. 1956.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 1985.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party supporters and party elites in nine n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8: 267–99.
- DIAMOND, L. et al. eds. 1997.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REZE, J., and SEN, A. 1989.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 B. North and R. North. New York: John Wiley.
- ESAIASSON, P., and HEIDAR, K. 2000. *Beyond Westminster and Congress: The Nordic Experienc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and HOLMBERG, S. 1996. *Representation from Above: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Sweden*. Aldershot: Dartmouth Publishing.

- FARAH, B. G. 1980.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West Germany; the institu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ass-elite linkag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FEARON, J., and LAITIN, D.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75-90.
- FENG, Y. 2003.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ABEL, J., and HUBER, J. 2000. Putting parties in their pla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94-103.
- GALLAGHER, M. 1991. Proportionality, disproportionality, and electoral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10: 33-51.
- GELMAN, A., and KING, G. 1994. Enhancing democracy through legislative redistric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541-59.
- GIBBARD, A. 1973. 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 a general result. *Econometrica*, 41: 587-601.
- GRANBERG, D., and HOLMBERG, S. 1988. *The Political System Matters: Social Psychology and Voting Behavior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OFMAN, B. 2004. Downs and two-party converg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7: 25-46.
- and LIIPHART, A. eds. 1986. *Election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GUDGIN, G., and TAYLOR, P. J. 1979. *Seats, Votes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lections*. London: Pion.
- HARFF, B. 2003.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oloca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57-73.
- HOLMBERG, S. 1989.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Swede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12: 1-36.
- 1997. Dynamic opinion representatio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 265-83.
- 1999. Collective policy congruence compared. Pp. 87-109 in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 W. E.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Issue agreement. Pp. 155-80 in *Beyond Westminster and Congress: The Nordic Experience*, ed. P. Esaiasson and K. Heidar.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HUBER, J. D., and INGLEHART, R. 1995. Expert interpretations of party space and party locations in 42 societies. *Party Politics*, 1: 73-111.
- and POWELL, G. B. 1994. Congru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in two vis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6: 291-326.
-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NGLEHART, R. 1984.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leavages in western society. Pp. 25-69 in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 J. Dalton, S. C. Flanagan, and P. A. Bec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RWIN, G. A., and THOMASSEN, J. 1975. Issue-consensus in a multi-party system: voters and leaders in the Netherlands. *Acta Politica*, 10: 389-420.
- JOHNSTON, R. J., ROSSITER, D., and PATTIE, C. 1999. Integrating and decomposing the sources of

- partisan bias. *Electoral Studies*, 18:367–78.
- KATZ, R. 1997.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M, H. M., and FORDING, R. C. 1998. Voter ideolog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3:73–97.
- KITSCHOLT, H. 2000. Linka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in democratic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845–79.
- MANSFELDOVA, Z., MARKOWSKI, R., and TOKA, G. 1999.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LINGEMANN, P. L., HOFFERBERG, T. R. I., and BUDGE, I. 1993. *Parties, Policies and Democ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 LAVER, M., and SCHOFIELD, N. 1990. *Multiparty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YS, C. 1959. Models, theories and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al Studies*, 7:127–46.
- LIJPHART, A.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ALLISTER, I. 1991. Party elites, voter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esting three explanations of mass-elite differ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237–68.
- MCDONALD, M. D., MENDES, S., and BUDGE, I. 2004. What are elections for? Conferring the median mandat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1–26.
- MAINWARING, S. P., and SCULLY, T. R. eds. 1995.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ION, M. 1996.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736–48.
- MARTIN, L., and STEVENSON, R. 2002. Government forma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33–50.
- MATTHEWS, D. R., and VALEN, H. 1999.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 The Case of the Norwegian Storting*.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AY, J. D. 1973. Opinion structure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special law of curvilinear disparity. *Political Studies*, 21:136–51.
- MILL, J. S. 1861/1958.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ed. C. V. Shield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MILLER, W. E., and STOKES, D. 1963. Constituency influence in Cong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165–77.
- et al. 1999.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1995. May's law of curvilinear disparity revisited. *Party Politics*, 1:29–47.
- O'DONNELL, G. 2004. Quality of democracy: why the rule of law matt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15:32–46.

- PIERCE, R. 1999. Mass-elite issue linkages and the responsible party model of representation. Pp. 9–32 in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 W. E.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E, S. C., TATE, C. N., and KEITH, L. C. 1999. Repr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 to personal integrity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291–313.
- PORTER, S. R. 1995.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Germany: effects of candidate selection committees.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 POWELL, G. B.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7: 273–96.
- POWELL, G. B. 2006. Election laws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291–315.
- with POWELL, L. W. 1978. The analysis of citizen-elite linkages: representation by Austrian local elites. Pp. 197–218 in *The Citizen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S. Verba and L. W. Pye. Stamford, Conn.: Greylock.
- and VANBERG, G. 2000. Election laws, disproportionality and the left-right dimen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383–411.
- PRZEWORSKI, A., STOKES, S. C., and MANIN, B. 1999.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and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E, D. 1967/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IKER, W. H.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ROYED, T. J. 1996. Testing the mandate model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 45–80.
- RUNCIMAN, W. G. 1969.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RTORI, G. 1968.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ngineering. Pp. 261–98 in *Public Policy*, ed. J. D. Montgomery and A. O. Hirsch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TTERTHWAITE, M. A. 1975. Strategy-proofness and Arrow's condi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 1–7.
- SAWARD, M. 1998. *The Terms of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SCHATTSCHEIDER, E. 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CHEDLER, A. 2002. Democracy without elections: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36–50.
- SCHMITT, H., and THOMASSEN, J. 1999.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R., and SAMUELS, D. 2001. Devaluing the vote. *Journal of Democracy*, 12: 146–59.
- STOKES, S. C. 2001. *Mandates and Democracy: Neoliberalism by Surpris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AGEPERA, R., and SHUGART, M.S.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P.J., GUDGIN, G., and JOHNSTON, R.J. 1986. The geography of representation. Pp. 183–92 in *Election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ed. B. Grofman and A. Lijphar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and JOHNSTON, R.J. 1979. *The Geography of Election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and LIJPHART, A. 1985. Proportional tenure vs.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3: 387–99.
- THOMASSEN, J. 1994.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Pp. 237–64 in *Elec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d. M.K. Jennings and T.E. Man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olitical elites and mass publics: the role of belief systems. Pp. 33–58 in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 W.E.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SCHMITT, H. 1997. Policy repres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2: 165–84.
- THOMSON, R. 2001. The programme to policy linkage: the fulfillment of election pledges on socio-economic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 1986–1998.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0: 171–97.
- VOWLES, J., AIMER, P., CATT, H., LAMARE, J., and MILLER, R. 1995. *Towards Consensus? The 1993 Election in New Zealand and the Transition to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uck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Press.
- BANDUCCI, S., and KARP, J. 1998. *Voters' Victory? New Zealand's First Election und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uck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Press.
- WEALE, A. 1999. *Democra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EISSBERG, R. 1978. Collective versus dyadic representation in Cong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535–47.
- WESSELS, B. 1999. System characteristics matt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en representation studies. Pp. 1137–61 in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 W.E.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第二十八章 选举体系

瑞恩·塔杰帕拉(Rein Taagepera)

### 一、选举体系为何重要

谁在统治?选举体系在民主政体下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这个问题的回答。根据公众投票分配议会席位的规则,可以使一个获得25%选民支持的政党成为议会中的主要角色,也可以仅仅让它得到5%的席位。

选举体系包括有关选举的法律,也包括人们在运用这些法律时候的技巧。法律可以在一夜之间公布,但政治家和选民却需要好几次换届的周期,才能学会如何运用这些法律获得最大的利益。选举体系与政党体系交织在一起。即便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最早的选举,也会在代表机构中导致不同政党的结合。

比如说,席位分配的简单多数制通常最终会导致一种两党制体系(即著名的杜维吉尔法则,下面还将提到)。但是,也许在两个主要政党胜出之前,还有许多其他的政党在早期选举中表现相当成功。地区的多样性也会明显地阻碍这个过程。在这样一种多党制下,选举法发挥的作用可以与两党制之下类似,但选举体系则会有所不同,因为选民们在两党之外还可以另有选择。

本意的概述主要是关于选举规则,因为选举体系中这个制度性部分的影响不仅从定性的角度来看相对容易理解,而且从定量的角度来说也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精确。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历史和文化因素也许会在相同选举规则的基础上导致不同的结果。除了狭义的选举规则,其他的制度因素也构成选举体系的一部分。尤其是议会中议席的数量会影响代表性。

选举体系影响政治,但它们同时也是政治的产物,它们会因政治压力发生变化。很多学者在对这个双向因果关系进行初步研究之后,就断定选举法为政党制度的成因而

非结果。但在多少情况下,按简单多数分配席位的规则来源于最初的两党格局,在多少情况下两党格局又是这种规则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建立之初,其政策制定者就分为两个政党,那么他们也许会选择简单多数制以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如果正相反,最初的政策制定者分成多个党派,那么他们也许会因为安全起见而采用比例代表制,以减少自己彻底出局的风险。

直到最近,这一问题才开始被系统地加以研究(Boix 1999; Benoit 2004; Colomer 2005)。政党制度确实常常出现于选举法之前并决定了后者,而选举规则一旦出现,就会在保存最初的政党格局方面发挥作用。为了避免因果自证,我们需要重述杜维吉尔法则,即“用简单多数的原则进行议席分配常伴随两党制格局”。

选举研究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学术领域,处于政治科学的中心:

尽管有很多政治科学的问题并不以选举为中心,但是对民主实践的研究——选举在其中处于中心的地位——显然是整个政治学科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对于选举的研究不只关注选举体系,而对选举体系的研究也不只关注“议席和选票”,实际上,作为政治科学家,我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数量指标是每个政党和候选人得到的席位和选票的数值。(Shugart 2006)

对于政治学家来说,选举规则还有另一个吸引力,即制度设计的可能性。在选票既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不同的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议会代表的构成,然后提出修改规则的方案。当然,在不同的规则下,选民也许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例如,把简单多数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就可能鼓励选民将选票投给第三党。现实中改变投票规则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这得通过在旧规则之下选出的代表同意——他们为何要改变让自己当选的制度呢?尽管如此,与政治文化和宪法中严格规定的制度相比,选举规则也许是最容易接受制度设计的。

选举体系中很多方面具有可量化的特征——议席与选票的数量、精确分配的计算方法等等,这一点能够吸引很多渴望在本领域发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漂亮的计量规则的政治学者。出于同样的原因,选举研究会吓退那些认为政治研究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人,或者认为它最多是一门建立在丰富的细节而非普遍的归纳基础上的科学的人。由于政治学<sup>①</sup>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不可重复的活体观察而非可重复的实验室测试,所以政治中任何普遍性的科学法则,如果存在的话,一定是深藏于、湮没于相当随机分散的数据中。这种分散性很容易被等同于普遍法则的缺乏。然而本章的概述将证明,可以为选举体制建立一些具有逻辑性的模型,通过它们提出的量化预测可以在经

<sup>①</sup> 此处原文为“students”,疑为“studies”即研究之误。——译者

验上与许多选举制的平均值相吻合。

本章首先主要围绕“杜维吉尔议题”介绍选举制的类型学和比较研究,中间部分讨论近年来这个问题上宏观方面的进展,最后一部分介绍选举研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将以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结尾:在多大程度上选举研究能够为政治学的总体研究提供一种基本思路?这些问题将在一本 forthcoming 的书中展开(Tagepera 2008)。

## 二、对选举体系的研究

### 2.1 基本类型

选举可以运用于某一个职位(如总统)、某些职位(地方议会),或是上百个职位(议院)。选民可以对一位或几位候选人表达不加限定的支持(“单选投票”),或者可以给候选人排序(“顺序投票”)。即使需要选举的只有一个职位,选举规则也可以要求当选者或者赢得相对多数,或者赢得绝对多数。为了产生绝对多数,候选人数目可以被直接削减(两人对决),也可以被渐次削减(即末位淘汰制)。

多个职位的机构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议席可以被分配到各选区,而每个选区的席位数量(选区“规模”, $M$ )可以从一个(单一选区制,SMD)到议会中的全部席位( $S$ )。选民可以对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封闭名单”)、名单中的每位候选人(“开放”或“经排名的”名单),或者也可以对某些特定的候选人投票。根据单一不可转移投票规则(SNTV),选区中 $M$ 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直接赢得议席;而根据单一可转移投票规则(STV),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少的候选人被淘汰,他得到的选票会在下一轮投票中被投给其他候选人。如果是对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投票,那么所有的席位都会归于获得相对多数的赢家(例如美国某些州的选举团制),但最常见的是依据某种比例代表的规则分配这些席位,比如昂特(d'Hondt)公约数或圣提拉噶(Sainte-Lague)公约数,或者简单配额加最大余数法。

这个概述不可能充分介绍大量已经在使用,或者可能被使用的各不相同的选举规则,更不可能详细解释其具体的运用过程。关于单一不可转移投票规则、单一可转移投票规则、公约数、配额和其他许多议席分配方法的运用,在关于世界上选举制度的任何专论中都有叙述,如李普哈特(Lijphart 1994)、雷诺德和雷利(Reynolds and Reilly 1997)、卡茨(Katz 1997)、法雷尔(Farrell 2001)和诺里斯(Norris 2004)等人的著作。运用最广的选举规则是多议席名单比例代表制和单一席位简单多数制,通常被称为胜者全胜制(FPTP)。



选举体系中最简单的类型是所有  $S$  个席位都在一轮投票中被列入封闭的名单,每个选区的规模  $M$  都相同,并根据比例代表制进行投票(当  $M=1$  时就成为胜者全胜的制度)。只需要两个指数  $M$  和  $S$  就足以说明这样一种简单的制度。分配议席的分工也会影响结果,尤其是当  $M$  的取值在 2 到 5 之间的时候。昂特法与简单配额加最大余数方法相比,对大党来说稍稍有利一些。但是,选区规模的变化影响要大得多,除非改换成半比例制或者简单多数的形式。

除了胜者全胜的选举没有预选之外(例如英国),进行纯粹单轮选举的体系非常少。实践上各国的选区规模互不相同,而且投票的方法可能是顺序投票。各国可能实行预选或者多轮选举,代表法定资格限制,或者采用不同的规则将选票和席位转移给得票较多政党(候选人)。选民也许有几张作用不同的选票。因此,德国的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MMP)要求选民根据单一选区制规则选择一名候选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个政党,后者按照比例代表制分配席位,以弥补单一选区制层面带来的不均衡。日本也采取了与之表面上很类似的“平行”选举规则,但没有德国那样的补偿机制。

席位分配规则对从选票到席位的转换的影响,最容易从那些简单的选举体系中看出来。相对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之间的对比在国家成为一选区的情况下表现最为极端( $M=S$ )。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多数制会把所有  $S$  个席位分配给获胜一方,而比例代表制会产生高度均衡的结果。随着选区被划分得越来越小( $M<S$ ),相对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之间的对比会不断缩小,直到在胜者全胜制的情况下两者结果完全相同( $M=1$ )。

## 2.2 比较研究

对选举体系的研究始于为某些具体规则的辩护,诸如密尔的论述(Mill 1861)。杜维吉尔把这一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他提出的杜维吉尔法则及假设(Duverger 1951;1954):胜者全胜通常导致两大政党并立的格局(“法则”),而多席位比例代表制常导致两个以上的政党相互竞争(“假设”)。在运用比例代表制的时候,伴随着选区规模从  $M=1$  增加到  $M=S$ ,政党数目会逐渐增加,当然增速会逐渐降低。

要注意的是,杜维吉尔的发现只考虑到了一个指标,即选区规模。这意味着它们只对我所说的那种简单的体系有效。对于涉及决选、层级、法定资格、顺序投票<sup>①</sup>或者任何其他复杂设计的选举,它们都没有什么解释力。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杜维吉尔注意到的结果?较小的选区规模(尤其是  $M=1$ )可能从两方面挤压了政党数目。“杜维吉尔机制效应”意味着,在胜者全胜的选区,只有最

<sup>①</sup> 原文为“ordinary ballot”,疑为“ordinal ballot”,即“顺序投票”之误。——译者

大的两党才有希望获胜,所以投给第三党的票实际上被浪费了。“杜维吉尔心理效应”则意味着选民们常常在下次选举中抛弃第三党。随着选票减少,第三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少,直至最终消失,除非它们在地方上有强有力的支持。

杜维吉尔强调选举规则和政治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关联。对于这种规律的探讨被称为“杜维吉尔议题”(Shugart 2006),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大概已经成为选举研究中的核心议题。这些研究试图为以下问题提供量化的答案:选举体系是如何形塑政党制度的?选民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选举规则的影响?形成这些关系的过程是怎样的?在选举规则与政治结果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关联这一想法虽然仍有争论,但相关研究依然不断发展。

有数十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推动了这一领域的进步,其中至少如下一些文献应该被提及,并且对它们的主要贡献做一点不免浅薄的评论。赖伊(Rae 1967)创造了“(选区)规模”这个术语并将其应用于世界范围内的系统研究。瑞克尔(Riker 1982)梳理了对杜维吉尔的发现及其影响的论述。塔杰帕拉和舒加(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证明,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即便M大于2或3,政党数目仍然随着选区规模上升而持续增加。李普哈特(Lijphart 1994)引入了有效门槛的概念,以为现实中更为复杂的体系建立简单的模型。科克斯(Cox 1997)则阐明了难捉摸的“心理效应”背后多种形式的策略性合作。

卡茨(Katz 1997)、雷诺尔和雷利(Reynolds and Reilly 1997)、法雷尔(Farrell 2001)、诺里斯(Norris 2004)、科洛梅尔(Colomer 2004)以及加拉格尔和米切尔(Gallagher and Mitchell 2006)等人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体现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李普哈特(Lijphart 1999)和鲍威尔(Powell 2000)分析了选举体系作为民主制度中一个核心部分的角色。舒加和卡雷(Shugart and Carey 1992),还有琼斯(Jones 1995)则研究了它们对总统制政体的影响。

雷诺德(Reynolds 1999)对于南部非洲的研究、格罗夫曼等(Grofman et al. 1999)对于东亚国家单一不可转移投票制的研究、博瓦勒和格罗夫曼(Bowler and Grofman 2000)对于单一可转移投票制的研究、舒加和瓦腾贝格(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对于混合成员比例制的研究、格罗夫曼和李普哈特(Grofman and Lijphart 2002)对于北欧国家比例代表制的研究,达尔西、韦尔希和克拉克(Darcy, Welch, and Clark 1994)以及海尼希等(Henig and Henig 2001)对于妇女代表权的研究,以及卢尔和齐美尔曼(Rule and Zimmerman 1994)对于女性与少数民族的研究,则深入探讨了具体的地理区域、选举规则与/或社会团体等方面的问题。

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分析研究需要选举数据的支撑。在数据搜集方面,麦基和罗斯

(Mackie and Rose 1991;1997)针对成熟的民主政体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诺兰、克伦内里希、蒂博、戈茨,以及哈特曼等人的研究(Nohlen, Krennerich, and Thibaut 1999; Nohlen, Gotz, and Hartmann 2001; Nohlen 2005)则相应补充了非洲、亚太和美洲的数据。现在还出现了一个关于中东欧的比较数据库(Nohlen and Kasapovic 1996),但好像还只有德语版。

### 2.3 杜维吉尔议题及未来

杜维吉尔议题就是杜维吉尔机制与心理效应的结果和成因的问题。它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维度主要强调心理效应,它涉及选民个人、政党领袖和捐助者的个人决定,科克斯称之为策略性合作(Cox 1997)。里德发现(Reed 1991),在日本的单一不可转移投票制之下,会有  $M+1$  个“真正有意的”候选人在一个有  $M$  个席位的选区参选;科克斯(Cox 1997, 99 页)则把  $M+1$  法则视为杜维吉尔法则的直接归纳,并通过不同的路径对其进行检验。<sup>①</sup>

已经存在较长时间的宏观路径则试图通过选举规则施加的限制(尤其是较小的选区规模)来解释政党的数量和规模,以及选票和议席之间不均衡的程度。<sup>②</sup> 政治分歧或者“议题向度”的数目也要被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当然前提是可以独立于政党之间的分野对这个数目加以测量。舒加(Shugart 2006)认为,杜维吉尔议题的宏观方面是选举研究的“重中之重”。

就议会选举中的简单规则而言,1980 年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多进展。舒加(Shugart 2006)认为,“均衡性问题与政党数目高度相关”,因此只需进行一些微调。但宣称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总是要冒一定风险的。<sup>③</sup> 诚然,“重中之重”已经得到了充分研究,后续的分析已经有可能扩展到对更为复杂的选举制度的研究、选举规则对政党内部的影响,以及候选人名单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等“第二序列”规则的影响等等。但并不代表核

<sup>①</sup> 这里,根据选举规则, $M+1$  适用于可供选择的候选人或名单的数目。在  $M$  值较低的时候,候选人与名单之间的区别就比较模糊,很少有政党能够赢得多于一的席位。但是在荷兰,议会所有的 150 个席位都在单轮全国范围的投票中决定(即  $M=150$ ),151 个可供选择的候选人似乎太少,而“可供选择的”政党的数目(获胜的政党或者至少以一席之差而失败的政党)接近于  $M$  的平方根加一,这个数字在荷兰是 13。

<sup>②</sup> 使用最广泛的测量政党数量的方法是拉斯科(Laakso)和塔杰帕拉 1979 年提出的“政党有效数量”(ENP),即  $N=1/\sum P_i^2$ ,其中  $P_i$  是在总投票或者总席位中排第  $i$  名的政党所占比重。运用最广泛但又相互排斥的衡量均衡偏离度的方法是拉斯莫尔(Loosemore)和汉比(Hanby)1971 年提出的  $D=1/2\sum |V_i-S_i|$  和加拉格尔(Gallagher)1991 年提出的  $Gh=[1/2\sum (V_i-S_i)^2]^{1/2}$ ,其中  $V_i$  和  $S_i$  为第  $i$  名政党相应的选票和议席份额。

<sup>③</sup> 1900 年前后,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前不久,很多人认为物理学的问题已经全部得到解答,且美国专利办公室的负责人甚至呼吁取消该办公室,因为他认为所有能被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出来了。

心议题被解决了。下面我将重点介绍杜维吉尔议题宏观方面的新发现,以及尚待完成的任务,其后再简单回顾一下其他方面的进展。

### 三、杜维吉尔议题的宏观层面

#### 3.1 杜维吉尔议题宏观层面的核心观念

杜维吉尔的发现基于一个一般性的观念,即一般说来,政党规模的分布取决于可提供的议席数。直接地说,这就是每个选区选出的议席数量。单一席位选区比多议席选区对政党数目的限制更大。但是,议会议席的总数也会发挥作用,因为更多的议席意味着为多样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sup>①</sup> 在拥有 500 个席位的议会中,有可能出现十多个政党,但在圣基茨和尼维斯岛仅有 10 个席位的议会中,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选区规模一定、其他要素相同的情况下,大型议会更可能容纳更多政党。

同样,最大党能够获得的议席数量也与议会规模相关。在单一席位选区中,最大党当然毫无疑问将拥有这个议席。随着选区规模逐步提高,最大党占有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为更多政党的出现腾出空间。同样的事情也会在整个议会中的最大党身上发生。规模较大的议会能够容纳更多政党,这为最大党带来了更多压力。把这个理由延伸至第二大党以及其他,一般来说,会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政党规模的总体分布取决于可提供的议席的数量。我将简要地举几个实际例证。

其他因素,比如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以及当下的政治事件有影响吗?当然。对于每一次选举来说,选票都是第一位的,它受当下政治的影响,也受更长时间内形成的本国特质的影响。它们会与选举规则的机制效应一同决定席位的情况。但是对于很多选举来说,一般情况下因果箭头的方向会相反(见图 28.1)。通过机制效应,选举规则会迫使席位的分配尽可能适应可提供的席位。选举规则也会通过心理效应影响选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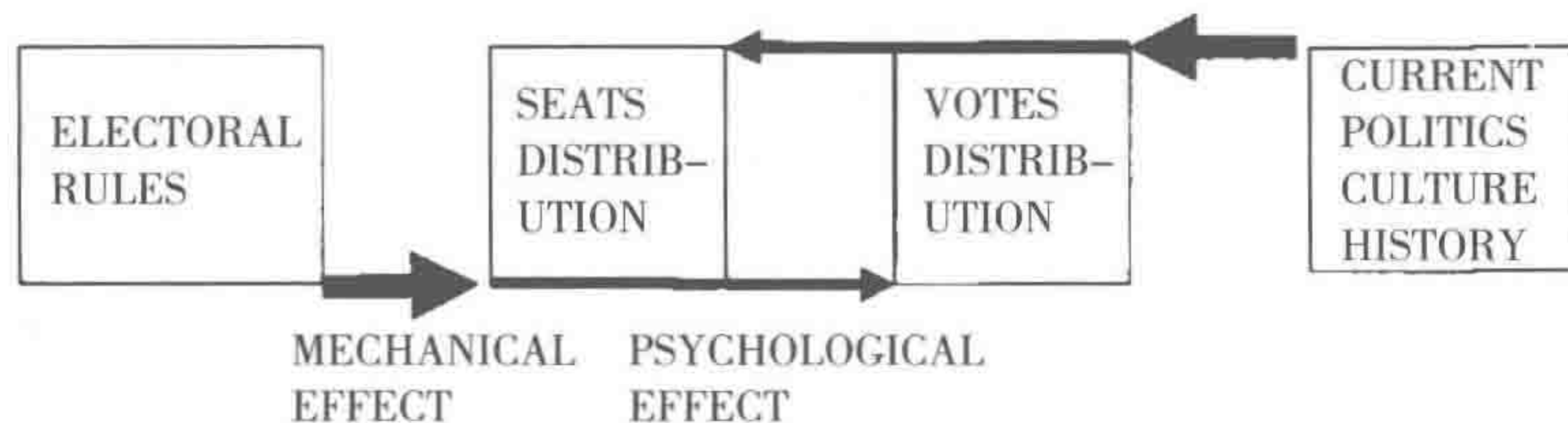


图 28.1 政治现实与选举规则的反向作用

<sup>①</sup> 因此尽管从选民和选举规则的角度来看,美国众院和参议院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众议院中黑人的比例常高于参议院。两者之间唯一区别就是众院的议席更多(Grofman and Handley 1989)。

分布,甚至可能抵消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因此,如果采用了类似的选举规则,一般来说很多国家的很多次选举会形成某种可预期的模式。

我首先会提出一些经验证据,表明这些观念确实影响了现实,然后我再阐释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些结果的理论。

## 3.2 简单选举体系的经验研究

### 3.2.1 最大议席份额

最大党的席位份额在政治上很重要。较大的份额使这个党得以更牢固地掌控内阁;反过来,如果最大党被排除在外,则可以使它作为反对党有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粗略浏览一下数据就会发现,正如杜维吉尔法则暗示的那样,最大党的席位份额( $s_1$ )会随着  $M$ (选区规模)的减少而逐步增长。经过检验也可以发现,对于胜者全胜的规则( $M=1$ )来说,最大党的席位份额是随着议会整个席位规模( $S$ )的下降而上升的。在那些议会只有 10—30 个议席的小岛国家,最大党占有的份额甚至可能超过 65%。我们因此假设  $s_1$  随着  $M$  和  $S$  上升而下降。

图 28.2 显示了最大党的议席份额( $s_1$ )与选区规模和议会规模形成的“席位积” $MS$  之间的关系(修订的版本已经在 Taagepera and Enschede 2006 中发表)。两个变量都以对数的方式表示。由麦基和罗斯收集的选举中(Mackie and Rose 1991;1997),所有规则相对简单的都包括进来了,这样可以对  $M$  进行精准的定义。图中直线不是最符合实际的,只是代表基于定量模型  $s_1 = (MS)^{-1/8}$  作出的理论预期。但可以看出,它与实际情况最为接近,塔杰帕拉和恩希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Taagepera and Enschede 2006)。需要注意的是,等式中还包含了总统选举这一特殊的极端情况( $M=S=1$  且  $s_1=1$ ),这是一个概念上的“定位点”。 $M$  和  $S$  其他任何形式的组合都不可能产生比基于席位积  $MS$  更分散的图像了。

### 3.2.2 最大党之外的其他席位份额

最大议席份额给其他的党的份额划定了界限。没有谁能超过最大党,而他们的席位总量只能在 1 至  $s_1$  之间。随着最大份额增长,所有其他的份额都要受影响。在最大份额已定的情况下用第二大份额( $s_2$ )的平均数除以最大份额,就得到了所谓的长岛三角式(Nagayama Triangle Format, Reed 2001),我们可以把它标示出来。从逻辑上说, $s_2$  的取值区间是当  $s_1 < 0.5$  时直线  $s_2 = s_1$  下面的三角形部分,以及当  $s_1 > 0.5$  时,直线  $s_2 + s_1 = 1$  下面的三角形部分。

可以重复使用这个过程对第三大党以及其他政党的席位份额进行计算,其结果见图 28.3。它反映的是最大份额相同时很多次选举的平均状况,总数是 350 次(简化版本参见 Taagepera and Allik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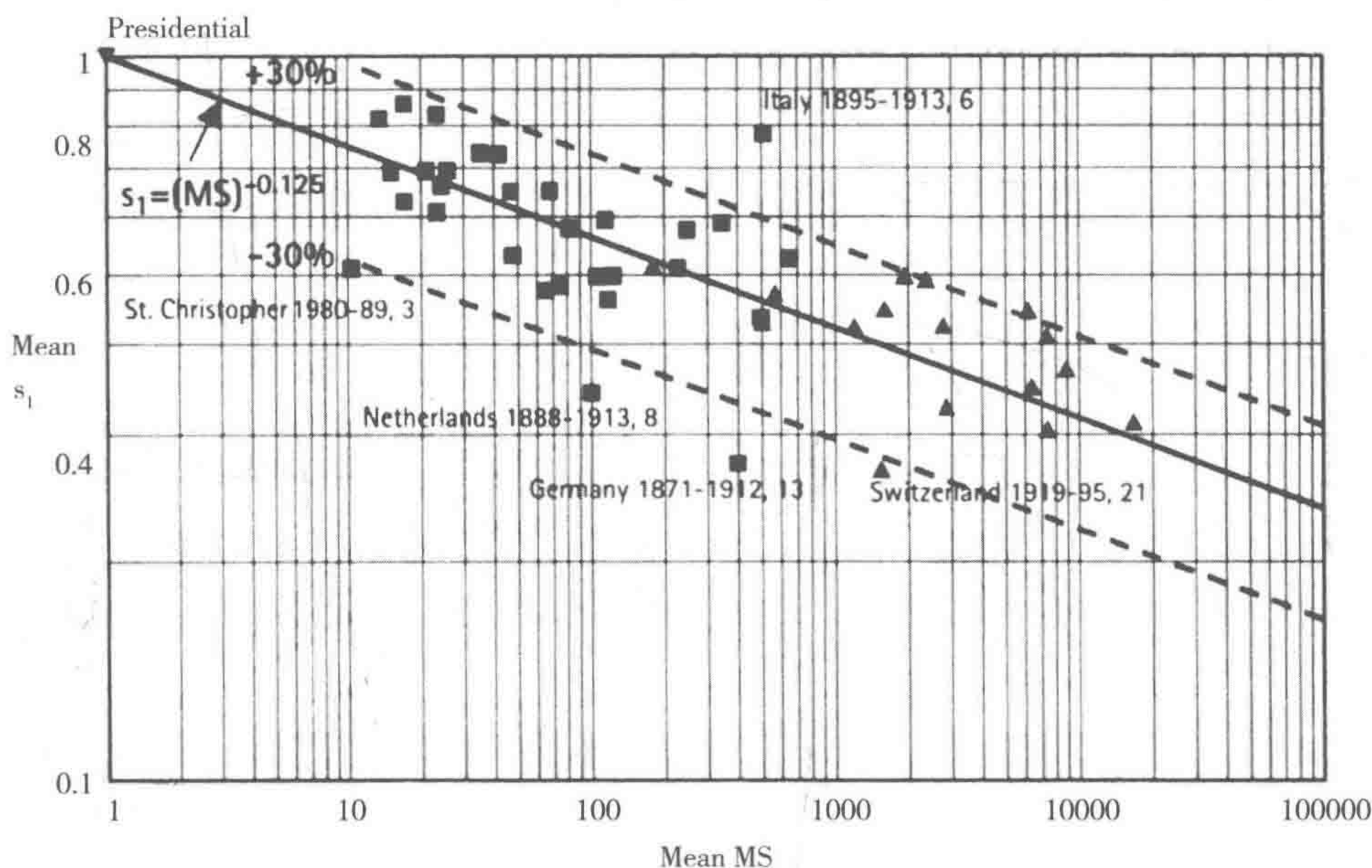


图 28.2 45 个相对简单的选举体系最大党的席位份额 ( $s_1$ ) 与最大份额给定情况下其他的议席份额和选区规模 ( $M$ ) 和议会规模 ( $S$ ) 的积。直角:  $M=1$ ; 三角: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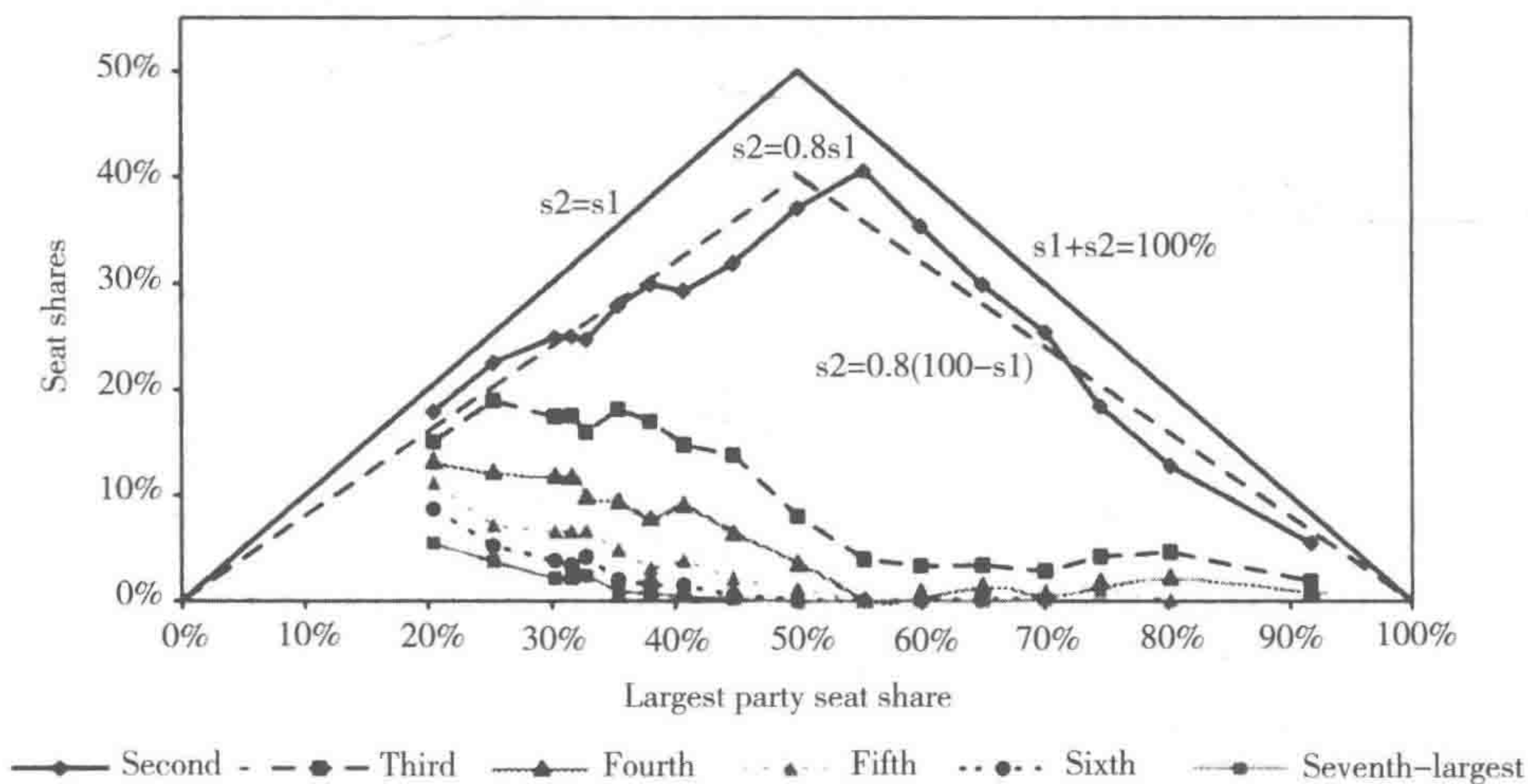


图 28.3 最大党席位已定的情况下,按规模排列的各政党的平均席位份额

结果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还是体现出某些规律。随着最大党份额的增长,规模稍小的政党的议席份额首先也随之增长,挤占的则是更小的政党的空间,但随后就持续下降。第二大党的曲线很快与第三党及以下各政党的曲线分离,两党脱颖而出。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复杂的格局可以通过理性的定量模型予以重复。

上文已经指出,一般来说最大党的份额取决于 MS 的乘积。在  $s_1$  给定的情况下,排名第  $i$  位的政党的平均份额取决于最大党的份额。因此,在  $M$  可以被定义的简单选举规则之下,所有排第  $i$  名的政党的平均议席份额取决于席位积 MS——即使其中关系很复杂。图 28.2 和 28.3 结合起来,从经验角度全面描绘了在简单的选举体系中建立在杜维吉尔观念基础之上的席位平均分配模式:各政党席位的平均份额取决于各选区的席位总数 ( $M$ ) 以及议会中的席位总数 ( $S$ )。

### 3.2.3 内阁任期

内阁的任期很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把内阁任期与选举规则关联在一起,那么就可以证明杜维吉尔的思考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大党规模越小,则内阁可能越脆弱。由于最大党的议席份额在 MS 上升时会下降,所以一般来说内阁的任期也会随着这一 MS 的上升而缩短。由于其他各种因素都可能影响选举体系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简单确定选举规则的直接作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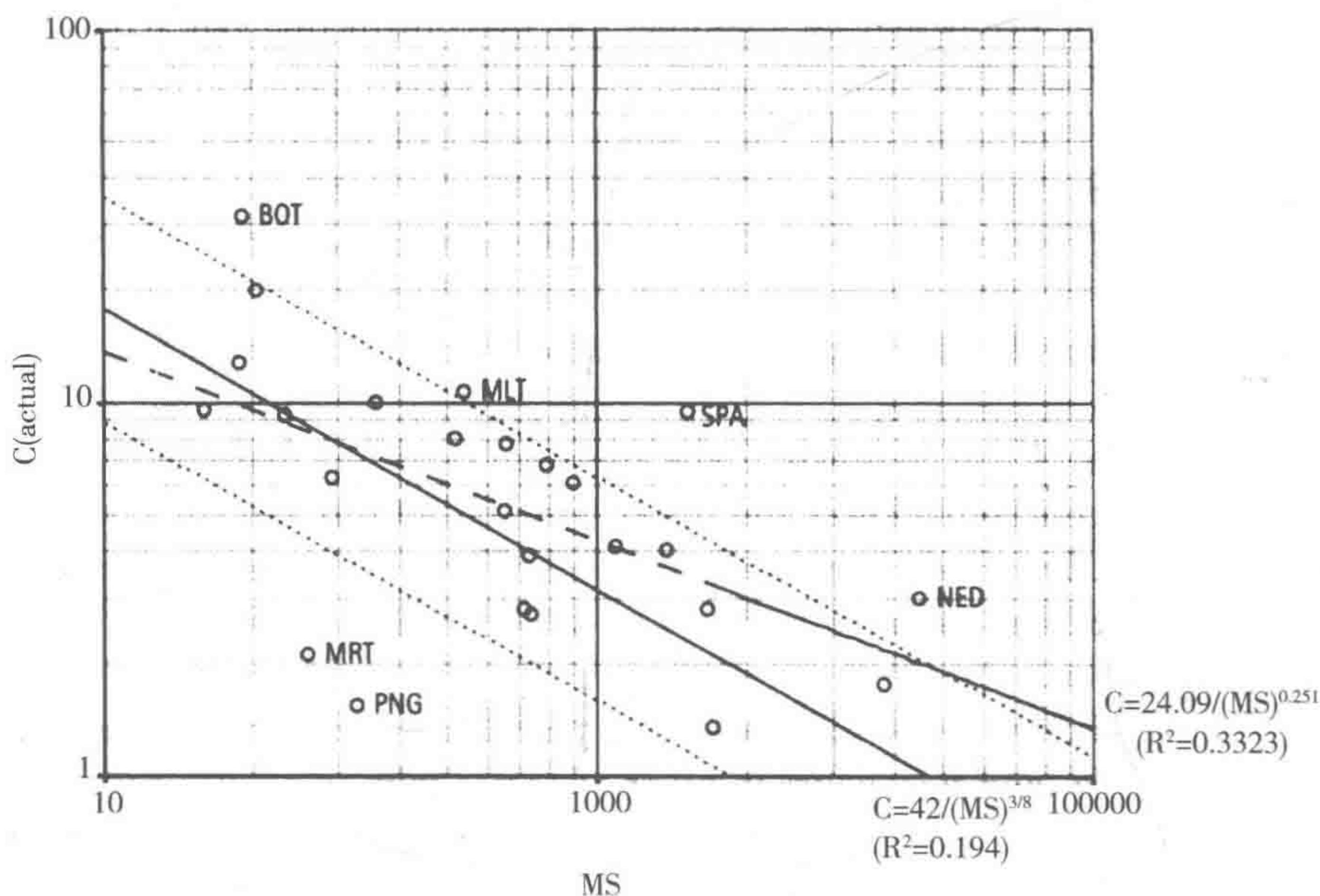


图 28.4 联盟持续时间与选区规模和议会规模的积 (Taagepera and Sikk 2004)

图 28.4 标示了内阁任期 ( $C$ ) 与席位积  $MS$  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以对数的方式表示。图中包括了李普哈特 (Lijphart 1999) 研究过的 36 个稳定民主国家中的 25 个,它们的平均  $M$  值可以被定义。虚线是  $R^2 = 0.33$  下的最佳线性拟合。内阁任期在  $MS$  上升的情况下明显缩短。

更重要的是,粗线代表了基于逻辑定量模型  $C = 42\text{yrs.}/(MS)^{3/8}$  得出的理论预期。可以看出它不是最好的拟合,而且  $R^2$  值下降到了 0.19。作为一个并不依赖任何实际数据的理论预测,它还是相当成功的,因为预期的直线的确穿过了数据团的中心。点线标示了当因子为 2 时的预测值区间。35 个国家中,19 个在这个区间里。如果控制了选举规则可观察的效应,则其他影响内阁任期的因素就会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在分析中更容易被修正。

### 3.3 关于简单选举体系的理论

#### 3.3.1 什么是逻辑定量模型?

下一步是构建逻辑定量模型以说明上述经验观察的结果。什么是逻辑定量模型?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最好不过了,这实际上也是解释选举规则对最大议席份额的影响的第一步。

假设有一个拥有 100 个议席的选区,比如 1918—1952 年期间的荷兰,当然是在全国范围。有多少个政党可能赢得议席,每党平均又拥有多少?至少一个党必须赢得议席,这样的党总数不会超过 100。且每个党的平均议席数从 1(每个党平均一席)到 100(某个政党席卷全部议席)。如果在没有其他任何信息的情况下非要给出答案,那么为了将错误尽可能降低到最小,我们会在逻辑上给出两个极端的中间猜测,为此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几何平均数计算(参见 Taagepera 1999)。这样,我们可以假定有 10 个得到了席位的政党,而每个政党又平均得到了 10 个席位。

实际上在荷兰,赢得席位的政党数在 8 到 17 之间;9 次选举的几何平均数是 10.4 个政党会赢得席位。这个例子说明,基于概念极限进行的猜测对于单次选举来说可能出现较大的误差,但可能接近多数选举的平均值。

那么为什么不采用传统的算术平均数呢?这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1 和 100 的算术平均数是 50.5。但是如果平均有 50.5 个政党获得席位,而每个政党得到的席位平均数是 50.5 个的话,则席位的总数会达到 2550 个而非 100 个!寻求逻辑上的矛盾也是另一个构建逻辑定量模型的方法。在现在的案例中只有使用几何平均数才可以避开逻辑矛盾。

对选区规模为  $M$  的单一选区来说,能够获得至少 1 个席位的政党的数目大概可以由以下公式表示,即  $p' = M^{1/2}$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93)。注意在单一选区多数制 ( $M=1$ ) 的情况下,这个等式转化为  $p'=1$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这是一个逻辑定量模型的好例子。这种模型使用逻辑推理得出比较具体的定量预测,而不仅仅是指导性的论断(“如果  $x$  上升则  $y$  会下降”)。这里使用的方法是尽可能



利用概念上较低和较高的极限,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这类模型反映了大量案例的平均值。它们当然只在概率的意义上有效,因为对某个具体案例来说,它高于或者低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 50%。

可以说,逻辑定量模型构成了像理论物理学这样的学科的支柱,在其他学科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政治科学一直忽视了它们的潜力,这也许是计算机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某种虚幻的希望,即我们无须再进行其他的努力,只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回归和因子分析,就可以破解社会机制的秘密。成功的学科走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发展道路(Coleman 2007; Colomer 2007)。统计方法只有在逻辑定量模型的引领之下才会获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 3.3.2 最大议席份额

假设选区规模为  $M$ ,议会的席位数是  $S$ 。如果在一个选区内有  $p' = M^{1/2}$  个政党赢得了席位,那么在整個议会中赢得议席的政党数( $p$ )必定至少有  $M^{1/2}$  个——这是  $p$  的下限。上限则是  $S^{1/2}$  个,因为这是当全国作为一个选区、并选出整个议会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席位的政党的数量。基于极限情况几何平均数的推测为

$$P = (MS)^{1/4}$$

这是至少在议会中获得一个席位的政党数量。需要注意的是,席位积  $MS$  首次作为简单选举体系中的关键特征出现了。

赢得席位的政党的平均份额是  $1/p$ 。最大份额( $s_1$ )必须至少等于这个平均值,最大接近总数(1)。基于概念极限几何平均数的推测应为

$$s_1 = (MS)^{-1/8}$$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93)。这与图 28.2 的最佳拟合非常接近。以上等式还预测  $s_1$  和  $(MS)^{-1/8}$  的乘积应该等于 1.0000。46 个比较简单的体系(其中 30 个  $M=1$ , 16 个  $M>1$ )的几何平均数是 1.0097(Taagepera and Enschede 2006)——误差仅为 1%。

这样高的吻合度令人吃惊,甚至也许令人不安。这个模型依据的仅仅是两种制度输入的极限——议会规模及选区规模。诚然,在不知道其他信息的情况下,  $s_1 = (MS)^{-1/8}$  也许是我们能够作出的最好的推测。但是我们真的不了解其他情况吗? 难道政治不发挥任何作用吗? 杜维吉尔的机制效应与心理效应又该作何解释?

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机制效应要考虑的是在单次选举中如何改变选票的份额,使席位的份额更符合制度的要求(见图 28.1)。心理效应要考虑的则是选票份额随后又如何自我调适,以适应制度的指令。这些效应对较长时期内一般席位分配相对来说只具有较小的影响。

当然,可能存在一些政治要素使最大党的议席份额扩大或者缩小,这是单纯的概率

无法反映出来的。例如,见风使舵的效应也许会在所有国家扩大最大党的议席份额。我们无法找到在所有情况下都对最大议席份额发挥影响的政治因素,这一点也许令人失望。图 28.2 中那些偏离基本趋势的情况表明,这样的因素也许会在国家层面存在。但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类因素的作用似乎又相互抵消了。

### 3.3.3 最大党之外的其他议席份额

我们最后考察具体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其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是科克斯(Cox 1997)所谓的策略性合作。请回顾一下此前估算最大份额的方法。我们可以在最大份额给定之后用同样的方法估算第二大议席份额。它不能比第一大份额更大,不能比刨除第一大份额后剩余的数量大,也不能比余留下来供其余政党瓜分的数额更小。

用几何平均数推测法算出第二大份额以后,可以以此类推估算第三大份额以及以下所有的份额,然后可以如图 28.3 那样画出所有党的份额。但是所得到的模型与经验结果很不一样(Taagepera and Allik 2006),它意味着仅仅依靠概率计算还不够。

建模的下一步是假定,即便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部分潜在的小党支持者也会出于各种原因不把票投给它们。除其他考虑之外,策略性排序(Cox 1997, 194 页)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对小党的存在及其纲领信息缺乏的问题。

一个政党要发展到怎样的规模,才能摆脱得不到支持者的“小党”身份而成为一个大党,能享受到选票转移的好处?转折点应该在最大党的份额倒转处附近。若  $s_1 = 0.25$ , 则最大的四个党受益;如果  $s_1 = 0.5$ , 只有两个会受益。如果假设有一半潜在的小党支持者转向大党并据此修正单纯的概率模型(Taagepera and Allik 2006),则结果会很接近图 28.3 中的实际情况。

我们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面临的任务又是什么?首先,图 28.3 展现了经验研究的结果,但还需要解释。其次,我们已经建构了一个比较接近经验模型的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即便是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复杂的经验模型也并不超出我们现有的解释能力之外。但问题仍然存在。如果用选票替代席位,图 28.3 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把比例代表制和胜者全胜模式分开描绘又会如何?最后,需要用政党规模分布方面的经验证据考察导致小党被抛弃的过程。杜维吉尔议题还远远没有被完全解答。

### 3.3.4 内阁任期

如果能够找到内阁任期和选举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在解决杜维吉尔议题方面就能获得一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步是通过引入交流渠道的概念,把内阁的任期与政党数目关联起来。如果存在  $N$  个政党,则它们之间就有  $N(N-1)/2$  个可能的关系渠道。加上党内关系,则渠道总数会接近  $N^2/2$ 。内阁的平均任期也许会与关系渠道的数量成反比。倘若如此,则一般内阁任期( $C$ )与政党数量之间的关系为  $C = k/N^2$ ,其中  $k$

是一个需要通过经验测定的常量。

如果把政党数量等同于议会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N = 1/\sum s_i^2$ ),则  $C = k/N^2$  这一公式完全适用于李普哈特研究的 36 个民主国家中的 35 个(Lijphart 1999, 132—133 页),唯一的例外是瑞士,因其制度设置与众不同(Taagepera 2003)。常数  $k$  在 42 年左右,大约是一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长年限,因此

$$C = 42 \text{ 年}/N^2$$

下一步是将有效数值  $N$  与最大党的议席份额( $s_1$ )关联起来。可以证明  $N$  不能比  $1/s_1$  小,也不能比  $1/s_1^2$  大。因此一般说来, $N$  的值可能在  $N = s_1^{-3/2}$  左右。加上之前得到的  $s_1 = (MS)^{-1/8}$ , 结果是

$$N = (MS)^{3/16}$$

最后,加上  $C = 42 \text{ 年}/N^2$ , 得到的是  $C = 42 \text{ 年}(s_1^3)$

$$C = 42 \text{ 年}(MS)^{-3/8}$$

根据这个推测画出的曲线大致穿过了图 28.4 中数据点阵的中心。

因此,内阁任期与选举规则之间的逻辑定量联系就建立起来了。42 年的常数值当然是通过经验得出的,但这在物理定律中也很常见。例如重力定律  $F = Gmm'/r^2$  中重力常量  $G$  就是通过经验确定的。要点是  $C$  和  $N$  之间的函数关系(平方反比关系)被确定下来了。当然,这个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完善。<sup>①</sup>

### 3.3.5 从选票到席位,再回归选票

如果观察单次选举,那么当然首先是选票,最后才是席位。因此,早期的选举研究把选票作为给定因素,并且通过选票来解释席位,这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制度却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很多选举的一般结果发挥影响(图 28.1),意识到这一点使我们首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席位份额的分配上面。前面几个部分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要问的是:一般来说,席位的份额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选票的份额? 首先我将回顾从选票到席位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发现,然后再沿着相反路径继续探讨。塔杰帕拉和舒加的著作已经详细地论证了选票对席位的影响(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142—198 页)中有细致叙述,下面简单介绍他们的发现。

亨利·退尔(Henri Theil 1969)通过一个逻辑定量模型,表述了胜者全胜的规则在把选票份额转为议席份额方面的机制效应: $s_i/s_j = (v_i/v_j)^n$ ,其中  $s_i$ 、 $s_j$ 、 $v_i$  和  $v_j$  即  $i$  党和  $j$

<sup>①</sup> 虽然在内阁任期与政党的有效数目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联,但用  $N = s_1^{-3/2}$  模拟后者与最大议席份额之间的关系并不甚完美。更精确的方法是将  $N$  和  $s_1$  联系起来(Taagepera 2008),这将进一步改善拟合。为了扩展图 28.4 中  $MS$  的范围,议会规模很小的国家内阁任期的数据也有作用。

党得到的选票与议席份额。最关键的是,在所有  $s_i/s_j = f(v_i/v_j)$  形式的函数中,这是唯一没有在多党制的情形下导致逻辑矛盾的。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个案例,即排除所有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可能之外,只剩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形式。指数  $n$  反映了均衡性的程度。 $n=1$  代表完美的比例代表制; $n>1$ , 大党就会得到相对更多的选票; $n<1$ , 则小党会得到相对更多的选票。

这个等式也可以被转变为  $s_i = v_i^n / \sum v_k^n$ , 这里的总数包含了所有得票的政党。在均衡性指数  $n$  已经给定, 所有的选票份额可知的前提下, 可以运用这个公式直接计算出任何政党的席位份额。

退尔(Theil 1969)将  $n$  的值设定为开放的, 但据观察, 自 1900 年以来所有根据胜者全胜的规则进行的议会选举中, 这一指数都在 3 左右。这已经在经验性的“立方定律”中体现出来:  $s_i/s_j = (v_i/v_j)^3$ 。作为思想试验, 我们首先把可供选举的席位数量慢慢调整到 1, 然后再朝相反方向, 将其增加到与选民人数相等的值。很明显均衡指数  $n$  会随着席位数量( $S$ )的上升而下降, 同时随着选民人数( $V$ )的上升而上升。唯一满足某些逻辑要求的简单公式就是  $n = \log V / \log S$ 。

“立方定律”的出现, 是因为所有民主国家的议会都满足一个议会规模立方根定律的要求:  $S = V^{1/3}$ 。这一定律起源于一个使向单一代表提出要求的交流渠道最小化的模型。计算的结果是  $\log V / \log S = 3$  比较合适。如果用人口总数( $P$ )模拟选民人数的话, 则  $S = P^{1/3}$ 。如果使  $n = (\log V / \log S)^{1/m}$  的话, 则席位和选票的关系也可以延展到多席位比例代表制中。

把上述公式与退尔的  $s_i/s_j = (v_i/v_j)^n$  或者  $s_i = v_i^n / \sum v_k^n$  结合起来, 就可以得出所谓的“少数消减定律”, 这是一个适应于多种选举的基本模型, 包括从直接和间接总统选举到简单规则下的议会选举。它也能延伸到女性的“橡皮顶”<sup>①</sup>现象和其他类似的情况, 只要少数群体的份额减少了为更小群体提供的职位总数。所有这些问题在塔杰帕拉和舒加的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142—198 页)。

也许是对“立方定律”反映出的趋势的意识促成了它在近期选举中的消亡, 因为各政党开始通过把资源集中在最有利的选区以抵消这种自然倾向(参见 Blau 2004 中的图表)。<sup>②</sup> 但作为一种最初的模拟, 少数消减定律依然成立。

① 指阻止某些个人或者群体上升到较高职位的非正式的限制。——译者

② 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何时开始改变世界本身的? 在量子力学中, 对于基本粒子的观察会无可避免地改变它的位置或者动量(著名的不确定原理), 但这个问题在宏观物理学中消失了。微生物会通过变异来增加它们对新发明的抗生素的抵抗力。对于重力定律的认识帮助人类设计出突破重力的方法, 并最终发明了飞机。当政治学提出某些用于描述简单政治现象的法则时, 政治家就会设法寻找其漏洞。从创新的角度来说, 他们与航空工程师别无二致。

在某次选举中,只要给定实际的选票份额,那么就可以通过等式  $S_i = v_i^n / \sum v_k^n$  估算席位份额。现在调转方向。从前面的等式可以导出  $v_i = s_i^m / \sum s_k^m$ , 其中  $m = 1/n = \log S / \log V$ 。只要根据制度输入估算出平均席位份额,对于很多按照简单选举规则进行的选举来说,我们就可以使用后一个等式估算出平均的选票份额 (Taagepera 2001)。这种路径还有些方法上的问题 (Taagepera 2008), 但原则是很清楚的。

在估算出选票份额之后,我们可以借助任何标准的指数,运用选票和席位份额来估算对均衡值的偏离度,从而回答宏观层面的杜维吉尔议题,即解释选举体系如何影响了政党的数目与规模的分布,以及选票份额与席位份额之间的不均衡程度。

图 28.5 展示了当前已经接近完成的对宏观层面的杜维吉尔议题的解决方案。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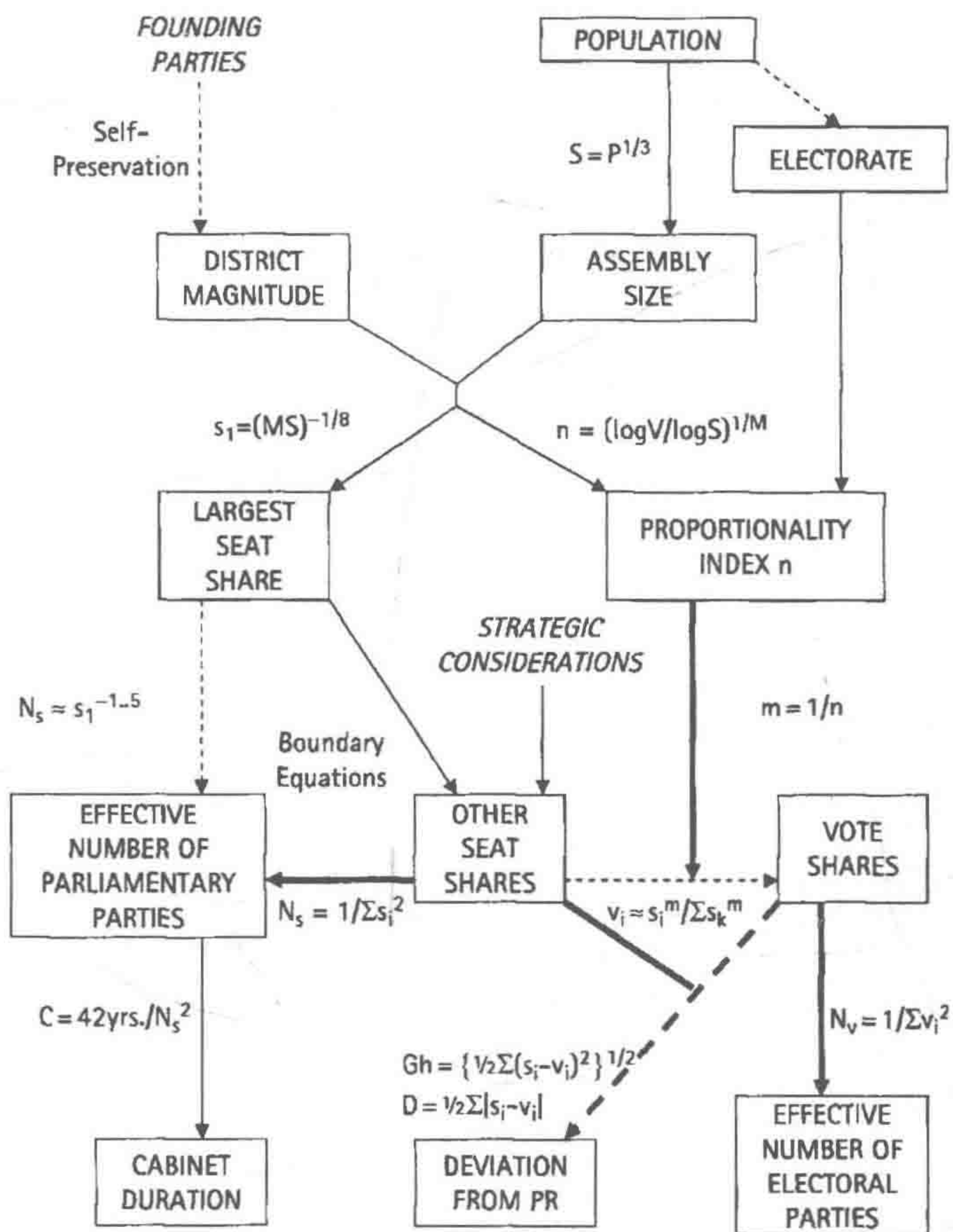


图 28.5 宏观杜维吉尔议题, 2007 年的情形

(深色箭头: 定义; 浅色箭头: 逻辑量化模型; 虚线箭头: 松散的联系)

线箭头表示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松散关系。每离开制度输入一步,随机错误都会增加。另外,对均衡值的偏离会导致几乎同等数量的确定性的减弱,这会大量增加随机错误。从这一背景噪音中能否得出某种与选举规则的定量关联还有待观察,但研究的进展给人以希望(Taagepera 2008)。

## 四、宏观问题

虽然宏观层面的杜维吉尔议题远远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答,但目前积累的研究成果使学者们已经能够对更复杂的选举体系、选举规则对政党内部的影响,以及封闭名单或开放名单等“第二序列”规则的效应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任何宏观层面的进展在微观层面上提出了新的挑战。下面的概述重点参照了舒加最近对选举体系的综合研究(Matthew Shagart 2006)。

### 4.1 杜维吉尔议题的微观层面

导致杜维吉尔所指出的基本议席分配模式的过程需要更清晰的描述。机制效应和心理效应是彼此纠结在一起的,而贝诺瓦(Benoit 2002)则认为,由于没有考虑到心理效应的“提前过滤”作用,所以机制效应的力量被夸大了。心理效应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来反映单次选举中个体行为者各种各样的理性选择。这里的行为者不仅包括选民,而且也包括政党领袖和竞选赞助者。

科克斯(Cox 1997)通过提出上面提到的“策略性合作”这一概念,把相关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这种合作也许能、也许不能具体化为提出最优数量的候选人或候选人名单。科克斯通过验证上文提到过的“M+1法则”认为,选民得到的信息质量随选区规模一同下降。布赖斯(Blais 2000)探讨了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选民是否投票的决定时具有的局限性。本章没有太多的篇幅讨论候选人、选民及政党的策略性考虑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这一问题又取决于政党的意识形态分布。

### 4.2 政党数量的文化和地理决定因素

除了制度之外,政治化的社会断层或者说“议题向度”的数量也会影响政党数量。如果没有独特的议题,那么即使选举规则没有设立什么限制,政党也无从组织起来。但是,对议题向度的数量进行印象主义式的估计会成为同义反复,因为这会受到已知的政党数量的影响。为了防止这个风险,奥德斯胡克和施维特索娃(Ordeshook and Shvetsova 1994)引入族群异质性,作为对议题的一种可测量的替代。由于这一方法忽略了非族

群性的断层,所以也许会导致某种低估,但是它代表了向着客观可衡量性方向的某种进展。断层与选区规模之间的互动作用得到了奥德斯胡克和施维特索娃(Ordeshook and Shvetsova 1994),以及内托和科克斯的确认(Amorim Neto and Cox 1997; Cox 1997, 208—221页)。

一旦人们在什么是族群的关键特征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它们的有效数量大致就可以用类似测量政党的方法加以确定。当然,这些群体所处的地理也是需要注意的因素。一个散布在全国的族群对异质性的影响,可能要小于同等规模、但集中在边境地区的群体,在那里它成为人口中的多数。一般来说,不同政党支持者的地理分布,会与选举规则的影响发生相互作用,加之投票者人数的差异,以及代表性的不平衡等等(Grofman, Koetzle and Brunell 1997),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政党在议会中的实力(Gudgin and Taylor 1979; Johnson 1981; Eagles 1995)。

#### 4.3 选区规模差异的影响

与更复杂的选举体系相比,不平衡的选区规模  $M$  被视为对简单制度的微小偏离,但它能明显改变小党的生存机会。假设一个国家在广袤的乡村地区有 100 个胜者全胜的选区,在首都市区还有一个 100 个席位的选区。虽然平均选区规模  $M = 2.0$ ,但是这与 100 个拥有两个席位的选区相比,实际效果有天壤之别。在后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形成两党制,并为第三党的出现提供有限的机会。前一种情况正相反,在拥有 100 个席位的选区可能出现十来个政党竞争席位,虽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胜者全胜的选区获得成功。在均值  $M$  相同的情况下,与更均衡的分布相比,即便是选区规模不像那么巨大的差异,也会增加政党的数量。

此外,对于同一个选举群体来说,选区规模的不均衡分布可能会扭曲政党的代表性,门罗和罗斯(Monroe and Rose 2002)用西班牙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在农村地区获得强大支持的政党可以横扫乡村的小选区,并同时保有其在大城市地区的小部分代表比例份额。相反,在城市获得强大支持的政党最多只能赢得城市地区的比例份额,至于农村地区的选票则基本上都被浪费了。

#### 4.4 双层比例代表制

双层比例代表制有两种形式:平行制或者补偿制。其结果可以非常不同,但两者常常被混淆。以选民在 100 个胜者全胜的选区、又在一个 100 个议席的全国性选区投票为例。按照平行规则,胜者全胜制选区的议席将会流向两个大党,同时所有政党都会在全国层面的选举中按比例获得自己应得的议席。总体来说,两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得到

的议席只达到按其选票比例应得份额的一半左右,剩下的席位都被两大党拿走了。相反在补偿性规则下,全国性的均衡会得到恢复(通常会设立一个选票数量的门槛),这意味着大党最终又会失去它们在胜者全胜的选区得到的多余的利益。

艾尔克利特和罗伯兹(Elklit and Roberts 1996)强调,“双层补偿成员”的选举规则是一个独立的范畴,通常被称为混合成员比例制(MMP)。舒加和沃腾伯格(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的著作更新了我们对于这种选举规则的特殊性的认识,即它既避免了比例不均的问题,又保留了地方代表制的优点。

一些国家最近开始采用双层比例代表制,或是平行制(如意大利和日本),或是混合成员比例制(如新西兰和苏格兰),这为政治学家提供了在这些国家中进行观察实践的宝贵机会。正如人们所预期的,新西兰从胜者全胜制到混合成员比例制的过渡的确减少了不均衡性(Gallagher 1998),但可能不会减少胜者全胜制所特有的那种政治对抗性(Barker and McLeavy 2000)。需要注意的是,不均衡性的减少直接源于一种软化的机制效应,这只是暂时的,而政治风格则是需要更多时间才得以形成的文化元素。在日本,从单一不可转移投票制(SNTV)到胜者全胜制和双层比例代表制可能使整个体系更为失衡(Gallagher 1998),占支配地位的自民党仍然把持着对议会的控制。

意大利从名单比例代表制到胜者全胜制和平行比例代表制的转变,强调了实行胜者全胜制的选区中杜维吉尔效应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方面:它们通过会导致两个大集团的形成,但这两个集团未必成为统一的政党。在意大利,政党组成两大集团在实行单一选区制的选区竞争,但由于还有全国性的选举,所以保存了他们各自的认同(Katz 1996)。因此人们认为,杜维吉尔法则在选区层面上会发挥作用(Reed 2001),但在国家层面上,政党格局仍然几乎与实行名单比例代表制时一样四分五裂。

#### 4.5 可选名单比例代表制

选民究竟是投票给政党还是候选人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Grofman 1999)。舒加(Shugart 2006)指出,即便是可选(开放)名单制在实践中运用更加广泛,但研究文献还是以默认的方式,认为比例代表制只能以封闭名单的方式(这是我对简单选举规则定义中的一部分)体现。

实际上,甚至在胜者全胜制的框架下也可以采用可选名单制,就如乌拉圭在总统选举中实行的那样(Shugart 2006)。一些可能属于不同政党的候选人结成同盟,并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名单,选民从中选择一个候选人投票。唯一的席位归于得到相对多数票的名单,并最终归于这个名单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有人认为,这种方式把初选和大选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虽然胜者全胜制看上去类似于把封闭名单的比例代表制运用于单



一选区,但实际上它更接近单一选区中的单一不可转移投票制。在单一不可转移投票制和标准的胜者全胜制之下,一个政党要是提出太多的候选人就会受到惩罚。

对于可选名单比例代表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它有大量仅存在一些细节差异的形式,但这些形式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舒加对有关封闭名单、可选名单、准名单和非名单制度的规则的分类(Shugart 2006),也许能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张路线图。

#### 4.6 党内向度

在给定选票份额的情况下,选举规则不仅将决定哪些政党能够获得席位,也将决定党内谁得到这些席位。在名单比例代表制中,政党可能会通过把不同群体(如女性、少数民族等)的代表纳入名单,而它们中的一些也会获胜。对于标准胜者全胜制之下的候选人,政党常倾向于选择来自主流族群中的男性。因此女性在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的议会中所占份额一般来说会更高一些(Rule 1981)。比例代表制也可能推动更程度的党内流动(Darcy, Welch, and Clark 1994; Henig and Henig 2001)。

梅特兰和泰勒(Matland and Taylor 1997)发现了一个很细微的区别:即使是在多席位封闭名单比例代表制之下,如果政党只希望赢得一个席位,那么也常常会把男性候选人置于名单的上部。可选名单制也许能让女性即使在政党领袖不寄望于她们的时候也依然能够赢得选举。

一位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取决于党派标签,但也取决于其个人形象吸引的“个人票”。卡雷和舒加(Carey and Shugart 1995)推测,在开放名单比例代表制之下,随着选区规模增加,个人投票的情况也会增加,但在封闭名单比例代表制之下情况则相反。的确,选区规模越大,封闭名单制为个人行为提供的动力就越小,因为排名  $n$  位的候选人无论个人如何表现,他把自己政党获得的席位从  $n-1$  增加到  $n$  的可能性都很小。在开放名单比例代表制(还有单一不可转移投票制)之下,个人活动可以让候选人脱颖而出,而且竞争的席位越多,这种可能性越大。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在  $M=1$  时相交,因为此时唯一的候选人就是本党在该选区中的门面。两个间接的测试证明了这个推测。随着  $M$  的扩大,提出带有地方特色的竞选方案的频率在可选名单制之下会增加,而在封闭名单制之下则会下降(Crisp et al. 2004)。在本选区出生、并且有过当选经验的候选人出现的概率,也呈类似的趋势变化(Shugart, Valdini and Suominen 2005)。

普通选举规则对党内政治影响的更多案例可见舒加的著作(Shugart 2006)。这方面我们仍然知之甚少,因为与党际关系相比,党内问题的数据更为浩瀚,也更难于处理。

## 五、选举体系是政治科学的核心吗？

科学上的进步在解决既有问题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对于微观杜维吉尔进程更广阔的意义上的研究、复杂选举制的研究,以及选举规则的党内影响的研究显然已经进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问题领域已经被厘清,更细微的问题也已经得到探讨,当然,其预测能力还远远谈不上已经完善。相反,杜维吉尔议题宏观层面的研究则一直专注于简单选举体系,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在选举体系对于政党间席位分配影响的量化预测方面获得了某种突破。对选票分布的研究和对不均衡现象的预测也指日可待。这一突破是在逻辑量化模型的基础上完成的。关于简单体系的理论建构已经完成,我们可以逐步把它推进到对更复杂的体系的研究中。

选举体系与政党体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政党的数量和影响很大程度上都由选举结果,即选票与席位决定。政党的凝聚力与谈判能力也许更有意义,但也更难于测量。因此,通常基于参选情况得出的政党有效数目,可能依然是政治科学中应用最广泛的单个指数,尽管它有明显缺点。无论何时,只要把政党体系视为某种政治现象的解释因素或者影响因素,它就会随之出现。

对其他分枝领域的研究使塔杰帕拉和舒加(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提出了如下问题:选举研究是否可以赋予政治科学的某些领域一种核心的地位,使它如同罗塞塔石碑解开古埃及文字之秘一样,破解政治现象的奥秘?

与其他政治现象相比,选举体系与非常硬性的数字打交道:选票数、席位数、选区数等等。因此这些研究尤其适于借鉴更成熟的科学领域的方法……选票对于政治科学量化的意义,也许正如物质之于物理学,或者货币之于经济学那样,即成为一种可以精确测量的基本单位(Taagepera 和 Shugart 1989,第5页)。

在发达的科学中量化表达互相勾连,同样的量在不同的等式中反复出现,一个在某种环境下测出的常量会在另一个环境中运用。这种数值是铺路石。比较而言,政治科学中的量化知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碎片化的。在一个回归分析中发现的系数很少用于其他分析。这个数值就是终点。

形象地说,定量关系在物理学中就如同欧洲的铁路,它们互相连接在一起。政治学中的数量关系却像是非洲的铁路,它们不过是从港口城市延伸出来的互不相关的轨道,遇到丛林就终结了。

简单选举体系是一个例外。这种体系下选区规模与议会规模的乘积导出了赢得席位的政党的数量,后者可以导出最大席位份额,最后导出政党有效数目(表28.5)。在

这个领域,我们初步得出了一个互相联系的等式网络,通过内阁任期,它还可以延展到选举和政党体系之外。

除了这样“殖民”的潜力之外,选举研究中逻辑量化模型的成功也为其他分支学科提供了方法论的补充。政治科学可以采用更多的定量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是要么回归与要素分析、要么理性选择。有一些思想实验的基本思路是从边界条件和极限案例出发,注重这些极限条件之间变动的连续性,同时排除逻辑上的矛盾,等等。它们在其他学科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成果,在政治学研究中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布雷迪(Henry E.Brady 2004)曾指出:“政治学家不会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正确无误的普遍法则,而应该对历史和环境有充分认知。”这个“不会”是多余的限制,因为我们可以两者兼顾。比如,我们无须宣称  $s_1 = (MS)^{-1/8}$  乃是“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正确无误”的法则,并用它来衡量实际的选举结果。在选举研究中获得成功的方法不可能为政治学的所有研究打开通路,而且也没有必要。只要有部分助益就足够了。

## 参考文献

- AMORIMNETO, O., and Cox, G. W. 1997. Electoral institutions, cleavage structur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49–74.
- BARKER, E., and MCLEAVY, E. 2000. How much change? An analysis of the initial impact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on the New Zealand parliamentary party system. *Party Politics*, 6: 131–54.
- BENOIT, K. 2002.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in electoral studies: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of Duverger's mechanical effect. *Electoral Studies*, 21: 35–46.
- 2004. Models of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Electoral Studies*, 23: 363–89.
- BLAIS, A. 2000. *To Vote or Not to Vote? The Merits and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LAU, A. 2004. A quadruple whammy for first-past-the-post. *Electoral Studies*, 23: 431–53.
- Boix, C. 1999. Sett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choice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609–24.
- BOWLER, S., and GROFMAN, B. eds. 2000. *Elections in Australia, Ireland, and Malta under the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Reflections on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RADY, H. E. 2004. Introduction [to symposium: two paths to a science of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 295–300.
- CAREY, J. M., and SHUGART, M. S. 1995.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 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14: 417–39.

- COLEMAN, S. 2007. Testing theories wi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redictions. *European Political Studies*, 6:2 (forthcoming).
- COLOMER, J.M. 2004.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s Choice*. London: Palgrave.
- 2005. It's parties that choose electoral systems (or Duverger's law upside down). *Political Studies*, 53:1-21.
- 2007. What other sciences look like. *European Political Studies*, 6:2 (forthcoming).
- COX, G.W.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ISP, B.F., ESCOBAR-LEMMON, M.C., JONES, M.P., and TAYLOR-ROBISON, M.M. 2004. Vote-seeking incentives and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in six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66:823-46.
- DARCY, R., WELCH, S., and CLARK, J. 1994. *Women, 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DUVERGER, M. 1951. *Les Partis politiques*. Paris: Le Seuil.
-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EAGLES, M. ed. 1995. *Spatial and Contextual Models in Political Research*.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ELKLIT, J., and ROBERTS, N.S. 1996. A category of its own: four PR two-tier compensatory 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0:217-40.
- FARRELL, D.M. 2001. *Elector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London: Palgrave.
- GALLAGHER, M. 1991. Proportionality, disproportionality and electoral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10:38-40.
- 1998.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in Japan and New Zealand. *Party Politics*, 4:203-28.
- and MITCHELL, P. eds. 2006.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OFMAN, B. 1999. SNTV, STV, and 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s: theoretical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In Grofman et al. 1999: 317-33.
- and HANDLEY, L. 1989. Black representation: making sense of electoral geography at different level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4:265-79.
- KOETZLE, W., and BRUNELL, T. 1997.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the three potential sources of partisan bias: malapportionment, turnout difference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arty vote shares. *Electoral Studies*, 16:457-70.
- and LIIPHART, A. eds. 2002. *The Evolution of Electoral and Party System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New York: Agathon.
- LEE, S.-C., WINCKLER, E.A., and WOODALL, B. eds. 1999. *Elections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UDGIN, G., and TAYLOR, P.J. 1979. *Seats, Votes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lections*. London: Pion.

- HENIG, R., and HENIG, S. 2001. *Women and Political Power: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Routledge.
- JOHNSTON, R.J. 1981. *Political, Electoral and Spatial Syste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ONES, M.P. 1995. *Electoral Law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Notre Dame, Ind.: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 KATZ, R. S. 1996.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Italy. *Party Politics*, 2: 31–53.
- 1997.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AKSO, M., and TAAGEPERA, R.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3: 3–27.
- LIJPHART, A.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OOSEMORE, J., and HANBY, V.J. 1971.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maximum distortion; some analytic expressions for electoral syste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467–77.
- MACKIE, T.T., and ROSE, R. 1991. *The International Almanac of Electoral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vious editions: 1974, 1982.
- 1997. *A Decade of Election Results: Updating the International Almanac*. Glasgow: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 MATLAND, R.E., and TAYLOR, M.M. 1997. Electoral system effects on women's representation;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vidence from Costa 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 186–210.
- MILL, J.S. 1861.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MONROE, B.L., and ROSE, A.G. 2002. Electoral systems and unimagined consequences; partisan effects of districte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67–89.
- NOHLEN, D. ed. 2005. *Elections in the Americas: A Data Handb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TZ, E., and HARTMANN, C. eds. 2001. *Elec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s. i and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KASAPOVIC, M. 1996. *Wahlsysteme und Systemwechsel in Osteuropa*. Opladen: Leske & Budrich.
- KRENNERICH, M., and THIBAUT, B. eds. 1999. *Elections in Africa: A Data Handb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2004.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DESHOOK, P., and SHVETSOVA, O. 1994. Ethnic heterogeneity, district magnitude,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101–23.
- POWELL, G.B.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AE, D.W. 1967.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ED, S.R. 1991. Structure and behavior; extending Duverger's law to the Japanese case. *British Journal*

- of *Political Science*, 29:335-56.
- 2001. Duverger's law is working in Ita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312-27.
- REYNOLDS, A. 1999. *Electoral System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REILLY, B. 1997. *The International IDEA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 RIKER, W. H. 1982.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753-66.
- RULE, W. 1981. Why women don't run: the critical contextual factors in women's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4:60-77.
- and ZIMMERMAN, J. F. eds. 1994. *Electoral Syste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ir Impact on Women and Minoriti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 SHUGART, M. S. 2006. Comparative electoral systems research: the maturation of a field and new challenges ahead. Pp. 25-55 in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Systems*, ed. M. Gallagher and P.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CAREY, J. M.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LDINI, M. E., and SUOMINEN, K. 2005. Looking for locals: voter information demands and personal vote-earning attributes of legislators und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437-49.
- and WATTENBERG, M. P. eds. 2001.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AGEPERA, R. 1999. Ignorance-based quantitative models and thei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1:421-31.
- 2001. Party size baselines imposed b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for simple electoral system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3:331-54.
- 2003. Arend Lijphart's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logical conne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Political Studies*, 51:1-19.
- TAAGEPERA, R. 2008. *Predicting Party Sizes: The Logic of Simple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and ALLIK, M. 2006. Seat share distribution of parties: model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Electoral Studies*, 25:696-713.
- and ENSCH, J. 2006.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largest seat share. *Electoral Studies*, 25:760-75.
- and SHUGART, M. S.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Predicting the number of parties: a quantitative model of Duverger's mechanical effect. *Ameri-*

*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455-64.

——and SIKK, A. 2004.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cabinet duration. Unpublished.

THEIL, H. 1969. The desired political entrop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21-5.

## 第二十九章 分 权

戴维·萨缪尔斯(David Samuels)

### 一、导 论

虽然全球化浩大的潮流主宰了当今世界的公众意识,但各国的政治领袖依然热衷于争论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制度设计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导致流血事件。的确,如果在一个制度真的无关紧要的世界里,伊拉克的逊尼派、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只要随便挑选一个制度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这只是一个荒唐的想法。个人与社会团体之所以在制度设计上你争我斗,是因为人们在制度框架内的政治立场,对于从政治中“谁得到什么”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具有实质意义。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政治制度对于政治行为者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制度对政治结果,如经济增长或者政治稳定的影响程度上面。也许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制度差别,就是行政和立法权是否分离。智慧之人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探讨如何设计“最好的”宪法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也许是第一个比较研究者,他曾让自己的助手兼学生到各地搜集比较宪法的“数据”。然而只有魏玛共和国陷入纳粹恐怖的噩梦,才激起了 20 世纪的学者对于这方面问题的兴趣(Hermens 1941)。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冷战期间(1945—1990)民主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失败,提供了更多分权会影响民主发展潜力的佐证(例如 Linz 1990)。

在所谓的民主化的“第三波”,即从 20 世纪 70 年代始至冷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学术界对于分权的关注获得了更多的动力。舒加和卡雷 1992 年出版的著作《总统与议会》(Shugart and Carey 1992)标志着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它首次尝试对关于分权的各种学术成果加以综合。这一著作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任务,并鼓励学者们对一些重要的



问题加以探讨,诸如分权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民主的崩塌、某些特定的制度是否更可能促进民主的稳固,以及政体形式对于政策输出和可治理性是否有影响,等等。<sup>①</sup>

本章主要探讨“分权有什么影响?”这一问题。学者们认为权力是否分开会影响各种各样的政治“输出”,但我相信短短一章不可能涵盖人们提出的所有疑问。因此,在对民主政体之间的区别进行简短的界定之后,我将讨论四个方面的内容,以说明分权发挥影响的程度:

- (一)分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进程中相关的“决断”和“坚定性”?
- (二)内阁对于民主政体中的政治进程和政治输出有什么样的影响?
- (三)分权会导致政体危机和/或崩塌吗?
- (四)分权以何种方式影响我们对民主代议制和回应制的理解?

之所以重点探讨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直接导向比较政治学研究者核心的理论和实践关切,或者说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质和结果、民主生存发展的机会,以及在民主政治的喧闹中选民意见是否发挥作用,等等。

## 二、定 义

学者们一般认为,分权有三种不同的形式: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2002年,在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76个民主政体(在政体IV数据复合民主指数评级中达到了5分或以上)中,31个都是议会制,25个是总统制,剩下的20个是半总统制。民主政体的区别主要围绕选举行政与立法机构的过程,以及行政与立法机构随后制定政策与管理政府的互动方式。<sup>②</sup>因此舒加和卡雷(Shugart and Carey 1992)将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一)把行政和立法机构的起源与存续区分开;
- (二)行政当局由宪法保障执行法律;以及
- (三)行政首脑掌控内阁。

对于起源的区分指的是行政机构的产生过程:它是产生自一次与立法机关席位分配无关的单独投票(总统制),还是产生自一些与立法机构议席分配相关的过程(非总

<sup>①</sup> 参见 Linz (1990, 1994); Mainwaring (1993); Stepan and Skach (1993); Satori (1994); Jones (1995); Mainwaring and Shugart (1997a); Power and Gasiorowski (1997); Carey and Shugart (1998); Przeworski et al. (2000); Haggard and McCubbins (2001); Cheibub and Limongi (2002); 等等。

<sup>②</sup> 限于篇幅以及文章重心在于民主政体之间多样性的影响,此处将不赘述关于每一种政体内部制度的多样性的争论。

统制)? 对于存续的区分则主要指终止政府的原则:在总统制下,立法与行政机构的任期都是固定的,并不像议会制那样,受两者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影响。至于宪法保证的权力方面,最简单的区分是一个机构制定法律,而另一个机构予以执行。如果立法机构可以绕开总统执行法律,那么这一体制就呈现出某种混合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特殊的权力。

“半”总统制正如其名,是一种混合政体。对于半总统制的定义以及哪些国家属于这一类别,学者之间仍然存在争论(参见 Shugart and Carey 1992; Elgie 1999; Metcalf 2000; Roper 2002)。一个最简单也最宽泛的定义是,政府的两个部门(立法和行政)都由直接选举产生(类似总统制),但政府首脑(总理)要对立法机关负责(类似议会制)(Siaroff 2003)。在这种政体之下,总统不直接掌控内阁。对半总统制影响的研究落后于议会制和总统制,因为几乎所有采用半总统制的都是相对比较新的民主国家。因此,尽管本章将对三种民主政体进行比较,但大部分的篇幅还是集中在议会制与总统制之间的对比上面。

某些学者置疑这种政体分类的重要性(例如 Przeworski 2003)。我并不认为分权与特定的政策输出有必然的联系。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Samuels and Shugart 2003),与混合体制相比,分权明显地能够容纳更为多样的治理风格和政治输出。也就是说,在治理的风格和实质方面,分权政体既可以和混合体制相似,也可以非常不同。学者们一直试图确定分权政体区别于混合政体的基本条件,并且探讨这种区别对于不同政体之下公民的影响程度。下面就转向上文提出的四个问题,考察我们对于分权的知识状态,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建议。

### 三、分权与政府的“决断性”和“坚定性”

根据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的理论,在分权政体下暴政出现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因为这种制度将行政与立法机构分置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从而使两个机构中的行为者产生不同的行为动机,也使多数至少是更难以协调起来压迫少数。在现代政治科学语境下,总统制的结构被设计得更少“决断性”而更富“坚定性”(Cox and McCubbins 2001)。这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那么在总统制下,政策变化会更缓慢、更平和。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期望行政与立法分开存在能够克服单方面决策的现象。由于对总统来说不存在信任投票上的问题,所以他可以利用总统职位的这一特权干预立法进程,比议会制之下的总理更为有效地把政策引向他所希望的方向(Cox and

Morgenstern 2001)。尽管如此,总统制的核心定义中并没有赋予总统任何有助于或者有碍于立法权力的特权,也就是说总统没有改变政策现状的固有权力。这强调了总统和处于核心地位的立法者之间的关系的关键作用。在国会中拥有强大多数的总统,与拥有类似规模的议会支持的总理相比,在对政府各部门进行协调方面并不会遭到太多的难题,因此政策结果也会比较相似。而且两个部门的独立存在就意味着这种跨部门的协调既不被鼓励,也得不到保证,即使总统和国会多数的偏好有所重合。议会制不能保证、但鼓励协调,因为如果议会制之下的政府得不到信任,它可以被解散,并由得到授权的新一届行政机构取代。在总统制中则不会如此。

我们需要追问,当总统与处于核心地位的立法者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立场分歧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局面(例如少数派政府)在总统制之下发生的频率几乎是议会制之下的两倍。<sup>①</sup> 假设国会多数提议改变现状(SQ),而总统拒绝签署使之生效(或反之亦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使政策保持稳定(也许会导致“僵局”或者“死结”),现状也没有改变,因为总统不能因此下台。在任何政体之下,僵局都不是立法机构某种议席分配形式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议会制下僵局不大容易出现,原因就在于下台的威胁——如果总理拒绝实施某项议会通过的法案,他在政府首脑的位置上可能就待不长。<sup>②</sup> 这就是科克斯和麦克卡宾(Cox and McCubbins 2001, 26—27页)认为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彼此独立,使总统制更少“决断性”而更富“坚定性”的原因(亦可参见 Laver and Shepsle 1996, 他们政府首脑的直接选举扩大了立法机构的独立性,而不是使其更为顺从)。

这引出了如下假设:

(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在某个时间点 P 上,与其他政体相比,纯粹的总统制不大容易离开现状转向新的政策;

(二)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某项政策被提出之后,与其他政体相比,总统制从现状向新政策的转变能够实现的目标要更有限;

(三)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某项政策被提出之后,总统制从现状到新政策的转变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四)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某项政策被提出之后,总统制从现状到新政策的转变付出的成本(比如用额外支出衡量)会更高。

<sup>①</sup> 切巴布等人(Cheibub, Przeworski, and Saiegh 2004)发现,议会制之下出现少数派政府的时间约占 22%,切巴布(Cheibub 2002)还发现,少数派政府在总统制下出现的时间约占 44%。这些数字与之前的研究相符(Strøm 1990b; Shugart 1995)。

<sup>②</sup> 在半总统制下情况也许会不同,这取决于总统的否决权。

对于这些假设的研究甚少。这些问题之所以比较棘手,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先验地决定不同政体之间在决断性和/或坚定性方面的区别应该有多大。因此虽然科克斯(Cox 2005)注意到,执政的多数在所有地方都很少流失选票,但切巴布等人(Cheibub, Przeworski, and Saiegh 2004, 表 2)提供的数据却表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在决断性/坚定性方面存在着一种累积性的差别。<sup>①</sup> 他们指出,议会制与总统制相比,在立法机构支持程度相似的情况下,行政部门的提议获得认可的比例总是更高。具体说,议会制之下行政部门提案的通过率为 82.8%,而在总统制之下只有 64.1%。这说明,政体结构在决断性和/或坚定性方面导致了相当程度的差异。

切巴布等人还发现,随着行政部门和核心立法者偏好分歧的扩大,总统制与议会制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坚定性,但却没有后者那么果断。因此,在行政部门获得立法部门绝大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两种政体“成功率”的差距相对较小(议会制为 89.6%,总统制为 82.6%),但在单一政党多数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就变大了(分别为 89.5% 和 77.4%)。从多数联合执政(76.0% 比 47.5%)到少数联合执政(81.7% 比 52.5%),再到单一政党的少数派政府(81.3%, 65.2%),成功率差距逐级扩大。

这些数字说明,无论总统拥有怎样的权力,都不足以克服分权所带来的麦迪逊式的惯性。也就是说,强势的行政权力不可能使总统制走向议会制,因为在总统制之下立法机关可以推翻否决、撤销行政命令、推翻议程,甚至剥夺行政机构的宪法权力,而总统却无权解散议会(Samuels and Shugart 2003)。<sup>②</sup> 在联合执政或者少数派政府的情况下,总统会试图采取单边行动的策略,但有可能遭到抵制。林茨和其他学者担忧这种可能性,并认为议会制的总是要少一些,这不仅因为在议会制之下少数派政府少出现,而且因为如果少数派的总理试图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或者如果僵局出现,他们可以被赶下台。简言之,尽管总统制不是僵局的必然药方,它的确会有引发行政—立法机构冲突的更大可能性。

关于议会“效率”的研究虽然有用,但对于政治体的决断性和坚定性问题只提供了部分答案。我们现在认识到,对于各民主政体中提案内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一无

<sup>①</sup> 作者们关注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之下,少数派政府通过议案的时候是否比多数或少数派联合执政的政府更少取得成功? 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sup>②</sup> 因此,强势的行政权并没有让阿根廷成为第二个英格兰。在两种政体之下,当行政部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时候,政府治理的区别可能并不来自于政治体制,而是来自于其他因素(例如联邦制)。但是当行政机构面临议会的反对时,我们会在阿根廷看到,政策的稳定性或者政策僵局持续整个总统任期。至少在阿根廷,这种情况似乎与宪政危机有关(例如 1989 年阿芳辛以及 2001 年德拉鲁阿的去职)。相反,在英国这种政府与议会对峙的局面首先不大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可以进行新的选举,最新的一次“无多数议会”出现在 1974 年。类似情况可能在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少数政府下出现:如果僵局出现(也许不会),既可改组政府,亦可重新大选。

所知。由于行政和立法机构彼此独立,总统和总理提出议案的策略应有所不同,而在不同程度的议会支持下这些不同会变得更明显。正如科克斯和麦克卡宾(Cox and McCubbins 2004)所言,美国政党最主要的影响不在于是否最终投票通过法案,而在于决定什么样的议案能够付诸投票。这对于比较政治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政体之间的区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党和/或行政机构将动议提上议程的能力?也许切巴布等人强调的区别在提案阶段同样存在。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政体之间在决断性和坚定性方面的区别会更大,而且有更大的实际影响。今后的研究应该着力阐明即便是在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偏好彼此重合的情况下,总统制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策的坚定性,并减少了政策的果断性。<sup>①</sup>

#### 四、内阁:分权研究中“缺失的一环”

对议会制政府的“制度主义”研究大概主要集中在内阁上面。内阁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争取议会支持使提案得以通过;(二)控制施行法律的行政机构官僚。尽管分权的相关研究在发展,但议会制之外国家的内阁还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研究之所以受阻,原因仅在于数据的缺乏,即除沃登多普、卡曼和布吉(Woldendrop, Keman and Budge 2000)等学者提供的资料(主要限于议会制)以外,我们对内阁成员的情况知之甚少。不过不久之后,学术界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分权研究中美国案例的影响阻碍了对内阁的研究。在美国,由于国会研究者的学术影响,人们认为,无从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立法机构对官僚部门失察的问题,内阁因而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另外,美国政治学者一般也不认为,内阁部长的指派与总统的治理战略和/或国会的成功直接相关,就像议会制之下那样(参见如 Bennett 1996)。

最后,舒加和卡雷那一部设定了研究议程的著作也几乎没有提及内阁的问题,从而将学者们的关切引向了别处。舒加和卡雷鼓励学者们关心行政权力的单边性(如 Carey and Shugart, 1995)、议席分配的选举—制度资源(如 Jones 1995; Shugart 1995),或者议会政治本身(如 Morgenstern and Nacif 2002)如何影响了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由

<sup>①</sup> 在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政策差别方面,还有两条比较有希望的研究路径,它们与我的假设相关,即政策制定在总统制之下成本更高。因为首先,政府的“规模”由政体形式所决定(试比较 Persson and Tabellini et al. 2004 与 Boix 2005b);其次,相对而言,议会制倾向于推动“公共品”而总统制则增加了“寻租”行为即腐败的机会(Shugart 1999; Haggard and McCubbins 2001; Gerring and Thacker 2004; Kunicová 2005)。对于导致政体之间这些潜在差别的原因,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

于这些问题本身已经相当复杂,内阁在这种纷乱中被忽略掉了。但是,学者近来开始发现,与议会制相似,内阁在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之下同样扮演了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关键性的纽带作用(Deheza 1997, 1998; Thibaut 1998; Amorim Neto 1998, 2002, 2006; Altman 2000, 2001; Lanzaro 2001; Amorim Neto and Strom 2004; Almeida and Cho 2003; Roberts and Druckman, Forthcoming; Amorim Neto, and Samuels 2003; Carroll, Cox, Pachón 2006)。

对于不同形式的民主制之下内阁政治的研究可能会影响比较政治中一些重要的争论。例如,一方面,在解释联盟的动力机制时,切巴布和李蒙治(Cheibub and Limongi 2002, 18页)认为“在总统制和议会民主制之下结成联盟的动机并无不同”。但另一方面在总统制之下,总统的核心地位意味着联盟的动力机制——政党决定加入或撤出某个联盟——在不同的民主政体之间会出现显著差异。分权赋予总统在政策制定中拍板的权力,而在议会制之下,总理会把某些部门的实际控制权让渡给他的内阁同事(Laver and Shepsle 1996)。因此,分权制之下一个党在考虑是否参加内阁的时候必然会更加充分地权量他们能否将参与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影响力。政党如果既在政策制定方面没有直接的影响力,又不能“构建和破坏政府”,那么相对于议会制而言,它们在总统制与半总统制之下在“机构”和/或“政策”收益方面(Strøm 1990a)能够获取的报酬会更低(Samuels 2002)。

这表示在总统制之下联盟存续的代价会更高,也更不稳定。阿特曼(Altman 2001)间接证明了以上结论,他发现总统的固定任期影响了联盟产生和存续的可能性。随着总统在任时间的流逝,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会下降,其瓦解的可能性会增加(2001, 93页)。因此,与议会制之下的内阁不同,总统的执政联盟“会倾向于和总统任期相一致的选举日程同步建立或者解散”(2001, 115页)。从理论上说,这些结论意味着议会制之下加入和退出执政联盟的标准模式(如Austin-Smith and Banks 1988),要经过实质性的修改才能适用于总统制。

分权对于内阁政治,以及其他政治输出的影响,远不止作出参加还是退出执政联盟的决策。阿莫林·内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发现:在总统制下执政联盟的大小或者其成员的数量也许非最重要的变量。相反,从内阁(以及在治理结果)的角度来看,关键的变量包括各党派部长的比例(区别于亲信和技术官僚),以及联盟中的成员党在多大程度上比较均衡地获得了权力。这一观点,与那些关注议会联盟中政党的规模和数量的研究,以及根据“否决点”的数量预测政策输出变化的研究,都背道而驰(如Cheibub and Limongi 2002; Cheibub, Przeworski, and Saiegh 2004; Tsebelis 2002)。因此,有必要详细介绍阿莫林·内托的观点。

在任何政体之下,行政首脑对于内阁组成的偏好反映了(一)他对政策结果的偏好

以及(二)他为了达成这些结果需要与其他行为者讨价还价的程度。因此,在行政首脑的政策偏好确定的情况下,内阁的任命策略取决于他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行为者尤其是议会党团进行交涉。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行政首脑为了进行有效统治对议会中各政党的依赖程度,按照从强到弱的顺序对民主政体进行排序:议会君主制、议会共和制、半总统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

由于总理为了维持政府的存在完全依靠议会中各政党的信任,所以他们几乎总是必须组建由各党成员参加的内阁。出于同样考虑,总理也几乎总是必须组建一个党派力量完全平衡的内阁,这意味着内阁中每个政党所获得的权力与它们在执政联盟中的贡献相一致。这是政治学研究中最古老也最恒定的经验结论之一(如 Gamson 1961; Warwick and Druckman 2001)。

与总理们相反,总统们并不依赖国会的信任维持自己的任期。因此与前者不同,总统们在调整内阁成员的党派及其比例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Amorim Neto 1998, 2006)。是什么决定了总统任命政党成员而非自己的亲信或者技术官僚的动机,以及是否根据均衡的原则来进行任命?为方便起见,我们假定所有的行政官员都只有两种制定政策的策略:他们要么通过立法,要么通过行政特权来实现其政策目标。“立法”的途径要求提案经规范的立法程序获得通过,而“特权”的途径也许不需要立法机构的卷入。例如,某些总统可以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

那些知道只能通过立法途径实现自己的目标行政首脑,会寻求与议会多数形成密切的联系。内阁总理只能使用这种策略,并任命一个完全是党派性质的内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性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依赖议会中的政党来维持政权和取得立法成果。相反,一个直选的行政首脑不必依赖立法机构而任职。因此在总统制之下,机构的彼此独立和行政首脑对内阁的威权,意味着内阁的组成与总统在国会中的联盟的关系既可以密切一点,也可以松散一点。一方面,根据个人风格、制度规定和/或议会中的党派组成,总统可能会认为“立法”途径更可取,因此会与议会制之下一样,使内阁的组成最大限度地增加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如果总统决定通过行政命令或者其他单边性的权力实现(至少部分实现)其政策目标,那么内阁的权力就可以由非党派的技术官僚、总统本人的亲信或者利益集团的代表分享。

总统被赋予较大的单边特权时,既更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达成自己的目的,也会相对减少与各政党的合作。由于机构是彼此独立的,所以内阁的任命策略就取决于总统对各部门的政策领域内,是通过立法还是特权制定政策更为有效的判断。总统越是依赖立法途径制定政策,就越会吸纳政党成员进入内阁,而内阁中的权力分配也就越均衡(Amorim Neto 2006)。

在半总统制之下,内阁任命的政治有所不同。根据这种体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但他们自己无须下台,这在政治上削弱了总理的权力。但是,由于总统和总理都拥有对内阁任命的事实上的否决权,从而又削弱了总统的权力(这与总统制相反)。在半总统制中,总统相对于总理的权力又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具体制度规定。总统的任命权越大,内阁中非党人士的份额也就越大(Almeida and Cho 2003; Amorim Neto and Strom 2004)。一般来说,半总统制之下内阁的动力机制代表了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某种中间地带。

综合上述阿莫林·内托的论点可以发现,在某个内阁中政党的比例和内阁权力分配的均衡性,既取决于某个政府或者国家的特性,也取决于政体的特性。表 29.1 和 29.2 证明,情况的确如此(细节及验证见 Amorim Neto and Samuels 2004)。

表 29.1 不同政体之下非党部长的平均比例

政体	百分比(标准离差)
议会君主制	0.71(3.89)
议会共和制	3.20(10.11)
半总统共和制	6.52(14.72)
总统共和制	29.17(29.04)

表 29.2 不同政体之下的平均均衡性

政体	百分比(标准离差)
议会君主制	0.937(0.127)
议会共和制	0.863(0.132)
半总统共和制	0.871(0.125)
总统共和制	0.645(0.266)

不同的民主政体之下内阁任命策略的区别带来什么影响?很多研究已经探讨了民主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多数与少数政府、一党与多党政府的区别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尚未将内阁的政党结构和比例的差别纳入考察范围。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把“技术官僚”任命为内阁部长在许多总统制国家中带来的影响(Bresser et al. 1993,; Conaghan, Malloy, and Abugattas 1990; O'Donnell 1994; Domínguez 1997)。他们对此类任命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解释,认为这不但影响治理风格,也影响了治理的实质(后面关于代表和回应的部分还将展开这个问题)。



阿莫林·内托(Amorim Neto 2002;也可参见 Amorim Neto and Santos 2001)同样发现,内阁的均衡性和总统的国会联盟的纪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内阁的均衡性——不仅内阁是一党还是多党,抑或多数还是少数——还会影响总统在立法方面获得成功的可能(Amorim Neto 1998)。如果内阁的职位是按执政联盟中各党的贡献成比例分配的,则在国会里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另外,阿莫林·内托和塔夫内(Amorim Neto and Tafner 2002)发现,在巴西,内阁的均衡性与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的数量成反比,再次证明了关于均衡性与总统的治理策略(“立法”与“特权”)之间关系的假设。

阿莫林·内托的发现显然与切巴布和李蒙治的观点相悖,后者认为“执政联盟和国会效率之间的联系至多也只是模糊不清的”(Cheibub and Limongi 2002, 5页)。事实上,内阁联盟与国会效率之间的联系具有关键的影响。如果组成了一个均衡的内阁,总统在国会中的联盟会更加自律,而总统也可能相对更容易地完成他的立法目标。如果内阁不均衡,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阿莫林·内托认为,影响内阁任命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总统的权力以及总统所属政党的规模。其他因素还包括总统所属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经济状况。这些变量与治理之间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除内阁成员的规模之外,研究应集中在组建内阁与执政联盟的方式上面,这能够为治理效果的不同提供重要的解释。

应该鼓励对不同政体之下的内阁加以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对官僚的监管、政策的效率,以及民主回应等问题。内阁不仅要为行政首脑的立法动议构建国会的支持,它还要表明行政首脑管理官僚系统和实施法律的策略。分权因此对解决“谁控制”以及如何控制官僚这一问题有重要的影响。在分权制之下,总统很大程度上不需要依赖国会支持就能控制官僚系统。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分权意味着民主政体之间在官僚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Moe and Caldwell 1994; Palmer 1995; Siavelis 2000; Huber and McCarty 2001; Baum 2002)。例如休伯和施潘(Huber and Shipan 2002)认为,针对类似的政策议题,政治家在不同的交易条件下会设计出不同的官僚控制机制。内阁相对于立法机构的独立会极大地改变交易环境。交易环境的区别影响了每个行为者所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与类别,后者反过来又影响了行为者对特定行为和策略的收益与成本的预期。

因此,接受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学者认为,在分权制之下设计控制机制,无论是对行政机构还是立法机构来说都会更为困难(如 Moe and Caldwell 1994; Palmer 1995),而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分权会导致更为细密的官僚监督机制,这是因为分权产生了立法者与官僚制之间面对面的监控问题。在分权体制下,不仅国会中的政党只

能对内阁任命发挥相对较小的影响；而且国会中的多数党也不能把未能履行这个多数通过的法案的政府拉下马。这必然促使总统制之下立法机关要求制定更为细密的官僚控制规则。

这在比较政治学中是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对于接下来的研究，学者也许应该借鉴已被美欧学者采用的委托代理理论（如 Ström, Müller, and Bergman 2003），因为这类理论对官僚的能力（Huber and McCathy 2004）以及政党政策目标的相对强度（Samuels 2002）进行了限制性的假定。如果民主政体中官僚的能力和政党目标各不相同，那么对管控机制的设计也应有所不同。由于经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管控机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分权将在官僚管理方面产生何种不同的动力，以及在政策实施方面导致何种差异等问题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在这一部分我提出，内阁政治可能代表了分权制研究中“缺失的一环”。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对政治进程来说，影响内阁的权力比许多总统拥有的单边权力更为根本，因为无论不同部门的偏好区别有多大，立法机关都没有正式的权力，以推翻总统关于任命或者解除某位部长的职务的决定。<sup>①</sup> 但另一方面，假如立法机关能团结必要的多数，则它总是能够阻止总统行使设定议程、否决法案或者颁布行政命令的权力（Amorim Neto 1998；Cox and Morgenstern 2001）。内阁乃是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重要联系，也是认识官僚管控和政策实施的关键，而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 五、政体危机：该归咎于分权吗？

冷战期间拉丁美洲一些民主政体的瓦解，以及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民主化地区民选政府的建立或者重建所引起的关注，持续影响着当前对分权的优势和缺陷的争论。如果像林茨（Linz 1990, 1994）等人所言，总统制加速了民主的垮台（即便不是直接的或者唯一的原因），那么我们能否设计出某些不那么容易崩溃的政治制度呢？退一步说，学者们能否至少在民主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方面贡献一些新的知识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民主化的“第三波”这一 20 世纪晚期的标志性事件中采纳了民主制，全世界的学者、政治家和政策实践者要继续追问这些问题。

林茨认为，由于行政与立法机关是分别选举的，它们会从不同的渠道获得统治合法性。另外，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因为固定的任期使两个机构中的政治家都无须缓和他

<sup>①</sup> 这一规则也有些例外（例如哥伦比亚和秘鲁的不信任规则，美国、菲律宾和韩国的信任规则）。但重要的是，这些规则都不能影响行政机构的存续。

们的立场或者寻找新的联盟伙伴。相反,议会制下两个部门的相互依赖增加了进行跨部门交易的诱因。此外,当两个部门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总统制由于缺少信任投票这样一种制度出口,所以有可能出现政治上的僵局;而在议会制之下,可以在不产生宪法危机的情况下使一个政府相对平稳地过渡到另一个政府。这些因素增加了分权制之下政府机构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可能引发政体危机,无论政党偏好的分配如何。

其他学者如曼瓦宁(Mainwaring 1993)和琼斯(Jones 1995)进一步指出,在多党制情况下,由于跨部门的协调更为困难、现存的问题更容易被加重,因此冲突的产生和持续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容易形成危机局势。这些学者同样认为,虽然少数派政府和联合政府在所有的民主体制下都很常见,但议会制富更有弹性,因为总理要依赖议会才能保住自身的权力。因此,尽管行政—立法机构的冲突在总统制之下并非不可避免,但它的确更容易发生,也更容易导致真正的危机。

在这一部分,主要评介最近一些关于分权体制下政体危机起源的争论。学者们都认为,总统制发生危机的频率要高于议会制,但他们对于导致危机局势的因素有不同看法。普列泽沃斯基及其合作者的著作(Adam Przeworski et al. 2000)成为近来这一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与那些认为碎片化的政党制度导致了政体不稳定的学者不同,普列泽沃斯基等人再次证明,总统制确实比议会制更脆弱,但他们对政党制度的特性与总统制政体的脆弱性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质疑。

普列泽沃斯基等人再次证实了现有研究的结论,即下院多数党的缺乏与总统制政体的崩溃相关(2000, 134页)。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最大党的规模与政体崩溃无关(同上)。这两个论点都可能正确,但它们都忽略了问题的核心:议会多数(一个或数个政党)是总统的联盟还是反对者。如果我们不清楚最大政党及其他政党的政治取向,则认为最大党的规模与政体崩溃之间存在任何关系的假设都缺乏理论依据。因此,普列泽沃斯基等人试图将最大党的规模与总统制的脆弱性联系起来,这对我们理解政体脆弱性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特定的变量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总统所在政党的规模和/或总统的执政联盟的规模是否决定着治理的成效。

普列泽沃斯基等人试图否认以下的观点,即总统制政体的崩溃与立法机关的碎片化有关系,后者的测量指标则是这一机构中有效政党的数量。尽管这个观点也常被引用,但碎片化与政体危机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和“最大党”一样,有效政党的数量也是一个受环境影响的因素,它同样取决于政党的政治取向。另外,在有效政党的数量相近的情况下,存在着多种联盟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总统来自哪个政党以及哪些政党与总统结盟。

比如有三个政党,每个占据30%的议席份额,另有一个政党得到剩下的10%,因此

有效政党数为 3.57。最小党为左翼,总统所在党居中,剩下的两个党居于右翼。总统与左翼政党结成联盟,另两个政党则成为反对党。要把有效政党数与政体崩溃关联起来,尚需回答以下的问题,即与总统的政党得到了 40% 的议席、而得到了 60% 席位的另一个党拒绝与总统结盟相比,上述情况要糟糕。后者的有效政党数为 1.92。也许这是两种同样麻烦的情形——也许不是——但我们不能依靠有效政党数来确定这一点。<sup>①</sup>简言之,普列泽沃斯基等人的观点(如同其他学者一样)依赖的是需要由情景决定、且理论价值有限的指标。<sup>②</sup>

这里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同样使人质疑切巴布(Cheibub 2002)及切巴布和李蒙治(Cheibub and Limongi 2002)的结论。他们认为,总统制与多党制的结合并不比多党议会制更不稳定,但他们的论文建立在与普列泽沃斯基等人类似的数据和观点基础之上。例如切巴布(Cheibub 2002,第 3 页)认为“少数派的总统,少数派政府和僵局不会影响总统制民主政体的稳定”,而他的论点与普列泽沃斯基等人(2000,134 页)关于少数派政府的结论相左,后者建立在一个关于僵局的比较狭隘的定义的基础之上,而且采用了和普列泽沃斯基等人类似的关于有效政党数的观点。

在这些问题上研究如何进展?学者们不应再依据有效政党数或者是否存在少数政府这类简单的指标,而应该研究立法机构中总统所在党和/或执政联盟的规模、内阁职位的分配以及意识形态的极端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前两个方面相对比较容易操作,而第三个方面则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专家的判断。针对总统所在政党的规模与政体崩溃之间的关系关系的推测,图 29.1 标绘了给定年份中总统制崩溃的(绝对)概率与总统党规模之间的关系。<sup>③</sup>

以上两者相互关系显然印证了之前的假设。在总统的支持率最低的时候,总统制崩溃的概率是 0.09,而总统的支持率最高的时候,相对应的概率是 0.03,前者是后者的整整三倍(在总统党规模的中点上概率为 0.05)。这一发现将研究带回文献中的一个

① 普列泽沃斯基等人的分析在方法论方面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他们使用的数据表明,102 个总统制国家中,有 40 个的有效政党数大于 4,这个数据来自瑞士。这里存在错误分类。瑞士并非总统制国家,因为它不符合总统制的基本要求,即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来源和存续都相互独立。瑞士的行政委员会是由议会正式选举的,这就是说它们的来源并不相互独立,虽然存续是把这 40 个国家进行重新分类会把其中相当部分有效政党数较高的“稳定政体”排除在外。

② 普列泽沃斯基等人对特定案例的归类方式也可受到质疑。例如,他们判定秘鲁的民主制在 1989 年已经崩溃(2000,100 页)。由于只有 24 个总统制崩溃的案例,所以这个判断改变了总体结果。1989 年秘鲁的有效政党数为 2.31,1992 年为 4.10,实际上就在这一年藤森解散议会开始独裁。普列泽沃斯基等人奇怪的归类有利于证实他们的假设,但如果把 1989 年的秘鲁归于民主政权,则他们的假设就不成立了。

③ 我收集了总统所在政党规模的数据,与普列泽沃斯基等人的数据库相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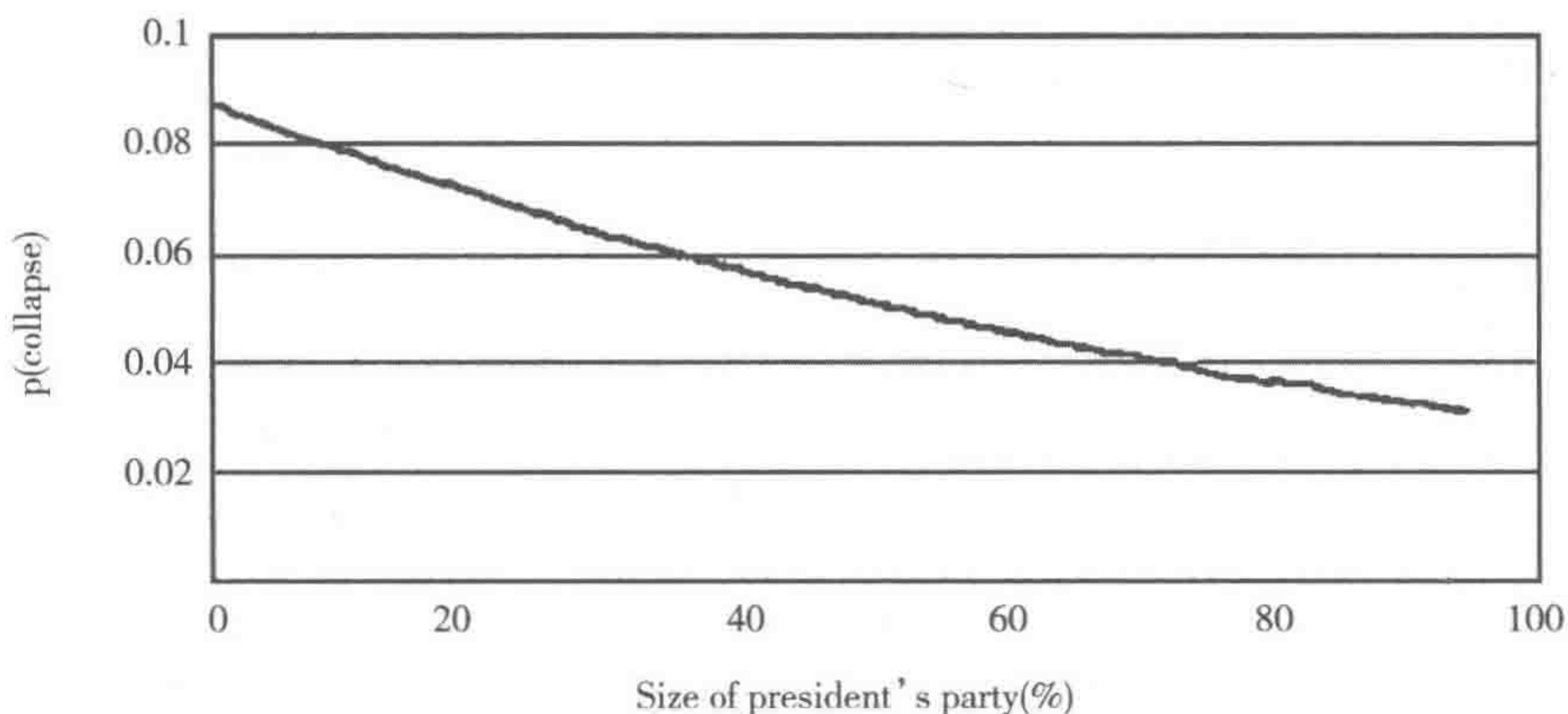


图 29.1 总统党的规模与政体崩溃之间的关系

关键论点：总统所在党和执政联盟的规模对于认识分权制下的治理动力机制至关重要。对于总统制的表现和稳定性的研究因此应该从关注政党的碎片化转向关注以下三者之间互动带来的可能影响：总统所在政党的规模及其在政策空间中的位置、内阁权力的分配，以及立法机构中意识形态极端化的程度与特性。这些变量的某种结合也许可以提供理解分权制下治理效果的线索。<sup>①</sup>

尽管学术界依然在争论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容易崩溃的原因，但幸运的是，政体“崩溃”的频率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小了很多。这表明军方与非军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和国际层面对于军事政变的容忍度出现了重大变化。但政体崩溃少了不代表政体危机也随之减少了。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呢？答案可能是经济崩溃，或者社会关系的紧张。政治制度也可能有影响。政体危机的反复出现——即使它们并没有导致政体崩溃——迫使我们审视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政党制特征、分权和政体表现之间的关系。

新的研究为以下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即尽管总统制并不必然导致政体危机，但分权体制下某种特定的政党制度的确与治理危机之间存在着更高的相关性。霍赫希泰特勒 (Hochstetler 2005) 发现，从 1978 年到 2004 年，非军方的政治行为者在南美的 10 个国家中对 42% 的当选总统提出正式挑战，试图迫使他们在任期未结束之前下台。最终，24% 的总统经过弹劾和/或辞职提前去职，而且和以往的时代不同，文职人员而非军事领袖成为他们的继任者。霍赫希泰特勒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街头抗议在决定哪些总统下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她也指出，另一个决定危机是否发生及

<sup>①</sup> 波瓦克斯认为，总统制崩溃的可能性之所以相对更大，是在某些经济条件下制度与政治家的寻租行为相结合的结果（可参见 Boix 2005a）。这一研究建立在波瓦克斯早先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之上（例如 Boix 2003）。

其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是总统是否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正如表 29.3 所示,她发现,如果总统得不到多数的支持,则更可能受到挑战并且被迫去职。

表 29.3 对总统挑战的频率

	多 数	少 数	总 计
未受挑战	7(77%)	17(53%)	24(55%)
受到挑战	2(22%)	15(47%)	17(42%)
总数	9	32	41
去职(总数中的百分比)	1(11%)	9(28%)	10(24%)

霍赫希泰特勒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传统的对于总统威权和合法性的挑战今天依然存在,虽然军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卷入政治。第二,挑战总统的不止是政治精英,民众抗议和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民众抗议、立法机构中政党支持的分布和总统制危机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这些发现仅限于 10 个国家,但是将其推广到更大范围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能将霍赫希泰特勒的发现推广到全世界的所有政体吗?在一个世界范围内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已经有所收敛的时代,只有总统制更容易出现危机吗?半总统制是否还更脆弱?在议会制之下发生类似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总统权威的严重挑战的频率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样的危机是不是就那么坏?毕竟,如果挑战成功,会使权力转移到民选政治家而非军方或者独裁者手中。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恰恰说明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也许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这样的危机更像议会之下的信任投票而非军事政变。另一方面,即使短暂的政治危机也会常常导致社会冲突或者经济困难。因此两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与社会环境类似的情况下,总统制危机的发生率(10 个国家 42%的民选总统)与其他民主政体相比孰高孰低;以及这类危机的结果究竟如何。如果总统制之下危机的频率更高,而且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和/或经济后果,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认另外一种“总统制的危险”。如果实际情况相反,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分权制在军队缺乏介入政治的意愿时解决政治僵局的一种机制。

也许总统受到挑战后对抗议的镇压引发的社会冲突、罢工、死亡,或者对人权的违反确实比信任投票之后更严重。也许对总统的挑战与/或总统的去职会导致经济或者社会危机,这或者是因为现任总统虽然躲过一劫但在政治上受到了削弱,或者是因为总统下台之后恢复控制的文职官员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即使

没有军队的介入,而且不存在政体“崩溃”的问题,从规范意义上讲,总统制仍然表现不佳。到底什么构成了“政体危机”,以及当“政体崩溃”不再如此频繁的时候此类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问题会推动学者们从比较的视角重新审视总统制之下的治理。

这部分我探讨了关于总统制是否导致了民主政体崩溃的近期争论。证据表明,总统制并不必然直接导致政体崩溃或政体危机,但它可能使危机和/或崩溃更容易发生。另外,证据也依然支持总统制和多党制的确“难于结合”的观点。但是,总统制、多党制和治理之间的关联依然不甚明朗。

## 六、分权、代表性与回应制

我在以上各部分回顾了一类研究,它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分权影响了政策过程与政策输出,也影响了民主制存续和发展的机会。这些也许都是真实的,但是选民们对此是否知道、又是否在意?在选民对政府的信心,或者他们影响政治过程和政治输出的能力方面,分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不同的民主政体之下,民主代议制究竟有没有好坏之分,还是仅仅“不同”?在不同的民主政府形式下,选民是否能够在同等程度上、以类似的方式让政府对他们负责?在本章涉及的所有相关研究领域,代表性和回应的问题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

舒加和卡雷(Shugart and Carey 1992)认为,总统制相对议会制的优势之一在于,它可以同时在国家 and 地方两个层面上把代表性和政治责任最大化。但对于这个假设尚少有研究。在不同政体中,选民们到底是把总统和议员等同还是区别看待?不同政体类型对于代表性的不同期望是否影响了选民对于民主制或者现任执政者表现的满意程度?“托管代表”(Przeworski, Stokes, and Manin 1999)在不同民主政体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例如,斯托克斯(Susan Stokes 1999, 2001)发现,与获得单一政党多数支持的总统相比,少数派和执政联盟推举的总统更容易在政策上“急转弯”。约翰逊和克里斯普(Johnson and Crisp 2003)完善了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选民推断总统未来政策立场的能力比较低,但是政党凝聚力和政党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预示议会中政党未来的政策行为。斯托克斯的著作以及约翰逊和克里斯普的论文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们都试图对不同的总统制国家在选举中反映出来的选民偏好与政策输出之间的联系进行系统的检验。他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在不同的民主政体之下这种联系是强、是弱,还是仅仅各不相同。

在这方面我的推测是(Samuels 2002; Samuels and Shugart 2003),委托代表在总统制

之下的可能性更小,因为行政机构的单边性权力、目标的分立,以及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下政党结构的不同,会鼓励选民和政治家采取不同的行为,进而导致对代表概念的理解不同以及结果的不同。这一假设显然与前文提到的总统制“更少决断性而更多坚定性”的观点相悖;因此目前这只能算是从理论上导出但尚未证实的假设。对于不同宪政框架下民主代表性的特性和范围这样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仍然少有问题。

应该如何推进对分权制之下民主代表性可能的区别这一问题的研究?“竞选纲领计划”(Klingemann, Hofferbert, and Budge 1994)对不同民主政体进行比较,以判断不同宪政体制下,政党坚守或者违反其政治纲领的程度,但类似的研究在代表性问题上尚未出现。这样的计划要求克服方法论方面和实证方面的诸多困难,但其成果也会是丰厚的。

同样,我们也尚未看到任何将鲍威尔(Powell 2000)的假设(现在仅包括一个纯总统制国家)推广到稳定的民主政体之外的尝试。鲍威尔的著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是一套研究议题——关注的是“多数民主”和“比例民主”之间的区别。他大致的结论是,每一种民主制都以自己的方式运行良好,但“比例民主”更加优越,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公民与政府的政策一致性相对更高。我的看法是,对于比较不同的民主政体而言,比例民主和多数民主的区分尚不充分,因为总统制和半总统制都可以结合这两种民主(这一点对于李普哈特对民主制进行比较的方法也适用)。从本质上说,行政机构的选举显然是“多数民主”,而立法机构的选举则既可以是多数民主,也可以是比例民主(甚至还可以结合两种因素,例如多层选举制)。实际上,大多数现实中的分权制国家确实结合了两种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恐怕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民主制度的“表现”加以判断的基础(Samuels and Shugart 2003)。关于另一种有希望的研究路径,可参见(Carroll and Shugart 2005)。

与代表性一样,不同民主政体之下回应制的性质很大程度上也有待深入研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是关于“责任的清楚度”的(如 Powell and Whitten 1993; Anderson 2000),认为在相对简单的选举和政党制度下回应制更有可能实现。相反,比较复杂的制度模糊了谁应该为政府输出负责的问题,从而使选民难以确认谁应受奖,谁该受罚。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欧洲议会的选举。关于总统制,舒加和卡雷(Shugart and Carey 1992)认为不同的制度形式会促进或者阻碍选举责任。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尝试从经验的角度探讨这一概念(Samuels 2004),并发现当行政与立法机构的选举不同时进行时(这在议会制下是不可能的),选民对于经济状况的反映相对微弱。相反,当两种选举同时进行的时候,选民因经济状况对政府官员的回报或处罚能力就会增强。



这一成果印证了林茨对于总统制“双重的民主合法性”的批评,即它迷惑了选民并阻碍了他们要求政府回应。不过,虽然有形式上的分权,但那些使行政与立法机构的选举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的制度,还是会导致“统一的民主合法性”。当选举同时进行时,选民易于把现任的行政首脑和他在议会中的支持者视为同党,并据此作出评判——不管现任总统是否有意谋求连任。但是,选举的循环、其他的制度因素,以及政党制度都会弱化责任问题,有时在国家的经济状况方面还会出现更多要求行政机构回应而较少要求立法机构回应的情况。

然而这些发现并没有回答不同政体下选举回应制的区别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理论依据认为这种区别存在。我认为不同民主政体下选民使政府对其负责的关键不在于责任是否明晰,而在于如何分配政治责任。因此从政治结果来说,选民应该把相对更多的责任归于直接选举的行政首脑而不是并非直接选举的内阁部长们。责任明晰会模糊责任的性质,但是如果选民首先不是把责任归于某个行为者,那么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就与责任问题无关(Samuels and Hellwig 2005)。

从经验上说,如果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同时进行选举(在总统制之下),或者行政机构的选举包含在统一的政府选举之内(在半总统制之下),选民们确实会把更多的责任归于经直接的行政选举、而非经议会选举产生的现任行政首脑身上(Samuels Hellwig 2005)。<sup>①</sup> 在某些条件下,选民们在总统制与半总统制之下会把更多的责任归于立法机构中的政党,但在议会制之下则不会(ibid)。总之,从一般情况来看,总统制与半总统制之下选举与责任的联系会比议会制之下更强。<sup>②</sup> 这一发现质疑了关于总统制与其他形式的民主制相比,责任问题相对更少的批评(如 Lijphart 1999; Manin, Przeworski, and Stokes 1999)。

## 七、结 论

宪法上的分权将不同部门的政治家置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并赋予他们特定的行为动机。如果我们相信学者们的成果——传统抑或现代——那么分权“程度”的差异对于政府和公民同样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现代学者的希望,是了解什么样的民主形式能够最好地服务公民的利益,这推动他们进一步探索分权体制的效果。本章总结了围绕“分权有何影响”这一问题的几种关键性的研究脉络。一些结论只是尝试性的,许多看法还很粗浅,但我希望学者们的创造能够发现探索这些重要议题的新路径。

<sup>①</sup> 前者两种选举同时举行的概率约为 75%。在半总统制之下所有选举中,统一的政府选举出现的概率约为 60%。

<sup>②</sup> 相反的观点参见 Nishizawa(2004)。

## 参考文献

- ALMEIDA, A., and CHO, S. 2003. Presidential power and cabinet membership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ALTMAN, D. 2000.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nd survival in multiparty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the case of Uruguay, 1989–1999. *Party Politics*, 6: 259–83.
- 2001.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nd survival in multiparty presidential regim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 AMORIMNETO, O. 1998. Of presidents, parties, and ministers: cabinet formation and legislative decision-making under separation of powe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CSD.
- 2002. Presidential cabinets, electoral cycles, and coalition discipline in Brazil. Pp. 48–78 in *Legislature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 S. Morgenstern and B. Naci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Cabinet formation in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forthcoming).
- and SAMUELS, D. 2003. Cabinet partisanship and regime type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 and SANTOS, F. 2001. The executive connection: presidentially-defined factions and party discipline in Brazil. *Party Politics*, 7(2): 213–34.
- and STROM, K. 2004. Presidents, voters, and non-partisan cabinet members in Europea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4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and TAFNER, P. 2002. Governos de coalizao e mecanismos de alarme de incendio no controle legislativo das medidas provisórias. *Dados*, 45(1).
- ANDERSON, C. 2000. Economic voting and political contex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lectoral Studies*, 19: 151–70.
- AUSTIN-SMITH, D., and BANKS, J. 1988. Elections, coalitions, and legislative outcom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405–22.
- BAUM, J. R. 2002. Presidents have problems too: the logic of intra-branch deleg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CLA.
- BENNETT, A. J. 1996. *The American President's Cabinet: From Kennedy to Bus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oix, C.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a. Co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breakdowns.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 2005b. The fiscal consequences of federalism.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RESSER PEREIRA, L. C., MARAVALL, J. M. and PRZEWORSKLA. 1993.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

- mocracies: A Social Democratic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M., and SHUGART, M.S. 1995.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14(4): 417–39.
- eds. 1998. *Executive Decree Autho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ROLL, R., Cox, G., and PACHÓN, M. 2005. How parties create electoral democracy, chapter two.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forthcoming).
- and SHUGART, M. 2005. Neo-Madisonian theories of Lat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In *Regime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i: Theories and Agendas*, ed. G. Munc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CHEIBUB, J.A. 2002. Minority governments, deadlock situa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 284–312.
- and LIMONGI, F. 2002. Modes of government form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democratic regimes: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sm reconsidered.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51–79.
- PRZEWORSKLA., and SAIEGH, S. 2004. Government coalitions and legislative success under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4): 565–87.
- CONAGHAN, C.M., MALLOY, J.M., and ABUGATTAS, L.A. 1990. Business and the boys: the politics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Central Andes.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25(2): 3–29.
- Cox, G. 2005. The organization of democratic legislatur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B. Weingast and D. Witt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and MCCUBBINS, M. D. 2001.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policy outcomes. In Haggard and McCubbins 2001: 21–63.
- 2004. Setting the agenda. Unpublished book M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and MORGENSTERN, S. 2001. Latin America's reactive presidents and proactive assembl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33(2): 171–89.
- DEHEZA, G.I. 1997. Gobiernos de coalición en el sistema presidencial: América del Su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 1998. Gobiernos de coalición en el sistema presidencial: América del Sur. Pp. 151–69 in *El presidencialismo renovado: instituciones y cambio político en América Latina*, ed. D. Nohlen and M. Fernández B. Caracas: Nueva Sociedad.
- DOMÍNGUEZ, J.I. 1997. Technopols: ideas and leaders in freeing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90s. Ch. 1 in *Technopols: Freeing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90s*, ed. J.I. Domínguez.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ELGIE, R. 1999. The polit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Pp. 1–21 in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ed. R. Elg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A. 1961. A theory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373–82.
- GERRING, J., and THACKER, S. 2004.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corruption: the role of unitarism and par-

- liamentar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2):295-330.
- HAGGARD, S., and MCCUBBINS, M. D. 2001. Introduc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policy. In *Presidents, Parliaments, and Policy*, ed. S. Haggard and M. D. McCubbi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RMENS, F. 1941. *Democracy or Anarchy?*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HOCHSTETLER, K. 2005. Rethinking presidentialism: challengers and presidential falls in South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forthcoming).
- HUBER, J., and MCCARTY, N. 2001.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bureaucratic capacity, and delegation in Latin American democra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Brazilian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 2004. Bureaucratic capacity, deleg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3):481-94.
- and SHIPAN, C. 2002. *Deliberate Discretion?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G. B., and CRISP, B. F. 2003. Mandates, powers, and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128-42.
- JONES, M. P. 1995. *Electoral Law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KLINGEMANN, H.-D., HOFFERBERT, R., and BUDGE, I. 1994. *Parties, Policies and Democ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KUNICOVÁ, J. 2005. Political corruption: another peril of presidentialism? Unpublished paper.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LANZARO, J. ed. 2001. *Tipos de presidencialismo y coaliciones políticas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CLASCO/ASDI.
- LAVER, M., and SHEPSLE, K. 1996. *Making and Breaking Governments: Cabinets and Legislature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 1999.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 1990.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1):51-69.
- 1994. Presidential versus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Linz and Valenzuela 1994:3-87.
- and VALENZUELA, A. eds. 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2 v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INWARING, S. 1993.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2):198-228.
- and SHUGART, M. S. 1997. Juan Linz,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appraisal. *Comparative Politics*, 29(4):449-72.
- eds. 1997b.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IN, B., PRZEWORSKI, A., and STOKES, S. 1999. 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Pp. 29–54 in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ed. A. Przeworski, S. C. Stokes, and B. Man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TCALF, L. K. 2000. Measuring presidential pow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5): 660–85.
- MOE, T. M. and CALDWELL, M. 1994.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a comparison of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system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0(1): 171–95.
- MORGENSTERN, S., and NACIF, B. eds. 2002. *Legislature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SHIZAWA, Y. 2004. Economic voting: do institutions affect the way voters evaluate incumbents? Unpublished paper. Doshish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www.doshisha.ac.jp/~ynishiza/](http://www.doshisha.ac.jp/~ynishiza/).
- O'DONNELL, G. 1994.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55–69.
- PALMER, M. 1995. Toward an economic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examining 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1): 164–88.
- PERSSON, T., and TABELLINI, G. 2004.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POWELL, G. B., and WHITTEN, G. 1993.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voting: taking account of politic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391–414.
- POWER, T. J., and GASIOROWSKI, M. J. 1997.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2): 123–55.
- PRZEWORSKI, A. 2003. Institutions matter?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Institutions, Behavior, and Outcomes, CEBRAP Sao Paulo, Brazil.
- STOKES, S. C., and MANIN, B. eds. 1999.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and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A., and DRUCKMAN, J. Forthcoming. Measuring portfolio salience in eastern Europea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 ROPER, S. D. 2002. Are all semipresidential regimes the same? A comparison of premier presidential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3): 253–73.
- SAMUELS, D. 2002. Presidentialized parti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4): 461–83.
- 2004. Presidentialism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econom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3): 425–36.
- and HELLWIG, T. 2005. Democratic regimes and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round the worl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5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and SHUGART, M. 2003. Presidentialism, 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 Politics, 15(1):33-60.
- SARTORI, G. 1994.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HUGART, M.S. 1995. The electoral cycle 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divided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2):327-43.
- 1999-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the provision of collective good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0:53-88.
- and CAREY, J. M.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New York: Cambridge.
- and HAGGARD, S. 2001.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policy in presidential systems. In Haggard and McCubbins 2001:64-102.
- and MAINWARING, S. 1997.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rethinking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Pp.12-54 in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S.Mainwaring and M. S.Shugart. New York: Cambridge.
- SIAROFF, A. 2003. Comparative presidencies: 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idential, semi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distin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287-312.
- SIAVELIS, P. M. 2000. Disconnected fire alarms and ineffective police patrols: legislative oversight in postauthoritarian Chile.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42(1):71-98.
- Stepan, A., and SKACH, C. 1993.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politics*, 46(1):1-22.
- STOKES, S. 1999. What do policy switches tell us about democracy? In Przeworski, Stokes, and Manin 1999:98-130.
- 2001. *Mandates and Democracy: Neoliberalism by Surpris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OM, K. 1990a.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2):565-98.
- 1990b.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ÜLLER, W. C., and BERGMAN, T. eds. 2003. *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IBAUT, B. 1998. El gobierno de la democracia presidencial: Argentina, Brasil, Chile y Uruguay en una perspectiva comparada. Pp.127-51 in *Ei presidencialismo renovado: instituciones y cambio político en América Latina*, ed.D.Nohlen and M.Fernández B. Caracas: Nueva Sociedad.
- TSEBELIS, G. 2002. *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RWICK, P., and DRUCKMAN, J.N. 2001. Portfolio salience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of payoffs in coalition govern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627-49.
- WOLDENDORP, J., KEMAN, H., and BUDGE, I. 2000. *Party Government in 48 Democracies (1945-1998): Composition—Duration—Personnel*.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第三十章 比较司法政治

约翰·弗里基(John Ferejohn)

弗朗西斯·罗森布鲁斯(Frances Rosenbluth)

查尔斯·施潘(Charles Shipan)

### 一、导 论

由于政治制度建立所有人都应遵守的规则,而不是任由公民遭受专制统治或者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时,人们的境遇会改善,很难想象哪一种政治制度不吹嘘自己奉行“法制”。<sup>①</sup> 通过把解释和实施法律的任务委托给法律专家,政府同意遵守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法院则可以为了维护“人民的法律”而作出不利于政府的判决。至少从理论上说,很多政治体制之下的政府必须服从这个概念。

另一个不那么被广为接受的理念是,法院的权力不仅限于执行,还包括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条的审查,甚至有可能推翻后者。在民主制之下,要由一个非多数的专家群体,对由获得多数支持的、以体现社会利益的方式起草的法律加以评判,其正当性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将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对支持和反对这两种形式的司法监督的理由进行简要回顾。

由于本章着眼点在于比较,因此我们将重点考察各国之间司法权力彼此相异的原因。在美国,司法独立是理所当然之事,各州有一种传统,担心新的联邦司法体系会获得太多的权力,因此坚持增加一些程序性的权利,比如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判。欧洲的民主理论依然与几个世纪以前卢梭式的“主权议会”观念混杂在一起。德国法学家卡

---

<sup>①</sup> 注意“依法而治”(rule by law)指的是政府把法律作为一种控制手段,这与“法律之治”即通常意义上的“法治”(rule of law)有别(Barros 2003)。

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反对司法审查,认为它既会导致政治司法化,也会导致司法政治化(引自 Stone 1992)。当然,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法院通过司法审查作出的判决往往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它们也就因此成为未经选举的政治行为体。政治的司法化导致了司法的政治化,因为司法机关重要性的上升,使政治家越来越关注法官的任命和具体的司法过程(Ferejohn 2002)。下文将会提到,美国和欧洲司法机构和过程的差别,并不来自主导的关于人民主权与司法权关系的理论,而是来自于法院独立于政治行为者的制度能力。

施密特所担心的问题,即模糊政治与司法之间的界限是否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倾向,取决于人们如何判断让法院捍卫一套等级制的法律原则本身的损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化的国家,普遍接受了通过某个特别授权的法院明确行使宪法监督权的观念,这大概是因为独裁统治的负面经验已经侵蚀了公众对议会主权的信任,或者也侵蚀了他们对司法机构(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同样执行不误)的信任(Ferejohn 2002; Ferejohn and Pasquino 2002)

使法院摆脱政治操控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设计宪政的阶段,任何一个处于“无知之幕”之后的群体都不能确定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在未来获得多数,因而会倾向于通过宪法手段对一些基本权利提供保障。但是一旦在立法机构中控制了多数,这些团体就会希望削弱法院的权力,使之难以推翻经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政策。任命终身任职的法官可以保障法官个人不会因为作出对政府不利的裁决而受到处罚,但如果政府的政治机构可以起草新的法案推翻法院的判决,或者可以通过立法改变司法机构的构成,那么个人的安全就不可能为法院创造出更大的自主空间。单个的独立法官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政治上不独立的司法体系(Ferejohn 1990)。在这里,一些特殊的制度环境非常重要。由议会多数任命法官从规范的说比较可取,因为这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来说不具党派性质的,或者至少是意识形态多元的司法系统。但即便如此,法庭自主决定的空间仍然受制于司法系统重组的规则。一般认为,规则的力量与协调反规则的行动所需付出的成本成反比(Hardin 2003b),这就是一个例证。下文将要提到,不管法院的结构和内部组成如何,政府对重组法院所必需的合法人数的要求,是衡量法院活跃程度的最好的单一指标。同时,单有宪法赋予的权力还不够,司法独立也会受到更广泛的制度和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当政治制度不稳定的时候,传统上倾向于推动社会性的建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独立更为重要但也更难得到保证。政府为力求自保,可能会放弃对司法任命和晋升的控制,或者赋予法官更广泛的裁判空间,虽然两者很少同时发生。政府还会利用对其持友方态度法官阻挠反对者(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3, 14



页)。但通过各国内部或者不同国家之间司法独立的变化情况,我们也知道当现任政府的支持岌岌可危的时候,法官就有机会作出对政府不利的判决。更细致地研究导致司法独立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价关于这一制度的效果的各种论点。

本章其他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二节对司法独立进行更系统的定义。第三节介绍对司法独立的规范性和经验性的理论解释。第四节用分类法而非完全实证的方法考察司法系统,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多开放的通道,也希望能够激发研究者的兴趣。第五节简述我们自己对于经验研究的一些看法,第六节是总结。

## 二、司法独立的含义

司法独立指法院相对于其他行为者的自主性。就法院能够不受其他政治行为体的影响作出裁定,并且无须担心其他机构施与的后果追求其目标而言,它就是独立的。其他行为者对于法院的人事、案件选择、判决规则、管辖权限以及执行法律的干预程度越高,则法院独立性就越低。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法院完全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判断行事的能力。

至少从假想的角度上说,我们很容易想象法院处在完全独立或者毫无独立性这两个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实中,长期来看,大多数法院处在这个连续过渡带的中间地位。更为困难的是判断哪些因素影响了司法独立的程度,以及其中每个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在后续的部分还会谈到测量的问题。

### 2.1 对成文法的司法审查

首先我们要区分两种政治行为体可能回应的司法行为。首先,法院会介入成文法的司法审查,其中他们会裁定监管部门的行为或者低级法院的裁决与现行法律相悖。其次,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会授权裁定立法是否合宪。在许多国家,这种宪法性的司法审查权会赋予宪法法院,它独立于普通司法系统,设置更审慎,自主权力更大。但在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中,最高法院即是上诉法院,也行使宪法性的司法审查权,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同一个法院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立法机关抗衡不同类别的司法行为的制度障碍,以及它影响法院人事的能力,会在不同领域决定司法独立的程度(Epstein, Segal, and Victor 2002),我们逐个考查这些问题。

如果法院能够裁决监管部门或者其他政治行为体(如地方政府、低级法院等)的规定与现行法律冲突,那么立法机关在得到有效多数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通过一个新的法案来使法院的裁决失效。三维模型显示,议会否决的威胁会使法院选择一种与它在拥

有完全独立的情况下不同的策略(如 Ferejohn and Shipan 1990)。考虑以下情况:有两位行为者,法官 J 和立法机关(或者更一般地说某位政治家)P,以及某个状态节点 q,它反映了其他某个政治行为体(比如某个部门)选择的政策。假定法官可以进行政策选择而不是简单地投票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立法机关也可以选择对法院裁决的回应方式;而立法机关在这一政策领域中只有当其他行为者,比如法院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且使议会处于一种比现有状态更差的境地时才会采取行动(也许因为某个委员会力图使 q 免受立法行为的影响)。图 30.1 展现了这种情况。

如果法院是独立的,并且无须要担心其裁决被推翻,它会直接选择执行 J,这是它的理想选择。但在这个例子中——以及在大多数政治制度下——议会会有机会对于法院的行为作出回应。因此,如果法院试图执行 J,则议会将选择 P 作为回应。法院则会意识到它所能做到的最多是将政策移至 P。实际上,法院为了避免其裁决被推翻,它会被迫考虑议会的立场;作为结果,它只能选择一个与它原来的偏好相去甚远的政策。



图 30.1

## 2.2 宪法性司法审查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种法院行为比对管理部门和低级法院规则的裁决更重要,这就是宪法性司法审查。<sup>①</sup>这种司法审查只能由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进行,它们拥有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进行审查的宪法权力。从逻辑上说,宪法审查法院与议会之间的策略互动与上文关于否决法院裁定的描述类似,除非立法机关只有通过修改宪法才能推翻法院的裁决,或者重组法院以得到新的裁决。由于推翻宪法性审查或者改变法院的构成通常需要立法机关绝大多数的同意或者其他复杂的程序,所以这些设计也就赋予了法院在进行相关权量时更大的自主权。立法机关中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联盟以修改宪法或重组法院,决定了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实际的自主性程度。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考察一些规范性的理论,它们说明为何法院必须独立行使国内法,或者审查法律本身的合宪性。然后再回到经验分析,考察使法院在实际上能够独立于其他政治行为者的制度或其他方面的条件。

<sup>①</sup> 本章的剩余部分中,除非特别注明,否则“司法审查”指的都是宪法性司法审查。

### 三、对司法独立的解释

#### 3.1 规范性理论

即便是独裁者们,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也总会声称法院的使命是捍卫“人民的法律”。司法系统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约束政府承诺不侵犯财产权,并以此提高私有经济投资的投资水平、减少政府债务支出,并促进经济增长(Landes and Posner 1975;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Kerman and Mahoney 2004; Djankov et al. 2003)。对于这些目的而言,由于司法独立允许法官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强制执行契约,所以它可能比司法审查更重要,因为后者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侵犯。

司法审查权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尤其是在民主政体中,因为它把对宪法价值的阐释和捍卫置于经合法程序通过的法律之上,把法院置于拥有多数支持的机构之上。司法审查最直接的规范性理由也许是,从无知之幕背后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由以保护权利和义务为目标的、以公平的方式确立的宪法原则加以管理,则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增进;同时如果由法律专家而非受到变动不居的多数支持的政治家来保护这些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对少数来说,效果会更好。即便不诉诸尚待法学专家为我们解释的对“自然法”信仰,我们也能够清楚地发现,让某个政治行为者捍卫一些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原则(比如说政治平等)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会有选择地保护这些原则。支撑这些理由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宪法原则比具体的法律更为基础,因为后者可能是政治交易的结果,会以其他人政治权利的受损为代价。

对于某种形式的司法独立,民主制有一套系统的抵御措施。民主主义者坚持立法机关或者人民应该最终决定法院的管辖权。但在实践中,民主制通常还是通过赋予法官终身或者长期任职、保障其收入,以及把重组法院的程序设置得非常复杂,从而支持了其他一些形式的司法独立。

另一种从公共利益出发支持司法独立的论点认为,如果不存在对立法行动的事后监督,那么对法律可能在未来产生的后果的信息不全,会导致过度保守的法律。就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人从经验角度对这一立场进行检验。但至少从假定的角度来看,拥有宪法性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在立法方面会采取风险更大的途径,而且即便立法受到错误理念的影响,立法机关也不会因其后果受到指责,因为法院可以在相当短时间内纠正它们(Rogers 2001)。不过,如果人们对司法机关是否对公众负责抱有疑问,尤其是如果人们认为司法机关拥有与公众利益不一致的自己的目标,那么这个逻辑就不存在了。

的确,从欧洲传统来看,作为人民主权体现的立法机关是民主制之下最好的决策机

构,因此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司法独立。法官们自身也可能会反复无常,或者专横跋扈,正如某些美洲殖民者所恐惧的,或者尼日利亚民众所经历的那样,因此保护少数群体权利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之道,或许是在立法机关中赋予它们更大的发言权(Olowofoyeku 1989; Shapiro 2002)。还有人认为,法律渐进主义倾向于挫败激进改革,因而天然地有利于保守倾向。

这一争论可以简化为一个经验性的权量问题,即是通过法院还是立法机关来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而如果对各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进程没有深切的认识,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回答。在结论部分我们还会回到这些问题,但现在暂且避开规范性的争论,只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利益很少会成为政治家采取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充分理由。正如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的妙语所言,法律并非是从一个“具有更高标准的天堂”降落人世(Holmes 2003, 53 页)。或者用艾尔斯特的话来说,“没什么东西能够置身于社会之外”(Jon Elster 1989, 196 页)。如果政治家可以通过食言获得好处,他们为何要束缚自己的手脚?即使同一批行为者之间长期的互动会使政治家愿意把监管的权威交给法院,以约束竞争,但从大众定理(Folk Theorem)可知,这并不排除达成其他均衡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转向实证主义的描述,更近距离地观察政治家的动机。

### 3.2 政治独立

对于相比之下,某些司法系统可能在政治上更独立,或者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的原因,有多种解释。<sup>①</sup>在这里,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政治分裂如何给予法院提供了某些独立行动的空间。当选政治家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影响法院的行动,例如任命他们喜欢的法官,通过可以推翻法院裁决的法律,或者甚至修改宪法。但在每个具体的案例中,政治家们只有在他们足够团结一致,能够集聚立法机关中多数支持的时候才会采取这些措施。这种思想路线表明,政治分歧乃是推测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指标,或者反过来,政治团结乃是推测司法软弱的指标。

<sup>①</sup> 有些学者强调普通法与成文法国家不同的传统(如 Djankov et al. 2003),但我们认为这也许会忽略法律政治中更深层的制度原因。另一些学者则把司法独立视为立法机关有意授权的结果(Landes and Posner 1975; 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 Graber 1993; Salzberger 1993)。我们认为,授权模式通常无法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就那些双方都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甚至是在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会不给立法机关出难题(此句原文为“*We think delegative models often fail to show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would be less trouble for the legislature than the problems they are supposed to solve,...*”句中“*than*”有误。——译者)。从根本上说,它们通常并没有说明,那些相互竞争的政党是如何达成一致,不染指司法事务的。参见 Ramseyer and Rosenbluth(1993)。

根据这个观点,在一个政治系统中政治行为体越是分散,则法院获得的自主空间就越大。在分裂的政治系统中,法院无须太担心受到报复或者被否决。<sup>①</sup> 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一下早先的那个图表来说明这一点。假设在图 30.1 中标示的行为者基础之上,增加一个独立于议会的行为者即行政部门,标记为 E。再假设议会和行政部门必须达成一致才能使法律通过。在前面的例子中,法院不可能执行其最偏好的政策,而只能被迫选择议会更可能接受的政策。但现在,如果当行政部门位于法院左侧,而议会位于法院右侧时,法院就可以自由无碍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因此选择 J。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其他政治行为体的分裂使它们不能联合起来推翻法院的政策选择。



图 30.2

如图 30.2 所示,分裂可能出现在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这与分权体制下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情况类似。但是,分裂并不限于议会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歧,也不是说在这种制度下就一定会出现。比如说,在单一制政府中出现分裂的可能性要比分权制政府小很多。另外分裂也可能出现在两院制的上下院之间(如果上院拥有立法权),或者执政联盟的参与者之间。一句话,分裂可能存在于诸多制度中。另外,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分裂程度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从而对司法独立产生不同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考察分裂假说对于政治家们的影响,即他们因此会如何运用任命权、立法否决权,或者修宪法权来保证法院与他们的偏好相一致。在许多政治体系中,特别是在几乎所有习惯法系统中,法官是由当选的政治家任命的,但在所有情况下,政治一致性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任命权对法院独立性的实际影响。<sup>②</sup> 这里存在很多种可能性,而且深入了解制度的细节,对于认识在运用任命权牵制司法机构方面,政治部门之间以及政治部门内部能够多大程度上达成一致很重要。在某些国家,比如德国,责任由联邦和州层面的政治家分担,联邦众议院任命宪法法院的一半法官,联邦参议院则代表各州指定另一半。最终的司法任命取决于这两个机构中的党派构成,可能会容纳各党

<sup>①</sup> Bednar, Eskridge, and Ferejohn(2001)认为政治分裂是司法独立的成因之一,而 Ferejohn(2002)则把分裂视为政治司法化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在分裂的政治系统中,政府进行决策的能力下降,所以这些决策会被移交到法院手里。这显然与政治分歧导致司法独立的论点有关——在这些系统中,一旦法院行动,政治分歧会减少政府对法院采取对抗性和强制性回应的可能性。参见 Chavez, Ferejohn, and Weingast(2004)。

<sup>②</sup> 对于不同选择机制的详细考察,参见 Epstein, Knight, and Shvetsova(2001)。

派的人选,从而使任何统一的联盟都难于控制。<sup>①</sup> 在某些实行分权制的国家比如美国,这种责任由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共同承担,所以它们也一同对司法机构发挥影响,但哪一方的影响更大则随时间不同而变化(Moraski and Shipan 1999)。与此类似,在俄罗斯和法国,由总统和两院议长任命宪法法院的法官及其他成员。另一方面,在墨西哥,总统几乎完全主导这一进程并亲自选择法官。在南非,非党的司法服务局推举法官就任于最高法院;随后总统自己从中选择一部分,并与首席法官一同选择另一部分。在许多议会制国家,司法任命权掌握在联合政府手里,但对任命的批准需要绝大多数的同意,这就要求议会中存在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以支持政府的选择。<sup>②</sup>

就法官任职需由当选的政治家决定而言,司法独立是受到限制的。立法机关中团结的多数也会影响法院判决的程序,进而影响司法行动的结果。例如在美国,国会有很多途径可以影响法院对管理部门的审查(如 Shipan 1997, 2000)。国会可以单独授权某个法院进行审查;可以决定某些行为不在法院审查的范围之内;可以规定法院判决的依据;可以决定法院是否必须尊重部门的专业性;还可以为法院的行动规定期限。另一个例子是德国,联邦众议院本可以允许法院审查政府关于环境方面的决定,但它并没有这么做(Rose-Ackerman 1995)。<sup>③</sup> 更普遍的情况是,立法可以改变法院权限,并因此改变其裁量权。而且它们也可以简化诉讼程序,增加法院需要受理案件的种类(Smith, forthcoming)。但是如果政治家之间存在分歧,那么这些权力影响就有限了。

能够回应法院判决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团结,也会增加他们通过其他手段限制司法独立的能力。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以多种方式影响法院的人事而限制司法独立,比如限制法官的任期或者削减法官的薪酬,在议会内部分裂程度较低的时候这种影响更大。当然,团结一致并非限制司法独立的充分条件。过往的立法机关也许会采取某些行动,让这些事情处于立法干预之外而使未来的立法机关难以对法院下手。司法机关的人事和管辖权可以由宪法赋予,也可以简单地由立法机关的多数赋予,还可以处在两者之间,这种区别会使司法机关的政治独立产生实质性的差别。

下一节我们要研究在不同司法制度下任命、否决以及修宪的制度规则怎样影响政治与司法行为体的互动。美国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具典型性,因为宪法中没有明

<sup>①</sup> 另外,任命需得到 2/3 的绝大多数通过,这有效地保证了大的政党在任命问题上的否决权(Vanberg, forthcoming)。

<sup>②</sup> 美国的各州为研究法官的选择机制提供了另一个比较的平台。毫不奇怪,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方式——一些法官由州长任命,一些由州长与州议会共同任命,另一些由委员会任命,还有一些由选举产生,等等。

<sup>③</sup> 罗斯—阿克曼认为:“众议院多数无意让法院审查官僚的政策制定过程。独立的司法机构可能会作出一些让执政联盟困扰的裁决”(Rose-Ackerman 1995, 12)。

明确规定司法审查权；但它为观察政治上的团结或者分裂如何影响法院自主权范围提供了很好的材料。然后我们要考查其他的总统制和议会制国家的情况，无论它们有没有宪法法院。

## 四、现实中的政治分裂

### 4.1 美国的司法系统

美国宪法并未规定司法系统应该成为宪法的守护者，保证其他机构的行为与宪法原则相一致。是最高法院法官约翰·马歇尔 1803 年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马布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宣示了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而政府的其他部门也都认可了这个声明。这个案子的讽刺之处在于，最高法院法官都是由联邦党人任命的，但由于当时在战略上处于弱势，所以他们并没有对杰弗逊政府运用司法审查权。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不仅赢得了总统大选，还从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人手中夺走了国会中的压倒多数。联邦党人在离任之前匆匆通过一项所谓的“午夜”法案，增设了一些联邦法官席位和其他司法职位，用以任命他们的支持者。这使民主共和党人感到非常恼火。杰弗逊政府一上任，就废止了这一任命法官的法案，并拒绝颁发亚当斯在离开白宫前已经签署的对 5 位新法官的委任状。

马布里就是由联邦党人任命，又被杰弗逊阻止任职的官员之一。他指控新政府未能颁发亚当斯已经签署的司法任命。民主共和党则干脆废止了增设联邦法官的司法条例。马歇尔非常精明，他知道杰弗逊和他在国会中的多数不仅可以起草新的法案，而且杰弗逊还可以动用免责权而无视法院的决定。马歇尔对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是高度政治性的。他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不能进行讨价还价，所以他作出的裁定是：最高法院有权对议会制定的法案是否合宪进行审查，但撤销联邦党人的司法条例是合宪的。马歇尔通过部分推翻国会制定的法令确立了司法审查的原则和先例，同时又规避了法院的判决被总统推翻的风险（Clinton 1994；Knight and Epstein 1996；Chavez, Ferejohn, and Weingast 2004）。

杰弗逊政府接受了马歇尔关于法院宪法特权的大胆宣示，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司法审查的原则，而是它会被如何用来对付他们自己。只要马歇尔认识到这么一种基本现实，即联合起来的行政与立法机关完全足以抵制司法体系的扩张，就无须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因此，尽管马歇尔对于司法审查权作出了如此大胆的声明，但直到 1857 年国会因奴隶制和国家分裂问题深陷纷争之中，斯科特对此作出判决之前，法院还是没有裁决过其他任何部门的行为违反宪法。

夏维泽、菲尔约翰和文加斯特(Chavez, Ferejohn, and Weingast 2004)发现,司法部门是采取积极主动还是消极顺从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政府其他部门之间是分裂还是团结,因而具有可预期性。当国会多数坚决站在总统一边时,如果法院对国会立法或者行政命令持反对立场,则不仅会导致国会通过新的法案,而且有可能更糟,即个别法官受到弹劾或者司法自主性受到攻击。上述几位研究者确定了一些因立法—行政部门的联合法院相对弱势的时期,但这些时期都比较短暂而且少见:1800年大选后的数年、杰克逊当选后的数年、内战之后的大约6年以及罗斯福新政的早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足够强大的同盟,最终改变了法院的意识形态,尽管他一次性地向最高法院“塞进”支持他的法官这一更大胆的企图归于失败。德·费杰列多和梯勒(de Figueiredo and Tiller 1996)指出,参众两院和总统的政治联盟会让法院处于弱势。司法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般会出现在前一时期任命的法官面对政治部门中新的力量组合的时候(Dahl 1957)。如果面对其他部门的联合反对,法院会约束自己的行动,而当司法任命开始使法院与当选部门的立场趋于一致时就更会如此。

#### 4.2 美国之外的总统制国家

关于政治分裂对于司法权力的影响的观点非常适合美国,但它也反映了其他一些总统制国家的情况。阿根廷高等法院的全盛时期从1862年到胡安·贝隆1946年当选总统为止。不同的政党控制了总统职位和立法机关,而控制着立法机关的多数党内部又四分五裂。总统无法把自己的亲信塞进法院,也不能清除那些不合作的法官,他只能尊重宪法条款,只要法官品德端正就必须保证他们终身任职(Chavez, Ferejohn, and Weingast 2004, 19页)。在这一时期,法院为捍卫个人权利、新闻自由以及政治异见的权利而对抗立法和行政部门。但在1946年至1983年总统党控制了国会两院期间,最高法院保持了低调。取代贝隆执政的是阿方辛的激进公民联盟,由于该党在参院中是少数,所以相对弱势,而司法系统则借此宣布诸多阿方辛的政策违宪。梅内姆于1989年接替阿方辛,因为在上下两院中都占据多数,所以其政府要强势得多。毫不奇怪,从政治分裂的相关原理来看,法院又变得温和了(Iaryczower, Spiller, Tommasi 2002; Chavez, Ferejohn, and Weingast 2004)。<sup>①</sup>

对于其他总统制国家,作为最可能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预期司法能动主义与政治部

<sup>①</sup> 尽管Helmke(2002)也提出与分裂逻辑类似的看法,但她还是强调了不同的角度。她提出,尽管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任期正式地保证其独立性,但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法院成员还是会随着体制变迁而变动。结果法官开始采用策略性行动,例如作出对即将离职的政党相对不利的判决,以及偏向即将上台的政党,等等。



门之间的团结程度反相关。墨西哥法学家珈萨诺瓦(Pablo Gonzalez Casanova)和比较法学家施瓦尔泽(Carl Schwarz)都发现,墨西哥最高法院会有规律地找政府的麻烦(参见Hale 2000)。不过我们更希望了解的,不仅是这些判决给政府制造了多大的困难,而且还有当政府反制最高法院判决的能力较弱时,这类判决是否会成堆出现。

在马科斯 1972 年宣布戒严之前,菲律宾最高法院被视为“世界上最独立、最重要及最声名卓著的最高法院之一”(Tate and Haynie 1993)。这种说法大致准确,因为马科斯不能操纵政府其他部门,所以他干脆动用军事力量把它们一关了事,并让自己的亲友取而代之。不用说,马科斯亲自挑选的法官都非常恭顺,布托和齐亚·哈克军政府治下的巴基斯坦法院也是如此(Tate 1993)。但是总的来看,司法能动性的波动与法院对总统控制议会多数的能力的期待是相关的。

一个基本观点是,政治分裂为法院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当其他的政治机构更加分裂时,法院就无须太担心遭到否决或者报复。他们可以因此自由地挑战政府。

#### 4.3 欧洲传统民主国家的司法权力

既然公众广泛呼吁健全政治、经济权利,为何司法审查在民主国家中并不普遍呢?答案包括两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议会制之下立法与行政部门的融合排除了机构之间法院自主行动的空间。但制度乃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因此即使议会制也可以选择某个机构来行使司法审查的职能,这一点下面会提及。只要选民信任政府具有保障其基本权利的能力,就不大会提出制度调整的需求。

制度的一致性对司法裁量权的影响在沿袭英式民主议会制的国家中最清楚,在这些国家,通常是由一个多数党控制整个行政系统。普通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在 1610 年宣称:“在某些情况下,普通法将控制议会的行动,有的时候可以使之彻底无效。”(Mezey 1983, 689 页)这句格言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英国却从来没有成为普遍的实践。

当然,1701 年的《王位继承法》规定,除不当的司法实践之外,法官不能被随便免职。这一对法官的保护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司法独立。科尔曼和马霍尼(Kerman and Mahoney 2004)指出,该法颁布后股价上涨,原因是投资者相信法院在强制履约方面地位有所增强。萨尔茨伯格和芬(Salzberger and Fenn 1999)发现,英国法官的升迁,取决于他们的观点是否经常被推翻,而非他们是否经常采取一种与政府对立的立场。但同样真实的是,司法系统与政府立场对立的情况比较少,而且都是在政治意义相对较小的问题上(Salzberger 1993; Shapiro 2002; Chalmers 2000)。这恰恰证明我们对于平衡的预期。在政府的立法与行政功能是按一种等级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与议会多数

相悖的法院判决很容易被推翻。

实行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制国家比英式议会民主制更容易出现分裂,因为这些国家通常由拥有不同选民和不同纲领的多个政党联合执政。但即使如此,执政联盟的政党也会按“规则”行事,因此只要联合政府在任,法院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能够在不冒被政府否决风险的情况下推翻政府。因为只要立法与行政部门是混合的,法院就没有多少自由行动的空间。

如果在总统制之下,尤其是当政府分裂的时候,法院行使立法审查的能力原则上要更强,那么政治分裂假设的理由也就更充分。但在议会制国家中,仅仅根据政治分裂水平的变动很难对司法独立的程度进行推断。在像瑞士、比利时和卢森堡这样的欧洲国家,宪法明确禁止司法审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虽然存在宪法性司法审查的可能性,但却很少付诸实际。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另外一些国家,包括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以色列、韩国、南非,以及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建立了宪法法院,其明确的目的就是保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显然,与政治分裂的系统中司法权力非正式的起起伏伏不同,后面一类国家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宪法性司法审查的途径。

#### 4.4 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宪法法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代被阿克尔曼(Bruce Ackerman 1997)称为宪政民主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出现的民主国家对司法体制的选择反映了美国模式和欧洲传统模式之间的某种折中。许多新制定的宪法都包含了司法审查的条款,但这种权力仅属于独立于普通司法系统的、单独设立的宪法法院,同时这一权力也更容易受到政治部门牵制。本节我们仅简单探讨为什么一些国家没有选择美国模式或者欧洲的传统模式,而选择了宪法法院的模式。我们更关心的,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团结或者分裂对于法院实际运作的影响。当然,这里只能简单地勾画这个问题,更多的研究还需待以时日。

菲尔约翰和帕斯基诺(Ferejohn and Pasquino 2003, 250页)指出:“所有国家的宪法法院都具有以保护基本权利为目标的司法管辖权,同时其作用越来越显著。”宪法法院不仅在一般的政治程序上设置重要的限制,而且做得越来越好。也许是因为法院在保护权利方面的效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所以执政联盟限制法院自主权的政治空间也越来越小。

反威权主义反冲。欧洲宪法法院的概念是由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的。凯尔森认为,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了美国最高法院以缓慢发展的立法权,而他对法院捍卫宪法的角色的理解要狭隘一些,也更

符合欧洲议会主权的哲学信念(Kelsen 1942; Stone 1992)。虽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20年就设立了宪法法院,但凯尔森的理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欧洲得以推广,此时所有经历过法西斯政权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法法院。奥地利于1946年决定恢复宪法法院,随后是意大利(1947)和联邦德国(1949)。

意大利和德国建立宪法法院的原因,部分是出于“对痛苦过去的深深厌恶”(Merzlyan and Vigoriti 1966—1967),也是为了保护公民免受类似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曾经作出的那种政治绑架(Adams and Barile 1953; Cole 1950, 967页)。<sup>①</sup>正如弗兰兹·卡夫卡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为极权主义提供了专横统治的机会(Dyzenhaus 1988, vii页)。

但在这两个国家,议会对司法权力的抗拒来得比执政联盟更迫切。在意大利,只有当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放弃了在议会中获得多数的希望之后,才不再拖延对宪法法院授权的法案。<sup>②</sup>在这两个国家,都是由议会的绝大多数通过了宪法法院的成员名单,使法官的组成具有广泛的跨党派和无党派特征(Cole 1959, 969页)。当然,政治家还是想方设法来应付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比如意大利“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使主要政党瓜分了法官的职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虽然这意味着法院属性会是多党而不是无党,但至少还是保证了它不会受任何单一政党控制。

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于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建立了宪法法院,他们都采取了类似意大利和德国的模式。随着威权政体在这些国家垮台,民众强烈呼吁通过司法途径抗衡政府其他部门可能进行的勾结。原本可能会抵制这一动向的多数党大概也很清楚,如果坚持原来的立场只会以选举中的失败作为代价。

在前共产主义东欧和其他过去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宪法法院的建立也大同小异。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波兰议会设立了一个新的法庭,它拥有特别强大的司法审查权,包括颁布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司法解释的权力。从1989年至1994年间,该法庭共审查过60部法律,并判定其中的40部违宪(Schwartz 2000, 201—202页)。这个法庭的成员由议会简单多数决定,任期九年。这个法庭似乎时而代表执政联盟,时而代表前一届政府的执政联盟。这反映出司法系统能动性的波浪型变化。早些时候,该法庭的判断可以经由议会中2/3多数的否决被推翻,但1997年宪法取消了这一规定(Rose-Ackerman 2004, 73页)。要推翻法院的判定,议会只能视争端的性质

<sup>①</sup> 意大利“公民自由讼案”中相当大一部分都与墨索里尼时代法案的合宪性相关。科尔认为,法院最早的40个判决中,三分之一与法西斯时代的法律和条例的合宪性相关(Cole 1959, 980页)。

<sup>②</sup> 直到天主教民主党(DC)的政治势力得到明显巩固之前,议会有8年的时间不能投票强制执行这一立法,(LaPalombara 1958; Volcansek 1999)。

或者通过新的法律,或者修改宪法。

在匈牙利,一些圆桌会议的谈判者在1989年设立了宪法法院,这是后共产主义政权第一届议会选举之前四个月的事情。为了防止政府操纵法院,其成员必须由议会的一个代表委员会指定,并经议会全体2/3多数投票批准(Pogany 1993; Rose-Ackerman 2004, 76页)。在新体制建立之初法院比较活跃,甚至在第一届国会履新之前就推翻了几项法律。1998年第一届法官们任期届满之后,议会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重新任命,新组成的法院在运用自然法判定宪法规定模棱两可的案件时一直比较保守(Rose-Ackerman 2004, 80页)。这也许是因为执政联盟的巩固把政府的能力转化成了议会中有组织的多数,从而使法院的判决更容易被推翻了。

俄罗斯的叶利钦在1993年关闭了议会两年前设立的宪法法院,之后建立了一个总统更容易操控的宪法法院。该法院的19名成员不是由杜马选举,而是由总统挑选并经比总统的活动空间更大的联邦委员会批准(Remington 2002)。自此以后,法院一直被强有力的总统所压制而无法积极活动。

韩国1948年到1987年之间的三部宪法虽然都规定了司法审查权,但在行政部门的压制之下,司法系统根本不可能践行其宪法赋予的特权。1988年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终结了几十年的专制统治,伴随着民主化改革,韩国建立了一个欧洲模式的宪法法院。由于9名法官都由总统任命(虽然其中三位必须来自国会的提名,另三位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提名),这个法院能够体现的独立性受到了广泛质疑(West and Yoon 1992)。法院似乎很清楚自己的战略定位,在1988年至1991年间所审查的37部法律中,有14部被裁定违宪,但正如杨所指出的,在政治性的案件上,法院还是比较克制(Yang 1993)。但是,法院的自主活动依然让政府不快,尤其是在执政党开始轮替,而政府对法院的构成更难于控制的情况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执政党曾试图通过修改宪法限制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但因公众的强烈反对而告终。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崩溃之后,出现了一个支持通过司法权威保护政治权利的广泛联盟,这不仅包括那些过去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也包括即将失去权力的白人,后者希望能够保证自己在政治上软着陆。1986年,在宣布人权法案不符合非洲传统两年之后,司法部部长设立了一个人权研究团体。废除种族隔离之后颁布的1994年宪法赋予法院强大的司法审查权(Hirschl 2000)。第一届宪法法院中清一色的白人男性法官最终被一群更具代表性的法官所取代。南非的例子表明,司法权力的增强,原因既可能出于新近获得权力的多数的刺激,也可能出于即将失去权力的政府的不安全感。

**非威权主义案例:保护少数群体的议会政治。**在部分国家如法国、加拿大和以色列,法院的宪法角色会因即将或已经离职的政治行为体的刺激而增强,因为对他们来

说,与法院的政治绝缘已经没有价值。作为少数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与那些其权利受到更高层次的日常宪法保护的公众、而非统治阶级更具一致性。

大革命后的法国一直在议会主权和强力行政之间反复摇摆,并且周期性地通过宪法设计尝试两者的结合方式。戴高乐时期的第五共和国本想纠正不稳定的议会之下产生的弱势政府的问题。对于司法审查,戴高乐的观点是:“在宪法问题上需要考虑三个方面。首先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而这一点由我一人决定。”另两个方面是必须考虑的政治环境,以及法条主义,对最后一点,戴高乐表现出最大程度的鄙夷(引自 Beardsley 1975, 212 页)。宪法委员会由总统、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各挑选三人组成,任期 9 年。但在早些时候戴高乐主义者控制了所有这三个机构。要启动宪法委员会的司法审查程序,只有诉诸总统或者议会多数党的领袖。

戴高乐于 1969 年去职,此后政府相对弱势,宪法性司法审查的规定也有新的变化。一旦戴高乐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多数受到削弱,法院就获得了某些自主的空间。1971 年,在一件有段时间被称为法国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案件中,法院废止了一项限制政治结社自由的政府法令(Morton 1988)。更重要的是 1974 年对宪法第 61 条的修正,当时的政府在临近下台之前顺应时势完成了这一工作。这一修正案按规定得到了议会中 3/5 多数的通过。它扩大了宪法法院的权限,只要国民议会或者参院中任意 60 位议员提出要求,它就可以对法律的合宪性实施审查。在此之前,只有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或者参议院议长才有权把法律提交宪法法院(Deener 1952)。由于这四方通常都是执政联盟的成员,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把自己通过的法律付诸审查。这一修正案扩展了法院的行动范围,这我们后面还会加以讨论。

以色列的世俗化政党(工党、梅雷兹党、利库德集团自由党支部等)在一系列议会选举中集体败给了宗教型政党和少数派政党后,于 1992 年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仅一个代表新市镇和贫困城郊地区东正教选民的沙斯党,国会席位就从 1984 年的 4 个增加到 1996 年的 10 个,再增加到 1999 年的 17 个,一举成为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之后的国会第三大党(Hirschl 2000, 109 页)。1949 年的时候,代表世俗中产阶级选民的以色列工人党(工党前身)是压倒性的政党,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权力让渡给司法系统,但现在已经情况迥异。代表世俗选民的各政党组成联盟,以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司法监督体制,保护其选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不受议会中不断变动的多数侵害(Hirschl 2000; Hofnung 1996)。

#### 4.5 影响:宪法法院制度中的司法政治

宪法法院的实际作用如何,它们的权力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有什么不同? 宪法法院权力范围的不同,不仅是因为为其授权的规定各不相同,而且也因为政治部门之间

的团结性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由于任命宪法法院的法官或者修改宪法通常都需要绝对多数的支持,因此议会要对宪法法院的作为施加影响就必须在其内部形成非常高程度的一致性。

现行的法国宪法结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的特点,在总统不能控制非常大的议会联盟时为宪法法院提供了自由行动的空间。立法机关中的少数曾多次利用1974年宪法修正案,组织任意61位议员要求宪法法院审查议案。社会党曾反对这项修正案,但也常常利用它要求宪法委员会对德斯坦政府的立法进行审查。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密特朗政府开始试图进行工业国有化的时候,又轮到了保守派这么做(Morton 1988)。在代表持股选民利益的右翼政党要求下,法院要求对以前的私人所有者提供全额补偿,从而使国有化的成本比政府的预期提高了28%(Stone 1992)。

即使对于团结一致的联合政府来说,在法院的偏好比政府更接近选民的时候,前者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罗曼(Susanne Lohmann)发现,公众意见能够增强中央银行实际的独立性,凡贝格(Vanberg 2001, forthcoming)在宪法法院的问题上也指出了类似的现象,即德国政府在其支持率不太高,同时立法进程又比较透明的情况下,如果预料到宪法法院会作出否定的判决,就有可能对立法进行调整。

## 五、独立性的经验测量

上面的部分对不同类型的司法体系的运作及其差异进行了一种类型学的概览,并通过考察一些随机性的事件检验了相关论点。本节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今后的研究中对我们所提出的各种命题进行更为严格的经验验证。

如前所述,理解司法独立这一概念的困难之一是对独立性如何进行测量。我们可以确立这个概念的不同方面——比如,政府回应法院判决的难易程度,以及政府在回应这一裁决时的不同选择——但确定这些方面不能直接提供可供我们对独立性进行检验的标准。另外,政府在回应法院判决时可以利用的一系列手段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会以不同组合的方式存在,很难确定它们中的每一个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权重。

学者们能做的,是依靠一些替代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通过考察并加总独立性的构成因素而对其进行直接测量,而是寻找某种对司法系统在不同水平的独立性之下能够采取的行为进行测量的方法。有两种方式是合适而且有用的。第一,我们可以考察法院推翻政府行为的频率;第二,我们可以考察法院对政府国有化尝试的反应。以下首先分别探讨这两个方面,然后确定这些行为在什么条件下更有可能发生。

### 5.1 推翻政府行为

在政府能够推翻法院判决的范围和政府变更法院人员构成的难易程度方面,不同政治体系的情况各不相同。这两种行为对司法独立的确立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政府拥有对法院人事的支配权,或者能轻易推翻其决定,那么我们很难指望法院能够独立行事。此之相反,法院独立行动的一个指标,就是它拥有推翻政府行为的意愿。因此,比较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司法独立水平的一个方法,就是考察法院推翻政府行为的频率。更具体地说,学者们可以考察宪法法院或者至少是拥有宪法性权力的法院(在那些没有独立宪法法院的国家中)判决政府通过的法律违宪的频率。

当然这种方法有其缺陷。法院会预期到政府可能的报复;如果法院知道政府会有所回应甚至推翻判决,它就不会采取那些可能招致报复的行动。换言之,从平衡角度来看,法院应该根本就不会作出对政府不利的判决。

虽然这个批评是成立的,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战略预期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总的来说,法院并没有按上述互动模式行事。在对这一现象最全面的统计分析中,西格尔(Segal 1997)发现,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美国的司法行为体出于对未来国会行动的预期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伯加拉、里奇曼和斯皮勒(Bergara, Richman, and Spiller 2003)基于同样数据的研究却发现,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司法行为者的确在预期其判决会被推翻的情况下采取了策略性行动。艾泼斯坦和耐特(Epstein and Knight 1998)通过对大量案例的研究,得出了与在此之前斯皮勒和格里(Spiller and Gely 1992)的统计分析类似的结论。<sup>①</sup>

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考虑另外两个因素。首先如前所述,政府能够用来对抗法院的手段在严重程度有所不同。它们都会让法院付出代价,但某些代价更大。比如,被解职比被否决就更严重。法院因此会在面临的代价和达成期待的政策结果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之间掂量。法院独立程度较低的政治系统中这种损益比会更大,而在法院独立程度较高的国家,损益比就会比较小。

第二点与第一点相关,法院有可能会在权衡利弊时犯“错误”,尤其是在估量因其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方面。建立在完整信息假设基础之上的立体模型会预示,上面所说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行政部门永远不会主动采取必定招致立法部门报复的行动,委员会永远不会提出法案,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模型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行动的发生条件。也许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喀麦隆(Cameron 2000)对美国总统否决

<sup>①</sup> 另外有大量研究证明,国会确实对司法判决作出了回应(如 Eskridge 1991; Spiller and Tiller 1996)。

权的精湛分析。他从完整信息模型出发,不仅对否决程序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还推断在平衡情况下,否决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国会和总统能够完全预期彼此的偏好和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介绍了不稳定性因素(比如对推翻法院否决发挥关键作用的议员的来源,或者总统的偏好等)的引入何以能够触发否决。

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报复可能的不确定会导致法院低估反对政府可能付出的代价。例如,假设法院错误理解了政府的偏好,或者它低估了政府报复的可能,我们认为它会更有可能挑战政府。错误或者反应的不确定在某些条件下更有可能出现,而我们下面将研究这些条件。此处仅指出,由于存在这种可能性,法院否决政府的行为可以作为衡量司法独立的有效手段之一。<sup>①</sup>

## 5.2 国有化

除了判决政府通过的法律是否违宪以外,法院也可以在接到上诉时对政府的其他行为作出裁定,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对一些经济部门进行国有化。法院一旦下定决心,可以推翻这些决议。尤其是当法官们与政府在意识形态、党派,甚至观点方面不一致的时候(当然前提是法官们是独立的),法院会更可能推翻此类行动。对政府的团结程度和法院重组的制度性规定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预期法院需要多大自主权来与政府抗衡。我们认为,一种富有成果的经验研究,是检验法院在保护少数群体的利益时所表现出来的激进或缄默的立场,与我们的预期在多大程度上相吻合。法院如何回应政府的国有化方案会是这类研究的线索之一。当然,法院采取这类行动也许是因为它考虑到了这么做的利益,或者是因为它对其他政治行为者的偏好作出了错误的理解。我们下面会考虑这类失误在什么条件下更容易发生。

## 5.3 选举与独立

我们曾经指出,如果政治行为体能够完全预期彼此的行动,就不会发生法院裁决与政府偏好相悖的事情;但我们也指出,法院可能犯错。因此,明确这种错误最有可能发生的条件非常有益。

<sup>①</sup> 关于美国最高法院是当选政府的同盟还是制衡多数的工具,有一篇重要的文献。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即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 1957)的《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作为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最高法院》,文中认为,最高法院很少长期与其他政府机构脱节,主要是因为这些部门有权指定法官的人选。有一系列研究关注这个问题,有些支持达尔,有些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 Funston 1975; Gates 1992)。最近的研究,可参见 Epstein, Knight and Martin 2001,这一研究表明,策略性行为可以对达尔的结论提供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最高法院与其他政治行为者保持同步,并不像达尔所说的那样是担心被替代,而是因为最高法院法官为保证自己不脱节而采取了策略性行动。



显而易见,当法院不能确定其他政府行为体的偏好时最有可能犯错。也许不确定性最高的时候,就是选举刚刚结束之后新政治行为体就职之时。法院由于已经习惯于与以前的政府官员打交道,对新上台的政治家的确切偏好则不太清楚,也可能不太清楚新政府在报复法院方面会走多远。换言之,法院不确定他们面临的潜在的代价。

当然,任何选举都会增加偏好的不确定性。但是在选举导致执政党发生重大变化时法院的不确定性会更高。在简单多数制的国家新政党上台的时候、在左翼政党被右翼政党替代或者相反的时候、在选举联盟中加入新成员的时候,或者在对政府控制从分裂变为统一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无论出于何种情况,法院都需要有一段时期弄清政府能够容纳和不能容忍的事情。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法院更倾向于挑战政府的行动。也正因此,我们会发现选举刚刚结束的时候,法院推翻政府通过的法律或者裁定反对国有化的事例会更多。

## 六、结 论

本章的目的不在于全面回顾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关系的文献,而是首先关注司法独立的狭义主题:它究竟是什么,怎样出现,以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就是司法独立?我们大致概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司法自主权应该与政府的政治部门之间的团结水平负相关,与推翻法院判决所需的团结水平正相关。

尽管看起来特别简单,但从经验的角度测量司法独立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因为如果法院和立法机关都能够预期对方对自己行为的反应,那么大概就没有什么冲突会进入公众的视野。如果人们并不了解法院或者试图阻止司法介入的政治联盟的意识形态立场,那么司法机关不作出反对政府的判决这一现象,就可能意味或者是法院因不愿意招致立法机关的反弹而自我约束,或者是立法机关为了避免遭到法院的否决而在法律中糅合了后者的立场。实际上,如果行为体拥有关于对方偏好的完整信息,并且采取策略性的行动,那么立法机关推翻法院的判决或者法院否决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法国的宪法法院就明显地推进了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协商,结果是法律甚至在颁布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各方可能的反应。

虽然策略性预期肯定会使经验分析复杂化,但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利用比如说新选举之后出现的意识形态极端化,或者信息缺乏的情形,来寻找自我控制失败的例子。斯威特(Stone Sweet 1992)描述了前任政府委任的人选主导法院时宪法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发生的冲突。同样可以预料的是,选举之后法院和政府彼此之间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行为只能获得非常少量的信息。

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可能是如何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国家对司法审查的不同规定。政治分裂似乎能够比较好地解释分权政府与司法自主之间的关系。但为什么有些分裂并不严重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宪法法院,或者就保护权利而言,为什么在一些没有宪法法院的议会制国家中,多数常常能够克制自己,不去侵犯少数的权利?我们倾向于认为,在所有民主国家中,选举竞争以及多数联盟对于失去边缘支持者的担心,是司法政治的共同基础。由于司法自主的必要条件是立法机关缺乏足够的一致以推翻法院的判决,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与表面上的法院“独立”相比,竞争性的选举对于法治和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可能更为重要。

## 参考文献

- ACKERMAN, B. 1997. The rise of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Virginia Law Review*, 83(4): 771-97.
- ADAMS, J. C., and BARILE, P. 1953.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talian constit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1(1): 61-83.
- BARROS, R. 2003. Dictatorship and the rule of law: rules and military power in Pinochet's Chile. In 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3: 188-220.
- BARRY, B. 1975.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and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477-505.
- BEARDSLEY, J. 1975.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France. *Supreme Court Review*, 189-259.
- BEDNAŘ, J., ESKRIDGE, W. N., Jr., and FERREJOHN, J. 2001. A political theory of federalism. In *Co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Democratic Rule*, ed. J. Ferejohn, J. N. Rakove, and J. Ril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GARA, M., RICHMAN, B., and SPILLER, P. 2003. Modeling Supreme Court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the congressional constraint.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8: 247-80.
- CAMERON, C. M. 2000. *Veto Bargai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LMERS, D. 2000. The much ado about judicial politics in the UK: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ported decisions of United Kingdom courts invoking EU law 1973-1998. MS. Harvard Law School.
- CHAVEZ, R. B., FERREJOHN, J., and WEINGAST, B. 2004. A theory of the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judiciary. MS.
- CLINTON, R. L. 1994. Game theory, legal history, and the origins of judicial review: a revisionist analysis of Marbury v. Madis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285-302.
- COLE, T. 1958.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an evaluation after six years. *Journal of Politics*, 20(2): 287-307.
- 1959. Three constitutional courts: a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4): 963-84.
- DAHL, R. 1957.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Journal*

- of Public Law*, 6:279–95.
- DEENER, D. 1952. Judicial review in modern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6 (4): 1079–99.
- DEFIGUEIREDO, J., and TILLER, E. 1996. Congressional control of the cour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expans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9: 435–62.
- DIAMOND, L. 1997.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50: 12–41.
- DJANKOV, S., LAPORTA, R., LOPEZ-DE-SILANES, L., and SHLEIFER, A. 2003. Cour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2): 453–517.
- DYZENHAUS, D. 1998. Law as justification: Etienne Mureinik's conception of legal cultur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n Human Rights*, 14: 11–37.
- ELSTER, J. 1989. *Solomonic Judg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L., and KNIGHT, J. 1998. *The Choices Justices Make*.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and MARTIN, A. 2001. The Supreme Court as a strategic national policy maker. *Emory Law Journal*, 50(2): 583–611.
- and SHVETSOVA, O. 2001. Comparing judicial selection systems. *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Law Journal*, 10(1): 7–36.
- SEGAL, J. A., and VICTOR, J. N. 2002. Dynamic agenda setting on the U.S. Supreme Cour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39(2): 395–433.
- ESKRIDGE, W. N., Jr. 1991. Overriding Supreme Court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decisions. *Yale Law Journal*, 101: 825–41.
- and FERREIOHN, J. 1992. Theorie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ies of legislatures.
- FERREIOHN, J. 1999. Independent judges, dependent judiciary: explain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72: 353–84.
- 2002. Judicializing politics, politicizing law.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5(3): 41–68.
- ESKRIDGE, W. 1992. Making the deal stick. *Journal of Law,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 8(1): 165–89.
- and PASQUINO, P. 2003. Rule of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3: 242–60.
- 2004.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lessons from Europe. *Texas Law Review*, 82: 1671–704.
- and SHIPAN, S. 1990. Congressional influence on bureaucrac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6: 1–21.
- and WEINGAST, B. 1992. Limitation of statutes: strategic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Georgetown Law Journal*, 80: 565.
- FOMBAD, C. M. 1998. The new Cameroonian Constitutional Council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gress or retrogression? *Journal of African Law*, 42(2): 172–86.
- FUNSTON, R. 1975. The Supreme Court and critical elections. *APSR* 69(3): 795–811.

- GATES, J. B. 1992. *The Supreme Court and Partisan Realignment: A Macro- and Microlevel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GRABER, M. 1993. The nonmajoritarian difficulty: legislative deference to the judiciary.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7: 35-73.
- HALE, C. 2000.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Mexico: the legacy of Emilio Rabasa. *Law and History Review*, 18(2): 257-79.
- HARDIN, R. 2003a. Why a constitution?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ed. B. Grofman and D. Witman. New York: Agathon.
- 2003b.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MKE, G. 2002. The logic of strategic defection: court-executive relations in Argentina under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2): 291-304.
- HIRSCHL, R. 2000.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judicial empowerment through constitutionalization: lessons from four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s. *Law and Social Inquiry*, 25: 91-149.
- HOENUNG, M. 1996.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unplanned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Israel.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4(4): 585-604.
- HOLMES, S. 2003. Lineages of the rule of law. In 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3: 19-61.
- IARYCZOWER, M., SPILLE R, P., and TOMMASI, M. 2002.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unstable environments: Argentina, 1935-199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4): 669-706.
- JACKSON, R., ATKINSON, M., and HART, K. 1977.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France: deputies' attitudes toward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9(4): 399-419.
- KELSEN, H. 1942. Judici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ustrian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4(1): 183-200.
- KERMAN, D., and MAHONEY, P. 2004. The valu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18th century Engl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Paper. <http://ssrn.com/abstract=495642>.
- KNIGHT, J., and EPSTEIN, L. 1996. On the struggle for judicial supremacy. *Law and Society Review*, 30(1): 87-120.
- LANDES, W., and POSNER, R. 1975.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in an interest-group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8(3): 875-901.
- LAPALOMBARA, J. 1958.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and crisis government: French and Italian contrast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17-42.
- LARKINS, C. 1996.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tization: a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4(4): 605-26.
- 1998. The judiciary and delegative democracy in Argent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0(4): 423-42.
- MCCUBBINS, M., and SCHWARTZ, T. 1984.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verlooked: police patrols versus fire alar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165-79.
- MATONE, G. 2001. Two logics of delegation: agency and fiduciary relations in EU governanc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2(1): 103-72.

- MARAVALL, J. M., and PRZEWORSKI, A. 2003.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TEI, U. 1997. Three patterns of law: taxonomy and change in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5(1): 5-44.
- MERRYMAN, J. H., and VIGORITI, V. 1966-7. When courts collide: constitution and cassation in Ital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5(4): 665-86.
- MEZEY, S. 1983.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traditions: judicial review and legislative supremacy in West Germany and Canada.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2(3): 689-707.
- MORASKI, B. J., and SHIPAN, C. R. 1999. The politics of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choi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4): 1069-95.
- MORTON, F. L. 1988. Judicial review in Fr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6(1): 89-110.
- NORTH, D. C., and WEINGAST, B. R.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803-32.
- OLOWOFOYEKU, A. A. 1989. The beleaguered fortress: reflection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Nigeria's judiciary. *Journal of African Law*, 33(1): 55-71.
- PIZZORUSSO, A. 1990. Italian and American models of the judiciary and of judici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a comparison of recent tenden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8(2): 373-86.
- POGANY, I. 1993.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ungary'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2(2): 332-55.
- PRZEWORSKI, A. 2003. Why do political parties obey results of elections? In 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3: 114-44.
- RAMSEYER, J. M. 1994. The puzzling (in) dependence of court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3: 721-47.
- and RASMUSEN, E. 1997.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a civil law regime: the evidence from Japa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3(2): 259-87.
- and ROSENBLUTH, F. 1993.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MINGTON, T. F. 2002.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Longman.
- ROGERS, J. 2001. Inform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 a signaling game of legislative-judicial 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1): 84-99.
- and VANBERG, G. 2002. Judicial advisory opinions and legislative outcom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2): 379-97.
- ROSE-ACKERMAN, S. 1995. *Controll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From elections to democracy: building accountable government in Hungary and Poland. MS. Forthcoming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IO, A. 1995. Reading 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 judicial review in Hungary.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 Studies*, 15(2):253-67.
- SALZBERGER, E. 1993. A positive analysis of the 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or: why do we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3:340-79.
- and FENN, P. 1999. Judicial independence: some evidence from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2:831-47.
- SCHANCK, P. 1990. The only game in town: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ve theory, statutory construction, and legislative histories. *Kansas Law Review*, 38:815.
- SCHWARTZ, H. 2000.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GAL, J. A. 1997. Separation-of-powers games in the positive theory of Congress and cour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28-44.
- SHAPIRO, M. 2002. Judicial delegation doctrines: the U.S., Britain, and Fran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5(1):173-99.
- SHIPAN, C. R. 1997. *Designing Judicial Review: Interest Groups, Congress, and Communications Poli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2000. The legislative design of judicial review: a formal analysi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2(3):269-304.
- SMITH, J. L. Forthcoming. Congress opens the courthouse doors: statutory changes to judicial review under the Clean Air Ac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 SPILLER, P., and TILLER, E. 1996. Invitations to override: Congressional reversals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 Economics*, 16(4):503-21.
- and GELY, R. 1992. Congressional control or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determinants of U. S. Supreme Court labor-relations decisions, 1949-1988.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3:463-92.
- STONE, A. 1992. *The Birth of Judicial Politics in France: The Constitutional Counc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NESWEET, A. 1992. *The Birth of Judicial Politics in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TE, C. N. 1993. Courts and crisis regimes: a theory sketch with Asian case studies. *Political Studies Quarterly*, 46(2):311-38.
- and HAYNIE, S. L. 1993.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nctions of courts: 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the Philippine Supreme Court, 1961-1987.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7(4):707-40.
- VANBERG, G. 1998. Abstract judicial review, legislative bargaining, and policy compromi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30(3):299-326.
- 2001. Legislative-judicial relations: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2):346-61. Forthcoming. *Prudent Jurist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KOPPEN, P. J. 1990. The Dutch Supreme Court and parliament: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versus non-political appointment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4(3):745-80.

VOLCANSEK, M.L. 1999.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Italy*. Basingstoke: Palgrave.

WEINGAST, B. 2003. A postscript to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3: 109–13.

WEST, J., and YOON, D.K. 1992.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ransforming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vortex?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0(1): 73–119.

WIDNER, J. 2001. Courts and democracy in postconflict transitions: a social scientist's perspective on the African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5(1): 64–75.

YANG, K. 1993. 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Korean democratizing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1(1): 1–8.

## 第三十一章 联邦制\*

帕布罗·贝拉门蒂(Pablo Beramendi)

联邦制被广泛视为大政府带来问题的解决之道,其吸引力似乎经年不散。自近代以来,关于政府层级之间权力分配问题的争论一直处在政治分析的前沿;在欧洲民主国家一体化事业的进程中,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国家建设的进展中,它们依然如故。现有,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生活在联邦制之下,这更印证了里克尔(Riker)那句古老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一个联邦的时代。沿着联邦制的道路,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一直被视为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的途径。不过,联邦制问题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对它的起源和运作的认识却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焦点发生转移的结果。

对联邦制的比较研究“数量不多质量参差不齐”(Riker 1964, 157 页)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在那个时代,该领域主要充斥着关于宪政设计的法理分析。<sup>①</sup> 这一研究路径建立在宪法形塑并指导国家生活的基础之上,因此基本上无助于对现实政治的理解。现在的研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据称,宪法就如同商业合同,“不会对每一个可能的案例规定详尽的原则和程序”(Dixit 1997, 20 页),因此,它们往往被那些把自己偏好置于时代的政治现实之上的政治行为者们重写或者操纵(Seabright 1996)。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由于里克尔开始性的贡献,联邦制比较政治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法条性的、而且相当零散的宪法分析,已经让位于对联邦运作不同方面的集中比较。政治占据了中心位置。类似地,传统的、描述性的说明,已经被对策略性互动及

---

\* 感谢 Srikrishna Ayyangar, Kelly Bogart, Alberto Diaz-Cayeros, Jonathan Rodden, Mary Santy, Brian Taylor, Erik Wibbels 以及本卷编辑对本章之前诸版本的帮助、评论和建议,所有可能的错误都由本人承担。

<sup>①</sup> 这种研究方法的例子包括 Wheare (1946), Bowie and Friedrich (1954), Livingston (1956), McWhinney (1960)。



其在联邦的起源、演进和结果的影响的分析所替代。在比较政治学的经济转向(Levi 2000)影响下,联邦制研究开始受惠于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之间的制约与平衡。经济学模型为本领域带来了理论上和分析上必需的精确性,各方面的比较研究者则通过缩小理论假设与僵硬的现实之间的鸿沟而作出了智识上的贡献。沿此路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把关注的焦点从联邦制的理想转向现实的设计,实现了规范性的关切与对联邦制实际状态进行实证描述之间的平衡(Rodden 2006b)。

这一章对于联邦制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主要论题、所面临的任务等进行必要而概略的回顾,它围绕一个从理性选择制度理论中借鉴的基本假设展开(Shepsle 1986)。制度研究分为(又结合了)两个层次:“首先,分析者研究制度的效果;其次,研究者分析制度为何采取特定的形式、为何成为必需以及为何得以存续”(Weingast 2002, 661页)。依据这一逻辑,本章第一部分将联邦制界定为一种制度。第二部分特别关注联邦制对于民主制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在揭示政治行为体应该关注联邦制的理由之后,本章转而把联邦制作为一种内生制度进行分析,即分析联邦制更可能产生和延续的条件。对于有关联邦制起源和效果的比较研究,这一部分也将提出一些方法论的思考。最后,本章将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联邦制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这个领域面临的挑战。

## 一、定义联邦制

联邦制是政治权力碎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层级政府的存在对于联邦制来说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每一个国家都围绕贯穿不同层级政府的某种垂直等级结构组织起来,联邦与单一制国家、联盟或者邦联区分开来的重要特点就是这种等级结构的组织方式。在单一制国家,地区或省级官员作为有效行为者在与中央讨价还价时并没有得到宪法保障的地位。他们缺乏对权力和资源的控制,因此没有能力在与中央的互动中予取予夺。单一制国家的集体选择是多数公民的意义决定的,这种多数的产生形式因选举制不同而不同。反过来,联盟是“一种政治复合体,其成员首先或者排他性地通过一般政府共有的机构、而非双重政府架构保持它们各自的完整性”(Watts 1999, 11页)。新西兰或者1993年以前的比利时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案例。

与联盟或者单一制国家相反,联邦制和邦联制体现了一种双重政府结构,驱动这一结构的是一些构成体和某个中央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sup>①</sup>两者都面临一个相似的零售价格,即怎样结合自我管理和共同管理(Elazar 1987),但它们提供了明显不同的解决

---

<sup>①</sup> 这不意味着类似的讨价还价(及其结果)要求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才有效的一系列机制加以保证。

之道。如果构成体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后者仅拥有有限且被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财政上依赖前者,并由前者选举产生,这就是邦联。财政上的依赖意味着共同政府缺乏自己的财政基础,而选举上的依赖指的则是中央政府的成员乃是构成体的代表这一事实。1776年至1789年期间的美国或者正在演变中的欧洲联盟是这方面的例子。相反在联邦制中,中央和构成体之间的权力制衡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联邦制之下,构成体和中央政府都拥有得到宪法承认的自主权,并据此与公众直接互动(Dahl 1983; Watts 1999)。里克尔把联邦制定义为“一种政治组织,其中政府行动被分派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它们各自在某些领域拥有最终的决定权”(Riker 1975, 101页)。这两个层级的政府的自主权,通常会通过宪法的正式规定,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司法审查制度得到有效保证。另外,中央和地方都有自己的财政基础,且两者都通过选举直接对公民负责。因此,联邦的中央政府(与邦联相反)与次级政府相比,拥有更强势的制度性地位。

对现有的各联邦略加观察就可以发现,虽然次级政府远非无权,但中央政府还是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问题仍然是如何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即如何在两级强有力的、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组织共同管理。这个问题反映了联邦制的根本困境:如何设计一套制度,以协调中央政府创造规模经济、并在某些领域内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的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在另一些领域处理地方特有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信息不对称)的能力?赋予次级单元过多的权力可能会威胁到前者,而如果中央政府太过强大也会威胁后者。这种紧张关系早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描述了尼德兰联邦因制度设计的缺陷,即“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不仅要求各省,甚至各市都要全体一致”(Federalist XX, 105页)导致的灾难之后指出,在各种政策领域都拥有否决权的强大的国家政府,只会“可鄙地葬送公共利益”(Federalist XXII: 118页)。<sup>①</sup>在他们看来,由一个适当授权的联盟政府来处理任何涉及各州之间外部性的活动(例如税收、防务、贸易管理),这是无可置疑的。反联邦党人则表达了相反的担忧,即中央太过强大可能会侵害州的权力,因此抵消了“依据本地知识作出决定”的优势(Ketcham 1986)。

联邦国家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这种张力,这既体现在规范政府不同层级相互作用的制度和程序方面,也体现在中央与构成体之间特定协议的性质方面,其结果是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权力分权的程度各不相同。前者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因此比完全依据

---

<sup>①</sup> 关于统一政策优势的描述,见汉密尔顿关于在联盟层面上对进口产品征税的辩护(Federalist, XII, 64页)。

行为者偏好形成的方案更为稳定有效。后者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品味的凝聚 (Riker 1980), 因而更容易随时间而变化。表 31.1 和图 31.1 及图 31.2 描绘了这种变化。在调节政府层次之间互动的制度方面, 我主要关注下议院和政党制中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分权方面, 我纳入了一些财政分权的指标。

联邦国家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地方利益在国家层面上被代表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国家依靠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上议院 (如美国), 另一些国家通过不同层级行政部门之间的定期会议 (如加拿大), 甚至更为非正式的、非结构性的协议 (Watts 1999; Swenden 2004)。如表 31.1 所示, 一些国家的下议院是直接选举产生的 (如巴西、美国), 这使地方选民得到更直接的代表渠道; 而另一些国家的下院则是由地方当局间接指定的 (如德国、奥地利), 因此有助于全国范围的政党扩大影响。另外, 有些国家的上议院拥有强大的权力, 可以重塑民主制之下的多数 (如美国、巴西), 而另一些国家的上议院权力非常有限 (如印度、西班牙)。在控制地方当局将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方面, 联邦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也各有不同。里克尔 (1964, 1975) 根据联邦领导所承担的角色不同, 对集权 (或最大) 联邦制和边缘 (或最小) 联邦制进行了区分。图 31.1 展示了简化的里克尔关于政党集中化的指标, 描述了六个发达的联邦制国家中层级和趋势的不同。<sup>①</sup> 最近, 学者已经放弃了这种主要基于美国特殊经验的简单两分法, 并且开始认识到联邦制结构的多维特征 (Stepan 1999)。特别是, 里克尔的这一指数基本上不能反映有联邦不同部分中政治竞争的不同格局。这涉及选举的外部性。如果政府各层级政治竞争的基本结构相类似, 或者选举的外部性较大, 那么地方领袖就会产生牺牲当地利益以换取国家层面的政治收益的动机。相反, 地方层面政治竞争的性质越独特, 则选举的外部性就会越小, 通过增进地方利益达成妥协的代价也越大。

表 31.1 联邦的多样性: 概览

	支出的分权 (1990—2000)	收入的分权 (1998—2000)	纵向不平衡 (1998—2000)	次级政府的 借贷自主	上议院
阿根廷	42.26	39.86	—	4	至 2001 年止由地方议会间接选举, 此后直选
澳大利亚	44.40	33.21	37.7	2.5	直选
奥地利	31.10	24.36	34.9	1.6	间接选举, 由州议会选举, 按权重选举

<sup>①</sup> 这一指标反映的是由控制联邦政府的同一政党或者政党联盟控制的地方政府的比例。

续表

	支出的分权 (1990—2000)	收入的分权 (1998—2000)	纵向不平衡 (1998—2000)	次级政府的 借贷自主	上议院
比利时	11.03	5.79	53.6		混合代议制,由直选、语区议会和地方参议员间接选举相结合
巴西	42.8	33.7	35.1	4.5	直选
加拿大	58.73	52.28	20.07	2.7	由联邦政府任命,各省代表权平等
德国	37.54	30.9	22.31	2.5	间接选举
印度	45.22	33.0	36.11	2.5	间接选举,由邦议会选举,根据权重选举
墨西哥	29.4	22.8	35.4	2.6	州层面直选(每州3人),同时全国范围内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不超过32人)
尼日利亚	29.1	20.4	—	1	直选
西班牙	32.40	19.3	54.15	2.5	混合代议制。80%选举,20%任命。参议员按党派选举
瑞士	46.90	43.2	24.06	3	直选
美国	48.61	41.6	30.99	3	直选

(来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分权数据库, <http://www1.worldbank.org/publicsector/decentralization/fiscalindicators.htm>; Rodden 2004; Watts 1999; Arzaghi and Henderson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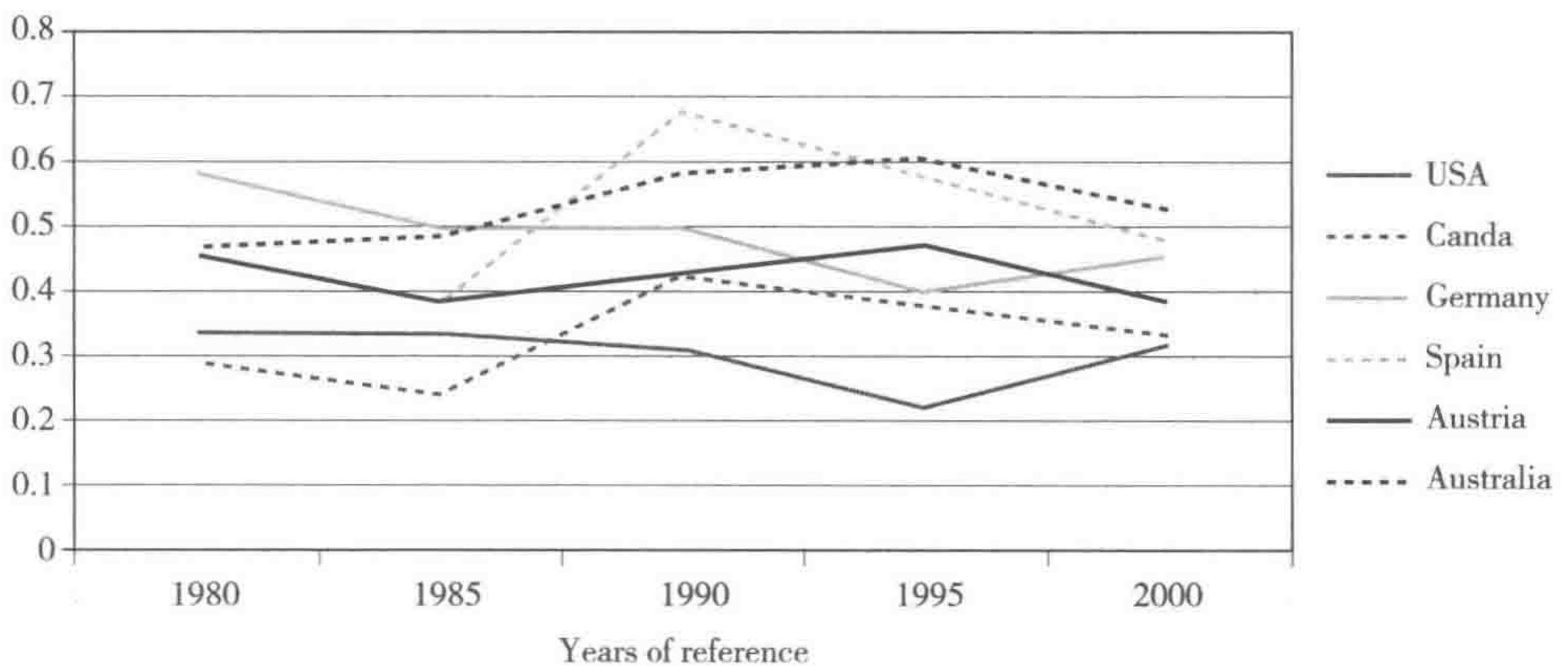


图 31.1 六个发达的联邦制国家的政党集中化(时段平均值)

如何衡量这种外部性的范围依然是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图 31.2 展示了一种公认并不完善的方法,它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即政党的有效数目(EN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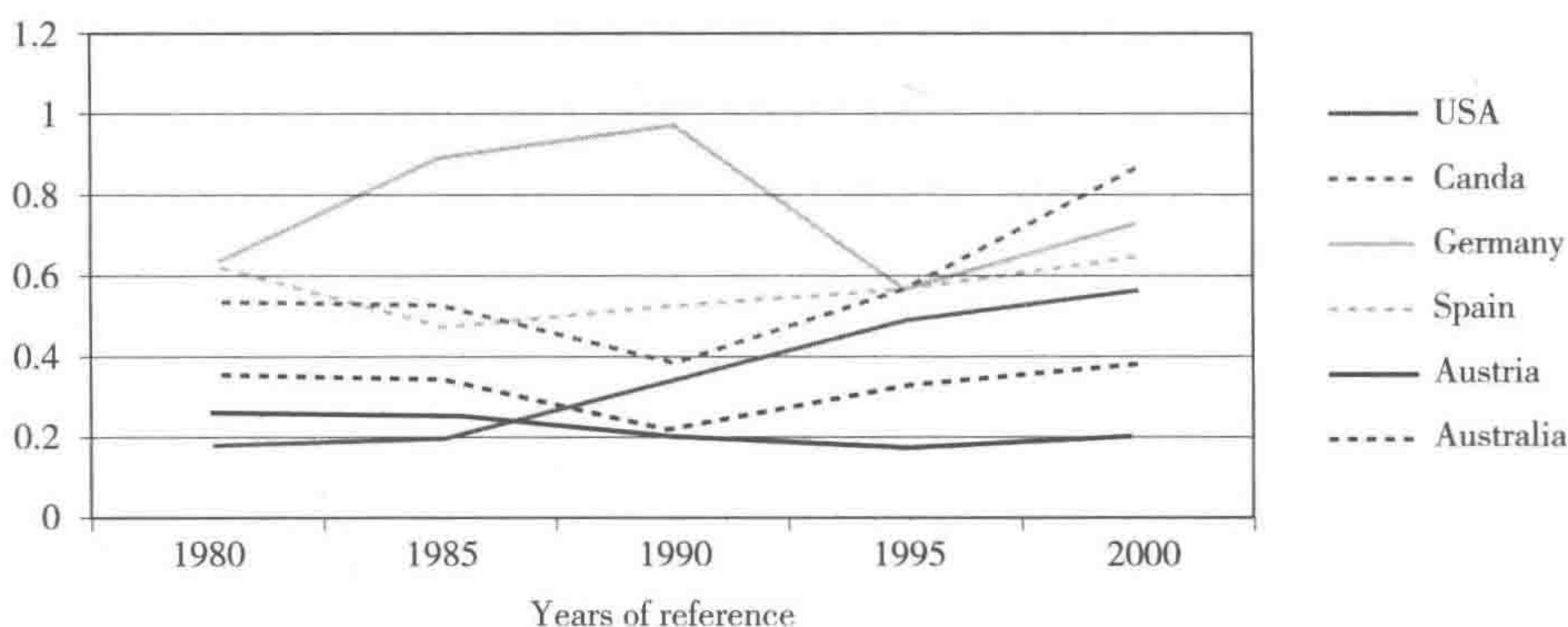


图 31.2 六个发达的联邦制国家的有效政党数:地区平均数对全国水平的偏离(时段平均值)  
(来源:作者根据各国数据的计算)

Lijphart 1999 的定义)是所有选举单元中政治竞争结构的一种可信指标。图表是以下计算方式的体现。针对每一个地区,我首先计算出地方与联邦层级 ENP 差的绝对值。然后,再通过取各地区平均数的方法求得距离的值。如果指数值为 0 或者接近于 0,则各地区与中央政治竞争的格局大致相同。反过来,指数值越高,不同层级政府的选举进程多样化程度也就越高。<sup>①</sup> 联邦国家中跨领域和随时间而出现的大量变化又再次显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维度的变化关系到不同政策领域的权威分配。表 31.1 显示了财政分权的几个指标。<sup>②</sup> 地区借贷能力在联邦国家中大有不同,支出和收入的分权水平也是如此。在后一方面,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类似水平的税收分权可能掩盖了地方财政自主性的差别,它可以间接地通过联邦国家纵向财政失衡的程度反映出来。另外,还有大量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候,税收集中化是联邦制民主国家的主流(Diaz-Cayeros 2004)。但这些国家中一部分已经自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开始扭转这一倾向,启动了不容忽略的税收权限下放的进程(Rodden 2004)。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财政集中并不必然与政策权威的集中一致,特别是在那些通过政策调控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互动的领域更是如此(Falletti 2005; Hooghe and Marks 2003; Kelemen 2004; Rodden

<sup>①</sup> 这一指标有明显的缺陷。假设两个地区有相近的 ENP 值,但只有一个地区有全国性的大党。显然这两地政治竞争的特性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了克服类似缺陷,罗登和维贝尔斯(Rodden and Wibbels 2005)最近提出,可以通过联邦政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的支持与它们在地方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的部分关联测定选举的外部性。

<sup>②</sup> 支出(税收)的分权即次级政府的支出(税收)在国家总支出(税收)中所占比重。纵向失衡则反映次级政府依赖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供其支出的程度。最后,借贷自主程度指的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借款规定的限额,其取值范围从 1 到 5,相关资料和细节,参见 Rodden(2004)。

2004; Schneider 2003)。<sup>①</sup> 总之,由于权力的清晰分配只是个案而不是常态,“没有什么机械的方法可以计算两级政府相互独立的行动领域的数量和重要程度”(Riker 1975)。

就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而言,政党的集中化和政策的分权预示着中央与地方之间可见的均衡必然是不稳定的(Bednar 2001)。正如戴维斯(Rufus Davis 1978)所言:“联邦契约最多只能被视为某个特定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点达成的形式化交易。”总之,联邦制构建出一种不断变动的复杂现实,离形式的或者宪法的类型学所描绘的那种清晰两分的世界相去甚远。在本章后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制的比较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重新发现这些复杂性的历史。这种复杂性是更好地理解联邦运行的钥匙,也是为联邦设计出可行的制度选择的条件。下一部分将根据关于联邦制的政治经济结果的文献,详细展开这一论点。

## 二、联邦制的影响:应对幻灭

联邦制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它在政府不同的两个层面上改变了政治行为者的选择范围和约束条件,从而改变了行为者的政治偏好和动机的整体结构(Rose-Ackerman 1981)。真正的问题是,联邦制的独到之处到底是什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二十年前面对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相对要简单得多。以福利经济学家或者公共选择理论家为首,人们会提出如下回答:联邦制孕育了更完备的民主,更优良的官僚系统和更发达的市场。相反,今天的答案却远非如此乐观。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表明,过去的期望至少部分程度上构建了一种联邦幻想。从今天来看,联邦制的政治与经济效果显然是复杂的、多维的,它总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也绝不总是正面的。因此,很难简单地说明联邦制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一种巨大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联邦制的研究摆脱了那种高度形式化的、而且基本上是规范化的联邦制模型,开始重新对联邦实际上究竟如何运行进行实证的考察。反过来,新的经验分析的浪潮,将为形成一种关于联邦的起源及其运作的一般理论提供基本的素材。对于这种理论,人们已经期待很久。

新近出现的关于联邦制的比较文献汗牛充栋。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合力,围绕一个主题创造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个问题就是:联邦制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政治与经济影响,重要的是对细节的研究。这里的细节既指特殊的制度设计,也指周遭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本节其余部分将通过概述联邦制比较政治学的主要成果,考察联邦幻想的问

<sup>①</sup> 一项新型的关于联邦制中管控权分配的分析可参见 Kelemen(2003)。

题。首先我将聚焦联邦制与民主的关系,然后分析制度的稳定问题,以及关于联邦制促进了官僚系统与市场发展的相关论点。

## 2.1 联邦制与民主

传统理论家推崇联邦制,认为它能够适应具有不同追求的政治共同体,并能同时保护政治自由。托克维尔(1835/1964)重申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的观点,称赞联邦制为一种“基于结合大国与小国的优点于一身的愿望而创造”的制度。具体来讲,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大国能够抵御外来威胁,而小国将能把“公民的所有努力与资源转化为共同体的内部福利”。通过限制联盟的主权,联邦制能阻止大政府施行“多数暴政”而压制政治自由、破坏善治。正因为具备这两项特性,人们通常认为联邦制能够在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为民主制的建立和存续提供必要的条件。

然而,对大规模民主制联邦国家命运的系统观察却展现了一种复杂的图景,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且尚未解决的谜题:在什么条件下联邦制有助于民主?在什么条件下联邦制有助于整合族群、语言或宗教的区隔?近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既有谨慎的乐观,也有直接的怀疑。<sup>①</sup>

林茨(Linz 1997)提出,在民主转型之前国家的制度和法治是否已经得到稳固,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既有的联邦结构会加剧而非防止冲突、暴力和体制失败。在后一种情况下,联邦制可能会表现出在相互冲突的国家认同之间进行调和的能力。阿莫雷蒂和贝米奥(Amoretti and Bermeo 2004)在综合比较了许多发达的和发展中的联邦制国家之后总结认为,联邦制的安排有助于成功地调解冲突。但就在同一本书里,巴恩斯(Bunce 2004)表明,在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从既存的联邦框架中衍生的民主制度更容易受到原有群体分离主义的破坏。对此类差异可以有数种不同解释。贝米奥(Bermeo 2004)认为,脱胎于极权统治的联邦不像诞生于契约的联邦那么成功。斯蒂潘(Stepan 2001)则强调联邦内部的权力关系。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少数族群获得的制度性杠杆力量越大,联邦阻止领土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小。<sup>②</sup>

虽然只是尝试性的,但这些解释还是可以适用于一小部分案例。罗德(Roeder 2000)进行了本领域为数不多的计量研究之一,他对此即持非常乐观的态度。罗德的数据基于1955年至1994年间132个国家以及632个族群,他的结论是对称和不对称的

<sup>①</sup> 关于这些问题早期的、一般是怀疑性的研究,可参考 Duchacek (1970); Riker and Lemco (1987); Lemco (1991)。

<sup>②</sup> 根据这个框架,在整个转型和稳定时期能够把不同单元聚合起来的全国性(得到民主授权的)政党制度的存在,就是特别重要的因素。

联邦制形式都会“急剧增加族群—民族冲突的可能性。”但是,进一步的案例研究表明,联邦国家设计的细节会影响其应对冲突、防止分裂的能力(Hale 2004; Filippov, Ordeshook and Shvetsova 2004; Stepan 2001; Treisman 1999)。总的来说,不同证据之间明显的矛盾表明,研究重点的转移,即对联邦制产生不同结果的过程进行理论分析,也许能够推进联邦制与民主的关系的研究。

联邦制如何塑造了改革领袖的动机和战略?民主又如何影响了地方和中央执政者之间的互动?在多个层面的分裂产生了政治影响的时候不同的联邦制设计是如何应对?最后,在次国家群体把文化、族群、宗教或者收入差异政治化的过程中,不同的联邦设计又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动机的(Fearon and Van Houten 2002)?

俄罗斯和伊拉克最近的事态使上述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一些学者正在对收入不公、民主与联邦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波瓦克斯(Boix 2003)最近提出,由于联邦制使得对再分配的控制分权了,所以它有助于民主在地区间存在明显收入差异的环境下存续下来。哈格(Hug 2005)则研究了收入不均对联邦国家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批学者关注的则是转型社会的制度设计问题。泰勒(Taylor 2005)研究了混合型联邦制民主国家的稳定性问题,在这些国家,传统的稳定性机制(政党、法院)尚未制度化。泰勒指出,对强制力的控制是一个被忽视的方面,因为它的结构对联邦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迈尔森(Myerson 2006)对选举顺序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首先进行地方选举有助于在国家层面上选出更优秀(即更负责、更清廉)的领导人,进而有助于建设更好的民主政体。相反,菲利波夫和施维佐娃(Filippov and Shvetsova 2005)通过俄罗斯的经验说明,在联邦制和民主之间存在着某种取舍关系。也就是说,在转型社会,一种运行不良的民主是地域性统一的先决条件。地方精英只有在能够寻租的情况下才会维护稳定。因此,如果政治竞争真的发挥作用,国家统一就会面临威胁。

虽然这些成果部分阐明了联邦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机制,但在任何共识产生之前,联邦制的设计如何影响了分散在不同维度中的政治行为者的偏好、动机和策略,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同时向联邦制和民主制转型的社会来说尤为迫切。显然,一种总体性的图景还有待于我们加以描绘。

## 2.2 联邦制与经济:走向新的共识?

联邦制对于民主政体的建立与稳定的影响只是理论家对联邦制诸多希望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联邦幻想的大部分集中在其他领域。在多元霸权的时代,居于比较政治学议程首位的,已经不再是政治制度研究。里克尔本人就宣称,既然制度不过是社会基本偏好的反映,那么就没什么理由期待联邦制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公共经济学者



并不这么看,他们的目标是对公共领域进行最优设计,并缩小制度与偏好之间的鸿沟。

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彼此对立,但都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假设基础之上,并且一同重新燃起了联邦幻想。福利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问题。与之迥然不同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家关心公共部门失灵问题以及如何控制公职人员的掠夺或寻租行为。然而,它们在联邦制的经济优势上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福利经济学家(Musgrave 1997; Gramlich 1973, 1987; Oates 1972, 1991, 1999; Wildasin 1991)来说,一种分权的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偏好、需求以及政策之间更好的协调,同时有利于实验和创新,因此导向资源的最佳配置这一目标。在这一框架之内,对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当政者来说,要素的流动性主要作为偏好的指示器发挥作用。<sup>①</sup> 对公共选择理论家(Brennan and Buchanan 1980; Buchanan 1995, 19—27页; Inman and Rubinfeld 1997a, 73—105页; Qian and Weingast 1997, 83—92页; Weingast 1993, 286—311页; 1995, 1—31页; Weingast, Montinola and Qian 1995, 50—81页)来说,由于联邦制约束了公共部门的掠夺本性,因此它是市场友好型的。在这一框架之内,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约束政府掠夺倾向的工具发挥作用。因为联邦制允许选民和要素在不同辖区之间用脚投票,所以可以通过市场和选民更好地监督当政者。<sup>②</sup> 这样,腐败更少滋生,公共部门更小(Prud'homme 1995),而市场运转也更为有效。总之,公共经济学的这两大分支都为复兴联邦幻想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使其在各学术机构、政府和国际组织中重新繁荣起来。

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Rodden and Rose-Ackermann 1997)。系统回顾联邦国家的经济记录可以发现,经验上的规律性十分复杂。发展中的联邦制国家似乎都系统性地与管理不善、花费巨大和市场失灵相关,而不像规范公共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欣欣向荣(Wibbels 2000; Ziblatt and O'Dwyer forthcoming)。光谱的另一端即发达的联邦制国家,如美国或者瑞士,则都可以作为联邦制正面效应的例证。至于联邦制本身是否能够减少再分配,这一点尚不明确(Pierson 1995; Beramendi 2003; Obinger, Leibfried, and Castles 2005)。

联邦国家之间可观察的经济表现和分配差异表明,政治—经济模型暗含的政治和

<sup>①</sup> 如果对地方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与收入相关,这些服务又是由所得税支付(Oates 1972, 1981),同时存在完全的流动性,则提波(Tiebout)的模型预示,各社区的收入会趋于一致,而能力会各不相同。关于对这些假设优缺点的批判,可参见Stiglitz(1983, 17—55页); Rose-Ackerman(1983, 55—85页); Bewley(1981, 713—740页); Zodrow(1983); Panizza(1999, 97—139页)。

<sup>②</sup> 联邦制之下流动性和再分配的关系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对这一主题更详尽的研究参见Peterson and Rom(1990); Epple and Romer(1991); Glatzer and Konrad(1994); Oates and Schwab(1988); Lejour and Verbon(1996); Christiansen, Hagen and Sandmo(1994)。

制度假设,与联邦国家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实际行为差距甚远(Rodden 2006; Srinivasan and Wallack forthcoming; Treisman forthcoming; Wibbels 2005a)。诚然,“对待模型的成熟态度是对其加以利用而非盲目迷信”(Theil 1971),要求任何模型的假设与我们研究的每一次实际经验完全匹配是非常荒谬的。但是,理论模型在解释联邦国家的表现方面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这从根本上取决于比较政治学者能够接受一种受到多少限定的政治概念。<sup>①</sup>

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联邦幻想和令人失望的现实之间的鸿沟的需要,正是在过去二十年推动关于联邦制的学术研究的动力。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人们假定政治精英的目标是使自己获得并保有职位的机会最大化,而不是使其可能得到的寻租利益最大化。此外,学者们开始或多或少认识到,要分析联邦制的作用,不能仅仅关注政治系统中的支持力量与偏好(传统的里克尔式方法),也不能把制度理解为一种能够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重塑偏好与动机的抽象实体(在传统的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最好的途径是去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努力主要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联邦制运行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以及不同环境下联邦制国家特定权力结构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前者揭示联邦制国家政治交易中主要行为体的偏好与动机,同时也解释了研究文献中强调的某些限制的作用,如资本和劳动力的实际流动性水平等。后者主要说明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转变为导致不同结果的政策。

### 2.2.1 联邦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

政府的偏好与公民控制政府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首先是“社会资本”分配的问题。如果被代理人(公民)贫困无知,或是在一个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私人交易替代了法治的社会中成长,那么代理人(即政治精英)担任公职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使被代理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主流的价值体系中没有公民美德的位置,地方政治只能破坏而非助益经济的有效运转(Wibbels 2005a; Treisman forthcoming)。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被代理人,加上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的公共生活准则和稳定的法律体系,会形成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一种不同的互动。选民更有可能惩罚公职人员赤裸裸的寻租,奖励善治和良好的经济表现。当政者要保住职位,就要使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大多数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另一个结构性的条件是各地方经济资产专用性的程度。资产专用性决定了与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典型相关的约束的有效性,因为地方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越低,则要素流

<sup>①</sup> 例如,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自己指出的,把政治领袖理解为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使我们很难说明联邦国家之间经济表现的差异。

动性也越低(Boix 2003; Beramendi 2004)。在一个专业化的、资产专用性较高的经济中,人力资本和技术与地方劳动市场紧密相连。另外,资本对税率提高的敏感性,要低于对其生产需要与劳动力的特性及教育体系的符合程度的敏感性(Lucas 1990)。因此,禀赋较好地区的当政者,不太会受其他地区采取的政策可能导致的外部性约束,但可能会受到本地区跨阶级联盟的约束。此外,地区间的异质性会改变禀赋匮乏地区的动机。由于资本会从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他们放弃了任何通过政策推动经济效率的尝试。作为结果,资本流动性并没有限制,反而鼓励贫穷地区的当政者参与到无效率的公共政策中(Cai and Treisman 2005a)。这引入了一个穿越经济发展和公民价值制度化这两个层次的不同视角。

联邦制运行的环境各不相同,既有发达的专业化经济、发达非专业化经济、发展中的专业化经济,也有不发达非专业化经济。由于联邦制和分权将公共政策与次级单元的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后者的特性会部分地通过联邦制的经济表现折射出来。发达的、受道德约束的政治经济体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果,地方性的、无节制的、腐败成风的经济体肯定运转不良。换言之,联邦制的、高度分散化的制度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具体的环境。

当然,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的联邦制国家都存在大量的内部差异,这些差异不能通过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加以解释。无论环境如何重要,它也只能部分弥合联邦幻想与联邦国家实际经验之间的鸿沟。另一部分涉及当政者的动机与联邦国家具体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这将导向联邦国家中的制度设计与合作的问题。

由于联邦制引入了数个政策供应者之间的竞争,所以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合作行为提供了基础。两层政府的当政者通过向公民提供产品和服务换取政治信用,同时又希望在满足公民需要的时候使成本最小化(Migué 1997; Volden 2004, 2005; Inman and Rubinfeld 1997a)。另外,他们还要使不受欢迎的政策改革对选举的影响降到最低。因此,地方政府常常产生高水平的债务,并通过联邦财政援助由联邦的其他部分替它们偿还。更常见的是,联邦国家总会面临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地方当局利用联邦风险共担的机制施行增加地方风险的政策(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6b)。相应地,中央政府也会一方面使社会计划分散化,另一方面又不向地方政府提供必需的资源,从而尽可能地把削减公共社会福利的政治成本转嫁到地方政府头上。

这种不合作行为的例子在联邦国家的日常生活中令人头疼,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曾经困扰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的相同困境(De Figueiredo and Weingast 2005; Inman and Rubinfeld 1996):如何监督和限制地方当局的不合作行为,但又不至于形成一个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的中央政府?相应地,如何限制中央的权力使其不至于压塌地方,但同时

又不至于助长地方背叛联邦的行为? 为了对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 学者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联邦设计中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 即地方财政自足和共有规则制度化的不同途径。

### 2.2.2 联邦中的权力结构 I: 财政制度

地方财政自足结合了财政自治和财政责任两个方面。财政责任指的是地方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它的经济行为的后果有效地内在化。因此, 它以高度的财政自治为前提, 即地方政府较多地依靠自己的收入而较少依赖联邦政府的财政转移。但是, 反之则不一定成立。财政自治并不总是意味着高水平的财政责任。财政自治地区受制于软性预算约束, 也许会产生大量债务, 并且把财政上不负责任的政策的后果转嫁到联邦其他地区身上。因此, 地方政府要实行财政自足, 就必须对其施以硬性的预算约束。如果中央免除地方政府的财政义务, 则不仅宏观经济表现会恶化, 地方也会更加依赖财政转移。<sup>①</sup> 这也意味着地方对财政转移的依赖, 会增加对中央财政援助的需求 (Rodden 2002) 和对市场化改革的抗拒 (Wibbels 2003)。不过也有一些证据表明, 由于中央的财政援助, 地方丧失了抗拒制度调整的能力, 只能接受硬性的预算约束 (Rodden, Eskeland, and Littrack 2003)。

然而, 如果硬性预算约束足够有效的話, 有大量文献表明, 随着次级政府的财政自治 (对转移支付的依赖) 增加 (下降), 市场会运转更好, 经济产出也会提高。<sup>②</sup> 专门的研究文献发现, 中国是财政自主的成功案例, 俄罗斯则因为缺乏地方自主, 导致地方精英被大型国有企业拉拢, 从而妨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Qian and Weingast 1997; Bardhan and Mookherjee 2005)。斯泰因 (Stein 1999) 也根据同样的理论作出了新的发现: 拉美的分权常产生大政府, 但是这种影响在纵向失衡程度高、财政转移随意性大、地方借贷自主额度较高的情况下尤其关键。更一般地说, 政府规模和支出分散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都与财政自主的水平有关 (Rodden 2003; Rodden and Wibbels 2002; Careaga and Weingast 2000)。实行财政自主的地区可以减少累计赤字和通货膨胀率, 同时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事实揭示了一个不可变化的经济逻辑。由于较高程度的财政自足扩大了地方政府能够把经济发展成果内在化的范围, 因而地方当局就有更强烈的动机创造一种保护市场的环境。

<sup>①</sup> 维贝尔斯 (Wibbels 2001) 通过考察一系列施行柔性预算约束的国家, 解释了分权的联邦国家随着自有财政收入的增长, 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预算、通胀和债务) 都能较少陷入危机的原因。亦可参见 Bardhan and Mookherjee (2006)。

<sup>②</sup> 硬性预算约束的效果并不直接。禁止对地方政府施以援助的法律规定不一定能得到遵守, 如果对援助的期望很高, 就会出现中央和成员体之间的策略互动。经验研究中要确认援助期待和它们对联邦国家财政输出的影响有一些困难, 具体参见 Rodden 2005。

总之,对于地方政府的不合作行为来说,财政自治发挥了第一道障碍的作用。相反,政府间复杂的财政关系为政治经济的机会主义提供了天然的温床。不过,财政制度的设计虽然重要,但它也不能完全决定联邦制和分权的经济影响。实际上,正如最近维贝尔斯(Wibbels 2005)和罗登(Rodden 2006)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所发现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策略互动的关键在别的方面,即联邦共有规则的具体结构。

### 2.2.3 权力的结构 II:共有规则的组织

联邦国家权力分配的三个层面通常被视为它们的经济表现各不相同的原因,这一点尤其被人们反复提及。这三个层面就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相对强度、地方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正式代表性,以及政党体系的组织。

经济学家反复强调,要保证全国性的政策压倒地方既有利益,一人在全国范围内选举产生的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必不可少(Inman and Rubinfeld 1996; Breton 1996; Eichengreen and von Hagen 1996; Wildasin 1997;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6b)。然而,为中央行政部门赋予太多权力也并非万应灵药。至少,这么做会根本性地压制构成体的自治,从而破坏了联邦制的初衷。另外,不受约束的国家行政权力会有诸多的动机压制地方政府,并且更加肆无忌惮地寻租(De Figueirido and Weingast 2005)。况且,强大的中央政府本身就会成为包括援助要求在内的寻租行为的目标(Wibbels 2005a; Rodden 2006)。因此,如何在保护地方精英自主的同时,约束其扭曲市场的动机,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大量的理论文献探讨了正式的决策规则和程序的重要性(Inman and Rubinfeld 1997b; Cremer and Palfrey 1999, 2000)。<sup>①</sup> 这里的逻辑简单而且不容置疑:不同的设计之所以创造了不同群体的赢家与输家,原因在于各构成体内部以及整个联邦偏好组合的不同(Dixit and Londregan 1998)。因此,无论在何种特定的设计之下,行为者都会利用其战略优势进行最大限度的寻租活动。这些模型得到了不断增加的经验证据的补充,表明政治代表组织作为连接次级特殊利益与国家决策的制度机制,如何影响了联邦的经济表现。维贝尔斯近期的著作(Wibbels 2005a)探讨了发展中的联邦制国家市场改革的决定因素,他把地方利益的代表机制作为分析的核心。由于政策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制订的,所以市场改革的命运可以部分地通过地方运用自己在国家机构中的正式代表机制阻挠或者影响改革的能力得到解释。虽然上院在决定市场改革的内容方面发

---

<sup>①</sup> 这类文献补充了第二类的理论模型,它们关注的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国家之间的区别。比如,柏森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6a)指出,风险分担和再分配的平衡取决于正式的政策制定规则:集中导致过度保障和更高水平的再分配,构成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则会导致保障不足和财政体系的萎缩。

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或者)下院的代表性又不充分,改革的特性和范围仍然反映了地方联盟在支持或反对某些特定的政策变化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sup>①</sup>

然而,代表制度赋予次国家成员体的权限可能会被协调国家与次国家层级的精英之间互动的另一套机制,即政党制度所抵消。维贝尔斯(Wibbels 2005a)分析了党派和谐的程度,并将其视为一种能够增进地方与中央当政者的合作、进而为成功的政策调整创造条件的机制。罗登(Rodden 2006)对联邦国家财政纪律的研究,则更为细密地分析了政党制度的设计如何影响了国家与次国家层面的精英之间的互动。

在权限划分不清的情况下,不同层级的政府都有把自己政策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其他层级身上的动机。尤其是在财政危机到达极限的时候,次国家政府会倾向于负债运营,并希望得到中央的援助。由于地方政府并不清楚中央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财政纪律,它们会依据对中央政府决断性的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财政行为。罗登认为,借助对全国政党制度的整合,可以使中央政府的决断力更为可信,并可以通过减少地方当局不负责任的行为强化财政纪律。

整合的政党制度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影响地方当局的行为动机。首先,被视为政党在全国性选举中的命运的缩影的地方精英,必须直面他们的政治行为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地方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受到约束,而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的经济表现将得到改善(Wibbels 2001; Rodden and Wibbels 2002; Enikolopov and Zhuravskaya 2003)。其次,整合的国家政党制度把不同层级政府当政者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有助于解决它们之间的诚信问题。党派和睦和选举成果两者互相反馈,有助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与政党组织之间的长期合作。作为结果,这会使地方和国家政治精英之间的相互承诺更为可信,并有助于使设计不佳的联邦财政安排得到重新考虑和最终改善。

整体上看,联邦制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复杂。<sup>②</sup> 同样,那种认为联邦制限制了经济上低效能的福利国家发展的观点也是有疑问的,因为次国家行为体通常会为了政治利益

<sup>①</sup> 迪亚斯—卡尔罗斯等(Diaz-Cayeros et al. 2003)依照同样的逻辑认为,一院制和议会制能够减少资本付出,因为它们限制了那些必须通过某种特定计划安抚其选民的、独立当选的政治家的人数。吉布森、卡尔沃和法雷蒂(Gibson, Calvo, and Falletti 2004)则证明,如果在上院中贫穷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代表比例过高,则联邦制将会严重制约宏观经济效能。最后,维贝尔斯(Wibbels 2003)认为,参院如果强势且议席分配不公,则会增加要求援助的联盟出现的可能性。

<sup>②</sup> 回应不同需要的政治精英之间相互竞争的张力可以说明联邦幻想的另外一些侧面,比如政策实验等。关于联邦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的文献也很丰富。对联邦制作为政策创造的实验室的传统理论,可参见如下的回顾:Rose-Ackerman(1980); Strumpf(2002); Cai and Treisman(2005b)。对联邦制与政策创新之间联系的相关辩护,参见Kotsogiannis and Schwager(2004)。据我所知,截至目前为止尚没有出现对于联邦制是否确实导致更多更好政策创新的系统经验分析。

进行社会支出,并希望实际花销能够通过一系列中央的财政安排转移到别的行为体身上。从经验上看,联邦无论是在福利国家的规模还是整体不平等的程度方面差别都很大。

总之,联邦制是否会规范财政政策、限制再分配(Beramendi 2003; Obinger, Leibfried, and Castles 2005)、滋生腐败(Cai and Treisman 2004; Bardhan and Mookherjee 2005),或者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这都要取决于外部条件和内部特征。虽然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厘清基本条件与可观察的制度影响之间不同的结合方面,但这些结合后面的一些具体要素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比如联邦国家存在的多种选举外部性的机制及其相互关系)。

更重要的是,对比较政治经济学家为联邦制描绘的新图景来说,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得到解决,那就是联邦制和分权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无论联邦制和分权带来什么影响(在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联邦制度具有保持现状的倾向性,这种影响都会长期存在。<sup>①</sup>因此,无论政治行为者什么时候作出建立联邦的选择,或者启动政治分权的进程,这些决策的影响都会持续很久。

### 三、联邦起源重探

以联邦制起源的研究,由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关于联邦制影响的文献中新方法和新发现的启发,也开始提出一些对于导致联邦产生和稳定的过程的新认识。这一领域摒弃了为联邦制的“条件”列出一个半开放的清单的传统,转向注重内生性和选择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本节首先简要回顾联邦起源的传统研究方法,然后重点分析这一新的学术倾向面临的挑战。

#### 3.1 里克尔之前的努力:联邦制的条件

里克尔的《联邦制》(1964)问世之前,研究联邦起源的文献基本上都采用非政治学的方法。人们把过去和现在的联邦的特性和环境条件加以总结,并将其视为形成联邦需要满足的一系列“条件”。从逻辑上说,这属于一种归纳法。在社会中一些文化、历

<sup>①</sup> 特莱斯曼(Treisman forthcoming)对所有传统上用来支持或者反对政治分权的论点都进行了具有挑战性的、形式化的解构。他认为,在偏好的差异性足够高的情况下,“有一种观点看上去确实更为普遍有效。如果政治的分权增加了改变政策需得到其认可的行为体数目,现状就更容易得到巩固”。例如,对否决权的分析表明,联邦制在各个领域,包括扩大还是削减福利国家(Obinger, Leibfried, and Castles 2005)、增加还是减少央行的独立性(Treisman 2000)等方面,都起到了阻止变革的作用。

史甚至观念上的特性出现之后,联邦制作为一种制度结果就形成了。不同学者总结的联邦条件的清单在范围和细节上各不相同。多伊奇(Deutsch 1957)的研究集中于地域和社会团体的“社会互动”和“交流”的水平。如果结构性的环境条件有利于这些关系的发展,联邦制就作为一种“安全共同体”诞生了。威尔(Wheare 1946)、鲍伊和弗里德里希(Bowie and Friedrich 1954)进一步扩展了这个清单,增加了诸如共同的制度史、军事威胁的存在,富有献身精神的领导,或者一个“基于种族、宗教、语言或者文化观念的共同体”等等条件(参见 Riker 1975, 115 页)。

里克尔的工作与前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他的条件列表严格限定在政治方面,包括:(一)“政治家具有通过和平协商手段扩展其领土控制权的意愿,其目标通常是为了应对外来的军事及外交威胁,或者为军事及外交扩张准备条件”;和(二)“另一些政治家愿意通过协商为了联盟的利益放弃其独立性,原因是他们面对外来威胁希望得到保护,或者希望参与联邦可能的扩张”(1975, 114 页)。不过,第二方面也许更重要,即里克尔列举的条件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的结果:“联邦政府的建立必须基于政治家的理性交易”(Riker 1975, 116 页)。

这就是里克尔对联邦起源和功能研究所作出的根本贡献。虽然众所周知,里克尔以“某种军事及外交威胁”为中心的特定预期经不起经验研究的检验(Stepan 1999; Ziblatt 2006),但同样真实的是,通过集中关注政治家的动机,他在两个方面为所有关于联邦起源和稳定性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Filippov 2005)。首先,里克尔率先将政治家视为某种策略行为者,他们的偏好来自于对现状和未来替代性制度的预期之间的平衡。其次,这些替代性的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具有分配的功能,即它们“形成了对赢家与输家的不同分配”(Filippov 2005, 99 页)。因此,里克尔的理论通过把有关联邦的交易理解为不同分配方案之间的选择,为关于联邦和政治联盟起源的理论奠定了新的基础。<sup>①</sup>

### 3.2 透过表象:内生性的联邦制度

大量关于内生性联邦制和政治联盟的文献探讨了这个问题。如果联邦制度和政治联盟如人们所知的那样有可观察的政治经济影响,那么行为体就会通过他们对这些影响的性质,以及他们可能的相对地位的预期形成自己的偏好。当然,他们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并基于错误的预期进行错误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预期对制度选择无足轻重。

<sup>①</sup> 麦凯(McKay 1999)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分析就是对这一理论框架的直接运用。



这一逻辑关系的典型例证是联邦制、再分配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Bolton and Roland 1997, Dixit and Londregan 1998; Alesina and Spolaore 2003; Beramendi 2007; Wibbels 2005b)。这一类研究把收入分配的形式和地域特征置于核心位置,用以分析现有联邦国家的政治整合、财政与政治分权,以及制度安排变革的决定因素。这里一个关键的直觉就是:联邦制和分权与某种特定分配结果的关系并非前者外生性地导致了后者,而是因为对分配的关注在制度选择和设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传统上对联邦制和分权起源的解释主要是围绕外部威胁和/或内部的文化和族群差异展开的(Riker 1975; Lemco 1991; Panizza 1999; Stepan 2001),关于内生性联邦制和分权的研究则提出了一种新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也进一步完善了最近关于政治与经济整合逻辑的分析,这类分析的基础是:为了应对要素、消费者和纳税人日益增长的流动性,必须设计出一些更具功能性的制度(Casella and Frey 1992; Casella and Weingast 1995)。这在马特里(Mattli 1999)关于区域整合的研究中尤为明显。马特里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外部性对整合的需求而非其供给作出解释。要形成对整合的有效供给,原有的成员体就必须克服主要由对分配的关注导致的集体行动的问题。因此,地区整合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妥善处理整合过程中潜在受损者的分配问题,否则他们会反对。也就是说,主导成员中的关键角色愿意担当“出纳员”来推进整合。<sup>①</sup>

内生性在最近关于联邦稳定性问题文献中也处于核心的地位。法条主义理论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试图创造使联邦制得以自我施行的条件。也就是说,联邦在这些条件下能够达成平衡,中央和地方都把对盟约目标的追求视为满足它们各自利益的手段(De Figueiredo and Weingast 2005)。贝德纳(Bednar 2004, 2005)则认为,联邦制是一个关于公共品提供的复杂问题,在某些制度环境下它会有利于机会主义行为。贝德纳指出,通过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强化服从的制度,机会主义可以得到遏制,但不可能被消除。在这些制度中,他特别强调了宪法保护、政党制度和司法系统三个方面(参见 Bednar, Eskridge, and Ferejohn 2001)。这些制度可以分别克服某些类型的机会主义,因而能够相互强化彼此的有效性。但是,单靠它们中的每一种都不足以维护联邦的稳定性。虽然上述分析在说明联邦不同制度互为补充方面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它们并没有论述这些具有稳定作用的制度形成的条件。

相反,菲利波夫、奥德修克和施韦佐夫(Filippov, Ordeshook, and Shvetsova 2004)则把稳定理解为被选举动员的精英之间围绕分配产生的冲突。为此,他们把宪政约束视

---

<sup>①</sup> 马萨诸塞州结构与团结基金(Structural and Cohesion Fund)的扩展可以作为经济整合过程中对潜在的受损者进行单边支付的一个很好案例。

为党派竞争的内生因素。如果整合的政党制度为政治精英创造了让他们在体制内表达其需求的政治与分配动机,那么就会出现反对联邦制度内核的动员。反过来,如果政治竞争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是非结构化的,那么关于谁得到什么的冲突会很快转变为关于博弈规则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治竞争加剧了族群分野和经济差距,所以很有可能爆发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样,当政治冲突的社会、种族和经济基础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机制最终会对宪政规则的存续或者崩塌发挥影响。

然而,还有一个困难来自于以下的事实,即政党制度本身是它们在其中运转的国家结构和结构断裂的内生产物。迪亚斯—卡尔罗斯(Diaz-Cayeros forthcoming)在对拉美联邦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证明,要把制度选择、选举问题以及分配政治区分开很困难。他对墨西哥联邦制度运转方式的创新性研究表明,政党制度的集中和税收政策的集中是一种连带内生的关系。在这个案例以及拉美的其他案例中,税收政策集中是联邦与地方政治精英交易的结果。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让富裕地区更加富裕,同时利用中央的再分配来收买落后地区领导者的支持。迪亚斯—卡尔罗斯指出,这种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领导人的联盟是由全国层面上政党制度的运行造就的。<sup>①</sup>

更普遍地看,最近关于内生性联邦制和分权的文献倒转了从结果推知原因的传统因果链条,认为人们所观察到的联邦制度和某些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自我选择过程的结果。这一点在对联邦制、分权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表现尤为明显,但类似的逻辑也可以被延展到不同的研究领域(Srinivasan and Wallack forthcoming; Aghion, Alesina, and Trebbi 2004)。这就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巨大挑战。如果联邦制度(及其作用)是,至少部分是自我选择,那么联邦制真的很重要吗?或者说得更和缓一点,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联邦制的影响是外生性的,而非自我选择过程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是未来数年间联邦制比较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巨大挑战。下面我将对回应这一挑战的一些可能的方法进行讨论。

### 3.3 未来之路

在分析联邦制的起源和影响时,如何解决内生性和选择问题?首先,一种比较激进的方法是主张无论制度是否具有内生性,其效果都是自我选择的,因此本质上说两者并不相关。联邦制度不过是使相关政治联盟的利益和主张不断地再生出来,所以它们本身实际上并不重要。另外,从有关内生性的财政分权或者政党的文献来看,要对联邦制

<sup>①</sup> 齐贝尔和科尔曼(Chhibber and Kollman 2004)进一步增加了财政联邦制和政党制度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层次。他们通过对加拿大、印度、美国和英国经验的研究认为,财政和行政集中化是政党制度集中化的重要原因。

的外生性效果加以确认会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因为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工具。这么做的话,我们其实是通过一种不同的路径,又回到了早期的、令人非常困惑的里克尔对联邦制意义的评价方法(Riker 1964)。

其次,对这个问题一种不那么乐观的解决方法是划分制度分析的不同层次,同时假定其中某些制度相比之下具有更强的外生性。形成联邦制的过程显然是多方面的。本章指明了与联邦制的起源、动力机制和结果相关一些要素,它们在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外部环境(族群—地区流动性、收入分配)、宪政制度和结构(州的权力,司法审查),非宪政制度(政党制度、联邦财政安排),以及财政、政治和行政分权的实际程度。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同时随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例如,司法审查有助于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修改宪法,但上院议席的分配方式在联邦国家的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即使有时被少数派质疑)。

作为历史的产物(Przeworski,本卷),这种同时性的缺乏留下了一个窗口,使部分均衡分析得以发挥作用。本章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不可能建立关于联邦制的一般均衡理论。由于联邦制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具有动态性和双向性,所以对联邦制某些特定方面的起源和影响的局部均衡分析可能更现实、也更有成效。所谓局部均衡分析,指的是把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切分为一些独立的片断,在每一个片断,有些问题是不变的,而另一些问题在变化。这里的一个基本直觉是,我们可以回溯寻找好制度的历史过程,即寻找那些使联邦制(或者联邦制的某些方面)得以被采纳、而其自身又的确并非联邦制结果的因素。一方面是在时间点 $T$ 上联邦制或者分权被采纳,另一方面是可以被视为联邦制在时间点 $T+n$ 上产生的结果的社会、政治或经济条件,如果能证明两者的确无关,那么对内生性与自我选择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呼之欲出了。<sup>①</sup>

在追寻这些外生性环节的过程中,对外部冲击的认定与分析是一种有希望的方法。比如,在评价收入分配对现存的财政联邦制造成的影响时,人们应该找到那些收入分配的突然变化与现行联邦制度的分配效果无关的例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萧条对北美联邦国家的影响,或者统一对德国财政制度的影响都是两个可以被视为外生性环

<sup>①</sup> 例如,日布拉特(Ziblatt 2006)超越了传统上关于必须建立一种“混合安全共同体”的观点(Deutsch 1957; Lemco 1991),把联邦制视为一种既存的、能够抵御来自大规模政体的强制的制度化的、高度基础性的政体妥协的结果。奥尼尔(O'Neill 2005)则把国家的分权解释为国家层面的精英为得到最大多数的选票而进行选举算计的结果。她认为,“当执政党相信自己不能继续掌控集中在国家层面的权力,同时又相信通过次国家层面的选举很有可能获得相当部分分权的权力”时,分权就“很可能出现”(2005, 5)。这样从本质上说,分权乃是具有长期政治眼光的政党的一种选举策略。因此,如果说选举的或者地缘政治的考虑使得联邦制度被采纳的话,那么就有从外生性的角度考虑它们的社会经济效果的可能性。相反,就对选举和联盟的关注与对分配的预期相重叠而言,选举策略就不再是外生性的了。

节的历史关节点,在这些节点上,可以清楚分析收入分配的变化对联邦制度的影响。

更一般地说,要提供一个可信的案例,那么那些外生性的环节应该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得到恰当的认定。理论上,需要继续把联邦制的形式化模型与联邦制比较政治学对制度复杂性的注重结合在一起。<sup>①</sup> 这样可以使联邦制的多面性成为值得深入开发的资源。<sup>②</sup> 进一步说,我们还必须接受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联邦制中任何因素的内生性(甚或是自我选择性),并不必然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它不会对自己产生影响。基于这个前提,不同联邦制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环境的关系,都可以在假定其他因素/方面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理论分析。使用这种方法的最新成果包括阿列西娜、安杰罗尼和艾特罗(Alesina, Angeloni, and Etro 2001),哈发和林达(Hafer and Landa 2004),以及(Volden 2005)对联邦国家共同提供公共品问题的分析,迪亚斯—卡尔罗斯(Diaz-Cayeros 2004)关于联邦制对税收集权的影响分析,以及贝拉门蒂(Beramendi 2006)对不平等与地方利益的代表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他认为,这是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然而真正的障碍在于,根据某些假设,利益上的理论关系已经得到确认,那么如何提出一种研究设计,使之适应于这些假设。这又回到了方法论的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最好的,即使不是唯一的方法,是通过替代性的途径避开那些不完善的设计,希望它们能够得到共同的结果。通过精心建构的历史性案例研究,可以对那些被认为确定不变的因素进行讨论,进而找到外生性环节。但这类研究只能补充(而不是代替)通过对证据进行更具普遍性和系统性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就此而言,关于联邦制和非集中的现有数据库,其质量和数量都需要极大的提升。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该领域在政党制度整合、财政分权,或者族群分裂等方面所使用的测量标准仍然颇有争议。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提高数据的质量与数量,才有可能运用大量的经验发现对关于可观察因素产生过程的不同假设加以检验(Przeworski, 本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进展互为补充,并且把联邦制在不同层面受到的影响与联邦制的根源或者在时间进程中决定其演变的条件区分开来。如果不能积累更好的数据,则会阻碍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基本问题提供切实可信的回答,从而使理论上的进展成为不完整的,无果而终的努力。

<sup>①</sup> 关于联邦制市场保护功能的更具规范性的模型与对财政联邦制的财政影响的比较研究的进展相结合,已经提供了大量例证,说明突破传统界限能够获得丰硕的成果。相当有趣的是,在挑战了联邦制市场保护模型的有限适用性之后,联邦制的比较经验研究证明,如果联邦的实际设计与这一模型的假设相符,则联邦的经济表现的确要更好。

<sup>②</sup> 例如法雷蒂(Falletti 2005)证明,不同类型的分权(财政、政治、行政)互为条件的动态顺序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联邦国家实际的权力结构。

## 四、结 论

对联邦制比较政治学的回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对于联邦制和联邦国家不同方面运作的知识在过去二十年中有了巨大的扩展,但形成一种关于联邦制起因和影响的普遍理论这一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追逐的目标却依然遥不可及。一方面联邦制的秘密已经越来越少,但另一方面建立一套能够预言联邦国家的产生及其本质和作用的方向的理论却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现有发现仅支持对联邦制和分权的有条件的、概率上的,而非确定的论述。联邦制和分权本身并不能为政治整合或者经济繁荣提供任何秘方。有时候它们能做到,有时则未必如此。这就涉及更多规范性的问题。最近对于联邦制的研究已经不再为任何意义上的联邦幻想预留空间。<sup>①</sup>学者们在联邦制和分权方面的发现越多,他们在预言联邦制的结果或者推动人们采纳这种制度方面就越谨慎。特莱斯曼 (Treisman forthcoming) 在从法条意义上强调分权的政府的复杂性之后总结道:“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分权政府就像是一场赌博。”

必须承认,联邦制和分权的许多细节还有待探索。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把进一步研究联邦制在不同环境下如何运作的需要,与不可能对政治分权(或整合)的影响进行可信的判断这两者等同起来还为时尚早。换言之,情景约束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预见性。类似地,要求人们小心谨慎也并不意味着宣称人们没有可能进行有意的宪政设计。在未来数年,联邦制比较政治学更有希望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全盘放弃这种可能性,而是正面接受以下的挑战,即系统性地断开联邦设计的某些具体因素与它们周边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联系。这要求机运和德性。<sup>②</sup>前者有求于历史,有赖于它愿意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外生性环节。后者则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找到把分析工具正确地结合到一起的能力。

## 参考文献

AGHION, P., ALESINA, A., and TREBBI, F. 2004. Endogeno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Quarterly*

<sup>①</sup> 当然,不能把这种情况与对中央集权的辩护相混淆。即便是在联邦制不能带来更好的经济表现的情况下,由于高度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异质化水平,更为集中的体制也未必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sup>②</sup> “foutuna and virtu”,这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喜欢使用的两个概念,指政治家获得成功必需的两个方面的条件。——译者

-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565-612.
- ALESINA, A., and SPOLAORE, E. 2003. *The Size of N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GELONI, I., and ETRO, F. 2001. Institutional rules for federation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 AMORETTI, U., and BERMEO, N. eds. 2004. *Federalism and Territorial Cleavag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RZAGHI, M., and HENDERSON, J. V. 2005. Why countries are fiscally decentraliz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1157-89.
- BARDHAN, P., and MOOKHERJEE, D. 2005. Decentralization,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an overview.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Corruption*, ed. S. Rose-Ackerm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2006. Decentral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16:101-27.
- BEDNAR, JENNA. 2001. Shirking and stability in federal system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2004. Authority migration in feder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7(3):403-408.
- 2005. Federalism as a public good.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2):189-204.
- ESKRIDGE, W., Jr. and FERREJOHN, J. 2001. A political theory of federalism. Pp. 223-70 in *Co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Democratic Rule*, ed. J. Ferejohn, J. N. Rakove, and J. Ril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AMENDI, P. 2003. *Decentra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Madrid: Juan March Institute.
- 2004. Decentraliz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North-Americ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2006. Fragmented solidarity: distributive politics on multitiered systems. M/S.
- 2007. Inequality and the territorial fragmentation of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BERMEO, N. 2004. Conclusions: the merits of federalism. Pp. 457-86 in *Federalism, Unitarism and Territorial Cleavages*, ed. U. Amoretti and N. Berme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EWLEY, T. F. 1981. A critique of Tiebout's theory of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s. *Econometrica*, 49(3):713-40.
- BOIX, C.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LTON, P., and ROLAND, G. 1997. The breakup of na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1057-90.
- BOWIE, R. R., and FRIEDRICH, C. J. eds. 1954. *Studies in Feder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BRENNAN, G., and BUCHANAN, J. 1980. *The Power to 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TON, A. 1996. *Competitive Fed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HANAN, J. 1995. Federalism as an ideal political order and an objective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25(2):19–27.

- BUNCE, V. 2004. Federalism, nationalism and secession: th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 Pp.417–40 in *Federalism, Unitarism and Territorial Cleavages*, ed. U. Amoretti and N. Berme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I, H., and TREISMAN, D. 2004. State corroding federalis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819–43.
- 2005a. 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817–30.
- 2005b.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cy experimentation.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CAREAGA, M., and WEINGAST, B. 2000. The fiscal pact with the devil: a positive approach to fiscal federalism, revenue sharing, and good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CASELLA, A., and FREY, B. 1992. Federalism and clubs: towards an economic theory of overlapping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6:639–46.
- and WEINGAST, B. 1995. Elements for a theory of jurisdictional change. Pp.11–41 in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grated Europe*, ed. B. Eichengreen, J. Frieden, and J. von Hagen. New York: Springer.
- CHHIBBER, P., and KOLLMAN, K. 2004.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arty Syste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REMER, J., and PALFREY, T. R. 1999. Political confed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1):69–83.
- 2000. Federal mandates by popular dem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5):905–27.
- CHRISTIANSEN, V., HAGEN, K. P., and SANDMO, A. 1994. The scope of taxation and public expenditure in an open econom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6:289–309.
- DAHL, R. 1983. Federalism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Pp.95–108 in *Nomos XXV: Liberal Democracy*, ed. J. R. Pennock and J. C. Chapm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R. S. 1978. *The Federal Principle: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Quest of a Mean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FIGUEIREDO, R. J. P., and WEINGAST, B. 2005. Self enforcing federalism.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1(1):103–35.
- DEUTSCH, K.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in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AZ-CAYEROS, A. 2004. The centralization of fiscal author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 Forthcoming. *Federalism, Fiscal Authority and Centr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ELWAIN, K., ROMERO, V. E., and SIEWIERSKI, K. A. 200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and particularistic spending.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 DIXIT, A. 1997.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DIXIT, A., and LONDREGAN, J. 1998. Fiscal federalism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8: 153–80.
- DUCHACEK, I. D. 1970. *Comparative Federalism: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of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EICHENGREEN, B., and VONHAGEN, J. 1996. Federalism, fiscal restraint, and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134–8.
- ELAZAR, D. 1987. *Exploring Federalis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1994. *Federal Systems of the World*. London: Longman.
- ENIKOLOPOV, R., and ZHURAVSKAYA, E. 2003.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published paper. Moscow: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search.
- EPPLE, D., and ROMER, T. 1991. Mobility and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828–58.
- FALLETI, T. 2005. A sequential theory of decentralization: Latin American cas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 327–46.
- FEARON, J. D., and VANHOUTEN, P. 2002. The politicization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 FILIPPOV, M. 2005. Riker and federalism.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2): 93–111.
- ORDESHOOK, P. C., and SHVETSOVA, O. 2004. *Designing Fed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SHVETSOVA, O. 2005. Fed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Rus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Postcommunist state and society: transnation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Syracuse University.
- GABSZEWICZ, J., and VANYPERSELE, T. 1996. Social protection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 193–208.
- GIBSON, E., CALVO, E., and FALLETI, T. 2004. Reallocation federalism: overrepresentation and public spending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p. 173–96 in *Fed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 E. L. Gib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LATZER, A., and KONRAD, K. 1994. Intertemporal commitments problems and voting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6: 278–91.
- GRAMLICH, E. 1973. State and local fiscal behaviour and federal grant policy. Pp. 21–57 in *Selected Essays of Edward M. Gramli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7.
- 1987.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public welfare policies. Pp. 309–27 in *Selected Essays of Edward M. Gramli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7.
- HAFER, C., and LANDA, D. 2004. Public goods in federal system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 HALE, H. 2004. Divided we st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thnofederal survival and collapse. *World Politics*, 56(2): 165–93.
- HAMILTON, A., MADISON, J., and JAY, J. *The Federalist*. Cambridge, Mass.: Hackett Publishing.



- HOOGHE, L., and MARKS, G. 2003. Unraveling the central state, but how? Types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2): 1118–40.
- HUG, S. 2005. Federal stability in unequal societi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2): 113–24.
- INMAN, R.P., and RUBINFELD, D.L. 1996. Designing tax policy in federalist economie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0: 307–34.
- 1997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ederalism. In *Perspectives of Public Choice*, ed. D.C. Muel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b. Rethinking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43–64.
- KELEMEN, D. 2003.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EU feder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1–2): 184–208.
- 2004. *The Rules of Federalism: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Policy in the EU and Beyo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TCHAMP, R. ed. 1986. *The Antifederalist Pap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Debat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KOTSOGIANNIS, C., and SCHWAGER, R. 2004. Policy innovation in federal system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xeter.
- LEIOUR, A., and VERBON, H.A.A. 1996. Capital mobility, wage bargaining and social insurance policies in an economic un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3: 495–514.
- LEMCO, J. 1991. *Political Stability in Federal Governments*. New York: Praeger.
- LEVI, M. 2000. 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822–44.
- LIJPHART, A.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VINGSTON, W. 1956. *Federalism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J. 1997. Democracy, multi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Working Paper 103. Madrid: Juan March Institute.
- LUCAS, R.E. 1990.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92–6.
- MCKAY, D. 1999. *Federalis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WHINNEY, E. 1962. *Comparative Federal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ATTLI, W. 1999.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GUE, J.L. 1997. Public choice in a federal system. *Public Choice*, 90: 235–54.
- MUSGRAVE, R. 1997. Devolution, grants and fisc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65–72.
- MYERSON, R.B. 2006. Federalism and incentives for succ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3–23.
- OATES, W. 1972.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 1991. *Essays in Fiscal Federali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1999. 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1120–49.

- and SCHWAB, R.M. 1988. 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efficiency enhancing or distortion induc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5: 333–54.
- OBINGER, H., LEIBFRIED, S., and CASTLES, F. eds. 2005. *Feder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 NEILL, K. 2005. *Decentralizing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NIZZA, U. 1999.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iscal centraliz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4: 97–139.
- PERSSON, T. and TABELLINI, G. 1996a. Federal fiscal constitutions: risk sharing and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5): 979–1009.
- 1996 k Federal fiscal constitutions: risk sharing and moral hazard. *Econometrica*, 64(3): 623–46.
- PETERSON, P., and ROM, M. 1990. *Welfare Magnets: A New Case for a National Standar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PIERSON, P. 1995. Fragmented welfare states: fed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Governance*, 8(4): 449–78.
- PRUD' HOMME, R. 1995. The dangers of decentralization.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0(2): 201–20.
- QIAN, Y, and WEINGAST, B.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83–92.
- RIKER, W.H. 1964. *Feder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RIKER, W.H. 1975. Federalism. Pp. 93–172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ed. N.W. Polsby and F.I. Greenstein. Reading, Pa.: Addison-Wesley.
- 1980. I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quilibrium of majority rule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432–46.
- and LEMCO, J. 1987.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Pp. 113–34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Federalism*, ed. W.H. Riker.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RODDEN, J. 2002. The dilemma of fiscal federalism: grant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around the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3): 670–87.
- 2003. Reviving Leviathan: fiscal federalism and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 695–729.
- 2004. Comparative federalism and decentralization: on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36(4): 481–500.
- 2005. And the last shall be the first: federalism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in Germany.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2006a. *Hamilton's Paradox: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Fiscal Fed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b.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ederalism. In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B. Weingast and D. Witt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KELAND, G. and LITVACK, J., eds. 200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and ROSE-ACKERMAN, S. 1997. Does federalism preserve markets? *Virginia Law Review*, 83(7): 1521–73.
- and WIBBELS, W. 2002. Beyond the fiction of federalism: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n multi-tiered systems. *World Politics*, 54(4): 494–531.
- 2005. Retrospective voting, coattails, and accountability in regional ele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s, Washington, DC.
- ROEDER, P. G. 2000. The robustness of institutions in ethnically plural societie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ROSE-ACKERMAN, S. 1980. Risk taking and re-election: does federalism promo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 593–612.
- 1981. Does federalism matter? Political choice in a federal republic.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11): 152–65.
- 1983. Beyond Tiebout: modell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ocal government. In Zodrow 1983: 55–84.
- SCHNEIDER, A. 2003. Who gets what from whom? The impact of decentralization on tax capacity and pro-poor policy. Working Paper 179.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 SEABRIGHT, P. 1996. Accountability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government: an incomplete contracts mode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61–89.
- SHEPSLE, K. 1986.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ed. H. Weisberg. New York: Agathon.
- SRINIVASAN, T. N., and WALLACK, J. S. eds. Forthcoming. *The Dynamics of Fed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E. 199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ize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2): 357–91.
- STEPAN, A. 1999. Federalism and democracy: beyond the U.S. model. *Journal of Democracy*, 10(4): 19–34.
- 2001. *Argu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 E. 1983. The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 twenty years after Tiebout: a perspective. In Zodrow 1983: 17–53.
- STRUMPF, K. 2002. Does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policy innov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4: 207–43.
- SWENDEN, W. 2004. *Federalism and Second Chambers: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ary Federations: The Australian Senate and German Bundesrat Compared*. Brussels: PIE-Peter Lang.
- TAYLOR, B. 2005. Force and federalism: controlling coercion in federal hybrid reg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Postcommunist state and society: transnation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Syracuse University.

- THEIL, H. 1971. *Principles of Econometrics*. New York: Wiley.
- TIEBOUT, C.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416-24.
- TOCQUEVILLE, A. DE 1835/1964.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TREISMAN, D. 1999. *After the Delu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2000. Decentralization and inflation: commitment, collective action or continu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4): 837-57.
- Forthcoming. *The Architecture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LDEN, C. 2004.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ve federalism: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welfare benefi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2): 352-63.
- 2005. Intergovernment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American feder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2): 327-43.
- WATTS, R. L. 1999. *Comparing Federal Systems*. Institut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Kingston, Ontario: Queen's University.
- WEINGAST, B. 1993.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1): 286-311.
- 1995.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1): 1-31.
- 2002.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Pp. 660-92 in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 I. Katznelson and H. V. Milner. London: Norton and Company.
- MONTINOLA, G. and QIAN, Y.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1): 50-81.
- WHEARE, K. C. 1946. *Federal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BBELS, E. 2000. Fede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4): 687-702.
- 2001. Federal politics and market reform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2): 27-53.
- 2003. Bailouts, budget constraints, and Leviatha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5): 475-508.
- 2005a. *Federalism and the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b.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constitution form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2): 161-88.
- WILDASIN, D. 1991.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a common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4): 757-74.
- ed. 1997. *Fiscal Aspects of Evolving Feder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IBLATT, D. 2006. *Structuring th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the Puzzle of Fed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ODROW, G. R. ed. 1983. *Local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The Tiebout Model after Twenty-Five Yea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第三十二章 联盟理论和政府形成<sup>①</sup>

卡雷·斯特罗姆(Kaare Strøm)

本雅明·奈布雷德(Benjamin Nyblade)

### 一、联盟谈判、政府形成和代议民主

联盟指为了共同目标联合在一起的一些个人或群体。比如一群可能来自一个或者多个政党的政治家,为使政府得以运转而联合起来。联盟成员共同把广泛而分散的社会需求转化为一系列可操控的公共政策。这只是结盟政治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但在民主社会,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形式。

政治行为体成功结盟的能力对代议制民主至关重要。在民主政体中,没有人能够在没有他人支持的情况下制定法律或行使权力。开放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促成多种多样的政治行为体,而他们要有所行动,就必须共同努力。民主规则一般要求,所有决定都得到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中简单多数或者特定多数的同意。

尽管联盟成员为共同的目标协作,但他们也可能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有些分歧出自对特定选区要求的回应。比如,代表城市的成员提出的政策要求,就与出自农村地区的代表不同。在多个成员竞争重要而稀缺的政治利益或者政府职位(比较总理人选)时,冲突也会发生。联盟成员如何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协调其内部冲突,会影响他们所建立的联盟的命运和效率。

研究联盟谈判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政府决策,而且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谁最先进入政府,对议会制民主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政府(行政部门)有赖于议会

---

<sup>①</sup> 我们要感谢卢比亚(Arthur Lupia)和米切尔(Paul L. Michell)对本章所依据的其他学术成果的贡献。

的支持。虽然总统制之下不同政党间的联盟谈判也很重要(Amorim Neto 2006; Cheibub 2002; Cheibub, Przeworski, and Saiegh 2004),但它对于谁控制最高行政职位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章主要关注的,是议会民主制之下的政府形成。

在议会制政体下,政府中的联盟一般通过政党,并由政党组成。政党本身就是政治家的联盟,他们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参加竞选。但是,在为政府的控制权而谈判的时候,各政党会表现得相当团结一致。因此,本章与大量有关政府形成的文献一样,仅讨论统一政党之间的联盟谈判(参见 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Müller and Strøm 1999 对于统一党假设的论证)。<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说,议会制之下各政党之所以会团结一致,正是因为政府始终需要得到议会的支持(至少是容忍)。在总统制下,政府相对独立,结果政党的一致性通常也就比较低。

在议会制民主国家政府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通过谈判形成联盟决定。参与谈判的政党必须同时瞻前顾后。当下的谈判,不仅会受到过去的谈判的影响(因为后者决定了谈判者拥有的资源以及他们行动的条件),而且也会受到未来的选举以及政治对手持续存在的威胁的制约。

谈判理论,或者广义的博弈论传统,自里克尔(Riker 1962)的奠基性著作发表以来,一直是理解联盟形成的主要分析框架。在本章中,我们不仅要说明谈判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政府形成的主要方面,而且还会表明,我们对结盟谈判的认识,是怎样逐步超越了这些理论早期阶段的简单化假设。我们重点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什么条件下会形成联合政府?其次,什么因素决定了联合政府的类型?换言之,政府在议会中可能仅得到少数派的支持,也可能是一个最小获胜联盟,还可能是一个超额联盟<sup>②</sup>,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不同的结果?最后,我们要考察那些影响特定政党,或者特定类别的政党进入政府的因素。

## 二、稳定的还是暂时的联盟?

关于联盟的形成,一个最根本问题却很少被提及。联盟可以因一时一事而立,也可以(至少从意愿上说)持久而广泛。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是选择暂时的还是持久的联盟?如果说政党是政治家的稳固联盟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直追问到议

<sup>①</sup> 不过应该指出,联盟研究中一个正在成长的领域就是对党内动力机制的研究(Strøm 1994; Druckman 1996)。

<sup>②</sup> Surplus coalition,指参与联盟的政党数超过了组建政府最低要求的联盟,即比最小获胜联盟更大的联盟。——译者

员个人的层面。为什么政治家有可能以独立自主的决策者的身份,根据不同的议题选择不同的可能的同盟者?可另一方面,为什么政治家有时(其实是经常)会服从政党的权威,并支持政党领袖青睐的政策和盟友?同样,这些政治家所属的政党也可能会结成暂时而流动的,或者稳固而正式的同盟。

这些决策可以在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框架内得到最好的解释(Dixit 1996; Strøm, Müller, and Bergman 2007)。自由而流动的同盟有其优势。它们允许更多自由,而且也更有效,因为参与其中的政党或议员无须为他们并不真正支持的提案投赞成票,也无须为他们也许根本无从预见的议题承诺共同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和更稳定更正式的联盟相比,短期性的暂时性同盟有一系列缺陷,诸如:

- **交易成本更高。**自由流动的多数迫使参与者就每个决定都重新讨价还价。这种方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会耗尽政党的资源,削弱其达到广泛而多样的目标的能力。稳定同盟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们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 **政策影响和延续性更低。**如果没有正式的联盟,政治决策有可能难以完全贯彻,从而也难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缺乏稳定的政党或同盟的情况下,立法方面的胜利也可能难以持久。周二上午形成的多数完全可以推翻周一晚上的统治者通过的法律?这种不稳定将大大降低执政同盟作出的任何决策的价值。如果对自己作出的决定是否立即被推翻一点把握都没有,统治的意义何在呢?这种不确定增加了另一类交易成本。

- **忠诚的执行者更少。**即便一个自由流动的多数维持到能够任命自己的内阁成员,而其决定也没有立即被推翻,也不能指望政府中的其他人会接受这些决定的束缚。实际上,官僚们只要能够抗拒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行政指令而不受处罚,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参见 Huber 1998; Huber and Lupia 2001)。换言之,只要领导权不稳定,反抗就有利可图。

- **政策可信度更低。**政策的可信度问题不会因其付诸实施而结束。很多政策要产生实效,都需要政府之外的人配合。公民必须遵守法律,企业必须履行合同,国家必须信守条约。如果政府领导人今天签署的协议,到明天就无法得到有效履行,那么任何与之打交道的人都不会对其加以信任并与之合作。在一个完全由自由流动的多数领导的国家,公共政策不会有长期的可信度。这反过来会在很多方面对公民产生影响。假如基本物权变动频繁且不可预期,则买房或者投资股票就不堪想象了。对那些试图把自己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计划建立在政府政策基础上的人来说,自由流动的多数意味着灾难。可预期性的缺乏,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无效和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

- **选民可靠的支持更少。**在民主国家,政治家只有通过选举获得公民们赋予他们

的决策制定权,才能在政府中谋取职位。选举,即选民最终要对联盟成员进行判断的威胁,决定了政治家的行为。因此,如果选民希望政府行为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可预期的,那么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家比暂时的联盟获胜的机会就要大;而稳定联盟的成员也更容易确立“政策品牌”,以减少选民对其为某位候选人投票的政策后果的疑虑(Cox and McCubbins 1993)。与自由流动的多数相比,稳定的联盟确实使选民更容易确保政府官员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总的来说,选择正式而稳定的联盟是一种生存策略。它使政治家得以影响政府决策、获得非政府行为体的信任,并且以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与选民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在议会机构中供职的政治家而言,这是一种集体利益。只要与自由流动的联盟提供的政策自由相比,稳定的关系与较低的成本更重要,那么政治家就会选择稳固的联盟。

不过,政治家并不总选择稳固的联盟。在某些政治系统中,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高度的信息确定性和相对较低的风险,使议会的很多决定都可以通过暂时的或者短期的谈判联盟作出。在总统制民主国家,政党一般都比较松散,暂时的决策同盟也更常见(Cheibub, Przeworski, and Saiegh 2004)。而且总的来说,稳固的联盟能够带来集体利益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必定选择这种联盟形式。而且,即便是在没有正式的行政联盟的情况下,也常常存在稳定的立法联盟(参见 Warwick 1994; Bale and Dann 2002)。因此,是否存在正式的行政联盟,除交易成本之外,还受到政府之外潜在的支持政党导致的相对成本和收益的影响,特别是它们在不为政府领导带来可能比较高的选举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政策让步的能力的影响。(Strøm 1994, 1990b; Laver and Shepsle 1996; Mitchell and Nyblade 2006)。

### 三、政府类别

内阁官员彻底轮换的情形较少见,一成不变的稳定也不太可能。在总统制民主国家,行政官员的任期是固定的(除了辞职、死亡,或者受到弹劾之外),而这种刚性或者说可预期性也会影响内阁的构成。但是,总统内阁的党派构成,与议会制之下的一般情况相比,会更具灵活性,因为总统可以通过改组内阁,提高国会或者民众对他们的支持率;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总统较少受到内阁党派构成的限制(Amorim Neto 2006)。

由于议会制民主国家执政联盟相对稳定,此类政府研究者最主要的关注是了解所结成的联盟的类别。学者们发现,可以根据议会对参政党的支持程度,把政府区分为仅得到少数派支持的政府、构成了最小获胜联盟,以及得到超额支持的政府几种类别,而



这种区分具有一定的意义。有的时候,单一政党得到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因而单独执政。但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特别是在欧洲,由于实行比例代表制,所以通常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得到法定多数。针对这样一种全是少数的情形,传统上一般认为应该形成多数派联盟,而少数派的政府则是需要得到解释的、对常态的偏离。这是因为在议会制之下,政府必须得到议会多数(或明或暗)的支持(Müller, Bergman, and Strøm 2003)。

里克尔影响深远的著作(见下文)把上述考虑简化为最小获胜联盟的问题。如果一个群体需要对某种有价值之物加以分配,而决定又必须根据简单多数原则作出,那么最小获胜联盟能够让群体中大多数的潜在回报最大化(Riker 1962)。由于参政通常会被视为有价值之事,因此最小获胜联盟应该是可取的选择。

尽管最小获胜联盟可能是谈判的“自然”结果,但实际上,至少在欧洲,这并非最常见的结果。表 32.1 列出了联合政府的一些基本特征,而它们所处的背景,也是人们通常研究最多的,就是:欧洲议会制国家的全国性政府。表中的样本涵盖了 1945—2000 年间西欧 17 个议会制或半总统制民主国家中的 424 届政府。其中,只有 13% 是单一政党多数派政府,22% 是单一政党少数派,44% 是多数联盟,而 18% 是少数联盟。多数联盟中,大约五分之三是最小获胜者联盟,其余的规模要大一些。因此,如果我们只考虑全是少数的情形,那么大约 25% 的内阁是单一政党少数派政府而非正式的执政联盟;<sup>①</sup>而几乎同样数量的联盟由于规模过大而偏离了我们的预期。因此,在全是少数情况下,最常见的是少数派政府,然后是最小获胜联盟,最后是超过最小多数的政府。西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所有这三种政府类别,但每一种类别在不同国家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表 32.1 西欧国家的联合政府:1945—1999 年

国家	数量	非党派		单一政党多数		单一政党少数		联盟		最小获胜联盟		超过最小多数		少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奥地利	22	0	—	4	18.2	1	4.5	17	77.3	14	63.6	3	13.6	1	4.5
比利时	33	0	—	3	9.1	2	6.1	28	84.8	14	42.4	12	36.4	4	12.1
丹麦	31	0	—	0	—	14	45.2	17	54.8	4	12.9	0	—	27	87.1
芬兰	44	7	15.9	0	—	4	9.1	33	75.0	7	15.9	20	45.5	10	22.7
法国	23	0	—	1	4.3	5	21.7	17	73.9	7	30.4	8	34.8	7	30.4
德国	26	0	—	1	5.8	3	11.5	22	84.6	17	65.4	5	19.2	3	11.5

<sup>①</sup> 这些数据来自 Müller and Strøm (2000); Strøm, Müller, and Bergman (2007); 且本节与下文中的分析都是基于 Mitchell and Nyblade (2007)。

续表

国家	数量	非党派		单一政党多数		单一政党少数		联盟		最小获胜联盟		超过最小多数		少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希腊	11	1	9.1	7	63.6	1	9.1	2	18.2	1	9.1	1	9.1	1	9.1
冰岛	26	0	—	0	—	4	15.4	22	84.6	17	65.4	4	15.4	5	19.2
爱尔兰	22	0	—	6	27.3	6	27.3	10	45.5	5	22.7	0	—	11	50.0
意大利	51	1	2.0	0	—	14	27.5	36	70.6	4	7.8	23	45.1	23	45.1
卢森堡	16	0	—	0	—	0	—	16	100.0	15	93.8	1	6.3	0	—
荷兰	23	0	—	0	—	0	—	23	100.0	9	39.1	11	47.8	3	13.6
挪威	26	0	—	6	23.1	12	46.2	8	30.8	3	11.5	0	—	17	65.4
葡萄牙	14	3	21.4	2	14.3	3	21.4	6	42.9	3	21.4	3	21.4	3	21.4
西班牙	10	2	20.0	2	20.0	6	60.0	0	—	0	—	0	—	6	60.0
瑞典	26	0	—	2	7.7	17	65.4	7	26.9	5	19.2	0	—	19	73.1
英国	20	0	—	19	95.0	1	5.0	0	—	0	—	0	—	1	5.0
合计	424	14	3.3	53	12.8	93	21.9	264	62.3	125	29.5	91	21.5	141	33.3

数据来源: Mitchell and Nyblade 2006。

#### 四、谈判理论与政府形成

为解释上述事实,我们首先需要讨论谈判理论的贡献。里克尔的《政治同盟理论》一书(Riker 1962)是把谈判理论运用于政治联盟问题上的经典之作。里克尔把诺依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的逻辑延展到政治领域,得到的结果就是著名的“规模原则”,并推断了最小获胜联盟的产生。里克尔借鉴合作博弈论,将政治联盟的形成模型化为总量固定的谈判博弈,其中参与者必须就如何分配对他们各方都有价值之物(对我们而言就是政府职位)达成一致。里克尔明确指出:“在类似提供补偿支付的N人零和博弈的社会环境下,参与者会建立其规模足以保证他们获胜的联盟,但不会更大”(Riker 1962, 47页)。

从根本上说,规模原则基于另两项原则,里克尔称之为“策略原则”和“非均衡原则”。规模太小的执政联盟会增加成员,因为被排除在政府之外的多数既希望,也能够推翻少数派政府(策略原则)。另一方面,如果联盟规模过大,则参与方会发现他们作为政府一员只能分到极小量的利益,因而会选择逐出联盟中多余的成员(非均衡原则)。

当然,从策略上说,联盟的形成并不总与提供补偿支付的N人零和博弈相一致。

现实中的联盟形成与里克尔模型的近似程度显然各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偏离越大,模型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就越弱。实际情况可能在很多方面偏离里克尔的模型,不过有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回报、参与方能够得到的信息,以及他们身处期间的谈判环境。

#### 4.1 回报

里克尔假设,联盟谈判的回报总量固定,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另外仅联盟成员能够得到这种回报。这些假设并非总是不言自明。在现实世界,政党有时会拒绝参加政府(例如,1957年瑞典的农民运动和1981年挪威的基督教人民党,爱尔兰工党则多次这么做,参见 Bale and Dann 2002)。如果政党总是能够通过参政得到好处,而作为反对派则一无所获,那么这类情况就不会发生。至少在西欧议会制民主国家,参政的实际成本之所以可能很高,是因为作为政府一员更像是选举负债而非资产(Rose and Mackie 1983; Narud and Valen 2006)。在选举中特别容易遭到失败的小党,可能需要慎重考虑,在联合政府中分一杯羹所得到的好处,是否能够抵偿选举中可能付出的代价。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政府持续时间的长短随形成的政府类别不同而不同,所以回报的总量也并非总是固定不变。比如,多数派政府一般会比少数派政府持续更久。因此,需要谈判的不仅是各方能得到多少个政府职位,还有被分享的蛋糕的价值,这会使谈判局势更加复杂(参见 Diermeier, Eraslan 和 Merlo 2002, 2003)。

如果参政的价值会有变化,那么可以推断,政府“价值”越高,则越有可能形成最小获胜联盟。这事实上就是里克尔规模原则最重要的依据。什么因素能够影响参政的价值? 有三个方面:(一)参政带来的利益是否丰厚,(二)参政带来的决策的机会,以及(三)参政对选举带来的预期损益(Strøm 1990b; Müller and Strøm 1999)。在其中每一个方面,职位的价值都需要参照在野的可能加以考虑(参见 Strøm 1990a, 42页)。参政带来的额外好处越多,则参与执政联盟价值就越高,对选举表现的影响就越积极,政策结果与联盟成员的偏好也更趋于一致(Müller and Strøm 1999)。因此,斯特洛姆(Strøm 1984, 1990a)在解释少数派政府时考虑了两个主要因素:选举结果和政策影响。如果在政策影响和预期的选举回报方面,参政与在野相比获利越少,则参加执政联盟的吸引力就越小,出现少数政府的可能性就越大。

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上述考虑的第二个方面,即政策影响。阿克塞罗德(Axelrod 1970)和德·斯万(De Swaan 1973)率先把政策作为联盟谈判研究的核心要素。德·斯万假定,行为者总是试图使政策的一致性最大化。也就是说,效用的最大化,要求各方在偏好的政策上达成一致,并且维持联盟的长期和谐。因此,行为者倾向于参加政策偏

好方面可能的分歧最小的获胜联盟(“最小圈子”理论)。<sup>①</sup> 总体的行为假设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联盟利益冲突会更少,对其成员来说政策价值更高,因而也更易于结成和维持。

在最近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在建构谈判对局模型时,倾向于超越里克尔(Riker 1962)和莱瑟森(Leiserson 1966)简单化的职位回报理论,而追随阿克塞罗德(Axelrod 1970)和德·斯万(de Swaan 1973)的做法,综合考虑政党的政策偏好。这些学者通常采用布莱克(Black 1958)和唐斯(Downs 1957)的空间对局逻辑,强调在一维或多维议题空间内居中型政策偏好的优势(参见 Schofield 1993; Crombez 1996; Laver and Shepsle 1990, 1996)。

这些模型强调的是,相对规模和居中型政策偏好如何共同增强了政党的谈判能力。这并不是里克尔方法的延伸,后者只是根据谈判环境与他们所提出的模型的接近程度,对联盟形成提供一般性的说明,而前者则根据资源(议席份额)和谈判偏好来解释联盟的类型。虽然这些模型在注重政策还是职位方面有所差别,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强调谈判权力的不同而非谈判环境的不同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这些谈判权力模型背后的逻辑相对直观,但由于它们试图把多重的议题维度与议席份额、有时还有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所以在实际推演过程中会变得相当复杂。以多数派的情况为例,假定简单多数就可以获胜,单一政党能够单独组建政府。虽然政府形成的研究一般都忽略出现多数的情形,但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权力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一个政党手里,所以它们的极端性仍具有启发意义。在出现多数的情况下,根据定义,多数党可以形成一个最小获胜联盟,它同时也是每一个议题上的居中政党,这使它无论从资源还是职位的角度上看都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不过,即便是在没有出现多数的情况下,有些政党也会拥有巨大的谈判权力。一个拥有众多潜在盟友的居中政党可能会自行组建政府。一般来说,不结盟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最小化。如果没有出现多数,联盟谈判中占支配地位的一方谈判权力越大,政府的规模会越小。也就是说,谈判权力的集中,会使少数派政府比最小获胜联盟更容易出现,形成超额联盟的可能性就更低了。这一基本观点是由克隆贝兹(Crombez 1996),以及拉维尔和谢普索(Laver and Shepsle 1996)以最明确的方式提出的,它成为几乎所有关于联盟形成的政策/规模理论的逻辑基础。

因此,谈判权力越是集中在单一政党手中,联盟就越不容易形成。这意味着比如一

<sup>①</sup> 德·斯万对其核心行为假设阐述如下:“行为体力求结成这样一种包括自己在内的获胜联盟,其采取的政策,在一系列政策选择中与自己偏好的政策尽可能地接近。”(de Swaan 1973, 88页)

一个接近多数的政党更有可能组建少数派政府,因为在每一次议会投票时它仅需要再随便争取几位议员的支持即可。同样,一个政党如果能够长期得到并没有参加政府的议会中盟友的支持,就占据了比没有这类盟友的政党更优越的谈判地位。一般来说,居中的大党拥有更大的谈判权力,因为它们可以与其左臂两翼的政党结盟(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Crombez 1996; Laver and Shepsle 1996)。与议会制政府相比,在总统制,特别是分权政府之下,谈判权力要更为分散。

## 4.2 信息

里克尔承认,他的模型中的其他假设与现实甚至差距更远,其中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完整性假设。现实中的政府来自讨价还价的谈判,参与各方通常对他们对手的真实偏好、下次选举的情形,以及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了解非常有限。政党数量越少、内部越团结,其历史记录越久远、越连贯,则联盟谈判的情形越接近里克尔模型近乎苛刻的要求。参与者得到信息越差,他们越会寄希望于扩大联盟的规模。正如里克尔(Riker 1962, 88—89页)所说:“信息越不准确、越不完整,组建者就越是试图结成更大的联盟,实际形成的获胜联盟就越有可能大于最小规模。”多德(Dodd 1976)运用一组政府样本验证这一命题,并得到了肯定的结果。

政党可以尝试通过对未来行动作出可信的承诺以降低不确定性。但是,在不具备作出此类当承诺的能力,或者能力不足时,联盟成员就有可能以弄垮政府的威胁互相“勒索”,来换取对方让步。为了避免这种威胁,联盟可能会增加更多成员作为“保障”。卡卢巴和沃尔登(Carrubba and Volden 2000)通过一个关于议会联盟形成的形式模型推断,为了建立一种更稳定的“滚木头”机制(并且避免个别成员进行勒索),政党会创造出一种“最小必要联盟”,它会比最小获胜同盟更大。他们在随后的一篇文章(Carrubba and Volden 2004)中指出,如果行动者数量众多且差异巨大,或者议案难以通过,或者立法成本太高,对联盟成员利益不明显,这种超额联盟就特别易于出现。在操作上,他们认为最适合这些条件的是拥有众多政党和议会成员、实行上下两院制、议会高度极化,而且政府规模较小(按税收在GDP中所占比重衡量)的国家。

艾利希·布朗及其助手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的一系列成果(Browne, Frensdreis, and Glieber 1984, 1986)对现有的联盟理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同时强调不可预测事件在联盟政治中的重要性。他们提出,最好把政府更替理解为偶发的“极端事件”,或者政府受到的外部冲击的结果,而非政党领袖之间正式而理性的谈判的产物。虽然鲜有学者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但后来的研究已经尝试在经验上把外部冲击引入内阁存续的模型中(King et al. 1990),并在理论上解释外部冲击对选举预期的影响(Lupia and

Strøm 1995; Diermeier and Stevenson 1999, 2000)。可以预见,对于信息影响的研究,会在未来联盟政治的文献中继续占据重要的位置。

### 4.3 决策规则、制度以及谈判环境

学术界对里克尔的联盟政治概念加以完善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方式,是对谈判环境,包括政治制度影响的认识。要全面评价此类影响,就必须对理论假设加以调整。里克尔的研究基于合作博弈论,而对于具体的谈判过程并没有建模。这类模型一般假设政党能够作出可靠的承诺,最“有效”的政府也能随之产生。不过,最近大量的研究成果都以非合作博弈论模型为基础,它们关注单个政党的动机,并坚持对谈判过程的每个阶段进行如实的描述。政府形成的非合作模型通过对政府形成的过程建模,力图解释合作模型未能说明的谈判动态机制。对于认识与联盟谈判相关的制度规则的重要性来说,它们也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能够影响联盟谈判的政治制度范围极广,而政治学家们才刚刚开始系统考察此类影响(关于这方面调查,参见 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Strøm, Budge, and Laver 1994; Strøm, Müller, and Bergman 2003)。制度有助于界定执政联盟必须满足的正式要求、组建过程、决策方式,以及它们被解散和替代的条件。

首先,宪法对待任政府的要求不一样。部分国家,如德国和西班牙的宪法规定制造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这意味着只有待任政府得到议会中多数成员的支持性(授权)投票,政府更迭才会发生。其他国家实行正式的授权投票,但并没有多数的要求(意大利),还有另一些国家根本无须授权投票(丹麦)。伯格曼(Bergman 1993)探讨了积极的(待任政府必须获得多数的明确支持)和消极的(没有类似要求)的议会制度,并分析了它们对联盟谈判的影响。在需要正式授权投票的情况下,联盟更易于形成。由于授权投票迫使议会中的政党对每一届待任政府表示“赞成”或者“反对”,少数派政府因而面临更大的风险,正式联盟也因此更容易形成。在需要正式授权投票的情况下,某政党要暗地支持一个少数派政府会更为困难,而必须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为政府政策承担责任,并且在未来的选举中与当权者展开竞争。

政府要在联盟谈判中“获胜”,可能不仅需要赢得国会某个院的简单多数。因为在一些国家中,政府必须同时对议会两院负责,所以一个院的多数在另一个院就有可能变为少数。德鲁克曼、马丁和泰斯(Druckman, Martin, and Thies 2005)指出,在第二个院获得多数的需要,增加了出现超额联盟的可能性。

行政部门的决策环境也可能会影响联盟谈判。因此,拉维尔和谢普索(Laver and Shepsle 1996)根据强调结构诱导型均衡的研究成果(Shepsle 1979; Shepsle and Weingast

1981),认为内阁组成及其相应的权限,从根本上限制了任何联盟能够同意的可行政策选择,因为很难阻止任何职位的担当者在相应的政策领域推行自己最偏好的政策。要对拉维尔和谢普索的模型进行适当检验,所需数据与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之前收集的、关于政府形成的数据根本不同,所以对他们的方法严格的经验验证还受到限制(但可参见 Warwick 1999; Laver and Shepsle 1999; Martin and Stevenson 2001)。不过,最近学者们已经开始在职位分配方面努力采集数据,因此对职位分配模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已经指日可待。随着对职位分配问题的研究兴趣的增长,对甘森的职位均衡法则(Gamson's law concerning portfolio proportionality)的研究(参见 Druckman and Warwick 2005; Warwick and Druckman 2001; Ansolabehere et al. 2005),以及对副部长角色的研究(参见 Thies 2001; Manow and Zorn 2004),都已经展开。

虽然多数模型假定联盟参与者只包括议会政党(或其领袖),但制度现实可能更复杂。在半总统民主制国家,政府可能不仅要同时对议会或立法机关负责,而且同时也要对总统负责,这会明显改变谈判环境(Amorim Neto and Strøm, forthcoming)。政府也会致力于那些需要更广泛的支持,而不仅仅是议会中简单多数认可的行动。例如,政府可能希望对宪法进行修订,这就需要立法机关绝对多数的支持。因为简单多数不能满足联盟成员的要求,所以形成超额联盟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另外,规范联盟谈判过程的制度规则可能至关重要。有关指定组阁专员(formateur),即受托进行联盟谈判的人的规则尤其如此。巴伦(Baron 1991)模拟了这一过程(确认规则)。他通过对固定的和偶发的指定顺序的考察,证明不同的组阁专员指定顺序会对联盟结果产生重大影响。随后的研究表明,组阁专员一般会得到极大份额的职位回报(Warwick and Druckman 2001; Ansolabehere et al. 2005),如果不仅考虑他们得到的职位数,同时也考虑到这些职位的相对重要性,情况就更是如此。

## 五、对联盟形成和政府类别的解释

谈判模型通过聚焦两类不同的因素,即与谈判环境相关的因素和与谈判权力相关的因素,增进了我们对联盟形成的了解。两类因素在解释议会制民主国家政府形成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项建立在相当广泛的数据基础之上的、关于西欧国家全是少数的情况下联盟形成的最新研究(Mitchell and Nyblade 2006)发现,无论是在解释暂时的议会联盟,或者比较正式行政联盟的组建方面,还是在解释形成的政府类别的方面,这两类因素都非常关键。

如果参政可能为政党带来较高的成本,则正式的行政联盟就不大容易形成,在选举

波动性较高,而且上届政府因某种突发事件而倒台的时候更是如此。类似地,随着反对派力量的增强(此时因参政而在政策影响方面带来的相对收益会下降),联盟形成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如果谈判拖延不决(此时政党会明确拒绝某个潜在的联盟,这表明决定它们行为的不仅仅是参与政府),则形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更小。

上述变量反映了谈判环境的性质,另一方面,各政党的谈判权力对联盟形成至少也会发挥与之同等重要的影响。如果谈判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个政党手中,那么即使该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也会增加一党执政的可能。联盟研究的历史上有一个不变的事实,那就是接近多数的政党尤其有可能组建少数派政府(Strøm 1990a; 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Crombez 1996)。米切尔和奈布雷德(Mitchell and Nyblade 2007)发现,根据最大政党的谈判权力(用班茨哈夫指数衡量),可以比根据它的议席份额更好地推断联盟形成的可能性。<sup>①</sup> 如果最大政党的谈判权力特别大(它自己拥有众多可以形成获胜联盟的潜在伙伴,而没有它则很难结成获胜联盟),那么它就很可能自己组建政府。如果最大党同时也是议会内的中间党,这种效应就更明显。即便是没有广泛的联盟,政策中心这个位置本身就对持这种政策的政党有利。

尽管有大量研究成果关注出现少数派和/或超额政府的可能性,并将其视为对最小获胜联盟这一正常现象的偏离,但同样值得追问的是,为何最小获胜联盟更容易出现。基于里克尔的结论,我们预期在谈判环境最接近简单合作博弈模型时,最小获胜联盟出现的可能性也最大。因此,在一个一院制国家,当不确定性较低、参政的价值较高,且决策规则是简单多数制的时候,最小获胜联盟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按照克隆贝兹(Crombez 1996),以及拉维尔和谢普索(Laver and Shepsle 1996)等提出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的逻辑,出现最小获胜联盟的条件,是谈判权力既没有过度集中在某个政党手里(否则它会以较低的代价组建一个少数派政府),也没有过度分散,以至为避免出现勒索行为必须组建超额联盟。总统制可能导致谈判权力分散在更多行为者手里,从而使谈判复杂化。因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半总统制或总统制之下出现最小获胜联盟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经验分析总体上支持这些观点(Mitchell and Nyblade 2007)。在全为少数的情况下,只有参与政府有利可图,才会出现最小获胜联盟。具体说就是反对派的影响较小、

<sup>①</sup> 班茨哈夫权力指数(Banzhaf Power Index)衡量的是具有不同权重的选票份额的行为者影响投票结果的能力(Banzhaf 1965)。这一指数可以计算出对每位选民而言,与其他行为者改变选票投向的能力相比,该行为者能够加以改变的投票组合的比例(从赢到输)。假定议会的议席数量为100,其中有4个政党,它们分别占有45、26、25和4席。如果采取简单多数制,则占据4席的政党没有任何谈判权力,因为它不能改变任何一次投票的结果,也无助于组建任何形式的最小获胜联盟。



选举形势较为明朗,而上届政府亦非因“突发事件”而下台。最小获胜联盟也与议会中谈判权力的分布明显相关。假如存在一个较小且谈判权力较弱的“事事居中的政党”(参见 Laver and Shepsle 2000),则非常有可能出现最小获胜联盟。

与最小获胜联盟不同,传统上一直认为,少数派政府独立性较差,效率也较低(Johnson 1975; Powell 1982)。但如上所述,少数派政府并不必然是反常现象,而且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与多数派政府相当,甚至优于后者(Strøm 1985)。那些导致少数派政府出现的因素,与阻碍了正式同盟出现的因素大致相同,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少数派政府都不是执政联盟。经验分析表明,除斯特罗姆(Strøm 1984)指出的两个主要因素(选举的决定性和反对派的影响)之外,其他衡量职位相对价值的指标也很重要,比如最大政党的规模和谈判权力。

另一方面,人们一般认为,超额联盟是政党彼此之间不能作出可信承诺的结果。最小获胜联盟可以被任何一个成员打破。所以,如果政党之间不能相互信任,或者不能在任期内保证相互支持,那么它们会发现吸纳新成员较为有利,因为这会使任何一个成员都更难于“勒索”政府。这一关于超额联盟的观点可以直接追溯到里克尔(Riker 1962)在关于立法机构滚木头的理论中被模型化(Carrubba and Volden 2000),尤其被用来解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超额政府(Carrubba and Volden 2004)。当谈判权力广泛分散于各政党之间的时候,勒索的威胁最为有效,超额政府也更易于形成。米切尔和奈布雷德(Mitchell and Nyblade 2007)发现,如果参政的价值并不太高,比如在选举波动性较高、上届政府因突发事件或者政治冲突倒台的情况下,超额联盟就较少出现。

总之,谈判环境,以及谈判权力在政党间的分布,在决定政府类别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谈判权力集中在一个政党手里、形成暂时联盟的成本较低,且各政党认为参政的价值并不太高,则出现少数派政府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各政党认为参政的价值比作为反对派更高,不确定性较低,且各政党相互之间能够作出可信的承诺,政治决定的规则是简单多数制,且谈判权力的分布既不太集中、也不太分散,则出现最小获胜联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谈判需要在议会各政党之间广泛进行,政治决定的要求高于下议院中的简单多数,而参政的价值既不太高也不太低时,则超额联盟出现的可能性最大。

## 六、参 政

从对联盟政府的学术研究开始之日起,学者们的兴趣就不仅在于推断联盟是否能够形成,以及联合政府是何种类别,而且在于哪些政党能够参政。里克尔认为,最终出

现的会是得到议会最少支持的少数获胜联盟,即最小获胜联盟;而莱瑟森(Leiserson 1966)则认为,最终出现的应是参与者最少的最小获胜联盟。从经验上说,这两种具体的主张都不太可靠。

联盟形成的经验研究在推断具体的政府构成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较少关注联盟形成的职位谋取模型,而更多关注政策偏好的聚合。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关于“谁入围了”的分析得出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富兰克林和麦基(Franklin and Mackie 1984)最早引入了多元检验,以评估政党规模和政策偏好的相对重要性,并且声称已经调和了早期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早期研究结果之间相互龃龉的状况,可以通过它们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得到解释。比如通过“对普遍策略和重点策略进行简单调整”(Franklin and Mackie 1984, 681页),同时承认国家的强烈影响,布朗(Browne 1973)和德·斯万(De Swaan 1973)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与泰勒和拉维尔(Taylor and Laver 1973)的发现相互吻合。他们甚至认为,在当时为止的研究中,“国家的选择比决定研究结果的其他任何假设都远为重要”(Franklin and Mackie 1984, 671页)。<sup>①</sup>

不过,随着政治学家统计方法的不断成熟,富兰克林和麦基的回归方法也受到了批评。马丁和斯蒂文森(Martin and Stevenson 2001)采用目前最合适的方法,对先前大量有关联盟的论断进行检验。他们指出:“(类似富兰克林和麦基那样早先的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回归的框架……每个形成中的潜在联盟都是作为孤立的案例被观察。这样,对类似意大利或者丹麦这样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大量政党的国家来说,就意味有数以千计的样本会进入观察,从而完全淹没在其他国家发现的关系”(Martin and Stevenson 2001, 38页)。他们认为,答案只是一个最大限度上的可能性框架,它把政府形成模拟为“一个无序而离散的选择问题,每一次形成政府的机会(而非每个可能的联盟)都代表一个案例,而所有离散的选择方案,就构成了能够形成政府的各政党所有潜在的组合方式”(同上)。马丁和斯蒂文森采用了麦克法登的条件对数模型,这是多项对数回归的一个特例。这样,潜在的联盟就是因变量可取的离散值,而每个潜在的联盟都与政党规模、意识形态和制度变量等一系列自变量相关。

马丁和斯蒂文森为传统的谈判权力变量(规模和偏好变量)和谈判环境变量(授权投票的要求、选举协议和当权者的地位等)的影响找到了证据。总体说来,他们的模型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能力(从过去研究的标准来看)。运用他们最好的模型,有大

<sup>①</sup> 在一项关于内阁存续的研究中,格罗夫曼也认为:“影响内阁存续的主要变量可能来自国家间效应,而后者则是像有效政党数这类政党体系变量的函数。”(Grofman 1989, 297—298页,斜体为原文所有)

约40%的时候能够(从数十个甚至数百个潜在的可能性中)准确预测最终形成的特定联盟,其准确度大大高于此前的经验研究(如 Laver and Budge 1992)。

近来关于“谁入围”的研究都以马丁和斯蒂文森的方法为基础。华威(Warwick 2005)借助一次广泛的专业调查,表明除政党简单的理念要素之外,其政策偏好的相关信息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联盟政治的解释。华威从多重维度考察了政党的“政策视域”。这类视域由政党通常不可能妥协的边界决定。贝克与杜蒙(Bäck and Dumont 2004)也以条件对数框架为起点,并运用这些模型作出的预测决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案例。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案例明确因果机制,同时反过来找到那些能够改善经验模型预测能力的变量。

## 七、结 论

联盟政府研究是比较政治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也是理论和经验知识都获得了最明显的进步的领域之一。议会制民主国家政府形成的研究一直与谈判理论密切相关,从里克尔(Riker 1962)和莱瑟森(Leiserson 1966)的开创性工作,到阿克塞洛德(Axelrod 1970)和德·斯万(de Swaan 1973)的政策偏好统合理论,再到人们提出更为复杂的模型,以同时兼顾上述两个方面(Austen-Smith and Banks 1990),并且涵盖更多的谈判环境因素,如选举的影响(Austen-Smith and Banks 1988),或者对联盟结果的其他制度和行为约束(参见 Strøm, Budge, and Laver 1994),虽然成就卓著,但未来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首先,需要更细致的理论研究,以整合谈判环境(制度)和谈判权力(规模、政策)变量。奥斯丁-史密斯和班克斯(Austen-Smith and Banks 1988)是这方面的先驱,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条比较有前景的研究路线是由迪尔梅尔及其同事开始的。迪尔梅尔和莫罗(Diermeier and Merlo 2000)提出了一个考虑到未来偶发冲击的联盟形成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政党会通过重新分配利益作为回应。迪尔梅尔、伊拉斯兰和莫罗(Diermeier, Eraslan, and Merlo 2002, 2003)模拟了联盟形成过程中,政党如何在不同形式联盟的规模与持久性之间进行取舍,以及某些制度规则和特征(如两院制、授权投票和建设性不信任规则)如何影响这些取舍,并决定形成不同联盟的可能性。

其次,与社会科学各领域一样,关键性的测量标准仍然是个挑战。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策偏好影响了联盟谈判,但学者们能够利用的政策偏好的测量手段却极其粗陋,它们要么是基于主观排序,要么可能来自它们本身需要解释的行为。在近期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种克服上述缺陷的方法,即或者通过专业调查(如 Laver and Hunt

1992,以及 Warwick 2005),或者通过诸如竞选纲领(宣言)等政策文件形成政策评估。后一种方法可以追溯到罗伯特森(Robertson 1976)的影响,但已经由纲领研究小组(参见 Budge et al. 2001)延伸并规范化了。至于根据这些数据评估政党政立场(参见 Gabriel and Huber 2000)和确定议题维度(Warwick 2002;Nyblade 2004;Stoll 2005)面临的挑战,则存在激烈的争论。

最后,经验检验方面也存在挑战。联盟谈判研究一直重点关注西欧稳定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全国性的政府。这些数据被反复使用,以检验和支持这个领域的主要假设。但是,这些论断几乎没有在它们据以得出的样本之外受到检验。未来的研究显然必须克服这一缺陷。因此,几项对议会制国家地方和区域联盟的出色研究尤其值得欢迎(Bäck 2003;Downs 1998)。我们也预感到,一些新的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会提供更多的机会对现有成果进行严格的检验。

经验验证面临的挑战不止于样本和案例选择,还包括统计的问题。例如,马丁和斯蒂文森提出的条件对数框架,建立在无关选择独立性(IIA)的统计假设基础之上,但这个假设在许多案例中可能会有问题。<sup>①</sup>另外,由于同盟形成只是议会制政府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Strøm, Müller, and Bergman 2007),而政党则既有过去又有未来,因此可能有必要在统计分类中考虑政府的其他阶段及其选择的影响,像迪尔梅尔、伊拉斯兰和莫罗(Diermeier, Eraslan, and Merlo 2003)的结构评估法所做的那样。

尽管存在这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挑战,我们依然保持乐观。鉴于过去40年联盟研究的进展,以及该领域持续的活力和创新,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对于联盟政治的认识在未来几十年不会继续快速发展。

## 参考文献

- AMORIM NETO, O. 2006. The presidential calculus: executive policy-making and cabinet formation in the America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10): 1292-8.
- and STROM, K. 2006. Breaking the parliamentary chain of delegation: presidents and nonpartisan cabinet member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619-43.
- ANSOLABEHERE, S., SNYDER, J.M., STRAUSS, A.B., and TING, M.M. 2005. Voting weights and formateur advantages in the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 550-63.
- AUSTEN-SMITH, D., and BANIKS, J. 1988. Elections, coalitions and legislative outcomes. *American Po-*

<sup>①</sup> 多项概率单位无须IIA假设,正确限定这种评估技术的条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 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405–22.
- 1990. Stable governmen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olicy portfolio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891–906.
- AXELROD, R. 1970. *Conflict of Interest*. Chicago: Markham.
- BACK, H. 2003. Explaining coalitions. Ph.D. dissertation. Uppsala University.
- and DUMONT, P. 2004. A combination of methods: the way forward in coalition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BALE, T., and DANN, C. 2002. Is the grass really greener? The rationale and reality of support party status. *Party Politics*, 8:349–66.
- BANZHAF, J. F. 1965. Weighted voting does not work: a mathematical analysis. *Rutgers Law Review*, 35:317–43.
- BARON, D. 1991. A spatial bargaining theory of government formation in parliamentary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1182–206.
- BERGMAN, T. 1993. Formation rules and minority govern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3:55–66.
- BLACK, D. 1958.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E, E. 1973. *Coalition Theories: A Logical and Empirical Critiqu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FRENDREIS, P., and GLEIBER, D. 1984. An events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cabinet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7:167–97.
- BROWNE, E., FRENDREIS, P., and GLEIBER, D. 1986. The process of cabinet dissolution: an exponential model of duration and stabilit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628–50.
- BUDGE, I., KLINGEMANN, H.-D., VOLKENS, A., BARA, J., and TANENBAUM, E. 2001. *Mapping Policy Preferences: Estimates for Parties, Electors and Governments 1945–199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RUBBA, C., and VOLDEN, C. 2000. Coalition politics and logrolling in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261–77.
- 2004. The formation of oversize coalition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521–37.
- CHEIBUB, J. A. 2002. Minority governments, deadlock situa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284–312.
- PRZEWORSKI, A., and SAIEGH, S. 2004. Government coalitions and legislative success under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565–87.
- COX, G., and MCCUBBINS, M. 1993. *Legislative Leviath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OMBEZ, C. 1996. Minority government, 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s and surplus majorities in parliamentar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9:1–29.

- DESWAAN, A. 1973. *Coalition Theories and Cabinet Formations*. Amsterdam: Elsevier.
- DIERMEIER, D., ERASLAN, H., and MERLO, M. 2002.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desig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 893–907.
- 2003. A structural model of government formation. *Econometrica*, jr. 27–70.
- and MERLO, A. 2000. Government turnover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94: 46–79.
- and STEVENSON, R. 1999. Cabinet survival and competing risk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1051–68.
- 2000. Cabinet terminations and critical ev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627–40.
- DIXIT, A. K.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DODD, L. C. 1976. *Coalitions in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DOWNS, W. 1998. *Coalition Government Subnational Style: Multiparty Politics in European Regional Parliament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RUCKMAN, J. 1996. Party factionalism and cabinet durability. *Party Politics*, 2: 397–407.
- MARTIN, L., and THIES, M. 2005. Influence without confidence: upper chambers and government formation.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0: 529–48.
- and WARWICK, P. 2005. The missing piece: measuring portfolio salience in western Europea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4: 17–42.
- FRANKLIN, M., and MACKIE, T. 1984. Re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size and ideology for the formation of governing coalition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671–92.
- GABEL, M., and HUBER, J. 2000. Putting parties in their place: inferring party left-right ideological positions from party manifesto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94–103.
- GROFMAN, B. 1989.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nd durati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country and within-country effec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291–302.
- HUBER, J. 1998. How does cabinet instability affect political performance? Portfolio volatility and health care cost containment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577–91.
- and LUPIA, A. 2001. Cabinet instability and delega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18–32.
- JOHNSON, N. 1975. Adversary politics and electoral reform: need we be afraid? In *Adversary Politics and Electoral Reform*, ed. S. E. Finer. London: Wigram.
- KING, G., ALT, J., BURNS, N., and LAVER, M. 1990. A unified model of cabinet dissolu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846–71.
- LAVER, M. and BUDGE, I. 1992. *Party Policy and Government Coali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nd HUNT, B. 1992. *Policy and Party Compet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and SCHOFIELD, N. 1990. *Multiparty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and SHEPSLE, K. 1990. Coalitions and cabinet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873–90.
- 1996. *Making and Breaking Governments: Cabinets and Legislature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Understanding government survival: empirical exploration or analytical model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395–401.
- 2000. Ministrables and government form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2: 113–24.
- LEISERSON, M. 1966. Coalitions in politics. Ph.D. thesis. Yale University.
- LUPIA, A., and STROM, K. 1995. Coalition termination and the strategic timing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648–65.
- MANOW, P., and ZORN, H. 2004. Office versus policy motives in portfolio allocation: the case of junior minister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Discussion Paper 04/09.
- MARTIN, L., and STEVENSON, R. 2001. Government forma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33–50.
- MITCHELL, P., and NYBLADE, B. 2007. Government formation and cabinet type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In Stram, Miiller, and Bergman 2006.
- MULLER, W. C., BERGMAN, T., and STROM, K. 2003.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promise and problems. In Stram, Muller, and Bergman 2003: 3–32.
- and STROM, K. eds. 1999. *Policy, Office or Vo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s. 2000. *Coalition Governments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RUD, H. M., and VALEN, H. 2006. Coalition membership and electoral performance in western Europe. In Strom, Muller, and Bergman 2006.
- NYBLADE, B. 2004.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issue dimension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POWELL, G. B., Jr. 1982.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articipation, Stability and Viol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IKER, W.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ON, D. 1976. *A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London: John Wiley.
- ROSE, R., and MACKIE, T. T. 1983. Incumbency in government: asset or liability? Pp. 115–37 in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ontinuity & Change*, ed. H. Daalder and P. Mair. London: Sage.
- SCHOFIELD, N. 1993.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multiparty coalition govern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3: 1–33.
- SHEPSLE, K. 1979.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quilibrium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27–60.
- and WEINGAST, B. 1981. 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 and legislative choice. *Public Choice*, 37: 503–19.

- STOLL, H. 2005. What's on the political agenda: cleavage salience and issue dimensiona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STROM, K. 1984. Minority government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the rationality of nonwinning cabinet solu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7: 199-227.
- 1985. Party goals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738-54.
- 1990a.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k.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565-98.
- 1994. The Presthus debacle: intraparty politics and bargaining failure in Norw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112-27.
- BUDGE, I., and LAVER, M. 1994. Constraints on cabinet forma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303-35.
- MULLER, W. C. and BERGMAN, T, eds. 2003. *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s. 2007. *Cabinet Governance: Bargaining and the Cycl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M., and LAVER, M. 1973. Government coalitions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 205-48.
- THIES, M.E. 2001. Keeping tabs on coalition partners: the logic of delegation in coalition govern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580-98.
- VONNEUMANN, J., and MORGENSTERN, O. 1944.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RWICK, P. 1994. *Government Survival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Ministerial autonomy or accommodation? Contested bases of government survival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369-94.
- 2002. Towards a common issue dimensionality in west European policy spaces. *Party Politics*, 8: 101-22.
- 2005. Do policy horizons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s? The evidence from an expert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 373-87.
- and DRUCKMAN, J. 2001. Portfolio salience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of payoffs in coalition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627-49.







第八部分

**比较视野下的治理**



## 第三十三章 经济和投票比较研究

雷蒙·M.杜赫(Raymond M.Duch)

经济投票普遍吗？有证据表明，这种投票方式在民主国家公民的大脑中已经根深蒂固。(Norpoth 1996)

经济投票意味着选民们在决定为某一政党投票时对经济表现所赋予的重要性(Duch and Stevenson 2007)。这种经济投票，是社会科学家们似乎一致认同的、罕见的有规律的经验现象之一。正如赫尔穆特·诺尔波斯(Helmut Norpoth)在上述引文中所言，经济是影响个人投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条社会科学的法则。经济投票吸引了许多政治科学家的注意，是因为它有助于说明到底是什么驱动了个人的投票决定，而了解这一点对民主责任理论不无影响。

学者们在对经济投票将近五十年的研究中得出了四个主要的发现。大致可以说，经济投票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理论性的。经济投票——与“堕胎”投票和“绿色”投票相反——可以相对明确地通过这一领域的主要模型，即投票选择的理性模型加以说明。这一模型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 1957)认为，选民根据有关执政党表现的信息(或期望)来决定他们的投票选择。一个可以理解的假设是，关于经济表现的信息对于一般选民来说非常关键，因此如果选民不能以理性的方式运用有关经济表现的信息，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受到严重的质疑。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学者们把选民理解为追求功利最大化的政治“消费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偏离了主要从社会心理学文献中借鉴而来，而且被广为接受的对投票选择的解释(Berelson, Lazarsfeld, and McSee 1954; Campbell et al. 1960)。因此就有必要提出一种关于选民如何以理性的方式、利用关于经济的信息进行投票选择的形式化描述；克莱默(Kramer 1971)，巴洛(Barro 1973)，菲尔约翰(Ferejohn 1986)和菲奥瑞纳(Fiorina 1978)等人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第二个重要的发现是经济投票的经验证明。虽然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内经验研究的大多数成果考察的都是美国的经验投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开始关注美国之外的经济投票。<sup>①</sup> 虽然在如何证明经济投票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就它的确存在这一点上人们大致已达成共识。这些经验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方面的努力,引出了第三个重要的发现:经济投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选举,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群体之间也存在巨大的不同。

经济投票中的这种不稳定性是经济投票研究中第四个重要发现产生的基础。不稳定的、多变的经济投票并不很好地与已有的关于经济投票的理论相符,这促使一些学者质疑并重新思考(或者至少是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关于经济评价如何进入投票者功利算计的理论。比较研究者在解释环境变化对经济投票的影响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原因很简单,虽然在单一国家,比如美国,也可以研究环境变化对投票的影响;但对经济投票的跨国研究,理应能够比仅限于单一国家的研究得到更多、也更有说服力的成果。

比较研究要对我们关于经济投票的认识作出贡献的话,尚需要应对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最重要的是,需要提出一种严格而有说服力的理论,以对经济投票的环境因素加以确定,并对多数人认定的经济投票的不稳定性加以解释。对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个体层面经济投票模式的比较观察,发现了经济投票很多有意思的不稳定性。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有几百项关于个体层面的研究,它们都明确指出了经济投票中的不稳定性。因此,比较研究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对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便对在个体层面的观察中发现的环境与经济投票之间的关系加以检验。第三个挑战是要回应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投票是由将经济评价的内生性导致的一种人为测量的结果。虽然对党派属性和投票偏好会影响经济评价这一点大致没有什么疑问(Duch, Palmer, and Anderson 2000),但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内生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投票的比重。比较研究者既然进行了大量个体层面的研究,应该有可能针对内生性的问题,确立经济投票的稳健性。

本章第一部分首先简要回顾对美国经济投票的研究,然后总结经济投票研究中四个重要的发现。对美国经济投票的研究使我们把经济投票视为一种理性的惩罚行为;有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表明经济投票确实存在;但经济投票也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然后我将简要回顾对经济投票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经济投票中的不稳定性。另外,它们同时也强调了制度和政治因素在解释这种不稳定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

<sup>①</sup> 近来有一些著作对这类经验研究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包括 Duch and Stevenson(2007); Hibbs(2006); Lewis-Beck and Stegmaier(2000)等。

尽管它们基本上没有为这些对变化的解释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本章第二部分表明,对大量个体层面的选民偏好研究的比较分析,为理解环境因素对经济投票的影响提供了一种特别有希望的研究策略。这一部分提出一种方法论的路径,用以分析大量现有的调查结果、测量经济投票的比重,并说明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通过利用这些方法,我总结了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提出的证据,它们表明,经济投票虽然不稳定,但占据很大比重。然后,我还将根据杜赫和帕尔默的研究(Duch and Palmer 2002)证明,经济投票所占的这种比重并不仅仅是人为测量的产物。

第三部分简要总结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提出的经济投票环境理论,它建立在选民根据工具理性投票的假设基础之上。投票选择的理性假设意味着,选民对经济表现的反应是有条件的,是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的,是受制度环境约束性的。理性投票选择模型还进一步假定:选民了解不同政党(包括执政联盟和反对党)影响经济表现的能力;也了解制度、政治和经济环境如何影响这些政党实施其经济政策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投票中会掺杂策略投票的考虑。这一部分除简单勾画经济投票的理性情景理论之外,还为从这一理论导出的一些假设提供了证据。

## 一、美国理性经济投票研究的理论遗产

早期美国学者对经济投票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为采用了投票选择的功利模型,这种模型把经济投票视为一种惩罚性的行为。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为经济投票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概念:选民是根据工具理性行动的行为体,他们进行投票选择的基础是对相互竞争的各政党预期效用的比较。但真正推动了早期经济投票研究的,是克莱默的努力(Kramer 1971),他试图从经验上测定经济福利在选民功利函数中的重要性。<sup>①</sup> 费尔(Fair 1978)对经济表现如何进入选民的功利考虑提供了一种形式化的说明,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克莱默的观点。<sup>②</sup>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以此为基础,可以从理性功利最大化的角度建立一种投票选择模型,并把经济福利纳入功利函数。

正如费尔(Fair 1978)所强调的那样,在确定经济如何进入功利函数方面,理论是必要的指导。选民在进行投票选择时,仅仅以回溯的方式思考问题,而且像克莱默

<sup>①</sup> 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不存在对经济与选举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克莱默对这方面的早期努力进行过很好的总结(Kramer 1971)。

<sup>②</sup> 如希布斯(Hibbs 2006)所指出的,这一贡献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它从可以通过经验方式测定的个人层面的功利函数,推导出了积累层面的投票等式。

(Kramer 1971)在早期所发现的那样,主要由一种惩罚性的反思所驱动吗?或者他们会像唐斯(Downs 1957)和斯蒂格勒(Stigler 1973)所暗示的那样,收集关于过去经济结果的更为广泛的信息,并据此评判相互竞争的潜在的管理“团队”在未来可能的表现?这两种观点依据的是同一种个人决策模型,它假定选民遵从工具理性主义原则,其目的就是使选民功利函数最大化。

这种惩罚性的视角至今还被许多研究经济投票的文献采纳。克莱默(Kramer 1971)和费尔(Fair 1978)在其早期开创性的著作中提出,影响投票选择的,主要是当政者近期的经济表现,而非对相互竞争的政党当选之后可能的经济表现的比较。他们认为,经济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进入选民的功利函数:惩罚不佳的表现,奖励好的结果。V. O.基(V.O.Key)对经济投票的描述常被引用,而且看上去也很有道理:“选民可能会拒绝他们已知的东西,或者会赞同他们已知的东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大可能被那种关于新奇的或未知的东西的承诺所吸引。”(1966, 61页)菲奥瑞纳(Fiorina, 1981)的经典作品《美国全国选举中的回溯型投票》中给出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预期效用投票模型,经济评价也被包括在内。<sup>①</sup>虽然在菲奥瑞纳的投票决定模型中,对当政者(和挑战者)表现的回溯性评价和未来预期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来的预期仅仅是一种从现在趋势出发进行的推断。这就为回溯性的、惩罚性的视角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因此,在对经济投票的早期研究中,这种选民行为的惩罚模型——或隐或显地——成为连接经济和投票选择之间的主导模型。

惩罚模型假定理性选民的关注相对比较狭隘:仅集中在过去和当政者。巴洛(Barro, 1973)和菲尔约翰(Ferejohn, 1986)证明,如果假定候选人如企业一样,为利润最大化原则所驱动,则回溯式的经济投票有可能是一种完全理性的投票策略。但是根据这一模式,选民在决定投票支持当政者而非反对党时会面临一个道德难题。他们认为,如果选民们不对不良的经济表现进行惩罚,他们给当政者提供一个信号,即糟糕的经济表现可以被容忍,从而会让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政治候选人有机可乘,这是一种冒险。按照这种模式,选民们不会对相互竞争的政治候选人带来的效用收入进行比较评判——他们只是建立了一个表现水平的门槛,把跨过这个门槛的当政者再次选举出来,或者惩罚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当政者(Ferejohn 1986)。这一点使大多数对经济投票的说明带上了惩罚的特征。也就是说,促使当政者不至逃避责任的原因,仅仅是对未来再次当选的关切;因为他们清楚,如果表现不佳,肯定会在未来受到选民们的惩罚。从选民的角度来说,为了使这种惩罚真实可信,他们会在政府的经济表现低于他们的预期

<sup>①</sup> 菲奥瑞纳没有提出一种把回溯型经济投票视为理性行为的形式模型。

时,通过投票惩罚当政者。

采取这样一种理性投票的惩罚视角对经济投票模型的具体特征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投票纯粹的惩罚性模式完全是回溯型的——选民们完全不理睬候选人的承诺(因此这些承诺不会进入效用函数),他们关注的仅仅是当政者任职期间最近的经济表现。

## 二、美国理性经济投票研究的经验遗产

理性经济投票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它刺激了严格基于经验推演的投票选择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获得了一些得到广泛接受的概念,用以描述选民们如何利用有关经济结果的信息形成他们的投票决定。在这一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经济投票研究根据美国的实际,得到了大量明确的经验发现,并且证实了在经济与投票选择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稳健的经验性联系。有三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学术流派,分别为形成这种共识作出了贡献。

穆勒(Mueller, 1970)对于总统人气的经典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分析路线:可以通过总统人气的积累层面的模型测定经济投票,而总统的人气又是通过每个月公众对行政首脑的认可度来加以衡量的,衡量的指标则是作为自变量的客观经济表现(特别是实际的失业率和通胀率,以及 GDP 的真实变化)。虽然人们对总统人气函数的具体细节还有一些争论,但几乎所有对总统人气函数的评估都证实,经济是影响总统人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如 Norpoth 1985; Beck 1991)。而且,不同的测评对这类影响的重要性(基本上)都持一致的看法。例如贝克(Beck, 1991)估计,通胀率一个单位的变化,在长时期内(以四年为一个周期)对总统人气的影晌是 4%。穆勒(Mueller 1970)则估计,如果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总统人气就会大约下降三个百分点(Mueller's 1970, 29 页)。虽然人们对总统人气函数应该包括哪些具体的积累性经济指标尚有不同看法,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积累性经济变量的某些组合能够预示公众对政府认可程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量的一般性变化对总统人气的影晌大概在三到十个百分点之间。

第二类经验性研究考察了实际的选举结果与客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引领这一类研究是塔夫特(Tufte, 1978),他使用从 1948 年到 1978 年 8 个总统大选时间点的数据,证明年度实际可支配收入与总统所在政党的得票率呈正相关。后续研究运用更多的数据和更精细的模型,证明了塔夫特最初的发现(如 Bartels and Zaller 2001; Erikson 1990; Hibbs 2002, 2006)。巴特尔和扎勒(Bartels and Zaller 2001)对大量不同的总统选举投票模型指标进行分析,并认为最好的工作指标是那些结合了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加权分配差异,并以此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他们特别提到希布斯(Hibbs 2000)的“面包



与和平”模型,认为它在使用中特别有效。

这些研究不仅证明了经济投票在积累数据层面上的存在,而且就经济投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所占的比重也近于达成了共识。比如说,研究者们相信,年度实际可支配收入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会使现任总统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二到四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上述研究所发现的经济投票的影响方向相一致,虽然后者关注的是总统的人气而非得到的票数。

早期从积累层面对美国经济与投票的研究还考察了国会选举中的竞争。克莱默(Kramer 1971)对1886年到1964年美国国会的选举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分析,他首次发现,选举年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变化预示着总统所属政党可能会赢得国会选举。这一结果被塔夫特(Tufte 1975,1979)随后发起的研究所证实,该研究采用了新近由雅各布森和康奈尔(Jacobson and Kernell 1983),列维斯—贝克和赖斯(Lewis-Beck and Rice 1992),基尔维特和乌戴尔(Kiewiet and Udell 1998)所提供的支持性证据。然而与总统选举的结果不同,这一发现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在积累数据与议会选举之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关联(如Marra and Ostrom 1989; Erikson 1990; Alesina, Londregan, and Rosenthal 1993)。但是,支持国会选举中的确存在经济投票的证据也在增加,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几乎肯定要比在总统选举中微弱得多。

第三类经济投票研究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V.O.基(Key 1966),他考察了公众对当政者表现的评价对实际投票决定的影响。早期类似使用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探讨经济投票的研究,主要依靠向选民们提出“个人财务状况”如何的问题。后来(也是最为持久的)美国在个人层面的经济投票的证据,则基于向回答者提出的有关一般经济状况,或者国家的“经济处境”的问题。菲奥瑞纳(Fiorina 1981)率先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分析,他证实选民对国家经济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选举(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的投票选择。此后不久,基尔维特(Kiewiet 1983)用更充分的数据和更严密的统计分类证实了菲奥瑞纳的结论。他并且证明,对总体经济状况的评价,与人们对个人收入的考量(如对个人财务状况的感知)相比,在形成投票选择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菲奥瑞纳和基尔维特的经验结论很快进入了美国政治科学的词汇库,而且仅在经过一些很小的修正和扩展之后,得到了广泛的验证(一些重要的例子包括Alvarez and Nagler 1998; Duch, Palmer, and Anderson 2000; Markus 1988, 1992)。

经济投票的累积研究非常有助于测量选举中经济投票单一的、平均的影响,与此不同,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不同选举个案层面的调查数据,则可以通过它们来测量(并比较)每一次选举中经济投票的强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尔维特(Kiewiet 1983)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明确地对一系列美国选举研究(从1958年到1980年)进行了经济投票的

测量。虽然在他的样本中选举调查的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四次包括全国经济评价的总统选举调查,)但他还是强调了国会与总统选举之间一般性的区别,并对其作出了解释(与上述累积性研究的成果一致,他也发现国会选举中经济投票相对较弱)。

在美国,对选举的个案研究与日俱增,学者们已经开始记录不同选举之间经济投票的强度所发生的变化。比如,菲奥瑞纳、亚布拉姆和波普(Fiorina, Abrams, and Pope 2003)考察了总统选举中经济投票的强度,而且解释了这种影响在不同选举之间的变化。而且,对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美国选举的个案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宏观与微观层面经济投票之间的联系(或者联系的缺失)(Erikson 2004; Duch, Palmer, and Anderson 2002)。

虽然学者们已经对经济投票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但在美国的相关文献中,对采用何种方法测量每个选举个案中经济投票的强度,仍然缺乏明显的共识。基尔维特、菲奥瑞纳,以及阿尔维雷兹和内格勒(Alvarez and Nagler 1998)采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美国总统选举每个个案中经济投票的强度作出了相当不同的测量。例如,基尔维特估计经济方面的考虑对当政者竞选支持率的影响是13%(Kiewiet 1983, 35页)。相反,阿尔维雷兹和内格勒的估计近于38%。<sup>①</sup> 在使用调查数据测量经济投票的强度方面缺乏统一的方法意味着,我们不清楚测量结果的变化是反映了经济投票影响的真实变化,还是说它们仅仅是不同计算方法的结果。

总的来说,在美国,经济投票已经受到广泛而细密的研究,而且这一努力已经得出一些重要的成果。<sup>②</sup> 美国总统得到的选票会受到经济表现的强烈影响。在累积层面,我们已经精确测量了累积性的经济变化对总统得票率和总统支持率的影响。在个案层面,研究成果证实选民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会对总统选举发生重要影响,虽然对这种影响的程度测量方式相当不同,而且也缺乏得到普遍同意的测量方法。

五十多年美国经济投票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经济投票确实存在。同时,从一些个案层面的调查(Kiewiet, 1983)到对8次选举的分析(Tufte, 1975),学者们证实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或者在不同类型的选举之间,美国经济投票的强度会发生极大变化。《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中的一些分析,记录了每次总统选举之间经济投票影响的变化(Blais et al. 2004; Fiorina, Abrams, and Pope

<sup>①</sup> 基尔维特(Kiewiet 1983)的结论基于把“普通”选民对经济的评价方式从“比一年前更坏”改为“比一年前更好”;阿尔维雷兹和内格勒(Alvarez and Nagler 1998)的研究结果则把对全国经济的评价从更糟变为更好。

<sup>②</sup> 艾利克森在1990年指出,经济表现与选举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投票行为与选举方面人们接受最广的一个假设,在这里他显然是以美国为例。

2003; Alvarez, Nagler, and Willette 2000; Duch, Palmery, and Anderson 2000)。

美国经济投票的不稳定性表明,环境因素,如总统选举的竞争性或者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经济结果的重要性。应该把什么样的环境因素纳入投票选择模型,以及如何评价它们的影响,是经济投票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我认为,要真正解开这些经验上和理论上的谜团,就必须把研究延展为一种跨国比较。对经济投票的跨国研究将会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因制度、政治和经济环境产生的不同影响,这对于理解经济投票的不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 三、比较经济投票中的未解之谜

研究表明,在美国之外的经济投票更是变化无常。如在美国一样,比较研究包括对经济与政府人气的累积研究、对经济和选举结果的累积研究,以及对经济认知与投票选择的个案研究。这三种研究的每一种都表明经济投票的存在,但是它的影响明显地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化。

**比较视野中的累积层面研究** 塔夫特(Tufte 1978)和后来的希布斯(Hibbs 2000)表明,美国那种经济与投票偏好之间在累积层面的相关性,并不一定会在其他国家的背景下重现。实际上,这一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非常不同。在某些国家,对政府人气与经济的累积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关系。法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多测量证明,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累积性经济影响(Lafay 1977; Lewis-Beck 1980; Hibbs and Vasilatos 1981),虽然雷卡容(Lecaillon 1981)是个例外。在英国,研究成果也倾向于支持经济投票的存在,虽然也有一些反面的证据。古德哈特和班萨利(Goodhart and Bhansali 1970)首先对政府人气进行了累积性研究,证明了英国政府的人气程度受到积累经济效果(失业率和通胀率)的明显影响。虽然这些早期研究受到批评(如 Frey and Garbers 1971, Miller and Mackie 1973),但近期的研究似乎再次证实英国存在经济投票,争论在于如何确定经济变量(比如是客观经济变量还是主观经济评价),以及如何控制政治突发事件,如马岛战争的影响(Whiteley 1986; Sanders, Marsh, and Ward 1991; Clarke and Stewart 1995; Clarke, Stewart, and Whiteley 1997; Price and Sanders 1993)。

对其他国家的累积性研究表明,政府人气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更大的变化性。对丹麦的测量结果开始是否定的,后来则是混合的(如 Paldam and Schneider 1980; Nannestad and Paldam 2000)。克奇盖斯那(Kirchgaessner 1991)发现,1982年之前,就业率对德国政府的人气程度有影响,但是在1982年之后就没有。弗雷(Frey 1979)对丹麦、挪威和瑞典67年间的执政党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带混合性的结论。麦德

森(Madsen 1980)对丹麦、挪威和瑞典政府的人气程度进行了类似的细致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丹麦和挪威存在经济投票,但在瑞典则可以发现相关证据。

致力于将不同国家累积性的(政府人气与选举结果)数据结合起来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混合型的。不同研究对经济投票影响的测量,在性质和程度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变化。帕尔达姆(Paldam 1991)分析了战后17个国家的选举数据,发现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经济投票。莱维斯-贝克和米切尔(Lewis-Beck and Mitchell 1990)研究了5个欧洲国家27次选举的累积数据,发现失业率和通胀率确实影响了执政党的得票情况。但是,查培尔和维加(Chappell and Viega 2000)对更长时段、更多欧洲国家样本的分析,却发现没有任何一项常用的经济指标对执政党的投票率产生了影响(虽然他们发现,通胀率相对于欧洲平均水平的变化确实与投票分布有着重要的联系)。虽然这些差异当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所分析的样本国家的不同,或者采用的测量方法的不同而得到解释,但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还是很难得出经济投票在发达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结论。

对于累积性经济投票的这种不稳定性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不同国家治理机制的性质各不相同。鲍威尔和惠顿(Powell and Whitten 1993)假定,制度性的“责任明晰度”——即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执政者分散对经济结果的责任——也许能够解释经济投票随环境而发生的变化。在对109次选举的分析中,他们把责任明晰度指标与经济表现指标相关联,结果发现“民众对政府集中控制决策的感知度越高,他们对政府为经济和政治结果承担责任的要求也越高”(Powell and Whitten 1993, 398页)。然而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受到罗伊德、莱登和鲍莱利(Royed, Leyden, and Borrelli 2000)的质疑,他们认为,关于政府责任明晰程度的理论缺乏支持,它实际上不过是认为,相对于一党执政而言,对联合政府的经济投票成分要更高。

比较视野中的个案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评价就已经事实上成为所有选举偏好个案研究的一个标准考察项目。例如,巴特勒和斯托克斯(Butler and Stokes 1969, 392页)通过他们早年对英国选民的研究认为,“选民对经济的反应是,出现了他们欢迎的情形时对政府进行奖励,而出现了他们厌恶的情形时对政府进行惩罚。”<sup>①</sup>但是,随着在其他国家进行了更多个案研究,人们逐渐得出了与累积层面的国别研究类似的结论——在个案层面,经济投票的程度和性质也存在高度差异。例如,虽然法国和英国的个案研究支持经济投票的存在,但米勒和李斯特豪格(Miller and Listhaug 1985)发现,在挪威基本上不存在个案层面的经济投票,贝卢西(Belluci 1985)证明在意大利也是如此。

<sup>①</sup> 引自 Lewis-Beck (1988, 34页)。

类似地,南尼斯塔德和帕尔达姆(Nannestad and Paldam 1997)的发现也与其他很多人不同,他们证明,与对全国经济的评价相比,个人的经济状况对丹麦人的影响要大得多。<sup>①</sup>

那些得出了否定的结果,或者发现较少见的经济投票形式的比较政治学者,通常都把这些情况归因于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背景的独特特征。例如,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意大利已经被基督教民主党统治了将近四十年(所以没有发生真正的权力交替)。这一点把意大利与其他众多西方民主国家区别开来,而且根据贝卢西(Belluci 1985)的研究,也可能压制了意大利的经济投票。与此相似,米勒和李斯特豪格(Miller and Listhaug 1985)认为,国际经济形势对挪威经济的高度影响,也许可以解释他们所发现的这个国家个人对经济的微弱影响。情况可能是,挪威的选民发现他们的政府对经济结果几乎负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也就不把经济表现作为影响其投票决定的重要因素。南尼斯塔德和帕尔达姆(Nannestad and Paldam 1995)则发现,丹麦选民之所以认为政府应对个人的经济状况负责,是因为丹麦作为一个广泛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政府政策与个人的经济状况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很多别的国家并不存在。<sup>②</sup>

总的来说,不同国家经济投票的多样性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它鼓励学者们去思考国内政治与国民经济的不同,如何导致了国家间经济投票的差异。但是,正如列维斯—贝克和欧劳(Lewis-Beck and Eulau 1985, Lewis-Beck 1988)所强调的那样,如果学者们仅仅对数量相对较小的一些研究结果加以比较,而且这些研究用来测量经济投票的统计模型又差异巨大的话,那么他们在认识政治经济环境对经济投票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得到的收获不会太大。

#### 四、希望之地:多国比较研究?

在过去50年间,个案层面的选民偏好研究增长迅速,这使得列维斯—贝克倡导的那种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大多数发达国家定期举行民意调查,其中就包括一些设计好的问题,以测量经济评价对投票选择的影响。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如世界价值观调查,欧盟民调处的调查,以及选举制度比较研究的调查),这些调查并未标准化。比如,它们并不包含一套具有可比性的变量,以测量某个选举选择模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变量。不过,数量巨大的个案研究通常还是包含了必要的核心变量,以及适当的控制

<sup>①</sup> 这一结论受到希布斯(Hibbs 1993)和鲍尔(Borre 1997)的质疑。

<sup>②</sup> 莱维斯—贝克(Lewis-Beck 1983)认为,在法国的经济投票中,个人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这是他之前为这一发现提供的解释。帕切克和拉德克里夫(Pacek and Radcliff 1995)则通过累积层面的数据对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明。

变量。对于那些揭示环境变量如何影响个人层面关系的模型,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变量加以评估。

当比较政治学者从根据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选民偏好研究经济投票,转向同时为50个或者100个民意调查中反映的经济投票建模的时候,方法论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在如此多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如何测量“经济投票”?每一位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对选民的效用,会受到诸多潜在因素的影响,经济只是其中之一。对每一个个体来说,经济投票的强度,取决于人们对经济结果感知上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民眼中每一位竞争公职的候选人的效用(如果对理论上相关的其他因素进行适当控制的话)。这样,所有参与竞选的政党都会面对“经济投票”,因为任何政党对选民的效用都会因人们经济认知的变化而受到或者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比如说,经济认知的变化,可能不会影响执政联盟中新加入成员对选民的效用,但可能会明显影响他对执政联盟中主要政党的偏好。一个政党的经济投票,就是选区(或者某个随机概率样本)中每一位公民投票概率变化的平均数。<sup>①</sup>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5)提出了一种方法,用以测量大量的、多样的民意调查中政党的经济投票,而且为环境对经济投票的影响建模(他们称之为“两步走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可以通过是否为出任行政首脑的政党投票的决定加以说明,写出来就是如下的对数函数:

$$v_{ik} \sim \text{Bin}(\pi_{ik})$$

$$\text{logit}(\pi_{ik}) = \beta_{ok} + \beta_{1k} X_{ik} + \sum_{j=1}^{j_k} \phi_{jk} Z_{jik} \quad (1.1)$$

在这个等式中, $v_{ik}$ 表示选民*i*在*k*次选举调查中每次都为行政首脑所属政党投了一标票, $i=1 \cdots n_k$ 。 $X_{ik}$ 是在个体层面测量的回溯性的经济评价, $Z_{jik}$ 是影响自述投票决定的其他个人特质, $J_k$ 则表示每*k*次选举研究中相关控制变量的数目。在任何一次个别的调查中描述经济投票的两个系数是 $\beta_{ok}$ 和 $\beta_{1k}$ ,它们可以随着调查的不同而变化。这一方法假设,在任何一次被研究的调查中,都存在一组可以用类似方法加以测量的核心变量。对经济投票来说,就是一个投票选择的问题(典型的,如“如果选举今天进行,你会为哪一个政党投票?”)和一种对国家经济总体状况的回溯性评估(在我们的案例中,标准的问题是询问被调查者,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经济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除此之外,这一测量方法还要求,投票选择等式中所有相关的控制变量都是确定的,以确保经济评价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能够得到统一的测量。这些控制变量与两个核

<sup>①</sup> 以三人投票为例做一个假设,如果经济改善使三位选民为议会中执政的社会党投票的概率分别变化了2.5%、3%和1.5%,那么社会党的经济投票就是2.3%(这三个数字的平均数)。

心变量不同,可以随不同的调查而变化——举例来说,对于收入这个变量,在法国的调查和荷兰的调查中就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测量。关键只在于,一个以适当方式加以明确的投票选择模型,应对每一次调查进行测量,这样才能确保对投票选择受到经济评价的影响的测量具有一致性。

选民  $i$  在调查  $k$  中为行政首脑所在政党投票的概率如下:

$$\hat{\pi}_{ik} = \frac{e^{\hat{\beta}_a(X_a) + \sum_{j=1}^k \hat{\phi}_j Z_{ja}}}{1 + e^{\hat{\beta}_a(X^a) + \sum_{j=1}^k \hat{\phi}_j Z_{ja}}} \quad (1.2)$$

这些模型中的系数,可用来测量样本中每一个个体的经济评价对其为行政首脑所在政党投票的概率的影响。对这一个体而言,经济投票的强度就是其经济认知的变化(从  $X_{ik}$  到  $X'_{ik}$ ) 导致的  $\hat{\pi}_{ik}$  的变化:

$$EV_{ik} = \frac{e^{\hat{\beta}_a(X_a) + \sum_{j=1}^k \hat{\phi}_j Z_{ja}}}{1 + e^{\hat{\beta}_a(X^a) + \sum_{j=1}^k \hat{\phi}_j Z_{ja}}} - \frac{e^{\hat{\beta}_a(X'_a) + \sum_{j=1}^k \hat{\phi}_j Z_{ja}}}{1 + e^{\hat{\beta}_a(X'^a) + \sum_{j=1}^k \hat{\phi}_j Z_{ja}}} \quad (1.3)$$

在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5)的案例中,样本中每个个体的经济评价从其实际值向负的方向移动了一个单位(典型的经济评价值在一到三个单位之间)。

对样本中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经济投票的平均影响程度的测量,是通过利用等式(1.3)去计算所有样本中的个体来完成的(即使用  $Z_{jik}$  和  $X_{ik}$  的测定值设定  $X'_{ik}$  为较  $X_{ik}$  更糟的类别)。如果选民的经济认知已经在最糟的类别,我们就不再改变它们。<sup>①</sup> 然后,对每个个体的经济投票取平均值,以求得样本中的平均经济投票值,即  $EV_k$ 。预期变化的标准误差,则使用金、托姆兹和詹森·魏腾伯格(King, Tomz and Jason Wittenberg 2000)给出的程序加以模拟。

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采用多项离散选择模型估算我们所分析的选民偏好调查中,每个参与竞争的政党得票的概率(每次调查中平均有四个政党)。与样本中的平均经济投票  $EV_k$  (根据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的得票)不同,多项离散选择模型得到的是  $EV_{kp}$ , 这里  $p$  代表在  $k$  次调查中的特定政党。杜赫和斯蒂芬森使用这一方法,得到了 678 个经济投票影响程度的估值(每一个值对应 165 次被分析的调查中的一个政党)。

图 33.1 给出了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根据 165 次选民偏好调查得出的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的经济投票及其标准误差(请注意,测量的基础是经济评价恶化了一个百分点,因此对当政者投票的影响是负面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性

<sup>①</sup> 我们也计算相反的变化,即除那些经济认知已经最好的人之外,每一位选民的认知都向更好的类别变化。比较两种测量结果,发现经济投票中并不存在不对称性——在两种情况下行政首脑经济投票的规模是一样的(虽然符号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证明了在个体投票模式中寻找不对称性的错误(Lewis-Beck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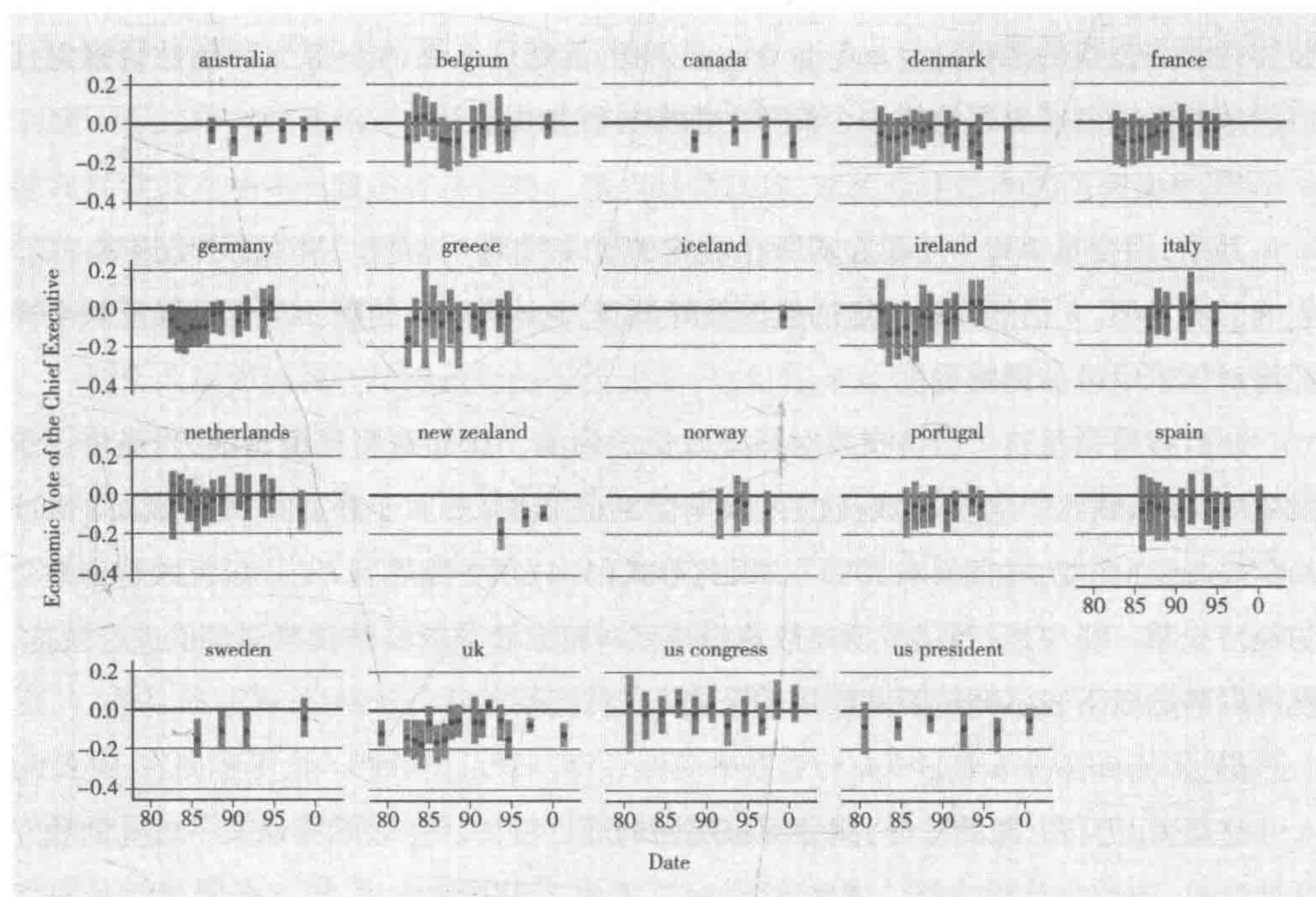


图 33.1 各国行政首脑的经济投票

结论,它非常明确地证明,在发达民主国家中存在经济投票。经济投票的中间值已接近 5%,这表明在一般情况下,随着选民对经济表现回溯性认知的波动,执政的行政首脑所在政党会增加,或减少 5% 的选票。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区别之上,我们会发现有一组国家,它们的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的经济投票通常接近于零,如意大利、荷兰、美国的国会选举就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一批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经济投票值非常高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总统选举、爱尔兰、新西兰和西班牙。

但是经济投票的强度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变化非常明显。例如,美国的经济投票就变化巨大,在 1996 年高至 10%,而在 2000 年的选举研究中又跌至为接近 0。对法国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它们似乎证明了政治中的共栖现象会影响这个国家经济投票的观点(Lewis-Beck and Nadeau 2000)。研究指出,1987 年(第一个共栖的整年)以前法国经济投票的强度在 6% 到 8% 之间变化,随后在 1987 年和 1988 年骤然减少到 3%。1991 年经济投票的强度恢复到 5%,而在 1993 年和 1994 年即第二个共栖时期再度下降。

第二个、但对比较政治学者可能更为有趣的问题,是如何对影响经济投票的环境因素建模。换言之,我们如何解释图 33.1 中经济投票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不稳定



性?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如果我们假定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的经济投票可以很好地模拟整体性经济投票的话(Duch and Stevenson 2007 就是这么做的),那么环境性因素对经济投票的影响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回归方程加以表达:

$$EV_k = a_0 + a_1 C_k + \nu k \quad (1.4)$$

其中,因变量  $EV_k$  (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的经济投票)就是上述测量环境因素 ( $C_k$ )影响的测量值,  $k$  仍然代表特定的选民偏好调查,它决定  $EV$  的值。 $C_k$  也可以反映全球经济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

还有些模型反映了经济投票对特定政党的影响。比如有些模型预期,当经济评价发生变化时,联盟中老资格成员的得票率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联盟中的新成员(Duch and Stevenson 2007, Anderson 1995)。因此等式(1.4)须要施展到  $EV_{kp}$ , 以反映特定政党的经济投票。相应地,利用多项离散选择模型对特定政党的经济投票测量值进行模拟,就可以得出以下表示环境因素作用的公式:

$$EV_{kp} = a_0 + a_1 C_k + a_1 P_{kp} + \nu kp \quad (1.5)$$

这里  $C_k$  仍与上面的一样,测量国家层面的环境特征。 $P_{kp}$  表示描绘某一政党的独立环境变量,如竞争首相职位。这里重要的是,需要运用某些方法,以区分经济评价对竞争这一职位的各主要政党得票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投票选择模型。

经济投票研究中真正有意思的挑战,是如何提出某种理论去指明等式(1.5)中的  $P_{kp}$  和  $C_k$ , 并将它们付诸经验检验。这一尚未完成的任务指出了比较政治学者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能走的路,当然前提是他们仍然采用两阶段的方法为环境因素建模。

## 五、经济投票:一种人为的测量结果吗?

在个人层面测量经济投票发现的不稳定性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理论挑战,但正如我下面会论证的,这毕竟是一个能够驾驭的挑战。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来自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些基于调查的经济投票测量受到严重的度量错误的影响。这一挑战意味着,图 33.1 体现的个体层面经济投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反映客观经济认知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而是一些人为的测量结果。

经济投票模型一般把经济评价视为外生变量,其暗含的假设是它们会反映出客观经济表现的某些方面。但是,对经济的评估说到底还是种态度,对态度形成的研究认为,选民的个性特征会影响“客观的”信息如何形塑他们的经济评价。经济投票的早期研究者之一杰拉德·克莱默(Gerald Kramer 1983)认为,对个人层面经济投票的研究可能有问题,因为个人对经济结果变化的认识,会夸大真实变化中政治的影响。他还指

出,如果个体层面的认知误差与党派偏见或投票偏好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投票的强度还会被进一步夸大。扎勒(Zaller 2004)也在最近重复了上述担忧,他认为,虽然对经济表现不那么带有党派偏见的评估会更容易被媒体接受,但政治老手和党派活动家会拒绝与其党派立场不一致的经济信息。这当然意味着,对民众中的一部分人来说,经济的评价会受到党派偏见的影响。由于政治老手和党派活动家在人群中的分布不同,在某种环境下经济投票的强度可能会被夸大,也可能被低估。

对个人层面的调查结果进行的分析表明,这可能是经济投票研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杜赫、帕尔默和安德森(Duch, Palmer, and Anderson 2000)认为,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经济投票研究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对国家经济的评估已经受到党派倾向的强大影响。埃里克森研究了美国选举研究(ANES)个体层面的调查数据,认为“受调查者对国家经济状态认知的截面差异大部分是随机的,与政治评价无关”(Erikson 2004, 5页)。并且他认为,经济评价和投票选择之间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关系,都是投票偏好的人造物,它决定了个人的经济认知。伊万斯和安德森(Evans and Anderson 2006)分析了英国个体层面的数据集,他们的结论是选民偏好对经济评价的影响,要大于经济评价对投票选择的影响。最后,维莱泽恩、富兰克林和推格斯(Wlezien, Franklin, and Twiggs 1997)在对四个国家经济投票的研究中也发现,选民的投票偏好对他们的经济评价具有强烈影响。因此,经济投票中无疑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但如何全面认识这一问题对个体层面测量的经济投票强度的影响,则还没有任何一致性的结论。

根据杜赫和帕尔默提出的方法(Duch and Palmer 2002),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认识经济评价( $X_i$ )

$$X_i = \lambda_i X^0 + X_i^S + \epsilon_i \quad (1.6)$$

$$X_i^S = f(W)$$

这里  $X^0$  代表对经济的客观评估,  $X_i^S$  则反映因信息和主观因素(即  $W$ )造成的系统性差异,  $\epsilon_i$  是随机因素。在这个形式化的定义中,个人层面的评估包含两种形式的“误差”,即主观考虑和随机性的波动,这两种形式的“误差”都是非态度性因素的来源。正是这种对全国经济评价的系统测量误差可能会人为夸大经济评价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正如克莱默所说(Kramer 1983, 95页):“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真实的经济结果如何影响了投票决定,而不是关于经济的议论或认知中的想象。”关于经济的议论和认知中的想象所造成的扭曲,可以通过  $X_i^S$  反映出来。

如果我们在经济投票模型中纳入对全国经济的评价,且不对系统测量误差( $X_i^S$ )加以控制,那么这种评价会直接受到党派倾向的影响,从而得到一种被夸大的经济认知与投票决定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些,上述形式化的定义通过  $\lambda_i$  和  $X_i^S$  的变

化,以及变量  $\varepsilon_i$  体现群体差别的存在。经济乐观主义或经济悲观主义层面上的群体差异由  $X_i^s$  的变化体现。但是,个体对于经济结果中特定因素的关注也会造成一些群体差异。确切的经济结果( $X^o$ )当然能够包括经济表现的不同方面(如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失业率,等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  $X^o$  视为反映客观经济结果的一个矢量,并根据权重因素  $\lambda_i$  把它纳入经济评价( $X_i$ )中。这一权重因素可以反映经济政策的重点或者倾向性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反映选民对经济的知识或感受方面的不同。

在传统的经济投票模型中,经济评价的系统性测量误差被定义为影响  $X_i$  的那些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与经济政策的结果无关——换言之,这就是  $X_i^s$  与  $X^o$  之间的区别。在极端的内生性情况下,系统测量误差( $X_i^s$ )中的大部分会影响  $X_i$ ,并且与投票选择高度相关,但与经济政策的结果没有特别的关系。例如,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党派偏见影响了经济评价。由于党派偏见也与投票选择高度相关,因此很难说测量误差的问题源自经济评价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被夸大(或被低估)。

一些学者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干脆忽略个人层面的经济投票研究。累积层面的公众舆论分析假定,通过累积的方法可以消除大众政策态度中个体层面的误差(Page and Shapiro 1992, MacKuen, Erikson, and Stimson 1992)。更确切地说,这类累积层面的分析假定等式(1.6)中的  $X_i^s$  和随机因素( $\varepsilon_i$ )的中值都为零。根据上述这些假定,并使  $\lambda_i = \lambda$ ,则个人层面的  $X_i$  的均值就是“完全”从累积层面对民意的测量,它构成了潜在的客观评价。杜赫、帕尔默和安德森(Duch, Palmer, and Anderson 2000)认为,这种方法也并非万能药。他们证明,个人的经济评价包含了系统变化中的主观因素,故而累积不可消除个人层面的误差(即  $E(X_i^s) \neq 0$ )。

因此重要的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内生性问题影响了我们对经济投票强度的测量。通过控制经济评价中系统性和随机性的测量误差,我们可以评估这些误差是否严重影响了对个人层面经济投票强度的测量。有一种方式是从经济评价  $X_i$  中剔除系统测量差错( $X_i^s$ ),这样对经济评价的测量就只包括能够导致经济评价有意义波动的因素( $X^o$ ),以及随机测量误差( $\varepsilon_i$ )。结果就是对  $X_i^{Purged}$  进行测量,即去除系统性测量误差之后的经济评价。

杜赫和帕尔默(Duch and Palmer 2002)认为,经济评价中的测量误差有一种系统构成,其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经济评价受党派影响。杜赫和帕尔默(Duch and Palmer 2002)证明,对国家经济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由党派倾向所决定——这在美国和欧洲都一样。除政治党派之外,受调查者还可能依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区域经济状况对国家经济情况进行评价。从个人和地方经验推断全国性的状况的公民,更容易以

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方式进行经济评价。第二,与此相似,对国家经济的评价还会因为个人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同,以及对政府政策和经济结果熟悉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第三,社会阶级的差异会系统地影响经济评价。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个人会以相当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种经济状况(MacKuen and Mouw 1995)。同样地,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公民,因其对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总体态度不同,对经济的看法也会各不相同(参见关于性别与经济投票的研究,参见 Welch and Hibbing 1992)。

在等式(1.6)中,系数( $\lambda_i$ )随个体不同而变化。变化的原因,是由不同个人组成的不同群体,关注的是经济表现中不同的方面。这些不同由  $\lambda_i$  表示。这一“与政策相关的变量”显示了经济评价中的差异,它表明利益不同,则对经济表现的评价标准也不同;或者说,因个人对经济政策或者经济重点的理解不同,他们的经济评价也会不同。例如,那些更注重降低通胀率而非维持较低失业率的个人(如有固定收入的退休人员),在对国家经济进行评价的时候,会更强调物价的稳定而不是工作机会的增加。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有三个因素造成了系统性测量误差:政党认同(PID)、信息及社会经济地位(SES)。这样,  $X_i^{Purged}$  可以表示如下:

$$X_i = a_1(PID) + a_2(Information) + a_3(SES) + a_4(Policy) + \varepsilon_i$$

$$\hat{X}_i^s = \hat{a}_1(PID) + \hat{a}_2(Information) + \hat{a}_3(SES) \quad (1.7)$$

$$X_i^{Purged} = x_i - \hat{x}_i^s$$

投票概率是等式 1.1 的修改版:

$$V_{ik} \sim Bin(\pi_{ik}) \quad (1.8)$$

$$\text{logit}(\pi'_{ik}) = \beta_{ok} + \beta_{ik} + X^{Purged} + \sum_{j=1}^{J_k} \phi_{jk} Z_{jik}$$

根据这个等式,经济投票的强度是  $EV'_{ik}$ 。图 33.2 比较了分别根据等式(1.8)和(1.1)得到的经济投票强度,前者运用了去除系统性主观因素( $EV'_{ik}$ )后的经济评价,后者则采用了  $X_i$ 。根据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的经济投票测量样本,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由主观因素带来的、与客观经济无关的系统性测量误差,对经济投票强度的测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也有一些测量,其中主观因素发生了影响,但总体结果仍然表明,在  $EV'_{ik}$  与  $EV_{ik}$  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研究经济投票,是因为它使我们了解个人是如何作出投票决定的。我们的兴趣并非单纯地推断选举结果。关于内生性问题的争论在于,是否政策结果上的短期波动对主观评价产生了某些独立的影响,或者是否党派倾向从根本上决定了公众意见(至少是民意测验中表达的公众意见)。如果在个人层面对经济评价进行测量存在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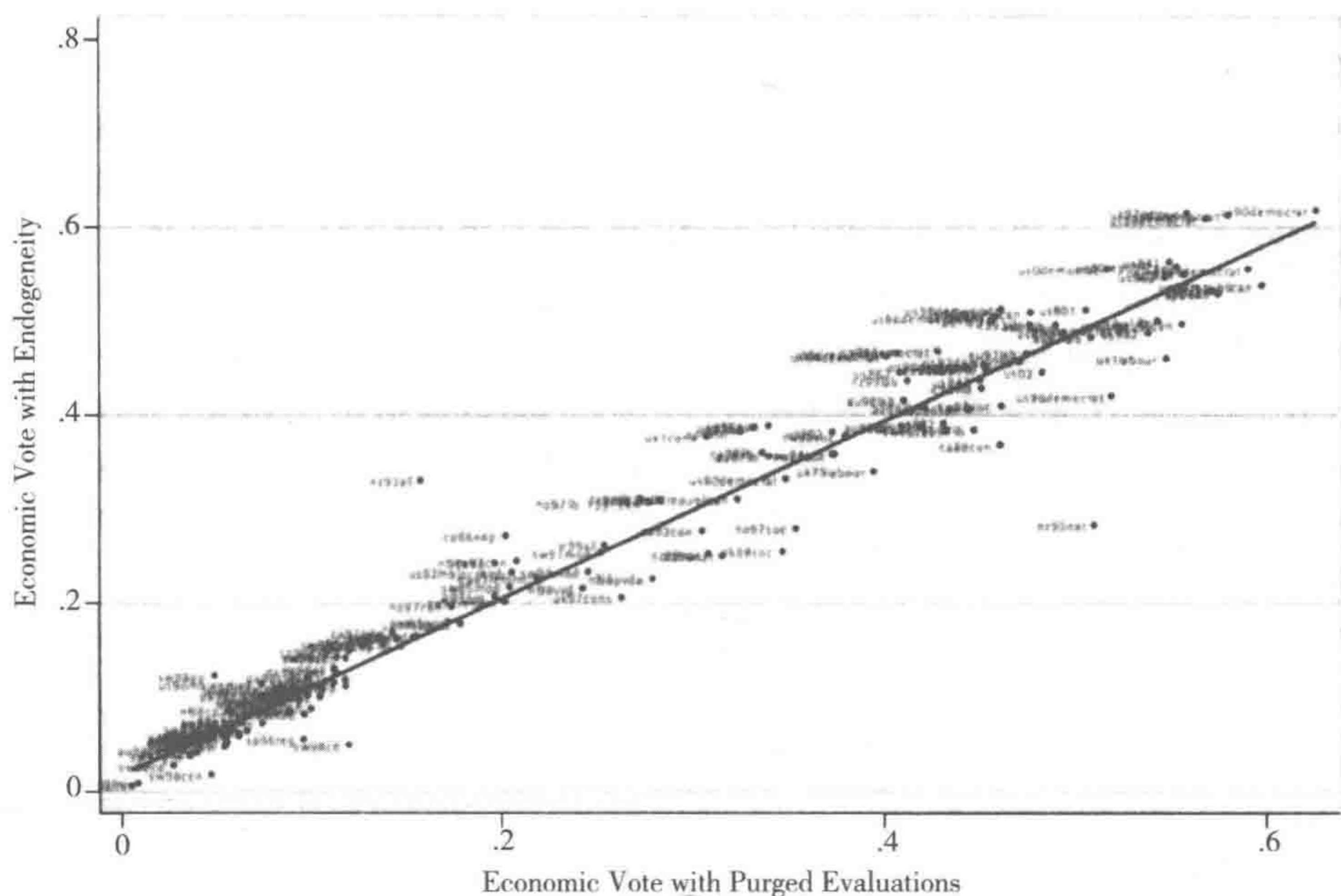


图 33.2 去除系统性测量误差之后的经济选举

本无法解决的内生性问题(如埃里克森所言),那么这对于了解个人如何运用信息作出投票决定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洞见。它表明,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在形成有关经济表现的意义的过程中,政党倾向或者其他的主观因素从根本上扭曲了他们关于经济结果的“客观”信息。

这一部分提供的证据实际上反驳了这一观点。因为大多数选民关于经济的“客观”信息的确在超越党派倾向的情况下影响着他们经济的评价。没有证据表明,内生性问题使个体层面经济投票的测量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也说明,我们在跨国和跨时段研究中发现的经济投票的环境差异,并非系统性测量误差的人造物。总的来说,虽然内生性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观经济评价,但从图 33.2 表明情况来看,它对经济投票随环境产生的变化并不形成系统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评价仍然是研究比较经济投票的学者们首要的关注对象。

## 六、调适回溯性模型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对 163 个选举调查的分析清楚地证明了经济投票的重要性。他们确认了经济投票强度随环境发生的变化,但同时也驳斥了那些认为内生性问题使经济投票强度无法测量的观点。对于比较政治学者们来说,挑

战在于如何解释这种由环境性因素导致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投票方面美国的研究和比较研究都是一种对回溯性模型进行反复调适的过程,目的是说明环境对经济表现的认知所产生的“噪音”。

希布斯(Hibbs 2006)指出,经济评价中克莱默(Kramer 1983)所谓的“变量误差”概念,如等式(1.6)所体现的,可以用来模拟当政者经济表现信噪比中的环境性变化。根据这一思路,环境因素随着经济结果中与政治相关的成分的多少而变化。就等式(1.6)而言,它意味着经济评价( $X_i$ )中系统测量误差( $X_i^s$ )的比率较高。当经济结果中与政治相关的成分( $X^o$ )与( $X_i^s$ )相比较小时,选民偏好函数中通常的经济评价测量方法就会包含相当程度的错误。因此,在执政联盟特别复杂的时候,或者宏观经济受到较大外部冲击的环境下,选民的经济评价中与政治相关的部分所占比重就会降低。如希布斯(Hibbs 2006)所证明的,在对经济评价进行测量时较高程度的误差,会导致投票等式中经济评价系数向下偏倚。因此,当宏观经济结果中与政治相关的成分较少时——反映在使用总体经济评价时出现了较高的测量误差——经济评价与投票选择之间的相关性就较低。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信噪比的变化确实影响经济投票的强度。鲍威尔和魏腾(Powell and Whitten 1993)提出了一种制度“责任明晰化”测量的手段,用来观测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当政者逃避经济结果的责任(主要政党投票的一致性,立法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反对党分享权力,两院制,联合政府以及少数派政府)。通过采用这一责任明晰化指标,再结合累积投票分享模式中对经济表现的测量,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对政府统一控制决策过程的感知度越高,他们把经济和政治结果的责任归于政府的可能性也就越高。”(Powell and Whitten 1993, 398 页)

帕塞克和拉德克里夫(Pacek and Radcliff 1995)研究了 27 年来 17 个西方民主国家福利政策对经济投票的影响。他们发现,较高级别的福利支出会压缩社会层面的经济投票。黑尔维格(Hellwig 2001)分析了一组由 9 个人层面的选举调查构成的样本,并引入了包括经济环境(经济独立性)和鲍威尔与魏腾(Powell and Whitten 1993)所使用的制度变量在内的环境测量。他证实,政治制度在调节经济投票强度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实也证明,一些经济变量,如国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与黑尔维格相反,谢夫(Scheve 2004)发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增强缓和了外部冲击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这让选民在投票决定中更注重经济因素。艾贝德和罗登(Ebeid and Rodden 2006)近期的工作解释了美国经济投票中的环境性变化。他们发现,如果国家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商品市场的影响,那么这些国家经济投票的强度就会降低。

另一方面,一些试图扩展或者在经验上证实责任明晰度的努力却并不成功,它们得到的经验发现或者互不关联,或者变动不居。例如,查佩尔和维加(Chappell and Veiga 2000)考察了1960—1997年间136次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他们发现通胀(与欧洲的平均水平相比)会影响投票结果,但并未发现责任明晰度有同样的影响。罗伊德、莱登和鲍雷利(Royed, Leyden, and Borrelli 2000)特别质疑鲍威尔和魏腾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政府责任明晰度的理论——他们宣称,实际上联合政府经济投票的强度比单一政党政府还要高。<sup>①</sup>

不过更重要的是,从经验上证明责任明晰度理论的努力表明,环境条件可能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放大了经济评价中的噪音部分( $X_i^s$ )。对经济投票中环境变化的经验研究说明,选民对经济表现的反应要比回溯性模型反映的更为微妙。这方面一项重要的发现来自安德森(Anderson 1995),他把明晰性概念用于每月人气数据,而非选举数据。虽然他只对五个国家进行了研究,但他的经验分析明确显示,“经济变化中政府的责任越明显,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就越强”(Anderson 1995, 210页)。看来,经济投票强度的变化并不仅仅是信噪比的函数,而更是选民对各政党达成经济结果方面的能力进行非常细致的区别的结果。

所有这些广义上的比较研究的努力表明,选民并不仅仅如经济投票的道德风险模型所预示的那样,通过奖励或者惩罚政府进行政治参与。实际上我倾向于认为,这些经验研究,在运用类型各异的累积和个体层面的数据的基础上,证明了选民信号提取的努力更集中于政党产生某些经济结果的能力上面。费尔龙(Fearon 1999)以逻辑的方式令人信服地证明,一旦我们承认选民对政党能力有所考虑,那么选择动机就会主导投票决定。这表明,要对信噪比的变动,或者责任的明晰度进行解释,仅仅依靠调适回溯性模型进行是不够的。这也正是最近一系列学者相继表达的观点(Duch and Stevenson 2007; Fearon 1999; Cheibub and Przeworski 1999),下一部分将对此进行详尽的论述。

## 七、理性以及对经济投票的再思考

至此,讨论已经触及投票选择中一个经验之谜的某些有趣的方面。经济评价显然或多或少会发挥作用,虽然这要取决于政治环境。上述经验模式中有一些证据表明,环境影响了选民将经济结果的责任归于某个特定的政党。而且,最终也有证据支持,选民

---

<sup>①</sup> 当然,Palmer and Whitten 2003a 和 2003b 的研究有力地反驳了罗伊德、莱登和鲍雷利的观点。

们进行着信号提取,并通过利用环境因素确定当政者促成经济结果的总体能力。我认为对比较政治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到某种方法,把这个谜的片断拼合到一起。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挑战,须研究者们重新考虑投票选择的微观模型,旨在理解环境特性是怎样影响投票选择功能的。

人们可以想象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提出了一种与上述回溯性模型不同的方法。这是一种经济投票的环境模型,它假定选民是理性的,他对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充分的了解。根据这一方法,他们设计了一个严格的微观模型,以确定在影响投票选择方面哪些信息是相关的,它们又如何被使用。他们认为,为理解经济投票的不稳定性,我们需要一种更为清晰的理论来说明选民是如何把他们的经济投票与政治和经济环境联系起来的。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提出的经济投票模型建立在三个重要的理性假设基础之上:选民有合理的预期、他们对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了解、个人是策略性的而非真诚的或表现型的选民。

理性预期理论表明,同样的理性假定应该与预测相关,后者则典型地与静态决定相关。换言之,理性预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面向未来的决定和静态的决定,特别是在个人使用信息的形式方面。<sup>①</sup>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传统的经济投票模型具有很强的回溯性特征。选民预期的功利算计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取决于对当政者表现的回顾性评价。但如果选民依据理性行动的话,他们应该在信息已定的情况下,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并以乐观的方式形成他们的预期。佩尔森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以及阿利西娜和罗森塔尔(Alesina and Rosenthal 1995)提出的经济模型都明确包含了理性预期的因素,并非常好地展示了经济投票模型中理性预期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结论,即经济投票的刺激因素是选民们所具有的如下关注:如何选择或者认定一位候选人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

他们的结论可以用如下等式表示:

$$E[u_{i,t+1} | v_i] = \left( \frac{\sigma_\mu^2}{\sigma_\mu^2 + \sigma_\xi^2} \right) (y_{it} - \bar{y} - \mu_{i,t-1}) \quad (1.9)$$

其中, $E[u_{i,t+1} | v_i]$ 是在给定经济条件下,理性的投票者为执政党*i*投票所获得的效用; $y_{it}$ 是政党*i*执政的*t*时间段中的经济增长率; $\bar{y}$ (上划线)是自然增长率; $\sigma_\mu^2$ 是执政者能力影响下的经济变化(我们可以将其设想为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相关的、对宏观

<sup>①</sup> 如 Cukierman and Meltzer 1986; Rogoff and Sibert 1988; Rogoff 1990;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 以及 Alesina and Roubini 1999。



经济造成的预料之外的震动);  $\sigma_{\xi}^2$  则是在没有政治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未曾预见的外部冲击,它超出了政治决策者的控制之外)。

这一结果表明,选民在什么时候能够从以往的经济变化中提取信息,以对当政者当下的能力进行判断,并且进行经济投票。 $y_{it} - \bar{y} - \mu_{it-1}$  一项表示所观察到的经济表现减去其原因能够被选民得知的那一部分经济增长,它反映的是当政者“最近为选民做了什么”(比如,去除当政者在前一个阶段已知的能力水平对经济所发生的影响之后,现阶段的经济情况与自然增长率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将该项的系数,即  $\frac{\sigma_{\mu}^2}{\sigma_{\mu}^2 + \sigma_{\xi}^2}$  理解为选民能够从经济中观察得出的“能力信号”。这一“能力信号”永远是正值,当随机(非政治的)变化对经济的冲击,即  $\sigma_{\xi}^2$  为 0 时,它将接近于 1。在这种情况下,选民能够了解,高于或者低于自然增长率的增长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能力。因此,除去自然增长率的数据能够准确反映政府是有能还是无能。一般来说,如果  $\sigma_{\mu}^2$ , 即能力项  $\mu_{it}$  的变化,与增长中非政治的成分  $\sigma_{\xi}^2$  高度相关,那么经济变化就会成为当政者能力的强信号,选民在进行效用计算时,就会更加看重过往的经济状况。或者说,如果观察到的经济增长更有可能来自非政治的影响而非当政者能力,即当  $\sigma_{\xi}^2$  与  $\sigma_{\mu}^2$  高度相关时,高于或者低于自然增长率的增长就只能为当政者的能力提供微弱的信号。

选民的经济预期中当政者能力信号的存在表明,他们能够使用相关信息进行判断,在经济结果的变化  $y_{it} - \bar{y} - \mu_{it-1}$  中多少是由当政者的能力而非外部冲击造成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因为它从理性行为者模型出发,解释了经济投票强度的变化。正如上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研究经济投票的比较政治学者面对的困惑就是如何解释经济投票强度的巨大变化。人们在解释这些变化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选民方面的信息匮乏或者信息混乱上面。能力模型则认为,经济投票的强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是因为政治的、非政治的,以及外部的因素对宏观经济结果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即环境发生变化。选民们能够抽取这类信息,并以理性的方式利用它来衡量经济结果。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证明,能力信号  $\frac{\sigma_{\mu}^2}{\sigma_{\mu}^2 + \sigma_{\xi}^2}$  完全能够涵盖与经济投票的跨国变化典型相关的主要环境因素,特别是经济、政治和制度性的环境效果。这些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了选民将外部冲击与政治能力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区分开来? 环境特征系统影响了或者政治能力的变化,或者外部因素的变化。人们是否接受这一理论另当别论,它毕竟相当好地表明,理论,特别是与选民一方个体层面的理性思考相关的理论,能够(我认为是必须)为经济投票环境变化的经验研究提供指导。因

此,认为政治或者经济环境的某一具体特性对经济投票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一回事,认为环境会有助于,或者有碍于选民提取信息是另一回事。比如,一个政党把责任完全集中于自己手里就能够增加经济投票吗?杜赫和斯蒂芬森理论(Duch and Stevenson 2007)的优势就在于,这只是从他们的能力信号模型导出的诸多假设之一:执政联盟的权力分享减弱了经济因素在投票选择中的重要性,这不过是因为它让选民把他们观察到的经济变化更多地归因于外部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的模型解释了三个主要的环境变量是如何影响经济投票的:对经济的政治管控、管理责任,以及策略性投票。

### 7.1 对经济的政治管控

正如我在本章开端处所言,我对经济投票的兴趣受到一种更为广泛的理论和经验兴趣的激发,那就是环境如何影响了选民对政党表现(显然包括执政当局)的评价和投票选择之间的联系。理解这一“影响”对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都很重要,对那些探讨不断变化的政治对经济控制的特性,以及它对民主回应制的影响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关于全球化,或者国有经济私有化对民主回应制的影响,人们常常提出一些比较宽泛的观点,包括环境因素(经济的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了选民评价与投票选择之间的关系。这类观点中有很多都暗含了一个微观的模型,以说明什么因素影响了投票决定,以及这些因素在投票选择中的重要性又如何受制于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些微观机制很少得到澄清,并且接受经验验证。经济投票的环境变量模型可以说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们关注普遍认为对投票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认知;它们也具体说明了选民们如何利用关于环境的信息,来决定这些经济评价在投票选择中的重要性。下面的例子是有关全球化和民主回应制之间关系的论点。

关于全球化与民主治理的观点认为,选民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是经济结果的产生到底是来自经选举产生、并且对他们负责的决策者的行为,还是来自他们无法通过选举使之负责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体的推动。这类观点假定,选民们能够判断国民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是来自选举产生的决策者行为(如减税),而非与国家政府官员无关的决定(外部经济体施加的贸易壁垒)。这暗示了一种经济投票模型,据此,选民将运用他们使用关于这一环境的信息(对国内经济的全球性影响)调节他们的经济投票。与典型的经济投票模型相比,这一模型中的选民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这里的挑战是提出一种具体的模型,以说明这些环境因素以何种方式进入了一位受工具理性支配的选民的选择过程。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采用的方法是从等式(1.9)中导出另一个方程,以包含制度环境对选民能力认知的影响。这一修正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决策者,他们分别称之为“依赖选举的决策者”(EDDs)和“不依赖选举的决策者”(NEDDs)。第一类(EDD)指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组成国家政府以及对政府负责的官僚机构。第二类(NEDD)可以指除此之外的任何人,只要他们的决定能够对经济产生影响,具体包括个人、企业、利益集团、不受选举影响的官员、外国领袖、WTO,等等。能力冲击仅与依赖选举的决策者的决策相关,而外部冲击则与其他任何人的决策相关。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导出的与等式(1.9)类似、能够包含制度环境对当政者能力信号的影响的算式是:

$$E\left[\sum_{i=1}^{\alpha}\mu_{it+1} | v_i\right] = b\left(\frac{\alpha\sigma_{\mu}^2}{\alpha\sigma_{\mu}^2 + \beta\sigma_{\psi}^2}\right) (y_{it} - \bar{y} - \sum_{i=1}^{\alpha}\mu_{it-1}) \quad (1.10)$$

当等式(1.10)中预期效用为正时,选民们会更倾向于为当政者投票。 $y_{it} - \bar{y} - \sum_{i=1}^{\alpha}\mu_{it-1}$ 这一项与上面类似,表示经济表现中减去选民了解其来源的部分,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有一个针对每个EDD(依赖选举的决策者)的独立效用项,对其加总就是 $\alpha$  EDDs。我们可以把这一项的系数,如 $\left(\frac{\alpha\sigma_{\mu}^2}{\alpha\sigma_{\mu}^2 + \beta\sigma_{\psi}^2}\right)$ 理解为“能力信号”,它表示选民从可观察的总体经济运行能够得到多少有关当政者能力的信息。这一能力信号的分子表示整体能力冲击的变化,它由与单个决策相关的能力冲击分布情况的变化与依赖选举的决策者的决策数量相乘而来( $\alpha\sigma_{\mu}^2$ )。我们在分母中增加了一项,以反映外部冲击的整体变化,它是与单次决策相关的外部冲击分配情况的变化与由不依赖选举的决策者的决策数量相乘的结果( $\beta\sigma_{\psi}^2$ )。

假设 $\sigma_{\mu}^2$ 和 $\sigma_{\psi}^2$ 在所有环境下不变,那么政治和经济制度对能力信号强度(以及最终对经济投票)的影响必然通过上述等式中 $\alpha$ 和 $\beta$ 的差异体现出来。能力信号的分子反映能力冲击的整体变化( $\alpha\sigma_{\mu}^2$ ),这意味着如果扩大EDD作出的导致某种经济后果的选择的数量,则这一项的值就会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EDDs作出了更多能够影响其经济增长道路的决定的国家,外部冲击的整体异化会更大。类似地,在影响增长的决定更多由NEDDs作出的国家,外部冲击的整体变化也会更大。

在对不同环境下整体能力信号进行比较时,每个环境下NEDDs与EDDs的比例能够决定他们的能力信号的相对大小。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证明,当 $\alpha$ 和 $\beta$ 取自能力信号较强的环境(有更多的EDDs),而 $\alpha'$ 和 $\beta'$ 取自能力信号较弱的环境(有更多的NEDDs)的时候,能力信号较强的环境中NEDDs与EDDs的比例一定

小于它们在能力信号较弱的环境中的比例<sup>①</sup>：

$$\left(\frac{\beta}{\alpha} < \frac{\beta'}{\alpha'}\right) \quad (1.11)$$

要确定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整体能力信号的相对影响,只需要了解这些比例的数值。

这一结论清楚地表明,全球性的变化是怎样进入个人层面与投票选择相关的考量的。选民们能够区分出两类决策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相对影响,一类来自国内依赖选举的决策者,另一类来自不依赖选举的决策制定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与国际环境相连(其他国家选举的官员、跨国公司,或者国际组织与国际协议)。全球化影响了民主治理,是因为它减弱了当政者的能力信号,并因此降低了经济因素在投票选择中的重要性。

可以以贸易开放为例。日益增加的贸易流减弱了 EDDs 对宏观经济政策结果的控制,也使国内经济的结果受到 NEDDs,特别是外国的决策者的影响。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经济体累积起来的需求受制于外部需求,也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而后者并不受国内决策者的影响。大量进口商品的经济体会受到通胀(或紧缩)的冲击,而这也在国内政府官员的控制范围之外(Cameron 1978)。开放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往往比封闭经济体更为集中,这也增加了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并使在任的决策者难以控制(Rodrik 1998; IMF 2005)。罗德里克(Rodrik 1998)提供的经验数据清楚地表明,经济越开放,GDP 增长的不稳定性就越大。<sup>②</sup>

因此,在开放经济体中,影响宏观经济的 NEDDs 的数量应该大于封闭经济体(即  $\beta_{cl} < \beta_{op}$ ),同时在开放经济体中 EDDs 的数量应该保持恒定,或者小于封闭经济体(即  $\alpha_{op} \leq \alpha_{cl}$ )。这样我们可以预期,在封闭经济体中,NEDDs 与 EDDs 的比值会更小。

$$\frac{\beta_{op}}{\alpha_{op}} > \frac{\beta_{cl}}{\alpha_{cl}} \quad (1.12)$$

它表明,在受全球经济影响的经济体中,整体能力信号较弱;而开放经济体中,较微弱的能力信号则将导致较低水平的经济投票。<sup>③</sup>

① 这一结论得自以下推演

$$\left(\frac{\alpha\sigma_{\mu}^2}{\alpha\sigma_{\mu}^2 + \beta\sigma_{\psi}^2}\right) > \left(\frac{\alpha'\sigma_{\mu}}{\alpha'\sigma_{\mu}^2 + \beta'\sigma_{\psi}^2}\right)$$

$$\left(\frac{\beta\sigma_{\psi}}{\alpha\sigma_{\mu}^2} < \frac{\beta'\sigma_{\psi}}{\alpha'\sigma_{\mu}^2}\right)$$

$$\left(\frac{\beta}{\alpha} < \frac{\beta'}{\alpha'}\right)$$

② Gavin and Hausmann 1996 提供了关于发展中国家这一效应的证据。

③ 艾伯德和罗登(Ebeid and Rodden 2006)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各省和州的结构特征不同,这一效应在次国家层面可能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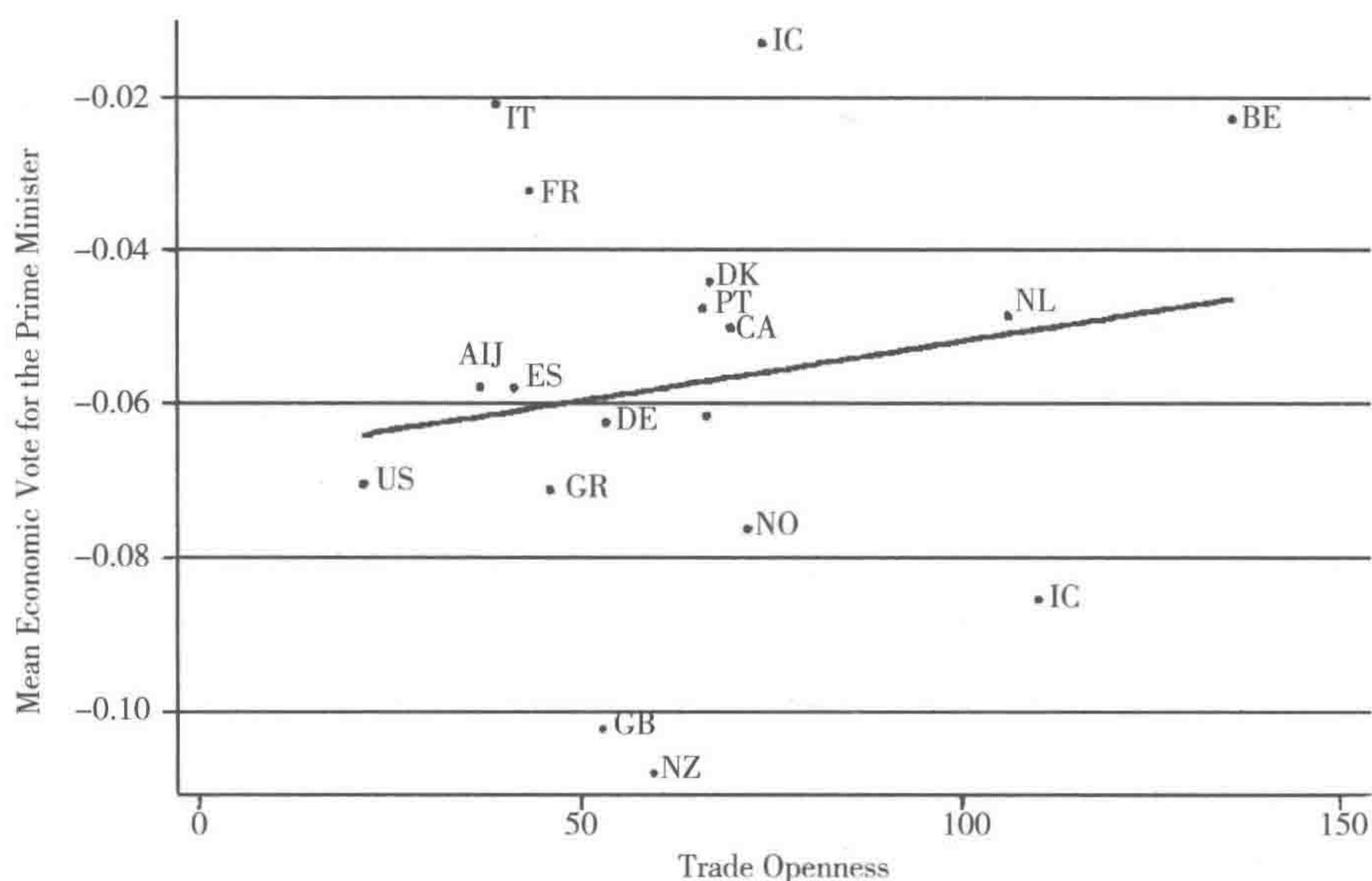


图 33.3 贸易开放性与议会政党的经济投票

杜赫和斯蒂芬森 (Duch and Stevenson 2007) 使用世界银行对贸易开放性的测量标准, 即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 (World Bank 2004), 检验了上述观点。图 33.3 反映了根据这一贸易开放性标准得出的行政首脑的经济投票情况 (请注意较高的经济投票负值表示高水平的经济投票)。首先, 非常清楚没有证据证明开放经济体的经济投票水平较高, 这否定了一些学者的看法 (如 Scheve 2004)。实际上, 经济的开放性会大大降低经济投票的水平。这也支持了如下的论断, 即开放经济体的能力信号比封闭经济体更弱, 并因此导致了较低水平的经济投票。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经济一体化的增强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特征的变化, 对民主回应制的测量变得日益重要。经济投票是多种投票选择模型中的一种, 它能够用于探知民主回应制。通过对环境因素如何影响投票选择进行严格的理论和经验考察, 研究经济投票的比较政治学者能够对这一论题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 7.2 管理责任

上一个小节认为, 选民能够了解对选举负责和不对选举负责的决策者之间责任是如何分摊的。这有助于说明一般选民如何提取信号的问题, 而且最终也可以解释经济投票依环境而发生的变化。在很多 (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 发达民主国家, 多个政党分担了管理, 或者说行政责任。其他合法政党对管理责任的分担也会对能力信号, 乃至经济投票的强度发生影响。

在比较经济投票的研究文献中有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观点, 认为与一党执政的简

单情况相比,联合执政的“复杂性”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经济投票的跨国变化(Powell and Whitten 1993)。但是,除了把联合执政的环境下较弱的经济投票归因于选民无法分清责任所在之外,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些经验上的发现提供较好的理论基础。用责任明晰度来解释经济投票强度的差异,意味着选民缺乏足够的信息,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对决策的责任并不清楚。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模型中的理性假设排除了选民方面存在任何困惑或信息不足的情况。或者说,他们假定选民完全了解联合政府中管理责任的分担状况。因此他们认为,选民在政府能力方面得到的并非模糊不清的、甚或错误的信号,相反,在不同政党之间如何分担管理责任的问题上,他们已经得到了相当准确的信息。在他们的模型中,管理责任的分配比例由  $\lambda_{i,t}^2$  来代表,是每个政党承担的管理责任值的平方。测量这个数值的一种方法就是计算某个政党所占内阁席位的百分比。这样,在一党多数政府中, $\lambda$  等于 1;而在一个由  $n$  个政党平均分享席位的内阁中, $\lambda$  就等于  $1/n$ 。<sup>①</sup>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由此得出一种包括“责任”因素在内的能力信号,它以以下方式通过被感知的政府经济表现影响选民的效用:

$$E[\mu_{g,t} | y_{g,t}] = \left( \frac{\sigma_{\mu}^2 \sum_{ie \in g} \lambda_{i,t}^2}{\sigma_{\xi}^2 + \sigma_{\mu}^2 \sum_{ie \in g} \lambda_{i,t}^2} \right) (y_{g,t} - \bar{y} - \mu_{g,t-1}) \quad (1.13)$$

这一结论假定,政府在给定时期的总体能力( $g$ ),就是各执政党能力的加权平均数,权数即政党承担的管理责任的量。每个执政党在时段  $t$  的权重是  $\lambda_{i,t}$ , 权重相加等于 1。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5)证明,当管理责任高度集中,即由一个政党管理经济政策时,能力冲击一项会达到最大值;而在管理责任由内阁中各政党平均分担的情况下,政治冲击这一项,即  $\sigma_{\mu}^2 \sum_{ie \in g} \lambda_{i,t}^2$  会达到最小值。

这一结论给出的预期,与“责任明晰度”理论类似,虽然这里提出的责任加权的能力信号理论的基础,是选民完全了解议会内各政党管理责任的分担情况。据此,单一政党多数政府的经济投票水平将会是最高的——典型的例子如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联合政府,特别是内阁席位由各政党分享的政府,其能力信号会比较弱,因此经济投票的水平也会比较低。<sup>②</sup> 图 33.4 以图 33.1 反映的行政首脑经济投票强度为基础,它把管

①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实际上还提出了一种广义的管理责任测量方法,它包含了与立法机关中的反对党相关的管理责任,但是为了简化讨论,我这里仅讨论基于内阁席位的狭义的方法。

② 管理责任除了被表达为政党在内阁中所承担的责任之外,还有更为广义和宽泛的表达方式。它可以包括例如反对党在一个有效的立法委员会系统中承担的管理责任。杜赫和斯蒂芬森在 2007 年总结了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内的所有政党所分担的管理责任的程度,并得出了上述结论。

理责任的集中程度,即等式中的  $\sum_{ieg} \lambda_{i,t}^2$  项,分为 4 个级别,并对它们相应的经济投票强度进行了比较。这里能够得到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在管理责任高度集中——即管理责任集中度较高(大于.7)的情况下,经济投票的水平也比较高。如果管理责任被较大数量的政党分担,即集中度低于.7,则经济投票水平就会比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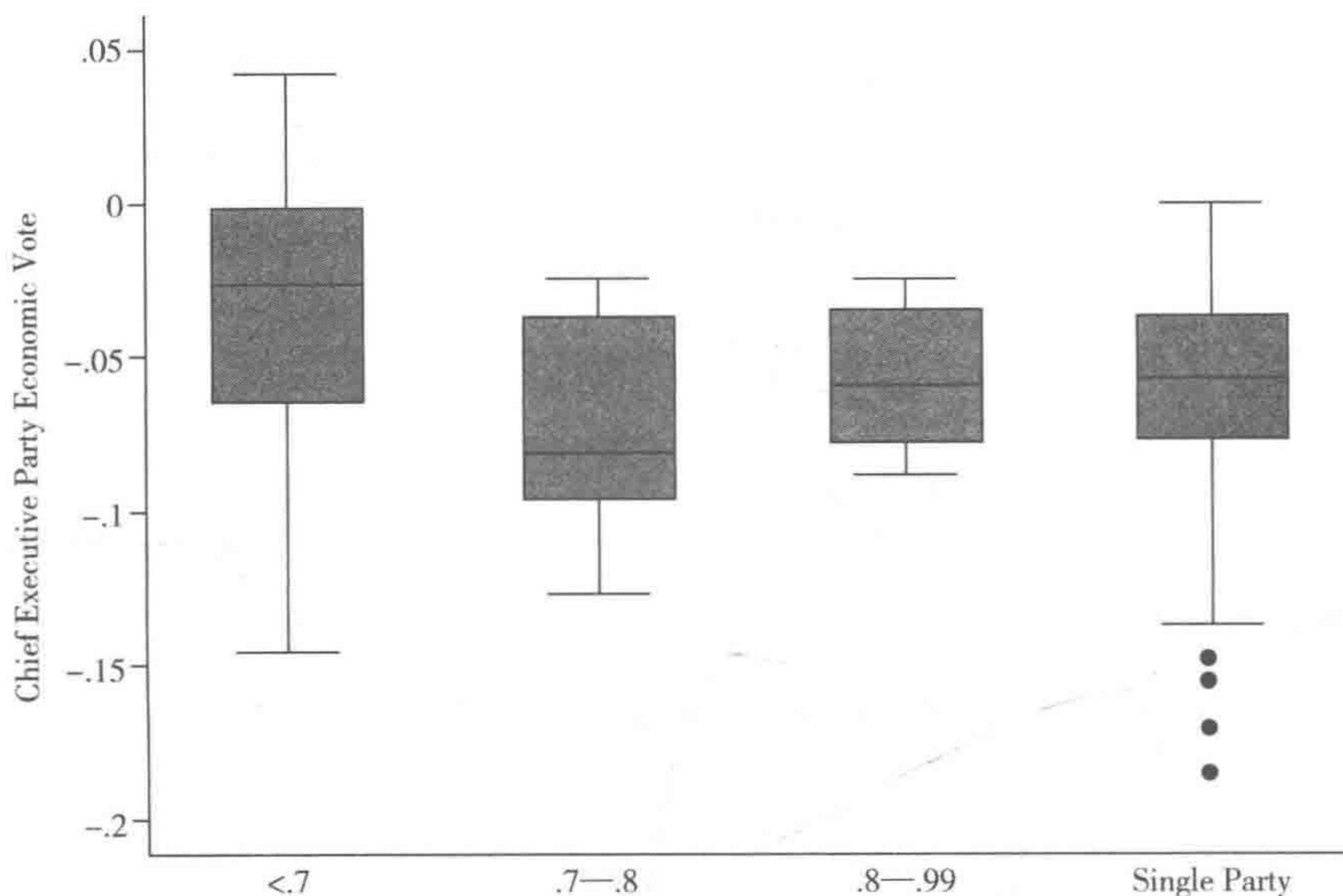


图 33.4 管理责任集中度和行政首脑所在政党的经济投票

### 7.3 竞争和策略投票

学者们普遍认为,候选人之间相互竞争的性质,以及策略投票的动机(当然它们都会随政治环境而变化),都会对在选举中竞争的政党的投票效用产生影响。因此比如说,为德国自由民主党投票可能会影响选举后形成的政府形式,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选民在考虑投票选择的效用时会注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假定选民们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一假定与对经济投票的大多数研究相一致),那么他们就会对选择制度,以及各政党相互竞争的性质作出策略性的反应。麦克凯维和奥德舒克(McKelvey and Ordeshook 1972)提出了一个决策理论模型,以反映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选民的考量:

$$E[\mu | v_j] - E[\mu | v_o] = \sum_{j' \in J} P_{jj'} (\mu_j - \mu_{j'}) \quad (1.14)$$

在此,  $J$  是立法机构中所有政党的集合,  $E[u | v_j]$  是为政党  $j$  投票的预期效用,  $E[u | v_o]$  则是弃权的预期效用,  $u_j$  和  $u_{j'}$  分别代表政党  $j$  和  $j'$  赢得选举后的效用。  $P_{jj'}$  是“中轴概率”,它被定义为政党  $j$  和  $j'$  在多党竞争中为胜出而结盟的概率。请注意,加号下面标注的是参与竞争的所有政党。选民会为  $E[\mu | v_j] - E[\mu | v_o]$  值最大的政党投票。

这意味着为一个政党投票的行为,只能通过改变选举结果来改变选民的效用。某

一政党得到的每张选票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通过这张选票在该政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竞争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概率加以表示。这样,选民为某一政党投票的预期效用,就是他的那一票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所有形式的和乘以每一种关键投票能够带来的效用的积。

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认为,选民与他们所感知的相互竞争的政党的经济表现相联系的预期效用(这是经济投票模型的典型特征),必须通过类似等式(1.14)的方式,由一张选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概率加以限定。这也就是说,在等式(1.9)表达的预期效用计算中,加入一个反映中轴概率,或者说每张选票的决定性意义的项目,这就得到了为政党*j*投票(而非弃权)的预期效用:

$$E[\mu|v_j]-E[\mu|v_0]=b(y_{g,t}-\bar{y}-\mu_{g,t-1})\sum_{g'\in A}(p_{j,gg'}-p_{j,g'g}) \quad (1.15)$$

在这个简化的例子中有两个可能的结果:在任政权(*g*)或者挑战者(*g'*)。假设选民对与挑战者相关的预期经济结果没有任何信息,即 $E[\mu_{g',t+1}]=0$ 。我们应该记得如果 $y_{g,t}-\bar{y}-\mu_{g,t-1}$ 为正值,这表明选民在选举周期*t*时段内感受到了一种对经济的正向冲击。等式(1.15)右边加总符号后面的最后一项,反映的是这一被感知的经济表现对策略性投票的影响程度。 $p_{j,gg'}$ 表示*g*和*g'*两个内阁联合参选,然而选民只为*j*党投票从而仅选择*g*内阁的概率; $p_{j,g'g}$ 则表示*g*和*g'*联合参选,然而选民只为*j*党投票从而仅选择*g'*内阁的概率。

如果选民感受到与现政权*g*相联系的积极的经济冲击,那么为政党*j*所投的票会打破联盟,并对*g*而非*g'*有利,同时这一积极的经济冲击会使为政党*j*投票而非弃权产生积极的效用。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现任执政联盟*g*一定会取胜(或者反对党联盟*g'*一定会取胜),即上述表达式中的“中轴概率”为零,那么经济情况就不会对选民为*j*党投票而非弃权的效用产生影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党执政。例如,在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由于当时的在任总统希拉克一定会取胜,所以经济评价肯定不会对投票选择产生影响。与此类似,在2001年的英国选举中,人们普遍认为工党能够轻易获胜,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在其中发现经济投票的迹象。

这一理论上的结果也可以引申到多党环境下某些特定政党得到的经济投票。结论之一就是,那些长期执政的党,如比利时和荷兰的基督教政党、爱尔兰共和党,或者德国自由民主党得到的经济投票,会比它们的内阁伙伴更低。这里暗含的逻辑,是对每次选举后政党构成都不变的内阁,与选举后会发生变化,但有一个或者有可能是多个政党始终参与的内阁进行区分。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长年执政的党总是能够进入执政联盟。比如说,至少在1994年之前,如果没有荷兰基督教民主党(或者它在1977年之前的前身)的参与,任何内阁都没有可能组建起来。由于为此类政党投票不



会对政府的组建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从理论可以预期,它们得到的经济投票水平会相当低。

这一策略投票理论导致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它得出的预期经济投票的强度,与只关注执政党管理责任的理论并不一致。上一节的讨论表明,分担管理责任会带来更高层次的经济投票,而其他学者,如安德森(Anderson 1995)也认为,一个政党的经济投票应该与它在执政联盟中为经济结果承担的责任相关。但是,对那些长期执政,而且在联合政府中占据了大量职位的政党——如荷兰的基督教党和爱尔兰共和党来说,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的理论预期它们只能得到非常低水平的经济投票,而政党责任理论的结论则相反,即它们会得到高水平的经济投票。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凸显了能够对杜赫和斯蒂芬森理论进行关键性检验的环境因素。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政党承担了较多的管理责任,所以理应得到较高水平的经济投票,至少按照那种强调管理责任或者责任明晰度(如 Anderson 1995 年)的理论情况会是这样。但是,很多承担了较多管理责任的政党,正是那些长年参与执政的党,它们的中轴概率接近于零,因为为它们投票不会影响执政联盟的构成。

回到荷兰基督教党的例子。如果我们仅考虑政党管理责任的分担如何影响了投票选择,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将会与关注政党责任的理论一样,即这个党将得到高水平的经济投票。荷兰基督教党至少在 1994 年之前在所有执政联盟中毕竟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然而我们的理论包含了一种策略投票的考量:理性的选民,会根据他为该党所投的这一票能够决定执政联盟构成的概率,来调整他的经济投票。对于荷兰基督教党这一特殊的案例来说,理性的选民会发现他们的中轴概率接近于零——无论他们如何投票,荷兰基督教党都会参与执政联盟。因此我们预计,荷兰基督教党几乎得不到经济投票;而传统的责任理论由于忽视了策略投票的因素,预计它能得到高水平的经济投票。

策略投票的考量影响了政党得到的经济投票这一思想意味着,在竞争决策权力和经济投票之间存在着一种曲线关系:非常有可能或者几乎没有可能进入选举后执政联盟的政党,得到的经济投票都不多,而那些进入执政联盟的概率中等偏上的政党会得到最高水平的经济投票。我们可以回顾图 33.1 中总结的杜赫和斯蒂芬森经济投票数据来解释这一观点。杜赫和斯蒂芬森(Duch and Stevenson 2007)提出了一种衡量竞争性的指标,即从 1960 年开始,某个政党获得总理职位的年份所占的百分比(因此,如果要测量 1988 年某个党的经济投票,那么就要计算该党获得总理职位的年份在 28 年中的百分比)。我将这一竞争性指标分为 4 组(1960 年以后获得总理职位的年份少于 50%、51%—75%之间、76%—99%之间,以及 100%的政党)。图 33.5 用箱型图反映了这 4 种类型中各政党经济投票的强度。图中的情况与竞争理论的结论相当一致:即的确存在

一种曲线关系,而得到最多经济投票的,是那些 1960 年以后获得总理职位的年份在 50%到 75%之间的政党。毫无疑问,选举之后一定会加入执政联盟的政党(即 1960 年后获得总理职位的年份比例为 100%的政党),其经济投票的水平最低(这一组经济投票的中值接近于零)。使这一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被归于这一类别的政党,正是那些如果我们只考虑其承担的管理责任,也会得到最高水平的经济投票的政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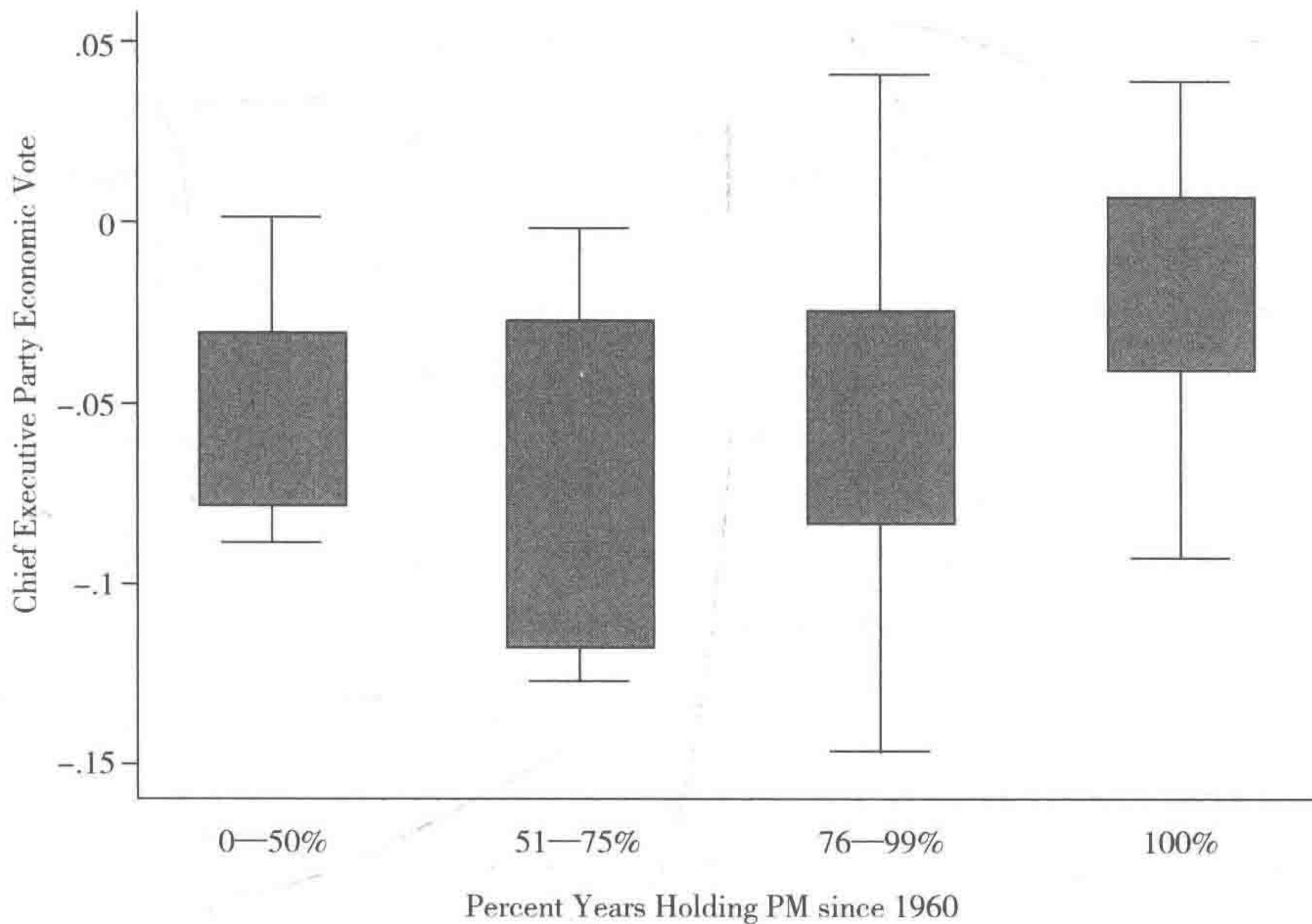


图 33.5 获得总理职位的历史与联合政府中行政首脑的经济投票

理性投票选择研究得到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选民们会考虑,他们的选票在决定选举中谁胜谁负,以及谁会进入政府方面是否能够发挥影响。通常的理解是,理性的选民不会为注定失败的候选人“浪费”他们的选票,但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应用于注定会获胜的政党或者候选人。因此在多党和联合内阁的情况下,真正重要的是,对决策权的“竞争分布状况”将影响策略投票的动机,并决定投票选择中经济评价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单个选民的投票几乎不会对选举之后决策权力的分配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是同样一些政党进入政府),因此在这类选举中经济评价只能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sup>①</sup>

<sup>①</sup> 相当多的学者已经指出,策略投票的动机会随环境性而发生变化,而这会影响选民的效用计算,因此在一种环境下是一些因素和事件左右了投票选择,而在另一种环境下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例如迈尔森(Myerson 1993, 1999)证明,按照复数投票的杜维吉尔法则,当政党们为意识形态而战时,策略投票的考量会让选民们为腐败的候选人投票,尽管他们的偏好是使寻租现象最小化,而且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候选人,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能够为选民接受,同时又没有寻租的包袱。

## 八、总 结

在比较投票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即经济投票——不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累积层面——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时段(或者说不同选举之间)都表现出相当的不稳定性。正如本章所强调的,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投票的比较研究者们面临的一大智识挑战。测量结果在国家间的不稳定性不只限于经济投票。实际上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表明,投票选择模型中一般会涉及的诸多效应,在国家之间都会发生变化。经济投票的强度在国家间各不相同,这与投票选择模型中很多其他要素类似。比如凯达尔(Kedar 2005)雄辩地证明,选民投票选择中的议题偏好会随制度环境而变。在投票选择模型中,党派倾向的影响也随制度环境而出现相当明显的不同(Huber, Kernell, and Leoni 2005; Kayser and Wlezien 2005)。阶级(Alford 1963)和意识形态(Kim 和 Fording 2003)对投票选择的影响,也可能会随环境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本章粗略介绍了为澄清环境对经济投票的影响而进行的研究。我认为,它们对于考察环境如何影响投票选择的其他决定因素来说,也提供了学者们可以遵循的某种路线图。在投票选择模型的研究方面,比较研究者之所以能够拥有一个厚实的理论基础,这完全受益于另一些学者对美国选举行为的研究。但是离开了美国的环境,这些理论就不那么适用。因此,比较投票行为的研究者的比较优势,就在于通过理论创新,把环境因素纳入个体层面的投票选择模型。这里的挑战,是必须严格模拟环境特征如何决定了每个变量(如意识形态、党派倾向、经济上的感受和阶级等)对投票选择产生的影响。最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建模技术使我们能够以严格的方式对这些模型加以检验,因为我们拥有相当多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人层面的数据,也有相当发达的多层建模技术,它们为开创性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一般而言,环境(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如何决定哪些因素被纳入投票计算,选民们又分别为这些不同的考虑赋予了多大的重要性。

## 参考文献

- ALESINA, A., LONDREGAN, J., and ROSENTHAL, H. 1993. A model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12-33.
- and ROSENTHAL, H. 1995. *Partisan Politics, Divided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ROUBINI, N. 1999.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ALFORD, R. 1963. *Party and Society: 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 ALMOND, G. A., and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T, J., and LASSEN, D. 2004. The electoral cycle in debt is where you can't see it: fiscal transparency and electoral policy cycl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Mimeo. Harvard University.
- ALVAREZ, R. M., and NAGLER, J. 1998. Economics, entitlements and social issues: voter choice in the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1349-63.
- and WILLETTE, J. R. 2000. Measuring the relative impact of issues and the economy in democratic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19: 237-53.
- ANDERSON, C. J. 1995. *Blaming the Government: Citizens and the Economy in Five European Democracies*. Armonk, NY: Sharpe.
- BARRO, R. 1973.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an economic model. *Public Choice*, 14: 19-42.
- BARTELS, L. M., and ZALLER, J. 2001. Presidential vote models: a recount.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4: 9-19.
- BECK, N. 1991. The economy and presidential approval: an information theoretic perspective. Pp. 85-101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he Calculus of Support*, ed. H. Norpoth, M. Lewis-Beck, and J.-D. Laf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ELLUCCI, P. 1985. Economic concerns in Italian electoral behavior: toward a rational electorate? I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ed. H. Eulau and M. S. Lewis-Beck. New York: Agathon.
- BERELSON, B., LAZARFELD, P., and MCFEE, W. 1954.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LAIS, A., TURGEON, M., GIDENGIL, E., NEVITTE, N., and NADEAU, R. 2004. Which matters most? Comparing the impact of issues and the economy in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e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555-64.
- BORRE, O. 1997. Economic voting in Danish electoral surveys 1987-1994.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4): 347-65.
- BUTLER, D., and STOKES, D. 1976.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2nd College Ed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AMERON, D. R. 1978.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1243-61.
- CAMPBELL, A., CONVERSE, P. E., MILLER, W. E., and STOKES, D. E.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HAPPELL, H., and VIEGA, L. G. 2000.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1960-1997. *Electoral Studies*, 19: 183-97.
- CHEIBUB, J. A., and PRZEWORSKI, A. 1999.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economic outcomes. Pp. 222-50 in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ed. A. Przeworski, S. C. Stokes, and

- B. Man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H., and STEWART, M. C. 1995. Economic evaluations, prime ministerial approval and governing party support: rival models considered.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45–70.
- and WHITELEY, P. 1997. Tory Tre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onservative support since 1992.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299–319.
- CUKIERMAN, A., and MELTZER, A. H. 1989. A political theory of government debt and deficits in a neo-Ricardian framework.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79: 713–33.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UCH, R. M., and PALMER, H. 2002. Heterogeneous perception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Economic Voting*, ed. H. Dorussen and M. Taylor. New York: Routledge.
- and ANDERSON, C. J. 2000. Heterogeneity in perceptions of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635–49.
- and STEVENSON, R. T. 2005. Context and the economic vote: a multilevel analysis. *Political Analysis*, 13(4): 387–409.
- 2007. *Voting in Context: Ho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Condition the Economic Vo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EBEID, M., and RODDEN, J. 2006.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conomic voting: evidence from the U.S.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527–47.
- ERIKSON, R. S. 1990.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congressional vote: a review of the macrolevel evi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373–99.
- 2004. Macro vs. micro-leve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voting: is the micro-level evidence endogenously induc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4 Political Methodology Meetings, July 29–31 2004. Stanford University.
- MACKUEN, M. B., and STIMSON, J. A. 2002. *The Macro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G., and ANDERSEN, R. 2006. The political conditioning of economic percep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forthcoming).
- FAIR, R. C. 1978. The effect of economic events on votes for presid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60: 159–73.
- FEARON, J. D. 1999.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selecting good types versus sanctioning poor performance. In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ed. A. Przeworski, S. C. Stokes, and B. Man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REJOHN, J. 1986. Incumbent performance and electoral control. *Public Choice*, 50: 5–25.
- FIORINA, M. 1978. Economic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a micro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426–43.
-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BRAMS, S., and POPE, J. 2003. The 200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n retrospective voting be saved?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163–87.

- FREY, B. 1979. Politometrics of government behavior in a democrac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1:308-22.
- and GARBERS, H. 1971. Politico-economics: on estim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 19:316-20.
- GAVIN, M., and HAUSMANN, R. 1996. Sources of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MS.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GOODHART, C. A. E., and BHANSALI, R. J. 1970.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 18:43-106.
- HELLWIG, T. T. 2001. Interdependence, government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s*, 63(4):1141-62.
- HIBBS, D. A., Jr. 1993. *Solidarity or Ego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 2000. Bread and peace voting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Public Choice* 104(1-2):149-80.
- 2006. Voting and the macro-econom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B. Weingast and D. Whitt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VASILATOS, N. 1981.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support for Presidents Pompidou and Giscard d'Esta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9:133-45.
- HUBER, J. D., KERNELL, G., and LEONI, E. L. 2005. Institutional context, cognitive resources and party attachments across democracies. *Political Analysis*, 13:365-86.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5: Globalization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Washington, DC: IMF.
- JACOBSON, G. C., and KERNELL, S. 1983. *Strategy and Choice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2nd ed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AYSER, M. A., and WLEZIEN, C. 2005. Performance pressure: patterns of partisanship and the economic vo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KEDAR, O. 2005. When moderate voters prefer extreme parties: policy balancing i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2):185-99.
- KEY, V. O.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IEWIET, D. R. 1983. *Macroeconomics and Micropolitics: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 UDELL, M. 1998. Twenty-five years after Kramer: an assessment of economic retrospective voting based upon improved estimates of income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s in Politics*, 10:219-48.
- KIM, H., and FORDING, R. 2003. Voter ideolog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n updat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95-105.
- KING, G., TOMZ, M., and WITTENBERG, J. 2000. Making the most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improving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2):341-55.
- KIRCHGÄSSNER, G. 1991.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popularity of West German parties: before and

- after the 1982 government change. Pp. 103–22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he Calculus of Support*, ed. H. Norpoth, M. S. Lewis-Beck, and J.-D. Laf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RAMER, G. H. 1971.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131–43.
- 1983. The ecological fallacy revisited: aggregate-versus individual-level findings on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and sociotropic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92–111.
- KYDLAND, E., and PRESCOTT, E.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473–90.
- LAFAY, J.-D. 1977. Les Conséquences électorales de la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essai de prévision chiffrée pour Mars 1978. *Vie et sciences économiques*, 75: 1–7.
- LECAILLON, J. 1981. Popularité des gouvernements et popularité économique. *Consummation*, 3: 17–50.
- LEWIS-BECK, M. S. 1980.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xecutive popularity: the French exper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306–23.
-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 EULAU, H. 1985. Introductio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ed. H. Eulau and M. S. Lewis-Beck. New York: Agathon.
- and MITCHELL, G. 1990. Modelos transnacionales de voto economico: estudio de un conjunto de países europeos. *Revista del Instituto de estudios economicos*, 4: 65–81.
- and NADEAU, R. 2000. French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ic vote. *Electoral Studies*, 19: 171–82.
- and RICE, T. 1992. *Forecasting Elec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and STEGMAIER, M. 2000.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183–219.
- MCKELVEY, R., and ORDESHOOK, P. 1972.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In *Mathematical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vol. vi, ed. J. F. Herndon and J. L. Bern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MACKUEN, M. B., ERIKSON, R. S., and STIMSON, J. A. 1992. Peasants or bankers?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nd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597–611.
- and Mouw, C. 1995. Class and competenc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Typescript.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 Louis.
- MADSEN, H. 1980. Electoral outcom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he Scandinavian cases. In *Model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P. Whitel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ARKUS, G. 1988. The impact of pers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a 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137–54.
- 1992. The impact of pers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a pooled

-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829–34.
- MARRA, R.E., and OSTROM, C.W. 1989. Explaining seat change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50–1986.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541–69.
- MILLER, A.H., and LISTHAUG, O. 1985. Economic effects on the vote in Norway. I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ed. H. Eulau and M.S. Lewis-Beck. New York: Agathon.
- MILLER, W.L., and MACKIE, M. 1973. The electoral cycle and the asymmetry of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popularity: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popularity. *Political Studies*, 621: 263–79.
- MUELLER, J. 1970.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18–34.
- MYERSON, R. 1993. Effectiveness of electoral systems for reducing government corruption: a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 5: 118–32.
- 1999. Theoretical comparison of electoral systems. 1998 Joseph Schumpeter Lectur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671–97.
- NANNESTAD, P., and PALDAM, M. 1995. It's the government's fault! A cross-section study of economic voting in Denmark, 1990/93.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8: 33–62.
- and PALDAM, M. 1997. From the pocketbook of the welfare man: a pooled cross-section study of economic voting in Denmark, 1986–1992.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119–37.
- 2000. Into Pandora's Box of economic evaluations: a study of the Danish macro VP-function 1986–1997. *Electoral Studies*, 19: 123–40.
- NORPOTH, H. 1985.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cycle of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In *Economic and Electoral Outcomes*, ed. H. Eulau and M.S. Lewis-Beck. New York: Agathon.
- 1996. The economy. Pp. 219–38 in *Comparing Democracies: Elections and Voting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 L. LeDuc, R.G. Niemi, and P. Norri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PACEK, A.C., and RADCLIFF, B. 1995. Economic voting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s*, 57(1): 44–61.
- PAGE, B.I., and SHAPIRO, R.Y. 1992. *The Rational 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LDAM, M. 1991. How robust is the vote function? A study of seventeen nations over four decades. Pp. 9–31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he Calculus of Support*, ed. H. Norpoth, M. Lewis-Beck, and J.-D. Laf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 SCHNEIDER, F. 1980. The macroeconomic aspects of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popularity in Denmark, 1957–1978. *National Okonomisk Tidsskrift*, 118: 149–70.
- PALMER, H.D., and WHITTEN, G.D. 2003a. Questionable analyses with n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 response to Royed, Leyden and Borrelli.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139–49.
- 2003b. Ignorance is no excuse: data mining versus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of hypothes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159–60.



- PERSSON, T., and TABELLINI, G. 1990. *Macroeconomic Policy, Credibility, and Politics*. New York: Harwood Academic.
- PRICE, S., and SANDERS, D. 1993. Modeling government popularity in postwar Britain: a methodological examp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317–34.
- RODRIK, D. 1998.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lar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5): 997–1032.
- ROGOFF, K. 1990. Equilibrium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21–36.
- and SIBERT, A. 1988. Ele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5: 1–16.
- ROYED, T. J., LEYDEN, K. M., and BORRELLI, S. A. 2000. Is “clarity of responsibility” important for economic voting? Revisiting Powell and Whitten’s hypothe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30: 669–98.
- SANDERS, D., MARSH, D., and WARD, H. 1991. Macroeconomics, the Falklands War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 contrary view.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161–84.
- SCHEVE, K. 2004.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candidate selection in open economies. Mimeo. Yale University.
- STIGLER, G. J. 1973.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160–4.
- TUFTE, E. R. 1975. Determinants of the outcomes of midterm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812–26.
- 1978.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ELCH, S., and HIBBING, J. 1992. Financial conditions, gender, and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54: 197–213.
- WHITELEY, P. F. 1986.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government popularity in Britain: the short-run dynam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4: 45–61.
- WLEZIEN, C., FRANKLIN, M., and TWIGGS, D. 1997. Economic perceptions and vote choice: disentangling the endogeneity. *Political Behavior*, 19: 7–17.
-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ZALLER, J. 2004. Floating voters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48–2000. In *The Issue of Belief: Essays in the Intersection of Non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ed. P. Sniderman and W. Saris.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Press.

## 第三十四章 环境约束下的政治预算周期

詹姆斯·E.阿尔特(James E. Alt)

莎娜·S.罗斯(Shanna S. Rose)

人们早就相信政治会影响经济后果。对商业周期的政治学研究,即经济后果如何反映了一种产生于政治环境中的决策,也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一学科的历史,是一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交替发展的复杂历史,它反映出人们对普遍性和简约性的追求。即便如此,从商业周期的这一广义政治学,到对“政治商业周期”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研究,即探讨选举周期如何影响了真实经济的各个方面,如GDP的增长率和失业状况等,也算是学术发展的一小步。在最近的二十年间,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因变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真实的经济结果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其原因将在下面进行探讨。

所谓政治预算周期,指的是由选举周期导致的政府财政政策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变动。“财政政策”包括公共支出和收入的幅度、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也包括财政平衡(或失衡)和公共债务。所谓“由选举周期导致”的事情,可以指能够观察到的各种不同情况,但一个共同的论题是,如果选举环境不同,那么关于财政政策的某些选择就会不尽相同。比如,如果距下一次选举还有很长时间,或者下一次竞选不那么竞争激烈,那么财政政策就会有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出当政者有意增加他们在下次选举中成功的机会。

但为何政治预算周期会受“环境约束”?难道在任官员不是怎样有助于他们在选举中获胜就怎样行事吗?的确如此,但简单来说,他们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他们必须有动机,也有能力操纵政策。或者如塔夫特(Tufte 1978)所言,政客就如同杀手,他不仅需要武器,还需要动机和机会。所以,要系统解释选举环境差异与财政选择差异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问“在什么环境下某种行为更可行?在什么环境下政治家们会更愿意

采取此种行为?”在当下对重要环境因素的思考中,有两个因素占主要地位: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选民特性;另一方面是与下一次选举在时间上和在预期中的接近程度。

从广义上说,政治预算周期研究与对代表制、回应制和代理问题的研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问题。曼宁、普列泽沃斯基和斯托克斯(Manin, Przeworski, and Stokes 1999)论述了“回应”代表制如何让当政者按他们(选民)的利益行事,当政者又如何选择那些使他们一定能够再次当选的政策。这就体现出了政治中的代理问题:选民们(委托人)希望政治家(代理人)以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方式行事,但又不能无所遗漏地监控代理人的行为。选民们为确保代理人的合作还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但他们对后者实行控制的工具即选票却并非完全有效。因此,环境约束的政治预算周期提供了一个窗口,以研究不同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中,选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政治家进行选择、监督、惩罚和控制,以及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以选民的利益为代价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sup>①</sup>

本章考察美国各州影响当政者操控政治商业周期的能力和动机的环境性决定因素。<sup>②</sup> 这些州都是相对开放的政治经济体,人均收入较高,法治非常完善。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美国的这些州,可以使我们发现丰富多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性,但这些特性又相对稳定,不至于使我们的分析太复杂化。可以说,把这些州作为比较政治的实验室有几个方面的优势。

比如,政治学把立法权与行政权是否分离作为区分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依据。有大量比较政治学的文献关注总统制政府相对而言的不稳定性。最近又有一批政治经济学文献假定总统制政府同时还会导致较少的再分配,以及较低的公共支出,但有较高的回应性,它们并且对此进行了经验验证。<sup>③</sup> 但是,对分权的经验研究也面临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总统制国家集中存在于第一世界之外。研究分权影响的一种方式,就是系统地研究美国各州,它们的制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但在基本结构方面又具有广泛的相似性,这使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同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因此,这些州的确可以被视为一个虚拟的“世界样本”,因为在此很多变量都可以得到控制。

另一方面,将美国各州作为研究重点可以让我们无需重新审查文献中的一些发现。例如,阿德赛拉、波瓦克斯和佩尼(Adsera, Boix, and Payne 2003)认为,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资产流动性更强的经济体(即脱离这种经济体是一种更容易实现、且成本更低的选择)中,以市场为基础的、私人性的反应更容易抵消政治周期,并且减少政客们

① 制度要对行为产生影响,需要通过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那就是选民和政治家得到的信息的不对称性。

② 罗斯(Rose 2005)证明在美国各州的总体支出中也存在政治周期。

③ 如参见 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3。

寻租的空间。关于浮动汇率也有类似的观点(Clark 2003)。这些观点我们就无需讨论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考察一个相关的问题,它涉及债券市场和宪法性约束。

出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考察财政政策的每个方面,因此我们的分析就集中在公共支出水平(按净人均计算)这一个维度上面。这一重点的选择与学术界的普遍共识相一致,即与税收、赤字和债务相比,支出方面的政治预算周期要更明显。

本章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我们首先进行简单的文献回顾,以说明政治预算周期理论是如何发展,以及为何如此发展的。然后讨论我们使用的数据和方法。为了让论述尽可能清晰易懂,我们自始至终只采用一种在学术界已经广为接受的测评方法,即动态面板分析方法。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先进的方法一定能够得出更好的结论。我们相信的是,通过使用一种能够把我们一些清晰的直觉表达出来的方法,我们能够更有效地交流所得到的结论。随后讨论我们的研究成果。我将表明,在不确定的选举结果使政治操控更有价值的情况下,政治预算周期较为多见;而在制度规则排斥政治周期(如果不能使之完全不发生的话)的情况下,政治预算周期就会比较少见。最后是结论。

## 一、环境约束下的政治预算周期:理论与证据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政治家会认为为了当选而操控财政政策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欲的?这个问题乍一看来并不复杂,但它立刻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可欲与可能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又怎样依赖于其他选择的得与失?比如,假定一种行为是相对来说不可行的,那么它也就是不可欲的吗?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种行为是可欲的,那么政治家们就不会试图创造(制度)使其变可行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需要考察制度变化的原因,以理解在何种条件下当政者能够有效控制政策。实际上,可行性包括了控制与效力两个维度(Franzese 2002),而这又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很容易就超出了学者对各种关系进行系统模拟、收集数据和评测结果的能力。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把行为与选择区分开来的方法,考查每一次在什么情况下替代性的选择更易于被接受,并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加以思考。或者,我们可以限定考查的范围,仅关注那些与手段、信息和代理人有关,并且反复出现,但无需在每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新加以分析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将始终诉诸读者的直觉,以帮助他们获得某些洞见,并自己在新的环境下加以运用。

### 1.1 问题与观点

结果与工具。人们是应该从结果,如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还是从政策工具,如支

出和利率来观察经济周期？以往的研究文献都是从结果入手。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诺德豪斯(Nordhaus 1975)证明，那些以再次当选为目标的政治家，可以在通胀和失业之间权衡，或者说在体现两者关系的菲利普曲线上找到一个最优点，在选举前后分别采取扩张和紧缩的经济政策。如果选民们采取一种“回溯性的”(或者说“适应性的”)态度，即根据对近期经济表现的评价投票，那么当政者这么做能够得到好处。选民们会因为当政者的经济干预奖励他们，虽然事实上在选举结束后，生产和就业又会回到自然水平，而通货膨胀率会提高。

在后来的二十年间，学者们开始关注政策变量——特别是公共支出、税收和赤字——而非真实变量的选举周期。作为这类研究最早的代表之一，塔夫特(Tufte 1978)通过转移支付寻找(并发现了)了政治商业周期。塔夫特曾经提到现在人所共知的一件趣事，尼克松当政时，在1972年的选举前夕，政府向上百万社会保障的受益人发出一封信，提醒他们注意月收入的增加。

从分析结果到分析政策，这一转变的发生出于下述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在真实变量中缺少关于选举周期的系统性经验证据：“任何人在阅读有关政治商业周期的文献时，都会明显感觉到支持性证据的不足”(Alt and Chrystal 1983, 125页)。除海恩斯和斯通(Haynes and Stone 1989)的研究之外，试图为真实周期提供有力证据的研究少而又少；大多数学者发现，在真实的经济结果中，只能为政治商业周期的存在找到非常微弱的证据，或者干脆就找不到任何证据，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麦克卡隆(McCallum 1978)、拉齐勒(Lachler 1978)、戈登和泡特巴(Golden and Poterba 1980)、列维斯—贝克(Lewis-Beck 1988)，以及阿莱西纳、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 Roubini, and Cohen 1997)等。

第二个原因(可能也是对上述证据缺乏的一种解释)是一般来说政治家们并不能完全控制真实的经济变量。首先，诺德豪斯的模型假设当政者能够控制财政政策，这与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相符(Drazen 2001, 80页)。实际上，贝克发现(Beck 1987)，美国的货币手段不存在周期现象，或者说，财政政策不变，则货币供给量也不变。他认为，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对由总统或者国会导致的、从财政方面触发的宏观经济周期加以调节，但它自己并不制造周期。<sup>①</sup>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在研究这么一个问题，即在中央银行并不那么独立的国家中，货币周期是否存在(如Clark and Hallerberg 2000)。同时，还有另外一些研究关注汇率机制的灵活性问题(Clark and Hallerberg 2000, Dreher and Vaubel 2005)。哈勒伯格(Hallerberg 2002)指出，在否决者较

<sup>①</sup> 也有少量研究发现某些证据表明，在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国家，也存在货币政治商业周期(参见如Soh 1986, Grier 1978, Lohmann 1998)。

少的国家,政治家们更倾向于实行货币而非财政扩张;而在否决者人数较多的国家,财政扩张的方法更容易被采用,也更有效。

其次,即便使用财政政策,当政者能够控制的政策工具也未必能够带来预想中的结果,其原因可能是政策工具不完善,也可能是它们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下面还会提到这一点)。因此,现在人们更多从支出、税收和赤字这类财政政策变量,而非利率和货币总量等货币政策,或者增长、失业与通胀等经济结果的层面理解经济周期。在我们的分析中,假定选民接受用支出购买的公共品(尽管他们发现支出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愿),当政者则能够控制支出(也许他们同样不能如其所愿地对其加以控制)。如果当政者有意再次当选,那么在选举前后,支出就会先上升后下降。<sup>①</sup>

虽然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我们仍应该注意到另外一类由希布斯(Hibbs 1977, 1987)和阿莱西纳(Alesina 1987, 1988)倡导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政治家们更多是党派分子而非机会主义者,因此真实经济中的变化应该发生在选举使政党交替之后。这些研究者并且指出,与右翼政党相比,左翼政党更明显地追求高增长和低失业的政策,甚至以通货膨胀为代价。他们和其他些作者(包括 Alt 1985, Alesina, Roubini, and Cohen 1997)在美国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发现了此类“政党周期”存在的证据。类似地,克劳斯(Krause 2005)也发现,在民主党政府治理下,收入增长较高,而共和党政府则往往在选举前扩大经济规模。

信息。如果说对诺德豪斯的回答有一部分是用工具替代结果,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假设的变化。最早政治商业周期模型假定选民是短视的,也就是如诺德豪斯所说,政客们能够反复玩弄选民,虽然选民们能够轻易地预见到下一次选举。近期的政治商业周期模型(如 Cukierman and Meltzer 1986, Rogoff and Sibert 1988, Rogoff 1990)已经摒弃了这种容易导致“卢卡斯批评”(Lucas 1976)的假定,这一批评认为,经济行为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预测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性的预期。<sup>②</sup> 这些新的模型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替代了选民短视的假设。也就是说,建模者们一般假定选民对于当政者的能力没有充分的信息。这一假设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选民们不能完全区分能力与竞选策略的情况下,政治预算周期才能“起作用”。换言之,“只有在执政党拥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欺骗公众的图谋才会成功。”(Rogoff and Sibert 1988, 第4页)

① 如果新上台的当政者要求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那么我们对赤字与支出可以进行同样的猜测,收入的情况则相反(选举之后提高,选举之前下降)。

② 如果选民拥有充分的信息并形成了理性的预期,那么由于选举成为一种可以准确预测的事件,选举之前的任何政策操控都不会产生真实的宏观经济结果。

在政治预算周期模型中,当政者越有能力,则他提供某一水平的政府服务需要的财政收入越少。政府面临的问题(以及有效管理需要的能力)会发生变化,当政者的效能也会随着时间逐渐改变。在这些模型中,选民虽然能马上察觉到公共开支和税收的变化,但要发现赤字或债务的变化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因此,选民们不能立即把赤字开支与表现了当政者出色能力的有效支出区分开来。这样,政治家们就有可能在选举之前运用赤字政策,即增加支出、减少税收,或者两者并行,以展示他们的能力。如果政治家清楚了解他们自己的能力所在,他们会施行一些能够有效展示这种能力的政策,使自己与那些无能的政客们区分开来。即便当政者和选民从来都不清楚需要何种能力,那么只要当政者比选民更早或更准确地观察到经济状况或者债务水平,那么通过政治预算周期增加再次当选机会的动机仍然存在,而且制度也会影响竞选手段的效能。<sup>①</sup>

*代理模型*。为什么会存在政治预算周期?对于我们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仅仅是代理问题的一部分,而后者则处于当代代表制和回应制问题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让我们进行如下假定:选民们看重的是当政者的能力,特别是在政府权力不断扩展,对经济状况的影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毕竟经济是选民最为关心的方面。为了选举或留住更有能力的当政者充当他们的代理人,选民们可能必须通过让他们有更高的职位安全感来补偿他们。<sup>②</sup>就此而言,政治预算周期就是间歇性的税收和支出调节,它反映着代理人关于何种行动能够增加其再次当选的机会的想法和选择。再次当选就是当政者因有效管理经济而收取的“回报”(选民们则为此付出某种代价)。在此情况下,如果较有能力的政治家发现管控支出和税收更为容易,那么政治预算周期就会成为“传播当政者管理能力的最新信息的有效社会机制”,虽然这要以财政波动的增加为代价(Rogoff 1990, 22 页)。

因此,选民们要尽其所能选出最好的当政者。当政者则尽量满足选民,当然也同时“兼顾其他”。只要选民们不能完全控制当政者,这种情况就肯定会发生:“如果选民们希望通过选举挑出未来的好政治家,或者惩罚过去的当政者,他们就必须为当下执掌政权的人支付更高的酬劳”(Przeworski 2003, 152—153 页)。我们的目标则是在其他情况

<sup>①</sup> 很多人发现,罗戈夫—西贝尔特模型(Rogoff-Sibert Model)中的均衡假设并不成立,该假设认为,选民们通过观察即便能力较差的政治家都不会采取的行为,对能力进行正确的推断。当然,如果存在其他方式保证有能力的政治家能够再次当选,那么选民们无须任何信号也乐于为他们投票。但是如果假定政治家对他们的能力有清醒的了解,那么在这个模型的结构中就会导致一个单独的均衡,即能力较差的政治家会发现,去做那些只有能力较强的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毫无意义。当然,如果政治家们并不了解自己的能力和,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均衡或者说推论。

<sup>②</sup> 对于此类问题影响最为广泛的研究包括 Przeworski (2003, 4—8 章); Adsera, Boix, and Payne (2003)。

相等同的条件下,测定这种酬劳的规模。

从经验上来看,这种酬劳是周期产生的“附加”选票。要测定这些附加选票,我们需要某种投票模型,使我们能够对实际投票与不存在政治预算周期情况下的“虚拟”投票加以比较。为此我们还需要某种关于周期本身的模型,以测定如果不发生选举的话,选举年的财政政策会有何不同。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些问题。

## 1.2 情景和制度约束效应

在过去20年中,已经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政治预算周期的存在。例如,阿莱西纳(Alesina 1988)、凯奇和朴(Keech and Pak 1989)、阿莱西纳、科恩和鲁比尼(Alesina, Cohen, and Roubini 1992, 1997)等学者在发达国家发现了周期的证据,舒克内奇(Schuknecht 1999)、布洛克(Block 2001)、阿克迈多夫和朱拉夫斯卡娅(Akhmedov and Zhuravskaya 2004)、布兰德尔和德拉泽(Brender and Drazen 2005)等学者则在发展中国家发现了周期的证据。当然,上述研究中有相当部分表明,周期仅存在于样本时段的部分时期,或者仅存在于开支和税收的部分领域。实际上,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寻找周期而未果(如Besley and Case 1995)。不同证据的存在说明,周期的强度可能取决于“当选的、有党派倾向的当政者制定政策的制度、结构以及战略情景”(Franzese 2002, 370页),它同时也决定了当政者是否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去创造政治预算周期。

**动机。**首先,需要考虑当政者操控公共财政的动机。在比较研究中,有人认为内生性的选举时间有可能影响这些动机,虽然从表面上看周期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参见Smith 2004)。由于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其统治者要求提前进行选举,所以我们在此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深究。但在另一个极端,由于制造周期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所以不可能再次当选的当政者,与可以再次当选的人相比,制造周期的动机就可能更少。实际上,百思利和凯斯(Besley and Case 1995)就是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了在美国各州的州长们任期届满之前,政治预算周期是否会较不明显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任期限制的存在与否带来的影响,虽然如上文所述,他们实际上在所有州都没有发现周期存在的证据。<sup>①</sup>

但也有可能任期限制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因为政党会发挥作为,所以那些即将离任、并受到任期限制的当政者,也会试图增加其所属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的几率,这样再次当选的动机就仍然存在。如果来自其他政党的高质量候选人为竞争那些“开放

<sup>①</sup> 这可能归因于作者们没有能够控制好财政积累的持续性。他们使用了一个固定的效果模型,而关于政治商业周期的大部分研究文献采用的都是阿雷拉诺—邦德方法(Arrellano-Bond Method),它能够对状态效应和财政持续性加以控制。



席位”相互协调(见 Cox and Katz 2002),任期限制的制度则会推动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再次当选的动机也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任期限制会削弱个人的动机,但会增强政党的集体动机;预期政治预算周期的强度就成为一个经验性问题。下面还会谈到这一点。

当政者操控支出和税收的动机也可能受到选举竞争性的影响;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莱特(Wright 1974),塔夫特(Tufte 1978)和弗雷(Frey 1978)。竞争性可能是一个制度问题。例如,选举规则的差别或者政党相对实力的强弱,会使在一些地方再次当选在另一些地方更难。但在更多时候,竞争性被视为一种“策略”变量:一次被认为“势均力敌”的选举,会增加任何有助于增加当政者再次当选机会的价值的价值和可欲度。<sup>①</sup>克林格梅尔和伍德(Clingermayer and Wood 1995)也确实发现,在“竞选竞争性”(通过选举年的模拟变量与州立法机关中多数党超出其他党的部分来衡量)与美国各州的债务之间存在正相关。当然,这一结论很难加以解释<sup>②</sup>,而且这种正相关可能不过是选举周期的结果,与选举是否势均力敌并没有关系。其他人则利用民意调查数据反映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激烈程度(Schultz 1995, Carlsen 1998)。下面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有关州长工作被认可程度的数据。

能力。下面我们考察当政者操控政府财政的能力,这可能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制度因素中,弗兰杰斯(Franzese 2002)指出,当多个决策者共同掌控政策时,“讨价还价、代理人、协调以及集体行动的问题都会让选举过程变得更为困难或更为复杂,而当这些决策者服务于不同的选民时就更是如此”(Franzese 2002, 384 页)。持同样看法的柏森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2)也发现,议会制政体比总统制政体更容易在选举前宣布减税。对该结果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与议会制政体相比,总统制政体之下拥有提案和否决权的决策者更多……因此财政僵局有可能会较为严重,对分权政体来说更是如此……但在议会制之下,一般是同一个多数既控制着行政权,也通过预算案,因此能够更方便地对财政政策进行微调以适应选举的需要”。(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2, 12 页)

哈勒伯格(Hallerberg 2003)也发现,尽管各不相同,但集中的财政制度能够更为有效地作出有关税收和支出方面的决定。但是,虽然更有效能的财政政策可能削弱政治

<sup>①</sup> 这种看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弗雷认为(Frey 1978),虽然有些时候存在选举压力,但在另一些时候当政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可以自由行动。舒尔茨(Schultz 1995)认为,当政者的前景越是不被看好,则其操控(在他的案例中是英国的转移支付)的动机就越强。另参见阿莱希纳和塔贝里尼(Alesina and Tabellini 1990)关于极化的研究:竞争者的偏好差别越大,他们全力以赴的动机就越强。

<sup>②</sup> 作者们只考虑了互相作用项(选举年乘以多数党与其他党的差额),却省略了回归中的两个变量,因此难以确定每个变量的约束效应。见 Brambor, Clark, and Golder 2005。

家们对政治预算周期的需要,但那些使财政政策更易于管理的因素,也会使它们更易于受到操控。这样看来,集中化的财政政策既可能与较明显的政治预算周期相关,也可能与较微弱的政治预算周期相关。

如果政策控制是被分享的,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行为体的多样性如何与决策过程相适应。当存在着多个“否决者”(Tsebelis 2002),他们的同意又为支撑政治预算周期的决定所必需时,政治家操控政策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减。但另一方面,关键人物众多而各不相同的偏好也可能妨碍他们协调一致,对政治家的行为加以监控,从而又增强了当政者操控政策的可能(Ferejohn 1999)。美国的各个州提供了分权政府之下政策控制破碎化、分散化和多样化的典型例证:政府的不同部门掌握在不同政党的手里。<sup>①</sup>但令人惊奇的是,实际上没有人研究分权政府对政治商业周期强度的影响,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一项对当政者操控政府财政以实现选举目标的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是政治家与选民之间信息不对称性的程度。当政者的信息优势可能取决于一系列原因。许多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民主化的程度,其假定是任何能够让政府“接近人民”的事情都会增加透明度,并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Hallerberg 2003, 398页)。例如布兰德尔和德拉泽(Brender and Drazen 2005)认为,与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在新兴的民主国家,财政操控会更为有效,因此选举周期也会更明显,因为在这些国家,选民对于选举策略缺乏经验。他们发现,在过去40年包括68个民主国家的样本之中,正是那些新兴的但尚未稳固的民主国家,其赤字中存在政治预算周期;柏森和塔布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2)以及施和斯文森(Shi and Svensson 2002)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阿尔特和拉森(Alt and Lassen 2006)认为,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更容易出现政治预算周期,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它们的财政透明度比成熟民主国家要低;在工业化国家中,他们也发现,如果财政制度的透明度较低,则政治预算周期就较明显。

如果我们认为透明度与有关财政政策的信息的可获取性相关,那么有一些因素就是重要的。首先是对预算过程的了解,它决定了当政者与选民双方能够得到信息量。实际上,我们常常听到立法者抱怨预算太复杂,以至难以了解;各式各样的拨款法案、对财政收入统计的有限认识、开支不封顶的拨款,这只是使当政者难以充分获知政策信息的例子。即便如此,当政者一般还是较公众更容易获得信息。使信息有效流向公众的

---

<sup>①</sup> 我们认为,分权政府削弱了当政者操控支出的能力,这也是关于协调、否决者,以及权力碎片化的理论所强调的,见 Saporiti and Streb 2003。当然,任何削减当政者能力的制度都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同样会削减他们的动机。

一个重要的潜在前提,就是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性的媒体,<sup>①</sup>我们在下面讨论这一点,以及过程本身的透明性。

最后一个、也许是更明显的影响当政者制造政治预算周期能力的制度性因素,是限制或者禁止赤字的财政规则。<sup>②</sup> 可想而知,受此类规则约束的当政者要想在选举前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在美国各州存在大量此类规则,包括适用于预算案、预算立法,以及超出收入的支出方面的全民公投和完全禁止债务,以及“平衡预算”的规则。罗斯(Rose 2006)发现,在美国那些采用“禁止延期”的平衡预算规则——禁止州政府把财政赤字带入下一个新财政年度——的州,政治预算周期就不存在,而不采用这一规则的州刚好相反。但是,禁止延期的规则只有辅之以对借贷的限制,才能有效地减弱政治商业周期。因此,在禁止延期的规则并不太严格、政治家们能够通过借贷弥合预算缺口的州,政治商业周期还是会出现。我们会在下面深入讨论这一发现,并将给出一些理由,以解释平衡预算的规则在实践中为何确实对政策发挥了限制作用。

## 二、数据、方法和结果

在何种程度上政治和策略的环境影响了政治预算周期的强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了美国45个州1974年至1999年间的面板数据。<sup>③</sup> 出于尽可能简化分析的目的,我们把真实人均总支出作为核心因变量,它涵盖了州一级几乎所有的支出。<sup>④</sup> 我们为州长选举周期(四年)中的每一年设置一个虚拟变量,然后使这些选举周期的虚拟变量与上述六个不同的“环境”变量(州长的支持率,州长的任期限制,不同党派分掌的政府,财政透明度,媒体以及财政规定)交互作用,以观察支出在不同时期如何随这六个因素而变化。下面对这些关键自变量中的每一个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表34.1

① 阿尔特和拉辛(Alt and Lassen 2006)指出,国家控制下重要媒体的出现在与预算过程透明性无关的情况下,造成了OECD国家中的政治预算周期。

② 有很多的研究文献是关于财政规则和原则的,但是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没有专门针对政治过程的分析。

③ 样本始于1974年,是因为之前很多州还在实行两年一度的州长选举,终于1999年,是因为联邦统计局在2000年至2001年暂时停止了对州政府财政的调查。样本中没有包括阿肯色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州以及佛蒙特州,则是因为在样本涉及的大多数时间,它们仍然实行两年一度的州长选举。阿拉斯加州没有在样本中出现,是因为它严重依赖开采税而成为“财政局外人”。

④ 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考察财政赤字行为,它等于支出减去收入的差。这在很多情况下类似,虽然有些情况下也不是太清楚,因为把收入包含进来就意味着对观察到的周期性的支出行为增加了“噪音”。

汇总了对所有解释变量的统计。

表 34.1 统计数据

	中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独立变量				
真实人均支出	4034.655	908.704	2471.321	7370.123
关键独立变量				
州长支持率	52.020	13.187	19	79.5
无任期限制	0.367	0.482	0	1
不限制连任两届	0.348	0.477	0	1
限制连任两届	0.207	0.405	0	1
限制仅任一届	0.078	0.268	0	1
分权政府	0.536	0.499	0	1
透明指数	0.467	0.167	0.111	0.904
媒体渗透程度	0.235	0.041	0.160	0.327
严禁延期	0.378	0.485	0	1
控制变量				
真实人均收入	22979.14	4106.3	13564.35	40594.95
真实联邦人均拨款	824.486	223.893	431.103	1958.288
失业率	6.258	2.108	2.2	18
人口(百万)	5.273	5.328	0.366	33.499
学龄人口百分比	20.238	2.44	7.0740	27.525
退休人口百分比	11.869	1.984	6.389	18.774
清一色共和党	0.112	0.315	0	1
清一色民主党	0.352	0.478	0	1

## 2.1 解释变量

支持率。没有任何机会再次当选的当政者,与一定能够再次当选的当政者一样,都不会有什么动机为竞选而操控支出。因此,我们把这两种极端情况与居间的更具“竞争性”的情况——中等程度的支持率加以比较。我们首先计算每位州长的年平均支持率(由于有时候在一年中会进行多次民意调查),然后再计算他们四年任期的平均支持率。<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四年的州长任期分为三类:低支持率(少于40%)、中等支持率(40%—60%)和高支持率(大于60%)。这些数据来自工作满意度数据库(Beyle, Niemi, and Sigelman 2002)。

<sup>①</sup> 我们在样本中排除了任期不满四年的州长,因为如果只采用选举年或选举年前一年的支持率时,我们得到的是相似的结果。

**任期限制。**一些当政者没有机会再次当选,并非因为他们会失败,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再次竞选。我们的任期限制虚拟变量把州长们分为四类。第一类——没有任期限制,他们总是能够参选,当然他们事实上可以选择放弃;第二类——两届任期中还剩一届(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再次参选,但如果他们获胜,最多只能再任一届);第三类——两届任期即将届满(他们已经再次当选,但不能再次参选);第四类——只有一届任期(这类当政者按规定不能再次参选)。暂不考虑州长们为本党连任行动的可能性,那么在前两个类别中会发现比较明显的政治预算周期。关于任期限制的数据由蒂姆·百斯利提供,并根据《美国州政年鉴》进行了更新。

**分权政府。**我们对分权政府的定义是:州长所属执政党与控制立法机构中一个或两个院的政党不一致。这一定义包括了独立州长。这些数据来自《美国州政年鉴》。我们的判断是,与分权政府相比,由单一政党控制的政府之下政治预算周期会更为明显。

**财政透明度。**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数据来源于对二手材料的综合(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udget Officers a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以及我们对州预算官员的调查。根据下列九种对财政透明度的测评方法,我们用9项标准对透明度进行调查,透明则回答“是”,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指标。<sup>①</sup>9项标准包括:(1)财政报告是否基于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普通接受回应原则)标准?(2)是否备有多年支出预测报告?(3)预算周期是否每年一次(而非两年一次)?(4)收入预期是否有约束性?(5)对于收入预期立法机构是否承担(或分担)责任?(6)是否所有拨款都被纳入了一个单独的预算案中?(7)拨款法案是否由非党人士起草?(8)是否存在禁止开放式拨款的法律?(9)预算是否要求公开的行为测评方式?每一年的透明度指数即回答为“是”的项目与其数据可得的项目总数的比值。为了简明扼要,我们将州分为规模相等的三个组,即在样本所调查的时期中,财政透明度平均值高的(指数大于0.53)的州,中等的(指数在0.40与0.53之间)的州以及较低(指数小于0.4)的州。<sup>②</sup>我们的判断是,透明率越低,周期会越明显。

**媒体渗透程度。**媒体渗透程度或密度的测量标准是各州每人平均拥有的报刊量,即该州发行的报刊总量与州人口之比。<sup>③</sup>这一数据仅在1983年和1995年两年能够得

<sup>①</sup> 总的来说,任何能够增加信息、正当理由、可获得渠道以及可证实方式的努力都能够增加透明度。这9项标准的横断面数据首先是由阿尔特等(Alt, Lassen, and Skilling 2002)针对财政透明度对州政府及州长支持率影响的研究中加以搜集的。

<sup>②</sup> 用连续的方法对透明度进行测量,得出的结果是可靠的。

<sup>③</sup> 卡尔斯·波瓦克斯向我们慷慨地提供了这些数据。

到。我们取这两年人均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样本覆盖的整个时段报刊发行量的断面指标。据此,我们把这些州分为数量大致相同的三个组:平均报刊发行量较高的州(发行量大于0.25),发行量中等的州(发行量在0.22与0.25之间),以及发行量较低的州(发行量小于0.22)。与财政透明度相似,假定较低水平的媒体渗透程度意味着较少的信息传递程度,那么它就应该导致较明显的政治预算周期。

**平衡预算法。**最后,我们采用罗斯(Rose 2006)的方法,把严格的“禁止延期”的规则定义为这样一些措施:它们禁止各州将财政赤字延续到下一个财政年度,而且由于它们要求公投或者禁止发行公债,所以也难以通过借贷来加以规避。<sup>①</sup>十七个州拥有此类严格的规定,而且在我们获取数据的年份中这些规则没有发生变化。这些数据由政府关系咨询委员会和州财长全国联席会提供。

**其他的控制变量。**为了确保我们对周期的测量没有受到州一级可能会影响财政政策的其他变量偶然发生的影响,我们还考虑了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第一,我们控制了政府的资源:税收(由州人均收入计算)以及联邦政府提供的人均拨款。第二,因为经济低迷时期会增加对需求拉动的项目的需要,我们控制了失业率。第三,我们控制了人口变量——包括人口规模以及学龄儿童(5—17岁)和老年(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以明确对政府服务的需要。最后,我们控制了政府中党派的构成,这一因素被证明会影响支出水平(如Alt and Lowry 2000)。这些数据——包括人均支出的数据——来自联邦统计局和《美国州政年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把它们的时间跨度由财政年度转换为自然年度。

## 2.2 测量问题

我们的兴趣所在,是政治预算周期的强度。对这一数值的测量方法,是对不同州以及不同的选举周期之间选举年(其年末进行选举的自然年)与选举年之后第二个自然年度(下次选举之前的第二年),亦即四年周期的中间点的支出进行对比。如果支出存在选举周期,那么两次选举之间支出的时间进程会表现为V字形;如果没有周期,这一进程就是平直的。测量周期强度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测量这个“V”的高度,也就是周期内支出在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异。如果环境变量在经验上“不造成任何差异”的话,那么罗斯(Rose 2006)指出的无约束的周期会在所有情况下出现。我们采用传统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但有所调整,即使支出对控制变量、环境变量和选举周期变

<sup>①</sup> 相反,在禁止延期的规则相对宽松的州,州长、立法机关或者像财长那样的公职人员都可以发行公债。

量进行回归,以测量环境约束效应,并对我们在这些方面的不确定性加以量化。

很清楚,与任何平板数据研究一样,重要是要控制州层面上不随时间变化的一些特征,如“自由主义文化”以及“发展主义的历史”等,因为它们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方法可以是在回归中增加某些固定效应。另外,某个州一个时期与下一个时期的财政积累会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在等式的右侧加入了一个滞后因变量,以反映财政状况的持续性。不过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已经很清楚,具有个别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在存在滞后因变量的情况下,会产生偏倚的测量结果(Nickell 1981)。

因此,我们采用了已经被普遍认可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即由阿雷拉诺和邦德(Arellano and Bond 1991)提出的瞬时测量一般方法。这种方法采用一阶差分代替固定效应,并且包含了一个滞后因变量。<sup>①</sup> 采用一阶差分意味着我们既分析支出的变化,也分析单个州层面的固定效应带来的变化。不幸的是,这一方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因变量的滞后值与滞后干扰的相关性问题,幸好诊断性检验能够告诉我们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

确切地说,我们使用的是如下的回归方法:

$$y_{it} - y_{i,t-1} = \beta C_{it} (E_{it} - E_{i,t-1}) + \lambda (X_{it} - X_{i,t-1}) + r(y_{i,t-1} - y_{i,t-2}) + (\delta_t - \delta_{t-1}) + (\mu_{it} - \mu_{i,t-1})$$

这里  $y_{it}$  代表  $i$  州  $t$  年的人均支出,  $E_{it}$  是虚拟变量中的矢量值,代表州长选举周期中的各年份,  $C_{it}$  是环境虚拟变量的矢量值(包括支持率、任职期限、分权政府、透明度、媒体或者财政规则)<sup>②</sup>,  $X_{it}$  是反映州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控制变量的矢量值,  $\delta_t$  是年份效应,  $\mu_{it}$  是干扰项。由于这是一个一阶差分等式,所以因变量反映的是支出方面的年变化,同时公式左侧所有随时间变动的变量反映的也是年度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州层面的固定效应)已经消失了(由于他们不改变),除非他们与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相互作用。(差异化的)年度效应控制了某个特殊年份选举偶然集中产生的混淆。由于我们选择了一个苛刻的证明策略,我们的测量结果反映的可能是政治预算周期真实强度的下限。

### 三、测量结果

要说明我们采用的所有程序和测量技术,会使这一章的长度增加一倍。我们相信,

<sup>①</sup> 要消除  $y_{i,t-1}$  和  $\mu_{i,t-1}$  之间的相关性,因变量在时段  $t-2$  与较早的时段( $y_{i,t-2}, y_{i,t-3}, \dots$ ) 之间的滞后水平作为差异( $y_{i,t-1} - y_{i,t-2}$ ) 的工具变量。阿雷拉诺和邦德证明,如果干扰项  $\mu_{it}$  中值为 0,或者不具备特别的相关性,即干扰项( $\mu_{it} - \mu_{i,t-1}$ ) 的一阶差分与时段  $t-2$  和更早时段之间因变量滞后水平的协方差为 0,则这类滞后水平可以发挥很好的工具作用。

<sup>②</sup> 上文已经解释过,我们对透明度、媒体以及财政规定的测量不随时间变化,因此环境变量在这些情况下不是  $C_{it}$  而是  $C_t$ 。

我们在此展示的结果是可靠的,因为它们可以用大多数方法得出,而且也是显著的,因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过适当的显著性检验。在我们发现显著的政治周期的案例中,我们相信其他变量的加入也并不会使结果发生变化。为简化起见,我们为每个环境变量绘制一幅图,以表明此案例中测量得出的周期的强度。

### 3.1 动机

支持率。我们预期在中等支持率(40%—60%)的情况下周期最为显著,因为此时选举竞争最激烈。如图 34.1 所示,这一猜测得到了数据的证实。在支持率中等的时候周期最明显: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则选举年和选举周期中间点人均支出的差额为 38 美元。<sup>①</sup> 这类周期与得到高支持率的周期的差异(22 美元)显著度非常明显,达到了 10%。<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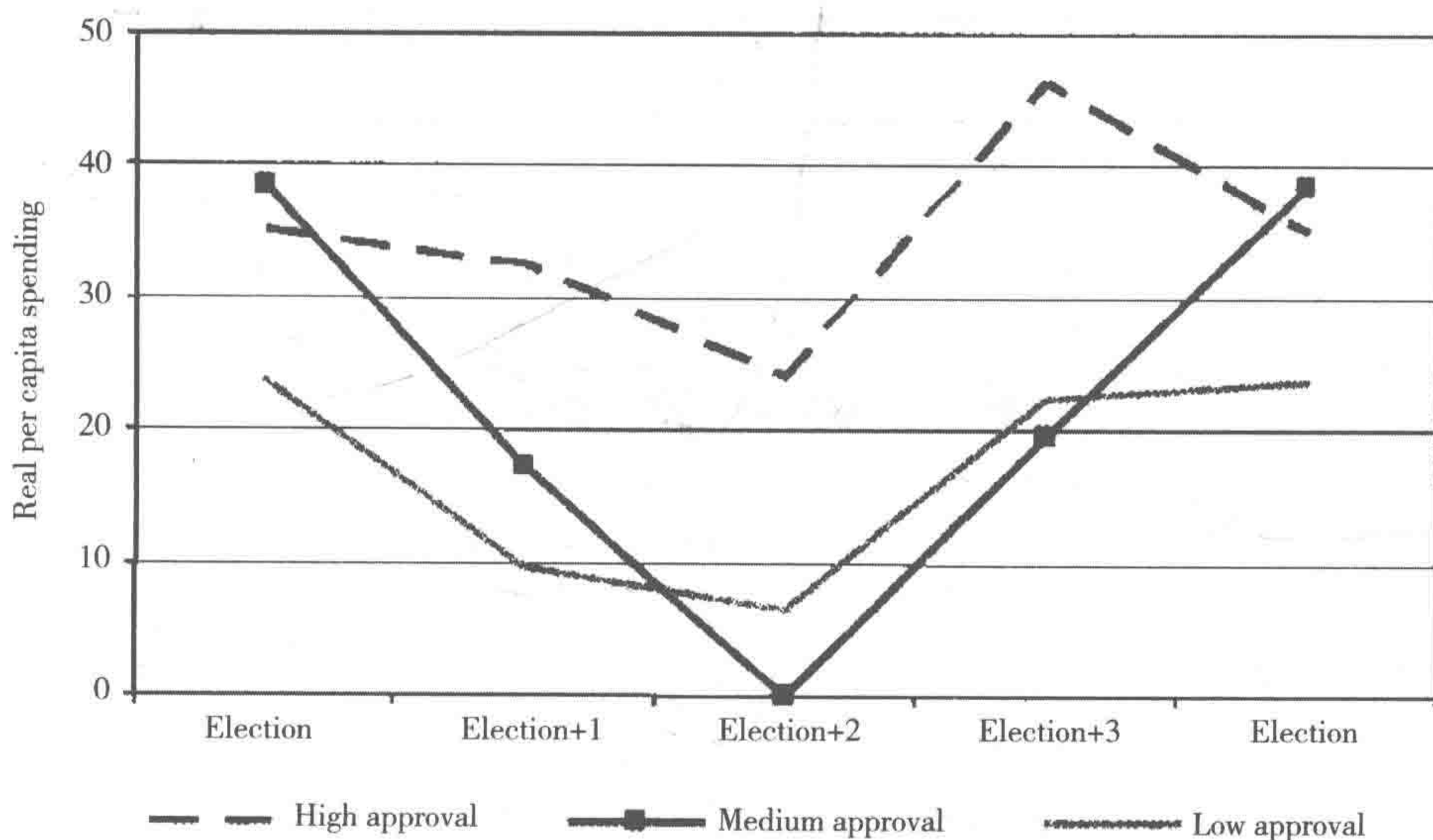


图 34.1 政治商业周期与支持率

任期限制。我们预期,如果州长们能够为再次任职参选,则周期会更为明显,因为受到任期限制的州长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动机去表现自己的能力。但实际结果相反,图 34.2 表明,在没有任期限制的州,州长任期限制为两届,但还有连任机会的州,以及州

<sup>①</sup> 这 38 美元的强度测量就通常意义而言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中等支持率的情况下,显著性检验仅取决于选举年变量的系数误差和标准误差。

<sup>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当州长的支持率比较高时,平均支出水平也是最高的。这种平均支出水平的差异虽然非常有意思,但超出了我们这一章的范围。我们在此关注的仅是不同环境下周期的相对强度。这一案例中的显著性检验以测试两个系数是否相等为基础。



长两届任期即将届满的州之间,周期的差异并不明显。不过,在只能任职一届的州,周期要稍微明显一些,而且这一差别的显著度达到 10% 的水平。这一结果是令人困惑,原因可能如上文所提到的,是政党的力量推动着那些受到任期限制的州长们付出努力,这种可能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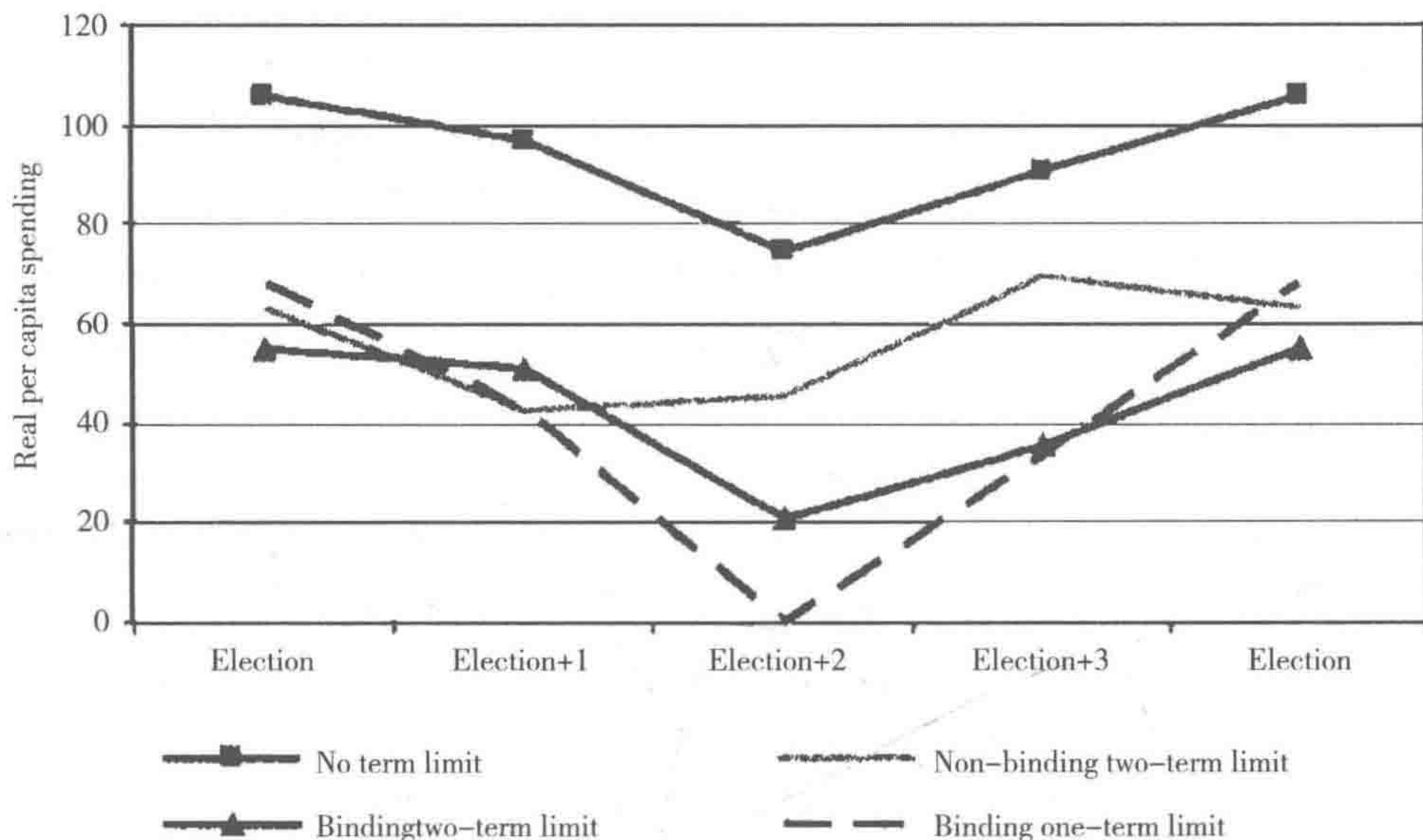


图 34.2 政治商业周期与任期限制

### 3.2 能力

**分权政府。**如果政府部门由同一政党控制会增加操控政府财政的能力(和动机),那么由单一政党控制的政府会比分权政府表现出更明显的周期。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在一党掌握政府下存在明显周期的证据。但是,图 34.3 却表明,周期实际上在分权政府之下要稍微明显一些,虽然这种差异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sup>①</sup>

**透明度。**如果政治家们能够通过信息不对称来愚弄选民,使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么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周期会更为明显。如图 34.4 所示,实际情况与我们的预期一样,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32 美元)周期最明显,随后是透明度中等的情况(30 美元),最后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28 美元)。但是这些差异很小,也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媒体渗透程度。**按照同样的思路,如果强大媒体的存在能够通过增加信息流动间接提高财政透明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期,与报刊发行量较高的情况相比,报刊发行

<sup>①</sup> 换言之,这两种基本完全一致的周期类似不受约束的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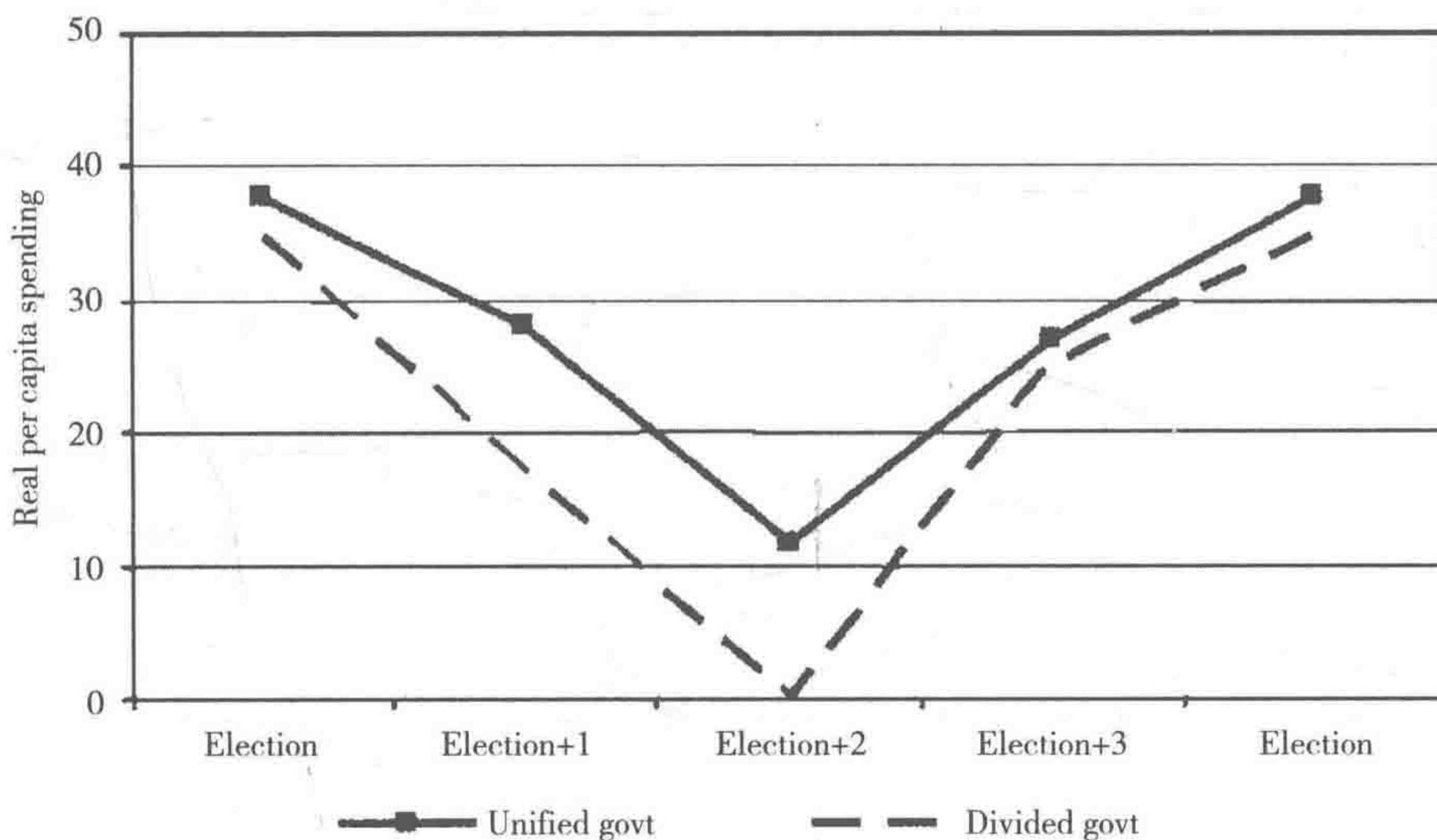


图 34.3 政治商业周期与分权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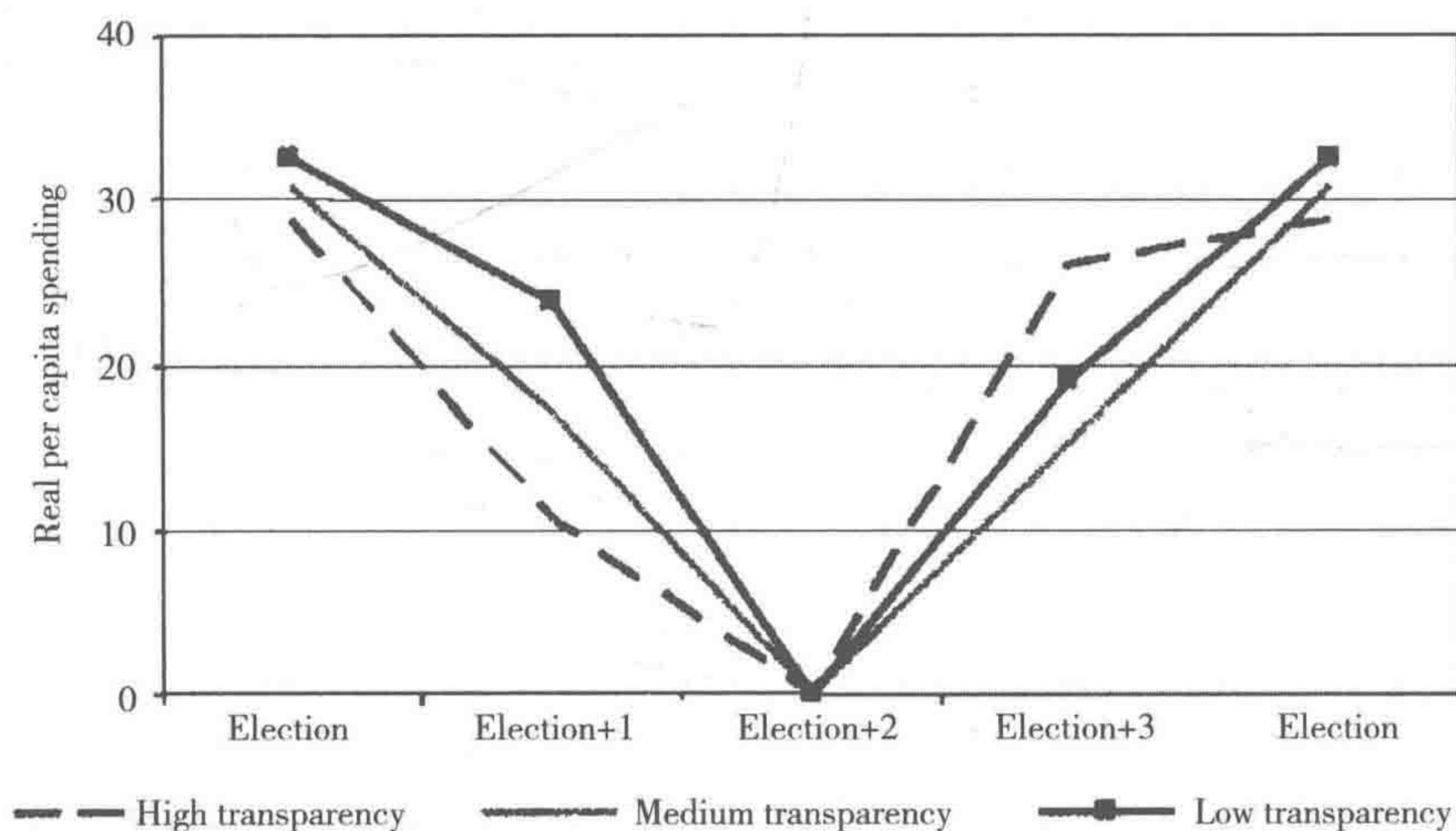


图 34.4 政治商业周期与财政透明度

量较低的情况下周期会更为明显。图 34.5 表明,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预算周期在报刊发行量较低的情况下(47 美元)要比中等发行量的情况下(14 美元)更明显,这一差异的显著度达到 5%的水平。令人奇怪的是,在发行量最高的情况下,周期要比中等发行量的情况更明显。不过,这两种受约束的周期之间差别的显著度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财政规则。**最后,如果财政规则能够有效地限制政治家实行赤字财政,并且为当选而控制支出的时间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没有此类规则的州观察到比存在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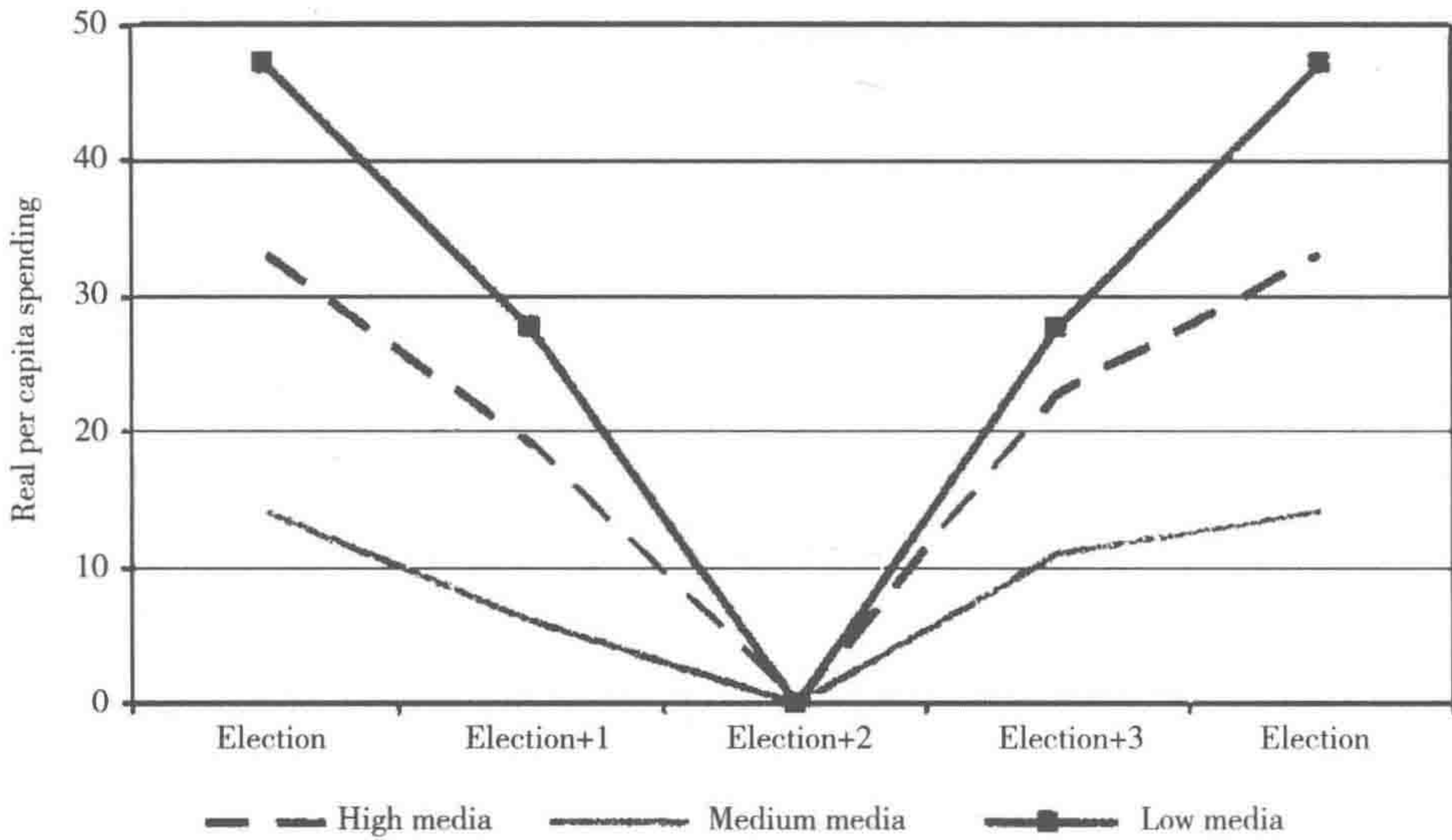


图 34.5 政治商业周期与媒体

规则的州更明显的周期。正如我们所预计的,在没有财政规则的情况下,周期非常显著(曲线顶部和底部的差距达 46 美元),而有财政规则的情况下,差距只有 6 美元,差异的显著度达到 1% 的水平。在对政治预算周期强度的测量中,即使把其他一些不同的控制变量包含进来,这仍然是我们发现的单个环境差异中最大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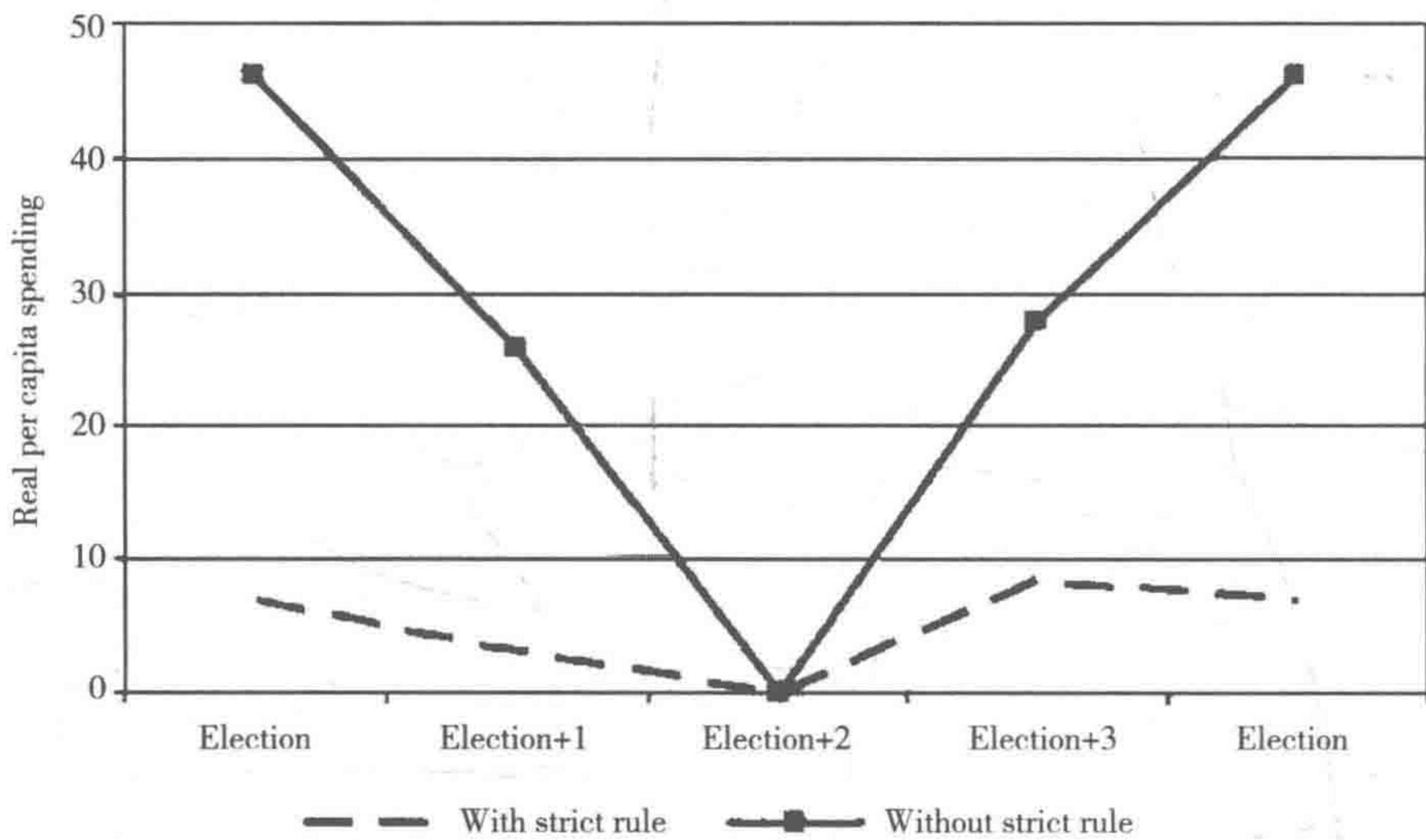


图 34.6 政治预算周期与财政规则

#### 四、结论:回应与执行

我们对选举导致的支出波动的探讨始于两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更容易发生?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是可欲的?”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一方面,能够再次当选的可能性看来很重要;即将来临的选举的竞争性(体现为对州长工作的中等认可程度),都与选举前夕支出的大幅增长有关。导致这一结果的机制是由舒尔茨(Schultz 1995)发现的,它研究的是与美国非常不同的(国家层面的,议会制的,欧洲式的)英国案例。信息的流动似乎也是影响当政者能力的一个因素,他们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加强政治预算周期:较低的报刊发行量与相当明显预算周期相联系。这一点与阿克梅多夫和朱拉夫斯卡娅(Akhmedov and Zhuravskaya 2004)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即俄罗斯地方政府,发现的结果类似。其他结果(如分权政府和透明度)并不明显,虽然它们在其他跨国研究中有所体现。

最明显的效应是由平衡预算的法律带来的。那些限制政治家通过发行公债弥补支出缺口的州,就没有出现政治预算周期。但这一结果既有趣,同时也是令人迷惑。它之所以有趣,因为从整体上看跨国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它之所以令人迷惑,则是因为虽然人们都同意此类法律能够产生实际作用,但并不清楚为何它们并没有被规避。在存在禁止延期的法律的地方仍然会出现赤字,但为何找不到支出方面存在周期的证据?我们也没有观察到对错误行为的司法处罚。如果政治家有制造政治预算周期的强烈动机,为何他们还会遵守法律?

这里有一个可能的答案,也将为对回应制的研究提供某些启示。我们认为,透明度使选民们能够监督当政者的行为。据说,当透明度增加,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减少。但假定问题并不在于缺乏信息:

信息并不缺乏:实际上,它非常丰富。但提取信号——关于事情的真相——很难。多维度的问题就更为复杂……对于选民来说,范围总是太大以至于他们很难在所有领域控制政府。(Przeworski 2003, 157 页)

劳瑞和阿尔特(Lowry and Alt 2001)认为,平衡预算的要求让债券市场的参与者能够良好地解决这一信息提取问题,因此

它让原来没有获得充分信息的债券市场投资者,能够区分即便没有法院的直接强制也会遵循传统和期望保持平衡的政治家和不这样做的政治家。(Lowry and Alt 2001, 50 页)

这就是说,在那些存在禁止延期的规则的州,如果政治连续推行赤字政策,那么投

资者会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机会主义,并作出激烈反应。既然知道如此行动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当政者们就会避免这种行为。

但此类法律“起作用”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有助于信号提取,而且也在于它们能够委托人们达成一致的评价标准。我们须要注意到,从代理人的角度看,这种一致并不一定是坏事:

试图增强其权力的代理人希望使他们的行为在一个单一的维度上受到控制……他们并不在意这个角度是什么,只要(委托人)能够在这个单一的角度上达成一致。这样,代理人就能将问题转变为单纯的协调性,而非讨价还价的博弈。(Ferejohn 1999, 151 页)

因此,想要借贷和支出的代理人就可能会需要这类法规,而意见与利益各不相同的委托人也会发现,协调起来推行这类法律乃是一件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但即便如此,

协调问题给控制执政者带来困难……如果政治委托人只是投票者,很少参与到政治过程,那么很难指望公职人员在行使其代理责任的时候受到太多的约束。(Ferejohn 1999, 150 页)

所以对政治预算周期的研究结论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与债券市场不同,选民们很难有效监控机会主义政治家。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协调,委托人之间太多的不一致性也是一个问题,而且选民多多少少总是比市场参与者更具多样性。再者,债券市场中的监控其实是市场参与者投资活动的“副产品”。其二,导致这一结果的机制,会让人们想到跨国研究中投资者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案例。流动资产的所有者能够防止体现为腐败的寻租行为(Adsera, Boix and Payne 2003);浮动汇率市场上资本的流动,也会让市场参与者防止政治预算周期(Clark 2003)。

## 参考文献

- ADSERA, A., BOIX, C., and PAYNE, M. 2003. Are you being serve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2): 445-90.
- AKHMEDOV, A., and ZHURAVSKAYA, E. 2004. Opportunistic political cycles: test in a young democracy sett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1-38.
- ALESINA, A. 1987.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a two-party system as a repeated ga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2: 651-78.
- 1988. Macroeconomics and polit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croeconomics Annual*, 3: 13-61.
- COHEN, G., and ROUBIN I, N. 1992.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elections in OECD democracies.

-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1):1-30.
- ROUBIN I, N., with COHEN, C. 1997.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TABELLINI, G. 1990. A positive theory of budget deficits and government deb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7:403-14.
- ALT, J. E. 1985. Political parties, world demand, and unemploym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1016-40.
- and CHRYSTAL, K. A. 1983. *Political Econo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d LASSEN, D. D. 2006. Transparency,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OECD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530-50.
- and SKILLING, D. 2002. Fiscal transparency, gubernatorial popularity, and the scale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 2:230-50.
- and LOWRY, R. C. 2000. A dynamic model of state budget outcomes under divided partisan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62:1035-69.
- ARELLANO, M., and BOND, S. 1991.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277-97.
- BECK, N. 1987. Elections and the Fed: is there a political monetary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1):194-216.
- BESLEY, T., and CASE, A. 1995. Does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ffect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Evidence from gubernatorial term limi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769-98.
- BEYLE, T., NIEMI, R., and SIGELMAN, L. 2002. Gubernatorial, senatorial, and state-level 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the U. S. officials job approval ratings (JAR) collection. *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 2:215-29.
- BLOCK, S. 2001. Elections,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and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 BRAMBOR, T., CLARK, W. R., and GOLDBERGER, M. 2005. Understanding interaction models: improving empirical analyses. *Political Analysis*, 13:1-20.
- BRENDER, A., and DRAZEN, A. 2005.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new versus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forthcoming).
- CARLSEN, F. 1998. Rational partisan theory: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5(1):64-82.
- CLARK, W. R. 2003. *Capitalism, not Globalism: Capital Mobility,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 HALLERBERG, M. 2000. Mobile capital,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electorally induced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323-46.
- CLINGERMAYER, J. C., and WOOD, B. D. 1995. Disentangling patterns of state debt financing. *American*

-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i): 108–20.
- Cox, G., and K A T Z, J. 2002. *Elbridge Gerry's Salaman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KIERMAN, A., and MELTZER, A. 1986. A positive theory and discretionary policy, the cost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the benefits of a constitution. *Economic Inquiry*, 24: 367–88.
- DRAZEN, A. 2001.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after 25 yea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 75–117.
- DREHER, A., and VAUBEL, R. 2005.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a panel data analysis. Unpublished MS.
- FEREJOHN, J. 1999. Accountability and authority: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Manin, Przeworski, and Stokes 1999: 131–54.
- FRANZESE, R. 2002. Electoral and partisan cycles in economic policies and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369–422.
- FREY, B. 1978.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 GOLDEN, D., and POTERBA, J. 1980. The price of popularit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examine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696–714.
- GRIER, K. 1987.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Federal Reserve policy: an empirical tes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4(2): 474–86.
- HALLERBERG, M. 2002. Veto players and the choice of monetar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775–802.
- HALLERBERG, M. 2003. Fiscal rules and fiscal policy. Pp. 393 – 401 in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 B.G. Peters and J. Pierre. London: Sage.
- HAYNES, S.E., and STONE, J. 1989. An integrated test for electoral cycles in the US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3): 426–34.
- HIBBS, D. 1977.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4): 1467–87.
- 1987.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ECH, W., and PAR, K. 1989. Electoral cycles and budgetary growth in veterans' benefits progra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901–11.
- KRAUSE, G. 2005. Electoral incentive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ost-war US personal income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 77–101.
- LACHLER, U. 1978.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a complementary stud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5: 131–43.
- LEWIS-BECK, M.S.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OHMANN, S. 1998. Rationalizing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a workhorse model. *Economics & Politics*, 10: 1–17.

- LOWRY, R. C., and ALT, J. E. 2001. A visible hand? Intertemporal efficiency, costly information, and market-based enforcement of balanced-budget laws. *Economics & Politics*, 13: 49–72.
- LUCAS, 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 19–46.
- MANIN, B., PRZEWORSKI, A., and STOKES, S. eds. 1999.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LLUM, B. 1978.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an empirical tes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4: 504–15.
- NICKELL, S. 1981. Biases in dynamic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 *Econometrica*, 49(6): 1417–26.
- NORDHAUS, W. 1975.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1): 169–90.
- PERSSON, T., and TABELLINI, G. 2002. Do electoral cycles differ across political systems? Working paper. Stockholm.
- 2003.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PRZEWORSKI, A. 2003. *States and Marke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GOFF, K. 1990. Equilibrium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21–36.
- and SIBERT, A. 1988. Ele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5(1): 1–16.
- ROSE, S. 2006. Do fiscal rules dampen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Public Choice*, 128: 407–31.
- SAPORITI, A., and STREB, J. M. 2003.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MS. Queen Mary University.
- SCHUKNECHT, L. 1999. Fiscal policy cycles and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5: 569–80.
- SCHULTZ, K. 1995.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1): 79–99.
- SHI, M., and SVENSSON, J. 2002.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S. IIES.
- 2003.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Nordic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9(1): 67–76.
- SMITH, A. 2004. *Election Tim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H, B. H. 1986.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tic countries. *Kyklos*, 39: 31–46.
- TSEBELIS, G. 2002. *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UFTE, E. 1978.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G.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6(1): 20–9.



## 第三十五章 全球视野下的福利国家

马休·E.卡尼斯(Matthew E.Carnes)

伊莎贝拉·马尔斯(Isabela Mares)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不同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发展变化的研究,成为比较政治学内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为理解不同福利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付出了持续的努力,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们在方法上不拘一格,理论上充满活力。这些研究成果有效地说明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即在公民疾病、老年和失业时使他们免受贫困之苦的能力。

发达工业经济体一直处于社会保护政策经验研究的核心地位。这是一个自然的起点,因为在这些经济体中,福利国家的比重已经占到GDP的30%到65%。比较研究根据这些案例得出了一些重要发现,即此类社会政策都集中出现在一个特别的“国家家族”或“福利资本主义世界”之中(Esping-Andersen 1990; Castles 1993; Huber and Stephens 2001)。但是,在解释所观察到的政策及其分配效果的多样性时,对于不同政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仍旧存在重要的理论争议。

我们在本章中认为,福利国家研究最令人振奋的机遇,来自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保护政策多样性的考察。研究福利国家的学者需要扩展他们的分析范围。在最近几十年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社会保障政策经历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中有两大趋势需要予以系统解释。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政策并没有单方面地转向某种新自由主义的、残留式的社会保障模式,其特征是覆盖范围有限且以私营方式提供福利。虽然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公民老年保险项目已经部分或全部私有化,但其他一些经济体——如中国台湾地区或韩国——却实行了向全体公民提供服务的全员社会保障计划(Wong 2004)。其次,我们发现这些政策的演变及其分配效应在不同政策领域明显不同。就分配效应来说,健康保障政策就比养老保障政策更为发达——这一结果在拉美和东亚

的政策变化中都可以看出来。

这些新近的变化向研究福利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一项重要挑战。基于发达工业经济体的经验得出的现有理论,能否解释发展中国家福利政策新近的变化?是否存在某种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适用的解释变量?如果有这种变量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如果已有的解释不能说明上述令人迷惑的结果,那么又如何寻找一些基本概念,以说明社会政策发展的多样性?本章将介绍福利国家研究中采用的一些主要方法,并分析它们在说明世界范围内社会政策变化不同轨迹的能力。

### 一、基础性结构条件:工业化和经济开放程度

最早关于社会政策起源的研究假定,经济增长和发展是解释现代福利国家出现和扩展的关键因素。因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将提高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和技术水平;就业人数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又将刺激政府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并且对因年老而不能继续工作的人提供保护;教育和劳动保护则导致了社会支出水平的提高(Wilensky 1975)。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福利国家的发展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化这一更广阔的进程的一个“副产品”(Huber and Stephens 2001)。

在经合组织国家对上述假设进行的量化检验表明,像工业化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变量与社会支出的总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Wilensky 1975)。相反,在更大范围内,即经合组织国家之外检验这一假设,则尚未得出确定的结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或者总税入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弱,而且经常达不到统计所要求的显著水平(Adsera and Boix 2002; Mares 2005)。

这一条研究路线意味着,东亚经济体——如中国台湾地区或韩国——社会政策投入水平的提高乃是它们经济发展的结果。东亚和拉美经济体在近几十年内经济发展道路的差别,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并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拉美,战后一段时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亚洲的情况则不同,这段时间制造业雇佣的人口一直在增加,这也就需要更多的措施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收入支持。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发展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是各地区社会支出出现差异的前提。

强调“工业主义逻辑”的研究存在一个主要局限,那就是它们并没有对基础性结构经济变量的差异与社会支出政策的不同之间的联系机制进行准确的描述。它们也没有说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将选择什么类型的社会政策。换言之,在类似的经

济发展水平上,为何一些国家选择了分配性的保障政策,而另一些却继续依赖残留式的、私人性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此外,这些理论也不足以解释一个国家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它们很难解释为什么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在健康领域采取了普遍的社会保障政策,而在养老方面则仅提供了相当有限的社会保障。

第二种类型的观点把宏观的结构性基础因素与公共部门的规模联系起来,并强调更高的经济开放程度的影响。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证明,经济开放程度——以进出口总量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和公共部门的规模正相关(Cameron 1978)。卡梅隆的研究基于对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分析,时段从1960年到1975年。为了说明这些结果,卡梅隆假设在开放经济体中,政府之所以实行收入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是为了补偿外部竞争对工人就业和收入造成的威胁。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定性研究补充了上述统计结果,他们考察了欧洲很多国家战后推行的产业和社会政策,说明这些经济体是如何“用国内的补偿性政策配合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的自由主义追求”(Katzenstein 1985, 47页; Ruggie 1982)。杰弗里·加雷特(Geoffrey Garrett)和狄波拉·米切尔(Deborah Mitchell)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更新了卡梅隆最初的发现,并且考察了其他的经济开放性指标(如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公共部门的规模之间的关系(Garrett and Mitchell 2001),阿里西亚·阿德赛拉(Alicia Adsera)与卡尔斯·波瓦克斯(Carles Boix)则考察了政体形式对经济开放性与中央政府收入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Adsera and Boix 200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质疑,经济开放性与公共部门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是否稳健,且能得到更大数量案例的支持。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证明,经济开放性与公共部门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并不仅仅存在于经合组织国家。但是,与卡梅隆和加雷特不同,罗德克认为要对贸易造成的外部不安全进行测量,合适的标准并非经济开放程度,而是贸易的变化。罗德里克提出,贸易变化会导致收入变化,进而导致对能够抵御由此产生的负面冲击的社会保障政策更高的需求,他并且为此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证据。而且,开放性对福利国家的规模也会产生一种压缩效应。在资本流动程度很高的环境下,政府难以通过提高对资本的税收补偿工人,其结果就是公共部门增长率的下降(Rodrik 1997, 90页)。<sup>①</sup>

虽然这一研究领域在经验上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但它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

<sup>①</sup> 此句原文为“government are unable to and the result is a increase taxes on capital to compensate labor, and the result is a dampening...”,疑有误。——译者

首先是因变量的累积性太强。卡梅隆采用的是政府总收入,罗德里克使用的是政府支出数据,阿德赛拉和波瓦克斯使用的则是中央政府的货币收入数据(Cameron 1978, 1244; Rodrik 1998; Adsera and Boix 2002, 239 页)。这些宽泛的观测值——将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混在一起——并不能确切反映为缓解由贸易变化带来的经济不稳定所花费的专门支出。比如罗德克认为,军事开支,或者政府对资本品的采购,在防范外部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个观点存在漏洞,且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即为何一些政府选择了这些特殊的支出而非社会政策支出来保护工人防范外部风险。

其次,以支出为基础的测量方法回避了政策设计的问题,而这是一些在政治上重要、在分配方面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对福利国家的很多数量研究中所采用的这样一种测量方法,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进行简单明了的批评。他指出:“对福利国家的理论本质来说,支出只是表面现象。很难想象某个人会只为支出而战。”(Esping-Andersen 1990, 19—21 页)。

最后,支出分配与花费水平同等重要。对因经济衰退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来说,重要的并非“人均社会政策支出”这一人工统计数据,而是他们受社会政策覆盖的实际情况,包括社会政策福利的水平及其具体规定,获益资格标准的严格程度,等等。福利花费水平相等的国家,往往不均衡地在不同群体的公民,或者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之间分配支出。一些国家可能制定非常高的支出目标以减少政治受益者的人数,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使福利惠及全体国民。与此相类似,在社会政策支出水平相近的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政策转移的组合也相当不同。因此,如果仅使用累积性的支出数据,有关很多社会政策分配效果的重要信息就会被掩盖。在近期的研究中,马尔斯(Mares)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以反映一百多个国家在保险覆盖率及风险再分配方面的政策差异,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过分依赖基于支出的测量方法(Mares 2005, 2006b)。

此类将较高的经济风险与较大规模的福利国家关联起来的论断,能够解释最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福利国家的另一种发展轨迹吗?考夫曼(Kaufman)和萨格拉—尤比哥(Segura-Ubierno)通过对 14 个拉美国家 1973 年至 1997 年社会支出变化的分析,发现经济开放性的增加伴随着社会政策支出的下降(Kaufman and Sagura-Ubierno 2001, 578 页)。与此相反,有几项研究证明,在近期的金融危机中亚洲经济体受到的巨大冲击导致了公共部门规模的扩大。虽然这些研究与罗德里克的观点一致,即经济开放对公共部门规模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单向的,但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还需要进行更细密的理论推断。

可以说,近期对经济不安全与较大规模的福利国家之间关系进行检验的文献,表明人们在整合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方面付出的重要努力。未来这一方

向的研究应该关注以下的问题。首先,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检验这些观点在微观层面的影响。更高的外部风险是否与更强的社会支出需求系统相关?在预测个人对社会支出的需求方面,外部风险的结果与其他变量相比意义有多大?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当前研究中所采用的因变量累积性太强。今后的研究需要确定,哪些政策的确是对更大程度的开放性的应对措施,并且采用更为准确的因变量测量手段检验开放性与社会支出之间的关系。最后,当前的研究仅只关注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以及外部开放性的变化如何影响了这种需求),但同样重要的,是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不同社会政策的能力的变化情况加以研究。我们将在本章的下一节分析导致社会政策供给产生差异的那些变量。

## 二、权力资源的视角

强调国家间宏观的结构性差异的解释存在一个内在的局限,它们缺乏一种将这些变量与较大规模的公共部门或社会政策(其特点是更广的覆盖面和更高水平的再分配)关联起来的政治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的权力资源的研究方法,开始着力克服这一内在局限(Esping-Andersen 1985; Korpi and Shalev 1979; Stephens 1979)。这一视角将社会支出的差异归因于劳工组织与代表保守政治力量的组织之间权力平衡的差异。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组织能力的上升,或者雇主力量的下降,都会导致社会支出的增加。对于权力资源视角之下社会政策的形成方式,斯考切波(Skocpol)与阿曼塔(Amenta)进行了如下简明的总结:

领取工资、最后是薪金的工人中很大一部分被组织到集中化的工会中,而这些工会又在经济上滋养了受同样一批作为选民的工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由于此类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同时存在于市场和政治领域内,因此人们假定,通过把阶级斗争引入政治领域,国家的税收、支出和行政能力都能够得到扩展,因为在民主国家,工人由于其数量上的优势更乐于在政治领域解决问题。这一种模型认为,工人们越早、越充分地被组织到集中化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中,且社会民主党控制国家的时间越长,现代福利国家发展也就越早、越“充分”。(Skocpol and Amenta 1986)

最早对权力资源视角下得出的预测进行检验的研究考察了战后欧洲社会政策的发展。艾斯平—安德森和科皮(Korpi)认为,德国和奥地利“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高度集中”,而这种集中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未到达的,这可以解释上述国家社会保障计划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重大差别(Esping-Andersen and Korpi 1984, 203页)。以这一定性研究为基础,一系列定量研究也证明,以各种方式展现出来的劳工的力

量——从工会的密集程度到工资谈判的集中化程度,再到社会民主党所占的席位数——与累积性社会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Huber and Stephens 2001)。权力资源的研究者还指出,政府中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与较为庞大的公共部门相关,也与福利国家的不同类型相关。为系统检验这一观点,艾斯平—安德森设计了一项指数,以测量劳工政策使工人的“商品地位”得以减轻的程度,结果发现,在左翼力量的大小与去商品化的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Esping-Andersen 1990, 52 页)。

虽然权力资源研究与过往解释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一研究路径也面临着一些理论上的局限。首先,它对劳工在社会保障中的利益作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假设,而没有区分部门的(或者个人层面的)变量,以说明不同的工会或者工人在社会保障政策设计方面的不同立场。其次,这一研究路径认为在劳工和雇主之间存在一种零和的冲突。它假定,劳工之所以需要新的社会政策,是为了补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得地位(Korpi 1983)。相反,雇主们则反对任何新政策的扩展。这一社会政策问题上零和分配冲突的假设,内在于权力资源研究者所采用的社会政策的定义之中。既然社会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去商品化”把“工人从市场依赖中解放出来”,那么雇主必然会拒绝一切使他们对工人的绝对权威受到削弱的政策(Esping-Andersen 1990)。尽管权力资源的视角从未检验其假设的有效性,新一波的研究已经证明,不能没有根据地假定雇主会反对任何新的社会政策,而且他们对新社会政策的偏好实际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再次,权力资源研究把社会民主党视为铁板一块,但实际上它们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表现出很大差别,而且甚至在党内也会出现分裂。此类研究也未能充分考虑选举对这些政党的活动施加的限制。近来的研究则已经证明,政治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左翼政党挑战者的身份认同影响了政策选择的时机和特点(Kitschelt 2000)。而且,社会民主党也未曾全体一致地要求为所有工人提供普遍的保护。在这些政党刚刚出现的年代,社会政策是它们赢得选民支持的重要资源(Shefter 1977);而在战后的很多时候,这些政党仅致力于服务其“内部成员”,即构成政党基础的拥有稳定的工作的工人(Rueda 2005)。

最后,此类研究中大多数采用两种可以互换的方法衡量工人的力量,即左翼政党的力量与工会组织性。但是,并不能够假定这些行为者在偏好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一致性。选举策略对于左翼政党来说非常重要,它会影响到这些政党推行不同的转移和服务组合的动机。与此相反,工会首先考虑的是其成员实际收入的最大化;社会政策方面的考虑虽然重要,但仅占据比较次要的位置。近来的一些研究,已经摒弃了较早时候关于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政府之间可替换性的假设。它们开始关注这些行为体之间的交易、在各

种交易中的政策得失,以及工会和政府针对某些特定的社会政策进行的政治交易能够持续的条件。这些研究表明,原有的对福利国家规模的承诺,以及社会服务与转移之间的混合,都会影响工会调整其收入要求以换取社会政策转移的意愿(Mares 2004, 2006b)。如果税收负担增加,或者非工会成员得到的社会政策服务和转移增加,那么工会降低工资要求的动机就会减小。至于工会的工资政策对就业状况的影响,则取决于工资谈判系统的集中化程度。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的偏好及其采取的策略,权力资源视角的研究只能提供比较有限的指导。政党在意识形态的考虑与选举策略之间是如何权衡得失的?既然劳工仅仅是此类政党众多不同的选民群体之一,那么社会政策在协调这些异质的联盟方面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拉丁美洲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如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以及阿根廷的贝隆主义党所推行的政策,都不符合权力资源理论的预期。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些政党都拒绝了它们的领导人提出的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它们的目标只是让其阶级基础中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受益。穆里洛(Murillo)和卡尔沃(Calvo)令人信服地证明,贝隆主义党实行的竞选策略,是承诺为其劳工选民提供一种具有裙带主义性质的私人产品(Murillo and Calvo 2004)。

因此,权力资源视角并不能充分说明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政策新近的变化。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两个既缺乏有力的社会民主政党,也没有强大的工会的地方,率先推行了全民健康保险(Wong 2004)。其次,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拉美和东亚近期改革所涉及的政策领域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医疗保障改革导致的更明显的再分配效应。最后,如穆里洛指出的那样,要理解拉美最近几十年间劳工政党的策略,以及劳工政党与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得以维系的条件,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劳工政党的竞选力量和政治力量,还需要寻找其他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选举竞争的层次和性质,以及工会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竞争(Murillo 2000, 2001)。

### 三、跨阶级联盟

近年来出现了新一波对发达工业经济体社会政策演变的研究,它对权力资源理论的理论假设和经验性结果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有力的批判。这些批判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类研究试图确认社会保障为行为者而非工人带来利益;另一类研究则挑战了雇主和工人在引入新的社会政策时零和冲突的假设,并且试图指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雇主们也支持新的社会政策,以及能够推动跨阶级联盟形成的更广泛的政治因素。

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对欧洲五个国家社会保障的历史起源进行了研究,

其中他有力地批判了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与普遍主义纲领的起源联系起来的理论 (Baldwin 1990)。他发现,在丹麦和瑞典,普遍主义的、以税收作为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并不是在二战之后、而是在二十世纪初开始推行的,那时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取得在政治上的压倒优势。在这一时期,普遍主义纲领最强大的推动者是代表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政党,如丹麦的自由党或者瑞典的农民党。普遍主义的纲领之所以赢得这些行为者的支持出于一系列的原因:它们让数量更多的民众分摊了税收负担,降低了许多小农户的非工资劳动成本。由于农业劳动力具有高度异质性,既包括小农户也包括工资劳动者,一种由税收支持的、普遍主义的选择比分配政策更具吸引力。

这一对权力资源视角的经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除阶级地位之外,鲍德温还明确了另外一些影响社会行为者对社会保障的偏好的变量。在这样一种对社会政策发展的叙述中,针对新的社会政策的引入而进行的重要的政治斗争,就不再是永远处于不利地位的无产者和他们握有资本的政治对手之间的斗争。鲍德温指出:

虽然一般来说,为社会政策而战的的行为者与社会阶级相互交错,而且常常彼此重合,但事实上就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由于通过社会保障进行的第二次再分配直接根据保险精算标准重新分配了灾难的成本,而不是根据第一次经济分配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划分,所以这类行为者一直是最初的、最直接的风险承受者,他们只能间接地、而且不确定地由通常采用的阶级和社会群体的概念加以概括 (Baldwin 1990, 11—12)。

在这一叙述中,两个新增的变量反映了一项新的社会政策导入时社会分裂的显著程度:风险概率及“一个群体自我依靠的能力”(它由一个群体的价值观和经济前景所决定)。鲍德温估计,风险概率比较高且自我依靠能力较低的群体,会倾向以保障形式的再分配,如集资形式的社会保障,或者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相反,风险概率较低、且自我依靠能力较强的群体,会倾向于覆盖面较小的政策,而且他们通常也能够(且愿意)实行这种政策。

通过明确社会保障其他方面利益的来源,这一理论视角为理解劳工运动较弱的经济体中围绕社会政策产生的分配争端的重要工具。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社会保障的逐步扩展——从仅覆盖大公司内部很少一部分工人到汇合了所有保障资金的全民健康保障——在已被保险覆盖的行为者与试图获得此类保障的新群体之间导致了重大的分配争端 (Lin 1997)。被社会政策覆盖的人和未被社会政策覆盖的人的相对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示政策制定过程中这些群体的政治要求。如果已经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与尚未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相比面对的风险较低,他们就会倾向反对政策扩展,或者要求国家以补助金或者降低保障基金缴纳份额的方式为他们作出补偿。相反,如果未受



益者风险相对更高的话,已受益者就会倾向于社会保障的扩展。

对权力资源视角的第二个批判挑战了雇主和工人在引入新的社会政策时零和冲突的假设,或者彼得·斯文森(Peter Swenson)所说的“固定阶级利益均衡假设”(Swenson 2002, 9页)。近来一系列新的研究指出,这一假设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雇主们并没有铁板一块地反对新的社会政策,也并非仅仅支持由企业实施的外包型社会政策。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商业领域中的关键部门都选择了覆盖面较广、而且再分配风险较大的社会政策。这些实例提出了两个系列的问题。其一有关偏好。社会保障中商业利益的来源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可以解释企业社会政策偏好的差别?其二,在正确认识雇主的偏好的基础上,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以理解新社会政策引入时出现的博弈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政治联盟。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才会对社会政策感兴趣?对企业来说社会政策意味着什么?这类政策能够为雇主提供什么样的制度便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些利益能够超出社会政策加诸企业的“成本”(此类“成本”可能以投保或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形式出现,它们可能会减少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的弹性)?以雇主为中心的新的研究为上述疑问提供了一些答案。其中的一类解释关注雇主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收益与收入相关的政策为高技术的工人提供了相对更多的利益,这就减少了他们接受与他们的技术能力不相匹配的工作的动机。在此情况下,社会政策就成为“保持技术的工具”(Mares 2003, 2005)。其他研究则把雇主们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与他们在生产市场上与其他企业竞争的努力联系起来(Swenson 2002)。

这些研究结合鲍德温早期的发现,并且证明相对风险预期不仅决定了工人,也决定了雇主对社会政策的偏好。引入社会政策立法的历史中有大量例证,表明高风险与低风险部门雇主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冲突。工作场所中意外事故发生率较高的工业行业更倾向于采用强制性的意外伤害保险;意外发生率较低的行业就会强烈反对这种政策提议。失业风险较高的行业会倾向于统一投保的政策;失业风险较低的行业则会反对此类政策。我们在近年提前退休政策的演变过程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分配机制在起作用。相对高龄的工人较多的企业会充分利用现有政策提供的可能对这些工人提供保护(Mares 2003)。

近来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在解释企业对不同社会政策结果的偏好的变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反映企业对社会政策结果的偏好变动的几项重要指标,包括企业规模、劳动力的技术构成、产品市场中的竞争程度,以及企业相对的预期。这些研究不仅成功破除了企业铁板一块地反对新社会政策的假设,同时也更关注不同行为者围绕新社会政策引入而进行的博弈过程中的策略考虑。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是“策略性联

盟”，即不同的行为体根据其次优偏好形成联盟。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采用博弈论指明政治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如议会中政治构成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工会和雇主的策略谋划，以及支持那些对他们来说仅是“次优选择”的意愿（Mares 2001, 2005）。

这类以企业为中心的解释能否帮助我们说明近几十年来世界不同国家在社会政策改革方面走过的不同路径？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企业对社会政策的支持与劳动力的技术强度有关。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在企业主要依赖低工资劳动的发展中国家，雇主对强制性的社会保障政策并不热心。人们也能推知，在东亚经济体中有可能发现企业对社会政策零零星星的支持，因为技术工人的增加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提（Haggard and Kaufman 2006）。以企业为中心对社会政策发展的研究在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时具有强大解释力。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韩国福利国家的发展及近期政策变化过程中雇主所扮演的角色（Yang 2004）。另外一些考察失业保障在东亚国家的引入过程的比较研究，则试图探明不同企业技术强度的差别是否能够说明它们对这类政策不同程度的支持（Choung 2006; Song 2006）。

#### 四、国家中心的视角

无论是强调劳工运动政治资源，还是强调跨阶级联盟的研究，都仅为国家官僚追求的利益和战略保留一种边缘性的位置。对一些学者来说，官僚仅在“无足轻重的”缝隙之中，即那些强有力的社会行为体对新的计划设计达成共识之后，才发挥作用（Baldwin 1990）。对另一些研究者来说，官僚不过是其政治主人驯服的工具。正是在这种智识环境之下，斯考切波（Skocpol）和伊万斯（Evans）关于“找回国家”的呼吁开启了一条有价值的研究道路（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它对官僚政治偏好的来源提出了一些解释。其次，它考察了国家结构及既有政策对后续政策发展的影响。

官僚对不同社会政策的偏好从何而来？哪些因素能够对这些偏好的不同加以解释？一些研究认为，国家的偏好来自于官僚行为者对过往政策的经验。玛格丽特·韦尔（Margaret Weir）和特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通过分析英国、瑞典及美国引入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过程，对这一逻辑提供了某种说明（Weir and Skocpol 1985）。美国和瑞典采取了自动调节公共支出的政策，以应对大萧条时期的就业冲击。韦尔和斯考切波尝试解释的是，为何在大萧条时期英国没有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英国劳工和工会的力量都与瑞典相当。她们将这一政策差异归因于过往政策的经验。她们认为，英国政策制定者对于一种更为有限的失业保障政策（在1911年引入）的经验，

使英国的公务员不愿意尝试更大规模的公共项目的实验,而这正是凯恩斯主义复兴计划的核心。与此相反,瑞典和美国的官僚缺乏相似的历史遗产,对更为激烈的政策调整持开放态度,因而能够接受公共工程项目支出的大幅增长。

其他对官僚政策偏好变化的解释强调观念因素以及不同政策理念的影响(Hall 1989, 1993)。海克罗(Hecló)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国家官员不仅运用权力(或者无论这种研究用哪个词来表达),他们还制造谜团”(Hecló 1974, 305页)。一些学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认为,这种思想变化并不来自于从成本—收益角度对最佳行动方案进行的理性计算。发挥作用的是认知捷径。政策制定者并不会权衡所有相关信息,他们只注重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根据某些狭隘的观察得出一般性的结论(Weyland 2005, forthcoming)。维兰德(Weyland)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模式为何能够迅速扩展到全世界。他的发现说明了某些与私有化进程相关的经验规律,即相邻国家同时采用了某种政策模式,以及发生同一变革的国家的逐渐趋同化。这种理论不仅可以说明近来养老金私有化的扩展,也可以解释战后初期大多数拉美国家对集资型保险政策的接受,以及这种政策在俾斯麦率先立法之后在欧洲的普及。

国家中心的理论,为理解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的改革进程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具。由于在许多经济体中工会、雇主联盟以及其他社会行为者力量弱小,官僚部门作为日程设定者就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巨大影响(Shmuthkalin 2006)。不过,这些解释也存在明显缺陷。一些研究认为官僚的偏好具有连续性(源自他们对过往政策的经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官僚的偏好会迅速改变(因为他们依赖认知捷径);只有极少研究指明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连续性、又是哪些因素引起了变化。霍尔(Hall)在早期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认为,与过往政策和实践的决裂(用库恩式的比喻称之为“三阶式”的政策变化),可能是一种由官僚体系之外的因素导致的过程(Hall 1993)。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研究对这种观点进行系统检验,维兰德近期的研究发现了一些由官僚独自促成的急剧变化的实例。最后,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在何种一般化的条件下,官僚偏好的变化对新政策的引入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在很多拉美国家,大量由官僚提出的私有化方案都被挫败了。因此,要提出一种更完备的解释,以更准确地推断改革的时机和内容,就需要更详尽地把握政策制定过程的机制,既需要考虑官僚之外的其他行为体,也要辨明这些行为体对官僚的选择施加的限制。

国家中心的视角还有另外一条不同的研究路径,试图探明现有社会政策对后续的政治发展产生独立影响的条件。皮尔森(Pierson)对英国和美国政策收缩的研究,为这种“政策反馈”的逻辑提供了一项很好的佐证(Pierson 1994)。在这两个国家,两位右翼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着力要废除已有的收入支持政策。

但他们的继任者却把关注的焦点系统性地转向了其他的政策领域。如皮尔森所言,不同的政策设计(它会影响政治家隐藏不受欢迎的措施的能力)可以解释在不同领域的政策收缩。基于皮尔森的发现,一系列其他研究开始系统探索“政策制造政策”的机制(Pierson 1994, 2001, 2004; Campbell 2002, 2003)。这些研究证明,既有的政策对于利益集团的力量和动员、选民的投票率,以及政策实施者帮助政策制定时未被考虑的团体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都会产生影响。此外,还有大量研究揭示了福利国家的设计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包括女性和高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Esping-Andersen 1990; Scharpf and Schmidt 2000)。

这些研究对认识发展中的国家社会政策改革也具有若干启示。在这些国家,既有政策的不同设计,也会影响政策改革过程中不同行为体的偏好和相对的博弈力量。在一些经济体中(如阿根廷和中国台湾地区),工业或手工业的工会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政策实施的特点影响了相关行为者的偏好,任何将政策实施的责任从他们那里转移到国家身上的提议,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政策制定者则常常以从工会手中拿走政策实施责任相威胁,换取他们对其他方面政策变化的配合,如养老制度的私有化等。因此,虽然这样一种政策制定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增强了工会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恩惠的来源),但它同时又在博弈过程中削弱了工会,得到了工会在其他政策领域的顺从。

强调“政策反馈”的理论也为解释近二十年来养老和健康政策方面差异巨大的变革路径提供了某些帮助。拉美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通过改革,增强了老年保障中私营部门的作用,这往往使低收入的人群更难于受益。相反,健康保险改革的特点则是明显增加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政策支出,甚至那些收入差距极大的国家(如玻利瓦尔、秘鲁和哥伦比亚)也都推行了一系列为赤贫者提供健康补助的项目,且增加了在基本医疗方面的投入。养老和健康保障方面政策设计的差异,既导致了引入这些政策时的分配冲突,大概也能够说明结果方面的差异。政策设计方面有两点明显的不同。首先是公共品外部性的大小。公共健康政策(如免疫计划)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外部性,即便对那些在经济意义上纯粹对此类计划做贡献的群体来说也是如此。这样就可以缓和分配冲突,也使高收入群体乐于接受贫困者收益的增加。在养老和健康保障领域政策设计方面第二个重要的不同是时限的不同。就健康保险来说,当下的投入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收获利益,但养老保障要等很长时间以后才有收益。这一差异也可能导致这两类项目扩展时的支持水平,以及分配冲突的程度有所差别。

我们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的演变时,不仅需要了解政策制定方面的差异,也要注意政策实施方面的不同,后者在两个方面影响后续政策的变化。税收能力的弱小

(这主要是、但不必然是社会安全管理资源弱小的结果)影响了不同项目财政方面的可持续性。国家执行能力总体上的弱小可能会增加私有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的吸引力。但国家并非仅在征税能力方面有差别,在税收的均等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各类收入群体对社会政策的贡献度差异极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安全管理部门缺乏关于小店主或其他就业不稳定的群体的收入信息,而且在决定不同职业应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时往往采用不同的标准。这类在政策实施中的分配的不均,会引起其他部门质疑现有社会政策是否“公平”,也会影响它们对以公私混合的方式提供社会福利的偏好。玛尔斯基基于这种逻辑认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差异影响了支持不同政策的政治联盟的构成。一些群体即便能够从社会保障的扩展中获益,但如果它们发现社会政策的实施中存在不公正,也会撤回对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社会政策的支持(Mares 2005, 2006b)。

总的来说,关注行政官僚的偏好变化和政策反馈的研究路径,为我们理解近年来社会政策改革的机制增加了非常重要的元素。它们为我们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理论得出的预期目前为止仅在累积数据层面上得到了验证。今后的研究应该对各种谈判过程进行更具体细致的描述,以充实这些初步的发现。这将使我们能够对有关不同的过往政策影响下不同部门策略缺陷的预测进行检验。最后,要说明不同政策的支持联盟的变化情况,还需要基于个人的调查数据(包括个人对累积性社会支出的支持度,以及个人对以何种方式混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供的福利的态度)。

## 五、结 论

本章开篇之初就指出,比较福利国家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兼收并蓄和累积进步是其明显的优势。现有的研究已经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的政治成果,即那些帮助工人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战胜暂时的或永久的经济困难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十年前,斯考切波和阿曼塔在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评论中,呼吁研究者们“严格遵循历史的逻辑”(Skocpol and Amenta 1986, 152 页,斜体字部分为原文所有)。过去二十年中出现的大量的研究文献遵循了这一劝告,并从中获益。细致的历史研究(通过历史背景了解关键行为者的偏好,但同时也密切关注现有制度安排的政治结果)为我们认识社会政策的起源和结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比较福利国家的文献不仅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的研究议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对关于制度变迁及转型过程这一更广泛的理论争论作出了巨大贡献(Streeck and Thelen 2005)。

我们在本章中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政策研究明确转向比较研究的时候。我们

对经合组织成员之外国家社会政策差异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 16 世纪的水平,有大片领域处于未知状态。福利国家研究者们未来几十年的目标,就是说明并解释这些差异。在这方面,对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社会政策发展轨迹的现有研究成果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

## 参考文献

- ADSERA, A., and Boix, C. 2002. Trade, democracy, and the size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open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2): 229-62.
- BALDWIN, P. 1990.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Class Bases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1875-19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ERON, D. R. 1978.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4): 1243-61.
- CAMPBELL, A. 2002. Self-interest,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distinctive participation patterns of senior citize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3): 565-74.
- 2003. *How Policies Make Citizens: Senior Citizen Activism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STLES, F. G. ed. 1993. *Families of Nations: Patterns of Public Polic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ldershot: Dartmouth Publishing Library.
- CHOUNG, J.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protection. 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CROUCH, C., and STREECK, W. 1997.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 Sage.
- ESPING-ANDERSEN, G.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KORPI, W. 1984. Social policy as class politics in post-war capitalism: Scandinavia, Austria and Germany. Pp. 179-208 in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 ed. J. Goldthor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 RUESCHEMEYER, D., and SKOCPOL, T.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RRETT, G. 1998. 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787-824.
- and MITCHELL, D. 2001. Globalizatio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9(2): 145-77.
- HAGGARD, S., and KAUFMAN, R. 2006. Recrafting social contracts: welfare reform in Latin Ameri-

- ca, 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MS.
- HALL, P. A. ed. 1989.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33): 275–96.
- and SOSKICE, D. W.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CLO, H. 1974.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From Relief to Income Maintenance*. Yale Studies in Political Science 2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BER, E., and STEPHENS, J. D.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TZENSTEIN, P. J.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Cornell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 R. R., and SEGURA-UBIERGO, A. 2001. Globaliz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73–97. *World Politics*, 53: 553–87.
- KITSCHOLT, H. 2000. Partisan competition and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when do politicians choose unpopular policies? Pp. 265–302 i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ed. P. Pier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RPI, W.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and S H A L E V, M. 1979. Strikes, industrial-relation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2): 164–87.
- LEVITSKY, S., and MURILLO, M. V. 2006. Variation in institutional weaknes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from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MS.
- LIN, K. 1997.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statism: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MADRID, R. L. 2003. *Retir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Priv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LLOY, J. M. 1979.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ecurity in Brazi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MARES, I. 2001. Firms and the welfare state: when, why, and how does social policy matter to employers? Pp. 184–212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ed. P. Hall and D. Sosk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isk: Business and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Wage bargaining in the presence of social policy transfers. *World Politics*, 57(1): 99–142.
- 2005. Social protection around the world: external insecurity, state capacity,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leavag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6): 623–51.
- 2006a. *Taxation, Wage Bargaining and Unemployment*. 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b.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social protection. Unpublished MS. Columbia University.
- MURILLO, M. V. 2000. From populism to neoliberalism; labor unions and market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 52: 135–74.
- 2001. *Labor Unions, Partisan Coalitions and Market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CALVO, E. 2004. Who delivers? Partisan clients in the Argentine electoral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742–57.
- PIERSON, P. 199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791–821.
- 2001.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DRIK, D.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8.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997–1032.
- RUEDA, D. 2005. Insider-outsider politics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the challenge to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1): 61–74.
- RUGGIE, J.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79–415.
- SCHARPF, F., and SCHMIDT, V. 2000. *Welfare and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FTER, M. 1977. Party and patronage; Germany, England, and Italy. *Politics & Society*, 7(4): 403–51.
- SHMUTHKALIN, W. 2006. Political regimes and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how state leaders matter to social policy expansion in Taiwan, Thailand and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SKOCPOL, T, and AMENTA, E. 1986. States and social polic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131–57.
- STEPHENS, J. D. 1979.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New Studies i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 STREECK, W, and THELEN, K. 2005.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NG, J. 2006. Enterprise unions and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labor, union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Korea,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System Restructuring in East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 SWENSON, P. 1991. Bringing capital back in, or social-democracy reconsidered; employer power, cross-class alliances, and 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ial-relations in Denmark and Sweden. *World Politics*, 43



(4):513-44.

——2002.*Capitalists against Markets: The Making of Labor Markets and Welfare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LEN, K. 2001. Varieties of labor politics in the developed democracies. Pp. 71-103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ed. P. Hall and D. Sosk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IR, M., and SKOCPOL, T. 1985.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wed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 107-63.

WEYLAND, K. 2004. *Learning from Foreign Models in Latin American Policy Reform*.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Theories of policy diffusion: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pension reforms. *World Politics*, 57 (2): 262-95. Forthcoming.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Policy Diffusion: Social Sector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WILENSKY, H.L. 1975.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NG, J. 2004. *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ci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YANG, J. 2004.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Korean welfare system: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authoritarian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in Korean].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5).

## 第三十六章 不良民主国家的不良表现<sup>①</sup>

菲利普·基弗(Philip Keefer)

因为所有富裕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因此发展和民主之间模糊的关系已经让研究者们困惑了很久。不过,如果考虑到政体的异质性,则这种模糊性倒也不太令人惊奇。尤其是在考察政治的政策选择时,异质性问题更为明显,它不仅体现在穷国与富国之间,而且在体现在贫穷的和富裕的、年轻的和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发展理论的概念工具,并不能为这诸多差异提供解释。例如这种理论一般假设,民主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平民出身的政客们试图通过再分配精英的既得利益,以取悦平民选民。但是,在不良的民主国家,不仅再分配程度较低,而且腐败盛行,这就意味着平民选民仅有非常有限的可能,要求他们的平民领袖对其行为加以回应。

本章对近期的一批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它们通过分析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性,为政体类别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常关系,特别是为何贫穷民主国家的表现与富裕民主国家的表现如此不同提供某种解释。政治市场很容易陷入不完善,因为公民在决定支持哪位政治竞争者时,只能依靠他们的承诺。如果人们无从观察政治家是否信守承诺,或者对失信者无从处罚,从而使政治家可以为选票更改承诺,那么政治市场就会失效。在这一点上,民主和发展理论一般认为,平民政客可以对平民选民作出可信的承诺。但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学者们已经找到充分证据,表明真实情况远非如此。

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强调影响政体表现的内生性因素,不等于轻视外部因素对政府表现的潜在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富国对资本、商品和劳动力流入,特别是流出穷国的影响,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然而,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因素能够为穷

---

<sup>①</sup> 本章的所有观点、解释和结论由作者负责,它们并不必然反映世界银行及其执行委员会,或者它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立场。

富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提供系统解释。同时,下文分析的贫穷民主国家的政策选择,也并非是对这些因素最佳的回应。

## 一、穷国以及其政策

理解国家间政策异质性的根源,是从一种更广阔的视野认识民主、政治经济以及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一部分将用充分的证据表明,富国和穷国,以及贫穷民主国家与富裕民主国家之间,在一系列政策领域都存在明显不同。这些差别中大多与经济发展(包括宏观经济与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及教育、公共设施、产权保障和财政再分配有关。虽然上述因素中没有一个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充分解释,但也没有人会怀疑如果它们全都运转不良,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严重阻碍。可以看到,穷国与富国在这些政策领域的选择非常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政体类别加以解释。与民主与发展之间的模糊关系类似,贫穷的民主国家与贫穷的非民主国家的政策选择也并没有太大区别(见表 36.1)<sup>①</sup>。

表 36.1 贫穷民主国家与贫穷的非民主国家表现类似

	贫穷的非民主国家 (no.)	贫穷的民主国家 (no.)	富裕的民主国家 (no.)
中间消费物价上涨率,1985	9.41(40)	8.49(13)	7.05(40)
中间消费物价上涨率,% ,2000	3.91(38)	4.31(32)	3.12(60)
平均政府债务/GDP,% ,1998	71.3(14)	53.3(16)	47.38(28)
海关滞留时间	6.8(15)	8.15(16)	5.23(17)
履行一项合同的时间	410(37)	416(30)	331(50)
政府总支出/GDP,% ,1998	.25(21)	.23(21)	.32(38)
中学入学率(%入学学龄儿童总数),1998	39.8(34)	45.7(25)	95.8(48)
铺设道路/全部道路,1998	44.8(11)	38.9(14)	69.7(22)
腐败程度(0—6,最低=6),1997	2.7(25)	2.9(34)	4.1(49)

<sup>①</sup> 在这一节中,我们简单地把民主国家定义为具有竞争性选举的国家,这与政治制度数据库(Beck et al. 2001)的定义相一致,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民主和发展理论高度重视选举制度。

续表

	贫穷的非民主国家 (no.)	贫穷的民主国家 (no.)	富裕的民主国家 (no.)
官僚素质(0—6,最高=6),2000	2.3(28)	2.4(30)	4.6(51)
法治水平(0—6,最高=6)	3.7(28)	2.9(30)	4.6(51)

注:腐败、官僚素质和法治水平的数据来自政治风险服务,即《各国风险指南》,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 1.1 华盛顿共识: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家所有制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及至90年代,被冠以华盛顿或“新自由主义”共识之名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对增长失败的回应。虽然这些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基本上都在90年代接受了这一共识。然而,到90年代末,穷国和富国之间一个巨大的政策鸿沟已经明显表现出来。<sup>①</sup>

1985年,富国和穷国的贸易量分别是83%和67%<sup>②</sup>,到2000年,两类国家的贸易量分别都增长了将近25%。<sup>③</sup>两者之间在贸易量方面的差距只是稍稍增大了一点;但在2000年,68个年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调整之后)超过5385美元的国家,其进出口商品和服务达到了GDP的百分之百,而68个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仅达81%。<sup>④</sup>从1985年到2000年,所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值也都下降了,但同样的,2000年较穷国家中的这一数值还是高出了将近25%。在2000年62个数据完整的国家中,31个富国政府平均债务占GDP的39%;而31个穷国政府平均债务要高出很多,占GDP的64%,与1985年的同一数据即45%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

政体类别对于改革的选择,特别是贫困的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来说似乎没有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在2000年,贫穷的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太大差别;在穷国中,无论是1985年还是2000年,政体和贸易总量都并不相关。只有负债额方面,民主制度造成了一些差别:至少在2000年,民主国家,包括贫穷的民主国家,其负债额要明显少于非民主国家。

① 参见Zagha(2005)的回顾性研究。

② 原文如此,疑为27%之误。——译者

③ 贸易政策可能是有关全球化政策选择的一个较好的指标,但使用它们进行国际比较容易产生误导。一个国家可能设置了低关税和高配额,另一个国家则可能相反;一个国家可能对进口商品征税,另一个可能对农产品进口征税。在实践上,国家的排名会因人们选取的贸易政策或者贸易政策指数而产生重大变化(Pritchett 1991)。

④ 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加进口;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

## 1.2 管治

继华盛顿共识之后,政策建议再次发生转向,并把改变扭曲的管治环境作为基本目标。同样,在管治效果对增长的影响强度,以及广义的社会收益是否超出了管治成本方面并没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如果不论与增长质量相关的那些重要问题(比如增长在各国造成的不同环境后果),人们一般会认为,管治会限制企业的投资意愿,并进而限制经济增长。与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民主国家相比,穷国在管治问题上会采取一种明显不同的立场,它们会比其他所有国家竖立更多的管治壁垒。

根据世界银行“经营”项目(2004)和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从2001年到2004年的多种数据)而得出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从三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在32个穷国和20个富国中,海关滞留时间分别是6.3天和3.8天;在68个穷国和60个富国中,履行一项合同分别需要377天和294天;在64个穷国和60个富国中,解决一项破产平均需要的时间分别是3.6年和2年。与像通货膨胀和贸易流动等宏观经济结果相比,政府能够更为有效地控制这些管治变量,因而它们也能更为清晰地反映出富国与穷国政府在决策方面的差异。人们可能会认为,穷国难以维持有效管治所需要的行政机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人均收入从5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区间内(占国家总数的75%),收入与管治表现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Engerman and Sokoloff 2002)发现,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那些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准入门槛较低,管制也较为宽松。实际上,所有民主国家执行一项契约所用的时间都比非民主国家少10%的天数,而在处理破产事务时甚至要少用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在比较贫穷的国家,竞争性选举在执行契约和处理破产方面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实际上它们还造成了更长的海关滞留。

## 1.3 政府规模与再分配

政府的再分配角色在研究民主制度与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中占有核心位置。例如,普列泽沃斯基和李蒙奇(Przeworski<sup>①</sup> and Limongi 1993)认为,选举会使穷人更容易地对富人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但同时也会降低投资的回报和发展速度。<sup>②</sup> 阿克莫格鲁和罗宾森(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民主与收入正相关,但他们同样高度关注再分配和财产权的保障问题。

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穷国,无论是否采用民主制,进行了较多的再分配。政府

① 原文为 Przeworski, 疑为 Przeworski 之误。——译者

②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政治不稳定以及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会对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但实际上它们也许能够通过再分配得到缓解(Kefer and Knack 2002; Svensson 1998)。

的总体规模是再分配的一个指标,而贫穷国家的政府规模都非常小。1998年,有84个国家提供了统一的中央政府支出数据,其中42个比较贫困的国家平均政府支出仅占GDP的24%,而其他42个国家的平均政府支出要高出整整8个百分点。<sup>①</sup> 社会安全是再分配的一种潜在形式;1988年有64个国家提供了社会安全税收的数据,其中32个最穷的国家社会安全总税收(由工人和雇主支付)的平均值为零;而32个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收入超过6635美元的国家,这一数值占到了GDP的6%。

民主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有其微妙之处。波瓦克斯(Boix 2003)与阿克莫格鲁和罗宾森(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认为,如果政治和经济精英预料到会出现实质性的再分配,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允许民主化。因此,在所有国家,竞争性选举都与政府支出无关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波瓦克斯(Boix 2003)进一步认为,公民对代际转移和失业补助的要求会与国家的收入一同增长,但只有在民主国家这一要求才会转变为政府政策。与此相一致,他发现民主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显著且正向的关系(Boix 2003)。<sup>②</sup>

但是,贫穷国家的情况与这些理论就一致了,竞争性选举对于政府支出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否控制人均收入,具有竞争性选举的贫穷国家在政府支出方面都要比非民主的贫穷国家至少低5个GDP百分点。即使我们同意对再分配性支出的需求会随收入发生剧烈变化,且当精英们预料到要进行较高水平的再分配时会阻止民主化,但贫穷民主国家的支出仍然大大小于贫穷的非民主国家,这仍然令人惊奇。

贫穷国家的税收更少,且方式也不同。与波瓦克斯(Boix 2003)的观点相一致,在1998年(这一年有80多个国家提供了数据),贫穷国家平均税收总额占GDP的18%,而富裕国家的这一数据达到了GDP的31%。然而,穷困民主国家的税收总额又比非民主的贫穷国家低了3.6个GDP百分点。贫穷国家较少依赖所得税与社会安全税,它们更多依赖非税收带来的收入(这一收入在富裕国家平均占GDP的2%,在贫穷国家占3%)。但是,与贫穷的非民主国家相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所得税收入要低两个GDP百分点。

已经有相当多的论文讨论了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后者认为,较富裕国家的公民会要求更大的政府,并以此解释穷国的政府为何都比较小。但是,瓦格纳定律并没有解释为何政府总支出和再分配对政体类别并不敏感,即为何贫穷民主国家的支出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少。本章的例证,以及马里甘、吉尔和萨拉—伊—马丁

① 这一组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年收入平均值是6101美元。

② 这一结论需要如下假设:国家观察的误差项不随时间而变化,且不足以改变这个假设(考虑到累积误差)。但是,如果控制住累积误差的话,那么工业附加值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要且显著的关系,这也许能够直接验证波瓦克斯的假设。

(Mulligan, Gil, and Sala-i-Martin 2004) 都表明了这一事实。这一现象挑战了有关民主与发展的理论,对此我们将在下文继续探讨。

#### 1.4 公共品及政府支出的构成

学者们认为,有关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政策选择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如 Easterly and Servén 2004)。贫穷国家这方面的供给明显要差得多。1998年,59个提供数据的贫穷国家,其中平均入学率要比59个富裕国家低54%。2000年,在中等贫穷国家,只有20.9%的人能够用上电;但在中等富裕国家,这一比例达到了92.9%。1999年,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收入达到4626美元以上的69个国家,经铺设的公路占道路总量的69%,而在70个没有达到这一收入标准的贫穷国家,这一比例仅达21%。<sup>①</sup>

收入并不能解释贫穷国家低水平的供给。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入学率方面的巨大差别形成对照的是,它们在教育支出方面的差距要小得多。1998年(在那些能够得到有效数据的国家中),39个富裕国家平均教育支出是GDP的2.9%,而40个贫穷国家的这一数值是2.6%。与以前的发现相一致,贫穷民主国家的教育支出,要少于没有竞争性选举的国家。

在贫穷国家,工资是教育支出中的大头,相对而言数额较小。两类国家教育支出大致相同,但入学率却差异巨大,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无非有两种,或者是贫穷国家对教育的需求较低,或者教育开支被挪用到别处。高支出、低入学率的国家众所周知的腐败模式就支持后一种解释。福斯特和罗森茨威格(Foster and Rosenzweig 1996)认为,(印度)对教育的需求与教育的回报有关,这是一种不同的解释。

整个20世纪90年代,贫穷国家公共投入水平实际上要高一些。在37个提供了数据的贫穷国家中,这一投入平均占GDP的3.9%,而在36个富国中,这一数值是2.8%。特别是在这十年的初期,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1990年贫穷国家公共投入平均占GDP的5.1%,而富裕国家平均只占2.7%。也许可以把这种高投入归因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欠缺,以及大规模投入产生的高回报。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穷国和富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会趋于接近。但是,尽管连续多年进行了额外的投入,两类国家基础设施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1990年是能够获得公路信息的第一年,从那时起到1999年,富裕国家平均道路铺设率从61.3%增加到69%,而贫

<sup>①</sup> 如果仅对49个同时提供了公共投资和铺设道路信息的国家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富裕国家的平均道路铺设率达到85%,而贫困国家的道路铺设率仅达35%。

穷国家的这一数值基本没有变化,仍然停留在 21%。

如果为裙带关系或者其他特殊目的投资比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政治上更有利可图,那么政治动机就会在投资与收效之间打入一块楔子。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投资其实早就有了自己的标签:“猪肉桶”。从公共就业支出的情况可以看出,追求特殊利益的动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均收入(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后)高于 6101 美元的 42 个国家中,薪金支出的平均值是 GDP 的 4.5%,但在 42 个收入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贫穷国家,这一比例高达 5.6%。

竞争性选举对是否能够用上电,能否铺设公路和公共支出方面都没有影响。无论是否控制收入,贫穷国家的竞争性选举与道路铺设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冯(Feng 2003)发现,无论是否控制收入,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入学率都比较高。但是,这一比例完全靠富裕民主国家拉上来的。事实是,无论是否控制收入,25 个贫穷民主国家与 34 个非民主国家的入学率相差无几。仅仅在薪金支出方面,政体效应较为明显。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它都随民主的进程而下降。

### 1.5 治理:官僚素质、腐败及产权保护

很多学者的经验研究认为,法治、腐败、官僚的素质,以及其他治理因素都对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早期文献参见 Keefer and Knack 1997),主要原因是它们可以降低个人投资的风险调整回报率。所有这些治理因素都具有公共品的特性,这将它们与之前讨论的政策联系在一起。根据定义,一个为所有公民平等服务的政府就不是专制的。当法治、一致性或者官僚的素质开始下降时,政府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可以想见,那些不能提供充分的教育或基础设施的政府,同样不能充分提供像官僚的素质这样的公共品。毫不奇怪,贫穷国家在所有治理维度上都比富国差得多。如果采用《世界各国风险指南》的标准,它们几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冯(Feng 2003)发现,类似的治理变量与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如果使用政治制度数据库(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的民主测评标准(选举的竞争性),而且考虑贫穷国家的情况,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腐败或官僚素质方面,贫穷的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区别;而法治的状况在贫穷的民主国家的确要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差很多。

## 二、解释民主与增长关系中的含混之处

政策扭曲的常见特征是,它们会使普通公民受损,而使少数特殊利益群体从中获



益。快速通关手续与倾向于拖延海关滞留时间的政策相比,对普通人更为有利。从定义上看,官僚的高素质、政府的一致性以及法治都对普通人有利。如果普通人的利益受损,唯一的制度性补救措施似乎就是竞争性的选举。但是,上文述及的关系并不支持这一猜想,因为贫穷国家竞争性选举导致的政策结果,与没有竞争性选举的贫穷国家并无不同,甚至更糟。

但无论如何,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争论还是转向分权与制衡,以及竞争性选举的作用问题,这些都是定义民主制的核心的制度安排。这一争论关注的是同一个政策硬币的两面: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公民不受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又在多大程度上鼓励了对增长具有控制作用的再分配。

政府并不能向民众提供充分的保证,使他们的投资不被政府或其他民众侵吞,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政治的分权与制衡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制度手段。诺斯和文加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考察了不存在竞争性选举的情况下政治分权与制衡所发挥的作用。他们表明,英国王室的财政需要如何使它越来越多地剥夺英国贵族和外国债权人的利益,英国精英对此加以抗拒的努力如何最终导致了光荣革命,以及作为革命结果拥有无上权力的英国议会又如何向英国主权债务的购买者们担保,英国一定会履行它的义务。<sup>①</sup>

然而也另有一些研究发现,仅仅依靠政治上的分权与制衡就能够为财产权提供充分强大的保护这一论点,缺乏足够的经济证据加以支持。基佛和科奈克(Keef er and Knack 1998)发现,对政治分权与制衡的主观测量(来自政治体 II 的行政约束);对产权保护来说具有统计意义,但实际效果有限。基佛(Keef er 2004)指出,如果控制竞争性选举的话,那么对分权与制衡的客观测量所发现的重要作用就会大大减弱。

斯塔萨维奇(Stasavage 2003)在对光荣革命的重新考察中强调,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否决者的动机。情况可能是选举为政治分权与制衡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因为它迫使多个否决者去满足更大多数选民的意愿,从而增加了比如剥夺的政治成本。一旦民主缺失,绝大多数公民失去否决的渠道,那么就只有在拥有否决权的少数精英恰好与他们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他们才能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保护。基佛(forthcoming)发现,在银行危机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选政府拒绝为失败的银行注资。贝茨(Bates 1983)对独立后非民主非洲国家的研究证明,那里相当缺乏针对机会主义行为的保护措施。由于民主的缺失,那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能够随心所欲地侵害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小农的

<sup>①</sup> 斯塔萨维奇(Stasavage 2003)表明,这一保障出现在英国商人能够在议会中行使否决权的那些年。

利益。

与民主优势论相对,另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因为加剧了从政治与经济精英向平民的再分配,所以会迟滞经济发展。普列泽沃斯基和李蒙奇(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认为,由于这些抵消性因素的存在,民主与增长之间不会存在明显的关联。与此相一致,他们所回顾的早期文献在民主对增长的影响问题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很多论文甚至否认这种影响。马里甘、吉尔和萨拉—伊—马丁(Mulligan, Gil, and Sala-i-Martin 2004)则提供证据表明,民主会带来更多的递减税和更少的支出,他们的结论是制度根本不重要。他们认为,各国的政策差异,是其社会利益差异的结果。但是,如果制度与社会政策无关,那么就很难解释人们为了改变或者维护制度而付出的努力(甚至要以生命和金钱为代价)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说明民主与增长之间关联性的缺乏,学者们除了指出更多的财产安全和更多的再分配之间相互抵消的作用之外,还注意到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是数据。测量民主的混乱方式也会掩盖民主与增长之间任何重要的联系。但是,即便使用更为精确的对民主加以测量的方法,两者关系中的含混之处仍然存在。第二个是概念。研究者认识到,民主并非外部赋予的国家特性。因此,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不同社会选择民主的条件之后,才可能在民主与增长的关系问题上得出可靠的结论。虽然这一思路较好地说明了民主与发展关系中的模糊性,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贫富民主国家的不同表现。

## 2.1 数据、民主与发展

早期关注民主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者们主要依据的,是“自由之家”(Gastil 1998)关于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的数据,以及班克斯(Banks 1971)和“政治体”(Polity)的数据(Gurr, Jagers and Moore 1990),后者基于对一国的行政机构是否受到约束,以及政治参与是否开放等方面的专业评估(参见Bollen 1993的讨论)。但这些指标的使用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些数据在被编制时已经包含了对政体表现的评价,从而导致了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在评价者认为表现比较好的国家,评测结果自然就会比较好。“自由之家”的数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障是制度安排、而非制度安排的指标的结果。虽然戈尔、雅格和摩尔(Gurr, Jagers, and Moore 1990)的“政治体”关于民主的测评指标可以部分地免于上述批评,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即使某些国家不存在政治上正式的制约与平衡,“政治体”的测评体系仍然可以认为它们的行政专权受到了实质性的约束。由于民主与发展理论关注的是规范化的民主制度,所

以使用“政治体”数据就会产生解释和内生性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困难在于我们缺乏衡量不同制度相对重要性的清晰标准(像竞争性选举相对于政治上的制约与平衡)。比如,根据政治体 IV 的数据,研究者在判断政治参与是否开放时无法确定竞争性选举的权重,而前者又恰恰是这组数据中民主制的一项标准;另外研究者们也不能确定,对行政权的约束,是来自制度性的制约与平衡,还是不那么制度化的对行政专权的限制。

为克服这些困难,贝克等人(Beck et al. 2001)在政治制度数据库中,利用客观标准(不论有多少个政党参与竞争,没有一个政党或候选人获得 75% 以上的选票),对立法和行政机构选举的竞争性分别进行测量。利用这些数据,基弗(Keefer 2004)认为定期竞争性选举的引入可以解释 1975—2000 年这一时期的增长,但前提是对内生性加以控制。<sup>①</sup> 普列泽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 et al. 2000)结合了从 1950 年以来的数据,它们根据同等透明的标准对民主国家加以界定,即领导人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而且至少进行了一次领导人改选(Boix and Rosato 2001 把这一变量延伸到了 1800 年)。但是,把 1950 年以后国家和年份的变量放到同一个面板上加以评估,他们仍然发现民主并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虽然令人失望,但显然更精确的数据也未能解开为何民主表现不佳这个谜团。

## 2.2 历史,民主与增长

阿克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和波瓦克斯(Boix 2003)认为,民主与增长之间之所以存在一种暧昧关系,是因为只有当关键行为者相信民主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时候才会选择民主。当然,这又取决于行为者对民主制之下再分配效果的预期,它们形成于行为者们不能就未来的再分配达成可信协定时。阿克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认为,最初精英控制了政府与经济,但他们面临着一种双重的信任困境。首先,他们不能令人信服地承诺不对平民进行剥夺。平民因此不再投资,增长就会迟缓。然而,如果精英们能够为平民提供民主制度并且确保其财产安全,并以此从平民那里换取可信的承诺,为他们提供收益中相当一部分份额的话,精英就能因此获得巨大的收入。但是,第二重信任困境会破坏这个契约,因为失利者不能保证,在他们掌权之后,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

因此,只有当精英们在旧有的环境下获取极少、因而再分配的代价极低的情况下,

<sup>①</sup> 此句原文为“Using these data, beginning of period competitive elections explain growth...”,疑有误。——译者

才会接受民主化。在此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民主、财产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伴生;而在精英们的统治有利可图之时,它们全都不会出现。

上述逻辑实际上让民主与增长之间没有紧密相关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迷惑,因为它预期民主国家应该增长更快。不过在补充分析中,阿克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1)认为,以及罗森多夫(Rosendorf 2001)认为,平民以革命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会让步,允许政治上的开放,即使他们并不情愿。如果不平等程度较低,民主和增长便会较早实现;而如果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让步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以及较低的增长。在此类民主国家,再分配的水平会很高,以至精英起而反对革命,从而引发政治不稳定。这种情况下,民主与增长就不必然相伴发生,政体也会反复动荡。

这些观点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初始阶段精英允许民主出现的条件,而过于匆忙地考察民主对增长的影响,就有可能得出这种影响并不存在的错误结论。正如普列泽沃斯基和李蒙奇(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及其他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制之下的再分配抵消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积极成果,而在于一些民主国家的精英更愿意接受民主化。在那些精英们不愿意接受民主化的国家,就会出现革命与反革命、政治不稳定,以及相对较高水平的再分配。如果把这两类不同的民主国家混为一谈,人们自然会低估民主对增长的影响。

阿克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从经验角度考察了两种不同的民主化形式。首先,他们考察了前殖民地国家。在这些国家,精英们在宗主国支持之下,非常有可能控制民主化,因此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收益而非平民革命的威胁。其次,他们使用移民的死亡率直接控制了精英的收益(这是阻碍民主化的因素)。只有在收益足够大,并且能够抵消较高的死亡风险时,人们才会移居死亡率比较高的国家;同时这些移民基本上也不会有任何动机去建立那些能够开放政治和经济参与的制度。他们发现移民的死亡率可以解释收入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与三个变量同时变化时人们的预期相一致(Acemoglu et al. 2005)。

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Engerman and Sokoloff 2002)的结论与此相似,他们并且提供了精英采取行动保护自身利益的更为直接的证据。他们发现,最适合矿业开采和农业种植的那些拉美国家,在扩大选举权提供公共教育方面进展最为缓慢;而且这些国家总是采用更为苛刻的规定,限制平民进入各种经济活动。在说明民主、财产权和增长相伴出现、而且必定相伴出现的历史条件方面,他们的证据至关重要。

### 2.3 平等、分配与不成功的民主国家:二十世纪晚期的畸形民主

上述观点虽然成功地从理论上和经验上把历史因素与当下的发展经验关联起来,

但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仍然不能很好地得到数据方面的支撑。特别是这类研究的核心论点,即由不平等导致的高水平的再分配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了民主国家的不良表现。有大量(虽不完善)证据表明,贫穷的民主国家并不一定存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更高水平的再分配。

与上述研究的结论相一致,缓慢的增长、不良的民主制度的确伴随着严重的不稳定。普列泽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 et al. 2000)通过一份图表总结了1950—1990年间30个放弃民主制的国家的情况,其中26个是贫穷的民主国家。政治制度数据库反映的情况与此相似。从1980年往后的20年间,拥有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国家中,贫困的一半里有13个国家放弃了民主制;而富裕的一半里只有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种变化。但是,从富有的精英向贫穷的平民的再分配,似乎并没有导致政治不稳定。相反,早期的证据显示,与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或者富裕国家相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政府较小,也较少地进行再分配。

即便是在围绕这些制度变迁的政治活动中,也很难觉察到对再分配的关注。大多数民主理论预期,右翼的、精英控制的政府将会被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左翼的政府代替。表36.2所示,自1975年以来,发生过91次从非竞争性选举或非选举制向竞争性选举的过渡,其中只有两次是从右翼政府转变为左翼政府。事实上,向竞争性选举的转变造成了更多的右翼政府(31个)而非左翼政府(25个)。相似地,在36次从竞争性选举向非竞争性选举的转变中,人们原本预期右翼政府将替代左翼政府。但是,在转变发生一年之后,有一小半的国家(16个)是左翼执政,只有一个国家从左翼政府转变成为右翼政府,在另外的10个国家(没有列出),政治变迁是从一个左翼政府转向了另一个左翼政府。

与政治不稳定一样,不同政体间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差异也与理论上的预期相一致:贫穷的民主国家会比富裕的民主国家更不平等。但是,与那些从未经历过政体变迁的国家相比,发生过政体变迁的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仅仅稍高一点点(四个百分点),而且在贫穷的民主国家,这点微弱的差异也消失了。另外米兰诺维克(Milanovic)(2000)的研究提醒我们,围绕再分配的社会冲突,是由市场中的不平等,以及政府再分配之后的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而且再分配前后基尼系数会发生巨大变化。许多跨国数据库提供的不平等指标,如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所提供的基尼系数,是再分配之后的数据。由于富裕民主国家再分配水平比较高,所以很可能民主穷国和民主富国市场不平等的程度相差不大。正确的不平等数据可能会告诉我们,成功的民主国家比不成功的民主国家更不平等。无论如何,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民主、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缺乏明显的关联,这刺激我们为贫穷民主国家的政治选

择和增长记录寻找其他解释。<sup>①</sup>

表 36.2 意识形态与政体变迁, 1975—2004

变迁总数	民主制向非民主制	非民主制向民主制
1975—2004	36	91
转向左翼	12	25
转向右翼	4	31
从左翼转向	16	29
从右翼转向	8	21
从左向右	2	5
从右向左	1	2

注:信息来自政治制度数据库(Beck et al.2001)。立法与行政机构选举都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家即民主国家(LIEC-EIEC-7),反之则为非民主国家。意识形态分野也来自政治制度数据库,根据最大执政党的立场为右翼、左翼、中间还是非意识形态所决定。

### 三、政治市场的不完善以及不同的民主表现

如果不平等及针对再分配的争端不足以解释不同民主国家的不同表现,以及贫穷国家民主制度为何难以影响其政治结果,那么还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一个有用的起点来自上面提到的政策扭曲,它包括了以牺牲全体社会利益为代价而为特殊利益服务的结果。教育以及公共投入的资源并没有转化为更高的教育水平或者更好的基础建设,而是注入了教育管理部门因裙带关系指定的承办人,或者关系较好的承包商的口袋。后者可以绕开妨碍着普遍企业家的官僚机构,确保他们的合同即使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也得以履行(以及他们对合同的违反能够得到许可)。

从1965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Olson 1965)开始,大量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特殊利益的存在可以解释民主制的不同表现。关于发展问题上国内政治的作用最强有力的证据,集中在贫穷国家政策决定过程中利益集团扮演的角色。贝茨(Bates 1981, 1983)揭示某些非洲国家灾难性的农业政策形成过程中特殊利益发挥的作用;弗里登(Frieden 1991)表明,利益团体的不同特征如何影响了国家对债务危机的反应;在美国政治的经验研究中,分析不同选区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个主要的方法。对民主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的问题是:为何一些民主国家相比之下更容易受到特殊利

<sup>①</sup> 有学者认为,精英与平民的冲突围绕的是再分配之外的其他问题,如管制或者公共品的获取等,但早期关于贫穷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政策相似性的讨论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益(精英)的影响。

一种回答强调政治竞争的机制以及政治市场的不完善,认为它们使政治家无须为其过分照顾某些特殊利益,或者追求其自身利益的行为对选民负责。基弗与克马尼(Keefer and Khemani 2005)指出政治市场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完善:政治信任的缺乏与公民信息的不完备。如果选民不能监督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或者不能相信政治竞争者的承诺,则竞争性选举在阻止政治家利用政策满足特殊利益或个人私利方面,其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毫无作用。

精英与平民政治不能对彼此作出可信的承诺,这是民主与发展研究着力点。但是,此类研究排除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不完善性,如假定精英和平民政治家能够分别对精英和平民成员作出可信的承诺;而后者反过来也都能严格地监督“他们各自的”政治家们采取,并且清楚这些行动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福利。贫穷民主国家公共政策的质量(几乎不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好,甚至更糟)对后一个假设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因为平民成员似乎完全不可能要求平民的政治家有稍好的表现。

更为一般地说,在不同的国家,要转达可信的承诺、通过服务选民得到信任,并且动员选民的支持,这些挑战的难度相当不同。把政治竞争的细节带入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以解释为何许多民主国家的确表现较差,而有些威权国家却潜在地做得相对较好。

### 3.1 选举(选择)前低度信任的政策后果

用政治信任度来解释不同民主国家政策选择的差异,以及非民主国家和贫穷的民主国家之间政治选择的相似性,其有效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在政治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公民和政治家们如何反应。研究文献提供了三种可能:政治家和选民对解决信任问题无能为力;选民们至少能够通过相互协调,为失信的政治家设定某种行为门槛;或者政治家确实花了本钱,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受信任程度。前两种情况在此类研究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基弗与伏莱古(Keefer and Vlaicu 2005)着重研究了后一种情况。他们明确指出,缺乏政治信任不仅对公民,而且对政治家也是个问题,因为如果后者不能对前者作出可信的政治承诺,就难以为他们的候选人动员足够的支持。

#### 3.1.1 在政治家和公民都无能为力时缺乏信任的后果

如果公民和政治家对于政治信任的缺失都无能为力,那么即使完全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也不可能对政策决定者施加任何影响。对于当政者来说,由于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不能可信地承诺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他们基本上可以免于挑战。政治承诺,包括关于收入和资产再分配的承诺,都变得毫无意义。这样一种选举前关于信任度的看法会带来

极端的政策预期：政府将肆无忌惮地剥夺、尽可能多地征税，并将所有的收益用于私人目的。

尽管贫穷国家的政治动荡不安，而且在很多民主国家人们都相信政治竞争者并不会对选民守信，但当选政府对民众的要求完全置之不理的情况却也比较罕见。教育投资确实让一些学生有学可上，政府的大多数收入也并没有存入政治家们在瑞士银行的私人账户。显然，政治家和选民在信任问题上完全无能为力的假设还是太过极端了。

### 3.1.2 公民能够相互协调影响投票规则时缺乏信任的后果

菲尔约翰(Ferejohn 1986)认为，选民们会相互协调，以构成某种行为门槛。如果当政者们的表现低于这个门槛，选民就会换掉他们，而无论挑战者是谁（因为挑战者同样不可信）。如选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政府就不能再如以前一样放肆地寻租。柏森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0)对菲尔约翰的模型进行扩展，用以说明这些投票之后的规则如何影响了公共与私人产品的供给。在所有的案例中，虽然这种投票之后的规则提高了公民福利，但对选举的回应性影响不大。

能够实施投票后规则的条件很严苛，要求选民协调行动形成某种表现门槛时就更是如此。例如，基弗(forthcoming)认为，当政策失败很快被人们所知晓，并且选民对这一失败所导致的结果认知比较一致时，选民协调最容易发生。但是，就效果更为复杂的其他政策，如教育政策来说，选举对政治家的表现只能施加非常有限的影响。因此毫不奇怪，在贫穷的民主国家，由于选民更多地依赖投票后的规则，其教育成果并不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好。另一方面，就银行管控而言，其政策失误的后果（即金融危机）短期内就能被所有选民觉察到，他们协调行动维持行为门槛就比较容易。正因为这类情况下投票后规则更为有效，所以在存在竞争性选举的国家，对濒临破产的银行进行财政转移的情况就很少发生。

但是，穷国易于依赖投票后的回应规则这种猜测，并不能够解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政策差异。柏森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0)认为，在主要依赖这类规则约束政治家的国家，寻租和腐败会很严重，公共品的供给可能处于中等水平（但还是积极的），但向特殊选民群体的转移应该是零。但贫穷民主国家的政策记录特别与最后一点极为不合。在表现不良的民主国家，为特定的选民群体谋利是竞选中支配性的因素，我们可以从薪金支出和公共投资的密集程度上看出这一点（猪肉桶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低信任度的国家，向特定群体输送利益的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但是对贫穷民主国家政治行为的直接观察同样不支持这一预期。布莱顿和凡·德·威尔(Bratton and van de Walle 1997)之所以把民主化之后的非洲政治称为“新世袭”政治，就是为了反映非洲的政治家们为特定利益群体提供好处的严重程度。维尔德



(Wilder 1999) 引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中一位来自旁遮普的前议员的话说,“人们现在认为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的工作就是治理贫民区,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为他们找工作……(这些事)占用了你整天的时间”(1999, 196 页)。“你看,我们被选出来是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能力。人们选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可以帮助他们”(1999, 204 页)。

### 3.1.3 当信任为内生性时缺乏信任的后果

由于得到信任可以在选举中大有收获,假如政治家们不为信任而投入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基弗和伏莱古(Keefer and Vlaicu 2005)提出了一个模型,表明有两种方法可供不受信任的政治家选择,以增加相信他们承诺的选民人数。他们可以通过投入建立起一个相信他们承诺的选民网络(例如建立某种利益分配的机制,在葬礼上发钱等等);或者他们也可以依赖现有的利益交换网络,向委托人作出承诺,后者则承诺为委托人投票。如果政治家依照以上两种策略中任何一种行事,我们就可以看到更严重的腐败,更多特定物品的供给,以及除某些特定物品之外更低的供给。这正是我们在贫穷民主国家中观察到的现象。

研究裙带主义的文献证实这两种策略相当常见。斯科特(Scott 1972)曾谈到菲律宾的政治家们为创造对个人的忠诚而坚持为私利服务,他也描述了1960年的缅甸选举,这完全是一场为争夺控制着票仓的委托人而非选民进行的竞选。斯托克斯(Stokes 2005)详尽地记述了阿根廷庇隆党的运行机制,通过它选民能够直接满足个人利益。无论政治家们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路线,他们最后总是诉诸那些相信他们承诺的特定选民群体的支持。这使他们更倾向于提供有利于这些群体的私人物品,而非使全体公民受惠的公共品。

有大量间接证据表明,贫穷国家的政治家很难向大范围内的公民作出可信的承诺。首先,大范围内的再分配在政治信任度有限的国家不太可能。与此相一致,政治制度数据库(Beck et al. 2000)记录了世界各国能否在经济上被区分为左、中、右及难以判断四类的情况。在2000年,46个存在竞争性选举的贫穷国家中72%的政党都可以被归入其中某一类;与48个富裕国家92%的政党相比,标准差是一。基弗(Keefer 2005b)也发现,存在纲领性政党的国家,腐败程度较低,为特定对象提供的物品比较少,而不区分对象提供的物品则比较多,但贫穷民主国家的党不大可能是纲领性政党。其次,人们可能会认为老旧的政党一直有更多的机会围绕再分配问题提高政策声誉。政党获取政策声誉的间接途径之一就是它的历史。政治制度数据库的资料显示,在富裕的民主国家,使用现有名称的政党平均存在的时间是贫穷国家的两倍,分别为47年和23年。

布厄诺·德·梅斯基塔等人(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也发现,信任的不足会

导致政策扭曲。不过,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基弗和伏莱古(Keefe and Vlaicu 2005)相反。他们允许当政者和挑战者都可信地向全体选民允诺一项有关税收和公共品的计划,但也允许政治家仅向一个与他们具有特殊联系的群体作出为其谋取私利的承诺。这就提升了当政者的优势,并会有碍于向(这些选民)提供私人利益。罗宾逊和托尔维克(Robinson and Torvik 2002)提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中,没有政治家能向选民们作出可靠的承诺。不过他们也认为,特殊的密切关系会使当政者对一部分选民作出可靠的承诺,这也将造成政策的扭曲。

虽然特殊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发生作用,比如有种族问题牵涉其中的选举,但并不能简单地把穷国与富国之间巨大的政策差异归因于不同国家这种特殊关系的不同。同时,正如基弗和伏莱古(Keefe and Vlaicu 2005)所指出的,政治家用以动员支持的很多策略,恰恰与使他们向选民作出的承诺更为可信这一目标有关。放宽政治信任的外生性假设,不仅可以把这些政治行为纳入政治竞争的分析,而且也能够使我们的政策预期更接近观察到的结果。<sup>①</sup>

#### 四、信任、民主化及历史的作用

有大量证据表明,贫穷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更难在大范围内作出可信的承诺。由于缺乏信任,他们推行的政策也只能得到某种特定的回应:诉诸他们的委托人以及选民中的特殊群体。信任理论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有关。一方面,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一般难以对所有公民作出可信的承诺,而这会阻碍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那些拥有更可信的政治竞争者或者社会结构的新兴民主国家,会使诉诸委托人付出相对更高的成本,而这就可能是一种优势。

基弗(Keefe 2005a)提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新兴民主国家推行的政策与较低的政治信任度有关,因而寻租现象更普遍、为特殊群体提供的服务更多,而面向全民的公共品较少。这些国家持续进行选举的时间越长,作为公共品的中学入学率就越高,法治就越稳定、官僚素质也越高;同时,公众获取信息所受的限制(新闻业国有化,信息成为公共品)会更少;腐败会减轻;公有部门的薪酬,以及更容易为少数人谋利的公共支出和投资也会减少。基弗(Keefe 2004)、柏森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6)发现,即使使用不同的民主测评标准、不同的民主经验累积标准、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测评,结

<sup>①</sup> 这一部分标题排序有误,只有 3.1,没有 3.2。——译者

果都表明,民主制的历史是解释增长的一个关键变量。<sup>①</sup>

关键的问题是新兴的民主国家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得以稳固。基弗和伏莱古 (Keefer and Vlaicu 2005) 表明,在没有委托人的情况下,政治竞争促使政治家越来越多地为自己的可信度投入,从而使相信他们承诺的选民不断增加,而政治家为所有公民无差别地提供公共品的动机也会加强。但是,这一过程并非必然,因为历史遗产(与前面回顾的民主与发展理论注意到的不同的历史遗产)会起阻碍作用。

在那些社会结构使诉诸委托人相对容易的新兴民主国家,政治家会倾向于依赖委托人,而不是为他们在选民中的声望投入。布莱顿和范·德·威尔 (Bratton and van de Walle 1997) 在讨论非洲民主的兴起时,强调了世袭主义遗产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更容易出现的不是良性循环,而是一种政治发展的陷阱。受托人对公共品毫无兴趣,因为他们难以说服委托人他们的介入有助于这类物品的供给。<sup>②</sup> 因此那些诉诸委托人的政治家不仅不会致力于增加相信其承诺的选民的数量,甚至不愿提供公共品。由于政府质量较差,其可信度又很低,人们的反对很容易导致政府的倒台,因此这种政体往往比较短命。因此,缺乏信任的民主国家常常同时也是年轻的民主国家。

另一项可能的遗产是纲领性政治竞争者的存在。如基弗和伏莱古 (Keefer and Vlaicu 2005) 所发现的,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实行普选和竞争性选举的时候,政治竞争者已经具有完备的纲领立场。但在其他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前民主政体残酷地压制这种纲领化的趋势。基弗 (Keefer 2005b) 表明,在大多数调查期间拥有纲领性政党的国家,此类政党一开始就存在了。某种历史遗产,这次是纲领性的政党,再度影响了后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 五、信任及民主研究中的未解之谜

在此讨论的信任问题为民主研究中的三个难解之谜提供了线索。首先是贫穷民主国家再分配的稀少。比如,阿克莫格鲁和罗宾逊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 认为,平民的集体行动会推进民主化,也会造成了再分配的压力。但是,只有当可信赖的政治行

<sup>①</sup> 柏森和塔贝里尼 (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6) 运用这些发现证明,民主制的历史会增加民主的资本,即公民赋予民主制的价值。公民们得到的经济利益越多,他们越愿意捍卫民主制;企业在民主制之下生产效能更高,但只有它们确信民主制已经稳定下来,才会进行更多的投资。因此,民主制越长久,增长就越快。本章讨论的信任理论得出的结论与此相一致,不过对新兴的和传统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异给出了更为直接的解释。

<sup>②</sup> 此句原文为“Patrons have no interest in...to convince clients that—”疑有误。——译者

为体存在并代表平民(和精英)的利益时,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出现。被裙带政治渗透的社会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集体行动。当它们民主化时,再分配的政治压力也会相应地比较微弱。

其次,贫穷民主国家的不稳定程度比较高,但与富人和穷人之间围绕再分配的冲突无关。当我们考虑到在裙带政治盛行的民主国家,政治竞争总是围绕着向特殊的选民群体输送利益而进行时,上述情况也就不难理解。虽然是被选举出来、但得不到信任的政治家几乎什么动机为公共利益制定政策。实际上,由于他们总是热衷于为特殊利益提供私人物品,这类政府制定的政策已经与众多非民主国家任人唯亲的政治相差无几。相应地,当政体受到威胁时,公民们不仅很少有起而捍卫民主制的动机,而且更有可能听信反民主的挑战者的承诺(Keefer 2006)。

最后,现有研究尚未澄清,民主化是精英之间,还是精英与平民之间冲突的结果。阿克莫格鲁与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与其他很多研究者一样(如Dahl 1971),认为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推动了民主化;科利尔(Collier 1999)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民主化的是精英群体之间斗争的结果,因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把全民选举作为实现其特殊利益的手段。正如罗宾逊(Robinson forthcoming)所言,这两种观点在分析方法上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预期,群体之间围绕政策发生的冲突将会导致制度变迁。政治市场的不完善能够解释为何这两种情况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科利尔(Collier 1999)提到的精英动员平民的努力,与达尔(Dahl 1971)提到的平民领袖组织平民民众联盟的努力,都有可能在信任缺失的沙滩上搁浅。在这些努力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民主化看上去的确与普通民众相去甚远,而制度变迁更像是小集团之间斗争的产物。

## 六、政治市场其他方面的不完善性:信息不完全

大量研究表明,公民信息的不完全会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政治市场这一关键的不完善性,本章一直没有提及。不过,在很多方面,上述讨论同样适用于信息问题,因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严重结果,就是公民无从确认政治家是否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没有确认,承诺就是空话。<sup>①</sup> 选民信息的不完全至少会以两种方式扭曲政治决策。首先,政治家会花费资源控制信息不全的选民,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

---

<sup>①</sup> 斯托克斯(Stokes 2001)分析了相反的情形,信息比选民完全的政治家向选民们承诺实行后者认为对其有利的政策,但并没有履行诺言,他推行的是自己认为有利于选民的政策。这种情况不会在选举中为政治家带来负面影响,因为选民们可以确认政治家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行事。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6)。其次,政治家会根本无视那些信息不全的选民而变得更为腐败(Adserà, Boix, and Payne 2003),或者更不愿意让他们了解政府的计划(Besley and Burgess 2002; Stromberg 2004)。

上文对信任问题的讨论也与此相关,因为公民的信息直接受到政府的影响。政府可以限制新闻出版机构了解国家机密、可以让支持者掌控媒体,也可以进行新闻出版审查,甚至可以干脆把媒体收归国有。信息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中,学者们必须使用报刊发行量作为选民信息量的一个替代指标。报刊发行量当然与发展相关:1995年,在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中,富裕国家的报刊发行量要明显高于穷国。不过,基佛(Keefer, 2005a)发现,在那些政府控制的报刊占据市场比例较高的国家,报刊发行量明显偏低。

信息量与上文讨论的信任问题直接相关。信息是一种公共品。像所有公共产品一样,在政治竞争者不能对选民作出可信承诺之时,它最不可能被提供(或者更可能被限制)。如果这样,那么报刊发行量就可以补充,或者替代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选民信息方面的外部指标,反映选举前政治承诺的潜在可信度。与此相一致的是,基佛(Keefer 2005a)指出,如果报刊发行量反映了政府影响公众信息的努力,那么这一数量就会与政府的特殊利益输送(如政府的薪酬支出)成反比,而事实的确如此。

## 七、结 论

虽然已经有数十年的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论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另一些国家并没有,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民主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并不能,以及为什么一些民主国家的政策选择推进了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做不到?换言之,为什么平民总不能从他们选出的政府政策中获益?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研究已经给出了丰富的解释。

本章的结论是,在上述每一步的进展中,可信的承诺都是一个核心问题,但承诺的具体作用各不相同。民主与发展研究认为,精英与平民之间无法达成相互信赖的协议,是一些国家成功实现了民主化的原因。但同样的观点并不太好解释民主国家的不同表现。一些表现不佳的民主国家似乎并没有像此类研究预期的那样,表明出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再分配的倾向,以及围绕再分配的冲突。

另外一些关注政治家向其支持者(比如平民领袖向平民)作出的承诺的可信度的观点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一些民主国家之所以表现不佳,并不是因为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冲突难以解决,而是因为政治竞争者首先就不能对选民作出可信的承诺。历史传统

也对民主化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些国家,传统上政治竞争者就能够向选民作出可信的承诺;而在另一些国家,世袭主义使政治家拒绝在选民中建立广泛的信誉。这两类国家的民主化迥然不同。这一事实又与关注精英与平民关系的研究有关。因为只有当政治竞争者能够作出可信的政治承诺,平民才有可能通过集体行动迫使精英让出权力。富裕的民主国家试图深化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民主化,要让这一努力获得成功,非常关键的是要更好地理解政治信任与成功的民主化之间的历史联系。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 A.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938-63.
-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94.
- and YARED, P. 2005. Income and democracy.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DSERA, A., BOIX, C., and PAYNE, M. 2003. Are you being serve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 445-90.
- BANKS, A. S. 1971. *Cross-Polity Time Series Dat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ATES, R. H. 1981.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3.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CK, T., CLARKE, G., GROFF, A., KEEFER, P., and WALSH, P. 2001. New tool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5(1): 165-76.
- BESLEY, T., and BURGESS, R.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415-51.
- BOIX, C.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ROSATO, S. 2001. 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 1800-1999.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OLLEN, K. 1993. Liberal democracy: validity and method factors in cross-national meas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 1207-30.
- BRATTON, M., and VANDEWALLE, N. 1997.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ENODEMESQUITA, B., MORROW, J., SIVERSON, R., and SMITH, A.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OLLIER, R. B. 1999. *Paths Towards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ASTERLY, W., and SERVEN, L. 2004. *The Limits of Sta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Public Deficits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GERMAN, S., and SOKOLOFF, K. 2002. Factor endowments, inequality,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Economia*, 3(1): 41–88.
- FENG, Y. 2003.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ory and Evid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FEREIOHN, J. 1986. Incumbent performance and electoral control. *Public Choice*, 50: 5–26.
- FOSTER, A., and ROSENZWEIG, M. 1996. Technical change and human-capital returns and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4): 931–53.
- FRIEDEN, J. A. 1991. *Deb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STIL, R. 1988.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87–88*. New York: Freedom House.
-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 1996.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 265–86.
- GURR, T. R., IAGGERS, K., and MOORE, W. H.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state: the growth of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state power since 180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5: 73–108.
- KEEFER, P. 2004. All democracies are not the same: identifying whether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etings.
- 2005 a. Clientelism,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cy choices of young democracies. Mimeo.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 2005 b. Programmatic parties: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and do they matt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5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Barcelona.
- 2006. Insurgency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in autocracies and democracies. Mimeo.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 Forthcoming. Elections, special interests and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and KHEMANI, S. 2005. Democracy, public expenditures, and the poor: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incentives for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 1–28.
- and KNACK, S. 1997. Why don't poor countries catch up? A cross-national test of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Economic Inquiry*, 35: 590–602.
- 1998.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Pp. 136–53 i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Economic Growth: Proceedings of the IEA Conference Held in San Jose, Costa Rica*, ed. S. Borner and M. Palda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2002. Polarization, politics and property rights: links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Public Choice*,

- 111:127-54.
- and VLAICU, R. 2005. Clientelism, credibility and democracy. Mimeo.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 MILANOVIC, B. 2000. The median voter hypothesis,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required dat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3):367-410.
- MULLIGAN, C., GIL, R., and SALA-I-MARTIN, X. 2004. Do democracies have different public policies than non-democra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51-74.
- NORTH, D. and WEINGAST, B.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803-32.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SSON, T., and TABELLINI, G. 2000.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2006. Democratic capital: the nexu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NBER Working Paper W12175.
- PRITCHETT, L. 1991. Measuring outward orien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it be done? Policy, research and external affairs working papers, WPS 566, World Bank.
- PRZEWORSKI, A., and LIMONGI, F. 1993.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3):51-70.
-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and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J. A. Forthco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 perspective on recent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 and TORVIK, R. 2002. White elephants. CEPR Working Paper 3459.
- ROSENDORF, B. P. 2001. Choosing democrac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3:1-29.
- SCOTT, J. C. 1972.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1):91-113.
- STASAVAGE, D. 2003.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1688-17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S. 2001. *Mandates and Democracy: Neoliberalism by Surpris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 Perverse accountability: a formal model of machine politics with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315-25.
- STROMBERG, D. 2004. Radio's impact on public spend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1):189-221.
- SVENSSON, J. 1998. Invest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2:1317-42.



WILDER, A. 1999. *The Pakistani Voter: Electoral Politics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he Punjab*.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GHA, N. R. 2005.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第三十七章 回应与政府的存续<sup>①</sup>

约塞·玛丽亚·马拉瓦尔(José María Maravall)

### 一、导论

如果公民能使政府对其行为负责任,并且相应地能够在选举时通过他们的选票对其加以处罚或者奖励,则这个政府就是可回应的。民主会导向代表制这一论断最核心的理由,就是由于政府必须对民众加以回应,所以它可能在选举中失败。之所以说人民在统治,是因为如果当政者的表现达不到人民确定的再次当选标准,他们就会被赶下台。作为一种奖惩措施的选举并非随意进行,它们反映了选民在投票时对政府的回溯性判断。正是选举时民众的反应保证了民主制的代表性,因为如果政治家们想要留任,就应该预想到这种反应,并且为公众利益、而非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

简而言之,这就是民主回应制的内容。它是对政治家的过往行为、而非未来立场的判断。民治就体现在每隔四年或五年,选民对当政者的这样一种回溯性控制。这种控制是垂直的,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当政者与选民之间的关系。用麦迪逊的话来说(Madison 1961, 352 页),这使当政者们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记忆:他们信赖人民”。正如多年之后基(Key 1966, 10 页)所说的:“对于失去公众支持的恐惧有力地约束了政府的行为。”

这样一种关于民主和选举的观点,能够避免其他一些关于选民如何能够控制政治家的观点的重大缺陷,因而已经被主流的政治科学所采纳。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

---

<sup>①</sup> 除卡尔斯·波瓦克斯(Carles Boix)和苏珊·斯托克斯(Susan Stokes)之外,我还想感谢几位对本章初稿作出过评论的人。他们是 Ignacio Urquizu, Andrew Richards, Sonia Alonso, Sandra León, 及 Henar Criado。Braulio Gómez 提供的数据库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 Alberto Penadés, Adam Przeworski 和 Ignacio Sánchez-Cuence 对本章提供的帮助。

仅仅把选举视为对最佳候选人的前瞻性选择,以及让他们实施一系列政策的授权的话,选民们随后就会失去对当选者的任何控制。曼宁(Manin 1995, 209—214 页)曾经描述过,自 18 世纪末以来,现代民主的“奠基人们”是如何拒斥了让这种控制得以实现的机制:如紧急授权、绑定指令,或者直接罢免代表。此外,战后的经验性民主理论也放弃了对民主制之下公民的理想化理解。无数关于公民的调查数据反映出他们的政治冷漠、对政治的不信任,以及政治上的无力感在扩大,而不是拥有信息、积极参与。这些公民进行投票,并不是因为对候选人及其纲领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只是为意识形态、党派偏见和阶级惰性而投票。如果选民们并不充分了解,而且也不太关心政治,那么对当政者施以控制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溯性的。诚如里克尔(Riker 1982, 244 页)所言:“一切选举所做到的,或者必须做到的,就是允许民众罢黜统治者。”选民们不需要认真地选择最好的候选人,并在日后密切监督他们的任职表现,他们只需要在选举的时候回顾以往,根据自上次选举以来情况是有所改进还是变得更糟而奖励或者惩罚他们。由于当政者害怕选民们未来的判决,并且希望继续任职,所以他们会做那些选民们如果拥有同样的信息也会去做的事情。这就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1963, 199—215 页)所说的“预期反应法则”。

基于政府回应性的选举观在很多方面并不令人满意。首先,在严格的回溯性投票中,公民们需要忽略未来,因为他们的决定与谁将统治他们无关。但是,公民们并不会像罗得的妻子那样,只是站下来往后看,然后成为盐柱。<sup>①</sup>也就是说,这一观点并未如实反映选举到底意味着什么。其次,学者们反复强调(Przeworski 2003, 156—157 页; Manin, Przeworski, and Stokes 1999, 10—16 页),要为过去的结果厘清责任,选民们需要大量的信息。最后,惩罚主要不是由选民,而是由政治家进行的。切巴布和普列泽沃斯基(Cheibub and Przeworski 1999, 231—235 页)指出,从 1950 年到 1990 年共发生过 310 次政府总理的和平更替,其中 148 次(占 48%)不是由于选民的惩罚,而是政治家的决定——或是来自其所属政党,或是来自执政联盟。这些首相们会像恐惧选民的判断一样,恐惧他们的同僚的阴谋。当然,政治家们抛弃这些总理,也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到选民未来的判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他们就不过是实施回应的附加工具。但是如果政治家与选民的标准不一致,那么政治命运就不仅仅由选民的意志所支配,当政者代表选民的动机也会消失。这是本章将重点讨论的理论问题,我将根据 1945 年到

---

<sup>①</sup>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圣经创世记第十九章》)——译者

2003年,23个议会制民主国家<sup>①</sup>的1109个观察年份首相的任免情况来进行研究。

## 二、选举与对政治家的回溯式控制

选举和民主按以下方式运行。(一)政治家们相互竞争,同时传递有关他们未来政策设想的信息,以及关于他们自身能力的信号。(二)选民选择那些更接近他们理想的政策立场、并且更有能力逐行其政治纲领的候选人。(三)政治家执掌权力之后,把他们的政策提上日程,并努力加以实施。(四)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下,政治家的政策和努力产生实效,改变了公民的福利状况。(五)在下一轮选举时,选民对这些结果进行回溯式评价,分别把将它们归因于政策、当政者的努力以及外部条件的影响。(六)选民更新他们对于政策和候选人的偏好。(七)选民再次选择或者拒绝当政者。因此,选举既是选择也是评价。公民们为他们的未来做决定(谁将会治理他们),同时也为他们的过去做决定(再次选择或者拒绝当政者)。麦迪逊同时强调了这两个方面:选举的目的,“首先是让那些最为睿智之人去判断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并让品德最为崇高之人对这种利益加以追求;其次是采取最为有效的措施,使他们在得到公众信任之后继续保持他们的德性”。(Madison 1961,350页)

我将讨论关于选举的第二个方面:它们能否对政府施以回溯性控制。凯特别强调,选举就是对当政者的奖励或惩罚,而全体选民不过是“对过去事件、过去表现和过去行为的评判者”(Key 1966,61页)。回应的原始模型把选民们放在一个信息完全的世界里,在选举时他们知道一切。政治家们则拥有一个无限的视域,<sup>②</sup>这样他们在任期的最后阶段不会受到未来选举的约束(Barro 1973)。巴洛模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于一项由自身利益牵涉其中的当政者通过税收提供的公共品,选举是否能够发挥约束作用。如果不存在再次当选的前景,政治家会选择一种比选民代表要求更高的水平提供公共品。相反,在重复选举中,选民们会设定一项标准,如果这一标准得到满足,政府可以再次当选,否则政府就会落选。不过这一标准需要足够高,以保证当政者不会依从他们自己偏好的替代选择——如果离职的代价不够大,情况多半就会如此。选民最终选择的标准取决于授权时限的长短、当政者再次当选的价值、未来不确定性的概率,以及当政者留任和去职时收益的差别。

① 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英国。

② 此处原文为“finite horizon”,疑为“infinite horizon”之误。——译者

与其他形式的代表相反,世界各国当选的政治家事先都没有一份清楚的激励清单,为他们的各种行为列出明确的回报。奖惩都是事后进行。下一次选举时,选民们再决定是否继续授权给当政者。如果当政者还不太愿意在未来放弃权力的话,他们就会约束自己,并且照顾选民的利益。在两次选举之间选民对政府的控制并不存在。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民主控制主要依赖政治家们这一间歇的利益权衡。如果当政者倾向于限制当下的收益以求再次当选,而不是使自己在当下的收益最大化并且在下次选举中出局,那么这种控制就存在。选民们也在权衡,因为只有他们允许当政者获得某种收益,参与的限制才会被克服。再次当选依据一项投票法则:如果人们获得了届满福利,当政者就能继续留任;否则他们就会被替换。这种届满福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也取决于政府难以控制的外部条件。信息完全的公民们会知道如何根据政策结果评判政府的责任,而政治家们也清楚对他们的要求。

如果公民们不能为其福利的变化追究责任,选举就很难对当政者施以控制,因为糟糕的政府有可能继续留任,而有能力的政府则可能会被赶下台。选民将无从了解政府的行为,无从了解它是否为他们利益行事,也无从了解他们的福利变化是否出于政府的政策。如选举承诺未能兑现,选民们也无从知晓这是出于外部条件的变化,还是当政者的寻租行为。选民们还可能被政治家所操纵。在一个多维的政治空间,选票的奖惩作用并不太明显,即便选民之间存在分配差异,它们也很可能被当政者抹平。

菲尔约翰(Ferejohn 1986)使用一个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模型,模拟对政府纯粹的回溯性选举控制。当政者具有一个无限的视域,因为不存在一个选举起不到制约作用的最后任期。这一模型只考虑“道德风险”:什么样的系统动机会防止选民回避对政府过去的表现进行回溯性评判。选民们希望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并且设定一个福利门槛值( $\kappa$ )作为投票原则。这个门槛必须足够高,以刺激当政者花代价去努力;但也不能太高,以至让他感到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放弃努力。这样一种届满福利取决于政府的努力( $\varepsilon$ )和不在其控制之下的随机的外部条件( $\theta$ )。这些条件可以被表达为一种概率分布。这样,选民们的效用就是 $U_v(\varepsilon, \theta) = \varepsilon\theta$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选民们不清楚政府的努力和外部的条件,他们所知道的只有结果,它取决于 $\theta$ 和 $\varepsilon$ 。由于这个模型是严格的回溯性的,它不考虑作为民主控制工具的选举,并且假设在“好”与“坏”的政治家之间没有能力或意识形态的差别。政策差异无关紧要,唯一需要考虑的只有当政者付出的努力。反对派也并不发挥积极作用:它只是当政者的镜像。如菲尔约翰(Ferejohn 1986, 14页)所说:“挑战者之所以重要,就因为他们存在。正因为权力追逐者存在,选民们才获得了某种能够作用于当政者的杠杆”。

职位的价值(政治家希望连任或者替代当政者)就在于能够实现对政治家的民主

控制,并且促成代表性。如果  $\beta$  表示任职的价值,那么执政者的效用就是  $U^m(\varepsilon) = \beta - \varepsilon$ , 而  $U^{out}(\varepsilon) = 0$  则是不任职的效用。菲尔约翰(Ferejohn 1986, 19 页)指出:

当任职的价值相对较高,且当政者对未来的期望也还没有明显降低的时候,选民对任职者的控制就多一些……任职价值的提高,不仅意味着需要付出某些东西,而且也会提高未掌权者为获得公职进行竞争的程度。

正因为当政者希望连任,所以他们才会“在其任职期间进行政策选择时,尽可能争取未来人们会为其表现投票”(Ferejohn 1986, 7 页)。如果  $\kappa$ <sup>①</sup> 代表执政者对未来期望下降的比率,那么当且仅当  $\beta - \kappa/\varepsilon + \delta U^m > \beta + \delta U^{out}$  时,当政者会付出努力  $\kappa/\varepsilon$ 。菲尔约翰结论的,在均衡情况下,能够使选民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最佳再次当选门槛值是  $\kappa = \delta(U^m - U^{out})/2$ 。当外部条件值( $\theta$ )大于门槛值( $\kappa$ )除以在任而非去职的预期的下降率时,政府会为连任付出努力。也就是说,当  $\theta > \kappa/\delta(U^m - U^{out})$  的时候。如果我们替换  $\kappa$ , 那么  $\theta > \delta \frac{U^m - U^{out}}{2} \delta(U^m - U^{out})$ , 或者  $\theta > 1/2$ 。这样,如果外部环境  $\theta$  的取值为 0 到 1 之间,则当它大于 0.5 时,当政者为达到  $\kappa$  只需做出最小必要的努力。在选举时,选民会评判届满门槛  $\kappa$  是否被达到,并以此决定是留住当政者还是将其赶下台去。

具有异质性的选民可以被当政者操纵。当选民对福利分配产生不同偏好的时候,是由政府决定哪个特定的群体将会受益;如果选民们为此相互竞争,政府就可以利用某些群体反对另一些群体。假设有  $N$  个选民,他们中每一个都只关心其个人的福利  $v_i$ , 而不在意累积结果  $\theta_\varepsilon$  ( $v_i$  到  $v_n$  的和即是  $\theta_\varepsilon$ )。他会设定一个个人的福利门槛  $\kappa_i$ , 如果  $v_i \geq \kappa_i$ , 他就会投票给政府。当政者则会通过分配  $\theta_\varepsilon$  造就一个简单的选民多数,以保证自己连任,同时使这个多数中成员利益的总量最小化;至于选民中其他部分的利益则被放在一边了。在这种情况下,少数群体的任何一个成员愿意接受  $v_i < \kappa_i$ , 然后加入多数;否则他就会一无所获。最后的结果是,选民们的要求一个经一个低,直到对所有人来说  $\kappa_i = 0$ 。当政者的努力在极限情况下也会被降到  $\varepsilon = 0$ 。可见,如果选民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那么政府就不可能被他们所控制,不过这只有在  $\kappa$  根据累积福利标准设定时才会成立。

这一严格的回溯性模型假设相当苛刻,后续的模型因此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了修正。其中一个例子是奥斯丁—斯密斯和班克斯(Austen-Smith and Banks 1989)建立的模型。除当政者的努力、外部条件和结果之外,他们把选举时的承诺也引入了回应机制。他们的投票模型是立体的,包括两届任期、两位候选人,以及一个同质的、但面临道

① 此处原文疑有脱漏。——译者

德风险的选民群体。这也是一个严格回应的模型,所以并不包括选择问题,也就是假定所有政治家在任何一个相关方面都完全一致。反对党同样被视为政府的镜像。他们不带有政策偏好,只是纯粹的职位追求者。对任期也没有限制,当政者可以继续竞选。这样,在均衡条件下,选民在每次选举中对两位候选人都不会有任何特殊的倾向。相反,他们关心的只是政策、未来的结果,只希望通过回溯性的投票策略影响当政者的决定。正如奥斯丁—斯密斯和班克斯(Austen-Smith and Banks 1989, 122页)所说:“既然当政者的偏好是由选民对政策结果的潜在偏好所决定的,那么在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就会设法推断哪一位候选人会付出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的努力。”

届满结果并不取决于执政前的竞选承诺。但在选举时两位候选人都宣示了他们的施政纲领,因此第一次选举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这两个纲领本身( $x_{11}, x_{12}$ )。然后新的当政者选择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 $\varepsilon$ ),这选民们无从观察。政府第一任期的立法表现是其努力和随机外部变量的结果( $\lambda_1 = \varepsilon_1 + \theta_1$ )。选民控制政府的回溯性策略由每一任期子博弈的纳什完全均衡逆向解决。选民为第二次选举设定投票法则  $\kappa(x)$ ,这取决于第一阶段的执政成果与当初竞选纲领的接近程度。也就是说,由于选民看重的是竞选承诺的可信度,所以他们的回溯性投票策略,就取决于当政者的表现与当初的政策承诺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因此,如果候选人在第一次选举中提出施政纲领时预想到这一投票法则  $\kappa(x)$ ,他们就应该清楚,如果希望连任的话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第二次选举中的回溯性投票既保证了选民在第一次选举后的收益最大化,也保证了竞选承诺的可信度。

另一个例子是柏森、罗兰和塔布里尼(Persson, Roland, and Tabellini 1997)的模型。他们引入了两个而不是一个行为体,且都关心未来的选举:一是政府(G),二是议会(L)。它们的收益都不能为选民所知( $r_g$  = 政府的收益; $r_l$  = 立法机关的收益)。由于  $r_g$  和  $r_l$  之间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因此 G 和 L 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选民们可能了解也可能不了解世界的状况( $\theta$ ),但清楚自己消耗的公共品( $c$ )。他们的投票是回溯性的。如果  $\theta$  已知,他们会据此设定一个连任门槛( $\kappa$ ),否则就根据  $c$ 。在分权制衡的情况下,G 和 L 在后继阶段政策制定的负责是分开的,但最终的决策需要 G 和 L 达成一致。否则现状就会持续。这一模型用预算制定作为例子。G 和 L 必须对预算的整体规模和内部构成( $r_g, r_l$  和  $c$  各占多大比例)达成一致。由于 G 和 L 之间存在分配冲突,而且最终结果需要双方同意(否则就维持现状),在均衡情况下,弱势的那一方把有关  $\theta$  的信息告知选民。结果是选民将不仅根据  $c$ (公共品的消费)、而是根据  $\theta$  来设定门槛,信息不对称不会带来任何收益,而且 G 和 L 都会连任。这一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它需要政府和立法机构之间不存在共谋,而且也不存在把这两个机构连接起来的政党。

### 三、一些经验证据

回溯性选举模型影响了一大批关于经济投票和政治商业周期的经验性研究。正因为当政者们能够预料选民对经济的反应,他们才会对增长和就业率进行操控。如果一个政府被认为是具体回应性的,那么选民们必然会对经济情况的变化作出反应。菲尔约翰(Ferejohn 1986,7页)认为:“经济表现对当政的行政官员选举中的命运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经济结果较好,那么政府就可以连任;如果经济结果很糟,那么他们就会在选举中失利。基尔维特和李伏斯(Kiewiet and Rivers 1985,225页)强调:“对于表现不佳的当政者选民会加以惩罚,这一论断不容置疑。”当然,为了使政府可控,个人应该以社会中心而非个人中心的立场投票。也就是说,应该对整体经济状况作出反应。

很多经验证据表明,两种假设都能够得到支持。累积的和个人层面的数据都显示,政府的支持率会因其过去的经济表现不佳而下降(参见Kramer 1971;Shaffers and Chres-santis 1999;Lanoue 1994;Monardi 1994;Svoda 1995)。个人调查数据也表明,公民会根据总体的经济状况,而非个人的经济处境投票。但是,经济投票研究的结论就不那么明确:很难说公民在投票时仅仅评判过去而不考虑将来;更进一步说,也很难断定政府经济表现的好坏是否与其在选举中的命运相关。

菲奥瑞纳在其对美国全国选举的研究中希望发现的就是回溯性投票:“选举更多是反映了一种对社会过往的评价,而非社会应该遵循的方向。”(Fiorina 1981,6页)。但是,1952年到1976年间的国会和总统选举都表明,不仅是回溯性的评价,而且对未来的期望也对选民的决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列维斯—贝克(Lewis-Beck 1998)不仅在美国,而且也在英国、西班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意大利发现了这种混合模式的投票。经济性投票确实存在,选民对经济的看法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但这种看法不仅仅针对过去,也关乎未来。然而菲奥瑞纳和列维斯—贝克认为,选民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期望不过是根据过去的某种外推,“回溯性评价对形成关于未来的期望具有直接影响”(Fiorina 1981,200页)。这一关于受回溯影响的前瞻性投票的观点,得到许多经济投票研究的认可(Uslander 1989;Bratton 1994;Keech 1995)。

但是,其他研究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据。有些学者认为,投票主要取决于对未来经济表现的期望,而非对过去的评估(Kuklinski and West 1981;Lewis-Beck and Skalaban 1989;Lockerbie 1992;MacKuen, Erikson, and Stimson 1992;Price and Sanders 1995)。还有一些学者质疑是否存在经济投票这种现象。帕尔丹(Paldam 1991,9页)指出,比较经验的证据不一致。选举的奖惩作用在一些国家存在,在另一些国家就没有。鲍威尔和



惠顿(Powell and Whitten 1993)研究了1969年到1988年之间19个国家的102次选举,他们发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对选举结果都没有影响。切巴布和普列泽沃斯基(Cheibub and Przeworski 1999, 226—230页)通过1950年到1999年99个民主国家、1606个年份观察值,研究了政府总理连任的概率。他们的结论是,过去的经济状况对这一概率并无影响。

如果公民的投票不受过往经济状况的影响,政治家就无需为他们的任职表现负责。如果过去的表现与未来的政治生命无关,政府也就无须费心经营政治商业周期。如果选民的预期可以调整(Tufte 1978; Nordhaus 1975),或者这些预期是理性的(Gukierman and Meltzer 1986; Rogoff and Sibert 1988; Rogoff 1990;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 Alesina, Roubini, and Cohen 1997),那么政治家们的策略就取决于选民们是否对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回溯性的反应。只有当政治家们相信回应制真正起作用时,他们才会在选举前人为地扩大经济规模。

政治商业周期包含道德风险。政客们都一样,他们只希望赢得选举。选民们也都一样,他们希望通过选举奖励有能力的当政者。在柏森和塔布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0)看来,选民的预期效用取决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稳定程度。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选民们会忽视政府的能力,在选举之前也不知道通货膨胀率,他们能够了解的只有GDP增长水平及失业状况。在包含能力因素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经济中,政府会在选举前人为提升增长率和就业率,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且使选民的效用最大化。这样一来,通胀率将会高于选民们的预期,但对此他们只有在选举之后才会知道。由于选民们清楚当政者的动机,而工资制定方也清楚这一扩张策略及随之而来的通胀,所以他们会增加工资。也就是说,一切都在理性预期之中。选举之后,经济会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回到自然水平。在其他模型中(Rogoff 1990),政府能够操纵的是预算的构成。由于信息不对称,当政者在选举前会通过一些人人都能看到的行动表明自己的能力(如减税、社会转移支付),其代价是那些只有在选举之后其效果才能被看出的计划(如公共投入,财政赤字)。OECD国家的经验证明,政治商业周期会导致选举后的通胀,但增长和失业率不受影响(Alesina, Roubini, and Cohen 1997)。难以理解的是:如果选举结果并不奖励选举前的经济增长,为何执政者还要采用这种机会主义策略呢?

因此回溯性投票模型中的某些方面需要得到澄清。首先,它们假定投票中不存在选择问题,所有的政治家彼此类似,反对派也不发挥积极作用,选民们仅仅对政府过去的记录进行奖惩。其次,信息不完全的选民能够根据政府过去的表现设定一个连任门槛值,并以此控制政府。最后,如费尔隆(Fearon 1999)所指出的,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是代表性的政治家,人们有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即政治家是有原则的人,他们所关

心的并不仅仅是保住自己的饭碗,而严格的回溯性回应模型与这种观点相冲突。因此,我们下面的研究,就要考虑到政治家之间可能有所不同,而且选举也关乎未来。

#### 四、回应论的局限

让我们从连任门槛的设置开始。当政者连任的动机取决于这一门槛。如果门槛太高,他会预感将输掉选举。这样就不会有两次任期间的权衡来约束他的寻租行为。相反,如果门槛太低,当政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门槛还要求选民关注外部状况,否则投票就有失武断,结果是好政府可能下台。假定最后的结果是( $\omega$ ),它将根据连任门槛( $\kappa$ )决定,后者又同时取决于政府的努力( $\varepsilon$ )和外部环境( $\theta$ ),但选民能够观察到的只有( $\omega$ )。如果当选政府发现外部状况良好,则只要  $\omega_1(\varepsilon_1\theta_1) > \kappa_1$ ,它就不会付出太多努力。相反,如果外部状况不佳,政府再努力也只能让  $\omega_2(\varepsilon_2\theta_2) < \kappa_2$ ,那么它将最终下台。如果选民难以判断  $\varepsilon$  和  $\theta$  对  $\omega$  的相对影响,则回溯性投票就不会让选民产生选择他们的代表的动机。

当选民们判断执政者努力对其福利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会区分政府不同的政治责任。这是“个人要求政府对其行为负责的主要机制”(Rudolph 2003a, 700 页)。也正因此,选民需要信息。要让选举选出民众的代表,选民们就不能一无所知。他们必须了解当政者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福利、外部情况是好还是坏,以及另外一个政府或者另一套政策是否会取得更好的成果。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它是否连任无关,那么选举就不可能保护选民们的利益。

艾琛和巴特尔斯(Achen and Bartels 2004, 37 页)却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一种一般性的政治回应理论能够解释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需要担当或者回避某些特定的责任。”他们研究了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然灾害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如 1916 年的鲨鱼袭击事件,1918 年的流感,1868 年到 2000 年的干旱和洪水),得出的结论是:“回溯是盲目的。只要选民感到不快,他们就会踢开政府,然后随便找一套方便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Achen and Bartels 2004, 7 页)

选民们可能不是对事件,而是对政府的回答作出反应。虽然政府可能无法对自然灾害、外部经济冲击,甚至孤立的腐败事件负责,它仍然可以选择是否及时应对。这种应对比与具体事件及其结果相联系的其他因素更容易评价。一项关于选民对 1982 年到 1996 年西班牙社会党政府政治的投票反应的研究发现,“对公众来说重要的并非是出现腐败,而是一旦腐败发生,政府是否能够采取措施查明真相,并追求相关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腐败丑闻的发生难以预料,因为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其成员和其他高级官

员的活动。政府能做的,是当这些事件曝光之后,以某种方式加以应对。”(Sánchez-Cuenca and Barreiro 2000, 74 页)

制度会影响选民分辨政治责任承担的能力。经验研究特别考察了少数派政府和联合政府对经济投票的影响。无论是在政府还是议会中,如果有多个党派介入决策过程,要厘清责任就比较困难。鲍威尔和惠顿(Powell and Whitten 1993)对1969年至1988年间19个工业国家进行了研究,结论是经济投票的差异与所谓的“清晰度指数”相关,即在多党分掌权力的时候、政府仅得到少数支持的时候、政党不够团结的时候、反对派控制了议会或议会委员会的时候,选民分辨责任的能力就会被削弱。这些结论得到了广泛讨论(Anderson 1995, 2000; Bengtsson 2004; Leyden and Borrelli 1995; Lowry, Alt, and Ferree 1998; Mershon 1996, 2002; Nadeau, Niemi, and Yoshinaka 2002; Powell 2000; Royed, Leyden, and Borrelli 2000; Rudolph 2003a, 2003b; Strom, Muller, and Bergman 2003; Whitten and Palmer 1999)。但仍有一些问题是开放的。联盟中的政党清楚地了解政府的行为,只要它们不形成共谋且相互之间保持竞争,那么它们可能就愿意向选民提供信息。多党体制下可能提供信息的渠道比较少、而逃避责任的机会比较多(Hirschman 1970; Fiorina 1981),但前提是联盟限制投票反对政府。虽然一党制之下责任更分明,但两党竞争和单一选区制也可能有碍于对任职者的控制(Ferejohn 1986)。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要使政治家相信支持当政者的门槛的确存在,它就必须自动发挥作用,而无论执掌权力的是谁。否则,政治家会采用各种策略操纵政策,以规避这个门槛(Maravall 1999)。如果他们成功了,就可以减少责任的范围。意识形态是推行此类政策的主要工具。如菲奥瑞纳(Fiorina 1981, 194 页)所说:“如果公民们不问政策内容,仅仅习惯性地根据政党认同来投票,并且不太愿意接受改变的话,那么选举人的责任在哪里呢?”

意识形态通常与前瞻性而非回溯性的投票相关。当公众根据过去决定如何对待当政者的时候,他们评价的是他的表现;而当公众希望选择最好的候选人管理国家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他的意识形态与自己是否接近。回应有关具体的结果,选择则涉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希望。不过,如桑切斯—昆卡(Sánchez-Cuenca 2003, 2 页)所说:“不应假定选民由两类不同的生物构成,一类仅关注意识形态,一类仅关注政府的表现。更可能的情况是,选民根据意识形成投票,但同时政府对政府的表现保持敏感。”政党的意识形态可以帮助选民推断未来的政策,但也可能影响回溯性投票,因为过去的政策可能会被视为对意识形态的背叛,或者在履行意识承诺方面的无能。根据英国、德国、葡萄牙,特别是西班牙的数据,桑切斯—昆卡证明,政治在一段时间内政党维持支持率的能力,与这种意识形态可靠性方面的回溯性评价相关。“如果考虑到以下两个问题,即意识形

态的一贯性和履行意识形态承诺的能力,则意识形态投票可能与回应论并无冲突。”(Sánchez-Cuenca 2003, 32 页)

如果以回溯的方式评价意识形态,那么选民就不会认为政治家们全都一样;而如果政治家们并不一样,公众就会用他们的选票选出最好的候选人。用丹恩(Downs 1957, 40 页)的话来说,“在决定如何投票忽视未来……这当然是不理性的,因为投票的目的就是选出未来的政府”。如果投票真的与选择相关,那么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选民可以通过过去推知未来的预期。换言之,过去的经验有助于对政治家的选择。

选举因此成为一个逆向选择的问题,通过它,过去与未来相连。回溯服务于选择。在费尔隆(Fearon 1999)的模型中,过往的任职是对两位候选人质量进行判断的标准。由于信息不充分,选民会预期,选出一位好候选人的概率是  $\alpha$ , 则选出一个坏候选人的概率就是  $1-\alpha$ 。选民无从了解政策( $x$ ),但了解他们的福利所受到的影响( $\omega$ ),而且  $\omega = -x^2 + \theta$  ( $-x^2$  代表对选民来说政策的效用  $x$ ,  $\theta$  是随机的外部的环境)。在重复的选举中,对候选人的选择取决于回溯性的门槛。选民们通过结果  $\omega$  来推断当政者的能力,并设定一项门槛值为  $\kappa$  的投票规则。下一次选举时,选民们更新他们对于  $\alpha$  的认识(选出一个好候选人的概率)。如果干扰项  $\theta$  是对称且单向的,则当  $\omega > \kappa(-x^2)/2$  时,选民会认为政府具有能力。也就是说,当政者的记录高于选民对好坏候选人表现预期 50%。如果  $\theta$  值增加,那么两位候选人获胜的概率会趋近一致;而在监督政府行为变得困难之时,干扰项  $\theta$  的值就会增加。

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颠倒过来,也就是说,人们不是根据过去,而是根据未来选择政治家。这同样是一个逆向选择的问题:政治家们因其政策而不同,选民对于候选人真实的政策意图信息不充分。哈林顿(Harrington 1993)的模型考察了两个候选人和两次选举的情况。由于候选人可以预知选民对其政策实施的反应,那么在均衡条件下,他们的最佳选择是向选民披露他们的政策意图。这增加了他们连任的机会,因为如果他是第一次当选,他会坚守竞选时的诺言。

这个模型运行方式如下。在第一次选举中,无须对当政者进行回溯性评价。只有两位候选人在某一政策领域  $\Omega$  就不同的政策( $x_1, x_2$ )向选民传达信息( $\mu_1, \mu_2$ )。候选人不清楚中间选民的立场,他们只能推测后者支持两种政策之一的概率。如果候选人对这一概率的估计一致,则他们传递的竞选信息会趋同。如果信息不同,选民们会将它们归于不同类别的政治家。比如,信息  $\mu_1$  代表第一种类型的候选人; $\mu_2$  代表第二种类型的候选人。候选人在传递信息时既会推测中间选民的立场,也会表达他们对政策  $x_1$  和  $x_2$  的有效性的信念。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会揭示中间选民的立场。然后,当选的政治家会在政策领域  $\Omega$  执行政策  $x$ 。这一政策可能与竞选信息相符,也可能与其不符。如

果当政者选择政策 $\chi$ ,那么选民们的收入是 $\gamma = \omega_{\chi} + \theta$ ,在其中 $\omega_{\chi}$ 是 $\chi$ 的组成部分, $\theta$ 表示外部因素。政客们想不断赢得选举,同时又对政策效果具有教条式的信任,因为他们不从经验中学习。他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根据他们对政策效果的信念及中间选民持有某种特定立场的概率,决定在竞选中要传达的信息;(二)根据已经作出的承诺,以及在增加选民福利方面政策效果的信念,决定当选之后推行的政策。虽然选民们也许会自发地偏爱某些政策,但对其有效性并不确定,也无从了解外部的随机情况。只有到这一阶段的末期,他们才会发现自身福利状况的变化,以更新其关于政策有效性的信念。

在第二次选举中政治家们不作出新的承诺。选票取决于第一次选举的承诺是否兑现,以及选民关于政策有效性的已经被更新的信念。选民们设定一项投票规则:如果当政者偏离了当初的承诺,那么他再次当选的门槛就会更高。当然,如果新政策的效果足以弥补这一背叛,那么这一门槛还是可以被达到。第二次选举中的投票规则,促使政治家在第一次竞选中传递真实的信息。那时他们不清楚中间选民的立场,但确信他们选择的政策会带来实效。因此,对于第二类政治家来说,在第一次选举中传递信息 $\mu_1$ 、并把自己装扮为第一类政治家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当选,他只能像第一类政治家那样表现,但不会因为背离承诺受到惩罚;或者偏离选举信息 $\mu_1$ ,尽管他明知只有实现更高的福利,才能满足因这一偏离而变得更苛刻的标准。如哈林顿(Harrington 1993, 93—94页)所言:“未来连任的考虑会让政客们努力兑现竞选诺言……候选人在竞选中多大程度上展示出他们真实的政策意图,就成为一件需要权衡的事情。”

当政者会出于不同原因背叛竞选承诺。对于为何在尽管当政者背离了当初的承诺而仍然得到选民信任的问题,斯托克斯(Stokes 2003)提供了某种解释。她的模型与哈林顿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家在政策问题上不持教条主义态度,相反他们能够从经验中学习。斯托克斯没有采用空间模型解释政策上的重大变化,根据这种模型,政治家没有理由扩大他的政策与选民们理想的政策立场之间的差异。政策转向初看上去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其中一些仅出于机会主义的策略和寻租行为,而另一些则是出于当政者对选民最佳利益的考虑。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政治家也会修正先前关于政策相对有效性的判断,而且认为只有改变承诺,才能更好地增进选民们的福利。选民们因而会在下一轮选举中为支持当政者设定更苛刻的投票原则(如更高的门槛),因为关注的是结果而非政策。因此“好”政治家和“坏”政治家都会偏离最初的承诺,但其原因和结果并不相同。政治家并不都一样,因此为了对其加以控制,选民设定了选择性的回溯标准。

如果选举包含了选择的问题,那么过去对未来的影响就非常清楚。但未来的影响更微妙,在此意识形态开始发挥作用了。斯托克斯(Stokes 2001)指出,选民对经济的反

应不仅是对过去的表现施以赏罚,而且也会采用某种比较的,或者赦免的标准。尽管过去的情况很糟,但选民们可能认为它预示着光明的未来,是一个通向光明的黑暗隧道。他们也可能相信,糟糕的情况并不是由当政者,而是由 IMF、全球化,或者哈罗德·威尔逊(英国工党首相)所说的“苏黎世大银行家”所带来的。因此这些选民会继续支持政府。在超过 15 年的时间内,158000 名位西班牙选民对经济状况的反应表明,他们中的相当部分采取了比较的,或者赦免的态度(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1)。在困难时期,保守党(UCD)和社会党(PSOE)有超过 50% 的选民找到了继续支持政府的理由,尽管其表现不佳。因果关系在此被颠倒过来:“在很多时候,出于某种原因,选民们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党,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为自己的选择找到理由。”(Maravall and Przeworski 2001, 74 页)。

与唐斯的观点相反,人们并不从过去推知未来。他们对过往状况的评价是现实的,它受到 GDP 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却总是更为乐观,而这种乐观主义大多源自意识形态。因此人民总是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思考未来的经济状况。基(Key 1996, 113 页)正确地指出:“一般的选民和我们一样,并不可能以水晶般的明澈,从当下的混沌中透视未来。”由于意识形态引导着人们对于未来的思考,而预期中也掺杂了回溯性的评价,当政者的续存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如果公民对政治了解有限且带有偏见,那么选举就很难有助于对政府的民主控制。首先,他们会随意地为当政者设定连任门槛,也会为政治家制造一些不适当的动机。其次,如果严格的回溯性投票是使政府回应的唯一方式,那么它只能在一个奇怪的世界发生,在那里政治家们彼此没有差别,选民们在选举政府时也不会考虑未来。如果选民们相信候选人之间存在区别,而且对未来抱有期望,那么意识形态就能使政治家逃避回应。

## 五、非选举的威胁:选民对政治家

我首先重复一下主流的观点:回应和代表性取决于选民对当政者施加的选举威胁。正因为政治家预期到下一次选举时选民的反应,所以他们不大可能逃避责任。如果说民主制生产了对民众之爱,那是因为掌权者们的政治生命有赖于选举时公众的认可。

但是我们知道,在议会制民主国家,有 48% 的首相失去职位并非出于选民的决定,而是政治家的阴谋。在 1946 年到 1994 年的意大利、1945 年到 1958 年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5 年之后的比利时、芬兰,或者日本都是如此。这种一批政治家被另一批政治

家放逐的情况,被玛格丽特·撒切尔苦涩地称为“滑稽的旧世界”。她本人于1990年11月被保守党内的大佬们撤换。在议会制民主国家,此类阴谋一直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看看以下一些例子,它们既包括一党政府也包括联合政府,有在议会中得到多数支持的政府,也有仅得到少数支持的政府。第一个例子是单一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多数的政府更换首相的情况。撒切尔被自己党内的政治阴谋赶下台,领头的是前任内阁大臣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和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撒切尔的政党在议会中占多数,而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领导的工党仅构成弱弱的反对力量。在撒切尔执政的最后两年,经济增长降低到1.4%,而她整个执政时期的增长平均增长率是2.3%。<sup>①</sup>撒切尔的支持率从1990年开始下滑,在三四月间达到最低点,但在春夏之间又有所上升——她的支持率在1981年、1982年冬和1986年春夏之间也发生过类似变化。<sup>②</sup>然而,党内选举最终让约翰·梅杰(John Major)替换了她。撒切尔对这一阴谋作出了如下反应:“让我感到悲哀的,是那些我一直视为朋友和同盟的人的背离,以及他们用来把背叛装扮成坦诚的建议和对我命运的关心的那些滑头的言辞。”(Thatcher 1993, 855页)

第二个例子是单一政党少数派政府对首相的替换。1981年1月,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辞去西班牙总理的职务。他领导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并为宪法和一项广泛的经济改革方案争取了跨政党的支持。他两次连任,组成一党执政的少数派政府。在他执政的最后两年,经济陷于停滞,平均年增长率仅达0.7%,而同期欧共体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8%。在他最后一次成功当选一年后,由天主教会和联邦商业组织联盟策划,党内不同派别开始密谋反对他,因为他们在离婚、教育和经济问题上持有完全不同的政策立场(Powell 2001, 279—291页)。党内的分裂,特别是党内重要人物1980年12月签署的“200人宣言”,表明苏亚雷斯已经无力维持民主中间同盟的统一。因此,在苏亚雷斯执政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他的支持率下降导致了党内分裂,而是党内的阴谋影响了他的支持率。

下面两个,是联合政府的首相被本党政治家们罢黜的例子。勃兰特(Willy Brandt)自1969年10月至1975年5月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任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他领导之下获得政权的,首先是从1966年到1969年作为少数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合执政,随后经1969年选举作为多数党与自由党联合执政。勃兰特在1972年再次连

<sup>①</sup> 这些例子使用的经济数据来自《欧洲经济》,2001年第72期(表10,132—133页)。GDP数据根据1995年的市场价格计算。

<sup>②</sup> 满意率的数据来自于 [www.mori.com/polls/trends/satisfac.shtml](http://www.mori.com/polls/trends/satisfac.shtml)。

任,而两年后终结他的总理职务的,是本党的其他领袖,特别是赫伯特·魏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Rovan 1978,383—423页)。勃兰特所受到的批评是,面对主要由青年社会主义工会联盟挑战的社民党内部冲突,他缺乏足够的权威。尽管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勃兰特最后两年执政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是2.5%,这要高于欧共体的整体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则低于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危机的爆发始于一个政治丑闻:勃兰特的首席幕僚君特·纪尧姆(Günther Guillaume)被证明是一位东德间谍。勃兰特仍然担任社民党的领袖,但他的总理职位被施密特接替了。

下一个例子也是关于联合政府总理被替换的。1954年6月,在奠边府战役失败后,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当选法国总理,仅此一次政府中出现了四个政党。孟德斯—弗朗斯终结这一次持续近7年的灾难性战争,而且对经济进行了有效的管理(Tarr 1961,186—234页)。但是他仅在任七个月,因为他关于欧洲防卫同盟、德国再军事化和经济改革方面的立场,受到本党及执政同盟,特别是人民共和运动(MRP)的反对。由于未能通过国民议会的信任投票,孟德斯—弗朗斯辞去职务,接替他的是本党即激进党的另一位领袖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而该党则继续领导执政同盟。

在最后一个例子中,总理被执政联盟另一个政党的政治家替代,而他本人所在政党则继续参与执政。贝迪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从1983年8月到1987年的4月领导了意大利由五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他所在的政党——意大利社会党——自1963年以来先后参加过由11位基督教民主党总理领导的联合政府。克拉克西出任意大利社会党领袖时,社会党的得票率不到10%,在议会中仅占五分之一的席位。克拉克西采取了坚守“生活第一”信条的策略,目标是扩大社会党的政治影响力,并与意大利两大政治力量,即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竞争选民的支持。在1983年的选举中,社会党的得票份额稍稍上升,而基督教民主党的得票率则下降了5%,为32.9%,是1948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Ercole and Martinotti 1990)。在得到广泛支持的共和国总统、社会党人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支持下,基督教民主党接受克拉克西担任首相,执政四年。在此期间,GDP年平均增长率是3.0%(欧盟的平均值是2.1%),通货膨胀率则从15%下降到了4.8%,贸易与支出平衡也得到了恢复。但是基督教民主党失去了耐心。他们首先在1986年6月使议会对克拉克西表示不信任,然后迫使他辞职,并由范方尼(Amintore Fanfani)领导过渡政府,最后在1987年的选举中重新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得票率达34.3%)。社会党参与了此后连续3届由基督教民主党人担任总理的联合政府,直到1994年意大利政治中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对此类阴谋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党内政治家之所以替换政党领袖,或者决定离开



执政联盟,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了选民的判断”(Cheibub and Przeworski 1999, 232 页)。这也是瓦维克(Warwick 1994, 92 页)的观点:“与经济失败无关的考虑也会鼓励政党或议员个人不再支持现政府”。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回应制仍在运行。施行密谋的政治家的标准应该与选民相同,因为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反应预期法则”仍然能使民主具有代表性。当政者仍须对选民们负责,这表现在为了最可能减少本党或者执政联盟在选举中受到的损失,其他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地撤换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理。

但是,如果事实并不真的如此,而施行密谋的政治家的标准与选民也并不一致,情况又会如何呢?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之所以替换首相,并非出于避免投票时受到惩罚的预防策略,而是出于政治野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赢得下一轮选举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必定跃跃欲试。只要得到高选票的支持,而情况又对其有利,他就会实施其策略。

假定有一位潜在的挑战者。他在选举时领导本党能够获得的预期效用(我们称之为  $L$ )为:

$$EU(L) = p_e W + (1 - p_e) D$$

该挑战者必须估计出现三种可能结果的概率:挑战成功并随后赢得选举胜利( $W$ )、挑战成功但选举失败( $D$ ),以及挑战失败( $F$ )。最后一种可能意味着回到原先的状态( $Q$ )。不过,由于我们假定政治家们不仅追求公职,也追求对本党的领导权,所以他的偏好顺序为: $W > D > Q > F$ 。

挑战的预期值是

$$EU(C) = p_c [p_e W + (1 - p_e) D] + (1 - p_c) F$$

其中  $C$  是对首相的内部挑战, $p_c$  和  $p_e$  是赢得内部挑战和赢得大选的概率。挑战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这个值是否大于原先状态的值( $Q$ )。即是否

$$EU(C) > Q$$

我们假设原先状态的值要大于挑战失败的值( $Q > F$ ),否则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出现挑战。随着回报的值(或者成功的概率)增加,挑战的预期效用也增加。所以进行挑战的条件就是:

$$p_c [p_e W + (1 - p_e) D] + (1 - p_c) F > Q \quad (1)$$

只要公式左边任何一个变量的值增加,政治家都会更倾向于发起挑战。如果  $p_c > 0$ ,不等式(1)反映的关系就可以表达为竞选成功的概率条件:

$$p_e > \frac{1}{p_c} \frac{Q - F}{W - D} \frac{D - F}{W - D} \quad (2)$$

由于概率取值在 0 和 1 之间,在变量的某些取值条件下挑战就不会发生,例如

$$p_c < 1 \Rightarrow p_c > \frac{Q-F}{W-F} \quad (3)$$

除非内部挑战获得成功的概率大于比值 $(Q-F)/(W-F)$ , 否则为满足不等式(2), 选举成功的概率就必须大于1。也就是说, 如果 $p_c \leq (Q-F)/(W-F)$ , 则无论选举获利的概率如何, 都不可能导致内部挑战。

同样, 如果 $D < Q$ , 则竞选获胜的概率 $p_c$ 取值必须足够大, 才会形成发起内部挑战的动机, 即

$$p_c < 1 \Rightarrow p_c > \frac{Q-D}{W-D} \quad (4)$$

如果竞选获胜的概率较小, 那么即便内部挑战获得了成功, 它的值也要比维持现状的值低。但是, 如果 $Q \leq D$ , 则无论选举获胜的概率如何取值, 内部挑战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都存在, 那么挑战就会发生。

选举获胜的概率( $p_c$ )大到什么程度才足以引发内部挑战? 这个值不需要太高。我们来考虑一个量化的例子, 其中 $W=1, F=0, D=0.5, Q=0.3$ 。那么根据式(3), 如果 $p_c \leq Q=0.3$ , 则内部挑战不会发生。但是, 如果根据式(2), 当 $p_c$ 达到0.4时, 只要 $p_c \geq 0.5$ 挑战就值得一试。如果 $p_c$ 为0.5, 则只要 $p_c \geq 0.2$ 时挑战就会发生。进一步, 如果 $p_c \geq 0.6$ , 则无论下一步选举获胜的概率如何, 都一定会出现内部挑战。

$W$ 和 $D$ 的取值越接近,  $p_c$ (内部挑战成功的概率)对是否挑战总理的决定影响就越大。在 $Q$ 值已定的情况下,  $W$ 和 $D$ 的取值越接近,  $p_c$ (获得选举胜利的概率)对是否发起挑战的决定影响就越小。让我们继续前面的例子, 如果 $D=0.75$ , 那么只要 $p_c \geq 0.4$ , 则无论 $p_c$ 如何取值, 挑战都会发生(如果 $p_c$ 小于0.3, 即 $Q$ 的值, 则挑战永远不会发生)。实际上, 只有当 $p_c$ 的取值在0.3和0.4之间, 是否发起挑战才取决于下一次选举获胜的可能性。在0.3这个门槛值以下, 挑战永远不会发生。在0.4以上,  $p_c$ 对决定的影响力就会下降。不过, 即便 $p_c$ 的值非常低, 挑战还是值得一试的。

我们不再进一步讨论促内部挑战获得成功的条件( $p_c$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Maravall 2003)指出, 如果候选人名单是封闭的、同时议会候选人的选择又是非集中化的, 那么政党执政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而总理的任职情况也更具可预期性。不过针对总理的密谋, 既可能出自分裂政党的某些派别, 也可能出自纪律良好的政党的中央机构。就 $p_c$ 而言, 如果经济状况影响了赢得选举的概率, 则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 政治家更有可能采取措施替换总理:

$$p_c(\Delta_\gamma(\theta^G)) > p_c(\Delta_\gamma(\theta^B)) \quad (5)$$

$\theta$ 反映经济状况的好坏,  $\gamma$ 为选民的收入,  $p(\Delta_\gamma)$ 是在选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获胜的概

率。即便很多次挑战都失败了,有野心的政治家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站出来。结果是,在经济表现糟糕的时候选民们会通过选票惩罚政府;而政治家们正好相反,会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替换他们的总理。

下面的分析基于23个议会民主国家,以及大约从1945年到2003年1109个国家一年份观测值。表37.1是这些观测值根据政府类型的分布情况。<sup>①</sup>

总理去职的情况发生过312次,其中123是由于选举失败(共举行过329次选举),189次是因为政治危机,或者来自本党内部(124次),或者来自执政联盟(65次)。与首相相比,政党执政的时间要长一些,平均分别为3年7个月和7年5个月。任期最长的首相是塔格·艾尔兰德(Tage Erlander),从1946年到1969年,他在瑞典连续赢得7次选举,领导了社会民主党政府22年。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是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在48年掌权的过程中经历了26位短命的首相。政府经常在选举中间失去选票(平均为-1.84%),也在68%的选举中失去席位。但此类损失并不必然导致政府下台。

表 37.1 政府类型

议会支持	构成		总数
	执政联盟	单一政党	
多数	571	167	871
少数	71	300	238
总数	642	467	1109

选票和执政表现之间的反差对联合政府来说表现得尤其明显。一般来说,它们失去的选票比单一政党政府要少:前者是-1.4%,后者是-2.5%。<sup>②</sup>不过,联合政府中总理的平均任期并不比单一政党政府更长,它们分别为3年6个月和3年10个月。总理们的政治生命可能更取决于其他政治家的操纵,而非选票和席位。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制度就会影响回应,因为它们可能会增加或者减少“责任透明度”。一方面,区分联盟中不同成员的责任往往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在时间点 $t$ 赢得选举的政党或总理并不总会在时间点 $t+1$ 发起选举,因为在 $t$ 和 $t+1$ 之间可能由不同的政党联盟执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选民们就不清楚在 $t+1$ 时应该奖励或惩罚谁。因此,当

<sup>①</sup> 多数政府和执政联盟都是虚变量。多数政府被标注为1,少数派政府则标注为0。它们反映的是议会对政府的支持情况,无论这个是联合执政还是一党执政。联合执政被标记为1,一党执政则标记为0。它们在议会中可以是多数,也可以是少数。

<sup>②</sup> 这验证了鲍威尔(Powell 2000, 54页)的数据,即单一政党政府会比联合政府失去更多的选票。这与斯特罗姆(Strom 1999, 69—70、124页)的结论相反。

议会政治成为“无规则的抢凳子游戏”(Warwick 1994, 134 页)时,制度就会影响政府的生存。

我首先考察使首相和政党失去权力的原因。一个政党失去权力,我指的是它失去了总理的职位,因为在政党的一个执政周期内可以有若干位属于这个党的总理任职。表 37.2 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回归模型,这主要是因为能够得到的指标变量的观测值不同。这可以从国家一年度观测值的数目看出,它从 1109 下降到了 891,然后再下降到 399。第二个模型的分析数据始于 1960 年,第三个则从 1970 年开始。这些变量既反映了制度性特征,也反映了一些重大事件。正如金等人(King et al.1990)所证明的,这两类变量可以同时持续分析中得到研究。<sup>①</sup>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模型中,制度指的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政府,抑或单一政党政府还是联合政府。在第三个模型中,有效政党的数目代替了执政联盟,<sup>②</sup>因为虽然这两者高度相关<sup>③</sup>,但新的变量对模型有所改善。另外,单一选区制也被加入了模型。<sup>④</sup> 在第一个模型中,唯一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是执政后期两年 GDP 的平均增长率;第二个模型中加入了最后一年的通货膨胀率;<sup>⑤</sup>第三个模型中则加入了政治丑闻。<sup>⑥</sup>

表 37.2 丧失权力的风险:总理与政党

	总 理			政 党		
	1	2	3	1	2	3
事件	1,035	818	399	1,011	794	386
删失数 <sup>⑦</sup>	74	73	0	98	97	13

① 这与仅关注政府和议会中的制度特征(Blondel 1968; Taylor and Herman 1971; Laver 1974; Dodd 1976; Sanders and Herman 1977),或重大随机事件(Browne, Frendreis, and Gleiber 1986)的解释不同。

② 有效政党数根据 Laakso and Taagepera(1979)的计算,它反映的信息与 Rae(1968)分裂指数是一样的,并通过这一指数计算出来,即  $1/1-Rae$ 。  $Rae = 1 - \sum_{i=1}^m t_i^2$ 。其中  $t_i$  是政党  $i$  的得票率,  $m$  是政党数量。

③ 执政联盟与有效政党数的相关系数是.436;而多数派政府与单一选区制的相关系数是.194。

④ 单一选区制计为 1,否则为 0。资料来源:Huber, Ragin, and Stephens dataset(1997)。

⑤ 通货膨胀和 GDP 增长的数据来源于 Michael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Fernando Limongi, and Adam Przeworski dataset,以及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⑥ 政治丑闻是指每年发生的腐败事件,有强大公共影响力的道德事件,或者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事务(如 1963 年英国的普罗富莫事件;1975 年德国的纪尧姆事件)。赢得和失去权力的数据来源于 Woldendorp, Keman, and Budge(1998),以及 www.keesings.com。

⑦ 删失数:因信息不完全而未计入的事件数。

续表

	总 理			政 党		
	1	2	3	1	2	3
总数	1,109	891	399	1,109	891	399
多数派	-.173 <sup>c</sup> (.081)	-.199 <sup>c</sup> (.090)	-.208 <sup>c</sup> (.118)	-.126 (.082)	-.128 (.092)	-.086 (.124)
执政联盟	.129 <sup>c</sup> (.067)	.150 <sup>c</sup> (.074)	—	.058 (.068)	.020 (.077)	—
有效政党数	—	—	.066 <sup>c</sup> (.034)	—	—	.144 <sup>b</sup> (.036)
单一选区	—	—	-.163 (.149)	—	—	.483 <sup>b</sup> (.157)
最后两年的增长率	-.005 (.012)	.002 (.001)	-.010 (.025)	-.054 <sup>a</sup> (.013)	-.056 <sup>a</sup> (.015)	-.082 <sup>b</sup> (.026)
通货膨胀率	—	.006 <sup>a</sup> (.001)	.060 <sup>a</sup> (.013)	—	.007 <sup>a</sup> (.001)	.025 <sup>c</sup> (.011)
政治丑闻	—	—	.077 (.179)	—	—	-.200 (.181)
Chi <sup>2</sup>	6.424 <sup>c</sup>	21.956 <sup>a</sup>	34.842 <sup>a</sup>	20.298 <sup>a</sup>	37.195 <sup>a</sup>	39.655 <sup>a</sup>
-2 对数可能性	12,752.611	9,724.142	4,080.652	12,215.934	9,232.265	3,869.950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差

<sup>a</sup>显著度为 1% 或更少<sup>b</sup>显著度为 5%<sup>c</sup>显著度为 10%

这些模型与科克斯回归有相似之处。它们都以比例分配的方式评估失去权力的相对风险。风险函数  $h(t)$  反映是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单位时间内可能的风险比例,当然前提是总理或者政党在此之前一直掌握政权。由于风险函数并非概率,所以它可以超过 1,它的取值可以在 0 与无穷大之间。<sup>①</sup> 从表 37.2<sup>②</sup> 可以看出,总理除任职时间比政党

<sup>①</sup> 因变量实际上就是执政时间的指标,即执政的年份。状态指标表明因总理或政党在被考察时段结束时仍然执政而被删除的年份观测值,因为导致他们执政终结的原因(选举、政治危机)尚未被观察到。如果  $h_0(t)$  表示随机函数的基准(不带指示变量的失去权力的预期风险), $e$  是自然对数的基础, $X_1 \dots X_n$  是指示变量, $B_1 \dots B_n$  是回归系数,则这一模型就可以写为  $h(t) = [h_0(t)] e^{(B_1 X_1 + B_2 X_2 + \dots + B_n X_n)}$ 。指示变量对失去权力的风险的影响,与随机基准区别开来了,后者假定在不同情况下不发生变化,且只与执政时间相关。随机性整体上由指示变量和随机基准决定。

<sup>②</sup> 每个不同回归系数的效果是  $100x[\exp(B) - 1]$ 。它反映的是自变量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时,风险(增加或减少)变化的百分比。

更短之外,对特定的制度环境也更敏感,不过他们的表现与他们的去留关系并不大。如果他们在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则他们任职的风险就会少一些。在三个模型中,这一风险分别下降了 15.9%、18%和 18.8%。相反,在联合政府的情况下,且有效政党数目增加,那么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风险会分别上升 12.1%和 16.2%,而在模型三(其中有效政党数替代了执政联盟)则会上升 6.8%。单一选区制并没有产生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通胀率越高,风险也越大。从模型二到模型三,无论对政党还是对首相来说,系数值都明显增加了。这表明,自 1970 年之后,即模型三反映的时间段,通货膨胀对任职的影响增强了。但是,经济增长和政治丑闻<sup>①</sup>对于首相的去留并没有影响。

政党任职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同时执政表现也更为敏感。与总理的遭遇相反,经济增长可以延长政党的执政周期。在三个模型中,经济增长时政党失去权力的风险分别下降了 5.2%、5.4%和 7.9%。另外与总理面临的情况一样,高通货膨胀率对政党执政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政治丑闻同样对政党没有影响。至于制度环境、议会中的多数,以及是否参与执政联盟,对于失去权力的风险都不产生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但在单一选区制之下,由于职位轮换更容易,这一风险会明显增加,另外在有效政党数量增加的时候也会如此。在第一种情况下,风险增加了 62.1%;在第二种情况下,风险增加了 15.4%。两种情况都与模型三相符。

需要注意的是,在表 37.2 中任何原因(选举失利或政治危机)都会导致失去权力。现在集中讨论总理的问题。根据回应理论,他们会对下一轮选举时选民的反应进行预测。表 37.3 展示了导致政府终结的不同原因。<sup>②</sup>首先是选举失败,这会使总理和他所在的政党下台。其次是政治危机,总理由本党内部另一位政治家取代。再次是另一种类型的危机,总理由来自执政联盟中另一政党的政治家取代,但他所属的政党继续执政。表 37.2 中政府终结的最后一种原因不能被视为一个政党失去了权力。

<sup>①</sup> 在模型三所反映的时间段,我记录了 72 个政治丑闻(来源是 [www.keesings.com](http://www.keesings.com))。这一案例数很难解释为何政治丑闻从未会产生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

<sup>②</sup> 利用选举年数据库中 Woldendorp, Keman, and Budge (1998) 的信息和 [www.keesings.com](http://www.keesings.com) 网站,我建构了三种政府终结的原因。在表 37.4 中以选举年记录总数为背景分开分析了三种终结原因,也根据模型 1、2、3,并对其中的自变量有所回应。案例关注了上一次失去权力之后的那几年——失去权力的原因有选举失败,被同一个政党之中的另一个政客替代,或者被政党同盟中的另一个政党的政客替代。

表 37.3 总理去职的原因

去职的原因	政府类别			
	支持		构成	
	多数%	少数%	执政联盟%	单一政党%
选举失败	36.7	45.7	36.0	44.7
被本党议员替代	41.7	35.1	34.9	47.2
被党外议员替代	21.6	19.2	29.1	8.1
原因总数(N)	(218)	(94)	(189)	(123)

表 37.4 反映的是对三种政府终结的原因进行回归的结果。指示变量与表 37.2 相同。如果我们首先考察制度的影响,那么会发现它是支配性的。首先考虑多数派的政府。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执政联盟中的密谋,它们失去权力的风险都要小一些(在三个模型中分别下降了 15.6%、19.3%、25.8%和 48.9%、52.3%、52.1%)。此类风险在党内政治中就有所增加:被本党成员取代的危险在三个模型当中分别上升了 61.9%、75.4%和 72.6%。执政联盟似乎既能保护当政者免受选民的惩罚,也能保护他们免遭本党成员的算计。在此情况下,选举带来的去职风险下降了 13.2%和 17.9%,而政党内阴谋带来的去职风险则下降了 22.5%和 26.9%。不过执政联盟也使总理更容易受到联合政府中其他政党政治家的威胁:根据模型一和模型二,联合政府中总理被替换的风险分别上升了 65.5%和 51.6%。随着有效政党数量的增加,首相被本党或者执政联盟中的伙伴替代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分别增加了 19.4%和 25.5%),而且后一种情况更容易发生。然而这些都与选民无关,因为选举失败的威胁并没有增加。单一选区制的情况则相反。它对选举失败会造成强烈影响,但是与政党内部的替换无关。<sup>①</sup>

如果我们转向重大事件,我们会发现选民们并不总是接受政治家奖罚当政者的标准。有两种例外情况:政治丑闻和通货膨胀。选民和政治家都不在意丑闻,<sup>②</sup>因为它不关乎丢失权力的风险。但在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阴谋,总理失去权力的风险都会增大。模型三中的风险系数明显上升了,它反映的是 1970 年之后的观察。通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让风险增长了 5.7%,这与政党内部的替换相对应。选民与政治家的重要区别在于:经济增长时,总理在选举中受到惩罚的风险会下降;与此相反,

<sup>①</sup> 考虑到联盟危机,我在分析中排除了这个变量,因为单一选区不会形成执政联盟,因此政府中也不存在来自同盟者的威胁。观察值的数目从 399 个上升到了 561 个。

<sup>②</sup> 请注意注 14 的说明。除政治丑闻之外,我还从《各国风险指南》中引用了一项腐败指标,即政治体系中的腐败。但结果在统计上也不具显著性。

政治密谋成功的可能却增加了。当选民们看到自己的福利得到改善而倾向于奖励当政者时,去职的风险在三个模型中分别下降了 5.1%、5.1%和 7.1%。相反,政治家却倾向于在情况良好的时候撤换他们的总理——总理本人所在的政党和政党联盟之中的其他政党都曾如此行事。在模型一、二、三中,同一政党内部替换的风险分别上升了 7.9%、8.9%和 12.4%;被同盟党替换的风险则分别增加了 15.6%、17.6%和 13.6%。增长的经济刺激了对权力的欲望,因为继任者们希望能够把握赢得下届选举的机会。但他们可能高估了这种机会。切巴布和普列泽沃斯基(Cheibub and Przeworski 1999, 232—233 页)指出,在任期内取代当政者的总理中,只有 30%的人赢得了下次竞选的胜利。

在本项研究中,取代当政者的政治家的未来并不太令人担忧。在 189 次因政治危机而非选举导致的总理更替中,86 位总理在新的选举中当选(占总数的 45.5%),72 位失败(38.1%)。其他人(16.4%)则根本没有机会参选,因为他们在能够面对选民之前又被替代了。如表 37.5 所示,政党内部发生的总理替换,较之执政联盟内部的替换,为新总理提供了更多赢得选举的机会。在本项研究覆盖的 329 次选举中,仅有 37.4%的当政者竞选失败。

表 37.4 去职的风险:选举和非选举的威胁

	赢得选举(政党与总理)			克服政治危机—1(政党继续执政,总理由其他政党出任)			克服政治危机—2(政党继续执政,本党推举另一位总理)		
	1	2	3	1	2	3	1	2	3
事件	983	766	364	509	353	210	809	593	315
删失数	126	125	35	600	538	351	300	298	84
总数	1,109	891	399	1,109	891	561	1,109	891	399
多数	-.170 <sup>c</sup> (.081)	-.214 <sup>c</sup> (.090)	-.298 <sup>a</sup> (.124)	-.671 <sup>a</sup> (.103)	-.741 <sup>a</sup> (.121)	-.736 <sup>a</sup> (.144)	.482 <sup>a</sup> (.095)	.562 <sup>a</sup> (.110)	.546 <sup>a</sup> (.146)
联盟	-.142 <sup>c</sup> (.068)	-.198 <sup>c</sup> (.078)	—	.510 <sup>a</sup> (.096)	.416 <sup>a</sup> (.114)	—	-.255 <sup>b</sup> (.075)	-.313 <sup>a</sup> (.087)	—
有效政党数	—	—	.018 (.036)	—	—	.227 <sup>a</sup> (.053)	—	—	.177 <sup>c</sup> (.044)
单一选区制	—	—	.688 <sup>a</sup> (.159)	—	—	—	—	—	.194 (.157)
最后两年的增长率	-.052 <sup>a</sup> (.013)	-.052 <sup>b</sup> (.016)	-.074 <sup>b</sup> (.027)	.145 <sup>a</sup> (.018)	.162 <sup>a</sup> (.022)	.128 <sup>a</sup> (.030)	.076 <sup>a</sup> (.015)	.085 <sup>a</sup> (.018)	.117 <sup>a</sup> (.028)
通货膨胀	—	.009 <sup>a</sup> (.001)	.022 <sup>c</sup> (.011)	—	.005 <sup>a</sup> (.001)	.046 <sup>a</sup> (.006)	—	.006 <sup>a</sup> (.002)	.056 <sup>a</sup> (.014)
政治丑闻	—	—	-.260 (.185)	—	—	-.105 (.243)	—	—	-.063 (.215)



续表

	赢得选举(政党与总理)			克服政治危机—1(政党继续执政,总理由其他政党出任)			克服政治危机—2(政党继续执政,本党推举另一位总理)		
	Chi <sup>2</sup>	26.510 <sup>a</sup>	54.469 <sup>a</sup>	40.135 <sup>a</sup>	125.139 <sup>a</sup>	103.190 <sup>a</sup>	123.231 <sup>a</sup>	54.254 <sup>a</sup>	61.826 <sup>a</sup>
-2 对数可能性	11,861.960	8,879.659	3,636.638	6,289.737	4,181.727	2,228.535	10,036.433	7,125.982	3,165.192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差

<sup>a</sup>显著度为 1%或更少<sup>b</sup>显著度为 5%<sup>c</sup>显著度为 10%

因此,发生总理更替的原因不同,未来当选的前景也会相当不同。选民会考虑政党认同。如果认同没有改变,那么即便总理被新人代替,他们还会保持对政党的忠诚。但是,无论从选民还是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执政联盟中候选人的变化都会导致更高的风险,因为这更容易导致选举失败以及替换当选总理的密谋。

选民和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因而很重要。政治家们通常并不在意选民的裁决。瓦维克(Warwick 1994, 75 页)曾写道:“尽管在议会政体下,政府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国会议员而非选民,但可以预期的是,议会对政府的支持也会随经济状况而变化,而后者对公众来说非常重要。说到底,议员还是要对选民负责。”然而,这并不是表 37.4 展示的结果。如果经济状况不佳,总理们会在竞选时受到选民的威胁;如果经济状况良好,他们则会在两次选举之间受到来自同僚们的威胁。由于政治家惩罚当政者的标准与选民不同,所以在议会民主制之下,当政者代表民众的动机会受到扭曲。

表 37.5 非选举产生的当政者赢得下次选举的情况

	获胜(%)	失败(%)	在下次选举前被替换(%)	总计
党内替换	62.9	33.1	4.0	100(124)
被联盟内另一党替换	12.3	47.7	40.0	100(65)
总计	45.5	38.1	16.4	100(189)

## 六、结 论

主流的政治科学认为,人民以回溯的方式进行统治。萨托利(Sartori 1987, 30、71 页)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对人民行使权力”;“在代议制政府中,人民通过控制和撤换掌

权者实际行使权力(政治权力)”。因为在民主国家,当政者会顾及下一轮选举中选民的回溯性反应,所以政府会照看人民的利益。如果政府是回应性的,那么一次次的选举就会导致代表性。

这一理论存在几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它假定公民能够为再次选举当政者设立一个门槛,从而使政府具有代表性。为此,公民们就必须能够明确什么人过去的结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能够辨别到底是政府行为,还是外部条件对此类结果产生了影响。其结果是,坏政府可能继续当政,好政府却会失去权力。一种最低限度的回应理论,必须由有关公民所需信息的理论加以补充,因为公民需要它来区分好政府与坏政府。

回溯性回应理论还有两个假设非常可疑。首先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彼此相似,因此选举时不涉及选择问题。其次,选民投票时从不考虑未来,也就是说,选举仅仅是根据回溯性标准施行奖惩。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公民们会根据理性的预期尝试选取最优秀的候选人,而且他们会把未来作为选举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部分。还有证据表明,当选民考虑选择、思考未来之时,意识形态就会影响投票。选举并不仅仅由对政府行为的回溯性评价所左右,而是也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希望所影响。因此,当政者有广泛的活动空间。他既可以逃避过去的责任,也可以燃起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最后,我们已经知道,在议会民主国家,有一半的总理不是因为选民,而是因为政治家的决定失去了职位。本党的同志,或者执政联盟中的同僚可能决定在选举到来之前罢黜总理。经验的民主理论认为,这类决定是因为预见到下次选举时选民的判决,换言之,就是通过寻找替罪羊的策略使政党或者执政联盟受到的惩罚最小化。但这个假定要成立,选民和政治家就应该采用同样的标准来惩罚这些总理。但这不是事实。特别是,经济条件会导致相反的反应。当经济状况糟糕的时候,选举失败的可能固然会增加;但当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总理成为阴谋牺牲品的可能也会增加。如果促使总理具有代表性的动机是再次当选,那么这种非选举的威胁会削弱这一动机。议会民主国家的总理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防备各种阴谋,特别是在经济状况还不错的时候。

因此,如果选民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则选举很难导致代表性。如果密谋代替了选举,政治家的标准又代替选民的标准,则政府依照选民利益行事的动机就会遭到侵蚀。最低限度的理论<sup>①</sup>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主为何会就产生对人民的热爱。

<sup>①</sup> 指本章所论及的回溯性民主理论,与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理论,或者慎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相比,这是对民众参与要求最小的民主理论。——译者

## 参考文献

- ACHEN, C., and BARTELS, L. 2004. Blind retrospection: electoral responses to drought, flu, and shark attacks. Working Paper 2004/199. Madrid: Instituto Juan March.
- ALESINA, A., ROUBINI, N., and COHEN, G. 1997.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ANDERSON, C. 1995. *Blaming the Government*. Armonk, NY: M.E. Sharpe.
- 2000. Economic voting and political contex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lectoral Studies*, 19: 151–70.
- AUSTEN-SMITH, D., and BANKS, J. S. 1989.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incumbency. Pp. 121–50 in *Models of Strategic Choices in Politics*, ed. P. Ordeshook.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ANKS, J., and SUNDARAM, R. 1993.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in a repeated elections model. Pp. 295–311 in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s, Compet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ed. W. Barnett, M. Hinich, and N. Schofie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RO, R. 1973.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an economic model. *Public Choice*, 14: 19–42.
- BENGTSSON, A. 2004. Economic voting: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context, volatility, and turnout on voters' assignment of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3: 749–67.
- BLONDEL, J. 1968. Party systems and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180–203.
- BRATTON, K. 1994. Retrospective voting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the case of the budget deficit in the 1988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2: 277–96.
- BROWNE, E., FRENDEIS, J., and GLEIBER, D. 1986. The process of cabinet dissolution: an exponential model of duration and stabilit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628–50.
- CHEIBUB, J. A., and PRZEWORSKI, A. 1999.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economic outcomes. Pp. 222–50 in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ed. A. Przeworski, S. Stokes, and B. Man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KIERMAN, A., and MELTZER, A. 1986. A positive theory of discretionary policy, the costs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the benefits of a constitution. *Economic Inquiry*, 24: 367–88.
- DODD, L. 1976. *Coalitions in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ERCOLE, E., and MARTINOTTI, G. 1990. Le basi elettorali del neosocialismo italiano. In *Vent'anni di elezioni in Italia*, ed. M. Caciagli and A. Spreafico. Padua: Liviana.
- FEARON, J. 1999.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selecting good types versus sanctioning poor performance. Pp. 55–97 in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ed. A.

- Przeworski, S., Stokes, and B. Man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REJOHN, J. 1986. Incumbent performance and electoral control. *Political Choice*, 56: 5–25.
- FIORINA, M.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RICH, C. J. 1963. *Man and his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HARRINGTON, J. 1993. The impact of reelection pressures on the fulfillment of campaign promis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 71–97.
- HIRSCHMAN, A.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BER, E., RAGIN, C., and STEPHENS, J. 1997. *Comparative Welfare States Dataset* www.lissy.caps.ln/compwsp.htm.
- KEECH, W. 1995. *Econom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Y, V. O.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IEWIET, D. R., and RIVERS, D. 1985. A retrospective on retrospective voting. Pp. 207–31 i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ed. H. Eulau and M. Lewis-Beck.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KING, G., ALT, J., BURNS, N., and LAVER, M. 1990. A unified model of cabinet dissolu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846–71.
- KRAMER, G. 1971.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131–43.
- KUKLINSKI, J., and WEST, D. 1981. Economic expecta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in United States Senate and Hous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 436–47.
- LAAKSO, M., and TAAGEPERA, R.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3–27.
- LANOUE, D. 1994.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voting in presidential-year elec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14: 193–205.
- LAVAR, M. 1974. Dynamic factors in government coalition form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 259–70.
- LEWIS-BECK, M.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 SKALABAN, A. 1989. Citizen forecasting: can voters see into the futur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46–53.
- LEYDEN, K., and BORRELLI, S. 1995. The effect of state economic conditions on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does unified government make a differen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8: 275–300.
- LOCKERBIE, B. 1992. Prospective voting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56–88. *American Political Quarterly*, 20: 308–25.
- LOWRY, R., ALT, J., and FERREE, K. 1998. Fiscal policy outcomes and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in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759–74.

- MACKUEN, M., ERIKSON, R., and STIMSON, J. 1992. Peasants or bankers: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nd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597–611.
- MADISON, J. 1961. *Federalist Papers* no. 57.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MANIN, B. 1995. *Principes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Paris: Calmann-Lévy.
- PRZEWORSKI, A., and STOKES, S. 1999. Introduction. Pp. 1–26 in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ed. A. Przeworski, S. Stokes, and B. Man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AVALL, J. M. 1999. Accountability and manipulation. Pp. 154–96 in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ed. A. Przeworski, S. Stokes, and B. Man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party democracy. Working Paper 2003/190. Madrid: Instituto Iuan March.
- and PRZEWORSKI A. 2001. Political reactions to the economy. Pp. 35–77 in *Public Support for Market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ed. S. Stok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RSHON, C. 1996. The cost of coalition: coalition theories and Italian governm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534–54.
- 2002. *The Cost of Coalition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ARDI, F. 1994. Primary voters as retrospective voters. *American Political Quarterly*, 1: 88–103.
- NADEAU, R., NIEMI, R., and YOSHINAKA, A. 2002.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voting, taking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context across time and nations. *Electoral Studies*, 21: 403–23.
- NORDHAUS, W. 1975.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 169–90.
- PALDAM, M. 1991. How robust is the vote function? A study of seventeen nations over four decades. Pp. 9–31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he Calculus of Support*, ed. H. Norpoth, M. Lewis-Beck, and J.-D. Laff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ERSSON, T., ROLAND, G., and TABELLINI, G. 1997.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accounta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1, 163–202.
- and TABELLINI, G. 1990. *Macroeconomic Policy, Credibility, and Politics*. New York: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POWELL, C. 2001. *España en democracia, 1975–2000*. Madrid: Plaza y Janes.
- POWELL, G. B.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nd WHITTEN, G. 1993.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voting: taking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391–414.
- PRICE, S., and SANDERS, D. 1995. Economic expectations and voting intentions in the U.K., 1979–87: a pooled cross-section approach. *Political Studies*, 43: 451–71.
- PRZEWORSKI, A. 2003. *States and Marke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E, D. 1968. A note on the fractionalization of some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 413–18.
- RIKER, W.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 ROGOFF, K. 1990. Equilibrium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21–36.
- and SIBERT, A. 1988. Ele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5: 1–16.
- ROVAN, J. 1978. *Histoire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allemande*. Paris: Seuil.
- ROYED, T., LEYDEN, K., and BORRELLI, S. 2000. Is “clarity of responsibility” important for economic voting? Revisiting Powell and Whitten’s hypothe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669–98.
- RUDOLPH, T. 2003. Who’s responsible for the economy? The form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 698–713.
- 2003.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Journal of Politics*, 65: 190–215.
- SÁNCHEZ-CUENCA, I. 2003. How can governments be accountable if voters vote ideologically? Working Paper 2003/191. Madrid: Instituto Juan March.
- and BARREIRO, B. 2000. *Los efectos de la acción de gobierno en el voto durante la etapa socialista 1982–1996*.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 SANDERS, D., and HERMAN, V. 1977. The stability and survival of govern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cta Política*, 12: 346–77.
- SARTORI, G.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 SHAFFERS, S., and CHRESSANTIS, G. 1991. Accountability and U.S. Senate election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4: 625–39.
- STOKES, S. 2001. Introduction: public opinion of market reforms: a framework. Pp. 1–32 in *Public Support for Market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ed. S. Stok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S. 2003. *Mandate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OM, K. 1990.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ÜLLER, W., and BERGMAN, T. 2003. *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VODA, C. 1995.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1982 – 1986.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8: 117–34.
- TARR, F. de. 1961. *The French Radical Pa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M., and HERMAN, V. 1971. Party systems and government s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28–37.
- THATCHER, M. 1993.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Harper Collins.
- TUFTE, E. 1978.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USLANER, E. 1989. Looking forward and looking backward: 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the 1980 federal elections in Canad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495–513.
- WARWICK, P. 1994. *Government Survival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KINS, A. 1991. *A Conservative Coup: The Fall of Margaret Thatcher*. London: Duckworth.
- WHITTEN, G., and PALMER, H. 1999.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voting. *Electoral Studies*, 18:

49-67.

WOLDENDORP, J., KEMAN, H., and BUDGE, I. 1998. Party governments in 20 democracies: an updat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3: 125-64.

## 第三十八章 经济转型与比较政治

蒂莫西·弗莱(Timothy Frye)

实际上,转型最难的部分绝不是经济,而是政治。(Sachs 1993,3 页)

过去 15 年,指令性经济的转型引发了比较政治学者极大的兴趣。得以实时研究民主政治、利益团体,以及欧盟在创造市场经济方面的影响,这一机会吸引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最优秀的人们,而在过去,他们只在别的领域施展才华。<sup>①</sup>对区域研究有深入了解的学者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一道,使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本章着重介绍指令性经济转型的研究对广义的比较政治学作出了何种贡献。首先是描述过去 15 年间不同国家非常不同的经济改革。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个(大致)相似的起点开始,从具有活跃的市场经济的欧盟成员国,到今天仍然具有高度国家控制的封闭的经济体,都卷入了这一过程。然后讨论政体类型、利益团体、治理质量和欧盟如何影响了经济改革。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民主并不像过去理解的那样会成为障碍;从改革中获利的集团可能不会支持进一步的改革;欧盟能够成为经济改革的发动机;有效的制度,尤其是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至关重要。这些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我认为,它们往往缺乏微观基础。比较政治学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中层理论更容易受到微观研究的挑战,因为它们提出了多种因果解释路径。在讨论每一种解释的时候,我将尝试寻找相应的途径,以建立中层因素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因果联系。

明确中层理论与现有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很多方面看,民主、国家能力与经济改革之间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此外,令人满意的解释不仅要说明结果本身,更要说明产生这些结果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关于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改革

---

<sup>①</sup> 在政治学家中, Raymond Duch, John E. Jackson, James Gibson, Stephen Holmes, David Laitin, Juan Linz, Alfred Stepan 和经济学家 Andrei Shleifer, Jeffrey Sachs 和 Joseph Stiglitz 对指令性经济转型的学术争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的研究在前一方面做得要比后一方面好。另外,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些中层变量与经济改革很可能是同一些原因的结果。因此,在经济转型的研究中依然存在诸多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这一微观基础薄弱的问题不仅限于后共产主义世界,而且也是主导比较政治学的中观研究中一个共同的缺陷。

在指出中观理论缺乏微观基础之后,本章从另一个角度回顾对中层理论的批判,即缺乏因果解释的深度。基切尔特(Kitschelt 2003)非常具有代表性地提出了这个方法论同时也是本体论方面的问题,认为好的解释不仅应该寻找人类行为之间密切的因果联系,而且还必须明确那些在时间上相距遥远的因果联系,以尽可能避免套套逻辑的出现。为此,一些学者通过更深远的历史因素解释后共产主义世界经济改革的差异,包括国家建构的时机和本质、大众教育的时机和本质、地理状况和规范扩散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共产主义制度的遗产,等等。这些解释不仅努力确认那些与当前经济结果相关的历史因素,而且尽可能厘清使这种历史影响得以流传的机制。对因果机制的关注带来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在结论部分,我将简要介绍我自己把时间上远近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对改革的结果加以解释的尝试。我强调的,是行政机构的党派属性、民主制度,以及1989年之前共产党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这个文献回顾未能涵盖经济转型研究的所有重要成果。在这样一个简短的回顾中,要囊括过去15年的大量工作,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本章也不准备像通常的文献回顾所做的那样,重点突出某种具体的方法、概念或研究途径。<sup>①</sup> 它的目标,是澄清争论的焦点;指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证明对指令经济转型的研究,已经为比较政治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 一、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针对指令性经济而言。没有两种指令性经济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种市场经济完全相同),但它们的确有一些共同点,即国家拥有财产并且决定其用途;计划者而非市场为大多数商品制定价格,公司仅受到软性而非硬性的预算控制。这意味着,管理者受到的约束更多来自资源短缺而非市场竞争(Kornai 1992)。尽管指令性经济具有诸多不合常规的特性,但它也能够维持均衡(Ericson 1992)。计划者、管理者、工人和消费者对指令性经济提供的刺激作出理性反应,而且每个参与者都不会偏离计划者的

---

<sup>①</sup> Djankov and Murrell(2002), Campos and Corricelli(2002)都是极好的文献回顾。它们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改革和市场建构,而非经济表现,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

策略。由于指令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所以它不受边际变化的影响。施罗德(Schroeder 1979)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是“被诱骗进行改革的”。也就是说,指令性经济很难从内部加以改变,虽然中国和越南是这个规则的例外。本章后面的部分,将讨论使中国和越南能够“走出计划”的制度创新(Naughton 1995; Qian 2003; Malesky 2005)。

前苏联和东欧的27个国家很明显属于转型经济的类别,且具有大致相同的制度起点。中国、蒙古和越南也常常被包括进这一类研究之中。在对亚洲的这三个转型经济体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比较时,一定要注意这两组国家之间的差别。中国和越南开始转型的时候,收入水平非常低,而且具有强大的一党统治,虽然在政府的较低层次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此外,中国和越南中央经济计划涉及的产品种类,要远远小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Naughton 1995)。是否应该借鉴亚洲转型经济体的经验,并把它们运用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此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对这两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想必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Qian 2003)。<sup>①</sup>

在研究过去15年市场经济建设方面的进步时,一些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人印象深刻,如果考虑到改革起步时恶劣的条件、变革的广度,以及20世纪90年代全球市场的风云变幻,就更是如此。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8个不同领域的经济改革进程加以测评,其中1表示指令性经济几乎没有变化,而4.3则表示达到了发达市场经济的标准。改革的领域包括大规模私有化、小型私有化、贸易自由、物价自由化、公司治理改革、银行改革、证券市场改革,以及竞争政策的改革。改革的最高评分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制度上的多样性,且并不必然向某种理想模式趋同。绝大多评分设定的表现基准点,都可以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找到。

表38.1的第一列,是2004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8个方面未经加权平均的改革指数,它表明很多国家此前15年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建立类似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度框架的方向上大步迈进。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某些领域一直努力引进广泛的经济改革,但在另一些领域也获得了可观的成效。最后一组国家,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已经去除了一些指令性经济的因素,但还保留了广泛的管制,高水平的国家保护,以及较大的国有成分。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提醒我们,改革是多层面的。一个国家往往同时进行不同类型的改革。这些国家不同类型的经济改革往往高度相关,但在经济改革不同领域取

<sup>①</sup> 在其他研究中,Sachs and Woo(1992),以及Mau(2000)是对这种比较持怀疑态度,Naughton(1995),Stiglitz(2000)和Roland(2000)较为支持这种比较。将这两个体系国家进行比较的一个难点是缺少可以用来比较的数据。

得的进展也存在普遍差异。例如,表 38.1 的后三列提供了 2004 年三种类型改革的得分。第二列表明,大多数国家明显提高了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但第三列和第四列则显示,它们在工业私有化和改善公司治理方面进展有限。<sup>①</sup>

表 38.1 2004 年经济改革

	8 类政策领域的 平均得分 1	贸易自由化 2	大规模私有化 3	公司治理 4
阿尔巴尼亚	3.00	4.3	3.0	2.0
亚美尼亚	3.06	4.3	3.3	2.3
阿塞拜疆	2.71	3.7	2.0	2.3
白俄罗斯	1.88	2.3	1.0	1.0
保加利亚	3.41	4.3	4.0	2.7
克罗地亚	3.49	4.3	3.3	3.0
捷克共和国	3.78	4.3	4.0	3.0
爱沙尼亚	3.78	4.3	4.0	3.3
马其顿共和国	3.08	4.3	3.3	2.3
格鲁吉亚	3.04	4.3	3.3	2.0
匈牙利	3.86	4.3	4.0	3.3
哈萨克斯坦	2.95	3.3	3.0	2.0
吉尔吉斯斯坦	3.08	4.3	3.7	2.0
拉脱维亚	3.63	4.3	3.7	3.0
立陶宛	3.62	4.3	3.7	3.0
摩尔多瓦	2.89	4.3	3.7	1.7
波兰	3.69	4.3	3.3	3.3
罗马尼亚	3.16	4.3	3.7	2.0
俄罗斯	2.99	3.3	3.3	3.3
斯洛伐克	3.70	4.3	4.0	3.3
斯洛文尼亚	3.41	4.3	3.0	3.0
塔吉克斯坦	2.43	3.3	2.3	1.7
土库曼斯坦	1.34	1.0	1.0	1.0
乌克兰	2.86	3.0	3.0	2.0
乌兹别克斯坦	2.15	1.7	2.7	1.7

<sup>①</sup> 这些国家在小范围私有化和国内价格自由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比在其他领域要多,后者如银行改革、证券市场改革和竞争政策方面。

续表

	8类政策领域的 平均得分 1	贸易自由化 2	大规模私有化 3	公司治理 4
样本中值(标准 方差)	2.40 (.76)	3.79 (.92)	3.14 (.83)	2.38 (.71)

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不同类型的经济改革进程的差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改革不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一种类型的经济改革有助于其他类型的经济改革(Fisher, Sahay, and Vegh 1996)。例如,自由贸易会使国内价格自由化变得容易。另一些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经济改革速度的差异,为政治家组建改革早期受益者的联盟,以支持转轨后期的进一步自由化提供了机会(Roland 2000)。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别改革进展的差异,可能与更为成功的改革努力相联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不同类别经济改革进展的差异,可能会使从一种类别的经济改革中获益的经济行为体阻碍其他类型的经济改革的进展(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Hellman 1998)。无论如何,虽然这些讨论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已经促使学者们更细密地考察不同类别的经济改革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从而把改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讲述了一个同样有趣的故事(见图 38.1)。一些国家,如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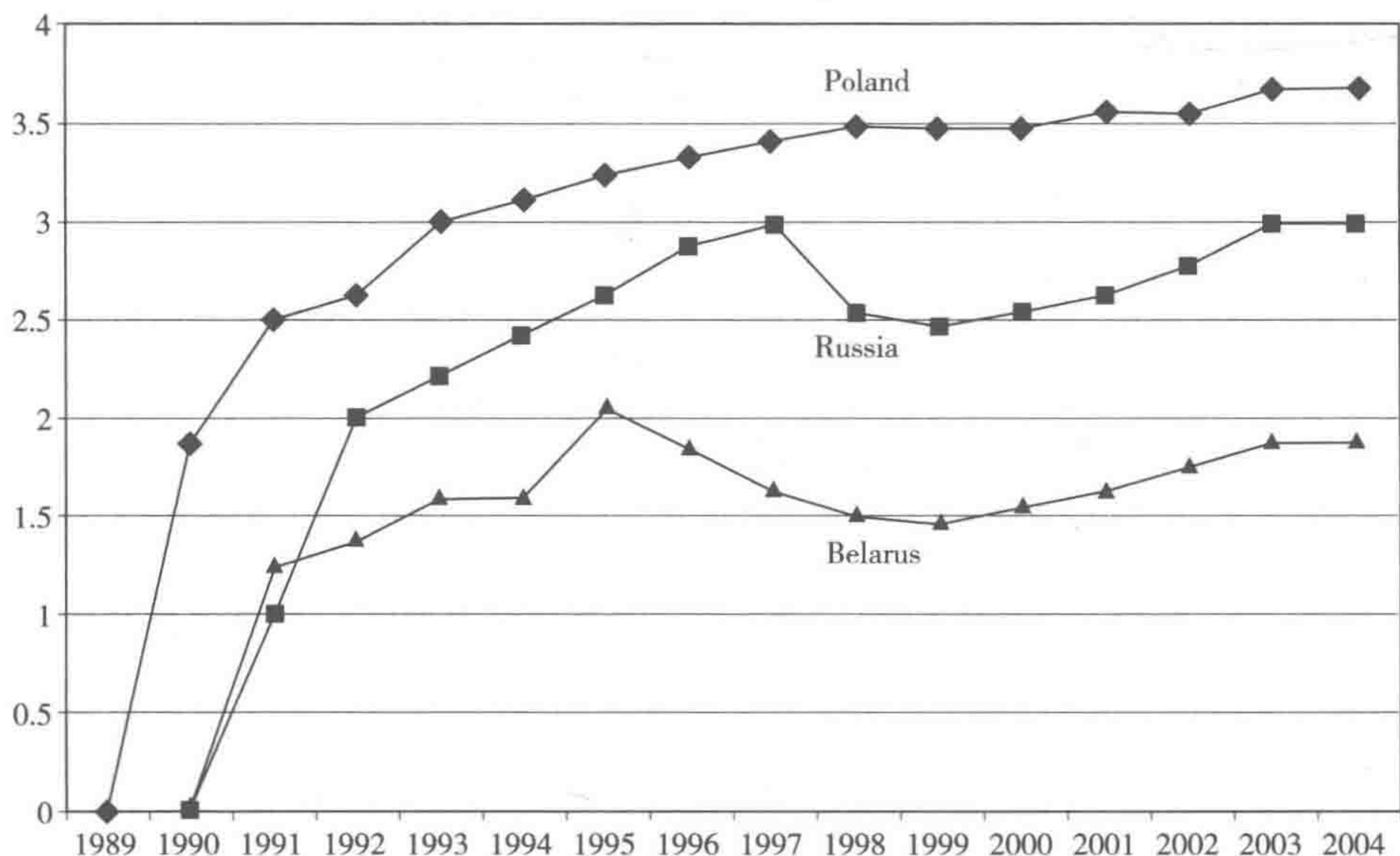


图 38.1 1989—2004 年平均经济改革得分

兰,从转型一开始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并且在整个后共产主义时代都保持了高度的经济自由。相反,白俄罗斯在此前的15年中遵循的是一条渐进的经济改革路线。俄罗斯的经济更是走走停停。在初期的自由化阶段之后,俄罗斯在1998年经历了经济改革的逆转。经历这一倒退之后,俄罗斯正努力让市场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

## 二、中层理论与经济改革:政体类别

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改革的差异,这一直是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中的一个中心课题。大多数研究者注重中层理论,它们强调的是政体类别、利益团体的权力、管治机构的质量,以及欧盟吸引力的影响。这方面的每一种观点都能够给人以重要的启示,但它们的微观基础却往往并不牢靠。

早期的分析受到拉美研究中产生的经济改革政治学传统智慧的影响,主要把政体类别作为经济改革的一种可能的解释(Lipton and Sachs 1990; Przeworski 1991; Williamson 1994)。这种观点强调,经济改革在短期内产生了集中于少数特定群体身上的代价,但从长期来看却可以使整个社会受益。因此,寻求经济自由化的统治者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在广泛的政策领域推进经济改革,并且在改革全面推开之后使他们免于必然出现的民粹主义反弹的威胁。经济转型中主要的政治挑战是创立一套制度,以保护改革取向的政治家在穿越“泪谷”时掌握政权,直到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益(Przeworski 1991)。那些行政权力特别容易受到民众压力影响(一般是通过选举)的国家,经济改革的进程也最为缓慢。<sup>①</sup>

然而,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所获得的发现挑战了这一论点。有证据表明,在后共产主义世界,民主的水平与经济改革的水平呈正相关。众多研究表明,“自由之家”评测的民主水平,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经济改革指数之间存在双变量相关的关系(Hellman 1998; EBRD 1999)。在对前苏联的成员身份、执政党的党派和初期的财富水平进行控制之后,回归分析表明,民主与经济改革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相关性。<sup>②</sup>

尽管“民主促进了经济改革”这一观点在最近几年得到了证实,但要大张旗鼓宣扬

<sup>①</sup> 学者们一般来说不至于主张独裁统治更有利于经济改革,但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能够抵御大众压力的制度更可取,他们同时也对政治和经济自由化能够互相支持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sup>②</sup> 由于研究涉及的时间段相对较短,存在着内生性偏差的可能以及测量的误差,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经济改革按时间段进行剖面研究应该持慎重态度,但无论如何这些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它还时尚早,因为这一论断的微观基础仍有待厘清。<sup>①</sup> 民主可能以多种方式影响经济自由化,但其间的因果路径还有待确认。一些研究者认为,民主通过把选举权赋予经济改革的失利者而强化了回应制,从而使强势群体难以绑架国家(Hellman 1998)。根据这一观点,任期较短且必须承担责任的统治者不太可能被俘获,因为经济行为体与特定的统治者建立个人关系所获甚少。但是,从均衡状态来看,政权交替并不必然与经济改革相关。失去权力的威胁既可以阻止负有责任的当权者假公济私,也能够阻止利益团体来获取特殊利益。由于丧失权力的威胁足以削弱权力寻租,因此对频繁政府更替和广泛的经济改革的经验观察,并不具有特别的说服力。<sup>②</sup>

一种略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民主国家的权力更为分散,比如有更多的否决点,因此比较难于被俘获。这可能是真的,但对于说明改革为何发生却贡献不大。其他领域的研究表明,分散的权力,使政府在引入经济改革时更难以克服集体行为和分配问题,而在后续阶段它又会使经济改革的维持变得更为复杂(Haggard 1990; Haggard and Kaufman 1995; Roubini and Sachs 1989)。<sup>③</sup> 如果不考虑主要利益群体的党派偏好,就很难了解民主制度本身为何有利于经济改革的引入。

民主可能通过选举周期推进经济改革。有一些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很有可能在选举后的一年、而不太可能在选举之前的一年推行(Frye and Mansfield 2004)。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俄罗斯不同政策领域存在选举周期的证据(Treisman and Gimpelson 2001),不过,这些结论尚未在不同国家更为广阔的政策领域得到验证。

转型之外的跨国研究表明,作为民主制基本特征的媒体自由对经济改革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Adsera, Boix, and Payne 2003)。麦克米兰和左多(McMillan and Zoido 2004)利用秘鲁官员间相互行贿的详尽收据和录像证明,由于贿赂媒体的代价要远高于贿赂当选官员和官僚,所以媒体是减少腐败的关键。在俄罗斯,享有更多出版自由的地区,经济表现也较好(Yanovskiy et al. 2001)。也许民主通过出版自由发挥了作用,但这一结论尚未得到整个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验证。更一般地说,民主制度也许不能替代、而只能补充经济自由化,而且只有在民主制各项因素同时出现的时候下才能推进这一进程。换言之,对于推进改革来说,选举的压力、权力的分散和自由的媒体都必不

① 应该注意的是,民主更多的是与经济改革的水平,而非经济改革中的增长水平相关。经济改革中增幅最大年份的民主水平与经济改革带来的增幅之间的相关度是 0.26,这个关系没有统计意义( $p=0.21$ )。很多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经济改革中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但民主程度都相当低。

② 经济改革可能带来民主,这种正向的关系可能强于反向的关系(Fish 2005)。

③ 哈加德和考夫曼(Haggard and Kaufman 1995)认为,集中的政治权力让经济改革的推行更为容易,但是这让下面的问题更加困难,即一旦经济改革推行它如何得到巩固。

可少。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要让民主对经济改革发挥人们所期望的影响,它的每一个部分就都必须到位。

还有两个环境因素也可能使民主在后共产主义世界比在其他地方更有利于经济改革。民主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可能与经济改革密切相关,是因为组织起来的劳工力量非常弱小。<sup>①</sup> 在拉美,由于劳工一直以来组织程度更高,与政党的关系更紧密,所以民主与经济改革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拉丁美洲,经济改革的失利者似乎更成功地(当然其实也不是太成功)利用民主制度阻挠了经济改革。看来,转型国家民主之所以与经济改革发生关系,原因可能是组织起来的劳工力量普遍较弱。

此外,与其他地区相比,作为民主制基本特征的权力分散化,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可以也更有助于推动经济改革。由于在转型开始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经济也高度国有化,进入政治领域的新的群体可能比原来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自由经济。因此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出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权力从当政者手中分散出去,会增加市场导向的群体对政策的影响力。一项基于1990年到1998年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政治权力是否集中,民主国家都实行开放经济;而政治权力分散的非民主国家,也实行高度开放的经济。只有政治权力集中的专制国家才维持了较高等度的贸易保护(Frye and Mansfield 2003)。

总的来说,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民主的水平如何影响了经济改革。厘清政体类别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因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民主同样与自由政府、欧盟准入条件,以及某些历史因素相关。在此,转型经济的研究者与民主和平论者站在同一条船上(Rasato 2003)。在民主的水平与某种特定的利益输出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但其中的因果路径仍然有待争论。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发现民主与经济改革关联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某些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同时导致了民主制度和经济改革。现在就无保留地接受后共产主义的世界民主与经济改革必然相伴发生这一个正在形成的(在规范意义上是令人愉悦的)共识,似乎还为时尚早。

### 三、利益集团:好赢家、坏赢家,以及经济改革

学者们同样考察了经济转型中利益集团扮演的角色。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人们一直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用利益集团解释经济改革,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sup>①</sup> 很多学者注意到,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弱小得惊人。关于这个问题,Crowley (2004)有一篇很好的文献回顾。

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群体不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把改革向前推进,而为了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对经济改革中的失利者则必须加以补偿,或进行压制(Garrett 1998; Haggard 1990)。罗德里克(Rodrik 1996, 29页)在总结通行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改革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创造出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利益就在于改革的继续。”在后共产主义世界,由于经济改革可能的受惠者,即私营企业在很多国家转型之初根本不存在,所以为经济改革创造政治支持就尤为重要。这一考虑为快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种比较容易为人们接受的解释。<sup>①</sup> 很多学者认为,私有化会让企业内部人员,首先是公司管理者获益,他们会支持后续的经济改革持续下去(Shleifer and Vishny 1998, 11页)。

但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证据表明,对于经济获益者的行为应该进行更为细密的观察。经济转型研究中最出人意料的发现之一,就是一些从经济改革中获益的团体可能意欲阻碍进一步的自由化。最典型的就是赫尔曼的观点(Hellman 1998)。他认为某些经济改革使一些特殊群体独享利益,而他们为了维护这种利益,会阻挠随后的改革。比如,要是在国内价格完全自由化之前放宽对外贸易限制,就会让出口商按照国家补贴价格购买商品,又在海外市场以国际的价格出售,以赚取两者之间的差价。与此相似,如果在建立产权保护制度之前进行工业企业的快速私有化,会让企业内部人员为个人利益侵夺公有财产。诸多研究表明,这类所谓“部分改革”的受益者都成了继续改革的阻碍。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享有经济特权的群体会颠覆改革,是赫尔曼(Hellman 1998)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认为改革进程本身会让某些群体获利,而它们出于既得利益又会阻挠改革。这一观点基于穆菲、施莱费尔和维施尼(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较早的研究,强调从经济转型中获益的群体会成为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首要阻碍。<sup>②</sup>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推进了这个方面的研究。索宁(Sonin 2003)提出一个形式化的模型,指出通过私有化致富的公司管理人员更倾向于维持软弱的法治状态,因为这使他们能容易使用私人手段保护自己的财产,包括贿赂政府官员和雇佣私人保安。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 and Stiglitz 2004)认为,经过私有化控制了企业的管理人员面临着集体行动和协同问题,这削弱了他们为下一步的机构改革进行游说的动机。作为一个群体,管理人员本来应该能够从法治的完善中获利,但由于机构改革具有分配效应,因此无法保证管理人员会采取某种共同策略,以增进他们的个人所得。实际上,有可能寻租的管理人员更倾向于延迟法治的建立,直到他们的资源被耗尽。

<sup>①</sup> 艾雅尔、泽列尼和唐斯利著作(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的书名《创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

<sup>②</sup> Schamis(1999)对拉美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对这个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对俄罗斯以外国家的研究(Ganev 2001)。在最早几轮经济改革中获利的大赢家肯定是未来改革最明显的反对者,但他们是否构成了改革最强有力的障碍则尚不清楚。在俄罗斯,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寡头控制下银行的政治权力,但在此后的7年间金融领域内的改革仍然进展迟缓。如果寡头银行是改革最大的障碍,那么在它们倒台后改革进程应该会更快的。<sup>①</sup>

相似地,如果经济改革的早期获利者拥有足够的权力俘获国家,那么当改革触犯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会逆转改革的方向,而经济改革也会后退。但是,经济改革后退的情况很少发生,而且更容易发生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另外,一些国家好像已经绕过了“部分改革均衡”,而如果早期获利者拥有太大的政治权力,这个结果就不大容易出现(Malesky 2005)。<sup>②</sup> 不过无论如何,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些在转型经济中致富的群体的确阻碍着进一步的改革。

### 3.1 好赢家

不过,并非所有赢家都是坏赢家。有些群体是因改革过程本身出现扭曲而致富,另一些则是受益于更多的贸易机会,因而会支持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杰克森、克里希和波兹南斯卡(Jackson, Klich, and Poznanska 2005)发现,在波兰那些转型初期创造了更多新型私营企业的地区,1993年和1997年两次全国大选中,市场导向的政党都得到了更多的选票份额。这项研究追溯了新型私营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时间进程,证明了为何众多新型私营企业的存在,迫使各政党采取了扩展市场的政策,从而推进了此领域的讨论。类似地,菲德马克(Fidrmuc 2000)和塔克(Tucker 2006)发现,在中东欧国家那些改革受益群体较多的地区,自由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也更高。弗莱(Frye 2004)发现,在俄罗斯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新型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特别愿意为那些支持改革的政党投票。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改革进程本身会改变改革中受益者和失利者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只是其具体作用机制难以通过统计分析的方式加以把握。那些创造了活跃的新型私营部门的改革,同时也创造了进一步自由化的支持力量;而那种把利益集中分配给某些占据特殊地位的群体的改革,则可能会停滞于未来的某个时刻。这表明了与通行

---

① 当然,其他经济领域的巨头仍然对政策发挥着巨大影响。

② 古利耶夫和拉钦斯基(Guriev and Rachinsky 2005)发现,一般来说,俄罗斯寡头控制的公司保持了较高的利润率,但很难断定他们强势的表现是与公司的性质相关,还是与所有者更大的政治权力相关。

的研究相比,一种动态性的转型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具有的优点。<sup>①</sup>此外,这些结果要求我们更细致地对待经济改革中受益者的政治行为。重要的是明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受益者群体会成为下一步经济改革的支持者或者反对者。

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表明,在研究政治和经济变化时,从跨期契约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会有所助益(Diermeier et al.1997)。在经济改革之获益的政治家和群体面临着一个可信承诺的问题。当政者选择那些希望某受惠者能够为其提供政治支持的政策。但是,有些受惠者在获利之后,可能并不提供他们曾经许诺的政治支持。事实上,那些在转型经济中致富的早期受惠者,可能会撤出其对改革的政治支持,以换取更好的谈判地位。

如果我们意识到公共官员也可能会违反他们在博弈中的目标,那么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通过提供某些选择性的利益以换取政治支持之后,国家行为者可能又会撤销这些利益。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一些寡头曾支持普京,现在他却发起了反对他们的斗争,这一变化非常好地说明了上述动态过程。这一事实提醒研究者们注意经济改革过程中立场变化的问题,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议题。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私有化会停滞不前?私有化的公平性是否有助于巩固财产权?牵涉外国公司的私有化更容易还是更难被逆转?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执掌权力的政治家会尊重他们前任的私有化决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就不这样?经营者在获得企业的控制权之后,如何能够相信国家官员们会尊重他们的所有权?

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转型经济,它多多少少存在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转变中。对经济转型和比较政治的研究者来说,一项迫切的任务是明确在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当政者和经济获益者之间的交易更容易发生。在此,分配政治学中固有的、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可信承诺的问题,再次在转型经济学中凸显出来。

#### 四、治理、国家角色与经济改革

治理和国家的经济角色是比较政治学中第三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而对于经济转型

---

<sup>①</sup> 这些结论以一种新的视角描绘了新型私有部门。这一观点指出,新型私营经济中的小企业远非边缘性的政治行为者,它们本身虽然游说能力有限,但在选举时却可以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对于推动机构改革和民主化来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区分让人们回忆起巴林顿·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对好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坏的土地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后者常常被研究者们引用。正是因为新型私营企业剥夺资产和获取租金的能力有限,所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会支持进一步的改革和民主化。

来说,它就是一个核心论题(Offe 1991; Grzymala-Busse, Jones-Luong 2002)。早期研究强调全面收缩共产主义国家的利维坦,但研究者们很快意识到,一个较弱的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方面同样无所作为(Sachs 1994; Holmes 1996)。后共产主义转型提供的一条经验,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在创生市场方面非常重要。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快速经济自由化的提倡者忽视了国家制度的改革,但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相信国家制度的构建首先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他们很可能是对的,因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制度建设是一种值得怀疑的主张。<sup>①</sup> 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国家的能力的迅速下降、非正规经济的出现,以及建设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所要求的高速度,往往使观察者们措手不及(Roland 2000)。

关于国家制度对市场进行治理的性质和能力的争论,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一种得到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崩溃了,但在很多情况下,与其他中低收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仍然保留了较大的税收和支付能力。表 38.2 反映的是世界银行关于 1995 年一系列国家的税收和国家支出在 GDP 总量中所占比例的数据。总体上看,相对于它们的经济规模,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两个比例都偏高,且保持着较强的税收能力。

表 38.2 1995 年拉美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税收和国家支出

	税收(%GDP)	支出(%GDP)
阿根廷	13	14
玻利维亚	11	21
巴西(1994)	20	34
墨西哥	13	16
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平均值	12(1994)	14
阿尔巴尼亚	17	31
保加利亚	36	42
爱沙尼亚	36	31
欧洲/中亚平均值	23	31
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	12	15

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南 2005。

<sup>①</sup> 一项研究发现,在转型开始几年之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增加。这表明,在宏观经济条件稳定之后,制度的重要性增强了(Campos and Corricelli 2002)。

还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应该削减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以“解放”市场。但是,拥有最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社会支出的比例也比较高。事实是,人均健康支出滞后值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计算的市场经济改革得分中间值呈正相关(.55)(World Bank 2002;EBRD 2003)。

在这个方面中国和越南情况有所不同。它们的国家较小,转移支付规模也不大,却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经济自由化。中国在这方面尤其令人感兴趣。1978年政府财政总收入大约占GDP的40%,但到199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Qian 2003,320页)。这一变化并非出于支出的巨减。事实上,这段时间内政府收入翻了一番。这一比例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它让分母增加了五倍。

最后,人们普遍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在近十年的治理相当糟糕,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实际情况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大致相当。马雷尔(Murrell 2003,1页)使用世界银行1990—1997年的数据对治理情况进行测量,发现“在人均收入已定的情况下,制度质量基本上与预期相同”。特雷斯曼(Treisman 2003)使用透明国际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ices)对治理进行测量,得出的是相同的结论。国别研究也有类似发现。虽然俄罗斯作为后共产主义世界无法无天的代表而声名狼藉,但是亨得利、马雷尔和里特尔曼(Hendley, Murrell, and Ryterman 2001)的调查表明,俄罗斯的法治制度没有那么糟。<sup>①</sup>

争论部分出自测量问题。在过去十年,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治理和腐败的新的方法,包括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但是,正如安东·契诃夫所言,“如果针对某种疾病出现诸多疗法,说明这一疾症尚未治愈”<sup>②</sup>。因此,不应低估衡量治理质量方面存在的困难。<sup>③</sup>

#### 4.1 蓝图和本土知识

人们都同意,“好制度”很重要,但各国家如何才能拥有好制度却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粗略地说,关于好制度的来源有两派观点,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则处于争论的核心。蓝图学派强调,我们清楚哪些制度在发挥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如俄国老百姓所戏称的那样“重新发现美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已经得到了很好的

<sup>①</sup> 如果采用其他标准的话,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要高于现有的评价。很多研究者认为,东亚四小虎官僚机构效能较高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社会不平等程度较低,且劳动力教育水平较高,而这些因素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Rodrik 2000)。

<sup>②</sup> 契诃夫是一位医生,所以他的话值得重视。引文出自《樱桃庄园》。

<sup>③</sup> 对单个国家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非常少见,而国家制度跨国比较的案例研究就更少(见Johnson 2000;Meaney 1995;Easter 2002)。

理解,只需稍加发动就可以适应各地的具体环境。现有制度的移植,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在其他地区创造市场时所经历的昂贵的试错过程。这一观点主张直接借鉴那些在国际上已经被实践证明,且多多少少为人们所共知的最佳方案,包括公司治理制度、银行法规以及破产制度,等等(Kaufmann 2005)<sup>①</sup>。蓝图派的观点经常与“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方案相伴而生(虽然并不必然如此),因为后者的一个方面,就是快速引入新的制度。

人们很容易把蓝图学派丑化为以华盛顿作为大本营的官僚,他们践踏本土规范,把千篇一律的方案强加于经验丰富的当地公共官员,后者则在服从指令之外几乎毫无选择的余地。不过,蓝图学派观点并不那么简单粗暴,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有所变化。这一学派的支持者强调的是善好制度设计方面的普遍原则,而不是法律的直接移植。他们不仅将透明性和回应性原则视为好制度的核心,同时也承认要解决治理问题,不同的制度可能都有用武之地。

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强调欧盟对转型经济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欧盟管理规范的引入提高了一些转型经济体的治理水平,也减少了腐败(Mattli and Plumper 2003; Kaufmann 2005; Vachudova 2005)。那么问题是:如果所有国家都可以直接借鉴现成的管理制度,并把它们运用于当地的市场环境,它们为何还要尝试新的发展道路?

另一些人则认为,地方性知识才是成功制度的基石(Berkowitz, Pistor, and Richard 2003; Rodrik 2000)。这一观点置疑“得到最好实践”的制度能够从其他背景下引入,这部分是因为各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高度相互补充的关系。有效的制度依赖于政治与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他们对本土的环境与条件具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McDermott 2002)。也就是说,制度是特殊环境的产物,它们经历不断的试错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这一观点通常与经济自由化中的渐进路线相伴随(虽然也不一定必然如此),因为后者注重的是可能需要时间来加以评判的实验。

不过,关于蓝图还是本土知识对制度发展更重要的争论,忽略了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制度选择成为关键因素的政治条件。比如,钱(Qian 2003)认为,中国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创造了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它们在政治上可行,且能够提高效率,虽然离蓝图派提倡的最佳方案尚有距离。<sup>②</sup> 这些制度固然保护了有权势的部分获取某些特殊利益,但也扩展了他人的机会。价格双轨制允许企业依照一种价格生产计

<sup>①</sup> 当然,学术界仍然在激烈争论这些问题,虽然它们已经被政策建议者们广泛接受(Easterly 2003)。

<sup>②</sup> 一种通常的政策分析方法是确认在经济上有效的政策,然后再揭示政治为其披上的美丽伪装。另一种方法是从政治上有效的政策出发,然后揭示人们如何调整经济政策以提高效率。

划产品,又可以根据市场价格出售超出计划的产品。价格“在边缘部分被自由化了,而中心部分的计划价格以及生产指标也得到了维持”。乡镇企业的出现也与此类似。它们是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一方面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获利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使乡镇企业主在完成计划之后有利可图。与蓝图学派强调的全面放开的价格与清晰界定的产权相比,这类制度显然有所不同。

此外,银行账户非实名制的出现虽然有违蓝图派关于透明性的主张,但也可以对中国政府有所约束。非实名制限制了政府能够得到的信息,也使对特定储户的掠夺变得困难。政府之所以接受这种制度,部分原因则在于它可以通过对利率和资本流动的控制,从它自己的银行储蓄中获利(Qian 2003, 306 页)。因此,非实名制有助于减少国家对市场的盲目干预,从而也增加了其承诺的可信度。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之所以有效,并不因为它们乃是适用于成熟市场经济的“运行最好的”制度,而是因为它们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环境。

施莱费尔和特莱斯曼(Shleifer and Treisman 2000)的观点类似。他们认为,俄国私有化和税收改革的目的是保护强势集团的特殊利益,但同时也希望借此提高效率。根据这一观点,俄罗斯政府通过使用国家财政换取铸币权,一方面保护了政治上强势的银行部门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原先通过通货膨胀维持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带来的社会代价。他们认为,考虑到政策选择的政治可行性,统治者们会引入一些只能附带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一些人认为这种策略对寻租者过于慷慨,但其支持者则将这些妥协视为在缺乏理想条件的情况下,为推动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Stiglitz 2000; Zhuravskaya 2006)。

总的来说,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经济改革突显了制度和治理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sup>①</sup>但是,制度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政治和经济行为体的动机。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更准确地说明为何政治家提供了那些有助于增强效率的制度,而强势的政治行为者为何又需要它们。

## 五、欧洲联盟

欧亚大陆、中国和越南指令性经济的转型就发生在世界经济动力源的周边。显而易见,欧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亚大陆的8个转型经济体于2004年加入欧盟,还有另外3个站在欧盟的门槛上。欧盟成员的身份为新成员国家提供了可

<sup>①</sup>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在1994年,即前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过程中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观的经济利益,而且这些国家的民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也相当高。对经济改革研究而言,欧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罗兰(Roland 2000)认为,东欧入盟国家展开了一场“改革锦标赛”,并推动潜在的成员国争先恐后加入欧盟。竞争的动力和被遗弃的恐惧刺激了欧盟东临近国家的经济改革。瓦胡多娃(Vachudova 2005)认为,入盟的前景使欧盟在中东欧国家1990年到1994年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一种“消极影响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入盟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欧盟即开始发挥“积极影响力”,即推动要求入盟的国家依据欧盟法律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在她看来,欧盟不仅提供了经济改革不会逆转的可信承诺,同时也增强了这些国家内部支持改革的利益团体的力量。

虽然关于欧盟影响的现有研究正在不断推进,但这些观点的微观逻辑还可以进一步厘清。毫无疑问,扩张带来的潜在收益非常高。作为供应方,欧盟成员国希望通过扩张换取边界的稳定、为他们的投资创造更安全的财产保护,并且管控来自东方的劳工潮。作为需求方,潜在的成员国希望得到欧盟的转移支付、成员国高收入的工作,以及大大扩展的出口机会。<sup>①</sup> 仅仅用成员国的收益进行解释会冒功能主义的风险。出于各种原因,很多对成员国有益的协议未能达成,尤其是涉及分配后果的时候。而且,如果只有成员国身份是唯一重要的因素,那么所有国家都会寻求加入欧盟,但该地区各国政府对入盟的支持并不一致。<sup>②</sup>

研究欧盟对经济改革的影响,一个附带的考虑是因果作用的方向。欧盟成员国身份的拉力是否比转型经济体的推力更强大?换言之,在党派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哪些经济改革是出于欧盟的要求,哪些又是出于各国原本就会推行的政策?至少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内部关于扩展的效果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Mattli and Plumper 2002, 551页)。对于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哪些国家有资格成为潜在的成员国,争论尤为激烈。人们可能会认为,只有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取得实质进步之后,欧盟才能更为主动地推进扩展。或者人们也可能会认为,即便欧盟对扩展仅采取半心半意的态度,加入欧盟的前景也刺激了经济改革。欧盟成员国身份与国内改革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从两个方面都说得通,而这大大加深了分析的难度。普朗佩尔、施耐德和特罗格(Plumper, Schneider, and Troeger forthcoming)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使用一种选择模型,来说明随机情况下某些国家不申请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他们发现,民主和市场改革的程度影响了申请加入欧盟的决定,而在一个国家提出入盟申请后,欧盟的条件在推进

<sup>①</sup> 即便缺乏欧盟成员国资格,这些目标中有一部分也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得到满足,如双边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以及移民政策。

<sup>②</sup> 以规范为基础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研究,也难以说明为何那些有入盟意向的国家仍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经济改革方面就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反思欧盟影响的时候,考虑到一些假想情况可能有助于问题的澄清。欧洲各强大的经济体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推动经济改革,甚至是在没有欧盟的情况下也能如此?如果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的经济改革失败了,情况又会怎样?欧盟还会支持扩张吗?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明确回答,但它们指出了某些方向,使欧盟形塑该区域经济改革的因果逻辑能够得以澄清。

## 六、中层理论与因果联系的深度

上面介绍的各类中层理论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首先,它们缺少微观基础,因而不能具体说明不同国家之间政策结果如何不同,以及为何不同。现有研究在捕捉中层因素,比如政体类型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相关性方面已经有所进展,但尚不能充分解释这些因素为何如此发挥作用。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调查,以说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体所作出的决定。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类中层理论缺乏因果联系的深度。也就是说,它们可能只是真正创造了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过程的某种反映。基切尔特(Kitschelt 2003, 16页)非常雄辩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一方面是毫不妥协的结构主义,它过分强调深层解释而忽视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是纯粹的环境分析,它仅关注最肤浅的、最近的跨时段社会机制”,而学者们则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他特别针对本章所提及的那些研究表示:“后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比较研究中的因果分析,不应肤浅到混淆了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的分别,但也不至于深刻到抹杀了一切可以通过人类行为实现,并可通过偏好、技术和期望加以确认的因果机制。”遵循这样一种思想路线,部分学者已经考虑进一步回溯因果链条,以找到导致后共产主义世界改革结果的结构性的深层原因。

这些分析并不总是试图为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名,它们的目标,是要发现那些影响了建立市场经济的不同道路的结构因素。例如,基切尔特和梅尔斯基(Kitschelt and Malesky 2000)对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制度性解释提出了批评,因为它们忽视了制度自身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他们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制度的独立影响可能十分有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选择之前的权力结构所支配。”<sup>①</sup>基切尔特(Kitschelt 2003)

<sup>①</sup> 更具体地说,他们将后共产主义世界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制度选择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动员、国家形成的时机,以及地理因素。反过来,在现存结构性条件的约束下,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对经济改革的影响既小且不确定。强有力的总统在具有明显裙带关系的专制政体下能够推动经济改革;但在结构性条件不利于裙带关系,或是在民主政体之下,其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国家形成的时机,以及共产主义的统治形式(无论是官僚管理,还是全国协商,或是家长制),都会影响民主制和经济改革的前景。例如,前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家长式共产主义和较晚的国家形成,为下台的共产党领导人提供了动机与资源,以建立一种对民主并不友好的政治制度,同时推行体现了他们的支持者利益的渐进经济改革。相反,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经历过全国协商式共产主义的国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形成了更适宜于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更具活力的国家机构和人力资本。在上述情况下,是国家建构的性质和共产主义统治的遗产制约了制度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它们穿越时空,影响着当下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前景。

类似地,柯普施坦和雷利(Kopstein and Reilly 2000)认为,欧洲和日本这些市场导向的民主国家,可以通过精英们得当的行为传递规范,从而推动相邻地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改革的展开。他们的观点是:“地理上与西方的邻近,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发挥了积极影响。”为了提供更充分的因果解释,他们指出,地理通过两种类型的扩散效应影响着政治和经济结果。一是近邻效应,即一个国家会受到其邻居的影响。二是开放效应。当然,一个国家对“观念交流”的接受程度会不同,“统治机构允许与周遭国家互动,以及接受交通、通信,以及技术影响的意愿与能力也不同。但是,这些因素会潜在地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行为。”(Kopstein and Reilly 2000, 36页)。在这里,扩散效应对经济改革发挥影响的因果关系仍不是特别清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地理因素可以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

费什(Fish 1998)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次选举乃是经济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而达登和吉尔泽马拉—布斯(Darden and Grzymala-Busse 2006)则把这一选举的结果归之于大众识字和国民教育的结果。<sup>①</sup>他们相信,在大众教育得到普及时所教授的内容影响了以后世代的价值观和态度,后者又塑造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政策偏好。他们写道:“是什么导致了共产党下台?我们认为最终的根源是前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它通过国民教育得到激励和强化。数十年间培育出来的民族主义仇恨、让人充满失望的对比,以及精心培育的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它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令人屈辱的强制),这一切堆积到顶点就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崩溃。”他们通过多变量剖面分析发现,带有民族主义内容的大众教育得以普及的时间点,与第一次后共产主义选举中非共产主义派别所占的席位数高度相关。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国民教育在较早阶段实现了全民识字的国家,为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创生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这一理论最大的优势,就

---

<sup>①</sup> 这当然并不排除制度遗产直接影响经济改革的可能性。政治学家认为,指令经济的制度遗产决定民主化的前景;经济学家也认为,改革的初始条件和制度遗产对于经济结果具有重要影响(DcMelo, Denizer, and Gelb 1996)。

是找到了某种使那些在时间上相距较远的因素(全民识字普及的时间),得以对当下的政治结果(第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影响的途径(民族主义教育)。

与过往的研究成果相比,这些工作揭示了更有深度的因果路径。它们也为人们寻找某些工具变量,为解决某些内生性问题提供了机会。而且,与那些仅仅试图把过去的制度性或者结构性特征(共产主义统治的时间或者过往的市场经济经验)与当下的结果关联起来的理论不同,这些工作同时还尝试寻找那些使时间上相隔久远的因素作用于当下的政策选择的途径。可以理解的是,这些研究的长处是能够更好地说明推动经济改革的结构性环境变量,但难以解释经济改革一旦起步之后的具体进程,但无论如何,它们的确为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必需的时间维度。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尝试通过两个步骤把时间上相距远近不同的因素整合起来。首先,在考察不同国家行政权的党派属性为何彼此不同之前,我研究了执政党与民主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政治反对派的性质。<sup>①</sup> 我认为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压力之外,执政党也影响着经济改革的程度。<sup>②</sup> 不过,执政党并不对经济改革施予直接影响;它通过与政治极化和民主制的相互作用影响经济改革。<sup>③</sup> 如果政治极化程度比较低,即议会中的政党分野并不构成对政府太大的反对力量,行政机构就能够推行他们偏好的政策。在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自由派政府仅面临各前共产主义政党的微弱反对,所以能够推行大规模的改革;而在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由于自由派政党的反对力量较小,前共产主义政党掌握的行政权就得以推行极为有限的、渐进的经济改革。

但是,如果政府垮台的话,那么议会中自由派政党和前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对立增加政策逆转的可能性。在那些政治极化程度比较高,即自由派与前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大致旗鼓相当的国家,如俄罗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策的不确定性就比较大。这种由政治极化导致的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了经济行为体预期的投资回报;反过来,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中,由于投资相对较少,当政者只能获取较少的收入购买政治上

<sup>①</sup>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政治权力的党派平衡影响了经济改革。费什(Fish 1998)通过对1991年到1995年经济改革的断面分析发现,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由共产党转变而来的各政党占有的议席数可以十分准确地预示经济改革的水平。阿斯兰(Aslund 2002)同样强调了精英的党派属性在经济改革之中的重要性。

<sup>②</sup> 自由派执掌的行政权由于与国家或政党机构几乎没有联系,也很难控制旧政权任命的政府官员,所以会选择依赖市场的经济策略。由共产党转化而来的政党控制的行政权,则主要信赖党和国家的机构,以及受到经济改革威胁的社会群体,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会对可能威胁到其力量基础的经济自由化持怀疑态度。

<sup>③</sup> 在此,政治极化的测量指标是在前共产主义政党(自由派政党)掌控行政权时,最大的自由派政党(前共产主义政党)所占席位的百分比。

的支持,因而会向那些阻挠改革的强势团体提供特殊利益,以图继续执掌权力。在民主制之下,自由派与前共产主义政党之间这种政治极化的效应会增强,因为政治竞争增加了政府更替的可能性。

作为这一观点的微观基础,我使用了一组 1999 年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对 20 个国家 4000 位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得出的数据。通过多层统计模型,我发现极化政治系统中的商业人士普遍认为政策的可预期性较低,投资率也因而较低。在此,要点是确立某种因果路径(政治不稳定),通过它,中层变量(政治极化)得以对结果(经济改革)产生影响。

我认为,后共产主义世界中自由派和前共产主义政党之间政治力量的党派平衡,受到更深层的因素的影响。更具体地说,我把政治极化问题一直追溯到共产主义阵营中国家认同形成时间点,以及本国共产党的立场。在一些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国家认同形成的时间比较晚,出现在共产主义者政权建立之后。在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时期本国共产党领导人仅面临微弱的民族主义反抗,而且能够依赖既有的机构,把自己装扮为“国家的捍卫者”而继续维持手中的权力。同时,由于前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维持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因而极化的水平也相对比较低。

在另一些国家,如波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国家认同早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之前就形成了,而本国共产党又仅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扮演一种从属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本国共产党会面临强烈的民族主义压力,而且极难取得公众的信任。这些国家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很快让位于主导着政治光谱的自由派政党,因而政治极化水平也不高。<sup>①</sup>

第三组国家包括俄罗斯、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在这些地方,国家认同的形成也早于共产主义政权,但本国共产党维持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使得 1989 年之后接替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党派能够可信地声称,他们一直独立于“外部”压力制定政策。在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有较高的信任度,而且可以借助共产主义时期的成就要求获得信任,同时轻描淡写地对待共产党统治时期那些最让人难以忍受的特征。这种办法在社会中的某些部分管用,但在其他部分则不然,因而导致了自由派与前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极化政治。

这样一种双向策略,一方面试图通过往后回溯因果链条,为理论寻找更深层的因果路径,另一方面也试图寻找使中层因素与经济结果相关联的微观基础。当然,要探究制度遗产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这绝不是唯一的策略。另外一种选择是对各国的不同

---

<sup>①</sup> 与大量二手文献一样,我把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立陶宛的前共产主义主义政党视为市场取向的政党(Ishiyama 1997; Grzymala-Busse 2002)。

制度加以比较。人们也许能够通过比较越南、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改革,发现认识制度遗产的新视角(Qian 2003; Malesky 2005)。虽然它们都是贫穷的农业国,亦非民主政体,但它们开始改革时的制度遗产各不相同。<sup>①</sup>还可以对越南和摩尔多瓦进行比较,虽然它们都是贫穷的农业国,但后者却有令人吃惊的民主化水平(Way 2003)。<sup>②</sup>

最后,学者们也可以通过对那些难以理论化的案例进行研究而获益。比如,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结构条件来看,人们期望它们的经济改革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就,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两个国家在开始转轨的时候都相对比较富裕,人口教育水平也比较高,且邻近欧洲,但它们在引入市场制度方面却遭遇了极大的障碍。类似地,保加利亚虽然有健全的民主制,但其经济转轨却相当困难。反过来,民粹主义者梅恰尔(Meciar)治下的斯洛伐克,其经济改革的得分却又高于人们的预期。事实上,尽管斯洛伐克在改革之初各方面条件并不乐观,且由一个民粹主义色彩较浓的政府领导,但根据20世纪90年代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改革评分,其成就基本与捷克共和国齐平。

## 七、结论和未来研究的领域

总的来说,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案例为关于创生市场经济的实质性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15年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民主不会阻碍经济改革的论断,还是人们常常提起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张力,都有失夸大。此外,与经济改革政治学的一般性发现相比,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使人们对利益集团政治学得到了更为细微的认识。与通常的预期相反,从经济改革中获益的群体有可能更倾向于阻挡而不是推进经济自由化。本章提及的例子也反映出,对一些国家来说,欧盟一直是支持经济改革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就未必如此。最后,这些例子提示我们,强有力的国家对于经济自由化至关重要。

当然,在为上述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微观基础和更为深层的因果链条,以丰富现有的发现方面,学者们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比如,民主到底如何推动了经济改革?政治与经济行为者在什么时候会进行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国际组织能够影响政策?在什么时候政治家会支持更强有力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在什么时候私人利益又会提出同样的需要?

<sup>①</sup> 威权统治的形式也有所差别,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威权统治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中国和越南却由党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这会使比较变得复杂化,但也会富有成果。

<sup>②</sup> 另一种研究路径重点关注具有不同制度遗产的国家地方层面的问题。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可以避开频繁变动的国家边界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在中层理论和经济改革结果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此外,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在时间上回溯因果链条,以保证转型研究中关于经济改革的中层理论不仅仅是对简单因果关系的反思。探究前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遗产如何影响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制度选择和政策结果,已经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课题(Pop-Eleches 2006)。

本章认为,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已经得出了一系列经验和理论方面的发现,它们挑战了现有的结论,扩展了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通常的逻辑是,经验上的发现始终主导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因此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也许并不明智。不过,以下三个具有潜在研究价值的领域还是值得一提。

### 7.1 跨区域比较

普列泽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为拉美和后共产主义世界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基础,但对这两个地区进行明确比较的研究并不多。此乃一大憾事。当然这种比较会面临很多困难,有趣的谜团仍然有待探索。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似乎带来了更强劲的经济表现,而在拉美情况就有所不同(Aslund, Boone, and Johnson 1996; Remmer 2001)? 为什么拉美的政策摇摆比后共产主义世界要普遍得多(Stokes 2001)? 为什么与拉美相比,民主制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似乎更有利于经济改革? 总的来说,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视野下研究经济转型大有前途。

### 7.2 制度遗产

未来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评价共产主义统治的制度遗产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影响。是否这些制度遗产对民主制和经济结果的影响在转型初期较为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减弱? 如果是这样,那么伴随改革的进程,具有不同制度遗产的国家会越来越彼此趋同。或者,这些遗产的影响会不断增加? 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未来前苏联共和国与东欧国家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在某些方面,这一研究课题与阿克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观点(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类似。他们认为,19世纪殖民遗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期,它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分为二。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比较政治学领域关于制度遗产对经济和政治结果的影响的讨论。

### 7.3 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

学者们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正式的国家制度对经济改革的影响,但关于社会制度

对市场影响的研究却不多见(Bruszt and Stark 1998; McDermott 2002; Ganev 2001)。这同样是一件憾事,因为市场经济既依赖国家制度(法院、官僚和立法机构),也依赖社会制度的复合体(网络、商业联盟和信誉机制)。有几位学者对黑帮(类似黑手党那样在国家能力弱小的地方提供保护的组织)的影响进行过研究,但对其他良性的社会组织却鲜有涉及(Varese 2001; Volkov 2002)。商业组织是阻碍还是推动了经济改革?为什么国家机构控制着某些部门,而另一些部门则受社会制度支配?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网络会妨碍或者推进市场发育?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混合,在保护所有权、形成行为规范和影响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那些从指令性经济和共产党统治之下转型的国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个问题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才刚刚开始触及。的确,指令性经济体的转型,与欧盟的兴起和东亚国家惊人的增长一样,在未来若干年内会一直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本章讨论了比较政治学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但远远没有穷尽经济转型研究的全部内容。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IOHNSON, S., and ROBINSON, J.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369-401.
- ADSERA, A., BOIX, C., and PAYNE, M. 2003. Are you being served? Accountability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2): 445-90.
- ASLUND, A. 2002. *Building 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Bloc*.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BOONE, P., and JOHNSON, S. 1996. How to stabilize: lessons from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17-313.
- BERKOWITZ, D., PISTOR, K., and RICHARD, J.-E.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legality, and the transplant effec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7(1): 165-95.
- BRUSZT, L., and STARK, D. 1998.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NCE, V.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 *Slavic Review*, 58(4): 756-93.
- CAMPOS, N., and CORRICELLI, F. 2002. Growth in transition; what we know, what we don't, and what we shou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3): 793-836.
- COLTON, T. J. 2000.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OWLEY, S. 2004. Explaining labor quiescen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om-

- parative perspectiv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3):394–429.
- DARDEN, K., and GRZYMALA-BUSSE, A. 2006. The great divide: pre-communist schooling and post-communist trajectories. MS. New Haven.
- DEMELO, M., DENIZER, C., and GELB, A.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patterns of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 DIERMEIER, D., ERICSON, J., FRYE, T., and LEWIS, S. 1997. Credible commitment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role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ors. Pp. 20–42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 ed. D. Wei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JANKOV, S., and MURRELL, P. 2002.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a quantitative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3):739–92.
- DUCH, R. 1993. Tolerating economic reform: popular support for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3):590–608.
- EASTER, G. M. 2002. Politics of revenue extraction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Poland and Russia compared. *Politics and Society*, 30:599–627.
- EASTERLY, W. 2003.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ERICSON, R. 1992. Economics. Pp. 49–83 in *After the Soviet Union: From Empire to Nations*, ed. T. J. Colton and R. Legvol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Various years. London: EBRD.
- EYAL, G., SZELENYI, I., and TOWNSLEY, E.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Verso.
- FIDRMUC, J. 2000. Economics of voting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Electoral Studies*, 19:199–217.
- FISCHER, S., SAHAY, R., and VEGH, C. 1996. Stabilization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early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2):45–66.
- FISH, M. S. 1998.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2:31–78.
- 2005.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YE, T. 2004. Markets, democracy and new private business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7(4):309–31.
- 2006. Partis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MS. New York.
- and MANSFIELD, E. D. 2003. Fragmenting prote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635–57.
- FRYE, T., and MANSFIELD, E. D. 2004. Timing is everything: election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4):371–98.
- GANEV, V. 2001. The Dorian Gray effect: winners as statebreakers in postcommun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4:1–25.

- GARRETT, G. 1998.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BSON, J. L. 1998.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rkets: changes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a market economy within the mass culture of Russia and Ukraine. *Journal of Politics*, 58: 954–84.
- GRZYMALA-BUSSE, A. 2002. *Redeeming the Past: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IONES-LUONG, P. 2002. Reconceptualizing the state: lessons from post-commun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30: 529–54.
- GURIEV, S., and RACHINSKY, A. 2005. The role of oligarchs in Russian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1): 131–50.
- HAGGARD, S.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nd KAUFMAN, R.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LLMAN, J. 1998.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World Politics*, 50(2): 203–34.
- IONES, G. and KAUFMANN, D. 2003.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4): 732–50.
- HENDLEY, K., MURRELL, P., and RYTERMAN, R. 2001. Law works in Russia: the role of legal institutions in the transactions of Russian enterprises. Pp. 56–94 in *Assessing the Value of the Rule of Law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d. P. Murrel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OFF, K., and STIGLITZ, J. 2004. After the big bang: obstacle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transition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 753–63.
- HOLMES, S. 1996. Cultural legacies or state collapse? Pp. 22–76 in *Perspectives on Postcommunism*, ed. M. Mandelbau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ISHIYAMA, J. 1997. The sickle or the rose? Previous regime type and the evolution of ex-communist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 299–330.
- TACKSON, J. E., KLICH, J., and POZNAŃSKÁ, K. 200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and's Transition: New Firms and Reform Govern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J. 2000. *A Fistful of Rub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ussian Banking Syste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N, D. 2005. Myths and realities of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Global Competition Report*. 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
- KITSCHOLT, H. 2003. Accounting for postcommunist regime diversity: what counts as a good cause? Pp. 49–88 in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 ed. G. Ekiert and S. Ha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MALESKY, E. 2000.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ost-communist economic reform. Paper presented



-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KOPSTEIN, J.S., and REILLY, D. 2000. Geographic diffu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st-communist Europe. *World Politics*, 53(1): 1–30.
-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 J., and STEP AN, A.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TON, D., and SACHS, J. 1990.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75–147.
- MALESKY, E. 2005. At provincial gat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economic reform. Ph.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 MATTLI, W., and PLUMPER, T. 2002. The demand-side politics of EU enlargement: democracy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EU membership.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9: 550–74.
- MAU, V. 2000. *Russia's Economic Reforms as Seen by an Insider: Success or Failure?*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MCDERMOTT, G. 2002. *Embedded Politics; Industrial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Postcommunism*.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MCMILLAN, J., and ZOIDO, P. 2004. How to subvert democracy: Montesinos in Peru.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4): 69–92.
- MEANEY, C. S. 1995. Foreign experts, capitalists, and competing agendas: privatization in Poland, Hungary and Czechoslovak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8(2): 275–305.
- MURPHY, K.,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1992.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 MURRELL, P. 2003. Relative levels and the character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Policies*, ed. J. Fidrmuc and N. Campo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 NAUGHTON, B.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 1991. 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ocial Research*, 58(4): 865–92.
- PLUMPER, T., SCHNEIDER, C., and TROEGER, V. Forthcoming. The politics of EU eastern enlargement: evidence from a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POP-ELECHES, G. 2006. The long arm of the past: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Unpublished paper. Princeton.
-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IAN, Y. 2003.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Pp. 297–333 in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ed. D. Rodri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MMER, K. 2001.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2: 29–59.
- RODRIG, D. 1996.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9–41.
- 2000. Institutions for high quality growth: what are they and how to acquire them.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5(3): 3–31.
- ROLAND, G.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OSATO, S. 2003. The flawed logic of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4): 585–602.
- ROUBINI, N., and SACHS, J. 1989.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budget deficits in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A European Forum*, 8: 101–27.
- SACHS, J. 1993. *Poland's Jump to a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4. Russia's struggle with stabiliza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evidenc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57–80.
- SACHS, J., and Woo, W. T. 1992. Structural faction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9(18): 101–45.
- SCHAMIS, H. 1999.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 51(2): 236–68.
- SCHIMMELFENNIG, F. 2001.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1): 47–80.
- SCHROEDER, G. E. 1979. The Soviet economy on a treadmill of “reforms.” Pp. 65–88 in *Soviet Economy in a Time of Change*. Washington, DC: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 SHLEIFER, A., and TREISMAN, D. 2000. *Without a Map: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and VISHNY, R. 1998.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ONIN, K. 2003. Why the rich may favor poor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715–31.
- STIGLITZ, J. 2000.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Pp. 27–56 i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B. Pleskovic and J. E. Stiglitz.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STOKES, S. 2001. *Mandates and Democracy: Neoliberalism by Surprise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R. 2003. *Lending Credi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REISMAN, D. 2003. Postcommunist corrup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Policies*, ed. J. Fidrmuc and N. Campo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 and GIMPELSON, V. 2001.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and Russian elections, or the manipulations of “Chuda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225–46.

- TUCKER, J. 2006. *Regional Economic Voting in Russia, Poland, Hungary, Slovakia, and the Czech Republic, 1990–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CHUDOVA, M. A. 2005. *Europe Undivided: Democracy, Leverage, and Integration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RESE, F. 2001. *The Russian Mafi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New Market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LKOV, V. 2002. *Violent Entrepreneurs: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Making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Y, L. A. 2003. Pluralism and weak states: the case of Moldov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7 (3): 454–82.
- 2005.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fourth wave: the cases of Belarus, Moldova, Russia, and Ukraine. *World Politics*, 57(2): 231–61.
- WILLIAMSON, J. 1994. In search of a manual for technopols. Pp. 9–48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ed. J.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YANOVSKIY, K., KOCHETKOVA, O., MAZHUGA, A., CHERNY, D., JAVORONKOV, S., SVOIE, D., HOBSON, P., and DESIARDINS, P.-M. 2001. *Political-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Russian Regions*. Moscow: Consortium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and Advice.
- ZHURAVSKAYA, E. 2006. Whither Russia: a review of Andrei Shleifer's *A Normal Count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forthcoming).

## 译 后 记

2011年,经十余年的酝酿、论证、准备和协调之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于成立了比较政治学系。建立这个系的目的,既是为了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是希望为本院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比较扎实的政治学基础。其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忽晓萌女士找到我,约请我组织翻译这部《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我当即欣然应允,心想正好可以作为比较政治学系成立的纪念。

这部《手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而绝大多数撰稿人也都是活跃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一线的代表性学者,每一章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比较政治学这个研究领域的基本历史、研究现状和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在美国,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和学生的必读书。从该《手册》的内容可以看出,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方法论的自觉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理论上对西方中心论的突破,是当前国外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由此可以认为,比较政治学已经从第一个阶段单纯的制度和法律研究,经过第二个阶段以政治发展为中心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会是一个真正富有成果的阶段。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刚刚起步。相信这部《手册》的翻译和出版,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应该能够提供一个较高的起点。

接受了该《手册》的翻译任务之后,我找了几位英语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在校研究生,请他们分头开始翻译工作。一年后,翻译初稿陆陆续续交到我的手里,之后就是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校改过程。在此期间,我几乎为这部《手册》用上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感觉上并不比自己写一部学术著作轻松。

翻译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该《手册》的读者主要会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和学生,而且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参考文献,所以文字表达的准确严谨是我最基本的追求。当然,原作者的写作习惯相差甚远,有的作者文字简洁明快,但也有的艰深费解。

作为学术著作,我想最重要的考虑不是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清楚明白地传达作者的思想。这样一来,译文在文风上反倒比较统一了。这种翻译方法是否可取,当然可以讨论。另外,为便于读者理解,译文中适当增加了一些注释;对于原文文字和表达上可能的错漏,也以译者注的形式标注出来。

本书各章的翻译者为:郭小雨第一、第八部分,张冲第二部分,邱晨曦第三部分,谢若莎第13、14、15章,韩毅第16章,贾力楠第五部分,马嘉鸿第21、22章,赵心知第23、24、25、26章,陈宇慧第七部分,全书由我统一校正。当然,虽然我自认为尽了最大努力,译稿实际上仍然具有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余地,甚至错误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校译的工作毕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所以还是勉强交稿了。另外,一些术语在国内尚无定译,比如 accountability、clientelism 等等都只能提供尝试性的译法。所有错误与不妥之处,尚乞方家教正。

唐士其

2015年12月22日

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ISBN 978-7-01-015764-1



9 787010 157641 >

定价：128.00元(上、下册)